

張永 著

鍛造 組織

紅軍與蘇區史新探

1927 ——— 1934

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



張永

生於1971年，遼寧瀋陽人，歷史學博士，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中國近現代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1989-1993年就讀於浙江大學機械工程系，獲工學學士學位；1993-1996年就讀於北京大學城市與環境學系，獲理學碩士學位；1996-2000年在北京做房地產估價師；2000-2003年就讀於北京大學歷史系，獲歷史學博士學位；2003年至今在北京大學任教（2014-2015年在澳大利亞國立大學訪學一年）。主要研究方向為民國政治史、中共黨史、中國近現代環境史，在《近代史研究》、《史學月刊》、《中共黨史研究》等重要學術刊物發表專題論文二十餘篇，出版專著《民國初年的進步黨與議會政黨政治》、《梁啟超與護國運動》，本書是作者十幾年中共黨史研究的匯總成果。



張永 著

鍛造 組織

紅軍與蘇區史新探

1927 ——— 1934

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

鍛造組織——紅軍與蘇區史新探(1927—1934)

張永 著

責任編輯:章 明

封面設計:石慶華

ISBN 978-988-31266-0-1

2023年3月第1版

版權所有 不得翻印

All rights reserved

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 2023

Copyright China Cultural Communication Press

香港新界粉嶺安全街33號豐盈工貿中心5字樓G座

Unit G 5/F, GOOD HARVEST CENTRE, 33 ON CHUEN STREET, ON LOK TSUEN,

FANLING, NEW TERRITORIES, HONGKONG

Tel: 00852-3921 6033

Fax: 00852-2528 5333

發 行: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

字 數: 372千字

開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張: 27.65

定 價: HK\$ 175元

自序： 列寧主義革命黨與現代中國的政治重建

中國近現代政治史激烈動盪、紛繁複雜，研究者從不同視角出發，建立了不同的理解框架，其中影響較大的有“革命”模式、“現代化”模式、“衝擊—反應”模式等，筆者嘗試探索的研究思路姑且可以稱之為“崩潰—重建”模式。不過本書並非概念先行之作，實際上在最初幾項研究先後進行時，筆者主要著眼於重建歷史事實，並沒有寫成一本書的想法。只是在完成了四篇相互獨立的論文之後，隨著思考的深入，貫通的感覺忽然降臨，幾項獨立的研究產生了關聯。本書的核心思想在混沌之中逐漸浮現——革命不僅是破壞舊秩序，也是建立新秩序，列寧主義革命黨的組織成長同時就是現代中國的政治重建，當代中國的政治制度與政治文化起源於這個歷史過程。

亨廷頓認為，政治秩序崩潰是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化中的重大危險，因此他在《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中提出發展中國家需要強大政府的觀點，並詳細比較分析了建立現代政府的幾種模式，包括：歐美議會民主制、傳統君主制、軍人政權、列寧主義革命黨等。亨廷頓雖然是一個美國人，但他清醒認識到，美國自治傳統中形成的政治制度，未必適合需要強大政府的發展中國家，美國人局限於自己的政治經驗，往往難以理解發展中國家在後發現代化的急劇變革中建立政治秩序的艱難。他甚至說，“在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許多國家，政治體制面臨著權威的集中、機構的分離和參與的擴大等三方面的需求。看來最適合於同時實現三方面目標的制度是一黨制”，進而認為發展中國家要學習政治經驗，最好去莫斯

科或北京，而不是華盛頓。^①

近現代中國經歷了徹底的政治崩潰，長期陷於戰亂之中，中國近現代政治史就是一部政治崩潰和試圖重建的痛苦掙紮的歷史。從建黨、建軍到建國的政治重建道路是現代中國的歷史出口，在這一過程中以民主集中制為原則的列寧主義革命黨發揮了關鍵作用。中國先後嘗試亨廷頓提到的幾種主要模式，清王朝、民初議會制、北洋軍人政權都試圖應對現代化挑戰，但都沒有成功。

一、清王朝、民初議會制和北洋軍人政權的先後失敗

傳統君主制很難適應現代化轉型，事實上只有英國、日本等少數國家的君主制經過重大變化後倖存，法國、德國、俄國以及中國等多數國家的君主制都在現代化過程中覆滅。自1840年鴉片戰爭打破清王朝的封閉以後，古老中國就被捲入到現代世界的殘酷競爭當中，清王朝雖然通過洋務運動迎來了所謂“同光中興”，但日本的迅速崛起使中國生存的外部環境大大惡化，1895年甲午戰爭失敗引來列強跟進的瓜分狂潮。清政府未能通過戊戌維新走上自強之路，反而在庚子之變中招致八國聯軍入侵和屈辱的《辛醜條約》。在弱肉強食的現代世界，大英帝國這樣屢戰屢勝的強國能給王室帶來榮耀，而落後國家的君主制只能在列強不斷羞辱中失去權威，更何況清王朝還是一個孤懸在主體民族之上的少數民族政權。在自救式的新政中苟延殘喘十年之後，喪權辱國的滿清帝國在1911年辛亥革命中土崩瓦解。

1912—1913年議會民主制的短暫嘗試也難有成功的希望。民主制需要廣大人民全面深入的參與，在多數人缺少民主理念的情況下，民主制很難運行，即使勉強運行，也很難擔當落後國家迅速追趕發達國家的歷史使

^① 薩繆爾·亨廷頓著、王冠華等譯：《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三聯書店1989年，第124—125頁。

命。民國初年的議會民主制只是幾種政治力量的脆弱平衡的產物，並沒有社會基礎。辛亥革命以後全國陷於分裂狀態，參與推翻清王朝的北洋派、革命派、立憲派、地方實力派都沒有能力武力統一全國，只好接受議會制度作為分享權力的妥協機關。一旦平衡被打破，北洋派鎮壓二次革命後取得軍事優勢，議會制就會被輕易推翻，建立起袁世凱的獨裁統治，民初議會政治很難逃脫曇花一現的命運。^①

軍人政權或許是機會較大的政治重建模式。袁世凱在民國初年成了很多人矚目的救星，他是當時中國最大軍事力量——北洋集團的領袖。在1913年鎮壓二次革命後，袁世凱確實在1914–1915年基本恢復了國家統一，各省的稅款開始上繳中央。梁啟超等人對袁世凱寄予很大希望，期待他領導中國通過開明專制道路走向富強。表面看來，袁世凱似乎有機會像土耳其的凱末爾將軍或者韓國的樸正熙將軍一樣，通過軍人集團的力量建設現代國家。但是，軍人政權在土耳其或韓國這樣較小的國家重建秩序相對容易，要在中國這樣幅員遼闊的大國建立秩序則更加困難。^②《史記·韓信盧縮列傳》中記載劉邦把從小一起長大的密友盧縮封為燕王，不料盧縮從長安到燕國後，竟很快起了異心，走向反叛。^③袁世凱復辟帝制後，蔡鍔在遙遠的雲南起兵反抗，以馮國璋為首的北洋眾將大多在各地坐觀勝敗，不肯出力，結果袁世凱在各派力量群起反對中身敗名裂而死。

袁世凱死後，最大的軍事力量北洋集團分裂，中國在政治上徹底破碎，陷入黑暗的軍閥混戰。政治規則倒退了幾千年，回到叢林部落時期，暴力成為主要的政治語言，有幾千條槍可以佔據一個省，有百條槍可以佔據一個縣，有幾條槍也可以占山為王、橫行鄉裡。土匪消滅不了就收編為正規軍，正規軍打了敗仗也可以變成土匪，土匪出身的張作霖攻佔北京後，竟自稱國家元首。雖然名義上有國會、省議會、縣議會，但都不過是軍

① 張永：《民國初年的進步黨與議會政黨政治》，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383頁。

② 張永：《梁啟超與護國運動》，天津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53頁。

③ 司馬遷：《史記》，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556–557頁。

閥手中的玩物。這些軍事勢力缺乏現代思想和組織能力，控制範圍最大只能到幾個省，再進一步擴張就走向分崩離析，在大大小小軍閥的廝殺之中，看不到恢復國家統一、重建政治秩序的希望。

二、列寧主義革命黨和蘇聯道路

正當中國在軍閥混戰、土匪橫行的政治崩潰中痛苦掙紮時，俄國十月革命爆發，布爾什維克黨革命成功，創建了紅軍，短短幾年就在殘酷內戰中統一了廣袤國土，建立了強大的國家——蘇聯，於是一條新的道路出現在中國人面前。俄國是相對落後的大國，國情與中國比較相似，這是俄國政治道路對中國影響深遠的基本原因。列寧面對的問題是：如何在沙皇退位後的政治崩潰中重建政治秩序？如何讓俄國迅速擺脫落後地位？如何同時避免嚴重貧富分化？他試圖通過激進的社會革命一舉解決這些問題，而實現目標的組織工具就是列寧主義革命黨。

二十世紀初，俄國各地出現了不少列寧這樣的社會革命者，但是他們很分散，形不成很大的政治力量。列寧在1902年發表《怎麼辦》，主張建立統一組織。1903年俄國各地代表聚會布魯塞爾，會上在討論黨章時，列寧主張黨員應受嚴格的紀律約束，和好友瑪爾托夫發生激烈爭論，最終引發社會民主工黨分裂為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

當時俄國社會革命者群體只是一個小圈子，彼此都很熟悉，列寧固執己見、引發分裂，讓很多人不理解。1904年，列寧在《進一步，退兩步》中又進一步闡發了中央集權的革命黨理論。列寧批評某些人“力求自下而上地來行動，因此在凡是可能的地方和凡是可能的程度內，都堅決主張實行自治制”，主張實行達到“無政府主義地步的‘民主主義’”，認為他們“到處拚命維護自治制，力圖削弱黨的紀律，力圖把黨的紀律化為烏有，他們的傾向到處都在導向組織的瓦解”。列寧自己“堅決主張擴大中央機關對於部分的權力”，中央機關應該“是一個由於自己的活動和自己的革命徹底性而享有極大威信的小組”，“在恢復黨的真正統一並在這個統一的基礎

上解散各個過了時的小組的時代，這種上層機關必然是黨的代表大會，即黨的最高機關”。^①

很顯然，列寧主義政黨思想的核心是：革命黨必須有執行力，只有權力集中、紀律嚴格才能有執行力，否則就只是知識份子的清談俱樂部。列寧不僅提出理論，還實際領導布爾什維克。布爾什維克人數不多，但組織非常嚴密。一次大戰期間，俄國連吃敗仗，沙皇被迫退位，國家陷入政治崩潰，立憲民主黨、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等都積極爭奪政權，此時布爾什維克雖然只有幾萬人，卻具有極強的執行力，最終贏得群眾，建立紅軍，統一國家，創建了蘇聯。

需要指出的是，列寧主義革命黨的組織原則是民主集中制，雖然強調集中和紀律，但也尊重黨內民主，黨在決議之前可以自由討論。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等領導人經常與列寧公開爭論，在是否十月革命、是否與德國簽訂和約等重大問題上都發生過激烈對抗，列寧通常可以依靠多數票通過自己的想法，但有時也會遭遇挫敗，他並不能凌駕於組織原則之上。可以說，列寧主義革命黨是一種兼顧兩方面的現代政黨，民主是其現代的一面，集中又使其適應相對落後的社會環境，這種富有彈性的制度在發展中國家很有競爭力。

亨廷頓對列寧的政治創新評價很高，他認為：“布爾什維克革命以前，沒有一場革命在政治上是全面的，因為還沒有哪位革命領袖系統地形成過一種能夠闡明如何組織政治參與的擴大並使之制度化的理論，而這正是政治的本質。列寧解決了這個問題，從而完成了20世紀最有意義的政治創新”。“許多不同類型的集團——宗教的、民族主義的、階級的——都能把新的參與者帶入政治，但是只有共產黨人才一貫表現出有能力去組織和規劃這種參與，共產主義運動對現代政治的突出貢獻，不是革除和摧毀現存制度，而是組建和創造新型的政治制度。”^②

① 列寧：《進一步，退兩步》，《列寧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92、495頁。

② 薩繆爾·亨廷頓著、王冠華等譯：《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第307頁。

值得一提的是，英國著名思想家和民主社會主義者羅素於1920-1921年到中國講學。他經過一年的觀察和思考，在離開中國前夕的臨別講演中提出：中國很難走歐美道路，蘇聯道路更適合中國。羅素認為中國不具備直接實行民主制度的條件：“中國政治的改革，非經若干年後，不能摹擬西方的模型，採用德謨克拉西的體制。德謨克拉西以為，一國國民是能讀書寫字且能略具政事知識的”，“若在俄國和中國這些地方，這類條件全都缺乏，人民既沒有教育，又不熟悉實業的方法，所以俄國式的手段，是最適宜最可能的。”他認為中國需要一個勇敢堅強的革命團體：“只要有一萬有決心的人，為一種理想所激動，而志願冒著自己性命危險”，“這一萬人必須是正直的，勇敢的，不沾腐敗氣習的、工作不倦的”。^①

在現代中國政治重建的過程中，出現了很特別的情況，1921年建立的共產黨和1924年改組的國民黨，都試圖走列寧開創的建黨、建軍、建國的道路，都採用了列寧主義革命黨的組織形式。兩個政黨、兩支軍隊、兩個政權為爭奪重建中國的主導權展開了激烈競爭，以至於如果不把兩者放在一起對比分析，就很難揭示出現代中國歷史演進的深層邏輯。

三、建黨——共產黨的組織成長與國民黨的派系紛爭

國民黨領袖孫中山很快認識到蘇聯道路的價值，他雖然不接受階級鬥爭和共產主義學說，但對列寧主義革命黨的組織模式卻極為推崇。事實上，早在1913年二次革命慘敗之後，孫中山就痛感國民黨一盤散沙，所以他在日本成立中華革命黨的時候，要求黨員按手印宣誓服從他，但黃興等民主革命家認為這種近於會黨的形式有損人格，因而拒絕加入。列寧主義革命黨的民主集中制顯然更符合現代原則，孫中山聽蘇聯顧問鮑羅廷講解之後，大為欽佩，請鮑羅廷幫助籌備召開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

^① 羅素：《中國到自由之路——羅素臨別講演》（1921年），《羅素談中國》，浙江文藝出版社2001年，326-327頁。

按照列寧主義革命黨模式改組國民黨。

孫中山在1924年1月國民黨一大上反復強調，改組的目的是要建立權力集中、紀律嚴格的黨，黨員要犧牲個人自由，黨要像軍隊一樣。他在1月20日開會詞中說：“如果個人能夠犧牲自由，然後全黨方能得自由”，“等到全黨有了自由，有了能力，然後才能擔負革命的大事業，才能夠改造國家。本黨以前的失敗，是各位黨員有自由，全黨無自由，各位黨員有能力，全黨無能力。”^①他在1月30日閉會詞再次強調：“本黨黨員從前看見政綱有不對的地方，做事就立刻和政綱相矛盾，這是本黨自亂的大毛病”。“黨員的奮鬥是和軍隊的奮鬥一樣，軍隊在奮鬥的時候，如果司令官的命令一時不對，當士兵的都要服從，照原來的命令去共同前進。若是都能前進，或者將錯就錯，也能打勝仗”。“本黨黨員，從前常有自以為是的，便要獨斷獨行，所以弄到全黨的精神非常渙散，革命事業不能成功。以後要我們的革命事業完全成功，便要大家一致行動”。^②蔣介石也認為：“蘇俄幫助我們，不只是物質幫助，並且是知識的幫助。最大的幫助，是要我們紀律嚴重，使同志有紀律行動。這才是最大的幫助”，“沒有紀律，團體便沒有用。各種幫助中，最好是這一種。”^③

但是，國民黨改組剛剛一年，孫中山就於1925年3月去世。國民黨失去領袖，立刻陷入分裂狀態。雖然孫中山在國民黨一大號稱重新建黨，但實際上國民黨的核心1905年成立同盟會時就形成了，早期的財政基礎是海外華人，很多元老如鄒魯、謝持等對學習蘇聯並不認同，孫中山在世時就有爭論。孫中山剛剛去世，國民黨內就出現了反共的西山會議派，到1927年又出現南京蔣介石政府和武漢汪精衛政府的分裂，國民黨第一步建立組織嚴密的黨就沒有實現，長期陷於派系紛爭。

①《廣東文史資料第42輯——中國國民黨“一大”史料專輯》，廣東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頁。

②《廣東文史資料第42輯——中國國民黨“一大”史料專輯》，第80-81頁。

③《鮑羅廷在華工作經過——汪精衛在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1926年1月6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5)，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年版，第21頁。

共產黨沒有歷史包袱，沒有像國民黨西山會議派那樣不認同列寧主義原則、鬧分裂的派系。共產黨從1921年建黨開始，就是共產國際的支部，是完全按照列寧主義原則建立的。但是，民主集中制是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新事物，即使對於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成長起來的新青年，要想學會如何組織和運作這種政黨形式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關鍵的問題是：何時需要民主？何時需要集中？民主和集中之間的平衡如何把握？如何建立鐵的紀律，同時又保持黨的活力？

共產黨成立之後，一直發展比較迅速，特別1925年五卅運動以後，黨員從不到一千人在一年多時間增加十倍，1926年北伐戰爭節節勝利，到1927年五大前後中共黨員猛增到約六萬人。但是，黨員的迅速增加並不等於組織的強大，甚至可能帶來組織的混亂，短時間內蜂擁入黨的新黨員難免泥沙俱下，很多人只是在形勢順利的情況下尋找個人出路，並沒有堅定的信仰和組織訓練。

列寧在十月革命勝利之後，發現大批湧入的黨員中有很多不合格，於是連續發動清黨，1919年清黨開除14萬黨員，占總數五分之二；1921年清黨開除17萬人，占總數四分之一。^①中共成立之初，黨組織一直比較寬鬆，紀律要求並不嚴格，黨員中知識份子比重很大，在民主和集中之間還是更偏向民主。黨組織從未大規模清黨，黨也很少處罰黨員，很多黨員並不嚴格執行黨的決議，這在1927年國共分裂的混亂局勢中造成了嚴重後果。

當時黨中央認為有些地方工人運動和農民運動過於激進，要求地方幹部糾正，但很多幹部都自行其是，拒絕服從中央。比如贛州著名工人領袖陳贊賢，“黨已發覺陳贊賢同志和贛州工潮的‘左’傾錯誤，決定要分別解決。但是，陳贊賢同志固執己見。雖然陳贊賢為工人階級利益的出發點是好的，但不肯執行黨的決定，使結果適得其反。當時黨要陳離開贛州城，到江西省委去。然而陳不接受省委意見，又私自回到贛州去。”^②

① 陳錫華：《淺談列寧時期的清黨經驗》，《理論戰線》第195（1983年）。

② 陳奇涵：《贛南黨的歷史》，《回憶中央蘇區》，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頁。

1927年3月陳贊賢在贛州被殺害，是國共衝突激化、蔣介石走向反共的重要標誌。

1927年黨組織的混亂是很明顯的，整肅黨紀成為中央十一月會議的重要議題。周恩來說：十一月會議“規定了政治紀律，這也是國際代表提出的。我們當時覺得這一條很新鮮”。^①連周恩來都覺得新鮮，說明以前很少整肅紀律，會議通過《政治紀律決議案》處罰被認為違反政治紀律的高級領導人。“譚平山同志自第五次大會後當任國民政府農民部長一直到南昌暴動前後的行動與主張，完全反對土地革命的政策。其行動更多離開黨而自由行動”，“其于屠殺豪紳和沒收等政策，亦時妨礙其行動，這些表示都是違背本黨組織的行動，應即開除黨籍。”“張國濤同志受中央常委委託赴南昌指導暴動，但國濤同志到九江南昌後不執行中央命令，反懷疑暴動主張，甚至反對暴動”，“國濤同志應開除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資格。”^②

自此以後，中共的黨紀日益嚴格，陳獨秀、彭述之等先後被開除黨籍。到了蘇區和紅軍肅反時期，違反組織原則就不僅是開除的問題，甚至有可能失去生命，黨紀之森嚴幾乎到了不近人情的程度。在以黨建國的模式中，是先建立黨內政治秩序，然後通過黨來建立國家的政治秩序。在建立黨內秩序方面，共產黨遠比國民黨成功。

四、以黨建軍——國民黨派系戰爭與紅軍的崛起

建黨、建軍到建國三部曲中，建軍是關鍵的一步。在軍閥混戰、暴力充斥的政治環境裡，沒有軍隊就沒有政治話語權，就等於退出政治舞臺。孫中山飽嘗沒有軍隊的痛苦，在1924年國民黨改組之後，立即著手建立黃

^① 周恩來：《關於黨的“六大”的研究》（1944年3月3、4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11），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235頁。

^② 《政治紀律決議案》（1927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3），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482-483頁。

埔軍校。校長蔣介石在國民黨一大還不是中央委員，在國民黨中的政治地位甚至不如毛澤東，但依靠黃埔軍的崛起，他在幾年內上升為國民黨領袖。那些沒有軍隊的政治派別，比如脫離共產黨、稱紅軍為土匪的陳獨秀派，還有胡適等人的自由派，則在政治上很難有所作為。

但是，國民黨的主要軍事派系中，只有黃埔系是國民黨改組後建立的，算得上以黨建軍，稱得上“黨軍”。其他軍事派系都形成於改組之前，陳銘樞、張發奎等的廣東軍隊和孫中山關係較深，革命性較強，李宗仁、白崇禧的廣西軍隊就要差一些，唐生智的湖南軍隊就差得更多了，馮玉祥的西北軍、閻錫山的晉軍、張學良的東北軍都起源於北洋時期，東北軍在北伐戰爭中甚至是敵對一方。這些軍事派系主要以私人關係結合，軍隊效忠於派系領袖，黨只是一塊招牌，黨紀更無從談起，所以常被稱為新軍閥。國民黨自稱“黨國”，其實“軍國”色彩很濃，但又不是統一的軍人政權，而是各軍事派系合作的聯合軍人政權。

國民黨的作用，是為各派軍隊提供一個上層政治結構，因為沒有一個派系強大到足以消滅所有其他派系，真正統一中國。北伐戰爭期間，本來蔣介石是以軍權挑戰黨權的代表，甚至被武漢國民黨中央開除黨籍，但在1927年8月，他在徐州戰敗形勢不利的情況下，宣佈為了黨的統一、為了南京政府和武漢政府的合併，願意犧牲個人權位，主動下野。

這是蔣介石的高明之處，說明他不是簡單的軍人，很有政治頭腦。蔣介石明白，單靠南京政府的軍隊，不僅難以消滅其他軍隊，統一國家，反而可能遭到各派軍隊圍攻而失敗。當時白崇禧說，南京政府的骨幹部隊，只有黃埔系第一軍的八個師和桂系第七軍的六個師，總共六萬多人。^①蔣介石剛宣佈下野，孫傳芳就率五萬多人過江猛攻南京，形勢一度極為險惡，南京政府辦事人員已經開始逃亡。李宗仁、白崇禧、何應欽率第七軍和第一軍經過血戰，勉強消滅了孫傳芳部隊，但要靠這六萬多人統一中國，短

^① 白崇禧：《招待上海各界茶會致詞》（1927年8月18日），黃嘉謨編：《白崇禧將軍北伐史料》，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版，第133頁。

期內是絕不可能的，何況桂系和黃埔系本身也矛盾重重。

蔣介石認識到，黨仍然是很有用的，只有依靠黨的結構才能號令其他軍隊，進而統一全國。即使他後來驅逐蘇聯顧問、甚至與蘇聯斷交，但從未放棄列寧主義革命黨的組織形式。蔣介石為了國民黨的統一，表面上犧牲自己、主動下野，實際上卻可以在黨內贏得更高的聲望。他知道自己雖然暫時下野，但還會以更高的姿態歸來，國民黨離不了他。汪精衛、胡漢民等政治領袖雖然資歷很高，但是他們沒有自己的軍隊，很難得到其他軍隊領袖的敬畏，而蔣介石有自己的黃埔系軍隊，這支年輕的軍隊正越來越強。李宗仁、白崇禧、唐生智、馮玉祥等雖然有自己的軍隊，但他們在國民黨中資歷很淺，不可能超越蔣介石，他畢竟是追隨孫中山多年的老黨員。《大公報》報導1927年蔣介石下野準備去日本之前，白崇禧、蔡元培、孫科、朱培德、何應欽等都到上海“懇切挽留，但蔣行意甚堅，無可挽留”，^①報刊上也紛紛發表挽留蔣的文章，其聲望比反而比下野之前更高。蔣介石在1927年、1931年和1949年三次下野，但總能復位，他以黃埔系軍隊為後盾，挾國民黨中央以令諸侯，在對李宗仁、馮玉祥、閻錫山、陳銘樞等軍事派系的鬥爭中始終掌握主動權。

國民黨軍隊的派系戰爭給紅軍崛起創造了機會，中國共產黨早期是個知識份子為主的團體，並不重視軍隊，但自從在1927年的血雨腥風中走上武裝鬥爭的道路後，建立紅軍成為最重要的任務。1936年主力紅軍四萬人彙聚陝北的時候，蘇區地方組織和白區黨組織損失殆盡，此時幾乎整個黨都在紅軍當中，絕大部分黨員都是紅軍。

紅軍是共產黨一手創建的，其組織系統始終統一。大多數主力紅軍都是中共中央直接派人建立的，這和李宗仁、馮玉祥、閻錫山、張學良等先有自己的軍隊、後加入國民黨完全不同。中央派周恩來等發動南昌起義，失敗後余部由朱德率領，成為中央紅軍的一個來源；中央派毛澤東到湖南發動秋收起義，余部成為中央紅軍的另一個來源；中央先後派徐向前、許

^①《蔣必出洋，汪刻在漢》，《大公報》1927年9月25日。

繼慎、曾中生等到鄂豫皖整編遊擊隊，創建了鄂豫皖紅軍；中央派賀龍、周逸群到湘鄂西，創建了湘鄂西紅軍。

當然，紅軍中也有所謂“山頭”，但紅軍的山頭和國民黨軍的派系不可同日而語，國民黨蔣、馮、閻、李、張之間發生了你死我活的血戰，而紅軍的山頭之間最多只是鬧意見而已。中央紅軍一、三軍團之間，鄂豫皖紅軍的31師和32、33師之間，湘鄂西紅軍的二軍和六軍之間，都鬧過意見，但也都比較容易就克服了。即使一方面軍和四方面軍1935年在草地分裂之際，雙方情緒非常激烈，徐向前仍然脫口說出：“哪有紅軍打紅軍的道理！叫他們聽指揮，無論如何不能打！”^①雙方只是各自走路，並沒有發生真正的武裝衝突。

紅軍是徹底的黨軍，各級黨組織是紅軍的靈魂，黨的組織原則也就是紅軍的原則，紅軍在運作民主集中制方面的探索，在中共政治制度發展中佔據重要地位。在創建初期，紅軍的權力結構還是偏于民主的。共產黨的骨幹是一批五四青年，而五四運動的核心理念就是民主，毛澤東直到晚年都認為井岡山紅軍是“一場槍桿子青年運動”，是“五四青年運動的繼續和發展”。^②當這批五四青年著手創建軍隊時，民主理念就被帶到紅軍中來，創建初期的紅軍有著濃厚的民主氣氛。

毛澤東對自己親手開創的紅軍民主制度非常自豪，在給中央的報告中重點介紹：“紅軍的物質生活，如此菲薄，又如此苦戰不息，仍能維持不疲者，黨的作用外，就是徹底的民權主義之實行。官長不打士兵，官兵穿吃一樣，待遇平等，士兵有開會言論之自由，繁縟禮節之廢除，經濟之徹底公開”。“這些辦法，使士兵特別滿意；尤其是新來的俘虜兵，他們感覺得前日的營壘中與今日的營壘中完全是兩個世界。他們雖然感覺紅軍的物質生活比較不如白軍的好，但精神得到解放，所以尚能相安。同時一個兵，前日替敵軍打仗不如今日替紅軍打仗之勇敢，乃是這種民權主義的影響。

① 徐向前：《徐向前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2007年版，第335頁。

② 馬社香：《“井岡山的革命精神不要丟了”——王卓超回憶1965年毛澤東在重上井岡山期間的一次談話》，《黨的文獻》2006年第3期，第22頁。

紅軍像一座火爐，俘虜兵過來馬上熔化，這是一種事實。中國不但工農群眾需要民權主義，軍隊需要民權主義更切”。^①

但是，在殘酷的戰爭環境裡，過度民主也會帶來副作用，特別是紅軍中多數是不識字的農民，運行民主制常遇到難以預料的困難，有時甚至引發慘重的失敗，這決定了建軍初期的民主氣氛難以長期保持。毛澤東等人逐漸認識到紅軍中分權式民主制的弊病，開始傾向於集中權力，但朱德為代表的多數人仍堅持分權和保障民主氣氛。兩派人在重大原則問題上產生嚴重分歧，再加上劉安恭、林彪等的激烈言論，終於在1929年春夏之交引發了紅軍歷史上著名的“朱毛之爭”。當時紅四軍民主氣氛很濃，支持朱德的人佔有優勢，結果在紅四軍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上毛澤東失去多數支持，實際上被趕出了他親手創建的紅四軍。

但是，在紅四軍選舉中失敗的毛澤東卻很快得到了中央的支持。通常認為周恩來是作風民主、平易近人的領導，但在這一時期，周恩來比毛澤東更堅決、更旗幟鮮明地反對過度民主。中央收到紅四軍七大文件和內部紛爭的報告，8月周恩來起草了《中央給四軍前委的指示信》，不僅明確批評朱德的極端民主化傾向，而且認為毛澤東也沒有勇敢地捍衛集權制：“玉階主張固然有極端民主化的傾向，便是潤之的答覆也還不能對於軍隊中之黨的支部工作，尤其是在目前轉戰千里之紅軍中黨的支部工作有一明確的答覆。對於集權制沒有勇敢的回答它是在目前與敵人肉搏的環境中所絕對必需。”^②

在中央的支持之下，毛澤東重回紅四軍，1929年12月組織召開了著名的古田會議，這是紅軍走向權力集中的關鍵一步。政治委員制度的確立意味著權力逐步集中於政治領導人，“黨指揮槍”的原則大大強化了。于此同時，士兵委員會的權力卻逐漸縮小，後來被中央命令取消，1930年

^① 毛澤東：《井岡山前委對中央的報告》（1928年11月25日），《毛澤東集》第二版（2），蒼蒼社1983年版，第41頁。

^② 周恩來：《中共中央給紅四軍前委的指示信》（1929年8月21日），《周恩來軍事文選》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84頁。

10月24日《中央政治局關於蘇維埃區域目前工作計畫》中明確提出：“原有士兵委員會的組織，要使他的許可權逐漸縮小一直做到消滅。”^①1930年以後，隨著紅軍規模的擴大，權力集中於政治領導人的趨勢不斷加強，政委獲得了超越集體領導的“最後決定權”。在集中權力的過程中，有時會帶來激烈衝突，甚至引發代價高昂的肅反。經歷血與火的鍛造之後，紅軍成為高度集中統一、具有鐵的紀律和強大精神力量的軍隊，這支軍隊最終決定了中國的命運。

五、以黨建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挑戰南京政府

孫中山在1924年國民黨一大上指出，建黨的目的是以黨建國，甚至一段時間內還要“黨在國上”，並形象地把黨比作建國工人的臨時工棚，這就是國民黨“黨國”思想的來源。他在1月20日發言中說：“俄國完全以黨治，比英、美、法之政黨握權更進一步。我們現在並無國可治，只可說以黨建國，待國建好，再去治他”。“俄之革命事實上實是三民主義，其能成功，即因其時黨放在國上。我以為今日是一大紀念日，應重新組織把黨放在國上。但此說初聽之，似甚駭人聽聞，其實現在我們何嘗有國，應該先由黨造出一個國來，以後再去愛之(鼓掌)。如今日上海、廣州常見之青草地上起洋樓，必先經過一棚寮時代，此棚寮即用以儲置建築材料與工人聚居之所，由此乃可以建築洋樓。中國現有好多不明革命黨之用意，即如羨慕洋樓者，見棚寮而厭之，不知無此棚寮以儲工具材料等物，則所羨慕之洋樓，只是空中樓閣，永不能實現，故當洋樓尚未造成之前，此棚寮實為至可寶貴之物(鼓掌)。黨之於國家，即如棚寮之於洋樓，黨有力量可以建國，故大家應有此思想與力量，以黨建國(鼓掌)。”^②

^①《中央政治局關於蘇維埃區域目前工作計畫》(1930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6)，第461頁。

^②《廣東文史資料第42輯——中國國民黨“一大”史料專輯》，廣東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頁。

孫中山這段話，只有結合中國歷史和他的軍政、訓政、憲政思想才能理解，他實際上是把“黨國”看作是從“家國”到“民國”之間的過渡階段，所以把黨比作建國工人的臨時工棚。中國歷史上政權是屬於私人的，即所謂“家天下”，唐朝屬於李家，宋朝屬於趙家，明朝屬於朱家，清朝屬於愛新覺羅家，人民從不是國家的主人，從來沒有執政的訓練。孫中山認為，在這種情況下直接實行民主制是不可能的，需要一部分先知先覺者，先建立一個黨，然後依靠黨建立“黨國”，通過軍政、訓政提高人民的政治覺悟，這是一個過渡時期，條件成熟以後再實行憲政，建立完善民主制的“民國”。

但是，以黨建國的道路，是先有黨紀，後有國法。國民黨只有一個表層機構，是不同軍事和政治派系的鬆散結合，難以建立真正的黨紀，也就難以建立統一的國家制度。於是，廣西是李宗仁、白崇禧的地盤，廣東是陳濟棠的地盤，山西是閻錫山的地盤，東北是張學良的地盤、山東是韓復榘的地盤，四川是劉湘等的地盤，貴州是王家烈的地盤，雲南是龍雲的地盤，等等。名義上他們都是國民黨員，都服從黨國，但實際上他們都是各自獨立王國的國王，實行不同的制度，甚至發行不同的貨幣，只有長江中下游的幾個省是蔣介石南京政府能夠真正控制的。

當然，經過多年苦戰，中央軍取得了明顯優勢，南京政府的控制力越來越強，1935年法幣發行是一項重大成就。蔣介石依靠國民黨這一系列主義革命黨的組織形式，依靠以黃埔軍這支“黨軍”為核心的中央軍，努力削平各路諸侯，建立貨真價實的“黨國”。但是，他必須面對兩大挑戰：一個是日本侵華的步步深入；另一個就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興起。

從1929年到1931年，紅軍利用國民黨各派軍隊激烈混戰的機會，迅速發展壯大，主力發展到十幾萬人，控制了中央蘇區、鄂豫皖、湘鄂西等幾片不小的區域。蘇區人口達到上千萬，中共在各蘇區建立起革命政權，成了執政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宣告成立，毛澤東當選政府主席。

建國的決策實際上來自共產國際，當時中共並沒有很成熟的領導集體，無論是陳獨秀為核心的中央，瞿秋白為核心的中央，還是向忠發、李立

三為核心的中央，都沒有很高的威望，共產國際發揮了很大作用。1929–1930年紅軍和蘇區迅猛發展，1930年初毛澤東在給林彪的信中提出了農村武裝鬥爭的要素，半年以後斯大林也認識到這是中國革命的希望所在，當面指示前來彙報工作的周恩來，要把紅軍放在中國革命的第一位，^①並通過共產國際的一系列指示要求中共把重心從城市轉移到蘇區。此時，李立三等卻命令紅軍脫離蘇區，進攻武漢等大城市。

六屆三中全會和四中全會改組中央以後，中共中央開始把革命重心向蘇區轉移，同時加強了對各蘇區的領導和控制，先後派項英、任弼時等到中央蘇區成立中央局，派張國燾、沈澤民、陳昌浩到鄂豫皖成立中央分局，派夏曦到湘鄂西成立中央分局，大批幹部被派往蘇區。在這一過程中，中央幹部與蘇區地方幹部發生了激烈衝突。中央蘇區的項英、任弼時與毛澤東之間，鄂豫皖蘇區的張國燾與曾中生、許繼慎之間，湘鄂西蘇區的夏曦與萬濤、賀龍之間都出現了嚴重分歧，中共組織結構遇到了嚴峻挑戰。

蘇區地方幹部在創建紅軍和蘇區過程中，積累了獨特、豐富的經驗，往往感覺中央派來的幹部是外行領導內行。比如1931年7月鄂豫皖蘇區的方英提到了紅軍幹部對新成立的中央分局的態度：四軍幹部“在會議上不得不承認其錯，而在實際上是用種種辦法來破壞中央分局之威信，如說國燾同志不懂軍事，澤民同志太書生不能領導等等，所以弄成軍委在四軍中沒有什麼威信”。^②估計毛澤東對項英、賀龍對夏曦也會有類似的感覺。

但中共的力量來自集中統一的組織體系，來自黨指揮槍、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這幾項組織原則，地方幹部與中央幹部的分歧被認為是對組織體系威脅。1932年10月寧都會議上，毛澤東被解除了軍事指揮權，由於他比較遵守黨紀，沒有受到進一步打擊。但是，鄂豫皖紅軍的曾中生、許繼慎等1931年9月召開雞鳴河會議，領導全軍幹部公開對抗中央

①《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中共中央文獻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83頁。

②《方英關於紅四軍和蘇維埃政權建設問題給中央的報告》(1931年7月1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鄂豫皖時期(下)》，解放軍出版社1993年版，第279頁。

分局。萬濤等在1932年1月中共湘鄂西第四次代表大會上圍攻中央分局書記夏曦，力圖推翻中央分局，據賀龍回憶：“到會代表幾乎一致批評夏曦”，“把夏曦同志整的沒有辦法。下面拍桌子，夏在上面像死人一樣。”^①在中央的支持下，鄂豫皖、湘鄂西先後展開肅反，對抗中央分局的幹部大多在肅反中被殺，中央取得了對各蘇區和紅軍的絕對控制。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建立政治秩序的能力是驚人的，雖然中央蘇區與其他幾塊蘇區被國民黨軍隊分隔包圍，但仍能實現中央對地方的有效領導。蘇區內部，幾乎每個村莊都建立了黨支部、民兵、貧農會、婦女會、兒童團，黨組織深入基層每個細胞。土匪是近代中國政治崩潰的標誌現象，但在蘇區很快被消滅。中共閩西黨第二次代表大會決議案提到，“閩西土地革命勝利已經有了一年的歷史，在這一年中工農得到了很大的勝利，社會上盜匪絕跡、煙賭肅清，生產上大大增加，真是實現了夜不閉戶、野無遊民的現象”。^②《智取威虎山》中老土匪座山雕的原型張樂山，15歲當土匪，在東北橫行數十年，清朝、張作霖、偽滿政權都拿他沒辦法，卻在中共建立北滿政權的第一年即被剿滅，雖然此事並不在紅軍時期，卻可以說明中共政權擁有恢復農村秩序的超強能力。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和中華民國南京政府，是在中國重建政治秩序的兩個競爭性政權，它們的執政黨共產黨和國民黨在組織形式上都是列寧主義革命黨，雖然國民黨有點名不副實。南京政府在中國東南部城市的政治秩序建設上取得了進展，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則更擅長在農村重建政治秩序，而當時中國人口的絕大多數生活在農村，這一點最終決定了成敗。

當蘇區只有上千萬人口時，即使共產黨能夠通過強大組織把資源動員到極限，也很難抵消國民黨軍事力量上的巨大優勢，幾塊蘇區先後失

^① 賀龍：《賀龍關於一九三〇年冬至一九三四年間湘鄂西武裝鬥爭問題的談話》（1961年4月18-20日），《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二），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版，第654頁。

^② 《中共閩西黨第二次代表大會政治任務決議案》（1930年7月30日），《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中冊，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15頁。

敗。但共產黨通過長征把組織和軍隊的核心保存下來，在抗日戰爭中利用其在農村重建秩序的能力獲得了巨大的發展，抗戰勝利時中共根據地的人口已到達一億人。雖然國統區有四億人口，但這些人口大部分都在農村，國民黨在農村缺乏根基，控制力和動員力很弱，它能動員的力量已經不及共產黨。

中共高度集中統一的軍事指揮體系也是國民黨難以比擬的。毛澤東能在不知名的小村莊裡，靠幾部電臺指揮全國數百萬大軍，這一強大的指揮體系是紅軍時期通過嚴厲手段鍛造出來的。而蔣介石在解放戰爭最後的大決戰中，忽而乘飛機飛到瀋陽，忽而在葫蘆島登上軍艦，到處召開軍事會議，頓足捶胸、賭咒罵街，但是衛立煌、傅作義、白崇禧這些將領還是自行其是。最終共產黨把解放軍發展到數百萬人，消滅了國民黨的數百萬軍隊，統一了中國大陸，結束了辛亥革命以後的國家分裂，重建了政治秩序，創建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擴大升級版——中華人民共和國。

六、1927年與1934年的異同

回顧中國共產黨完成中國現代政治重建的驚心動魄的歷史，可以發現從1927至1934年是非常關鍵的階段。表面上看，這一階段的起點和終點似乎有相似之處，1927年中共遭受重大挫折，在國民黨的血腥鎮壓之下，黨員從5.8萬人銳減到1萬多人，處於生死存亡的邊緣。1934年中共再次遭受重大挫折，三大蘇區先後失敗，三支主力紅軍在敵軍圍追堵截中陷入苦戰，再次面臨生死存亡的考驗，似乎經過7年奮鬥，一切又回到了原點。

但實際上，1934年與1927年相比，共產黨已經發生了脫胎換骨的組織演變。1927年的中共，還是在共產國際扶持下的幼稚政黨，領導機構是不脫書生氣的知識份子群體，發動群眾運動卻不能真正領導，沒有自己的軍隊，更沒有自己的政權，到爭取政權的緊要關頭，就暴露出缺少經驗、猶豫不決的弱點。而1934年的中共，已經創建過紀律嚴明的十幾萬主力紅

軍，在上千萬人口的區域建立過強大政權，毛澤東、周恩來等人已經從激進知識份子成長為經驗豐富的軍事家和政治家，並且探索出不同於蘇聯的獨特革命道路。經過1927到1934年血與火的鍛造，中共組織已經成長為極具競爭力的軍事政治力量，在抗日戰爭中發展壯大，在解放戰爭中擊敗國民黨，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最終在長期戰亂的中國完成了政治重建，這個過程中形成的一系列組織原則也由此成為當代中國的政治傳統。

本書關注重點不在中共與外部敵人的鬥爭，而是緊扣內部的組織原則問題，包括：第一，上級與下級的關係；第二，中央與地方的關係；第三，黨和軍隊的關係；第四，中共與共產國際的關係；第五，黨和軍隊的組成成分；本書的取材和論述主要圍繞著這些問題展開。

目 录

第一章 國際指示、工農運動與中共的轉型困境	
——1927年“右傾機會主義”新探	1
一、共產國際指示爭奪領導權——嘗試理解斯大林	4
二、工農運動自發爭奪政權，中共無法建立有效領導	14
三、中共接受國際七次全會指示，但在劇變中猶豫動搖	26
四、決裂之際——中共中央妥協退讓，拒絕國際八次全會指示	35
五、小結	49
第二章 中共在武裝暴動中的組織轉型	53
一、最後的合作——初期紅軍多出自張發奎第二方面軍	55
二、八七會議決定武裝反抗——吸收“暴徒分子”入黨	63
三、南昌起義——中共第一次武裝暴動中的組織混亂	73
四、十一月會議強化黨的組織	78
五、中共在殘酷鬥爭中的換血與轉型	87
六、小結	92
第三章 紅軍對土匪武裝的收編、改造和清洗	95
一、民國初期的土匪與政治	97
二、收編土匪武裝是擴大紅軍的重要手段	100
三、改造土匪武裝——中共六大嚴厲政策和紅軍實踐中的變通	112
四、清洗——信仰力量轉化為組織力量	120

五、小結	130
第四章 朱毛之爭與紅軍權力結構的集中趨勢	133
一、紅軍初創時期的民主制度及其弊端	135
二、1929年朱毛之爭與毛澤東在紅四軍七大的挫折	152
三、中共中央對民主的認識和對毛澤東的強力支持	165
四、古田會議與政治委員權力的上升	172
五、政治委員與士兵委員會的消長——紅軍的權力集中趨勢	178
六、小結	184
第五章 紅軍的崛起與革命重心向蘇區轉移	187
一、紅軍在組織中地位演變与中国革命新道路	191
二、革命形勢好轉,紅軍集中整編,從邊緣走向中心	202
三、立三路線挑戰共產國際,六屆三中全會確定戰略轉變	210
四、革命重心移向蘇區:加強聯繫、派遣幹部、建立中央局	219
五、小結	232
第六章 六屆四中全會與羅章龍另立中央	235
一、反對派初步形成,中共中央持續壓制	238
二、黨內民主爆發,反對派爭奪領導權	249
三、六屆四中全會與羅章龍等的分裂活動	260
四、羅章龍等成立“非常委員會”及其對各地影響	269
五、小結	283
第七章 紅軍爭論、黃陂肅反與蘇區中央局的初建	287
一、紅一方面軍統一指揮權過程中的激烈爭論	289
二、黃陂肅反與富田事變	299
三、蘇區中央局的初建與中央肅反政策的實施	316
四、小結	330
第八章 中央蘇區集中體制的全面建立	333
一、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建立集中政治保衛制度	335

二、共產國際遠程操控,毛澤東失去軍事指揮權	350
三、博古推動反羅明路線,李德執掌蘇區軍事大權	363
四、第五次反圍剿中紅軍和蘇區的緊張狀態	377
五、小結	381
第九章 鄂豫皖中央分局與白雀園肅反	383
一、中央分局發現鄂豫皖紅軍存在嚴重紀律問題	386
二、紅軍公開對抗中央分局引發白雀園肅反	391
三、當時政治派系極為複雜也是肅反誘因	397
四、白雀園肅反被殺人數並非 2500 人	404
五、地方幹部在肅反擴大化中起了重要作用	407
六、小結	410
第十章 湘鄂西中央分局與夏曦四次肅反	411
一、中央分局成立前的湘鄂西初期肅反	413
二、萬濤等推翻中央分局書記夏曦的嘗試及失敗	415
三、夏曦領導湘鄂西蘇區第一次肅反	430
四、紅軍退出洪湖地區後的第二、三、四次肅反	437
五、在中共中央和任弼時幹預下結束肅反	444
六、夏曦肅反被殺人數考辨:幾百人被殺,大多是幹部	451
七、小結	454
餘論:彈性集中體制的有效性和適應性	456
參考文獻	460

第一章

國際指示、工農運動與中共的轉型困境 ——1927年“右傾機會主義”新探

1927年國共合作破裂，無疑是中國現代史上的重大事變。國民黨在這一年建立了南京政府，而共產黨在血雨腥風中走上了武裝爭奪政權的道路。關於這段歷史，中國大陸長期占主流的敘述是“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導致大革命失敗，這是當年共產國際定下的調子，顯然是一種簡單化的理解。近些年來，國內外學術界的主流觀點似乎轉變為：共產國際的錯誤指導責任更大，從七次全會到八次全會，共產國際既要中共推動激進土地革命，又要維持國共合作，這種自相矛盾的政策讓中共無所適從，最終導致了失敗。比如影響很大的《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在第三卷前言明確提到“共產國際對華政策的矛盾性和不現實性”，^①但這同樣是一種簡單化的理解。

筆者認為，北伐戰爭引發了全國性的政治動盪，腐朽的北洋政權走向崩潰，新興的國民黨派系紛雜，正所謂天下無主，群雄並起，出現了一個爭奪政權的窗口期。如果中共不能勇猛進取，等到北伐成功後國民黨逐步建立穩定政權，中共可能錯失競爭政權的機會。共產國際自上而下的指示，農民運動自下而上的壓力，都要求中共迅速轉型，積極爭奪政權。但是，文弱書生很難變為勇猛戰士，知識份子群體並不容易轉化為武裝革命黨，中共經過動搖、分化以至大換血才實現艱難轉型，具體來講：

第一，共產國際對中共的指導參考了俄國革命經驗，雖然由於信息滯

^①《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3)，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年版，第3頁。

後、國情差異，發生了不少戰術性誤判，但在戰略大方向上、甚至時機選擇上仍是老練的。共產國際七次全會上，斯大林強調不失時機抓軍隊、布哈林強調農民運動，指示中共開始爭奪領導權，這奠定了中共後來建立紅軍和蘇區的基礎，其認識深度超過當時以書生為主的中共領導群體。同時，為了充分利用國民黨，共產國際指示維持國共合作，儘量拖延決裂，爭取時間發展壯大，這是一種策略。

第二，南方數省幾百萬農民被發動起來，成為氣勢宏偉的新興政治力量，衝擊了整個政局，對共產黨和國民黨都造成巨大壓力。革命農民自發奪取基層政權，收集槍支建立農民自衛隊，農民協會雖然名字不叫蘇維埃，但事實上已經是縣以下政權，挑戰了剛建立的國民黨政權。但中共由於組織力量不足，加上認識模糊，難以對廣大革命農民建立有效領導。

第三，幼稚的中共組織在從書生時代到鐵血時代的轉型中，難免出現猶豫不決和組織混亂。面對血腥暴力的戰鬥，書生為主的中共領導層難以適應，各級幹部中有不少人臨陣逃走。雖然可以說毛澤東、任弼時、羅易、瞿秋白、蔡和森等比較激進，鮑羅廷、陳獨秀、彭述之、譚平山、張國燾等比較保守，但任何人都不是始終如一、毫不動搖的，每個人都在挑戰自己的極限。可以說，“猶豫動搖”或者說“右傾機會主義”是中共突然進入全新危急環境的必然現象，不少堅定的黨員最終闖過了轉型難關，與奮起的廣大革命農民相結合，走上了創建紅軍、開闢蘇區的道路，中共成為中國政權的有力競爭者。

一、共產國際指示爭奪領導權——嘗試理解斯大林

（一）共產國際“一次半革命論”與俄國革命經驗

從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到1943年共產國際解散，中共在組織上一直是共產國際的支部，接受共產國際的領導和各種幫助。特別是在成立初期的幼稚階段，共產國際對中共的成長起了關鍵作用，無論在理論

上、還是實踐上，都是如此。

列寧、斯大林、羅易等的理論是共產國際指導世界落後地區革命的主流理論。這種理論不像陳獨秀溫和的“二次革命論”或托洛茨基激進的“一次革命論”那麼清晰，帶有一定的模糊性，或許可以稱為“一次半革命論”。這種理論很有彈性，強調審時度勢、隨機應變，儘量把民主革命向社會革命推進。1920年7月共產國際二大的時候，列寧對落後國家革命還沒有成熟看法。最初列寧更傾向於二次革命論，但來自印度的羅易提出質疑，認為上層資產階級革命性不足，下層群眾才是革命主力，落後國家民主革命可以超越階段，表現出社會革命的特點，無產階級政黨要爭奪領導權。

當時蘇聯在國際上最主要的敵人是英大英帝國，落後國家革命的重要目標是打擊大英帝國，而印度是其最大的殖民地。共產國際二代代表大部分來自歐洲，列寧本人也不瞭解殖民地國家，因此擁有印度經驗的羅易很受重視，會議通過的列寧報告提到：“在先進國家無產階級的幫助下，落後國家可以不經過資本主義發展階段而過渡到蘇維埃制度，然後經過一定的發展階段過渡到共產主義。”^①列寧還讓羅易起草一個補充提綱，並且親自“把委員會討論的情況，向代表大會全體會議作了報告，並建議同時採用那兩種提綱。”^②這說明，列寧基本接受了羅易的想法，斯大林後來也大致延續了列寧確立的政策。

斯大林指導中國革命也依靠他自己的經驗積累。革命奪取政權是冒險的事業，從沒有必勝的把握，這一次機會沒抓住，下一次可能要等很久，甚至可能永遠不會再來。俄國革命是在1905年和1917年出現了兩次機會，中間則是長達十二年的沉悶時期。1905年，日俄戰爭失敗引發全國騷亂，初建的布爾什維克在彼得堡和莫斯科參與創立蘇維埃，嘗試奪取政權，雖然失敗，但積累了寶貴經驗。斯大林本人正是因為在1905

^① 列寧：《民族和殖民地問題委員會的報告》1920年7月26日，《列寧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36頁。

^② 羅易：《羅易回憶錄》下冊，商務印書館，1978年版，第397頁。

年高加索革命中表現出色，進入了布爾什維克領導層。1917年，一次大戰中的連續戰敗導致沙皇退位，舊體制徹底崩潰，布爾什維克抓住機會，通過武裝暴動一舉奪取政權。這是斯大林關於革命的主要經驗，也是他指導中國革命的重要依據。斯大林在中共六大之前與周恩來等談1927年暴動時說：“1905年11月也幹了（採取了行動），雖然暫時取得了勝利，但終究還是失敗了”^①，很明顯他是把中國革命的1927年看作是俄國革命的1905年。

1926年初，北方國民軍遭遇失敗，共產國際認為中國革命進入低潮。此時中共力量很小，距離奪取政權還很遙遠，依附於國民黨的勢力才能求得發展，應該儘量維護國共合作。如果發生衝突，只能妥協讓步，因此斯大林認可了1926年3月20日“中山艦事件”之後對蔣介石的妥協政策。當時廣東“掀起了瘋狂的反共反蘇俄運動”，^②國民黨中派、右派掌握軍隊主力，右派廣州公安局長吳鐵城已經策劃按名單搜捕共產黨員。如果不做退讓，中派蔣介石與右派聯合，也許四一二政變會提前一年發生於廣東，中共可能在北伐之前即遭鎮壓，連在兩湖發動大規模農民運動的機會都沒有了。蔣介石獲得來自共產國際和中共的讓步後，把吳鐵城解職，表示和右派劃清界線，政變的危機暫時過去了。

（二）共產國際政策的激進化與中共五大

斯大林認為1926年中國革命處於低潮，本來並不看好北伐。但7月北伐戰爭開始之後，卻極為順利，北伐軍勢如破竹，9月攻佔武漢。在北伐軍佔領的湖南、湖北等地區出現了規模巨大的農民運動，武漢、上海等城市的工人運動也高漲起來。這時斯大林突然意識到，革命高潮來了，出現了爭奪政權的機會。他轉而樂觀地認為，有了蘇聯的強大援助，中國革命

^①《周恩來對斯大林同瞿秋白和中共其他領導人會見情況的記錄》（1928年6月9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7），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479頁。

^②《維爾德給維經斯基的電報》（1926年4月23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3），第209頁。

可能不經過“1905”的挫折，直接取得“1917”的勝利，中共在1927年就應該嘗試爭奪領導權。

共產國際執委會七次全會1926年11月在莫斯科召開，會議確立了斯大林、布哈林對共產國際的領導。在這次會議上，迅猛發展的中國革命成為中心議題，興奮情緒推動共產國際政策趨於激進化。斯大林在題為《論中國革命的前途》的演說中，提出中國可能不會“一點一滴的同樣重演俄國一九〇五年的革命”，他特別強調軍隊的作用：“在中國，是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這是中國革命的特點之一，亦其優點之一。中國革命的軍隊具有特別的重要性，也在乎此”。“從此中國共產黨人應特別注意軍隊的工作”，而且還要“經過革命軍隊去推動農民”，“幫助農民反對地主”。^①斯大林經歷過俄國革命奪取政權的過程，親身領導過革命戰爭，他在這篇演說中指出了中國革命的兩個關鍵：軍隊和農民，而當時的中共領導層還沒有這樣清楚的認識。

布哈林在發言中更強調中國革命的社會主義方向和土地革命：“我們在中國應當採取社會主義發展方針”，“我們應該在農民這個革命的同盟和大工業資產階級之間作出選擇”，爭奪政權意味著與資產階級決裂，因此必須通過土地革命爭取人數眾多的農民。“我完全贊成斯大林同志關於軍隊的講話。不能認為斯大林只看到了軍隊，此外一無所見。我們認為農民組織將起巨大的作用”，他們現在就“擁有一定武裝力量”，在作戰需要時可以把他們組織成軍隊。^②雖然布哈林也談到要非常小心謹慎，不要破壞國民黨的軍隊和政府，但是七次全會政策與1923年《孫文越飛聯合宣言》顯然大相徑庭。斯大林特別派出激進的羅易到中國指導中共召開五大，傳達最新政策，說明共產國際根據革命形勢的迅猛發展，拋棄了原來比較保守的協議，這也預示著國共合作將很快走到盡頭。

^① 斯大林：《論中國革命的前途》（1926年11月），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教研室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十三冊，第425、427、429頁。

^② 布哈林：《布哈林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七次擴大全會中國委員會會議上的發言》（1926年12月1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4），第17-22頁。

(三)斯大林與托洛茨基的論戰

在蘇聯的領導人當中，托洛茨基對中國革命的看法更為激進。“一次革命論”(不間斷革命論)是他的獨特理論，有人認為十月革命本身就是不間斷革命論的勝利。這種理論認為，落後國家資本主義不發達，資產階級很弱，甚至連領導民主革命的能力也沒有，共產黨在民主革命期間就應該爭奪領導權，民主革命勝利後無需等待資本主義發展，可以不間斷進行社會主義革命，這樣兩次革命合併成了一次革命。具體到中國革命上，托洛茨基主張共產黨不應受國民黨束縛，應建立工農蘇維埃，建立自己的軍隊和政權。

自1926年以來，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結成反對派聯盟，攻擊斯大林的中國革命政策軟弱右傾。雖然斯大林在組織上擊敗了反對派，把兩人趕出最高領導層，但是托洛茨基並不屈服，不斷寫文章與斯大林爭論。1927年蔣介石的四一二政變暴露了斯大林的誤判，托洛茨基加強了攻勢，5月7日寫了《中國革命與斯大林大綱》，對斯大林通過妥協來維護國共合作嚴厲批評，提出直接建立蘇維埃。托洛茨基認為“中國革命4月間的失敗，不僅是機會主義路線破產，同時也是官僚主義指導方法的失敗”，指責斯大林要求中共“服從了將軍和政權都握著在自己手裡的大資產階級所領導的國民黨，他在政治上完全服從了蔣介石的紀律”，他提出應立即武裝工農，建立蘇維埃。^①他在5月10日、16日又先後寫了《共產黨和國民黨》和《中國革命的蘇維埃問題》，雖然在共產國際執委會5月18日召開第八次全會上，季諾維也夫和拉狄克都沒有獲准參加這次會議，托洛茨基和武約維奇始終處於少數地位，但他的雄辯仍然是有力的，造成了一種激進氣氛。

雖然托洛茨基在最高領導權的爭奪中失敗，但他的理論影響了不少

^① 托洛茨基：《中國革命與斯大林大綱》（1927年5月7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6），第85、92、97頁。

人。比如少共國際駐中國代表達林，1927年春他對張國燾明確表示，“他贊成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認為運用之於中國革命也是很恰當的”，“主張中共退出國民黨；獨立發展工農運動，使之成為工農蘇維埃，到適當時期取武漢的左派政權而代之；決不要做那些糾正工農運動過火這種不名譽的勾當。”張國燾還覺得：“中國少共書記的任弼時，常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會議上，發表一些左傾的言論，也許就是受了達林的影響。”^①

斯大林頂住了托洛茨基的攻勢，拒絕立刻建立蘇維埃，反對退出國民黨，要求維持國共合作。斯大林當然不會幼稚到對蔣介石、汪精衛毫無警惕，事實上蘇聯曾援助土耳其的凱末爾大量軍火和金錢，後來凱末爾卻鎮壓共產黨，以致早在1924年加拉罕就提到：“我們被土耳其的牛奶燙過以後，在中國見到涼水也要吹一吹。”^②蔣介石1926年發動過包圍蘇聯顧問的“中山艦事件”，斯大林早就知道蔣的政治傾向，他反對退出國民黨，是認為中共仍可以利用這種合作。他在1927年4月5日莫斯科講話中形象地說：“像右派這樣一些人，應該利用到底。從他們身上能榨多少就榨多少，然後才將他們像榨幹了的檸檬一樣扔掉。誰不這麼做，誰就是笨蛋”。^③

在5月24日共產國際八次全會上，斯大林做了題為《中國革命和共產國際的任務》的演說，認為在與蔣介石決裂之後，應維持與武漢政府的合作：“反對派建議在中國立即成立工農兵代表蘇維埃”，但蘇維埃“首先而且主要是反對現存政權的起義機關”，“反對派是否懂得現時在中國成立工農代表蘇維埃，就是造成蘇維埃和武漢政府這兩重政權，而且必不可免要提出推翻武漢政府的口號呢？”斯大林還批評托洛茨基低估農民的作用，認為這個錯誤“從1905年起就和托洛茨基形影不離，它在1917年2月

① 張國燾：《我的回憶》第二冊，東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227-228頁。

② 《加拉罕給契切林的信》（1924年2月9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1），第415頁。

③ 斯大林：《在聯共（布）莫斯科機關積極分子會議上關於中國大革命形勢的講話》（1927年4月5日），《黨的文獻》2001年第6期，第69頁。

革命前夜表現得特別明顯，並且直到現在也沒有離開托洛茨基。”^①

斯大林雖然反對立刻建立蘇維埃，但是認為如果形勢發展，條件成熟時就可以建立蘇維埃。1927年5月共產國際八次全會決議提出：“在革命的繼續發展，民主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的過程已經開始，則成立工農兵代表委員會即成必要，這時，成立蘇維埃的口號便成了黨的中心口號”。^②從1926年11月共產國際七次全會到1927年5月中共五大和共產國際八次全會，中國革命形勢發展很快，共產國際指導中國革命的政策也日趨激進，越來越強調發動土地革命，建立獨立軍隊，爭奪領導權。

（四）共產國際八次全會強調建立獨立軍隊

蔣介石4月發動政變之後，中國革命的形勢明顯惡化了。斯大林的基本傾向是，在爭奪政權的決鬥中，只能勇往直前，後退沒有出路。5月共產國際執委會八次全會比七次全會更加激進，通過的《關於中國問題決議案》是6-7月共產國際指導中國革命的總方針，5月底那封著名的指示信就是決議的具體化。決議案中建立新軍隊和爭奪領導權的意向更為堅決，一方面要推進土地革命，不惜拋棄資產階級，爭取農民，建立自己的軍隊；另一方面也要儘量推遲決裂，充分利用國民黨左派武漢政府來發展自己，這確實需要很高的政治技巧。

決議案首先強調土地革命和建立工農武裝：“要想引導群眾加入鬥爭，只有在鄉村實現土地革命”。“農民革命（沒收土地和國有土地包括在內），這是中國革命中新階段之主要的社會經濟內容。使千百萬農民從下面以‘平民式’的直接鬥爭實行土地革命，共產黨站在前線，指導這個運動，在目前最為重要”。“另一方面，只有在這種從上面和下面協同實現土地革命的政治之原則上，才能在堅固的革命的基礎上，造成真正可靠的武

^① 斯大林：《中國革命和共產國際的任務》（1927年5月26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6），第229、223頁。

^②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八次全體會議關於中國問題決議案》（1927年5月），《中共中央文件選集》（3），第608頁。

力,改編一切舊有的軍隊”。“必須迅速,大膽,果決的實施武裝工農群眾之政策。最先武裝那已經有組織的覺悟的部分”。^①

決議案同時要求維護國共合作,認為“如果看輕國民黨這個革命運動的特殊組織形式,實際上便是助成右派攫得國民黨的旗幟”,“共產黨的策略,萬不可為蔣介石的機變作保障(退出國民黨路線,便不能免這種結果)”。^②為了利用國民黨的旗幟,暫時就不能打出蘇維埃旗幟,“在中國革命進展目前的階段中,即刻成立工農兵蘇維埃,必然被認為是兩個政府,是推翻武漢政府的路線,是越過國民黨這個群眾的組織及國家的政權”。^③

決議案認為共產黨不可輕率暴動,需要運用“縱橫的策略。負責武漢政府政策的共產黨,如果永遠而且在一切條件下,反對妥協的策略,這就是說,共產黨要無條件的同時向各方作戰,這是大愚特愚”。“何時應該妥協,何時必須轉守為攻,這要就具體條件決定。共產國際特別以為,有些同志在蔣介石上海政變時建議實行暴動的策略,十分謬誤”。“須知暴動的策略乃是暴動既發,便要採取攻勢。所以有了相當勝利的希望存在,才可著手暴動。暴動是‘玩’不得的”,“假使上海工人發起了廣大的武裝行動,則必被蔣介石帝國主義聯合武力撲滅,中國無產階級的鮮血,在一個毫無勝利之望的戰爭中,便會平白灑盡。”^④

根據斯大林的經驗,革命高潮創造了革命奪權的機會,必須勇敢抓住,如果錯過一個機會,可能要等待多年。但是,在發起暴動之前一定要小心,布爾什維克在1917年7月也不得不退讓,列寧暫時躲到了芬蘭,等

①《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八次全體會議關於中國問題決議案》(1927年5月),《中共中央文件選集》(3),第601-602頁。

②《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八次全體會議關於中國問題決議案》(1927年5月),《中共中央文件選集》(3),第604頁。

③《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八次全體會議關於中國問題決議案》(1927年5月),《中共中央文件選集》(3),第608頁。

④《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八次全體會議關於中國問題決議案》(1927年5月),《中共中央文件選集》(3),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609-610頁。

到10月更有利的時機一舉成功。在本身力量有限的情況下，一定要儘量利用各種合作關係，十月革命是與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的聯合行動，革命勝利之後雙方才走向決裂。但斯大林明顯高估了武漢政府的革命性，將其與俄國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做了類比，國民黨左派確實一度表現得相當激進，但其依靠的大部分軍隊卻是很保守的。

仔細研究共產國際當時的決議和指示，可以發現共產國際兩個相互矛盾的指示是有所偏重的，推動土地革命、建立軍隊、爭奪領導權是真實目的。共產黨的革命目標與國民黨根本不同，分手是早晚的事，1924年6月鮑羅廷就曾對謝持、張繼說：“兩者本互相利用。國民黨利用共產黨。共產黨利用國民黨。”^①國共合作並非是永久的合作，延遲最後決裂的時間，是為了做更充分的準備。實際上，列寧談到與阿富汗國王的合作時就說過，他對阿曼紐拉不報幻想，“但革命的策略要求我們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機會。”^②

但國民黨並不愚蠢，事實上國民黨領導人比中共幹部年齡更大，政治經驗也更為豐富，比如像譚延闓、唐生智這樣的軍人，當面說話非常動聽，涉及實際利益則寸步不讓。他們當然也知道合作只是暫時相互利用，他們與鮑羅廷合作的目的是想得到蘇聯的軍火和經費支援，中共要在這種相互利用中佔優勢需要老練手腕。但中共領導人陳獨秀是教授出身的思想家，他在1927年3月毫無城府地對吳稚暉坦白說20年後就要第二次革命，連年輕的羅亦農都感覺不妥，國民黨當然不會等共產黨發展壯大，將來推翻自己。陳獨秀的話引發吳稚暉4月2日的《致中央監察委員會請查辦共產黨函》，這實際上就是蔣介石4月12日政變的政治宣言。吳稚暉說：“現在擁汪倒蔣，過些時又必擁鮑倒汪，再過些時，又必擁列寧倒孫文”，“規規矩矩是二十年；痛痛快快起來，二年二個月，只要有機會。但他們種種喪失信用的利用別人，他們終有給人覺悟的機會。蘇俄的陰謀，施

①《謝持、張繼與鮑羅廷問答紀要》（1924年6月25日），《鮑羅廷在中國的有關資料》，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13頁。

②《羅易回憶錄》下冊，商務印書館1978年版，第435頁。

諸土耳其而不效，還要拿同樣失敗的方法，再來中國試驗”。^①到6月初，羅易竟然天真地把共產國際密電拿給汪精衛看，給了對方提前決裂的藉口。中共其他領導人瞿秋白、蔡和森、彭述之等也都年輕氣盛，書生氣十足，執行這種需要高超技巧的政策十分笨拙，常被國民黨先發制人。

斯大林在當時算是經驗相對豐富的政治家，但他對蔣介石4月政變和汪精衛7月分共都出現明顯誤判。這裡除了對中國國情不熟悉外，還有信息滯後的原因，斯大林遠在莫斯科，而1927年中國形勢發展可以說是瞬息萬變。當時電報很貴，一個字大約要兩元錢，而且要靠英國等敵對國家的機構，保密性也存在疑問。共產國際與中共的通訊更多靠信件，當時上海到莫斯科的信件要“三四個星期”才能到達，^②送到最高領袖斯大林手上還要一些時間。也就是說，斯大林常常是根據一個月以前的信息做判斷。

在形勢發生緊急變化的時候，莫斯科和上海、武漢之間也通過電報聯繫。電報快得多，一般可以在一兩天內到達。但是由於電報費用很高，一般都比較簡短，很難把複雜多變的形勢描述清楚，而且當時電報也不很可靠。鮑羅廷後來說：“事情常常糟糕到這種地步：莫斯科完全收不到我們的電報，或者只收到結尾部分，而開頭部分不知在什麼地方被截住了，被弄亂了，因為電報都是通過帝國主義的線路拍發的。反過來，從莫斯科向漢口拍發的電報，也經常只收到結尾部分，沒有開頭部分。過去幾個星期，我們什麼消息都得不到，特別是我們駐北京大使館和駐上海領事館遭到襲擊之後，更是如此。”^③很明顯，在這種通訊狀況下，遠在莫斯科的斯大林很難跟上急速變化的中國形勢。

①《彈劾共產黨》(1927年4月)，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黨史教研室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四冊，第312-313頁。

②《阿爾布列赫特給皮亞特尼斯基的信》(1927年2月25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4)，第130頁。

③《鮑羅廷在老布爾什維克協會會員大會上的報告》(1927年10月23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4)，第504頁。

二、工農運動自發爭奪政權，中共無法建立有效領導

(一)工農運動自發爭奪政權

共產國際指示中共勇敢發動群眾，爭奪領導權，此時工農群眾運動也日趨激進，自發起來爭奪政權，與共產國際的指示基本一致。但是，中共領導層猶豫動搖，黨的組織力也很有限，群眾運動雖然是中共參與發動起來的，但中共在當時還無法建立有效領導。

工人運動早就對國民黨城市政權造成了衝擊，1925-1926年廣州市港罷工委員會就有“第二政府”的名聲，委員會設有八個部，其中財政委員會和糾察委員會權力很大，還成立了約2000人的工人糾察隊，幾乎擁有警察部隊的權威。^①北伐軍攻佔武漢後，蘇聯顧問巴庫林1926年12月底觀察到：“武漢工人建立了三百多個各自為政的工會。這種分散狀態是工人組織的主要缺點。湖北省總工會迄今不起什麼作用：群眾都是自發組織起來，獨立採取行動，缺乏自上而下的領導。”^②1927年1月4日，群眾不顧武漢政府的勸阻，強行衝擊佔領了漢口英租界，成為當時震動全國的大事件。“有一點可以完全肯定：無論共產黨，還是國民黨，或者是國民政府官方，都沒有料到事情會這樣發展。”^③

劉少奇後來也提到：“工會是第一個政府，而且是最有力量、命令最能通行的政府，他的權力有時超過正式政府”。“隨便逮捕人，組織法庭監獄。檢查輪船火車，隨便斷絕交通，沒收分配工廠店鋪，這些事這在當時是較平常而且是極普通的”。“這等事在小城市如汀州幹起來問題還小，在武漢

^① 薩坡什尼柯夫：《1924-1927年中國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湖北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5頁。

^② 巴庫林：《中國大革命武漢時期見聞錄》，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第28頁。

^③ 巴庫林：《中國大革命武漢時期見聞錄》，第44頁。

那樣的城市，那樣多人幹起來，問題真有點駭人”。^①

農民運動的規模和力量遠遠超過工人運動。當時中國工業不發達，工人數量有限，革命工人數以十萬計，而革命農民則數以百萬計，成為中國政治的決定性力量。隨著北伐軍的前進，農民運動在湖南、湖北、江西等地大規模展開，農民在幫助北伐的過程中組織起來，繳獲了不少武器，也得到了北伐軍的支持。“在北伐軍所佔領的湘鄂贛等省的民眾運動，的確是已走入革命道上，革命已深入到鄉中去，每個小縣每個小村中的人民，均感到一種新的映像，充滿著新的企圖，打倒土豪劣紳的口號，在鄉村中非常普遍，群眾自動槍殺劣紳土豪的事數見不鮮。”^②“湖南的農民正在把農民協會變為權力機關，但中共中央卻在實行“剎車”方針，因此“現在有一個很大的危險是，無論是中共中央還是區委，在緊急關頭都沒有能力領導民眾，”^③“湖南農民已經自行奪取地主的土地了，就連農民協會也制止不了這種奪地行為。”^④

毛澤東這時敏銳地認識到，農民運動的巨大力量根本改變了政治力量對比，革命者不得不在農民和紳士之間作出抉擇，這與布哈林的說法基本一致。毛澤東雖是農家出身，但1925年以前並不重視農民運動，據周恩來說：“惲代英同志看到陶行知他們搞鄉村工作，寫信給毛澤東同志。毛澤東同志回信說：我們現在做城市工人工作還忙不過來，哪有空去做鄉村工作。一九二五年他回家養病，在湖南做了一些農村調查，才開始注意農民問題。”^⑤1926年5月國民黨中央通過《整理黨務案》，毛澤東被迫辭去代理宣傳部長職務，開始把主要精力投入農民運動講習所，成為重要農運領導人。

① 劉少奇：《關於大革命歷史教訓中的一個問題》（1937年2月26日），《中國赫魯雪夫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言論集》（1923.8-1944.10），人民出版社資料室1967年版，第205-206頁。

② 《中央政治報告》（1927年1月8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3），第4頁。

③ 巴庫林：《中國大革命武漢時期見聞錄》，第63頁。

④ 巴庫林：《中國大革命武漢時期見聞錄》，第140頁。

⑤ 周恩來：《關於黨的“六大”的研究》（1944年3月3、4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11），第240頁。

1927年初毛澤東在湖南做了一個月實地調查，結束調查的第一天他就急切地向中央報告湖南農民已經要求從民主革命進到下一個階段的革命：“在湖南的許多縣，農民在鄉村已經完成了民主革命，農民的革命情緒依然非常之高，依現在形勢他們簡直很迫切的要進行到另一個革命了。這樣千萬貧農大群眾（根據長沙調查：貧農占十分之七，中農占十分之二，富農占十分之一）要進到別一個革命，依我的考察，是無論如何抑制也不能長久抑制得下的。”^①在正式報告中。他更興奮地寫到：“目前農運的興起是一個極大的問題。很短的時間內，將有幾萬萬農民從中國中部、南部及北部各省起來，其勢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無論什麼大的力量壓抑不住”。“一切革命的黨，革命的同志，都將在他們面前受他們的檢驗而決定棄取。站在他們的前頭領導他們呢？還是站在他們的後頭指手畫腳批評他們呢？還是站在他們的對面反對他們呢？”^②

湖南農民運動自發建立起基層政權，顛覆了農村傳統權力結構。毛澤東寫到：“幾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權，打得落花流水。他們的體面威風，掃地以盡。紳士權力既倒，農會便成了唯一的權力機關，真正辦到了‘一切權力歸農會’。連兩公婆扯皮的小事，也要到農民協會去解決。一切事情，農會的人不到場，便不能解決，農會的人在會場裡放個屁也是靈的。農會在鄉村中簡直獨裁一切”。^③親身領導湖南農民運動的柳直荀敘述更加生動：“從前一切的鄉政，都是由少數穿長衣的大人老爺們把持著。他們有時也開會議，但這是大人老爺們的會議，赤腳草鞋、帶著牛屎臭味的農民們，只能站在門外聽講”。“現在世界翻了底：農民開會來管理大人老

① 《毛潤之同志視察湖南農運給中央報告》（1927年2月6日），解放軍政治學院黨史教研室編：《中共黨史參考資料》第四冊，第208頁。

② 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1927年3月28發表於《中央副刊》第七號），《毛澤東集》第二版，蒼蒼社1983年版，第208頁。

③ 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1927年3月28發表於《中央副刊》第七號），《毛澤東集》第二版，第209-210頁。

爺了。大人老爺們非服從不可。”^①1927年春季的湖南“的確是一個革命的湖南”，“城市中的工會，鄉村中的農民協會，簡直是當時的第二政府，政府的命令非經過工農兩會，簡直無法執行。”^②

湖北農民運動雖然興起稍晚，但也迅速奪取了基層農村政權。據當時人的觀察，“農民協會對於政權的獲得很是急劇，如保衛團的收回也自動地解決了。各種糾紛的解決，從前是由鄉紳辦的，現在也移到農民協會的手中了。一部分的農民協會，在鄉村中，有相當的權力；尤其是下層農民協會，至於接受夫婦爭吵的仲裁了，如農民運動稍發達的陽新縣，民事案件也少，司法委員頗為閒散。官廳多年不能解決的懸案，由農民協會解決了的也不少”。^③

蘇聯顧問洛佐夫斯基認為，這時的農會實際上就是蘇維埃。“共產黨是打著‘一切權力歸農會’的口號進入農村的。應當說，這個口號對於農村來說是最成功的口號。為什麼呢？因為農會在其實踐活動中實際上就是蘇維埃”。“隨著農會政權的鞏固，隨著它的權力的擴大，隨著農村的這個政權佔領越來越多的地區，在這種情況下，農會將開始變為具有特殊職能的蘇維埃。”^④

在1927年5月馬日事變前夕，湖南工農群眾運動已經發展到與國民黨爭奪高層政權了。據當時長沙工人領袖袁福清回憶：“事變前，全省各縣、區、鄉農民協會會員和團結在農協會周圍的農民群眾，已達二千萬人，部分地區運動發展到要求政權、要求土地的階段了。在長沙城裡，更有工農訓練班，有帶著紅星鐮刀斧頭帽徽的工人武裝糾察訓練隊、農民自衛軍

① 柳直荀：《湖南農民運動的追述》（1928年1月），《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農民運動資料》，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77頁。

② 柳直荀：《湖南馬日事變之回憶》（1928年5月），《馬日事變資料》，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60頁。

③ 田中忠夫：《北伐軍佔領武漢後的湖北農民運動》，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黨史教研室編：《中共黨史參考資料》第四冊，第190頁。

④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會議討論中國問題速記記錄》（1927年10月1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7），第104頁。

等組織。在事變前夕，五月中旬還召開了長沙工、農、商、學、兵的代表會議，準備成立市政府！”^①

群眾運動有自發的激進傾向，工農一直被壓在社會底層，從來沒有執政掌權的經驗，初嘗權力滋味，很容易有幼稚過火的政策，造成混亂失控。工會在贛州發動工潮，開始是布店工人與店主的勞資糾紛，然後擴展到理髮、錢業等其他行業。“錢業店罷工獲得勝利，從每月十幾元工資增加到十倍以上，變成每月一百四、五十元”，“資本家對工人道：‘你來當老闆，我來當工人’”，“這工資水平突出的高，影響到其它工會工資不能解決。這種弊從利生的過左政策當時是不自覺的”。^②胡禮賢在《兩湖一瞥》中提到，當時“湖南工人的氣焰，真是不可向邇”。“工資則天天要求增加，事情必要等他高興的時候才肯去做”，“罷工更是一件極平常的事”。農民運動更加激烈，“說殺就殺，說打就打，有些還經過特別法庭最簡單的審判程式，其餘糊裡糊塗送了性命的，更不知道有多少。”^③

當時的中共領導層對農民運動出現了明顯分歧，瞿秋白、毛澤東等表示支持，覺得群眾受壓迫多年，矯枉必須過正，過火一些是難免的。但陳獨秀等卻認為應該限制農民運動：“軍隊用來作為藉口的，不是沒收土地，而是農民運動的‘過火’行為，如：軍官們家裡的土地和財產被沒收，親屬被拘禁，一些平民被扣留和罰款；禁止運糧；強迫商人攤款；農民私分糧食，吃大戶；士兵寄回家鄉的小額匯款被農民沒收和瓜分。這些過火行為迫使出身於中小地主階級的軍人與土豪劣紳結成反共反農民的聯合戰線。那些家中遭到衝擊的軍人，更是憤怒”。^④換句話說，在激進的農民運動與國民黨軍隊發生衝突，難以避免決裂時，陳獨秀等希望站在中間，而不是站在農民一邊。

① 《為馬日事變訪問袁福清同志》（1950年），《馬日事變資料》，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76頁。

② 陳奇涵：《贛南黨的歷史》，《回憶中央蘇區》，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頁。

③ 胡禮賢《兩湖一瞥》，蔣永敬編：《北伐時期的政治史料——一九二七年的中國》，臺北正中書局1981年版，第314頁。

④ 《陳獨秀根據政治局意見致共產國際電》（1927年6月15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5），第467頁。

(二)國民黨感覺政權受到威脅，轉向鎮壓工農運動

國民黨自稱為革命政黨，也表示要扶助工農，但當工農運動威脅其剛取得的政權，態度逐漸發生變化。1926年秋唐生智為了挑戰蔣介石，不斷找中共尋求支援，雙方達成合作條件。唐生智承諾：“接受中共的政治領導”；“絕對支持湖南的工農運動，並即電告湖南代主席張翼鵬，要接受中共湖南省委所提出要撤換的和所推薦的縣長”；“趕走蔣派來的前敵總指揮部政治部主任，由共產黨員接替，以後各部隊都成立政治部，由共產黨員主持”。^①負責談判的彭澤湘到唐生智總指揮部擔任政治部主任，負責中共與唐的聯絡，唐生智的支持是湖南、湖北農民運動能夠大規模興起的重要原因。

1927年初，群眾運動雖引起國民黨右派不滿，但國民黨左派和唐生智仍表示支持。唐生智2月5日在長沙發表講話：“目前的階級爭鬥，與其說是勞資衝突，毋寧說是壓迫者與被壓迫者的衝突。幾千年的歷史，農民都伏在統治者之下忍氣吞聲，現在革命的呼聲將他們喚起了。他們從被治的地位，漸漸要爬起來了。”^②

3月以後，工人武裝起義衝擊了上海城市政權，農民運動衝擊了兩湖國民黨政府，各地國民黨都感到工農運動可能奪走其剛取得的政權。無論是上海四一二政變，還是湖南馬日事變，核心都是對政權的爭奪，他們把工農群眾自發奪權的行為都說成是共產黨的陰謀。5月3日白崇禧發佈《敬告武漢政軍同志書》稱：“共產黨徒，盤踞湘鄂兩省，凌亂我政綱，盜竊我黨權，悖總理容彼各個分子加入我黨共為國民革命之教言，公然厲行彼黨所謂社會革命之實，以地痞土匪團結之暴力，肆行捕殺我黨同志及良善農工”。“湖南全省，自去冬以來，即只有共產黨而無國民黨矣。湖北本年以內，亦只有共產黨而無國民黨矣。中央遷鄂後，尤只有共產黨之政

^① 彭澤湘：《自述》，《黨史研究資料》(5)，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09頁。

^② 唐生智：《革命任務》(1927年2月5日長沙講話)，巴庫林：《中國大革命武漢時期見聞錄》，第252頁。

令，而無國民黨之政令矣。”^①

湖南農民運動的衝擊也很快超過了唐生智政府的容忍限度，湖南代省長、唐的參謀長張翼鵬6月給武漢政府的《馬日事變報告書》中提到，省政府的政令在農運衝擊下無法實行。“去歲省黨部政府議決谷米流通，並頒佈去六留四，不意縣區農運，極力阻禁，甚至甲鄉不准購運至乙鄉，雖經政府屢次命令，視若具文”；“土地問題，政府尚無明令，農運恃其威力，隨意沒收，其或不從，非目為土豪，即加以反動，人人自危，莫敢偶語”；“農工私擅逮捕，窮鄉僻壤，遍設囹圄，法律由心，刑戮在口”；“武裝同志，犧牲於外，家屋被其沒收，妻室被其誘惑，父兄飲泣，親族含羞，函電紛馳，無一得請”。^②唐生智最初接到馬日事變消息，還表示願意與中共繼續合作，但從河南北伐前線回到湖南後，發現農民協會挑戰了他的政權，立刻轉向反共、鎮壓農民運動。

外國勢力對兩湖工農運動衝擊政權的形勢也看得很清楚。中共文件中提到：“過去在湖南完全表現兩個政府：一為唐生智的軍閥政府，一為農民的農會政權”，“當省港罷工的時候，帝國主義即說罷工委員會是第二政府，當湖南農民協會力量大的時候，帝國主義又說農民協會是第二政府，當武漢民眾勢力非常之大的時候，帝國主義又說湖北省總工會是第二政府。帝國主義對於此第二政府之危險性是看得很清楚的。”^③

孫科一度表現得相當激進，反對蔣介石也很堅決，但當出現對武漢政權的威脅時，也改變了對工農運動的態度。他在6月20日演講中把政權問題說得非常透徹：“革命政府的政權，自然應統一在國民政府，絕不許有其他機關的侵佔。但照前幾個月的兩湖情況來說，總工會、農民協會可以自由捕人，可以封沒財產，可以執行刑律，可以罰人款項。這些都是政府特

① 白崇禧：《敬告武漢政軍同志書》（1927年5月3日），黃嘉謨編：《白崇禧將軍北伐史料》，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版，第80、83頁。

② 張翼鵬：《馬日事變報告書》（1927年6月20日在武漢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第三十次會議報告），蔣永敬編：《北伐時期的政治史料——一九二七年的中國》，第314頁。

③ 《中共中央政治報告》（1927年9月15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黨史教研室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十四冊，第32頁。

有的權力，卻變成一切團體所共有，結果弄到政權分裂”。“我們今後一定要糾正這種錯誤，在國民政府之下，政權必定要統一起來，無論何種人民團體，都不能僭行政府特有的權力”。^①

很明顯，國民黨政府可以居高臨下做出扶助工農的姿態，制定一些保護工農的相關法令，但當工農運動威脅其政權時，必然轉向鎮壓。政權問題上的矛盾是不可調和的，中共要麼站在國民黨一邊壓制工農運動，要麼站在工農運動一邊與國民黨決裂，並沒有中間道路可走。

(三)中共組織力量不足，難以有效領導大規模工農運動

中共按其政治理念必須站在工農一邊，支持農會成為鄉村政權。6月14日《中央通告農字第八號》明確提出：“農民協會之組織，一開始便含有與鄉村中舊政權對抗之第二政府的性質”。“鄉村政府建立之過程中，他居於領導地位。鄉村自治政府既成立之後，他是政府的中堅。事實上等於指導政府的組織”，“在中國之政治民權化的過程中，占著非常重要的地位。”^②

但中共不想和國民黨過早決裂，希望通過糾正工農運動過火維持國共合作，為自己贏得更多時間，這也是共產國際的指示。不過中共當時組織力很有限，無法做到這一點。中共農運骨幹不少出自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到北伐戰爭時共有六期學員畢業。前五期重點在廣東，共畢業454人，其中三分之一派往廣東各地，三分之二回到各省。^③第六期放眼全國，人數最多，有318人畢業，其中：湖南36人，湖北27人，江西22人。^④雖然後來南方各省又辦了一些短訓班，但受過訓練的農運幹部仍非常有限，他們分散到數百萬農民之中，像星星之火撒進乾燥草原，能夠

① 孫科：《革命政府最近兩月的經過》（1927年6月20日），《馬日事變資料》，第305頁。

② 《中央通告農字第八號》（1927年6月14日），《馬日事變資料》，第457頁。

③ 《全國農民運動概觀》（1927年1月），《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農民運動資料》，第6-7頁。

④ 《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辦理經過》（1926），《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農民運動資料》，第67頁。

憑著一腔熱情，把飽受壓迫廣大農民發動起來，可一旦燒起燎原大火，卻根本無力掌控。

中共當時的組織力量，相對於農民運動的巨大規模，人數實在太少，經驗也不足。1926年下半年廣東農會會員達到80多萬，基層農會有上萬個，廣東區委負責農運的上層工作人員不過35人，“已不夠應付種種臨時發生事件之用，至說到下層幹部人材更為危險，縱使在農村工作和現在耕作的農民同志都算起來也不過八百餘人，還是不夠以區農會為單位而分配之。”^①八百多黨員分散在八十多萬農會會員中，平均一千個農會會員才有一個黨員。1927年初，中共有大約2.5萬名黨員，正如維經斯基說的：“黨的骨幹還非常年輕。黨在一年半到兩年以前才開始有廣泛的政治生活。這期間黨大約壯大了10倍。沒有足夠的力量用來改造最近幾個月湧入黨內的群眾。”^②

到5月中共五大時，黨員激增到5.8萬人，其中工人占53.8%，農民占18.7%，知識份子占19.1%，軍人占3.1%。可以看出，主要生活在城市的工人和學生合計占72.9%。但即使是占比較大的工人黨員也只有3.1萬，工會會員卻有280萬，工會會員中黨員比例大致是百分之一。農民黨員只有約1.1萬人，而農會會員卻有972萬之多，黨員占農會會員的比例只有約千分之一。^③另據1927年5月湖北各縣農民協會的統計表，當時全省農會會員已達約270萬人，而表中對應的黨員總數不過約2500人，不到千分之一，如果算上農會會員家屬，就是平均幾千個農民中才有一個黨員。在有些地方，比如黃陂8萬農會會員才有4個黨員，孝感縣9萬多農會會員才有

①《農民運動議決案》(1926年中共廣東區委擴大會議通過)，《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農民運動資料》，第360頁。

②《維經斯基給聯共(布)駐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代表團的信》(1927年1月21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4)，第97、99頁。

③《陳獨秀在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1927年4月29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5)，第360頁。

8個黨員，隨縣2萬農會會員中只有1個黨員。^①極少的黨員、弱小的黨組織漂浮在農民運動的汪洋大海上，只能任憑巨浪翻滾，根本無法貫徹政策、控制局勢。

必須指出的是，以上這些動亂中調查得來的數字未必準確。6月1日《中央通告農字第五號》承認，黨組織沒有能力真正領導農民運動，甚至連農運的真實情況也不能準確掌握。“農民協會現時最危險的病象，便是本黨在許多時機中，欠缺黨的指導。各級黨部對於各地鬥爭的形勢，農民協會組織的成份、農協機關的成份，都缺乏精確的考查，對於各階級農民的趨向，亦沒有明晰的觀察，對於農民協會會員的數目，武裝農民的數目，亦不能夠詳細知道。任何地方都沒有正確的整理材料”。“有些指導農民運動的負責人員，往往慣於虛報農民組織的數目，誇大農民鬥爭的事實，——這簡直難於有正確的實際的指導，而且妨礙政治方針之確定。”^②

雖然統計數字未必準確，但農民運動中黨員很少是毫無疑問的，而且這很少的黨員大都還是未經訓練的新黨員。平江縣黨組織批評省委派來的農運幹部“既不知農運的方法，又無農運經驗，在鄉村中三十裡路尚要乘轎，怎能與農民接近？”^③在這種情況下，黨組織很難建立對農民運動的領導，農民運動很大程度是處於自發狀態，順利的時候一哄而起、行動過火，遭到打擊又很容易潰散。《中央通告農字第九號》承認：“黨在農民中的組織，過去是沒有能夠相當的盡其領導責任的，許多地雖然能有十萬幾十萬的農民群眾的爭鬥，但每每只是幾個同志在那裡活動，而不是黨的組織在那裡盡其領導職任，有些地方雖然有黨的組織，但沒有深入群眾（都只在區協，沒有到了鄉協），或者雖有組織而不起作用”。^④

①《一九二七年五、六月湖北各縣農民協會會員統計》，《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農民運動資料》，第457-460頁。

②《中央通告農字第五號》（1927年6月1日政治局會議通過），《中共中央文件選集》（3），第161-162頁。

③《平江報告》（1927年9-10月間），《湖南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0），中央檔案館、湖南省檔案館1989年，第3頁。

④《中央通告農字第九號》（1927年7月20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3），第221頁。

共產國際代表羅易和鮑羅廷都承認中共無力領導農民運動，甚至說農運是哥老會領導的。羅易“承認農民運動的過火，但不是中國共產黨做出來的，乃是農民自己做出來的，便是說共產黨不負此過火的責任”。鮑羅廷在一次政治局會議上說，“我們同志太幼稚，不能真正領導農民運動，領導湖南農民的是‘地痞’與哥老會，而不是我們。”^①他在5月會議上又抱怨：“主要的問題是，共產黨能否控制工人群眾和自己的省級組織。在遊行示威和在其他重大事情上，共產黨沒有充分顯示出自己領導群眾運動的能力。共產黨能控制武漢無產階級和湖南農民嗎？可以商定一定的方針，但條件是共產黨能夠執行這個方針。我本人對此表示懷疑。”^②農民運動是哥老會領導的說法幾乎成了中共向國民黨解釋的官方說法，連最支持農運的毛澤東也只能跟著說。馬日事變以後，汪精衛在6月13日討論中提到：“據毛澤東同志報告，才曉得農民協會有哥老會在內把持。他們既不知道國民黨是什麼，也不知道共產黨是什麼？只曉得作殺人放火的勾當”。關於馬日事變的解決方法，“毛澤東同志也承認不用武力的方法是對的，”也就是說不能嚴厲懲罰屠殺工農的許克祥。^③

當時中共組織還處於鬆散、幼稚階段，甚至對各級幹部和黨員都難以建立有效領導，他們經常違背中央政策，按照自己的想法自行其是。羅易給斯大林的報告說：“黨的活動沒有集中統一，沒有加以組織，各地的共產黨員都是按自己的方式工作。”“共產黨人常常在毫無準備、沒有黨的指示的情況下出席這樣或那樣的聯席會議，他們每個人都各行其事，他們的行動敗壞了黨的聲譽。”^④當時在中共各級幹部中有不少幹部態度激進，對中

① 蔡和森：《黨的機會主義史》1927年9月，《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5），第525、526頁。

② 《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代表聯席會議記錄》（1927年12-13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4）第250頁。

③ 《中共同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委員會第二十八次會議速記錄》（1927年6月13日），《馬日事變資料》，第279、280頁。

④ 羅易：《致政治書記處和斯大林同志報告》（1927年5月28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4），第290、291頁。

央妥協政策不滿，基層群眾更加激進，妥協政策實際上很難執行。“黨已發覺陳贊賢同志和贛州工潮的‘左’傾錯誤，決定要分別解決。但是，陳贊賢同志固執己見”，“不肯執行黨的決定”。“當時黨要陳離開贛州城，到江西省委去。然而陳不接受省委意見，又私自回到贛州去。”^①中央後來公開承認，“湖南農民運動發展成了強有力的土地革命，其他各省亦有極大的農民群眾起來反對豪紳地主。然而這都不能算是中央所提示指令的，乃是違背中央的指示指令而做出來的”。^②

方志敏當時擔任江西省農民協會秘書長，同時兼任江西省委農委書記，但是他說除了《嚮導》以外，“其他的黨內文件，就一本都沒有看到，連黨的五次大會決議，也未見過”。^③南昌距離武漢並不遠，連方志敏這樣的省級幹部都沒有見到五大決議，可見當時黨組織陷入了混亂。方志敏感覺“既無明確的政治路線，又無一定的工作方針，雖然也是一天忙到晚，但是並沒有忙出一個什麼好名堂來！那時的工作，可以說是上層的而不深入下層；是空洞洞的而不實際化；是帶著腐化享樂的傾向，而沒有艱苦地去進行工作”。^④

因此，中共中央公開的妥協政策和農運的猛烈形勢完全背離。就在中央發表一系列通告要求限制農運，保護小地主及軍官的土地時，農民運動發展到了更激進的階段，有的地方已完成土地的重新分配，進而要求分配其他財產。5月24日來自湖北黃岡縣的農運幹部說：“絕大多數大中地主和一部分小地主，從農村逃進了城市”，“佃戶們普遍認為，秋季不必交地租了，因為東家不在家。他們認為土地問題已經不存在了，所以現在很少提什麼沒收土地的要求。留在農村的小地主，往往為了保住性命自願把土地交給農民協會”。“農民認為土地已經屬於自己了。現在的突出問

① 陳奇涵：《贛南黨的歷史》，《回憶中央蘇區》，第4頁。

② 《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告全黨黨員書》（1927年8月），《中共中央文件選集》（3），第266頁。

③ 方志敏：《方志敏全集》，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0頁。

④ 方志敏：《方志敏全集》，第30頁。

題時農民想抓錢花。這次罰款和沒收逆產的發起人，一般都是農民協會中的積極分子——貧農”。^①江西萬安幹部張世熙在六大發言中談到，農運起來後，地主和農民“往往發生武裝鬥爭，每次雙方都有死傷。上級機關得到這些消息，便嚴厲的下命令批評萬安工作太過火，不許再繼續的這樣幹。可是黨無論如何拉後腳，終不能抑制群眾革命熱情的高漲。”^②

工農群眾運動的規模如此巨大，衝擊力如此之強，幼小的中共組織還沒有力量有效領導。革命工農與國民黨的決裂在所難免，中共想站在中間妥協調和是不可能的。按中共的政治本性，只能堅決站在工農一邊，不惜與國民黨決裂，同時依靠革命群眾的巨大力量，在殘酷血腥的鬥爭中與國民黨爭奪政權，這也是共產國際和斯大林指示的核心思想。但問題是，以書生為主的中共各級幹部準備好了嗎？

三、中共接受國際七次全會指示，但在劇變中猶豫動搖

(一)陳獨秀的二次革命論

共產國際自上而下發來了爭奪領導權的指示，農民運動自下而上起來爭奪政權，但兩者之間的中共領導層卻出現了明顯的猶豫，其理論上的原因就是二次革命論。這種理論認為落後國家應有兩次革命，第一次是民主革命，完成民主革命後，經過一段時間的資本主義發展，第二次革命才是社會主義革命。1922年陳獨秀主持中共二大確定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的劃分，大致就是這個意思。陳獨秀等認為在民主革命階段，中共的主要使命是傳播革命思想和組織發動群眾，爭奪政權是很久以後的事，他們沒料到革命形勢發展這麼快，書生突然面對奪權的血戰，難免猶豫動搖。

二次革命論強調兩次革命的清晰劃分，與俄國的孟什維克比較接近，

^① 巴庫林：《中國大革命武漢時期見聞錄》，第248-249頁。

^② 《張世熙在“六大”討論政治報告的發言》（1928年6月25日），《江西黨史資料》（5），江西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1988年，第55頁。

陳獨秀、譚平山、彭述之、張國燾等大致傾向於這一理論，後來蔡和森說陳獨秀是孟什維克並非沒有道理，^①這幾個人最終都脫離了中共，也不是偶然的。張國燾在與少共國際代表達林的討論中，“表示革命是應該分清階段的”，達林很失望地稱他為“革命的階段論者”。^②譚平山後來登報脫離中共時，明確說“認為中共的政策，對於中國革命來說是超時代的。”^③所謂“階段論”、“超時代”的說法大致源於二次革命論，他們認為當時是民主革命，不應該採用社會革命的政策。

不敢爭奪領導權是二次革命論的主要表現，即認為民主革命應由國民黨領導，中共應等待多年後的社會革命再去爭奪政權。這在1926年初就有表現，中共在國民黨二大上聯合汪精衛獲得不少權力，據周恩來說，當時還計畫“把我們的黨員完全從蔣介石部下撤出，另外與汪精衛成立國共兩黨合作的軍隊。我帶著這個意見回汕頭去，並等待中央回電到後，立即正式向蔣介石提出。當時在國民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代表中，左派占了絕對優勢，實現上述計畫是完全有保證的。等了很久，中央來電不同意。”^④布勃諾夫觀察團1926年3月會見陳獨秀得到的印象是：“陳認為革命勝利、取得重大革命成果的前景還非常遙遠，捉摸不定”，而且覺得陳獨秀對農民運動和土地問題極為淡漠。^⑤很顯然，陳獨秀認為當時只是民主革命的開始，社會革命是很久以後的事情，他還在7月發表文章質疑北伐戰爭，引發了很多爭論。

二次革命理論的另一個表現是對土地革命沒有決心，擔心會導致國共合作破裂。1926年11月在共產國際七次全會討論布哈林報告時，譚平山就委婉地談到擔心激進路線威脅國共聯盟：“中國需要有一個包括一切

① 蔡和森：《論陳獨秀主義》（1931年9月10日），《蔡和森文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04頁。

② 張國燾：《我的回憶》第二冊，東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228頁。

③ 張國燾：《我的回憶》第二冊，第341頁。

④ 《一九二四至二六年黨對國民黨的關係》（1943年），《周恩來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118頁。

⑤ 切列潘諾夫：《中國國民革命軍的北伐》，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382頁。

革命階層的反帝反封建殘餘的民族革命統一戰線。一方面，我們必須保證農民的利益；另一方面，我們要保持和鞏固民族革命運動的統一戰線。在這種相互矛盾的情況下，很不容易執行正確的策略路線。”^①在1926年底的爭論中，陳獨秀認為鮑羅廷關於土地問題的觀點是錯誤的，鮑羅廷當時說：“贊成解決土地問題的，才是真正左派，現在國民黨中無左派”。陳獨秀在中央特別會議上，不客氣地批評“鮑同志這種錯誤見解”，認為“目前中國大多數農民群眾所爭的還是減租減息，組織自由，武裝自衛，反抗土豪劣紳，反抗苛捐雜稅這些問題，而不是根本的土地問題”。^②

鮑羅廷在1925-1926年對土地革命比較積極，與陳獨秀有很大差別，他批評書生氣十足的“中共中央像一個圖書評論員：他等待著書籍出版，然後閱讀，寫書評——加以讚揚或指責，”^③批評“上海的陳獨秀實行的是反帝、反軍閥鬥爭，根本不提土地革命”。^④“鮑羅廷還充分運用自己的身份和影響，通過汪精衛抽調各軍部隊（每軍一個團），調動直屬軍委會的裝甲車隊，在花縣、四會、廣宇等地，協助農民的衛隊對地主武裝進行鎮壓。”^⑤同時，鮑羅廷很重視農民勢力和農村遊擊戰爭，甚至說“職工運動沒有什麼前途，唯一重要的是農民遊擊戰爭。中國全體共產黨都要加入遊擊戰爭”^⑥。雖然鮑羅廷在1926年5月主張對蔣介石妥協，也對張國燾說過“中共似乎是命中註定要做中國革命的苦力”，^⑦但是他到1926年底已經開始佈置反蔣。在1927年夏天與羅易的爭論中，鮑羅廷和陳獨秀因對具

① 《共產國際有關中國革命的文獻資料》第1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157-158頁。

② 陳獨秀：《政治報告》（1926年12月13日中央特別會議），《中共中央文件選集》（2），第563-564頁。

③ 鮑羅廷：《當前中國政治經濟形勢》（1927年10月23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4），第509頁。

④ 《國外中國近代史研究》第13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62-63頁。

⑤ 鄭秀山、鄧演存、尹時中、歐樹融、陳錦松：《鮑羅廷在廣東》，《鮑羅廷在中國有關資料》，第264頁。

⑥ 蔡和森：《論陳獨秀主義》（1931年9月10日），《蔡和森文集》，第826頁。

⑦ 張國燾：《我的回憶》第二冊，第119頁。

體時局認識接近而暫時結盟，其實他們的思想是有很大差別的。

遠東局書記維經斯基與陳獨秀思想比較接近，鮑羅廷1926年批評維經斯基時說，“不能允許這樣的取消主義和失敗主義”。當時瞿秋白對陳獨秀、維經斯基很不滿，出現了“分歧和摩擦”，瞿秋白明確表示“不同意右傾方針”。遠東局成員拉菲斯在報告中指責維經斯基有“半孟什維克傾向”，明確要求共產國際撤換他，“派一名中央委員來中國領導遠東局的工作”。^①譚平山在莫斯科與羅易談話時，認為中共“黨內衝突是維經斯基和鮑羅廷之間衝突的反映”，他建議“撤銷遠東局並召回維經斯基”。^②在北伐戰爭勝利掀起的革命高潮中，陳獨秀、維經基因落後於形勢的保守傾向逐漸失去領導威信。

雖然托洛茨基和陳獨秀都提出過退出國民黨，表面上相似，但其實恰好相反，前者來源於一次革命論，而後者來源於二次革命論。托洛茨基是進攻性的，主張建立蘇維埃，奪取政權；而陳獨秀是保守性的，把中共當做獨立清高的在野黨、甚至知識份子小團體，不敢爭奪政權。雖然後來兩人因批評斯大林而結成同盟，但他們在1927年的政見大相徑庭，史華慈的評論可謂一針見血：“托洛茨基提出的大膽的行動方針和陳獨秀的謹慎小心的‘自我保護主義’一點相似之處也沒有。”^③

（二）上海工人武裝起義與四一二政變前後的爭論

1927年初，國共分裂的危險還不嚴重，中共中央受革命形勢鼓舞，一度表現出超越二次革命論、積極執行共產國際指示的姿態。收到共產國際七次全會決議案後，政治局討論後認為：“在此次國際提案中，自然未曾說將來中國不會有第二次無產階級的革命”，“只是指示我們必須準備整

①《拉菲斯關於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工作的報告》（1926年12月14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4），第44、46、48頁。

②《羅易給斯大林的信》（1927年1月14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4），第68頁。

③史華慈：《中國的共產主義與毛澤東的崛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73頁。

個的中國革命能夠一氣呵成，而不可在主觀上註定了我們必須有第二次革命”，“對於現在的革命遂以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自限，一步也不肯超越，一切都等待到第二次無產階級革命再說，這便是我們過去方針和戰略上根本錯誤。革命是活的，不像演劇和做影戲，必須演完這一幕才能開演那一幕。”^①

當時農民運動在初期階段，政治局似乎並不擔心國民黨反對激進政策，認為可以在國民政府的領導下，也就是在國共合作的框架下，完成從民主革命向社會主義革命的躍進。政治局認為：“中國國民革命前途之發展，得超過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由無產階級實際領導的國民革命成功，自然不必再造成發展資本主義的政治環境”，應該“在現有的國民政府政權之下，繼續發展國民革命，以達到革命的民主獨裁制，將國民革命發展到超越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以上，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從民族解放到工農解放，把國民革命和無產階級革命，看做整個的中國革命”。“我們的革命方針和戰略上，必須抓住這兩種革命的連鎖，使之一氣呵成，不能夠機械的將他畫為截然不相銜接的兩個時期。”^②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是中共中央積極進取的高潮。在北伐軍迫近上海的時候，羅亦農、周恩來、趙世炎等3月21日組織工人發動起義，繳槍上千，組織起兩三千人的糾察隊。在武裝起義的過程中，甚至陳獨秀都很積極，參加了三十多次會議，這說明在形勢順利的情況下，多數人都有超越個人局限的可能。但在起義的緊要關頭，陳獨秀和彭述之又表現出決心不足，周恩來在中共六大說：“最後五分鐘的決心問題，在這上海的江蘇省委對於這次暴動沒有一點動搖，而我們可說中央是動搖的，彭述之他跑去看了一下，看見許多時沒有攻下敵人，於是他就發出了一個‘是否還可以支持下去呢？’晚上獨秀又寫了一封信給羅亦農，好像是叫可以停一

① 《中央政治局對於〈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七次擴大會議關於中國問題決議案〉的解釋》（1927年初），《中共中央文件選集》（3），第22頁。

② 《中央政治局對於〈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七次擴大會議關於中國問題決議案〉的解釋》（1927年初），《中共中央文件選集》（3），第21-22頁。

下，他們是動搖的”。^①

起義勝利之後，上海工人成為重要政治力量，糾察隊也很有實力，積極參與組織上海市民政府，這是中共爭奪城市政權的初步嘗試，但立刻引起了蔣介石的嫉恨。在吳稚暉、蔡元培等文人的聲援之下，他聯合桂系白崇禧等軍人，4月12日突然發動政變，鎮壓了上海工人武裝，而中共中央猶豫動搖，並沒有組織有效的抵抗。周恩來在4月18日會議上憤怒地說：“中央政策動搖，指導無方，對於前次廣東與上海都如此，中央對於爭領導權沒有決心”。“起頭是模糊，後來是妥協。如蔣介石完全代表資產階級，事實很多，如汪來後不免蔣職，工人避免與蔣衝突，完全是讓步，以致於失敗”。^②

瞿秋白、毛澤東等也對領導層日益明顯的動搖猶豫十分不滿。為了回答關於農民運動過火的議論，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激烈地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權力的暴烈的行動”。“一切過分的舉動，在第二時期都有革命的意義。質言之，每個農村都必須造成一個短時期的恐怖現象，非如此決不能鎮壓農村反革命派的活動，決不能打倒紳權。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不能矯枉。”^③這個報告不僅在湖南，而且在共產國際都產生了一定影響，毛澤東也由此成為湖南農民運動的代言人，深得湖南農運骨幹的信任，6月底蔡和森在武昌毛澤東家養病時，看到每天都有從湖南“逃亡的同志及農民到毛家來”。^④

①《周恩來在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軍事報告》(1928年7月3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黨史教研室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十四冊，第82頁。

②《特委會議記錄》(1927年4月18日)，《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66頁。

③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1927年3月28發表於《中央副刊》第七號)，《毛澤東集》第二版，第213-214頁。

④蔡和森：《黨的機會主義史》1927年9月，《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5)，第544頁。

像陳獨秀一樣，鮑羅廷和維經斯基也因不能適應激進形勢，引起了其他共產國際代表的不滿，他們的領導威信動搖了。鮑羅廷已經著手策劃對抗蔣介石，但他的方法仍是外交家式的上層路線，拉攏唐生智和國民黨左派徐謙、孫科、譚延闓等人，不相信工農運動的力量。阿爾布列赫特認為鮑羅廷和維經斯基都落後於急速發展的中國革命，憤怒地寫信給共產國際領導人：“為什麼要讓格裡高裡（維經斯基）和鮑羅廷這樣不合適的人來領導這一事業。前者什麼信念也沒有，把這一事業中生氣勃勃的一切都毀了，他像松鼠蹬輪子似的來回瞎折騰”。“後者更糟糕。他縱容最壞的機會主義”。“萬分需要有一個久經考驗、經驗豐富的老革命家而不是官吏來領導一切。難道偉大的十月革命不能提供這樣的人嗎？”^①知識份子型的維經斯基^②和外交家型的鮑羅廷，或許能勝任前一時期指導中共的任務，但到了爭奪政權的殘酷搏鬥階段，他們越來越難以適應，中國革命新形勢需要勇猛的革命家。

（三）中共五大激烈爭論，勉強接受國際指示

共產國際七次全會後不僅給中共發來新指示，還派激進的羅易為共產國際代表，指導中共接受新政策。但是羅易4月初到達武漢的時候，很多中共領導人已對日趨激進的工農運動感到擔心，對是否接受新政策產生了懷疑，領導層中的分歧加大了。陳獨秀4月10日到達武漢，標誌著中共中央遷到了革命中心。但僅僅兩天之後，蔣介石4月12日在上海血腥鎮壓中共，緊接著李濟深於4月15日在廣東反共，北方軍閥張作霖也於4月6日派兵進入使館區捕獲李大釗等共產黨員。十天之內，北京、上海、廣東三個重要地方組織連遭重創，大批黨員和群眾遭到殺害。

在這種情況下，羅易說服中共接受激進政策的難度大大增加。羅易說：“中共中央無法判明新的環境，黨的領導和全體活動分子仍舊受到自

^①《阿爾布列赫特給皮亞特尼斯基的信》（1927年2月25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4），第130、131頁。

^②維經斯基回蘇聯後，取得經濟學博士，當上大學教授，寫了很多文章。

己的舊政策的束縛，無法執行時局所要求的新政策”；“不存在渴望充當新領導的成熟的新核心”；“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沒有很好理解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新提綱。”^①陳獨秀、張太雷、彭述之等有很大疑慮。張太雷認為，共產國際代表團提出的“國民革命的土地綱領太左了，小資產階級將不能接受，革命聯盟將因而瓦解。”^②

羅易批評“認為在中國進行土地革命為時過早”的觀點，指出“陳獨秀同志的觀點與共產國際的提綱是矛盾的”。^③他強調“土地綱領的基本要求是沒收部分土地——沒收大地主的土地。這個建議不是由我們首次提出的，事實上農民已在這樣做了”，“或者支持農民的土地要求，或者為了同小資產階級保持良好關係而延遲土地革命的發展”，“無產階級不能為了同小資產階級聯合而背叛農民。”他還提出：“懷疑共產國際提出的政策的正確性，認為這個政策有‘激進主義’的危險，就意味著懷疑無產階級在中國革命現階段的鬥爭中能夠行使領導權。”^④

五大政策意味著站在農民一邊，很可能與國民黨決裂，對此陳獨秀和鮑羅廷等人都沒有決心。陳獨秀“正面的不文飾的”表示不同意，羅亦農和彭述之“則用聲東擊西的伎倆，從側面來反對五次大會完全與資產階級決裂的政策。”五大開會期間，武漢店員和童子團又有過火行動，封閉了兩個小工廠和線店，陳獨秀“大為驚怒”。^⑤鮑羅廷雖然不反對土地革命，但認為時機還不成熟，提出應繼續北伐，佔領西北並接通蘇聯後，再和國民黨決裂，因土地革命提前決裂很危險，這在當時被稱為“西北學說”。羅易說：“中共領導人仍在疑神疑鬼，害怕與國民黨關係破裂”。“中國共產黨在形式上接受了新的路線，但卻是半心半意的，在鮑羅廷的領導下，這種新的路線只能遭到破壞”。“鮑羅廷是蘇聯政府的代表，掌握著各種資料，控

① 巴庫林：《中國大革命武漢時期見聞錄》，第334-335頁。

② 《羅易赴華使命》，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207頁。

③ 《羅易赴華使命》，第174頁。

④ 《羅易赴華使命》，第207、208、209頁。

⑤ 蔡和森：《黨的機會主義史》（1927年9月），《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5），第512、519頁。

制著通訊機構”，“我就是在那種極度困難的情況下，站在這個由鮑羅廷操縱的中共領導集團的對立面，說服中國共產黨第五次代表大會，通過符合共產國際提出的新路線的決議。”^①

由於共產國際的權威，雖然有很多疑慮和爭論，1927年4月27至5月10日召開的中共五大還是接受了羅易的主張。針對鮑羅廷的所謂“西北學說”，五大政治議決案說：“第五次大會認為共產黨應當竭力執行深入革命的職任，以鞏固革命的根據地”，“東南諸省是經濟上最先進最富饒的地方，我們不能拱手讓給資產階級。”^②土地議決案明確指出：“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大會以為必須要在平均享用地權的原則之下，澈底將土地再行分配”，“土地國有確系共產黨對於農民問題的黨綱上的基本原則。”具體政策上，中共一方面提出無代價沒收公地和出租土地，另一方面還是對國民黨做了妥協，提出“屬於小地主的土地不沒收”，“革命軍人現時已有的土地可不沒收”，“革命軍兵士中沒有土地者，於革命戰役完終後，可領得土地耕種。”^③

中共五大基本上接受了共產國際政策，強調推進激進的土地革命，又試圖維持國共合作。斯大林、布哈林和羅易顯然都高估了國民黨左派的革命性，誤以為國民黨左派的武漢政府能夠接受土地革命。鮑羅廷在中國已經三年，他對中國政治實際更為熟悉，知道國民黨軍隊中反對土地革命的勢力很大，擔心過早推動激進政策帶來決裂危險。鮑羅廷並不反對土地革命，也認為和國民黨早晚要分手，在廣東的時候他就對中共領導層說：“國共是要分家的，不過分的愈遲愈好；北伐打到北京的時候，可能就要實行分家”。^④1926年12月到武漢之後，他又修正了自己的說法：“現在

①《羅易對大革命失敗的回憶》(1938年)，《國外中國近代史研究》第7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59-79頁。

② 中共五大《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議決案》(1927年5月)，《中共中央文件選集》(3)，第54-55頁。

③ 中共五大《土地問題議決案》(1927年5月)，《中共中央文件選集》(3)，第66、70頁。

④ 張國燾：《我的回憶》第二冊，第124頁。

看來，分家之事已經大為提早了。”^①但是，真正到國共分裂迫在眉睫的時候，他感到非常猶豫，覺得中共過於弱小，很可能遭到慘敗。鮑羅廷雖然是老布爾什維克，但他長期生活在美國，十月革命前後主要從事外交工作，是才智卓越的外交家，並不是在決裂之際領導武裝暴動的革命家。

四、決裂之際——中共中央妥協退讓，拒絕國際八次全會指示

(一) 5月分裂危機加劇，中共中央妥協退讓

羅易在中共五大上主持通過了激進政策，但是面對日趨惡化的危急形勢，這個誇誇其談的理論家卻毫無辦法。中共中央的決策還是受鮑羅廷影響更大，他的實際經驗比較豐富，總能針對具體情況拿出辦法。此時政治局會議參加者包括陳獨秀、瞿秋白、譚平山、張國燾、蔡和森、李立三、周恩來，任弼時也經常以少共書記身份參加，會議上分歧往往非常大。羅易和鮑羅廷的爭論佔據中心，陳獨秀、瞿秋白等也各持己見，張國燾形象地說：“從莫斯科以及上海來的那些共產要人們，竟是各有一套想法，這就走到‘艍公多了會翻船’的境地了。”^②

羅易在墨西哥受鮑羅廷影響才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並始終把鮑當做最親密的朋友之一，但此時他們的觀點卻針鋒相對。^③中共中央“會議開始時，往往是由魯易大發一番議論，接著便是鮑羅庭起而反駁；於是陳獨秀、瞿秋白、威金斯基等也就捲入了這個爭辯的漩渦，相互辯難，喋喋不休。而眾多的具體問題，反是在為理論爭辯了幾個鐘頭之後，出席的人們也已聽得倦態畢露之時，才草草的作出決定”。瞿秋白“覺得魯易的空談誤事，其為害是有過於陳獨秀先生的”。陳獨秀對四一二政變毫無警覺，在政變幾天前還和汪精衛發表聯合宣言，領導威信大為動搖，瞿秋白已有

① 張國燾：《我的回憶》第二冊，第169頁。

② 張國燾：《我的回憶》第二冊，第226頁。

③ 《羅易回憶錄》上冊，第203頁。

推翻陳的意圖，但鮑羅廷“以不應動搖現有領導為理由，主張少檢討一些過去，多策劃一些未來”，阻止了他。^①蔡和森也說：“魯易同志所說的一切原則都是很對的，很可寶貴的，只可惜沒有說出辦法，每次開會都像上課一般，只總空空洞洞的教我們一些原則”，“老鮑是有辦法而無原則，魯易是有原則而無辦法”。^②

為了維持國共合作，安撫國民黨左派的武漢政府，中共剛在五大上確立激進政策，就不得不出臺一系列措施限制群眾運動，造成了自相矛盾的混亂。5月10日五大剛剛閉幕，5月13日政治局就做出《關於小資產階級問題共產黨與國民黨的關係》議決，提出限制職工運動，保護小資產階級利益，還具體規定：“勞工部下設立仲裁廳解決雇主和店員間的衝突”，“調和店員過分的要求，規定營業管理權，保證店員不幹預營業。”^③

但群眾運動不受控制，國民黨軍隊也開始武力鎮壓了，幼稚的中共組織缺乏應對危機的能力。當時武漢政府的主力部隊張發奎部和唐生智部在河南抗擊奉軍，5月17日，駐紮湖北的14師師長夏鬥寅發動叛亂，聲稱支持南京政府，乘虛進攻武漢，情況十分危急，葉挺率留守部隊和軍校學生勉強擊退叛軍。5月21日，長沙33團團長許克祥發動“馬日事變”，屠殺中共黨員和工農幹部，湖南黨組織幾乎瓦解。事前湖南省委得知國民黨軍隊可能動手，竟提前一天於5月20日晚開會決定各自逃走，省委書記夏曦的理由是他和郭亮、戴曉雲、李維漢等公開活動，很難在長沙隱蔽，決定由薛世綸、王則鳴、林蔚成立秘密臨時省委。^④謝覺哉後來回憶：“二十日晚我接到電話，叫我走。為什麼走？走向何處？走了怎麼辦？均問不出，無計畫各走各的。”^⑤柳直荀也說：“事變之前，我們知道事變之將到，原有

① 張國燾：《我的回憶》第二冊，第233頁。

② 蔡和森：《黨的機會主義史》1927年9月，《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5），第527頁。

③ 《關於小資產階級問題共產黨與國民黨的關係》（1927年5月13日中央政治局議決），《中共中央文件選集》（3），第117-118頁。

④ 《關於我在馬日事變過程中一些情況的說明》（1979年12月），《馬日事變資料》，第580頁。

⑤ 《謝覺哉日記》，《馬日事變資料》，第572頁。

一個反攻的計畫。但是當時的黨雖則組織尚好，但只是一個太平時代的黨，沒有鬥爭的經驗，不能應付這個鬥爭的環境”，“因此事變臨頭，手忙足亂一切計畫全歸失敗”。^①

湖南省委9月給中央的報告稱：“湖南的黨經過五月事變的打擊，差不多完全瓦解了”。“省委會及一部分地方領導機關不能擔負它應擔負的責任”，“不但完全失了指揮力，並且不顧黨的生死，負責人首先各自逃走去了，有許多還是未聞風而先自潰”。“負責同志多半是書生，沒有戰鬥經驗，一般同志亦多不能戰鬥，因之省委失指揮力而後各地多不能獨立發揮其戰鬥力”。“事變發生之前，全湖南黨員已達二萬以上，現在已收集的不過五千左右”，“大約已恢復的不能超過原有人數的三分之一”。^②

數百萬人規模的湖南工農運動，竟然在少數敵對軍隊突襲之下瓦解，黨組織的幼稚以及群眾組織的鬆散自然是基本因素，但中共中央猶豫動搖，導致各級幹部缺乏血戰的決心也是重要原因。鮑羅廷得到湖南“馬日事變”的消息後“大發雷霆”，不過他的憤怒卻是針對中共湖南幹部的。他對羅易說：“湖南的局勢已變得無法容忍，他本人將前往那裡，逮捕李維漢（共產黨省委領導人、政治局委員），把共產黨人通通逐出該省，解除所有糾察隊的武裝。”^③鮑羅廷選擇的顯然不是狹路相逢勇者勝的鬥爭政策，而是妥協退讓的政策。但他也很無奈，軍隊的叛亂只有更強大的軍隊才能鎮壓，但中共卻沒有這樣的軍隊。

斯大林在1926年11月的七次全會就強調中共要重視軍事工作，準備建立軍隊，但鮑羅廷、維經斯基、陳獨秀等並不擅長這項工作。1927年5月關於中共軍事工作的報告說：“無論是中共中央還是我們共產國際委員會代表，都對黨的軍事工作重視不夠”；“中央軍事部的人員組成薄弱，經常只有一名成員，而且是缺乏經驗的同志”；“糾察隊和農民遊擊隊的

① 柳直荀：《湖南馬夜事變之回憶》（1928年5月），《馬日事變資料》，第562頁。

② 《湖南省委給中央的組織報告》（1927年9月5日），《馬日事變資料》，第511-512頁。

③ 羅易：《致政治書記處和斯大林同志報告》（1927年5月28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4），第283頁。

武器問題難以解決”；“由於打入軍隊的指示很晚才由中央下達給軍事部，所以向國民軍的滲透工作做得很不夠。”^①周恩來後來在六大上也說：“在武裝工人和士兵方面，我們沒有明確而堅定的方針”，“沒有軍事工作重心，也沒有對這項工作的相應態度。我們把在其他工作中不好使用的較差的同志派到軍隊中去。結果在軍隊中我們沒有聯繫，沒有受過訓練的軍人黨員。”^②

反共浪潮席卷全國各地，共產黨的處境越來越危急。險惡的形勢在中共領導層引發了明顯的慌亂，他們經過激烈爭論，最終決定繼續採取退讓政策。中共中央極力拉住國民黨左派，力圖鞏固與小資產階級、小地主等“中等階級”的同盟。夏門寅叛變後第二天，中共中央發表《中國共產黨對夏門寅叛變告民眾書》，聲明“中國共產黨反對在鄉村沒收小地主及革命軍官和士兵的土地，更主張沒有土地的軍官及兵士分得土地”，甚至說“中國共產黨關於小地主的政綱已明白規定，農民幼稚的行為，決非共產黨的行動。”^③

中共接連出臺了一系列讓步政策，限制工人運動和農民運動。5月22日，湖北總工會與漢口商會代表召開聯席會議，議決“在工作時間內，店員不得自由離店”，“工會及店員，不得強迫店家加用店員”，“工人向店東提算總帳事，已由湖北全省總工會通告制止。”^④5月25日政治局《工人政治行動議決案》要求工人武裝糾察隊調動“須得衛戍司令部同意”；“政治停工必須得總工會命令，總工會應極慎重，非十分重大政治示威，決不下停工令”；“工會無政府命令不得拘捕非工人”。^⑤政治局5月25日通過《對於

①《赫梅廖夫就中共中央軍事部的工作給別爾津的書面報告》(1927年5月6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4)，第241頁。

②《周恩來在中共六大軍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的報告記錄》(1928年6月27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7)，第502頁。

③《中國共產黨對夏門寅叛變告民眾書》(1927年5月18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3)，第129、130頁。

④《工商聯席會議議決案》(1927年5月22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3)，第119、124頁。

⑤《工人政治行動議決案》(1927年5月25日政治局通過)，《中共中央文件選集》(3)，第134-135頁。

湖南工農運動的態度》，承認“貧農幼稚行動，如均分土地、均分財產、對於土豪劣紳之逮捕罰款以及關於宗教道德革命等，引起了小資產階級、小地主尤其是軍人之劇烈反對”，認為“這些糾紛已引起極嚴重的政治問題”，“鄉村中農運問題，一切非本黨政策所規定的幼稚行動，立須依本黨的領導力量，切實矯正。已沒收之軍人產業一概發還”。^①

5月26日，政治局仍在討論如何尋找中間道路，而不是站在工農一邊堅決鬥爭。會議通過的《關於湖南事變以後的當前策略的決議》稱：“今天黨所面臨的問題，不是立即推翻敵人或者我們徹底投降，這裡有一條中間道路，必須找出這條中間道路”。“冒立即同敵人發生武裝衝突之險，對於我們黨來說是不可取的。我們的政策是爭取時間，保存自己的力量，為不可避免的戰鬥作準備”。“同左派國民黨的領導人，特別是同汪精衛建立更密切的關係，以便結成一個聯盟去反對名義上是在國民政府領導下的國民黨內的軍閥反動勢力”。^②

羅易反對讓步政策，但他得不到中央多數支持，也提不出有效的替代方案，只能在給莫斯科的電報中抨擊“鮑羅廷實行的是葬送革命的徹頭徹尾的社會民主主義政策。他處事獨斷專行”，“向共產黨發號施令”，“不符合他的政策的報告不能發出”，“拒絕發我的電報”。^③他在給斯大林的報告中認為“過去的根本錯誤是，從來沒有嘗試過建立自己的武裝力量”，“沒有把農民武裝起來”，“這種政策的結果是災難性的”。他還批評“黨太年輕，沒有傳統和經驗”，中共中央“領導未能同黨的成長壯大齊頭並進，它是軟弱的和機會主義的。一些老的領導人（陳獨秀、譚平山）與其說是共產黨人，不如說是國民黨人”，而鮑羅廷則認為“中國革命10年內不可能取得成功”，“談論中國無產階級領導權問題，這是幻想”。5月27日政治

①《對於湖南工農運動的態度》（1927年5月25日政治局通過），《中共中央文件選集》（3），第136頁。

②《關於湖南事變以後的當前策略的決議》（1927年5月26日中央政治局通過），《中共中央文件選集》（3），第138、139頁。

③《羅易給某人的電報》（1927年5月25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4），第274頁。

局會議上通過的仍是“實行策略性退卻。”^①

政治局確定了安撫武漢政府的方針，於6月初連續向全黨發出控制農民運動的通告。6月1日政治局會議通過《中央通告農字第五號》，認為國民革命軍的軍官“皆是地主階級出身，大多數自己是小地主。貧農力爭改革土地制度的鬥爭，打擊了軍官的利益”，“如果現時在軍隊中的軍官，完全離開革命，那就足以使整個革命運動發生很大的崩裂，甚至於破滅”。“平均田地甚至於平均佃權，以及均分財產，強迫搗毀祖宗牌，沒收兵士郵寄回家之款等，都是不正當的政策”。^②

中央緊接著又在6月6日發出《中央通告農字第七號》，要求糾正農民無組織行動：“此等無組織之行動，如下列各事，目前尤當絕對迅速糾正！”“自由逮捕，罰戴高帽子，遊街示眾，吃排家飯等行動，往往殃及小地主，引起軍官及小地主的反動”。“禁米出境，勒寫捐款，剷除煙草，禁止釀酒等事，足以使商業停滯，妨礙城市與鄉村之交通，引起中小商人之反動，更可以使政府借阻止軍米妨礙稅收的口實，實行壓迫農民運動”。“反對舊禮教，拜祖教及一切迷信菩薩等束縛農民的惡俗，改革男女關係的運動等，自然都有進行的必要，但是這些都是文化運動，只能用宣傳而不能用鼓動方法，更不能用強迫方法”，“不可以強迫搗毀其神像祖宗牌等”。“各級農民部，須知農民運動已至極嚴重的時期，我們如果不能切實執行黨的政策，以改正過去的錯誤，萬難挽救目前的危機。換言之，即將使整個農民運動，受致命的打擊，亦即使整個革命運動受極大的創傷。所以，各級農民部，務須指導各級農民協會黨團，嚴厲執行，至要！至要！”^③

① 羅易：《致政治書記處和斯大林同志報告》（1927年5月28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4），第287-292頁。

② 《中央通告農字第五號》（1927年6月1日政治局會議通過），《中共中央文件選集》（3），第156-157頁。

③ 《中央通告農字第七號——糾正農民無組織行動》（1927年6月6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3），第174-176頁。

(二) 共產國際八次全會指示堅決進攻，中共中央拒絕執行

1927年5月18-30日召開了共產國際八次全會，5月30日蘇共政治局會議決定給中共發一封要求堅決進攻的指示電。這封電報不僅加快了國共分裂，而且在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之間引發了激烈對抗，中共拒絕執行這封電報，是被斯大林指責為“右傾機會主義”的重要原因。

電報雖然也提到通過農會糾正過火，不要“觸及軍官和士兵的土地”，但主要的傾向是進攻性的，認為“不進行土地革命，就不可能取得勝利”，“我們堅決主張從下面實際佔領土地”。電報關鍵內容是要求“動員兩萬共產黨員，再加上來自湖南、湖北的五萬革命工農，組建幾個新軍。要利用軍校人員做指揮人員，要組建自己可靠的軍隊，現在還不晚。不這樣做就不能保證不失敗。這是很困難的事情，但沒有別的路可走。”^①十月革命後大批蘇共黨員參與創建紅軍是革命勝利的關鍵，斯大林本人正是紅軍南線察裡津血戰的主要領導人。中共全部黨員不到六萬，斯大林要派兩萬黨員去參軍，就是要中共不能心存僥倖，應下定決心迎接即將到來的血腥殘酷的國內戰爭。電報也提出了一些不現實的要求，比如改組國民黨中央、審判反動軍官等，說明斯大林對半個月來夏鬥寅叛亂和馬日事變的巨大衝擊不瞭解，出現了信息滯後。

國內戰爭單靠兩萬黨員當然不夠，還需要爭取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因此不僅不能壓制農民運動，還要通過土地革命來發動農民，為此應不惜與地主及資產階級決裂。6月3日，蘇共政治局根據最新報告召開緊急會議，再次發出要求堅決進攻、反對退卻的電報，並明確表達了不滿，認為“鮑羅廷對譚平山長沙之行的解釋不能成立。我們認為，任何阻止土地革命的行為都是犯罪。應當立即切實領導土地革命，而不得利用考察加以阻止”。“要以傷亡減員為藉口將張發奎的部分部隊，如若可能，則將其

^①《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第107號記錄》，《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4)，第298-299頁。

所有部隊作為比較可靠的部隊調作武漢的後備隊，趕緊補充工人和農民”。“我們沒有得到關於收到最近的電報的確認。這是不能容忍的。”6月6日，蘇共政治局再次發出電報：“為答覆陳獨秀的電報，再次重申阻止進行土地革命是犯罪行為，並會導致革命的毀滅。”^①

但中共中央多數領導人的想法完全不同，陳獨秀、譚平山等害怕決裂，沒有準備好面對即將到來的殘酷戰爭，認為只能退卻。羅易6月5日給斯大林的電報說：陳獨秀是“典型的激進知識份子，是國民黨在共產黨內的代理人”，“他完全支持國民黨鎮壓湖南‘過火行為’的政策，這實際上是向農民進攻。他認為湖南的同志對發生反革命叛亂有嚴重過失。在目前革命處於危機的情況下，這樣的領導對黨是極其有害的”。“黨在革命鬥爭中成長壯大，但不是它的領導成長壯大了”。“陳應立即召到莫斯科去。”^②

6月7日，中共政治局開會討論莫斯科來電。陳獨秀直率地表示拒絕：“電報表明，莫斯科不瞭解中國的實際情況”，“共產國際可能不知道，沒有過火行為，反動派的統一戰線不會這麼容易形成。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不能談及土地問題。”譚平山也明確反對電報：“如果我們在局勢惡化的情況下還主張解決土地問題，那就更糟糕了”，“我們不應過高估計莫斯科的電報。它們是想讓我們振作精神。”羅易支持共產國際電報，認為依靠陳獨秀等人無法執行進攻政策，需要立刻改組中共中央，他在6月8日給莫斯科的電報中說：“若徹底揭露舊的政策，實行堅強的領導，則還可以挽回局面。有必要採取果斷的組織措施。”^③

6月15日，陳獨秀代表政治局致電共產國際，明確拒絕莫斯科的指示。他強調“整個軍隊對農民運動的過火行為都抱有敵意”，“這種情況

①《聯共(布)中央政治局緊急會議第108號(特字第86號)記錄》，《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4)，第306-307頁。

②《羅易給斯大林和布哈林的電報》(1927年6月5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4)，第303頁。

③《羅易給聯共(布)中央政治局的電報》(1927年6月8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4)第308-311頁。

下,不僅是國民黨,就是共產黨也必須採取讓步政策”。“否則,將立即引起與大部分反動軍隊的衝突,與國民黨發生分裂,而我們將變成一個反對黨”,“在最近的將來,繼續留在國民黨內在客觀上大概是不可能的”。“中國共產黨設法要建立民主政權,但在短時期內不可能實現”。“當我們還不能實現這些任務的時候,必須與國民黨和國民黨軍將領保持良好關係”,“我們的迫切任務是要糾正‘過火’行為。”^①

蘇共政治局6月16日會議決定重申既定政策,嚴厲批評中共不執行國際指示,同時決定派以勇猛著稱的羅明納茲去中國,代替羅易和鮑羅廷。指示電稱:“我們沒有任何新方針,而你們那裡實際上是不執行共產國際的決定,首先是關於土地革命、武裝工農、建立可靠的武裝部隊和使國民黨機構民主化的決定”。“答覆陳獨秀的電報,重申我們的指示,即推遲土地革命是極為有害的。”^②

莫斯科毫不動搖地堅持進攻政策,讓猶豫不決的中共領導層陷入混亂之中。在6月26日的政治局會議上,感覺走投無路的陳獨秀悲歎道:“右的道路意味著放棄一切,左的道路意味著採取激進行動。在這兩條道路上等待我們的都是滅亡”。“莫斯科的指示我弄不明白,我不能同意。莫斯科根本不瞭解這裡發生的事情”。鮑羅廷含糊地說:“我們不同意這些電報的方針,因此給莫斯科發了電報。莫斯科非常明確地回答說,它堅持自己的指示。任務是尋求新的、與莫斯科一致的行動綱領”。張國燾則激烈地表示:“我也認為,莫斯科的指示是不能接受的。應當加以拒絕並通知莫斯科。如果莫斯科還堅持自己的意見,那就應該再次回電反對莫斯科。”譚平山、瞿秋白、周恩來、張太雷的發言模稜兩可,只有任弼時堅決支持莫斯科:“我完全不同意鮑羅廷的意見”,“應該完全徹底地接受莫斯科

^①《陳獨秀根據政治局意見致共產國際電》(1927年6月15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5),第468-469頁。

^②《政治局1927年6月16日會議第111號記錄》,《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4),第349頁。

的指示”。當鮑羅廷反問“在哪裡和怎樣才能沒收土地”時，任弼時回答：“在湖北、湖南、江西，借助於農民隊伍。”^①

任弼時在這次會上表現很堅決，但在國共正式分裂後發表宣言的時候，他卻堅持不要點名批評汪精衛，給蘇聯顧問留下了“很不穩定，政治上不大可靠”、“害怕進行真正的鬥爭”的印象。^②毛澤東在這一時期也寫過迷茫沉鬱的《菩薩蠻·黃鶴樓》，後來批註說：“大革命失敗的前夕，心情蒼涼，一時不知如何是好”。^③的確，當時幾乎每個人都有過猶豫動搖的時刻，每個人都在挑戰自己的極限，從激進書生轉型為勇猛革命家絕非易事。

（三）最後決裂——湖南暴動計畫夭折與武漢工人糾察隊繳槍

6月中上旬，蔡和森曾提出一個湖南暴動計畫，得到了羅易的支持，但在猶豫動搖之中又取消了計畫。當時鮑羅廷、陳獨秀、李立三、瞿秋白主張借唐生智、張發奎的力量東征蔣介石，羅易、譚平山主張借張發奎的力量南伐廣東，蔡和森主張在湖南暴動，他尖銳地說：“北伐是馮玉祥的事，東征是唐生智的事，都與我們無關，我們不要再為他人做嫁衣裳，伐來伐去，依然兩袖清風，一無所得！這便是說現在我們必須堅決地自覺地來幹我們自己的事，來找我們的地盤和武力”。“武力”和“地盤”的提出，確實是一個大突破，這就是建立紅軍和蘇區的思想。蔡和森提出的湖南決議案包括建立五萬以上農軍、沒收土地、赤色恐怖、反攻長沙，這與國際來電相符，羅易表示支持，於是組織了“湖南特別委員會，專為指揮湖南暴動”，派了不少軍事同志去湖南。但後來羅易聽了一個報告，認為湖南革命勢力

①《西塔羅夫關於中共中央政治局與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代表聯席會議的報告》（1927年6月26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4），357-363頁。

②《西塔羅夫給青年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信》（1927年8月26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7），第27頁。

③張仲舉編著：《毛澤東詩詞全集譯注》，陝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2頁。

已經瓦解，決定取消暴動，軍事部負責人周恩來白忙一通，氣得“與羅易大鬧一場”。^①

這一階段，羅易確實是莫斯科進攻政策的主要支持者，但他也不是成熟的革命家。6月5日，他竟然把莫斯科電報拿給汪精衛看，這個幼稚舉動顯然加快了國共分裂的進程。在鮑羅廷等的攻擊之下，共產國際6月22日決定召回羅易，“因為他給國民黨中央的一些委員看了只發給鮑、羅、柳三同志而無論如何不能給其他人看的電報。”^②蔡和森評論道：“魯易始終不失為一個書生，原則是在紙上維持著，實際問題一個也未見到”。“魯易既始終要拉住汪為中心，又始終要提出汪所不能接受的政綱，這是老鮑始終有力制勝魯易之點”。“魯易是想擴大張發奎的勢力，此事老鮑堅決反對，因此共產黨中央軍部負責同志及中央政治局多數亦堅決的反對，以為這個意思一露出，唐生智等馬上就要和我們翻臉，何鍵馬上即會暴動政變。但是魯易終不死心，卒把此意完全告知汪精衛。”^③

對羅易洩密的處罰也說明，莫斯科堅持國共合作只是暫時的策略，就像十月革命時與左派社會革命黨的合作一樣。斯大林一方面要求維持國共合作，另一方面要求土地革命和建立軍隊，兩者顯然矛盾。但其實前一方面只是掩護，重心在後一方面，在國民黨的掩護下通過土地革命和建立軍隊壯大自己。羅易竟然幼稚到把汪精衛當做自己人，顯然是誤解了斯大林的本意，所以莫斯科“對這種行為感到吃驚”，立刻決定召回羅易。^④布哈林一年後在中共六大作報告時，特別批評羅易“將共產國際之秘密電報拿給汪精衛看”，“這種人完全是做得糊塗，愚笨”，明確說“狡猾的政策，

① 蔡和森：《黨的機會主義史》1927年9月，《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5），第529-530頁。

②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秘密會議第30號記錄》（1927年6月22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4），第344頁。

③ 蔡和森：《黨的機會主義史》1927年9月，《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5），第538-539頁。

④ 《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第112號（特字90號）記錄》（1927年6月18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4），第348頁。

欺騙的政策，外交式的奸詐”，“對待我們階級的敵人是完全可以用的”。^①

中共中央沒有行動決心，不過還是發了一個通告，嘗試把農民運動的巨大力量組織起來，通過農民自衛軍建立軍事力量，甚至對會黨武裝也積極爭取。6月14日《中央通告農字第八號》要求“各省軍部須派有軍事工作能力及經驗的同志訓練農民自衛軍，使其有野戰與迅速集中的能力”，要求建立“鄉村自治機關的保安隊，並須實行民兵制，使每個農民都能獲得軍事訓練，並使有一批復一批的武裝訓練與補充，這個問題非常嚴重，各省軍部及農民部，均須積極切實準備，同時必須號召農民加入軍隊。”通告還提出聯絡會黨：“農協中不應任何方法，任何形式排拒會黨。可介紹會黨分子加入國民黨，會黨中有階級覺悟的應介紹加入本黨。”^②

在共產國際強調建立軍隊的時候，卻發生了武漢工人糾察隊繳槍事件，此事也是後來共產國際批評中共“右傾機會主義”的例證之一。唐生智、張發奎軍隊在河南打敗奉軍以後回師武漢，唐軍駐漢口、漢陽，張軍駐武昌。6月下旬，唐的部將何鍵將要在武漢發動叛亂的傳聞風聲鶴唳。6月底，中共中央為消除武漢政府的疑慮，明令宣佈解散武裝的工人糾察隊，本來是想秘密調糾察隊過江到武昌進入張發奎軍隊，結果糾察隊聽到傳聞後拋棄槍支、一哄而散，這也說明沒有嚴格訓練和實戰經驗的工農武裝戰鬥力很差。^③總工會佈告稱：“現在武漢反動派，企圖挑撥工兵之感情，製造種種謠言，中傷本會糾察隊，以致蜚短流長，淆亂外間聞聽，影響工兵聯合戰線。本會為避免反動派藉口武裝糾察造謠起見，業於本月二十八日將糾察隊全體解散。所有前領槍彈，並經交存政府”。^④

關於糾察隊繳槍事件，蔡和森對其前因後果有更詳細的記述：“自上

① 布哈林：《中國革命與中共的任務》（1928年6月），《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11），第182頁。

② 《中央通告農字第八號》（1927年6月14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3），第185、189頁。

③ 蔡和森：《黨的機會主義史》（1927年9月），《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5），第539-540頁。

④ 《湖北全省總工會解散糾察隊佈告》（1927年6月29日《漢口民國日報》），《中共中央文件選集》（3），第621頁。

海失敗之後，‘紙老虎’的工人糾察隊迅速發展”。“五次大會後，則以工人糾察隊、農民自衛軍改編入正式軍隊之論極佔優勢。夏門寅叛變時，湖北全省總工會糾察隊有逃走怯懦之現象，遂益愈確定了這種‘改編入正式軍隊’的方針”。^①6月底，鄧演達出走前警告共產黨何鍵將在漢口發動叛變，“太雷提出糾察隊、童子團問題今日一定要解決，恩來報告中央軍部與省委軍部業已決定於今日下午將總工會糾察隊調過武昌入張發奎軍，並已與張交涉好，但為避免耳目計，過河時不著糾察隊衣服，也不攜槍。和森說：‘這實際是解散糾察隊了，何不率性公開宣佈，以消滅何鍵暴動之藉口？’大家遂決定公開宣佈解散糾察隊，實際編入張軍”。“不意省委及總工會處理糾察隊之事，手忙腳亂，未向負責同志說明，以致一時大形混亂，糾察軍及辦事人棄槍棄職，逃走一空。”^②

中共領導層中不少人陷入慌亂之中，幾百萬農民奪取土地的革命已經無法控制，國民黨已經轉向用軍隊鎮壓農民。農民與國民黨已經決裂，到底是站在農民一邊？站在中間？還是站在國民黨一邊？這是中共必須回答的尖銳問題。選擇站在國民黨一邊等於背叛了自己的政治立場，成為國民黨的附庸；選擇中間立場等於回避重大政治問題，失去政治影響力，像後來的陳獨秀派、胡適派一樣；選擇站在農民一邊，則意味著立即與掌握軍隊的國民黨決裂，面對血腥殘酷的鎮壓，經歷過蘇聯建國血戰的斯大林發出了強硬指示，但外交家鮑羅廷、學者陳獨秀以及知識份子為主的中共領導層顯然還沒有準備好。斯大林在7月9日批評道：“現在的中央（它的上層領導人）是國民革命時期鍛煉出來的”，“但它完全不適應新的土地革命階段。中共中央不理解新革命階段的涵義”。^③從後來武裝暴動、建立紅軍和蘇區的歷程來看，莫斯科指示強調建立軍隊和發動農民的

① 蔡和森：《黨的機會主義史》1927年9月，《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5），第539-540頁。

② 蔡和森：《黨的機會主義史》1927年9月，《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5），第543-544頁。

③ 《斯大林給莫洛托夫和布哈林的信》（1927年7月9日於索契），《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4），第407頁。

戰略方向無疑是中國革命取得成功的關鍵。

在國共破裂的最後關頭，斯大林一方面堅持強硬指示，另一方面也不放棄對國共合作的利用，力爭把檸檬完全榨幹。在7月8日給莫洛托夫的信中，他提出利用國民黨下層反對上層，這一策略在布爾什維克與社會革命黨的合作中有過成功經驗。他說：“只要能利用武漢的上層人士時，我們就利用他們，現在應該拋棄他們。應該嘗試去掌握國民黨地方機關並使之與今天的國民黨上層對立”。“暫時不把退出國民政府（現在這樣做是必要的）與退出國民黨（最近的將來這樣做可能是必要的）聯繫起來。”^①在這一時期，正在索契度假的斯大林，顯然對武漢政府產生了誤判，沒料到汪精衛這麼快就轉向反共，誤判蔣介石之後又誤判汪精衛，必定又要遭到托洛茨基的嘲弄。在7月9日信中，斯大林的情緒失控，竟對布哈林和莫洛托夫怒罵起來：“你們兩個人真見鬼！你們徵詢對（關於中國的）新指示的意見，又不提供具體的新材料，真使我感到有點兒難堪！”^②從這裡也可以看到斯大林的粗暴性格。

7月8日，共產國際致電中共中央，指示“共產黨人必須示威性地退出國民政府”，但“退出國民政府並不意味著退出國民黨。共產黨人必須留在國民黨內，並在國民黨的各個組織中和擁護國民黨的群眾中，為改變國民黨的政策和改組領導機關進行堅決的鬥爭”。“共產黨的領導機關應該真正成為工農群眾革命運動的中心。否則，黨就會毀滅自己。”^③7月13日，中共中央根據莫斯科指示，公開宣佈退出武漢政府。

7月14日，共產國際在《真理報》公開發表了與武漢政府決裂的決議：“最近幾周，事態發展得特別快”，由於“軍事將領和軍官團公開轉入反革命營壘，並宣佈與農民為敵”，“武漢政府已成為反革命勢力”。“中國共產

① 《斯大林給莫洛托夫的信》（1927年7月8日於索契），《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4），第400頁。

② 《斯大林給莫洛托夫和布哈林的信》（1927年7月9日於索契），《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4），第405頁。

③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致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電》（1927年7月8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5），第487-488頁。

黨人毫不遲疑地退出武漢政府，以示抗議”。“不退出國民黨。儘管國民黨領導在開展將共產黨人清除出國民黨的運動，要留在國民黨內。要同國民黨基層建立更密切的聯繫，由基層作出決議，堅決抗議國民黨中央的行為”。^①7月15日，汪精衛在武漢國民黨中常會第二十次擴大會議上正式宣佈分共，不過仍表示“和平分共”，並且在7月16日《漢口民國日報》公佈了《保護共產黨員個人身體自由之訓令》。^②

7月28日，斯大林在《真理報》發表文章，以俄國革命的經驗為國共合作辯護：“在十月革命時和十月革命後，直到1918年春，布爾什維克和左派社會革命黨的革命聯盟是否正確呢？我想，還沒有人敢於懷疑這個聯盟的正確性。”^③的確，在蔣介石控制的地區，國共早已分裂，而共產黨遭到的損失更大。即使在與武漢政府決裂的最後關頭，對於相對弱小的中共來說，每一點值得利用的合作機會仍然是可貴的，所以當中共終於在南昌發動八一武裝暴動時，仍然打出了國民黨的旗幟。

五、小結

中國共產黨在1927年還處於幼稚時期，政治理論未經實踐，領導機構缺乏經驗，各級幹部意見分歧，無法有效領導數量巨大、情緒激動的工農群眾，也無法制定出成熟的政策，即使有政策也很難貫徹執行，當面對奪取政權的血戰時，難免要遭受挫折。一個政黨只有經過嚴重挫折的考驗，才能實現深刻的轉型，真正走向強大。

斯大林1927年7月底的評論是有道理的：“以為中國共產黨能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一下就成為真正的布爾什維克黨，那就可笑了。只要把我

①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關於中國革命當前形勢的決議》（1927年7月14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5），第491-494頁。

② 王奇生：《國共合作與國民革命》（1924-1927），鳳凰出版傳媒集團、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07頁。

③ 斯大林：《時事問題簡評》（1927年7月28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6），第268頁。

們黨經歷過的一系列的分裂、脫離、變節、叛賣等等歷史回憶一下，就能明白真正的布爾什維克黨並不是一下子就能產生出來的。”^①羅易1929年的回顧也頗為中肯：“黨太年幼，在完成所面臨的艱巨任務時，難免不犯錯誤。黨缺乏必要的政治經驗”。“中國共產黨從一個主要是知識份子的小組織，突然轉變為一個群眾性的無產階級政黨，領導著參加這場大規模革命鬥爭的250萬有組織的工人和大約900萬有組織的農民。然而黨的領導仍然主要是知識份子；他們被事變的發展弄的不知所措，不能駕馭局勢。”^②莫斯科指導外國革命同樣沒有經驗，共產國際1919年成立，1920年才制定在落後國家革命的理論，連列寧都承認對中國、印度瞭解不多，理論很不成熟，有待實踐的檢驗。

中國共產黨1921年成立，最初只是一個知識份子的小團體，在1925年五卅運動以後迅猛發展，黨員從幾百人很快超過萬人，成為有影響的群眾性政黨，但各級幹部仍以知識份子為主。1926年下半年北伐戰爭節節勝利，新黨員大批湧入中共組織，武漢第一紗廠“十月革命九周年紀念的前夕，一夜之間就發展了七、八十個黨員”，^③到1927年五大時中共黨員已經猛增到五萬八千多人。但是，黨員的迅速增加並不等於組織的強大，甚至可能帶來組織的混亂，短時間內蜂擁入黨的新黨員難免泥沙俱下，很多人只是在革命形勢順利的情況下尋找個人出路，並沒有堅定的信仰和組織訓練，這種組織上的弱點在面臨複雜局勢和嚴峻考驗時必然會導致挫折。失敗不是某些人的具體“錯誤”造成的，而是組織在特定階段的內在弱點決定的，在面臨全新環境、需要脫胎換骨的轉型時，無論多麼“正確”的政策，都很難避免中共在鬥爭初期遭受挫折。正如毛澤東1936年對斯諾說的，“即使共產黨在分裂以前採取了比較積極的政策，從工人和農民

① 斯大林：《時事問題簡評》（1927年7月28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6），第265頁。

② 羅易：《關於中國大革命失敗的結論》（1929年），《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6），第396-397頁。

③ 袁溥之：《往事歷歷》，《廣東黨史資料》第三輯，廣東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41頁。

中創建了黨的軍隊”，他也“並不認為反革命在一九二七年會被打敗”。^①

中共組織雖然由於年輕幼稚遭受失敗，但在逆境中表現出很強的生命力。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惲代英等一批中共精英經受住了失敗的考驗，開始發起暴動、創建紅軍、開闢蘇區，領導殘酷的革命戰爭。在那個天下大亂、群雄並起的時代，中共有了自己的軍隊和革命根據地，就有了繼續競爭政權的機會。

^① 愛德格·斯諾：《西行漫記》，三聯書店1979年版，第140頁。

第二章

中共在武裝暴動中的組織轉型

中國共產黨在1927年既取得了巨大發展，也遭受了嚴重挫折。在國共分裂後的血腥鎮壓中，李大釗、陳延年、趙世炎等喋血刑場，許多知識份子和工人離開了中共，但很多精英骨幹如毛澤東、周恩來、陳毅、惲代英等闖過了這一關，他們從國民黨左派的武漢政府分化出一部分軍隊，勇敢發起武裝暴動。中共失去很多知識份子和工人的同時，大批革命農民以及賀龍等勇猛戰將在武裝暴動中加入進來，中共的組織成分發生了重大變化，初步實現了向武裝革命黨的轉型。

一、最後的合作——初期紅軍多出自張發奎第二方面軍

斯大林反對中共過早退出國民黨，要求維持國共合作到最後一刻，是希望從中獲得好處，特別是獲得建立軍隊的機會。雖然斯大林早在1926年11月共產國際七次全會上就強調中共應重視軍隊，但他在1927年5月13日和中山大學學生的談話中，明確反對立刻建立獨立的紅軍，他認為比較現實的是在國民黨的框架下，“使現有的軍隊改善並且用種種可以用的手段使它革命化，現在就奠立新的革命團隊和師團的基礎，這些部隊由革命的、經過農民革命學校的農民和由革命的工人組成，建立幾個新的、真正可靠的、擁有可靠的指揮人員的軍團”，“這些軍團就將為那個新的、後來發展為紅軍的軍隊”。^①

^① 斯大林：《和中山大學學生的談話》（1927年5月13日），《斯大林論中國革命問題》，聯合出版社1949年版，第55頁。

中共部分實現了這個設想，在與武漢政府最後決裂之前，從國民黨左派手中獲得了不少軍隊，汪精衛在軍隊裡的主要支持者是張發奎，他的第二方面軍成了初期中共軍隊的重要來源。

(一) 國民黨左派的激進傾向是合作基礎

在 1927 年 3 月二屆三中全會上，國民黨左派表現出相當激進的革命傾向，這是中共與其合作的政治基礎，但也使斯大林、羅易等發生誤判，以為國民黨左派能夠接受激進土地政策。鮑羅廷聯合國民黨左派鄧演達、徐謙、孫科、顧孟余等主導了這次會議，蔣介石和張靜江沒有出席，會議強調集體領導，取消主席制，蔣介石失去了中常會主席、組織部部長、軍人部部長等重要職務。二屆三中全會對農民宣言相當激進，認為“中國國民革命最大部分的目標，在於使農民得到解放”，主張超越減租減息政策，重申孫中山以前提過的“耕者有其田”，聲稱“本黨決計擁護農民獲得土地之爭鬥，至於使土地問題完全解決而後止。”^①蘇聯顧問巴庫林 3 月 19 日寫到：“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全會會議已經結束。整個來說，它標誌著國民黨武漢派領導集團的政策向左轉了”，“同蔣介石決裂是在所難免的了”，“這次全會還使共產黨人現在進入了國民政府”。^②可以說，二屆三中全會基本上恢復了 1926 年 3 月 20 日中山艦事件之前國民黨左派與中共緊密合作的局面。

汪精衛是國民黨左派的領袖，他在“請假”一年之後，取道蘇聯回到國內，他在莫斯科會見了斯大林等領導人，很可能達成了合作的諒解。汪精衛到上海後，拒絕了蔣介石、吳稚暉等的分共要求，4 月 4 日與陳獨秀發表維護國共合作的聯合聲明，並且在 4 月 6 日給好友李石曾的信中說：“五日談話會散後，痛苦萬分。弟深信弟意見，決不能得吳先生等之贊同。而吳先生之意見，弟亦決不能贊同”。“民國十三年來改組之國民黨，其精神與

① 巴庫林：《中國大革命武漢時期見聞錄》，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85 年，第 229-232 頁。

② 巴庫林：《中國大革命武漢時期見聞錄》，第 114 頁。

政策絕不可犧牲”。^①很明顯，汪精衛為維持與共產國際及中共的合作，不惜與蔣介石、吳稚暉等人決裂，羅亦農在4月6日上海活動分子會議上說：“汪精衛的態度非常之好，政治觀念很穩定，與C.P.可以合作下去，甚至於到建設社會主義，他絕對贊同共產國際給我們的訓令。”^②

汪精衛剛到武漢兩天，蔣介石就在上海發動了四一二政變，4月15日汪精衛主持中央委員會會議宣佈蔣介石十二大罪，認為他“自絕於黨和人民，自甘墮落為一個新軍閥”，將其開除黨籍。^③5月4日，汪精衛受邀列席中共五大，並且在發言中說國民黨可以接受中共五大的激進政策，走向非資本主義道路。他說：“魯依同志解釋第三國際第七次擴大會議”，“中國革命的特質，應當往非資本主義那一條路上走”。“照這個決議案的大意看來，中國國民黨是可以採用的”。“本席覺得第三國際的決議案，同國民黨的政綱可以互相幫助，並無衝突”，“國共兩黨是可以攜手合作的。”^④可以看出，汪精衛一度思想相當激進，顧孟余甚至說過，汪是“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論述一切。”^⑤

鄧演達是國民黨左派中最激進的，他對土地革命非常支持，武漢國民黨中央成立土地問題委員會就是他的提議。他4月2日在國民黨中常會發言中說：“農民問題，其焦點就是土地問題，所以本席今天特提出組織問題委員會，由此會確定一個實行分給土地與農民的步驟，將來實行起來，必定得著農民真實的擁護。農民起來，做成鄉村間普遍的革命現象，然後可以推翻社會的封建制度，否則必不能真正成功”。鄧演達提議“請指定

① 汪精衛：《寄李石曾書》（1927年4月6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黨史教研室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四冊，第314頁。

② 羅亦農：《中共上海區委召開活動分子會議記錄》（1927年4月6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黨史教研室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十三冊，第509頁。

③ 《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就開除蔣中正黨籍發表的聲明》1927年4月15日，見巴庫林：《中國大革命武漢時期見聞錄》，第296頁。

④ 汪精衛在中共五大的列席發言（1927年5月4日），蔣永敬編：《北伐時期的政治史料——一九二七年的中國》，正中書局1981年版，第246-247頁。

⑤ 《維經斯基同顧孟餘談話記錄》（1926年8月17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3），第401頁。

徐謙、顧孟余、譚平山、毛澤東四同志”為土地問題委員會委員，顧孟余提議“並請指定鄧演達同志”，提議獲得通過。^①

武漢政府重要人物汪精衛、顧孟余、徐謙等一度都對解決農民土地問題表現出一定熱情，甚至投機的軍官唐生智、何鍵等也說過贊成的話。鄧演達後來談到，武漢中央注意土地問題是從四月初土地委員會成立開始，“徐謙、顧孟余，軍官領袖如唐生智，甚至劊子手何鍵，都先後發過贊成‘急切解決土地問題，要沒收大地主的土地交給貧農’的議論和其他好聽的話，當時在場贊成的更是所謂左派領袖，汪精衛格外熱心。”^②事實上，孫中山生前確實說過：“我在農民問題上的政治路線是：我決心將所有現在掌握在地主（出租土地的人）手裡的土地轉交給農民掌握和所有”，^③所以汪精衛自命為孫中山思想的忠實捍衛者。

但國民黨左派是動搖的，當兩湖農民運動形成巨大社會衝擊時，汪精衛等人在多數軍隊可能叛變的威脅下，很快改變了態度。6月，汪精衛在反共浪潮的裹挾下，“很明白的發表了許多痛罵農民運動的言論，他的信徒們且有謂‘農民蠢如鹿豕’，並指農民配不上說自身解放，根本反對民眾的要求。當時汪氏一切的氣力都集中於軍閥的拉攏勾串，只要是高級軍官說的，就俯首聽命。”^④鄧演達後來說：“武漢首都的危迫與著名的許克祥反叛快來了。這個光景就是在武漢中央日夜討論轟轟烈烈的土地委員會擴大會議場中，所以許多‘煞有介事’的口說先生們一次比一次沉默，最後至於藉詞推宕反對的理由了”。“馬日事變（五月二十一日）這個爆發的信號，是叫起了一班投機依附模稜兩可的先生們，叫他們‘再不要跟著共產

① 鄧演達：《在國民黨二屆常務委員會第五次擴大會議上的報告和發言》（1927年4月2日），《鄧演達歷史資料》，華中理工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95頁。

② 鄧演達：《中國革命最近的嚴重局勢之由來》（1927年8月17日莫斯科），《鄧演達歷史資料》，第158頁。

③ 《就中國農民問題與孫逸仙和廖仲愷的談話》（1924年8月10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1），第515頁。

④ 鄧演達：《南京統治的前途及我們今後的任務》（1930年11月10日），《鄧演達歷史資料》，第243頁。

黨失敗，因為這個失敗是永遠的失敗，我們要做我們的。’（顧孟余六月中旬給汪精衛的警告電報中的話。）這樣，土地委員會的生命就上了十字架，武漢中央就心驚膽落蹲伏在封建地主的槍頭底下了!!!”^①

鄧演達雖然思想很激進，但在政治上並不成熟。他批評汪精衛屈服于唐生智、何鍵等軍人，自己卻沒有充分意識到軍隊的重要性。郭沫若後來說：鄧演達“雖然是軍人出身，但他卻不高興自己帶兵，在後期武漢政府時代，他是有可以帶兵的機會的，我們勸過他自己領率一軍以作為革命的保障，他不肯聽從。他說：‘我才將老虎皮脫掉，又要披上嗎？’為著這件事情，我始終替他可惜。”^②

（二）初期紅軍多出自張發奎第二方面軍

斯大林在這一時期給中共的指示中，反復強調建立軍隊的重要性。1927年5月共產國際執委會八次全會關於中國革命的決議提出：“武裝革命的工農，編成絕對可靠的隊伍，在軍隊內確立共產黨及堅確不拔的國民黨左派之影響，肅清軍隊中反革命分子，組織工團軍，尤須特別注意。”^③

中共在1927年4月就發動黨團員參軍，以期擴大在軍隊中的實力。黨組織在武漢號召五百名黨員參軍，但因為很多工人黨員有家庭負擔，計畫沒有完成，倒是共青團的年輕人顧慮較少，超額完成了指標，參軍達一千人。^④中共五大《職工運動議決案》繼續號召工人去拿槍：“現在的軍隊，多半是遊民無產階級的分，很難使他革命化，所以我們要使軍隊革命化，和建立真正的革命軍隊，必須有多數的工人去當兵。因此到軍隊中去、拿槍去的口號，應該很廣大的在工人群眾中去宣傳，打破一般不願意

① 鄧演達：《中國革命最近的嚴重局勢之由來》（1927年8月17日莫斯科），《鄧演達歷史資料》，第158-159頁。

② 郭沫若：《紀念鄧擇生先生》（1946年11月20日），《鄧演達歷史資料》，第324頁。

③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八次全體會議關於中國問題決議案》（1927年5月），《中共中央文件選集》（3），第608頁。

④ 巴庫林：《中國大革命武漢時期見聞錄》，第143頁。

當兵的觀念!”^①

張發奎與汪精衛關係密切，他的第二方面軍與中共關係最好，成為中共初期軍隊的重要來源。這支軍隊是由號稱“鐵軍”的第四軍發展而來的，出自廣東，革命精神比較強。張發奎本人雖然後來堅決反共，但在北伐期間他很“欽佩共產黨員的熱忱與戰鬥精神”，“從不懷疑共產黨員是勇敢善戰的”，“不辭勞苦”，他主動“把共產黨員安插到不同的崗位，因為他們都很能幹”，認為“共產黨員用不同的方法幫助了我，因為他們工作勤奮。共產黨的政工人員無疑是認真負責、表現良好的。”^②

1927年4月，蔣介石成立南京政府，與武漢國民政府決裂，“一些偏右的高級軍官卻離開武漢，跑到南京蔣介石那邊去了。第十一軍軍長陳銘樞、第十師師長蔣光鼐、第二十四師師長戴戟，還有一些團長都離隊而去”。“在這種情況下，武漢政府就對鐵軍的高中級軍官，進行了一次調整”。這時中共與國民黨左派聯合反蔣，相互信任，汪精衛和張發奎提拔了不少共產黨員將領，“不少共產黨員和左派掌握了指揮權”，葉挺升任24師師長、許繼慎任72團團長、蔣先雲任新編77團團長。^③原第四軍葉挺獨立團為中共培養了很多軍事幹部，改編為25師73團，團長周士第。75團也由葉挺負責籌建，派入孫一中、練國梁、袁也烈、蔡晴川等擔任營級幹部。^④這時張發奎任用共產黨員相當積極，“河南進軍結束時，張發奎的部隊裡有8名團長是共產黨員，也就是說有30%的共產黨員，營長也大致占這個比例”，“有些團裡共產黨員軍官的數量相當可觀。”不過，即使是共產黨勢力最大的第25師75團，士兵中黨員的比例也只有10-12%。^⑤

6月，張發奎部在河南打敗奉軍後回師武漢，擴編成第二方面軍，下轄

① 中共五大《職工運動議決案》(1927年5月)，《中共中央文件選集》(3)，第83頁。

② 夏蓮瑛訪談記錄、胡志偉翻譯校注：《張發奎口述自傳》，當代中國出版社2012年，第79-95頁。

③ 蕭克：《朱毛紅軍側記》，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60頁。

④ 《周士第回憶錄》，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9-100頁。

⑤ 《工農紅軍參謀部第四局關於南昌起義會議速記記錄》(1927年9月14日於莫斯科)，《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7)，第38、41頁。

第四軍、十一軍和二十軍，需要大規模招兵以彌補河南戰役的重大傷亡。在周恩來等人的組織下，湖南、湖北很多工農運動骨幹踴躍參軍，使得共產黨在這支部隊的影響進一步加強。在夏天全國反共高潮中，第二方面軍仍然對中共很友好，收留了各地逃亡出來的很多共產黨員和工農幹部，共產黨在這支部隊中勢力很大，這樣才有了武裝暴動、創建紅軍的機會。

蕭克說：“南昌、秋收、廣州三大起義，是人民軍隊創建的起點，這三大起義軍事力量的主要部分都來自鐵軍”。南昌起義幾乎拉走了二方面軍一半的部隊，包括二十軍全部、第十一軍24師和10師、第四軍25師等；廣州起義主力是第二方面軍第四軍教導團；秋收起義主力是第二方面軍總指揮部警衛團，出自該團的蕭克說：“這個團是1927年6月下旬在武漢建立的，是我黨根據葉挺的建議，幫助張發奎組建的。黨派許多黨團員骨幹，擔任警衛團的各級幹部，使這支部隊像獨立團一樣，成為我黨直接掌握的部隊。在委派團長時，葉挺請資格比較老的張雲逸去同張發奎談，任命共產黨員盧德銘當團長，“張發奎同意了。盧德銘赴任前，中央軍委負責派遣工作的聶榮臻親自向他作了交代，要他‘掌握好這支部隊，不斷擴大黨團員數量，提高全體官兵的革命覺悟’。那時，團長有委派連排長之權，由共產黨員任團長，這個團基本上就被我黨掌握了。”^①

甚至在南昌起義之後，中共還把張發奎、黃琪翔列入領導名單，而他們也沒有放棄和中共合作的可能，對第四軍教導團中的共產黨員仍比較寬容，不然就沒有發動廣州起義的機會。12月10日，汪精衛給陳公博的電報提到：“黃琪翔同志掩護共黨，例如著名共黨廖尚果竟為第四軍政治部主任，《燈塔》第三、四期容共有據”。^②第二天，第四軍教導團就發動了廣州起義。蕭克說：“張發奎到廣州後，還派人去潮汕同南昌起義軍聯繫，走到惠州，得悉起義軍已失敗便作罷了。如果我們打勝了，他還有可能與我們聯合打李濟深，至少分化要遲一點。南昌起義時，我黨還想爭取張發

^① 蕭克：《朱毛紅軍側記》，第171頁。

^② 《汪兆銘致陳公博等蒸電》（1927年12月10日），《廣州起義資料》下，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82頁。

奎，繼續承認他為第二方面軍總指揮，他是七個主席團成員之一，還任命黃琪翔為前敵總指揮，他們未到職前，分別由賀龍和葉挺代理。當時我們的政策，是爭取更多的同盟者留在革命陣營裡”。^①

在中共政治局會議上，陳獨秀曾兩次提出退出國民黨，但負責軍事工作的周恩來表示反對，認為“退出國民黨後工農運動是方便得多，可是軍事運動大受損失了。”^②的確，假如中共過早退出國民黨，汪精衛、張發奎勢必要求葉挺、盧德銘等中共黨員退出軍隊，這樣中共就失去了發動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廣州起義的機會，創建紅軍將會更加艱難。

共產國際一直批評中共領導人熱衷於和將領搞外交，不重視士兵工作，比如羅易在給斯大林的報告中說：“黨的所有領導人無一例外地把很多時間花在先串通這個將領反對另一個將領上，然後又串通另一個將領反對這個將領上，而不是群眾工作上。”^③這種說法有一定道理，但也有把俄國經驗簡單套用在中國的傾向。俄國1917年二月革命後，臨時政府頒佈法令，在軍隊廢除死刑，新成立的士兵委員會有權否決軍官的命令，這導致軍隊領導體系瓦解。軍官喪失了領導力，有時士兵委員會竟要求軍官交出武器。因此，布爾什維克可以自由深入士兵群眾進行宣傳，絕大多數士兵都是工農出身，他們大批加入了革命陣營。

但中國的情況完全不同，舊軍隊的領導體系並未瓦解，而且軍隊不是統一的國家軍隊，而是效忠私人的軍隊，軍官對軍隊有很深的個人影響。由於軍隊是軍官的命根子，軍官對士兵控制很嚴，共產黨員不可能自由宣傳。從中共建立軍隊的過程看，無論是1927-1928年葉劍英、賀龍、彭德懷等出身舊軍隊的軍官加入革命陣營，還是後來爭取趙博生、董振堂、季振同發動寧都起義，爭取俞作柏、李明瑞發動百色起義，爭取軍官都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周恩來的分析很精闢：“中國僱傭式軍隊的特點，軍官在

① 蕭克：《朱毛紅軍側記》，第165頁。

② 《鮑羅廷在中國的有關資料》，第212頁。

③ 羅易：《致政治書記處和斯大林同志報告》（1927年5月28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4），第290頁。

軍隊中是有很大作用的。‘六大’認為在官長中進行工作就是軍事投機。後來事實證明，敵軍大部隊的嘩變和投降紅軍，都是由於我們在軍官中進行了工作。如廣西李明瑞的一個師變為紅軍，江西第二十六路軍的起義，都是由軍官領導的。”^①相反，在沒有軍官支援的情況下，單靠士兵群眾發動兵變成功的很少，在這裡俄國經驗很難應用到中國。

但國民黨左派很難接受中共建立獨立軍隊，最終雙方必然走向決裂。鮑羅廷和羅易大約6月1日收到共產國際關於創建獨立軍隊的電報，書生氣十足的羅易竟然沒有和任何人商量，就於6月5日把電報拿給汪精衛看，這成了促使他轉向反共的理由。在汪精衛看來，1923年越飛和孫中山商談合作時，說中國共產革命在兩百年之後；^②1924年6月鮑羅廷安撫國民黨右派元老謝持、張繼時，說共產革命在一百年之後；^③1927年3月陳獨秀回答吳稚暉時，共產革命一下子提前到了二十年之後，^④這造成與蔣介石的決裂，但汪精衛還能接受。共產國際6月1日電報要求中共立刻創建獨立軍隊，顯然意味著共產革命已經開始發動。汪精衛認為共產國際和中共這樣步步緊逼，合作已經無法繼續，雙方走向最後決裂。7月13日，中共宣佈退出國民政府。7月15日，汪精衛在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宣佈分共。

二、八七會議決定武裝反抗——吸收“暴徒分子”入黨

在7月12日鮑羅廷主持的臨時政治局會議上，被排除在會議之外的

① 周恩來：《關於黨的“六大”的研究》（1944年3月3、4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11），第244頁。

② 《吳敬恒致中央監察委員會請查辦共產黨函》（1927年4月2日），蔣永敬編：《北伐時期的政治史料——一九二七年的中國》，第362-363頁。

③ 《謝持、張繼與鮑羅廷問答紀要》（1924年6月25日），《鮑羅廷在中國的有關資料》，第15頁。

④ 《彈劾共產黨》（1927年4月），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黨史教研室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四冊，第313頁。

陳獨秀已經離開領導崗位，成立了由張國燾、周恩來、李維漢、李立三、張太雷組成的臨時政治局常委會。共產國際讓陳獨秀去莫斯科，但他拒絕服從。這次中央改組是由鮑羅廷一手操辦的，據蔡和森說：“老鮑提議獨秀、平山去莫斯科與國際討論中國革命問題，秋白、和森赴符拉迪沃斯托克辦黨校，新指定國燾、太雷，維漢、立三、恩來五人組織政治局兼常委。自此獨秀即不視事。”^①但鮑羅廷此時威信已經不高，他的計畫沒有落實，陳獨秀、譚平山沒去莫斯科，瞿秋白也沒去符拉迪沃斯托克。

新任共產國際代表羅明納茲7月下旬到達武漢，他是與鮑羅廷、羅易、維經斯基完全不同的人，是一個真正的鐵血革命家，這說明斯大林認為中國革命進入武裝暴動新階段後，需要不同以往的指導者。羅明納茲15歲參加革命，“很早就進入了斯大林的核心集團，在後者的支持下，24歲時就成為格魯吉亞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書記”。他是一個“性格強硬的人物”，“以其對死亡的輕蔑而令每個認識他的人感到震驚，不管是他自己的死還是別人的死，他都毫不在乎，”^②這樣的人顯然不會在殘酷鬥爭中猶豫不決，鐵血時代開始了。

（一）八七會議決策武裝暴動

八七會議由羅明納茲主持召開，會議的緣起是“國際方面又電令來召集全黨緊急的正式會議，以審查舊政策及指導機關，而決定新的政策。”^③“電令”兩個字清楚地表明瞭共產國際與中共的組織關係，8月4日中央致廣東省委的信中提到：“新國際代表已來，決定開緊急會議。此會議批評過去中央的機會主義及決定新的政策，廣東太遠而工作緊張，無法參加此會”。“過去中央對湘事，及對國民黨政策之動搖，因而致於失敗，並且一定

① 蔡和森：《黨的機曾主義史》（1927年9月），《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5），第546-547頁。

② 亞歷山大·潘佐夫：《毛澤東傳》（上），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261頁。

③ 《“八七”中央緊急會議·小引》（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3），第247頁。

亦感覺到新的指導與方針之必要。”^①

8月7日，中央緊急會議在武漢召開，只有三項日程：1. 共產國際代表羅明納茲報告；2. 中央代表瞿秋白報告；3. 改選臨時中央政治局。中共五大選出的中央委員有31人、候補中央委員14人、中央監察委員7人、候補中央監察委員3人，共計55人，但實際出席八七會議的只有15人，出席比例只有27%，加上共青團中央、中央軍委、湖南省委、湖北省委代表以及中央秘書也只有22人，所以只能稱為緊急會議，改選出來的政治局也只能稱為臨時政治局。這是白色恐怖下迫不得已的特殊形式，共產國際的認可是其合法性的來源。

羅明納茲解釋了緊急會議和臨時政治局的合法性：“國際中央決議認為，此次緊急會議不僅是論過去錯誤，還應實行改組指導機關，現在的問題，是否此會有改組指導機關（中央）的權力。因為中央與各地的隔離，今天的會僅有兩個地方的代表參加。但因現處於秘密環境中，故可以叫此會為‘緊急討論會’。此會雖無權改組中央，但有權可以選舉臨時中央政治局。”^②

在報告一開始，羅明納茲就明確提出，錯誤不在上層的共產國際和下層的工農群眾，而在中間層的中共領導機關。“過去的錯誤是在指導機關，國際對於群眾方面的英勇的行為仍是非常滿意的。黨的指導與國際的指導及群眾要求差得如此之遠，是非常奇怪的。”^③改組中共中央，就是要陳獨秀等承擔失敗責任。羅明納茲說：“至於過去錯誤的責任問題，中央的領袖獨秀同志有許多問題雖決議後，他仍要以個人的意思來改變此決議。但此責任應政治局大家來負。”^④

會上羅亦農對共產國際用人不當提出直率批評：“大家都說國際是無

①《中共中央致廣東省委信》（1927年8月4日），總政治部辦公廳編：《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歷史資料選編》第一冊，解放軍出版社2002年版，第3頁。

②《“八七”中央緊急會議》（1927年8月7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黨史教研室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十四冊，第2頁。

③《“八七”中央緊急會議》（1927年8月7日），《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十四冊，第2頁。

④《“八七”中央緊急會議》（1927年8月7日），《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十四冊，第4頁。

錯誤的，我要公開的批評國際：國際的政治指導不成問題，是對的，但在技術工作問題非常之壞。既認中國革命非常重要，但同時又派魏金斯基，羅易來指導，他們都是無俄國革命經驗的。魏金斯基在1917年以後才加入黨，我們在上海要暴動時他要反對，並且不幫助。至於羅易誰也知道是國際犯了左派理論幼稚病的人，這種人如何能指導中國的革命。國際的決議是好的，但派來的人不好使人不滿意。這是國際要負責任的。”^①

不少與會者提出，中共需要根本轉型，不能再作紳士、書生的黨。毛澤東關於農民運動和武裝鬥爭的發言給人深刻印象：“農民要革命，接近農民的黨也要革命，但上層的黨部則不同了”。“我曾將我的意見在湖南作了一個報告，同時向中央也作了一個報告，但此報告在湖南生了影響，對中央則毫無影響”。“這個意見是農民指揮著我成立的。我素以為領袖同志的意見是對的，所以結果我未十分堅持我的意見”。“總之，過去群眾對於黨的領導的影響太少”。“秋收暴動非軍事不可，此次會議應重視此問題，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堅強起來注意此問題。湖南這次失敗。可說完全由於書生主觀的錯誤，以後要非常注意軍事。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②

湖南代表彭公達的發言更加激烈：“過去中央完全是一個和平的、不革命的黨，不是一個爭鬥的黨。鄉村農民已經起來奪取政權了，黨反而阻擋，黨對農民運動完全與顧孟余一樣的見解”。“五次大會以土地革命為中心的決議政治局完全拋棄了”，“過去黨的指導不好，有紳士氣概。過去曾有群眾忿怒欲殺上層同志的事實，如湖南都許多同志要殺夏曦，把夏曦也當做一個劣紳看待。黨對這些現象不能解決，只能當書生坐在屋中決定政策。”^③瞿秋白在報告中也說“革命的指導機關犯了紳士的毛病”。^④

①《“八七”中央緊急會議》（1927年8月7日），《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十四冊，第6-7頁。

②《“八七”中央緊急會議》（1927年8月7日），《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十四冊，第5頁。

③《“八七”中央緊急會議》（1927年8月7日），《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十四冊，第6頁。

④《“八七”中央緊急會議》（1927年8月7日），《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十四冊，第8頁。

八七會議提出了湖南、湖北、廣東、江西四省暴動的計畫，選舉了臨時中央政治局正式委員9人(瞿秋白、李維漢、蘇兆征、向忠發、羅亦農、顧順章、王荷波、澎湃、任弼時)，候補委員7人(周恩來、鄧中夏、毛澤東、彭公達、李立三、張太雷、張國燾)，瞿秋白、李維漢、蘇兆征為常委。^①在選舉過程中，不少人表示不願在中央工作，要求下到地方去組織暴動，其中毛澤東態度最為堅決。候選名單公佈後，蔡和森要求不要選自己進政治局，表示自己“已決定去湖南”，要求選毛澤東為政治局正式委員。毛澤東則明確反對說：“我現在擔任土匪工作，不能加入”。李維漢也主張政治局加入毛澤東，自己退出。毛澤東仍不同意，再次堅決表示“自己非外面去作工不可”。顧順章也說“自己適宜作下層工作，不要掛一虛名”。陸沉也主張毛澤東進政治局，不要選自己。^②八七會議上，毛澤東等人確實表現出結束空談、深入群眾去組織暴動的勇敢實幹精神。

中共黨內對八七會議新方針的不同態度反映出這是一個大分化的時代，有人對徹底轉變猶豫害怕，有人卻興奮迎接新的鐵血時代。蔡和森說：“國際訓令初到時，黨的上層之間發生一種悲觀的空氣，以為國際訓令這樣一來，一切舊指導機關和指導人的信任打得粉碎”，“一定要各不相下，四分五裂。因為有這些顧慮，以致對於接受新方針非常猶豫，非常害怕。”但另一些人，則認為八七會議新方針挽救了黨，北方有好些黨員說：“假若新方針遲來一月，我們都散了”。蔡和森認為：“這不僅北方為然，全國莫不如此，尤其在兩湖、上海及廣東。我們仗著新方針，不僅挽回了工農群眾的恐慌和悲觀，而且興奮了廣大範圍內幾百幾千萬的群眾”。^③方志敏在江西鄱陽遇到省委特派員，聽到八七會議消息，頓覺“滿心歡喜”，立即著手收集槍支，組織秋收暴動，準備進攻弋陽縣城。^④

① 王建英編：《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彙編》，紅旗出版社1983年，第71頁。

② 《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十四冊，第12頁。

③ 蔡和森：《黨的機會主義史》1927年9月，《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5)，第551頁。

④ 方志敏：《方志敏全集》，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7頁。

(二)籌畫武裝暴動,吸收“暴徒分子”入黨

八七會議後發佈的《告全黨黨員書》對原中央提出嚴厲批評：“黨的指導機關裡極大多數是智識份子及小資產階級的代表”，“湖南農民開始積極的鬥爭，甚至於已經實行分地的時候！我黨指導機關口頭上承認某幾種錯誤，然而始終繼續阻滯土地革命的方針到底。我們黨實際上是跟著國民黨的小資產階級領袖，盡力的在那裡反對農民運動中的‘過火’”。中央在農民暴動的關頭，表現這樣沒有爭鬥的決心，簡直是等於出賣革命，這是無論如何不能辯護的，的確是我們黨歷史的一個汙點。”^①

《告全黨黨員書》透露出中共的新方向，重點在武裝鬥爭。“軍事問題很重要，然而第五次大會沒有特別去討論”，“這實是我黨第一等重要的責任”。^②8月21日《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任務與策略的議決案》再次強調最重要的任務是建立軍隊：“這種革命戰爭，必須要創造新的革命軍隊。革命的經驗，已經證明僱傭軍隊決不是革命的靠得住的工具”，“因此創造新的革命軍隊，不要有僱傭的性質”，“建立工農的革命軍。這種軍隊之中要有極廣泛的政治工作及黨代表制度，強固的本黨兵士支部，要有靠得住的忠實於革命的軍官，——這是現時革命運動中最重要的任務之一。”^③

中共的緊迫任務是重整全國組織，特別是從公開政黨向秘密政黨轉型。在大革命時期，中共在南方是公開參與政權的政黨，南京政府和武漢政府先後反共後，中共黨員和群眾骨幹遭到追捕、殺害。在白色恐怖中，中共組織受到嚴重破壞，很多黨員逃亡，和組織失去聯繫，全國組織面臨潰散的危險。中共必須以秘密方式重建組織，八七會議《黨的組織問題議決案》提出：“中央臨時政治局，應當建立全國的秘密交通機關”，“務使本

^①《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告全黨黨員書》(1927年8月11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3)，第265、267、270頁。

^②《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告全黨黨員書》(1927年8月11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3)，第285、287頁。

^③《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任務與策略的議決案》(1927年8月21日)，總政治部辦公廳編：《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歷史資料選編》第一冊，第11頁。

黨有一全國的交通網”。“現時主要之組織問題上的任務，就是造成堅固的能奮鬥的秘密機關，自上至下一切黨部都應如此。各級黨部委員會，省委，市委，縣委，區委都應當在最近期間改造”，“每一黨部都應嚴格的與其上級及下級黨部建立極密切的極秘密的聯繫。極嚴格的秘密規律，是秘密狀態中黨的工作之基本條件”。“嚴守黨的紀律尤其為秘密黨之必要條件。黨部機關之一切決議及決定，調遣等等，應當絕對的服從，一切黨員，不論其地位如何都應如此。凡破壞紀律者，都應從嚴懲辦”。^①

中央向關鍵地區派出重要幹部，力圖重整地方組織，實行暴動計畫。毛澤東受命出任湘南特委書記，準備發動秋收暴動。當時蔡和森和毛澤東政見一致，也想回湖南領導暴動，甚至被懷疑要成立小組織，蔡和森辯解道：“和森與毛澤東同志之關係，絕對不是甚麼企圖組織左派，只因澤東一向反對中央農民政策，1926年冬季以來，完全代表湖南土地革命的傾向，為一切敵人之所痛恨，而為一切農民之所歡迎，所以馬日事變後，和森主張他回湘工作，‘八七’會議時又主張他在中央”。“和森請求回湘工作，絕不是企圖與毛澤東等組織什麼左派，只因兩湖暴動和森是提議之一人，又彼時湖南工作實須要加人。”^②但蔡和森身體很差，又主要長於理論，中央決定派更熟悉農民運動的毛澤東去湖南。

中央在8月9日致湖南省委信中指示：湘南特委“以毛澤東，任卓宣，郭亮及當地工農同志若干人組織之，澤東為書記”。“湘南工農會中在馬變以來，舊的領袖最大部分被壓迫去了或被槍斃，此刻只有趕緊的堅決的提取在這幾月鬥爭中表現的積極的‘暴徒分子’到各工會領導機關做領袖，同時我們黨便也要堅決的趕緊的大批吸收這些‘暴徒分子’入黨，以建立黨與工農群眾的關係，就是會匪之富於革命性的也要多多介紹加入。必如此黨在國際指導之下新的路線方能實現，秋收暴動才能勝利”。^③當時

①八七會議《黨的組織問題議決案》(1927年8月)，《中共中央文件選集》(3)，第302-304頁。

② 蔡和森：《黨的機會主義史》1927年9月，《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5)，第550頁。

③ 《中央致湖南省委信》(1927年8月9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3)，第308-309頁。

湖南黨組織思想激進，認為革命已經從民主革命躍進到社會革命階段，何資深在六大上說：“參加八七會議的毛潤之同志，他對中央和湖南同志說現在是社會革命。”^①

湖南、江西黨組織在新時期提出了新組織原則，對於不敢參加暴力鬥爭的黨員一律清除，大量發展勇猛的工農入黨。《湖南九、十兩月組織工作計畫》稱：“事變發生以來，同志之革命與否，忠實與否，勇敢或畏縮”，“皆如量表現，暴露無餘。同志中投機的，逃避鬥爭的，怠工的，對黨不忠實的，革命觀念根本動搖的，無論其在黨中的地位歷史如何，一概毫不姑息的嚴格的洗刷出去”。“很可驚的數量的積極前進的新的革命戰士，較之太平時候高談革命高談主義的好的多了，都是我們很好的革命分子”，“即日開始儘量吸收這些革命分子入黨。尤其是工農分子，應毫不猶移的來著不拒”。^②1927年底，黨組織已經在實踐中認識到，只有在暴動中才能大批吸引農民入黨，江西省委12月25日給贛南特委的信中說：“黨的組織，必須在各種鬥爭中去發展”，“只有鬥爭才能吸收大批的革命工農分子，洗刷一些怯懦投機分子，以樹立黨的真實基礎”。^③

（三）長江局的成立及其對各地組織的整頓

中共中央遷往上海之後，長江局成立於武漢，在七省範圍內代行中央職權，力圖在群眾基礎最雄厚的地區發起暴動。10月1日《中央對於長江局的任務決議案》規定：“長江局所轄範圍為湖北、湖南、河南、江西、四川、安徽、陝西七省”，“長江局不是中央在上列七省的通訊機關而是代行中央職權”，“江局的第一個最大任務便是堅決的發展土地革命”，“須普遍的發展遊擊戰爭與沒收地主的土地及殺戮土豪劣紳等工作。依兩湖農民暴動

① 《湖南代表何資深的發言》（1928年6月24日），《黨的文獻》1988年第4期，第31頁。

② 《湖南九、十兩月組織工作計畫》（1927年9月5日），《湖南革命歷史文件彙集》（5），第121-122頁。

③ 《江西省委致贛南特委的信》（1927年12月25日），《江西黨史資料》（4），江西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1987年，第83頁。

的形勢，某幾縣的農民可握得某幾縣的政權，以發展各地的農民暴動”。“因現有各級黨部多不能領導各地的革命運動，長江局負責同志須不斷的巡行各地”。^①

長江局書記為羅亦農，主要幹部為王一飛、任旭、陳喬年等，他們本想在兩湖地區大幹一場，但剛成立就遇上湖南秋收起義失敗，於是所謂單純軍事冒險的“毛澤東主義”成了10月2日長江局第一次會議的批評對象。代表中央辦理移交的李維漢說：“湘省現完全屈伏於毛澤東主義之下，須加以糾正”。^②10月29日第十次會議上，羅亦農又批評湖南的“毛澤東主義，槍桿上出政權”，“其實毛澤東之主義並不成其為主義，他常互相矛盾，他雖主張軍隊，但不懂軍隊”。“湖南暴動不是群眾運動，而是軍事冒險”。“他們下鄉並不召集群眾大會，不殺土劣等，派澤東到湘南卻作了師長”。“農民是可以起來的”，“醴陵暴動一起，殺土劣，農民有六百人要求入黨”。結果受到批評的湖南省委被長江局改組，由王一飛擔任書記兼軍事部、組織部。^③

江西省黨組織在南昌起義後的白色恐怖中一度陷入困境，省委書記汪澤楷束手無策，他10月15日到長江局彙報時說：“南昌過去有四百多同志，‘七三一’事變（即南昌起義）以後，差不多有百人隨軍隊去了，一部分自由回家去了，現在除省委外只剩下十餘人；牛行車站過去有八十余同志，現在只有八人；農村原有四十餘人，最近曾找到二人，已正式恢復關係，但又被土劣報告而跑了，所以南昌市的組織好像無形解散了”。^④吳振鵬報告中也提到，“賀葉軍隊一走，黨的組織完全瓦解，省委與各級關係斷

①《中央對於長江局的任務決議案》（1927年10月1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3），第376-377頁。

②《中共長江局第一次會議記錄》（1927年10月2日），《中共中央長江局文件彙集》（一九二七年、一九三〇年），中央檔案館1985年，第7頁。

③《中共長江局第十次會議記錄》（1927年10月29日），《中共中央長江局文件彙集》（一九二七年、一九三〇年），第63、64頁。

④《中共長江局第四次會議記錄》（1927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長江局文件彙集》（一九二七年、一九三〇年），第16頁。

絕，工作停頓，此時只是從事建立秘密機關”。^①

一位江西省委幹部的描述更為生動，當時“常委會及各部工作人員雖有，然一點工作都沒做，甚至在四、五個禮拜中，一次會議都沒開。幹什麼呢？天天躲在房子裡面，抄麻將”，“江西省委的工作，即是每天八圈或二十圈，陪愛人，找愛人”，“江西省委的精神，消極、悲觀、幻想”。9月20日以後，江西省委接到八七會議文件，也只是在房子裡“大寫準備秋收暴動的通告，在地圖上把全省劃做六個秋收暴動區”。^②

長江局對江西省委非常不滿，羅亦農在給中央信中說：“江西的黨，簡直不成話，決根本改造”。^③10月16日，長江局第六次會議決定改組江西省委，新省委書記為陳潭秋，組織委員李鐵良，宣傳委員宛希儼，其他委員還包括袁孟冰、劉士奇、吳季冰、林修傑、馮任等。^④江西省委改組以後，對各地暴動的領導才得到加強，“對於組織工作，亦有相當的注意，改造了特委縣委的指導機關，提拔了一些工農幹部，恢復了三十餘縣的組織，實行了全省清黨運動，增加了大批的農民同志”。^⑤

江西新省委積極策劃暴動，萬安是中共影響較大的地區，省委12月卻對萬安黨組織提出了嚴厲批評，認為“黨的工作非常幼稚，在群眾中沒有一點基礎，一般同志的心目中，都只認識少數活動的個人（所謂老師）而不認識黨。一切黨員的活動，都在幾個老師的指揮之下，而不是黨的領導。故雖有縣委的組織，只不過是空有其名”。“萬安縣委目前唯一重要的工作，可說便是造黨。縣委以下各級黨部應立即改組，實行清理組織，整頓

①《吳振鵬：江西黨組織的發展與現狀》（1928年1月7日），《江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八年）》，中央檔案館、江西省檔案館1986年，第159頁。

②《紅刃：三個時代的江西省委》（1929年3月3日），《江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一九二九年（一））》，第61-63頁。

③《羅亦農給中央的信》（1927年10月17日），《中共長江局第四次會議記錄》（1927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長江局文件彙集》（一九二七年、一九三〇年），第30頁。

④《中共長江局第六次會議記錄》（1927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長江局文件彙集》（一九二七年、一九三〇年），第28頁。

⑤《紅刃：三個時代的江西省委》（1929年3月3日），《江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一九二九年（一））》，第63頁。

組織，建×黨的紀律，剷除一切投機畏怯不進步的分子”。^①

萬安農民運動逐漸高漲起來，“全縣農民均在農民協會組織之下，農協在農民中有極大的威權，已成為鄉村中事實上的政府”。從11月到12月，大批農民三次進攻萬安縣城，有一次“相持半日之久，群眾死傷四十餘人，卒不能勝，但群眾絕無退去。此次群眾攻城，完全是自動的無組織無計畫的行動，萬安共產黨縣委與農協事先不知，至是始前來指揮，見群眾犧牲太大，城內反動武裝力量甚厚，命令群眾退卻，群眾仍不肯退。責稱須共產黨一星期內決定攻城計畫並實行攻城”。^②1928年1月9日，萬安農軍第四次攻城獲勝，佔領了縣城，成立了江西第一個縣蘇維埃。在暴動過程中，萬安黨組織有大的發展，1928年1月江西全省有黨員約4000人，其中萬安2300人，占一多半。^③雖然暴動很快在敵軍反攻下失敗，數百名黨員被殺，但暴動播下了革命種子，到1929-1930年形勢好轉時，這裡又成了發展紅軍和蘇區的根據地。

三、南昌起義——中共第一次武裝暴動中的組織混亂

八一南昌起義是中共第一次大規模軍事暴動，標誌著中共武裝鬥爭時代的開始。一直以來，國民黨依靠軍隊的力量，發動廣州中山艦事件、上海四一二事變、廣州四一五事變、長沙馬日事變。中共沒有軍隊，不得不妥協退讓，始終被動挨打，這次終於邁出了勇敢反擊的第一步。

但是起義過程中，中共組織不成熟的弱點也充分暴露出來。起義領導層非常混亂，譚平山原來是妥協傾向比較強的，7月12日會議之後就不再是中央核心領導成員，這時他卻忽然變成了暴動的急先鋒，依靠個人影

①《中共江西省委致贛西南特委信》(1927年12月4日)，《江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八年)》，第110、113頁。

②《江西工農革命的記錄》(1928年1月到3月)，《江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八年)》，第198-199、202頁。

③《中共江西省委王××同志關於江西組織的談話》(1928年2月18日)，《江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八年)》，第187頁。

響成為起義的主要領導。李立三說：“八一革命表面上看起來，似乎完全在黨的指導之下，實際上不過是許多C.P.分子的個人指導，最後幾乎變成平山同志的個人指導。”^①

起義領導人之間意見分歧嚴重，特別是張國燾態度動搖，反對與張發奎決裂，以中央代表身份固執己見。蔡和森說：“南昌暴動之失敗不是偶然的，主要是因為前敵主要負責人之主觀沒有根本改變，平山同志不必論，國燾同志自從主持五人政治局及常委以來，開始表現他政治上弱點，尤其懷疑土地革命，不甚相信群眾勢力，而對於張發奎發生幻想。”^②李立三也說：“三十日早特立同志到南昌，當開前委會，特立（即張國燾）報告中央意見宜慎重，國際電報如有成功把握，可舉行暴動，否則不可動，將在軍隊中的同志退出，派到各地農民中去。所以目前形勢，應極力拉攏張發奎，得到張之同意，否則不可動”。周恩來、惲代英、李立三、澎湃、譚平山“都一致反對此項意見，謂暴動斷不能遷移，更不可停止，張已受汪之包圍，決不會同意我們的計畫。在客觀應當是我黨站在領導的地位，再不能依賴張。爭論數小時，因特立系代表中央意見，不能以多數決定，故未解決。到三十一日晨，再開會議，又辯論數小時之多，特立最後表示服從多數，始決定於是晚二時舉行暴動。”^③

譚平山的突出地位是在和張國燾的鬥爭中建立起來的。張太雷說：“南昌開會的時候，平山同志主張幹”。“中央已決定對張發奎的態度，如張不與汪精衛聯絡則到東江之後始解決之，否則在潯便解決他。故贊成南昌的決定，並派恩來去主持”。“不料國燾假傳聖旨，說國際不主張幹，他亦極力反對幹，此時反而平山主張成為擁護新政策的一個人，國燾這不僅損失個人的信仰，而且是損失中央的威信，因為他是中央派去的。故此國

① 《李立三報告——八一革命之經過與教訓》（1927年10月），《中共中央文件選集》（3），第419頁。

② 蔡和森：《黨的機會主義史》（1927年9月），《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5），第551頁。

③ 《李立三報告——八一革命之經過與教訓》（1927年10月），《中共中央文件選集》（3），第407頁。

燾的行動，實應受處分。因為這樣結果致使這次行動成為平山所領導”。^①在爭論最激烈的時候，領導人之間甚至差點自相殘殺，譚平山想派人殺掉反對起義的張國燾，幸虧被周恩來制止。周恩來說：“張國燾反對南昌起義，譚平山對一位師長說，張國燾若反對起義就把他殺掉。當時我任前委書記，這位師長來徵求我的意見，我說黨內鬥爭不能這樣做。”^②

南昌起義的領導機構最初是前敵委員會，後來是革命委員會，但組織相當混亂，領導人常常各自為政。李立三說：“前委的組織原照中央命令，沒有平山同志，但是當時平山在政治負了很大的責任，中央並未將他撤換，所以前委商量的結果，只好要平山參加前委會議”。“同時負責的幾個人，都是前後左右分途而走，很難集合一塊開會。因此除掉幾個重大根本政策以外，許多重要的問題都由負責同志隨意辦理，甚至違反已定的政策，也不能糾正或制裁。可以說前委本身組織非常之弱，在政治上，幾乎完全失掉了指導。譬如在汕頭再與張發奎聯絡，和濫委陳炯明部為師旅長等事，有幾個參加前委的同志當時全不知道”。^③

劉子毅在報告中也談到失敗的重要原因是“無黨”，“行動中間只有個人的活動，並沒有黨的活動，一切事件及決定僅少數中央委員知道，其餘同志都是被動”。前委“僅在瑞金開始組織支部，汀州召集同志開會，立三同代英作了一次報告，此外並沒有什麼，一切同志的行動都是政府機關的行動，並不是黨的行動”。^④可見，南昌起義雖然是幾個重要中共幹部領導，但下面並沒有各級黨組織，更沒有深入部隊基層的支部，黨無法嚴密掌控部隊，在形勢不利的情況下很容易潰散。

①《張太雷報告——“八一事件”之經過，失敗原因及其出路》（1927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3），第422-423頁。

②周恩來：《關於黨的“六大”的研究》（1944年3月3、4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11），第235頁。

③《李立三報告——八一革命之經過與教訓》（1927年10月），《中共中央文件選集》（3），第419頁。

④《劉子谷同志關於南昌起義部隊於潮汕失敗經過情形的報告》（1927年10月19日），《江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八年）》，第48、49頁。

起義過程中對蔡廷鍇的態度，也暴露出中共領導人雖決心反擊，仍不脫書生氣。蔡廷鍇的第10師是駐南昌的精銳部隊，10師29團團長張一德、30團團長範蓋、28團參謀長徐石林等都是共產黨員，中共在部隊中的影響很大，本來是起義的主力之一。起義領導人輕信蔡廷鍇支持起義的表態，允許他繼續領導部隊，甚至早已受到懷疑的28團團長陳芝馨也沒有撤換。結果10師剛離開南昌就叛變了，蔡廷鍇扣押了部隊中的中共幹部，公開宣佈已經槍決，實際還是留有餘地，把他們偷偷放走，自己則帶軍隊投奔蔣介石。這導致南昌起義後僅幾天，就白白損失了五千人的精銳部隊，也是後來在潮汕失敗的重要因素之一，周恩來在抗日戰爭中談到此事仍後悔不已。^①朱德後來也說，第10師9個營裡有5個營是受中共領導的，由於抓得不緊，結果整個師都送給了蔡廷鍇。^②

當時中共的組織體系已經被打散，各級組織之間往往失去了聯繫，下級得不到上級的指示，上級不知道下級的實際情況。起義軍和中央也失去了聯繫，中央9月23日致廣東省委信中說：“葉賀軍隊不知已達到什麼地方？此時廣東全省應不等待葉賀之到達，即行發展普遍的暴動”。^③而起義軍“前敵的同志，直到了汕頭後，才知道有八七緊急會議的這回事。行軍兩月，簡直成了野人，不單是不知道黨的情形，並且連全國大的政治狀況都不知道。蔣介石下野，我們到汀州看見上海的《申報》才知道”。“經過各地黨部的組織，都異常幼稚，並且充分表現機會主義。在贛東一帶不必說簡直全無黨的組織，就是在粵東一帶所有各地的黨部，不過是一些共產分子的集團，全不是群眾的鬥爭的組織”。^④

當時起義軍中黨的組織很混亂，難以形成對軍隊的有效領導。在上層，軍部與前委往往各行其是；在基層，黨代表只在團一級，士兵得不到政

① 徐石林：《“八一”起義片斷》，《南昌起義資料》，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42-244頁。

② 朱德：《朱德自傳》手抄稿本，轉引自《中共黨史人物傳》精選本(1)，人民日報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第403頁。

③ 《中央致廣東省委函》(1927年9月23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3)，第374頁。

④ 《李立三報告——八一革命之經過與教訓》(1927年10月)，《中共中央文件選集》(3)，第419、420頁。

治指導，不知道起義的目的，大批逃亡，紀律難以維持。軍部“與前委的關係很壞，因為軍部在組織上是獨立的，就是一切政治的指導都須完全經過軍部，同時軍委亦很弱，所以黨的政治的方針很難深入到軍隊中的同志去。這是黨的組織上一個很大的弱點。”^①張國燾說：“從南昌到撫州一路甚為狼狽，大炮喪失殆盡，機關槍亦失掉不少，槍枝二三千枝，子彈更不知其數。行軍毫無精神，從軍官一至兵士不知為什麼到廣東去”。“這些都代表逃亡失敗的現狀。南昌起義是對的，可是在起義中黨的作用實在很少，在軍事上政治上都毫無準備”。“十一軍尚不能說是C.P.軍或工農軍，只能說包括很多C.P.分子之有紀律的國民黨軍，二十軍只說是表同情於我們之舊式軍，革命委員會則甚複雜，黨的組織極鬆懈，黨亦無職權，軍事上政治上均甚幼稚，毫無奪取政權之準備。如此潰敗，實堪痛心”。^②

中央聽取了李立三、張國燾、張太雷等的報告之後，總結南昌起義的經驗教訓，迅速指示加強黨代表制度。10月24日《中央通告第十三號》指出：“在這總的武裝暴動工農革命政策之下，黨的作用高於一切。必須有黨的指導”，“這次委任雜色軍隊，及與張發奎接洽等，都是前敵各個人的任意行動。政治指導集中於黨是非常之重要。再則工農革命軍中，必須有黨代表的制度。”^③這說明中共雖然年輕幼稚，但很善於在挫折中學習。

南昌起義和秋收暴動最大的失策，就是軍隊和農民運動結合不夠，這說明當時武裝鬥爭的思路很模糊，中共也很快認識到這個問題。10月29日《長江局最近政治決議案》稱：“兩湖秋收暴動與廣東的失敗，因為本黨土地革命的策略未能深入群眾，下級黨部未堅決的執行以至未能喚起廣大的（廣東與湖北有幾處不在此例）群眾的行動，在群眾的本身方面除了少數地方，並未受如何的打擊，他們的觀念至多不過是大勢改變，還須等

①《李立三報告——八一革命之經過與教訓》（1927年10月），《中共中央文件選集》（3），第420頁。

②《張國燾報告》（1927年10月9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3），第427、429頁。

③《中央通告第十三號》（1927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3），第404-405頁。

待新的時期”。^①當時湖南農民遭到血腥鎮壓，報仇雪恨之心很強烈，如果南昌起義軍能夠與湖南秋收暴動農民結合起來，結果可能會好得多。

四、十一月會議強化黨的組織

列寧主義革命黨的組織原則是民主集中制，決策前可以民主討論，執行時必須集中權力。當時中共組織上還很幼稚，既不夠民主，也不夠集中，下層的意見難以反映到上層，上層的決策也無法在下層貫徹，實際處於各自為戰、鬆散無力的狀態。周恩來在六大上對此有極尖銳的批評：“五次大會後的中央，他的工作是很混亂的，各部都是獨立起來，常務委員會從沒有開好，中央本身工作也毫無頭緒”。“中央與各省的聯繫，更為混亂。各地區完全由各地區自行處理，中央是沒有指導的。廣東方面，中央從沒有管過，北方彭述之逗留各地，中央也不管，政治指導更說不到了。湖南雖相接甚近，也是調遣混亂，毫無指導的系統。四川、河南也沒有聯繫，就是上海也無經常的指導。總之，中央與各省可以說完全表示斷絕”。^②

1927年下半年，中共面臨關乎生死存亡的危急形勢，首先要強調的是集中，甚至要通過清黨來整肅紀律。蔡和森說得很透徹：“組織問題是現在最重要的問題。我們本是民主集中制。然八年以來，只有從下至上的民主。最近三年以來，黨的組織像暴發戶一樣地發展：1925年以前是不滿500人的知識份子小團體，1925年以後，卻發展至5萬人以上的大群眾。”^③鮑羅廷也說過：“造黨不是一天一日所可做得到的”，“一個黨的造成要經過多少訓練與奮鬥，才能得到好的結果。黨員要好，寧可少，黨員多而壞

①《長江局最近政治決議案》(1927年10月29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3)，第524頁。

②周恩來：在中共六大上的組織報告(1928年6月30日)，《黨的文獻》2008年第3期，第21頁。

③蔡和森：《黨的機會主義史》1927年9月，《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5)，第554頁。

那就不如無黨。我們的黨曾經有一次肅清黨內五分之一的黨員，那時我們有五十萬黨員，開除了十萬人。”^①中共的清黨不全是自己完成的，血腥的白色恐怖把很多不夠堅定的黨員嚇跑了，留下來的、新加入的則是堅定革命者。

中央政治局11月中旬召開擴大會議，努力重整在白色恐怖中被打散的組織。出席會議的主要是在上海的政治局委員十多人和各省代表，還有共產國際代表羅明納茲，會議由瞿秋白主持。議程中除了例行的政治報告外，接下來的組織問題、召集六大問題、政治紀律問題都是關於重整組織的。會議通過《最近組織問題的重要任務議決案》，強調“組織問題更加占了第一等重要的地位，中國共產黨組織之布林塞維克化，以及無產階級和農民群眾的組織之革命化，都是當前最迫切最重要的問題”。“沒有正確的布林塞維克式的組織，中國共產黨決不會成為群眾的力量，決不能盡他在工農革命裡的領袖及領導者的歷史使命。”^②

（一）工農幹部替代知識份子幹部

會議決議認為領導機關工人太少，知識份子太多，帶來了自由散漫、猶豫動搖、不夠勇敢等問題。“中國共產黨組織上的主要缺點：一、有很大的政治意義的——就是本黨領導幹部並非工人，甚至於非貧農而是小資產階級智識分子的代表”。“革命的小資產階級分子，滲入了我們的黨。這種成份形成中國共產黨的最初幹部”。“他們不但沒有能改造（成）澈底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反而將自己在政治上不堅定，不澈底，不堅決的態度，不善於組織的習性，以及其他種種非無產階級的小資產階級革命者所特有的習性，習氣，成見，幻想”，“帶到中國共產黨裡來。”^③

①《鮑顧問與白崇禧之談話》（1926年2月3日），《鮑羅廷在中國有關資料》，第78頁。

②《最近組織問題的重要任務議決案》（1927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3），第468頁。

③《最近組織問題的重要任務議決案》（1927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3），第469-470頁。

工農幹部替換知識份子是當時重整黨組織的主要辦法。“中國共產黨最重要的組織任務是——將工農分子的新幹部替換非無產階級的智識分子之幹部”，“使黨的指導幹部之中無產階級及貧民的成份占最大多數。支部書記，區委，縣委，市委，省委的成份，各級黨部的巡視指導員的成份，尤其是農民中黨的工作員的成份，必須大多數是工人同志或貧農同志。”^①廣東省委書記李立三甚至說：“知識份子的作用完了，今後只有依靠工農幹部”。^②山東有的黨組織甚至對收入較高的工人都要排斥，規定月工資10元以上的不許入黨。^③江西省明確指示，縣委中工農分子應過半數，而“知識份子僅可派做技術工作”。^④

的確，不少知識份子在思想傳播階段很有熱情、很有能力，但是到了暴力革命階段，表現出猶豫動搖，甚至大批脫離革命。比如在1927年2月上海第二次武裝起義中，有人觀察到：“在公開的巷戰中，知識份子都逃跑了。在街頭巷尾，在民眾之中只留下了工人領袖，結果他們大多數遭到了殺害。”^⑤中央通告描述了1927年下半年的情形：“黨不能成為鐵一般的無產階級戰鬥的黨，而只是小資產階級浪漫的集團，一切黨內生活和日常工作都只是自由的浪漫的不規律的，反動勢力的壓迫一來，整個的黨即完全瓦解：逃亡的逃亡，消極的消極，怠工的怠工，反叛的反叛。武漢反動至今，由五萬而降至不及兩萬，不及兩萬的黨員中，積極的分子至多不過五分之一”。^⑥

毛澤東、周恩來等知識份子幹部在嚴峻考驗中正成長為卓越的革命

①《最近組織問題的重要任務議決案》(1927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3)，第471頁。

②周恩來：《關於黨的“六大”的研究》(1944年3月3、4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11)，第242頁。

③周恩來：在中共六大的組織報告(1928年6月30日)，《黨的文獻》2008年第3期，第23頁。

④《中共江西省委致贛南特委信》(1927年12月25日)，《江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八年)》，第144頁。

⑤巴庫林：《中國大革命武漢時期見聞錄》，第110頁。

⑥《中央通告第十七號——關於黨的組織工作》(1927年12月1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3)，第534頁。

家,但是從十一月會議到中共六大,工農幹部替換知識份子的政策始終占支配地位。這不僅引發了工人幹部和知識份子幹部之間的矛盾,而且直接造成中共六大選出的新中央能力嚴重不足,發生了後來“立三路線”的嚴重偏差,然後又用王明等毫無經驗的年輕留蘇學生來補救。1921-1927年,陳獨秀無論有怎樣的缺點,在黨內還是很有威望的領導人,但從1927年到1935年八年時間,中共始終沒有成熟穩定的、有能力、有威望的領導核心,這帶來了嚴重的負面影響。

共產國際在1928年中共六大把向忠發這樣一個碼頭工人提拔為中共總書記,或許還有另一層想法。實際上,蘇共主要領導人列寧、托洛斯基、斯大林、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都是知識份子。共產國際似乎認為,斯大林、布哈林等經驗豐富的領袖替中共完成了研究形勢、制定政策這些需要知識的工作,中共領導人只要堅決執行國際指示就行了,不需要很多知識,碼頭工人更適合這樣的角色,像陳獨秀那樣知識太多,反而是缺點。

(二)強化支部建設,建立秘密工作規則

十一月會議決議中關於支部建設不足的分析是很深刻的,這是中共組織鬆散無力、沒法有效領導群眾運動、沒法把政策貫徹到基層的根本原因。“黨的組織上的第二個弱點,便是許多大工廠、大商店尤其是鄉村和軍隊之中,至今幾沒有黨的支部。鄉村之中,嚴格的說起來簡直沒有黨的組織,各地鄉村中,至多只有特派員或者極少的知識份子的黨部委員會,他們之下並無支部,甚至並無黨員”。“沒有先進的貧民分子所團結而成的黨的組織,本黨便很難指導農民鬥爭”,“農民暴動便成了完全自然爆發的無政府主義的性質”。^①

決議提出加強支部建設,保證支部定期開會,通過支部嚴格管理黨

^①《最近組織問題的重要任務議決案》(1927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3),第472-473頁。

員。“支部工作在黨的組織現狀之下，占極重要的位置，過去因為支部工作不好，以至本黨不能在群眾中起廣大的作用，而黨員之散漫，黨的政策不能深入群眾，甚至不能深入黨內群眾，都由此而生。今後須特別注重支部工作，經過支部起群眾的作用，至於支部的經常組織工作如按期開會等要嚴格的執行，這些都是樹立黨的基本組織的工作。”^①毛澤東在三灣改編時決定把支部建在連隊，與十一月會議的思想一致，這大大加強了黨組織對軍隊的掌控能力。

當時白色恐怖很嚴重，共產黨員到處受到追殺，黨組織按照舊的方式已經無法生存，必須轉型成為有嚴格秘密工作紀律的地下黨。決議提出：“嚴格的整飭紀律和建立黨的秘密組織，實在是党的工作成效之最必須的條件之一”。“秘密機關的地址絕對只准在工作上必須知道的黨員知道。保存秘密文件的數量應當減到最少限度，絕對不容保存黨員的名單和地址單。通信上必須用密碼的方法。各級黨部的常務委員會不得超過五人至七人。五人以上及兩點鐘以上的集會，非極端的必需不得舉行，凡是稍稍破壞黨的秘密組織紀律的，立刻應當停止他的工作，或者簡直開除黨籍。”^②

（三）嚴肅政治紀律，處罰重要幹部

黨組織必須賞罰分明，嚴格執行紀律，才能有效運轉。此前中共大批招收黨員，卻很少處罰不守紀律的黨員幹部，這是危急關頭陷入混亂的重要原因。會議根據羅明納茲的建議通過了《政治紀律決議案》，處罰被認為違紀的高級領導人，雖然處罰未必都公正合理，但這確立了強化組織的新方向。決議提出：“只有最嚴密的政治紀律，才能夠增厚無產階級政黨的鬥爭力量，這是每一個共產黨所必需的最低條件”。^③周恩來說，“這也

① 《最近組織問題的重要任務議決案》（1927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3），第473頁。

② 《最近組織問題的重要任務議決案》（1927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3），第476頁。

③ 《政治紀律決議案》（1927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3），第478頁。

是國際代表提出的。我們當時覺得這一條很新鮮，”^①共產國際當時在幫助中共建立組織原則上發揮了關鍵作用。

譚平山受到的處罰最重，他被開除黨籍。決議認為譚平山“多離開黨而自由行動，最著者如當今年七月武漢國民黨及政府開始排共之際，曾秘密與鄧演達等聯絡主張取消中國 C.P. 而另組織第三黨”。“中央政治局決定其赴莫，亦未遵命前去；及至九江南昌更充分發展其個人行動，在九江因為他和賀龍談話之投機和賀可反張，便在負責同志會議中，鼓動不管中央不管黨而自幹的反黨空氣”，“其後在革命委員會中更多先做而後通知或徑不通知前委的舉動，其于屠殺豪紳和沒收等政策，亦時妨礙其行動，這些表示都是違背本黨組織的行動，應即開除黨籍。”^②譚平山被開除黨籍後，更加積極策劃成立第三黨。

在南昌起義前態度動搖的張國燾也受到很重處罰，被開除出中央委員會。決議認為：“張國燾同志受中央常委委託赴南昌指導暴動，但國燾同志到九江南昌後不執行中央命令，反懷疑暴動主張，甚至反對暴動，南昌事變以後的主張聯絡張發奎，並反對沒收一切土地的政綱，這些違抗中央政策和派其往前敵指導使命之結果，反給前敵同志以更壞更右的影響，前委亦因之更加搖動。國燾同志應開除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資格。”^③

湖南秋收暴動失敗，毛澤東被認為應承擔領導責任，但處罰不重，只是退出政治局，仍保留中央委員資格。決議稱：湖南省委領導農民暴動過程中，只與土匪和雜色軍隊接頭，不發動農民群眾，沒提出土地革命、沒有屠殺土豪劣紳。“湖南省委委員彭公達、毛澤東、易禮容、夏明翰，應撤銷其現在省委委員資格，彭公達同志應開除其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資格，並留黨察看半年。毛澤東同志為‘八七’緊急會議後中央派赴湖南改組省委執

① 周恩來：《關於黨的“六大”的研究》（1944年3月3、4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11），第235頁。

② 《政治紀律決議案》（1927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3），第482-483頁。

③ 《政治紀律決議案》（1927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3），第483頁。

行中央秋暴政策的特派員，事實上為湖南省委的中心，湖南省委所作的錯誤毛同志應負嚴重的責任，應予開除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①

黨內比較寬鬆的氣氛消失了，凡是與國民黨關係不清楚的都要被開除黨籍。二十五號通告“命令同志一律退出國民黨，並絕對實行反國民黨的工作，如有對此猶疑的分子，即斷然開除其黨籍”。“絕對退出國民黨軍隊中的政治工作，如有猶疑不退出的開除黨籍”。“在黨的組織上，黨員中如有國民黨反動領袖的子侄和戚友，如黨部認為工作有不便時，須令其退出黨籍（十二月十日的長沙暴動事前被市黨部反動分子之兒子C.Y.同志向其父親洩露了）。”^②

十一月會議精神傳達後，各地黨組織開始嚴厲執行紀律。河南省黨組織也效仿中央於十二月通過《政治紀律決議案》，批評“豫南特委蔑視省委命令，不發展工農群眾”，給全體委警察告處分；河北特委“根本不發動工農鬥爭”，予以解散，特委書記杜工全留黨察看一年；杞縣縣委吳殿祥“與劣紳酒宴談歡”，開除黨籍；省委委員胡儉到武漢“一去不返”，永遠開除黨籍；許昌鐵路工會秘書李長夫“不受指揮，騙取工會款項”，永遠開除黨籍。^③福建省委通告要求所有黨員立即與國民黨劃清界線：“所有同志不馬上退出國民黨者，以反革命論，立即開除黨籍”；“各種民眾運動如農協工會等，如再用國民黨招牌，張貼國民黨旗幟標語者，以反動機關論。該負責同志予以最嚴厲處分，直至開除”；“各級黨部接到此通告後不切實執行者，以違抗命令論，決予以最嚴厲處分”。^④

這次清黨是中共的自我淨化，很多黨員離開了中共，也有不少黨員思想動搖，其中包括中共創始初期最重要的黨員，他們是第一階段革命中的

① 《政治紀律決議案》（1927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3），第483-484頁。

② 《中央通告第二十五號——對國民黨的工作》（1927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3），第588-590頁。

③ 《中國共產黨河南代表大會政治紀律決議案》（1927年12月），《河南革命歷史文件彙集》（2），中央檔案館、河南省檔案館1984年，第367-369頁。

④ 《中共福建省委通告第十一號》（1928年1月24日），《福建革命歷史文件彙集》（2），中央檔案館、福建省檔案館1983年，第91頁。

風雲人物，卻不適應革命的新階段。譚平山被開除黨籍後，登報脫離中共，認為中共政策過於激進，超越了時代。陳獨秀辭職以後，拒絕共產國際要他去莫斯科的指示，實際上已經處於半脫離狀態。張國燾受到處分後很不服氣，甚至產生了分裂中共，另行組黨的想法。張國燾對瞿秋白的暴動政策不滿，1928年2月下旬“與瞿秋白有過一次攤牌性的談話”，張國燾提出如果不停止暴動政策，“我將另行組織一個工農黨”。在中共第六大上，“瞿秋白曾聲稱他雖然犯了錯誤，但沒有另行組織一個工農黨的意圖”，就是針對張國燾的。^①張國燾曾和陳獨秀討論過另行組黨的計畫，主張“這個黨仍以原有的同志為基礎，擴大其政綱要點仍是反對帝國主義和實現土地革命，但不再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陳獨秀對張國燾的想法雖然“大感興趣”，但是覺得困難太多，尤其是經費難於解決，沒有付諸行動。^②不過後來陳獨秀脫離中共，成立中國托陳派，張國燾1935年在四川另立中央，1938年最終脫離了中共。

在整肅紀律的過程中，也難免地出現偏差。湖南有些地方出現過分嚴厲的傾向，甚至有死刑的處罰。醴陵縣委在1928年2月報告中列出“執行政治紀律”一項，其中稱“西南兩鄉各區委支部大多數都能執行紀律，對於洩露秘密，臨陣退卻，猶疑未定，屢次不到會，不願參加實際工作，懷疑黨的新政策和土地革命的，均用黨的名義宣佈死刑的約有二十多人。若某同志開除之後，馬上執行死刑，毫不姑息，就是誰為過去的領袖或老同志都不寬待”。^③1929年平江黨組織仍有所謂“十二條鐵紀”的規定，其中七八項都是死刑，甚至有“全家抄洗的規定。許許多多的同志，為了幾塊錢或幾十塊錢的數目不清，或作戰時失掉了槍支而慘死了”。^④蔣長卿在巡視湘鄂贛的報告中說：“雖然省委迭次的指示，但是在九月以後銅鼓六

^① 張國燾：《我的回憶》第二冊，第354頁。

^② 張國燾：《我的回憶》第二冊，第364-365頁。

^③ 《中共醴陵縣委關於暴動經過的報告》（1928年2月），《湖南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0），第62頁。

^④ 《夏尺冰巡視湘鄂贛邊境各縣工作的總報告》（1929年7月25日），《湖南革命歷史文件彙集》（7），第181頁。

區處決了區委劉志遠，瀏陽一、二、五、六、八各區都殺了些同志，這點我在瀏陽的區聯合會上，已詳細批評殺的紀律不好，最近二區又殺一個支部書記”，^①這顯然會在黨組織內部造成不正常的恐怖氣氛。

(四)嚴肅紀律的同時，也強調擴大黨內民主

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當時認為，基層黨員和群眾的革命熱情很高，領導機關壓制了群眾，所以在嚴肅紀律的同時，也主張擴大黨內民主，把中共建成既民主又集中的列寧主義革命黨。

會後發出的十七號通告提出廢除設部制度，改為常委會集體領導：“黨的另一個主要缺點，就是各級黨部指導之不集體化。從中央以至縣委甚至於大的區委，都是分成幾部幾委，各部各委可以獨立派人獨立指導工作，部和委之主任自然而然成為分業的專門家，黨的組織自然而然分裂成數多的獨立系統，特別是軍委、工部、農委”。“本來中國的黨是封建社會之產物，很容易流於首領個人的獨裁形式”，“因此黨的指導集體化亦為改造黨的主要問題之一”。“中央，省委，縣委，市委以至大區委，廢止設部制度，集權于常委”。^②

十天之後，中央又發出二十號通告，強調“擴大黨的民主化到最高限度”，必須通過各級選舉來改造組織。“各級黨部的指導機關從小組以至省委，必須經過全體會議或代表會議的選舉，重新改組一次”。“無論選舉代表或選舉指導機關之會議，在選舉前，須提出中央擴大會議之決議及全國黨的問題材料特別是當地黨內的問題，在會議中引起群眾的激烈的辯論，使群眾瞭解黨內組織上的一切缺點和改造的意義，然後開始選舉”。“擴大黨的民主化至最高限度，激發黨員群眾對黨內問題的討論，一切實際鬥爭的策略上的決定，盡可能經過黨員群眾的討論，務打破黨員群眾對黨之政策不敢討論或不懂得怎樣討論的成習”。除有特殊必要情況，“上級黨部

^①《蔣長卿巡視湘鄂贛邊境的報告》(1929年12月20日)，《湖南革命歷史文件彙集》(7)，第408頁。

^②《中央通告第十七號》(1927年12月1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3)，第534-536頁。

不要派人去作書記，或常務委員”。^①

五、中共在殘酷鬥爭中的換血與轉型

中國共產黨在1927年下半年實現了意義深遠的換血和轉型，這是在國民黨殘酷鎮壓中完成的。周恩來在六大上說：“中國的白色恐怖可以說是全世界歷史上所絕無僅有的殘酷”。“第一從陳贊賢被殺到東南遍地的大屠殺。在這個時期大概死了十二萬以上”。“第二從夏鬥寅叛變到馬日事變，以及武漢政府叛變、馮玉祥叛變和其他各地大小的屠殺，統計被屠殺的約十七萬以上”。“第三由廣州暴動到現在”，“被屠殺的約在五萬以上”。“總括的計算，被殺的有31萬到32萬左右，此外在監禁的尚有四千六百多人”。^②

白色恐怖威脅下，大批知識份子離開了中共，比如周恩來最小的弟弟周恩壽。他從五四運動開始就一直追隨大哥，到廣東入黃埔軍校四期，成為中共黨員。但到南昌起義前夕，周恩壽的黃埔同學文強問周恩來：“你這個哥哥怎麼把老弟也甩掉了？”周恩來無可奈何地說：“不是我甩他，是他甩我，他不跟我走嘛。”^③周恩壽脫離了革命隊伍，改換姓名，過起了平民生活。著名共產黨人於樹德是李大釗的好友，國共合作時期是地位很高的國民黨中執委，此時也公開聲明“退出一切政團，從事著述”，^④做出類似選擇的還有施存統等人。共青團員多數是青年學生，蘇聯顧問西塔羅夫說，他在1927年7月離開中國的時候，長沙原來的3000名共青團員，只剩下大約100名，“有些團委簡直是四處逃散”。^⑤9月12日《申報》報導，長沙

①《中央通告第二十號——關於組織工作》（1927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3），第559-560頁。

②周恩來：在中共六大的組織報告（1928年6月30日），《黨的文獻》2008年3期，第19頁。

③文強、劉延民：《文強口述自傳》，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第29頁。

④《共黨到滬者多》，《大公報》1927年9月12日。

⑤《西塔羅夫給青年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信》（1927年8月26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7），第28、30頁。

朱穀君等六名被捕共青團員向衛戍司令部出具誓詞：“餘等因年幼學淺，受環境影響，誤入共產主義青年團，現值政府除暴安良，百度維新，對於青年學子，准其改過自新，自願從此脫離該團關係，永不再入”。^①諸如此類的聲明在當時的報刊上經常出現。

城市工人也大批脫黨。羅亦農 1927 年 12 月報告：“武漢三鎮號稱八千同志，在八月二日總罷工之前三、四天僅存三千，罷工後則減少至二千，九日十日減少至一千二百六十九人，其中尚有些靠不住，後來聽說更少了”。^②武漢礪口區原來有黨員 1500 餘人，到 1928 年 1 月只剩下 50 多人。^③上海黨組織在高潮時期有 12000 人，但是到 1928 年初，“就連正式的數字 1500 人，都是令人懷疑的，因為誰也說不出有超過 20 人的支部”，“暴動前的廣州有 1800 名黨員，現在據最樂觀的估計不超過 100 人”。^④

與此同時，革命農民卻在暴動中大批湧入，中共組織成分發生了重大變化。福建省工作大綱中明確提出：“勇敢之工農份子無條件的大批介紹進來，尤其是在某一處鬥爭之後，那些勇敢的暴徒，可以介紹入黨”。^⑤1927 年 12 月，湖北黃安 18 歲的農會骨幹李先念加入了黨組織，他在黃麻暴動失敗後的白色恐怖中組織起遊擊隊，黑夜裡襲擊殺掉了當地民團首領陳芝斌。^⑥湖北麻城同樣 18 歲的陳再道也入了黨，他和 72 個人一起帶著 53 支槍撤往黃陂縣木蘭山，他們火攻地主堡壘羅家大院，繳獲 19 支長槍；^⑦在湖南醴陵，剛滿 18 歲的耿飆從共青團員自動轉為黨員，他從黨組織

① 《湘省破獲共產黨陰謀續訊》，《申報》1927 年 9 月 12 日。

② 《羅亦農對於湖北問題的答辯》（1927 年 12 月 21 日），《湖北革命歷史文件彙集》（4），中央檔案館、湖北省檔案館 1984 年，第 192 頁。

③ 《中共湖北省委關於武漢三鎮情形給中央的報告》（1928 年 1 月 5 日），《湖北革命歷史文件彙集》（5），第 57 頁。

④ 《阿爾布列赫特給共產國際執委會的信》（1928 年 2 月 29 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7），第 356 頁。

⑤ 《福建政治現狀及目前工作大綱》（1928 年 2 月 9 日），《福建革命歷史文件彙集》（2），第 117 頁。

⑥ 《李先念傳》，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3-37 頁。

⑦ 《陳再道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 2009 年，66-79 頁。

得到了一支老掉牙的駁殼槍，成了7人遊擊隊的隊長，他們不斷襲擊地主團防，很快發展到30多人，有20多支槍；^①在湖南、湖北、江西等大革命時期農民運動高漲的地區，紅色遊擊隊與地主武裝的生死決鬥在成千上萬個村莊裡上演。李先念、耿飆、陳再道等年輕農運骨幹大批入黨，成了中共武裝鬥爭的主力。

米特凱維奇給共產國際的信中生動描述了這場大換血。“上海郊區一家紡織廠的女工的情緒受到極大的壓制，她們被白色恐怖和紅色恐怖嚇壞了，她們說她們希望過幾個月安寧的生活，得到一口飯吃”。“大批工人共產黨員幹部在白色恐怖影響下脫離了黨，不再在會議上出現，回避見面”。“知識份子開始退黨，甚至成立自己的新黨（譚平山）”。“與此同時，我們在農村，黨的組織正在大大發展”，“例如在廣東，我們黨現在大約有3萬人”，“在湖南和湖北，隨著農民運動的發展，有大批農民加入黨”。^②八七會議後的《中央通告第二號》也提到：“成千萬的工農會機關的領導者，最大部分是由知識份子充當。屠殺一來，儘先跑掉的多是這些分子，然而這些分子跑掉之後，卻有許多工農起來代替了他們”。^③

對比中共六大和五大的黨員統計，可以發現：從1927年4月到1928年6月一年多時間，農民在中共黨員中的比例從18.7%猛增到77.6%，而工人則從53.8%下降到10.9%，知識份子也從19.1%下降到與其他合計只有6.9%。中共雖然遭受嚴重挫折，很多人被殺，很多人脫黨，但由於農民在暴動中大批湧入，黨員總數卻從5.8萬增加到13萬。六大以後，中共黨員中農民比例繼續上升，據湖北省1928年10月底的統計，全省5252名黨員中，工人只占6%，而農民占90%。^④湖南醴陵經過1927年底到1928年初

①《耿飆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91年，第90-97頁。

②《米特凱維奇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信》（1928年1月），《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7），第286、289頁。

③《中央通告第二號》1927年8月19日，《中央革命根據地歷史資料文庫——黨的系統》（1），中央文獻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0頁。

④《湖北全省各縣組織狀況一覽表》（1928年10月30日），《湖北革命歷史文件彙集》（5），第596頁。

的農民暴動之後，全縣黨員約4200人，其中工人1.5%，知識份子1.5%，而農民占比高達95%。^①而在湖南平江縣，在彭德懷1928年7月領導軍隊起義之後，全縣各鄉農民大舉暴動，短時間竟發展了七萬五千黨員，^②比五大時全國黨員還多，雖然這些黨員並不鞏固，但預示了中共在農村的巨大發展潛力。

中共五大^③和六大^④黨員成分對照表

	工人	農民	士兵	中小商人	知識份子	其他	黨員總數
五大(1927年4月)	53.8%	18.7%	3.1%	0.5%	19.1%	4.2%	5.8萬
六大(1928年6月)	10.9%	77.6%	0.8%	—	6.9%		13.0萬

中共當時最缺乏的是軍事人才，賀龍、葉劍英、彭德懷等的加入作用很大。綠林出身的賀龍曾多次提出入黨申請，但都被拒絕，直到他帶領二十軍參加南昌起義後才被接受入黨。他顯然是與陳獨秀、彭述之、譚平山等知識份子完全不同的人，蘇聯顧問戈列夫說：“賀龍是個精力充沛、英勇果敢的小夥子”，“是個很會打仗的人”。契赫伊澤認為，賀龍有不少“對於一個革命領袖來說令人懷疑的嗜好：好女色，好賭博，好酗酒”，但是“他與中國的富裕階層沒有任何聯繫，他出身於貧苦農民”，“意志堅強，英勇果敢，奮不顧身”，“按其社會出身來說，經過改造以後他是跟我們一起走的很遠的將領”。^⑤賀龍沒有讓他們失望，南昌起義失敗後，他沒有去蘇聯留學，而是只帶幾個人回湘鄂西重新投入血戰，據當地黨組織1928年3月的報告：“雲卿此行備受危險，但其精神極振作，決心極堅，對黨只恐不孚信用，絕無猶疑。據他常常表示，始終願受黨的指揮及服從一切決議案。此

① 《中共醴陵縣委工作報告》(1928年4月11日)，《湖南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0)，第96頁。

② 《滕代遠給中共湖南省委的報告》(1929年1月12日)，《湖南革命歷史文件彙集》(7)，第12頁。

③ 《陳獨秀在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1927年4月29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5)，第360頁。

④ 周恩來：《在中共六大的組織報告》(1928年6月30日)，《黨的文獻》2008年3期，第20頁。

⑤ 《工農紅軍參謀部第四局關於南昌起義會議速記記錄》(1927年9月14日於莫斯科)，《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7)，第41、42、49頁。

次各役，他本人均同士兵在前線，毫無畏怯。”^①

毛澤東、周恩來、惲代英、方志敏、陳毅、粟裕等知識份子經過血與火的考驗，完成了從激進知識份子到革命家的轉化，他們成為最堅定、最有才幹的革命精英。惲代英參加南昌起義後，在南下途中一直拒絕騎馬，酷暑之中和戰士一起步行。他是深度近視，眼鏡框斷了就用繩子系在耳朵上，這種艱苦卓絕的風範鼓舞了部隊士氣，難怪毛澤東後來說惲代英是可以代替自己領導紅四軍的人。^②方志敏逃回家鄉以後，把潛伏各地的同志，一個一個叫出來，秘密開會，決心重起爐灶，“分頭到各村去活動，在七天內，居然組成了二十幾個黨員的支部”，接著發動農民暴動，開闢了贛東北蘇區。^③二方面軍教導團是廣州起義的主力，由原武漢中央軍政學校學生組成，他們在武漢打夏鬥寅時還很稚嫩，經過半年險惡環境的鍛煉已經大有進步，聶榮臻說：“教導團方面千多人僅有百多個同志，動作起來都能領導一致的動作，而且都勇敢，比之打夏鬥寅時相去天淵”。^④

粟裕當時只有20歲，本來是湖南的激進學生，馬日事變後逃到武漢，與湖南、湖北逃避追捕的一千多學生和工人編入葉挺為師長的第四軍24師教導隊。這些人絕大部分是黨團員，但是自由散漫、沒有軍事經驗，他們在血的教訓中懂得了軍事的重要，在嚴格艱苦的軍事訓練中開始了脫胎換骨的轉型。粟裕說：“經過一兩個月以後，我們開始習慣甚至喜愛起軍隊生活了，身體鍛煉的異常結實。青銅般的面孔，鼓起肌肉的臂和腿，我們手執武器，再也看不出一、二個月以前那種自由散漫的學生樣子了。當然，這樣嚴格的軍事訓練，確實使一部分意志不堅定的人動搖了，他們吃不了苦，偷偷地開了小差”，“當時堅持下來的同志，則絕大部分都成了堅決的革命戰士。”^⑤

①《中共湘西北特委史書元給中央的報告》（1928年3月13日），《湖南革命歷史文件彙集》（9），第137頁。

②胡毓秀：《第一批女兵》，《南昌起義資料》，第312-313頁。

③方志敏：《方志敏全集》，第36頁。

④《聶榮臻對廣州暴動的意見》（1927年12月15日），《廣州起義資料》上冊，第358頁。

⑤粟裕：《南昌起義前後片段》，《南昌起義資料》，第128頁。

中共第一次擁有了自己的軍隊，從這個意義來講，1927年不僅不是失敗之年，甚至可以說是成功的起點。1955年授銜的中將以上高級將領共254人，他們是中共武裝奪取政權的核心力量（10元帥、10大將、57上將、177中將）。這些將領的籍貫分佈與1927年農民運動最強大的區域完全吻合，湖南以73人高居第一，湖北以49人位列第二，江西41人第三，第四安徽就陡降到14人，^①他們多數曾是工農運動的骨幹。中共1927年在湖南、湖北、江西等地發動了上千萬人的工農運動，雖然在國民黨軍隊的殘酷鎮壓下損失慘重，但成千上萬暴動農民為中共軍隊提供了雄厚的人力基礎。

紅軍創建蘇區的地方多是農運中建立了黨和群眾基礎的地區。在1930年紅四軍報告中提到，紅軍在沒有農運基礎的地方建立蘇區很難，“下很多功夫，努力發動群眾，創造群眾組織建立黨”，但是“只要紅軍一走，靖衛團一回來，仍舊是白色恐怖政權，紅軍的努力，只留些政治影響，其次就一切都沒有了！”而有農運基礎的地方就大不一樣，“四軍到南康、信豐只有數日，因為他原先有黨有群眾，四軍一去配合起來，一禮拜的工夫，簡直分配了土地，創造了小塊蘇維埃”。^②1927年南方農民運動是中共創建蘇區的基礎，紅軍先在有農運影響的偏僻山區建立小的地方政權，然後才有機會逐漸發展壯大，最終奪取全國政權。

六、小結

1927年的中共組織仍然很幼稚，在巨大革命浪潮中比較被動，難以領導規模宏大的群眾運動，也難以執行共產國際的指示，屢次遭到國民黨先發制人的打擊，損失慘重。但是在與國民黨左派汪精衛、張發奎等的合作

^① 江林平：《淺析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人民解放軍高級將領的地域分佈》，《珞珈史苑》2015年，278頁。

^② 熊壽祺：《紅軍第四軍狀況 1927年7月——1930年4月》（1930年5月），《中央革命根據地歷史資料文庫——軍事系統》（9），第317頁。

中，中共也掌握了一些部隊，特別是在張發奎的第二方面軍裡，有很多軍官是共產黨員，黨組織在部隊中影響很大，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廣州起義的主力都出自這支部隊。

從八月開始，中共奮起反擊，在南昌發動兩萬多人的起義，八月七日召開中央緊急會議，確立武裝暴動的政策，拉開了鐵血時代的大幕。這樣根本的轉變是非常艱難的，書生並不容易成為戰士。最初的武裝暴動都不成功，中共幹部並不擅長此道，南昌起義的組織很混亂，失敗難以避免，四省秋收暴動也是一樣。中共在失敗中不斷學習，總結經驗和教訓，十一月會議對整頓黨的組織發揮了很大作用，穩住了陣腳，確立了向秘密地下黨轉型的方向，強調了政治紀律，但是也出現了過分打擊知識份子幹部的偏差，引發了很多不良後果。

在白色恐怖的考驗中，中共發生了深刻的換血和轉型。周恩來在中共六大上把這稱為“黨的改組”。他說：“許多不好的分子出去，新的工農分子進來”，“黨的改組是革命勢力重新結合的一個總表現，意義是非常重大的”。^①很多不堅決的革命者離開了中共，知識份子和城市工人大批脫黨，但在大規模暴動中，賀龍等革命軍人和大批革命農民加入，黨員中農民比例從中共五大時不到20%，到六大時達到近80%。

中共領導層不再是知識份子群體，堅持革命的知識份子逐漸洗去書生氣，成長為革命家。毛澤東、周恩來、賀龍、朱德、陳毅等人在慘敗後的恐怖形勢中繼續頑強奮鬥，把中共殘存的組織和軍隊保存下來，進而創建了紅軍和蘇區。中共不但沒有滅亡，反而在小塊區域裡第一次成為擁有軍隊的執政黨，成為參與爭奪中國政權的新興軍事政治力量。

^① 周恩來：《革命的性質和形勢》（1928年6月27日），《黨的文獻》1988年1期，第16頁。

第三章

紅軍對土匪武裝的收編、改造和清洗

土匪問題是紅軍創建初期的重大問題。國共分裂後，共產黨遭到血腥鎮壓，殘存的力量撤退到偏遠山區堅持武裝鬥爭，這些蠻荒地區通常有眾多的土匪。當時中共軍隊很弱小，收編土匪武裝可以迅速壯大革命軍隊，土匪成分在早期紅軍中占不小的比重。但收編的土匪武裝只有經過艱難的信仰和組織改造，才能成為真正的紅軍，而對難以改造的部分則不得不嚴厲清洗。

本章主要把土匪問題當作紅軍創建中的內部問題。在收編、改造、清洗三個步驟解決土匪問題的過程中，顯示出共產黨能夠依靠信仰和組織的力量，把動盪農村中複雜、落後的龐大人力組織起來，創建具有堅定信仰和嚴格紀律的新型軍隊。依靠這樣一支軍隊，共產黨在廣大農村建立了新的政治秩序，並最終通過農村包圍城市主宰了中國的命運。

雖然土匪問題主要存在於建軍初期，在後來發展壯大的主力紅軍中影響有限，但土匪武裝是紅軍吸收的最落後、最野蠻的成分，通過研究土匪問題的解決過程，能夠充分表現革命軍隊“大熔爐”的作用，進而揭示紅軍是明顯不同於當時中國其他軍隊的新型軍隊。

一、民國初期的土匪與政治

在清王朝時期，中國人口從1億多人猛增到4.5億人。到清末，人多地少的矛盾極為尖銳，大多數農民生活困苦。辛亥革命後形勢更加惡化，民初十幾年軍閥混戰不休，陷入大動亂，連基本的社會秩序也難以維

持,大量破產的農民和散兵游勇流為土匪,土匪暴力活動成為農村的普遍現象,“幾乎所有的報紙和雜誌都充斥著有關盜匪在鄉村製造騷亂和傷人的報導”。^①

土匪武裝已經成為一種普遍的地方勢力,各個政治派別都不得不應對這種局面。在北洋時期,政府無力根本上消滅土匪,大致採取剿撫結合的策略,這期間像張作霖、陸榮廷、張宗昌這樣土匪出身的軍官甚至有機會成長為稱霸數省的勢力。袁世凱死後,北洋集團很快分裂,喪失了控制全國的威力,各地軍閥爭奪地盤的戰爭此起彼伏。軍閥們為迅速擴張軍力,大肆收編土匪,很多土匪被改編為軍隊,而軍隊戰敗或嘩變之後又常常成為土匪,軍隊和土匪的界限逐漸模糊,出現了兵匪一家、軍隊土匪化的趨勢,這表明落後的軍閥政權不但無力肅清土匪,反而受到了土匪的滲透和影響。

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派在反清起義中很重視聯絡會匪,在辛亥革命中土匪武裝曾發揮重要作用,但革命後土匪武裝擾亂社會秩序,革命派不得不在其執政的地區(比如廣東)嚴厲鎮壓包含很多土匪成分的民軍。到1913年反袁失敗後,國民黨從分享權力的政黨回到革命黨的地位,聯絡土匪又成為反抗北洋軍閥的重要策略,在震動北方數省的白朗軍中就有孫中山的使者。在護國戰爭、護法戰爭等歷次軍事行動中,國民黨都有聯絡土匪武裝的嘗試,福建的盧興邦、陳國輝、郭鳴鳳等土匪首領在這一時期與國民黨建立了聯繫。

1926年北伐戰爭開始以後,各路北伐軍都曾收編土匪武裝,不過在兵力比較雄厚的湖南、江西戰場,收編土匪武裝的作用不大,湖南著名的土匪首領陳光中不過被委任為營長。但在兵力不足的福建戰場,何應欽大力收編土匪武裝,順利地驅逐了北洋軍,盧興邦、郭鳳鳴被委任為師長,陳國輝被委任為團長。何應欽率北伐軍進軍浙江以後,收編的幾支土匪武裝成為福建重要的軍事力量。國民黨對土匪武裝的收編基本上只是拉攏

^① 菲爾·比林斯利(美):《民國時期的土匪》,中國青年出版社1991年,第15頁。

土匪首領，頒發委任狀，並不進行深入整頓，收編的土匪武裝往往反復無常，其行為方式中仍保留著野蠻任性的作風，所以在國民黨控制的區域，土匪活動即使有所收斂，也難以得到根本的解決。

中國共產黨是當時新興的政治力量，主要以城市知識份子和工人團體為基礎，工作重點是工人運動和學生運動。1925年1月中共四大的時候，農民運動受到了更多關注，制訂了《對於農民運動之議決案》，其中涉及到土匪問題，認為“土匪與農民之關係是一個重要問題”，並根據廣東農民運動的經驗把土匪分為三類，分別提出不同的對策：一、“有幫助農民反抗壓迫的，這類土匪當予適當的聯絡”；二、“有被地主利用壓迫農民的”，“我們一面以武力對抗，一面須極力向他們宣傳並揭破地主利用他們的陰謀”；三、“對於擁戴土豪專以魚肉農民為業的土匪，自然只有訓練農民自衛軍以防禦之。”^①

1926年北伐軍打過長江，共產黨在湖南、湖北、江西等地發動了聲勢浩大的農民運動，土匪和農運之間形成了錯綜複雜的關係。有的土匪與地主勾結，搗毀農會、殺害農會幹部；有的土匪武裝同情農運、甚至參加農運，比如井岡山的袁文才、王佐部先後被編為寧岡縣、遂川縣農民自衛軍。總的來說，敵對土匪只能壓迫一盤散沙的農民，並不能抵抗組織起來的農民運動。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裡熱情讚頌了農運肅清土匪的威力：“從堯舜禹湯起吧，一直到清朝皇帝，民國總統，我想沒有哪一朝代的統治者有現在農民協會這樣肅清盜匪的威力”，土匪在“各縣全然絕了跡，哪怕從前是出土匪很多的地方”。“農會會員漫山遍野，梭鏢短棍一呼百應，土匪無處藏蹤”；“農民禁阻谷米，谷米價值極廉”，“民食問題不如從前之嚴重”；“會黨一概加入農民協會，在農民協會裡頭公開的逞英雄，吐怨氣”；“農會一起，匪患禁絕。對於這一點，紳富方面都同情於農會”。^②

^① 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363-364頁。

^② 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1927年3月28日發表於《中央副刊》第七號)，《毛澤東集》第二版(1)，第245頁。

但是，土匪成分滲透進農會，“逞英雄”，“吐怨氣”，難免會加劇農民運動中固有的暴烈傾向，加之建黨不久的共產黨組織力還在幼稚階段，不能有效掌控大規模群眾運動，以至於鮑羅廷認為“湖南農運不是我們的領導，而是地痞與哥老會的領導。”^①鮑羅廷的看法固然偏頗，卻也反映出會黨與土匪因素在農民運動中確有影響。

二、收編土匪武裝是擴大紅軍的重要手段

在大革命失敗後的白色恐怖中，大批黨員脫黨，繼續戰鬥的革命者也被迫撤離城市，他們與南方各省遭到追殺的眾多農運骨幹結合，在農村勇敢發起武裝暴動，創建紅軍和蘇區。在1927年開始武裝暴動時，由於軍力薄弱，收編土匪成為壯大革命武裝的重要手段。當時中共中央很重視在暴動中吸收土匪武裝，但是由於缺乏有效的控制和改造，這個策略最初發揮的作用有限。暴動失敗後，紅軍和遊擊隊向敵軍薄弱的偏遠山區尋求生存機會，這些地區常常有土匪武裝盤踞。在國民黨軍隊的壓力下，土匪也往往傾向紅軍，很多土匪武裝被收編充實到紅軍中，壯大了革命力量。在創建初期的紅軍中，土匪武裝佔有不小的比重，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紅軍的很多遊擊戰術也來源於土匪武裝多年積累的經驗。

（一）從國共分裂到建立井冈山根據地——“土匪問題是非常大的問題”

1927年7月國共分裂以後，中共在八七會議決定轉入武裝暴動，聯絡土匪武裝在暴動計畫裡佔有重要地位。對武裝鬥爭態度堅決的毛澤東明確說：“土匪問題是非常大的問題”，“會黨土匪非常之多，我們應有策略”，認為通過土地革命能贏得土匪武裝的支持，批評有些同志像孫中山只想利用土匪，提出對土匪武裝應以誠相待，應該“當他們是我們自己的兄

^①《鮑羅廷在中國的有關資料》，第215頁。

弟”。^①共產國際代表羅明納茲肯定了毛澤東的意見：“我們不但不利用，並且還應確定其經濟地位”^②。所謂確定經濟地位，就是在階級劃分中把土匪定為“破產的農民”，既然是農民，當然是階級兄弟。八七會議在中央層面明確了聯絡土匪武裝的政策，在選舉中毛澤東提出不要選自己進政治局，希望到地方搞暴動，他說：“我現在擔任土匪工作，不能加入”，可見收編土匪在他的暴動計畫裡份量很重。^③

其實早在5月馬日事變後，湖南黨組織在危急形勢下已產生了“當大王”的想法。郭靜筭到瀏陽組織第一路指揮部，見平江、瀏陽兵力薄弱，主張“退到瀏陽及江西邊界去當大王”。^④7月《中央通告農字第九號》也提出上山學習土匪是軍事上長期鬥爭的方法。^⑤在湖南省委給毛澤東的信中提到：“中央最近所示的軍事三步辦法，即：（一）設法改編挨戶團，取得合法地位，以圖自保；（二）上山學匪準備長期奮鬥；（三）上二者都辦不到則埋槍。”湖南省委比較認同“上山學匪”的辦法，並且實際上已經開始實行這一方法，“潭部已收集了一百二十四支槍上了山，兵極可靠，負責同志郭詠泉來省請示，即堅囑其負險固守，正式作匪”。湖南省委的結論是：“湘雖失敗，然收集流亡，兩千支槍尚或可得，經時整理上山作匪亦有可能。”^⑥當然，這裡只是提出學習土匪的生存策略，保存現有的力量，還不是通過收編土匪壯大力量。

在震動全國的八一南昌起義中，收編土匪武裝成為軍事工作的重要方面，起義領導機關曾經大規模改編土匪武裝，但是實際效果有限。當時

① 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黨史教研室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十四冊，第10頁。

② 《共產國際代表羅明納茲關於農民鬥爭決議案的發言》（1927年8月7日），《八七會議》，中共黨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74頁。

③ 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黨史教研室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十四冊，第12頁。

④ 潘心源：《湘東各縣工作報告》1929年7月2日，《湖南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甲7，第121—122頁。

⑤ 《中央通告農字第九號》（1927年7月20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3），第220頁。

⑥ 《中共湖南省委給潤兄並轉中央的信》（1927年7月23日），《湖南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甲5，第92—95頁。

深入土匪的聯絡員報告說：“葉賀軍隊南昌舉義之後革命委員會成立，我即於此時受前敵軍委命令赴撫州接洽土匪工作”。“撫州六縣原屬平原之地，無高山險阻，大股土匪不能容身，只有小股土匪，每股為數十人不等”。聯絡員“遍訪他們的首領”，提出收編條件為：遵從命令和政策，保護貧農利益，掩護起義軍主力後方安全。土匪首領要求供給槍支彈藥，革命委員會慷慨同意提供2000多支槍、50萬發子彈。土匪300多人到撫州搬運槍支，雖然搬運未完即被國民黨軍隊擊敗，只運出1200支槍、10多萬發子彈，但招集了2000多人的隊伍開赴江西、福建山區。不過這支隊伍遭到失敗，在埋槍700余支後分散，60名土匪首領在撫州被斬首示眾。^①南昌起義中雖然撥出大批武器彈藥改編土匪武裝，但來不及改造和訓練，這些隊伍戰鬥力薄弱，很快潰敗。

八七會議以後，秋收暴動成為南方四省武裝反抗的工作中心，由於軍事力量不足，聯絡土匪武裝受到高度重視。在1927年9月《中共江西省委秋收暴動計畫》中，聯絡會匪形成了比較系統清晰的思路。省委首先承認會匪是農民的一部分，“是失業農民另一種的生活形式，他們‘劫富濟貧’的口號即是土地革命的精神”，所以“我們進行暴動工作，須與當地會匪聯絡，派人到他們中去工作，向他們說明土地革命的意義是劫富濟貧更徹底的辦法”。計畫要求聯絡會匪要抱有誠意，“要會匪與農民建立兄弟般的關係，不要存利用的心理，不是希望他們來幫助，而是要他們與農民一樣為暴動的主體”；同時要注意“聯絡會匪要拉住群眾，不要僅拉他們的領袖”。^②中共與江西土匪武裝建立了初步聯絡，八一起義後不少中共黨員遭到搜捕不得不隱藏在土匪中，到秋收暴動時期正好擔任收編土匪的工作。江西省委報告提到：“在‘八一’後贛東各縣的同志大都被政府通緝跑

^①《關於撫州土匪問題的報告》(1927年)，《江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927—1928年甲)，第35—38頁。

^②《中共江西省委秋收暴動計畫》(1927年9月)，《江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927—1928年甲)，第21頁。

到土匪裡面去了。迄聽到各處暴動，也回來接頭而大幹特幹了。”^①

湖南秋收暴動是各省暴動中影響最大的，湖南農民運動勢力非常雄厚，暴動中還有正規軍隊的參加，但收編土匪武裝同樣受到重視。1927年9月湖南省委給中央的信中提到“由此間加派人前往湘南加緊土匪運動及暴動”^②。《兩湖暴動計畫決議案》明確提出土匪是暴動中的重要力量，“對於土匪的政策應當以我們的口號去宣傳他們，組織他們於農民協會之下或革命委員會之下，使他們在暴動的時候成為一部分重要的副的力量，在暴動成功之後，予以改編”^③。湖南省委中提出要在土匪中發展黨員：“土匪紅會等必須在事實上理論上去批評其錯誤，改造其組織，使之加入農民協會，與農民一致，其中有階級覺悟的急進分子，不妨吸收入黨。”^④但是湖南秋收暴動中對土匪的收編卻並不成功，師長余灑度收編了平江土匪邱國軒部，在一、二、三團之後編為第四團，結果起義過程中邱部叛變，與敵夾擊最精銳的主力第一團，造成起義軍慘重損失，被迫放棄進攻平江的計畫。^⑤邱部的叛變是湖南秋收暴動很快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⑥

任弼時在秋收暴動失敗後的報告中，提出要對土匪武裝提高警惕，必須先有革命行動才能收編。“過去軍事工作，多與各地土匪領袖接頭”，現在湘南有土匪“自稱有槍七千餘，願意與我們合作，並贊成土地革命政綱和屠殺土豪劣紳政策，惟要求一千元開辦費。其他預備受正式軍隊收編的軍隊，也時常向我們要求津貼。據我的觀察，這些軍隊勢力都不可靠，

①《中共江西省委關於目前政治狀況及各地工作給中央的報告》（1928年），《江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927—1928年甲），第342頁。

②《中共湖南省委給中央的信》（1927年9月4日），《湖南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甲5，第120頁。

③《兩湖暴動計畫決議案》，載1927年9月12日出版的《中央通訊》第4期，《湖南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甲5，第133頁。

④《中共湖南省委組織局工作計畫》（1927年11月25日），《湖南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甲5，第375頁。

⑤ 餘灑度：《餘灑度的報告》（1927年10月19日），《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上冊，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頁。

⑥ 後來邱國軒部被平江遊擊隊擊敗，邱被活捉處決，見《鐘期光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第15頁。

並且又含有極大的危險，結果必定我們被他們所利用欺騙，並且我們也沒有這多錢供給接濟，因此決定對於這些軍事勢力，必須令他先做出成績，然後談到經濟上的接濟。並須承許我們派人進去工作擔任下級幹部為條件。現預備派人南去要唐某廖某實行土地革命政綱”，“以測驗他合作的真意。”^①

在平江、瀏陽，收編不成功引發了對土匪武裝的敵視。潘心源說：“現在平、瀏所取的政策，完全是一種殺的政策，不論他們是否反動，只是要稍有一點錯誤，便捉去槍決”，“土匪借我們的名義組織赤衛隊，雖有不少的盲動，但當地土豪劣紳卻已被他們打跑了，也未嘗不可利用他們做過革命的助力，如果專門去殺，便只有增加自己的敵人，無意中幫助了敵人”。^②

但是在井岡山，收編袁文才、王佐部卻給困境中的紅軍很大幫助，在創建根據地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江西寧岡縣黨組織的龍超清等人早就與袁文才、王佐有聯繫，兩部曾被編為農民自衛軍，但他們實際上還是獨立活動，黨組織不能真正掌控。秋收起義失敗後，毛澤東帶領不足千人的隊伍在三灣改編後向井岡山撤退，在古城文昌宮會議上討論了如何對待井岡山土匪武裝的問題。當時不少人主張武力消滅，但毛澤東認為這種意見“太狹隘了，度量太小了”，“三山五嶽的朋友”是消滅不完的，“他們大多數是貧苦農民，與地主階級矛盾很深”，應當“教育改造他們，把三山五嶽聯合成一個大隊伍”。會後毛澤東親自和袁文才交朋友，送給袁部100支槍。^③袁文才深受感動，也送給紅軍七八百元錢，並幫助籌集糧食、安置傷病員，進而同意率部參加紅軍。當時紅軍正處於失敗後的困境中，軍心渙散，“逃跑的很多”，“甚為危險”^④，袁部的參加使紅軍得到了休整，壯大了革命武裝，進而創建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

①《弼時報告(二)》1927年10月4日，《湖南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甲5，195-196頁。

②《潘心源關於“秋收起義”前後瀏、醴、平革命鬥爭情況的報告》1929年7月2日，《平江革命歷史文獻資料集》，中共湖南省平江縣委黨史資料徵集小組辦公室編輯出版1983年，295-296頁。

③《何長工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87年版，第106頁。

④《中共湖南省委巡視員杜修經的報告》(1928年6月15日)，《湖南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甲6，第37頁。

毛澤東領導的井岡山紅軍編為第一師，共兩團：一團是秋收起義餘部，約一千人；二團即為土匪武裝袁文才、王佐部編成，約六百人。1928年4月朱德帶領南昌起義餘部和湘南起義農軍共約一萬人上山，與毛澤東會師成立第四軍，編為六個團：28、29、30、31、32、33團，其中32團即是由袁王部編成的。但是4月到8月間，由湘南起義農軍編成30、33、29團先後返鄉潰散，紅四軍只剩下28、31、32三個團約四千余人，袁王部32團在保衛井岡山的戰鬥中發揮了重要作用。^①

紅軍在探索遊擊戰術的過程中，也從土匪經驗中學到了不少東西，“上山學匪”是有真實內容的。井岡山原來有個土匪首領叫朱聶子，政府軍和地主武裝多年也無法消滅他，他的秘訣是“不要會打仗，只要會打圈”，意思是不要和對手硬碰硬，而要靈活的遊擊。毛澤東對這個口訣很欣賞，反復向部隊幹部解說，並且把它改造為“既要會打仗，又要會打圈”，逐漸形成了紅軍的遊擊戰術——“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跑，跑不贏就鑽，鑽不贏就化（化裝成老百姓）”，常讓強大的敵軍毫無辦法。^②毛澤東甚至把“打圈子”這個詞寫進了給中央的正式報告，在1929年紅四軍前委給中央的信中明確提到“強敵跟追，用盤旋式的打圈子政策”^③。陳毅在給中央的報告中也談到“打圈子脫離敵人包圍與窮追”，“大敵前來，我不能與之作戰，則利用打圈子的辦法向沒有敵人的地方跑”。^④可見，來自土匪的“打圈子”成了紅四軍的口頭禪，在紅軍遊擊戰術中佔有重要地位。

（二）收編土匪武裝，創建贛西南紅軍

贛西南蘇區1929年以後逐漸成為中央蘇區的中心，土匪成分在贛西南初期革命勢力中佔有相當比重。土匪問題在整個江西都很普遍，在贛

① 陳毅：《關於朱毛軍的歷史及其狀況的報告》（1929年9月1日），《陳毅軍事文選》，解放軍出版社1996年，第2—4頁。

② 《何長工回憶錄》，第104—106頁。

③ 《紅軍第四軍前委給中央的信》（1929年4月5日），《毛澤東文集》第一卷，第56頁。

④ 《陳毅關於朱毛軍的歷史及其狀況的報告（一）》（1929年9月1日），《陳毅軍事文選》，第15頁。

西南尤為突出，贛西南土匪主要是受會黨控制的會匪，三點會在某些地區已經成為群眾性組織。由於國民黨軍隊和民團的壓迫，也由於革命勢力的興起，會匪往往傾向於共產黨。泰和縣仙槎靖衛團任意捉殺仁善鄉農民，甚至有病在床的70多歲的老頭子、4歲的童養媳、路上的挑夫、江邊的癩子都被殺害，激起了群眾的公憤，“尤其是洪家兄弟，自動的召集千餘人的示威大會，一面用群眾的力量，驅逐仙槎靖衛團，另一方面，派代表到東固搬請紅軍援助”。^①1929年江西省委報告中提到：“贛南有同志二千餘人，群眾在他們自稱有十萬人，但實際確有二萬餘”，另外“七、八萬是土匪群眾”，可見會匪勢力在整個贛西南革命勢力中佔有相當大的比重。^②1930年巡視員張懷萬在報告中也提到：“贛南的土匪極多，現在因為革命發起，很多土匪（三點會）都歸順革命”。^③

由於經驗不足，收編政策最初遭遇了不少挫折。吉安縣委“在暴動的準備中，只注意聯絡東固的會匪，派人到會匪中去工作，從不想到怎樣發動群眾”，“又怕會匪不能受我們的指揮，擾害地方——不敢進行，所以結果還是一哄而散”。^④贛南地方武裝八縱隊的前身是北洋軍殘部流散形成的土匪，大多是河南人，黨組織派吉安師範的革命學生把它爭取過來，但是派進去的人太少，不能充分改造，這支部隊最後垮掉了。^⑤

但地方組織的艱苦努力逐漸收穫了成果。興國縣委派黃家煌、肖以佐、陳赤峰、陳奇涵等幹部加入三點會，因這些革命者大多是富家子弟出身，以至於當地人議論說：“這些人不愁吃不愁穿，好事不做跑去當土

①《中共贛西特委給江西省委的報告》（1929年7月18日），《江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929年二甲），第25頁。

②《中共江西省委關於各地黨的工作狀況給中央的報告》（1929年7月），《江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929年二甲），第47頁。

③《張懷萬巡視贛西南報告》（1930年4月5日），《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上冊，第183頁。

④李幹生：《江西省委致中央信》（1927年12月4日），《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中冊，第9—10頁。

⑤李挺：《回憶紅二、四團的前身》《回憶中央蘇區》，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6頁。

匪”。^①於都縣也派丘倜、劉為美、李駿等六名黨員入三點會，與會黨頭目“喝血酒，跪拜天地為誓”。^②不少土匪武裝被改編為紅軍，壯大了革命隊伍。贛西遊擊第一大隊是二團東渡時留下來的，“當時僅有步槍八支，後來與當地一班土匪聯合，漸漸淘汰他的、分配他的，領袖驅逐出去，得了四十多杆槍，漸漸發展得九十多枝，總共有一百卅枝”。^③贛西特委領導下的遊擊第一大隊、第二大隊人數500多、槍400支，其成員相當部分也是來源於土匪^④；上猶、崇義以及湘贛邊境的土匪和三點會一批一批投奔紅軍，“誠懇的接受紅軍的領導”。^⑤

在早期贛西南紅軍中，收編的會匪武裝占很大比重。紅二、四團主力是七縱隊、九縱隊、十五縱隊和十六縱隊，四個縱隊中有三個縱隊長曾是會匪首領。第七縱隊的前身是段起鳳領導的綠林武裝，後來由賴經邦通過親戚關係爭取過來，又收編一個姓孫的領導的土匪武裝，逐步淘汰不純分子，吸收農民和革命知識份子，1928年2月成立七縱隊，段起鳳擔任縱隊長（吳江只擔任很短時間）；十五縱隊以興國縣三點會首領管開炳的部屬為骨幹發展而來，1928年6月成立，管開炳為縱隊長；十六縱隊以興國縣三點會首領曾老四的部屬為骨幹發展而來，1929年1月成立，曾老四為縱隊長。1928年9月七縱隊和九縱隊合併成立獨立第二團，段起鳳擔任二團副團長；1929年2月，二團抽調100多名骨幹與十五、十六縱隊合編為第四團，段起鳳擔任團長。二、四團是贛南紅軍的主力，1929年11月，贛西南蘇區以二、四團為基礎創建了紅六軍（後改稱紅三軍），成為紅一方面

① 陳奇涵：《贛南黨的歷史》，《回憶中央蘇區》，第5—6頁。

② 丘倜：《關於於都暴動的情況》，《回憶中央蘇區》，第28頁。

③ 《江西軍事工作報告》（1929年5月4日），《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中冊），第428頁。

④ 《中共吉水縣委書記劉作撫關於贛西情形給中央的綜合報告》（1929年9月6日），《江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929年二甲），第157頁。

⑤ 《中共贛西南特區委西河分委給中央的綜合報告》（1931年6月16日），《江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931年），第85頁。

軍一軍團的主力之一，在第一次反“圍剿”戰爭中立下大功。^①

(三)閩西蘇區土匪勢力特別強大，土匪問題更為突出

1929年初，紅四軍為避開湘贛兩省聯合重兵圍攻，主動撤離井岡山，一路與追兵苦戰，經贛西南輾轉到達閩西，開闢了中央蘇區的另一個主要部分——閩西蘇區。閩西蘇區是紅軍走出困境、轉危為安的重要根據地，同時閩西山區也是土匪勢力非常強大的地區，福建省委提到“閩西土匪特別多，對土匪的問題比較嚴重”^②。

閩西地區的突出特點是，大的土匪武裝控制了地方政權，成為紅軍的主要敵人。在湖南、江西，國民黨政府軍的力量比較強大，土匪一般處於受壓制的地位，往往傾向紅軍。但在閩西，由於遠離全國政治軍事要衝，國民黨正規軍隊力量薄弱，北伐戰爭中被何應欽收編的郭鳳鳴、盧興邦、陳國輝等土匪武裝控制了地方政權。1929年春，毛澤東、朱德率領紅四軍初次進入福建，首要的敵人就是這些割據閩西的土匪武裝，3月一戰擊斃郭鳳鳴、佔領長汀，6月又在龍岩消滅陳國輝部的主力，奠定了閩西蘇區的基本局面。

但是，閩西不僅僅有這些大股土匪，部分地區已成為遍地皆匪的野蠻世界。國民黨收編的土匪武裝不能維持最基本的秩序，他們本身就胡作非為、戰鬥力也有限。各種土匪多如牛毛，不少地主、士紳為求自保也不得不加入土匪，同時為抵抗土匪，地方上大刀會等民間自衛組織也極為發達。在某些地區搶劫成為重要的生存方式，甚至普通農民也賣田買槍，土地大片荒蕪，社會幾乎倒退到部落爭鬥的原始時代。比如永定縣，土匪數量十分驚人，“擄人勒索成為常事，往往僅有數裡之路，本地人亦行不得。小鄉村之小姓農民耕牛農具被掠，無以耕作，多流離別處或亦當匪，因此

^① 李挺：《回憶紅二、四團的前身》，《回憶中央蘇區》，第39-40頁；余伯流、凌步機：《中央蘇區史》，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6-38、54-56頁。

^② 《中共福建省委報告》（1929年4月20日），《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上冊，第69頁。

有許多田地無人耕種。”^①軍隊下鄉來剿匪時，同樣禍害農民，所謂軍隊不過是被收編的大股土匪而已，“有用的、值錢的、搬得去的東西搶去”，還要“罰款贖罪”，把很多無辜農民綁走，要拿錢才能贖回。軍隊還常常半夜對農民突然襲擊，以至於當軍隊臨近駐紮時，常常吓得“全鄉農民晚上不敢在家睡覺”。^②

中央巡視員趙亦松(即周肅清)在報告細緻生動地描繪了閩西土匪橫行的恐怖場景。很多破產農民和手工業者不得不當土匪，“無論那一鄉那一村，都有土匪的組織，大小頭目，不計其數。他們或則互相關聯，或則互相對峙、衝突，造成劇烈的鬥械”。“他們最主要的條件是不離故鄉，就地極野蠻的剝削劫掠，或三五成群，或大股公開劫掠，攔路搶劫、綁人、搶牛、洗劫鄉村。最大的匪股，利用時期，勾結軍閥與豪紳，盤踞一區、一縣或數縣，形成土匪與豪紳相勾結的政權，極殘酷的剝削農民，私造土槍，收買槍彈，擴充實力”。“現在的永定、武平、連城等縣，差不男子都是流氓土匪，一般的知識份子都在如何變為匪頭。因為土匪、流氓、豪紳有不可分離的聯繫，真正的農民，除少數的男子外，耕田、劈材，都是婦人充任。一般說起來，男子尤其是有槍的男子，都是壓迫者、剝削者，女子才是真正生產的農民！”^③“永定土匪的數量是怪驚人的，坎市、武溪兩區的人口不下三四萬，土匪占了大半。尤其是武溪，除了土匪，什麼也沒有。土地都荒蕪得無人耕種，尚以搶劫龍岩、南靖一帶為生”。“農民最痛苦的是土匪與豪紳的壓迫，沒有田耕，而且不能耕田”。“他們共同的表現是要求槍支，要求與豪紳土匪決死戰。他們許多都賣田買槍，好象不要土地，這實在是革命要求最

①《中共福建臨時省委報告》(1928年4月3日)，《福建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927-1928年上甲)，第197-198頁。

②《照化巡視莆田的報告》(1929年1月9日)，《福建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929年上甲)，第30-31頁。

③《趙亦松關於福建工作情況的綜合報告》1928年7月29日，*福建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928年下甲)，90-91頁。

迫切的描畫。”^①

土匪給人民造成深重的災難，但他們的活動有時卻有利於紅軍。國民黨軍隊楊樹莊部“因泉州的土匪擾亂”，盧興邦部因“古田的土匪時常擾亂”，“時常感覺到自顧不暇”，“不能安心前進”，無力來進攻閩西蘇區。泉屬一帶土匪遍地皆是，少數留守的國民黨軍隊常為土匪繳械。^②福建省委1929年9月提到，由於泉屬土匪的紛擾，加上內部矛盾和財政困難，使福建國民黨軍隊“對閩西的進攻發生了很大的困難”。^③

不少小股土匪主動要求加入紅軍，多數土匪與國民黨軍隊有矛盾也不願對抗紅軍。趙亦松報告提到，永定的土匪“大半受豪紳的領導”，不過他們要把持稅收，與國民黨軍張貞部是有衝突的，不太敢與共產黨作對，“但是真正加入農協或共產黨的，大半系小股與受大股壓迫者”。^④1929年福建省委給紅四軍前委信提到，“漳、泉一帶土匪已在蠢動。漳州土匪多希望我們收編”^⑤。在地方組織報告中也提到，莆田、仙遊、福清三縣“土匪除有背景的向我們進攻，大多數是表示好感，並且要求收編”，“仙游最近土匪要求我們派人去領導及派人去拿武裝，莆田同樣也有幾股。”^⑥

閩西特委認識到收編土匪武裝是壯大紅軍的機會，1929年“匪運”已經上升為與“工運”、“農運”、“兵運”並列的重要工作。特委檢討以前的工作，認為“二月殺土匪八人，招致土匪群眾之反對，是不對的”，“過去閩西

①《趙亦松關於永定工作概況報告》1928年7月29日收，《福建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928年下甲），127、129頁。

②《中共福建省委給中央報告》（1929年6月8日），《福建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929年上甲），第251頁。

③《中共福建省委致閩西特委及前委信》（1929年9月6日），《福建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929年下甲），第205頁。

④《趙亦松關於永定工作概況報告》（1928年7月29日收），《福建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928年下甲），第132頁。

⑤《中共福建省委致前委信》（1929年5月26日收），《福建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929年上甲），第239頁。

⑥《於潔關於莆田、仙遊、福清三縣情況的報告》1933年9月19日，《福建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福州）》（1933-1934年），117-118頁。

一般的說都不注意土匪運動，並大部分都是仇視土匪，如蛟洋殺七匪等，尤其對城市流氓的取仇視態度，這在客觀上是把土匪流氓群眾讓與豪紳階級，使之進攻我們”。^①很快，“匪運”取得不小的收穫，相當數量的土匪武裝被收編入革命隊伍。武平有土匪五六十人加入農會，永定一帶土匪有幾十人在共產黨指揮之下，還有十余名土匪投到八支隊，溪口有一部分土匪被編為赤色遊擊隊，後編入紅四軍四縱隊。龍岩的劉烈波部有土匪80人，經軍部委為赤色遊擊隊，後來紅四軍前委決定將長汀赤衛隊、永定湖雷溪南遊擊隊，與一部分土匪及北四區五九團都編入四縱隊，包含許多原土匪成分的四縱隊逐漸成為福建地方紅軍的主力。^②

1932年在上海抗戰的十九路軍調入福建後，雄心勃勃要整頓地方秩序，消滅各地的武裝割據，對土匪武裝造成很大壓力。很多土匪“覺得找紅軍是他們的出路”，有的找不到紅軍，“卻自持起紅旗冒充紅軍”，他們並不瞭解紅軍，結果鬧出帶三角型帽徽的笑話。惠安黨組織一方面揭破他們的假冒，另一方面也派人做他們的工作。^③安溪黨組織報告說，德化土匪張鳳南部“被十九路軍打擊，沒有出路，派代表到我們有組織的地方來找，要求我們收編他們。我們對他們這樣說，苛捐什稅不准派，無產階級勞苦群眾一個錢不准拿，不准壓迫士兵，他們接受”。^④閩南黨組織認為“土匪應該分別看待”，“發許多《告綠林兄弟書》給土匪。土匪要求我們收編的”，有王觀蘭的兩連，有百七、八十人，槍五十多枝，安溪中心縣委將其編成閩南遊擊隊第二支隊的第三大隊。”^⑤這段時間是福建紅軍收編土匪

①《中共閩西第一次代表大會之政治決議案》(1929年7月)，《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中冊，第117、119頁。

②《中共閩西特委報告》(1929年11月6日)，《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上冊，第169、170頁。

③《中共廈門中心市委關於工人運動及蔡協民問題等給中央的信》1933年1月31日，《福建革命歷史文件彙集(廈門)》(1933-1935年)，第27頁。

④《林瓊關於安溪縣工作情況的報告》1933年2月27日，《福建革命歷史文件彙集(廈門)》(1933-1935年)，44頁。

⑤《包野關於閩南組織情況給中央的報告》1933年8月1日，《福建革命歷史文件彙集(廈門)》(1933-1935年)，72-73頁。

武裝的又一個小高潮。

三、改造土匪武裝——中共六大嚴厲政策和紅軍實踐中的變通

但是，野蠻的土匪武裝要想成為真正的紅軍，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必須經過深刻的改造。對於如何改造土匪武裝，1928年夏天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共六大制定了粗糙嚴厲的政策，提出對土匪首領要“完全殲除”，而紅軍在實踐中則表現得更為靈活和耐心。六大是在共產國際的直接領導下召開的，其決議主要反映了共產國際領導人的想法，他們從俄國革命經驗出發，宏觀上並不認為農村武裝鬥爭是中國革命的中心，對來自農村的革命成分持懷疑態度。斯大林在接見中共領導人時說：“農民遊擊戰爭並非暴動，有些地方取得政權，組織紅軍，但不能持久”。^①很顯然，斯大林此時認為中國革命的前途也應是十月革命式的城市暴動，農村武裝鬥爭只起次要作用，他的看法到1930年以後才發生較大轉變。

雖然共產國際領導人也注意到中國作為落後農業國的特點，強調土地革命和農民運動，但是比較擔心農民的落後性給革命帶來危害。當然這種擔心也是有道理的，近現代歷史上代表先進技術和先進思想的是城市，革命運動通常以城市為主要動力，比如法國歷次革命中的巴黎、俄國十月革命中的彼得堡和莫斯科，而農村常常是落後反動勢力的基地。因此共產國際一方面承認在革命武裝力量不足的情況下，在農村武裝鬥爭中收編土匪是必要的，同時也非常警惕土匪武裝成分引起革命軍隊的墮落變質。1928年《共產國際執委會東方書記處關於中共軍事工作的訓令》要求注意土匪領袖的危害：“強盜隊伍（土匪、紅鬍子）有時有成千累萬的武裝，有時能夠打敗正式軍隊，所以在農民中的工作人應對他們加以注意。強盜是社會經濟恐慌的產物，其中大部分有傾向革命的可能；土匪隊

^①《周恩來對斯大林同瞿秋白和中共其他領導人會見情況的記錄》（1928年6月9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7），第478頁。

伍第一就須改組，改組時首要的必須注意軍官成份的選擇，因為大半的土匪領袖是真正的強盜，他們只是妨礙革命的事業。”^①

共產國際很多工作人員對農村武裝表示懷疑，蘇聯顧問葉夫列莫夫甚至對賀龍也很不信任，他說：“賀龍當了20年的土匪，而你現在想把他變成共產黨人，變成為社會主義而鬥爭的我們的遊擊隊員。這是極大的錯誤。”^②共產國際駐華代表阿爾布列赫特對毛澤東的紅軍也有疑慮：“這些軍隊沒有根據地和供應來源，所以它就成了農民的很大負擔。更有甚者，一部分軍隊是半土匪出身，例如毛澤東的隊伍，他們隨著時間的推移，開始瓦解並遭到農民的反對。”^③共產國際執委會指導員斯卡洛夫明確提出紅軍中發生盜匪活動的危險：“在許多部隊中，特別是在不大的部隊中，職業土匪占很大比例，他們一起加入軍隊並在自己的頭目領導之下”，“在紅軍的一些部隊，有時是主力部隊的社會成分如此紛雜的基礎上，紅軍隊伍中發生盜匪活動的危險性在增強”。^④

正是由於共產國際對中國農村武裝鬥爭落後性的懷疑，中共六大提出了對土匪問題的嚴厲政策。《農民運動決議案》第十項“對民團土匪的策略”認為，土匪的社會成分與貧苦農民有聯繫，是“因無法為生而去當土匪”，“所以黨應當加緊在裡面的工作，宣傳土地綱領，成立秘密的組織與黨的支部，來吸引這些武裝群眾”。^⑤而在《蘇維埃政權組織問題決議案》第十項“對土匪的關係”中則提出，僅在暴動前才可以與土匪聯盟，“暴動之後宜解除其武裝並嚴厲的鎮壓他們”，並認為“這是保持地方秩序和避

①《共產國際執委會東方書記處關於中共軍事工作的訓令》（不晚於1928年5月4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7），第439頁。

②《工農紅軍參謀部第四局關於南昌起義會議速記錄》（1927年9月14日於莫斯科），《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7），第56頁。

③《阿爾布列赫特給共產國際執委會的信》（1928年2月29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7），第357頁。

④《斯卡洛夫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組織部和東方書記處的書面報告》（不晚於1930年12月28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9），第556頁。

⑤《農民運動決議案》（1928年7月9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4），第364頁。

免反革命死灰復燃之必要的先決的前提”，“他們的首領應當作反革命的首領看待，即令他們幫助暴動亦應如此。這類首領均應完全殲除。土匪而浸入革命軍隊或政府中，便危險異常。這些份子必須從革命軍隊和政府機關中驅逐出去，即其最可靠的一部分，亦只能利用他們在敵人後方工作，絕不能位置他們於蘇維埃政府範圍之內。”而在第十一項“對迷信與半迷信的農民武裝組織（紅槍會等）之關係”中提出的政策是“奪取其群眾，孤立其首領，並乘機改編之”。^①

這種嚴厲政策在原則上雖有一定道理，但太過粗糙，明顯脫離實際。首先，兩個決議本身就有矛盾，前者似乎把脫離生產的土匪和一般農民自衛武裝混在一起，籠統提出“吸引這些武裝群眾”；而後者把職業土匪和紅槍會等農民自衛武裝明確區分，提出不同的政策，對土匪是嚴厲鎮壓，對紅槍會等是乘機改編。其次，對土匪武裝暴動前利用、暴動後鎮壓，對土匪首領“完全殲除”，這樣的政策完全脫離實際。因為暴動不止一次，土匪武裝也不止一支，一次暴動採取了這種“過河拆橋”的政策，就足以把其他土匪武裝推向敵對的一邊。

紅軍創建初期的實踐中對政策做了靈活的變通，否則將很難通過改編土匪武裝迅速發展壯大。當時紅軍處於敵人圍攻之中，與中央的聯繫時斷時續，有很大的自主權，紅軍面對危急複雜的形勢，只有採取符合實際的政策才能生存發展。1929年9月，陳毅在給中央的報告中提到，紅四軍對於投誠的土匪，“均歡迎其加入紅軍，紅軍是一個大爐子，可以把他們熔化，常常是首領不幹，群眾自願幹，結果首領為他的群眾所推翻。前委不主張硬性的消滅首領的辦法，奪取了群眾，首領自然成了廢物。”^②

八七會議以後相當一段時間內，紅軍都強調對土匪武裝要真誠相待，要當成階級兄弟，而不僅僅是利用他們。雖然在1929年初柏路會議已經

^①《蘇維埃政權組織問題決議案》（1928年7月10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4），第399、400頁。

^②《陳毅關於朱毛紅軍的黨務概況報告（二）》（1929年9月1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5），第786頁。

傳達了六大決議，但紅四軍的《告綠林弟兄書》還是體現出對土匪武裝的友好態度：“土豪劣紳為你們取一個名字叫土匪，土匪成了極惡劣最下賤而兇惡的東西”，但是“共產黨與紅軍並不以為你們可惡”，“因為你們與我們都是無田耕、無工做、無衣穿、無飯吃、無屋住的窮朋友”。土匪生活痛苦危險，是沒有希望的，“出路只有一條，就是與紅軍齊心合作，受共產黨指揮”，“又能長進學得政治軍事的本領，又能夠有幫助不致單獨孤立受壓迫”，“家裡也可以分得田地”，最後是熱情地召喚，“弟兄們快來啊，我們紅軍歡迎你！”^①

不過，六大決議也是有深刻依據的，初期以開放態度收編的大量土匪武裝含有很多毒素，必須通過深刻的改造才能消除，否則將危及紅軍的信仰和組織原則，導致紅軍墮落變質。土匪和革命者雖然同是現存制度的反對者，但是兩者有很大不同。土匪的反抗是消極的，並沒有建立新社會的宏偉理想^②，因此雖然人數眾多，卻很難成為有組織的政治力量。土匪活動是破產農民自發反抗的一種，他們鬥爭的主要目的是滿足自身的物質需求，憑藉著武裝從事搶劫、姦淫等暴力活動，受害者既有地主、富商，也有普通的農民，他們很少遵循什麼原則，往往隨心所欲，具有很大的野蠻性和破壞性，“一般土匪雖前身是個農村失業的農民，但做起土匪來便沒有了農民意識，不管三七二十一要搶之。”^③由於他們並沒有新的建設性理想，因此並不從根本上反對現存制度，只要統治者表現出寬容，他們很容易接受招安，搖身一變成為現存制度的捍衛者，如閩西大土匪郭鳳鳴、陳國輝、盧興邦等。

紅軍是共產主義者領導的武裝集團，信仰上摒棄私有觀念，有著推翻舊社會、建設新社會的宏偉理想，對現存制度毫不妥協，其思想和組織與

①《告綠林弟兄書》（1929年），《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中冊，第473-476頁。

②法國學者畢仰高對自發的農民反抗有比較細緻的研究，見Lucien Bianco: Reflection on Chinese Peasants and Revolution, Peasants without Party, New York: M.E.Sharpe, Inc., 2001, p16—p35。

③《中共福建省委巡視員練文瀾巡視莆田工作報告》1929年4月26日收，《福建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929年上甲），186-187頁。

當時中國一般軍隊有極大不同，更不是掙紮圖存的土匪武裝所能想像的。然而，依據新的信仰和組織原則創建一支新式軍隊決非易事，甚至直到1929年夏，毛澤東對自己親手創建的紅四軍仍很不滿意，在《給林彪的信》中說：“稍為進步一點的軍隊，就需要規律化，像紅軍本來這種‘爛糟糟’現象，我們只好認它是一種原始的遊民的隊伍的現象，要極力和這種現象鬥爭。”^①“鬥爭”的結果就是在紅軍建設歷史上具有重大意義的“古田會議”。紅四軍尚且如此，收編的土匪武裝要成為真正的紅軍，更要經歷思想和組織改造的過程，這是艱難曲折的信仰傳播過程，也就是陳毅所說的在紅軍大熔爐中熔化再造的過程。

土匪武裝有長期劫掠生涯中形成的惡習，也有特有的組織結構，因此改造土匪武裝是相當艱巨複雜的工作。比如贛西南紅軍中土匪成分很多，“二、四團紅軍大部分吃鴉片，打仗要發餉，二十五縱隊是大部分老弱與流氓吃鴉片煙的，於都遊擊隊多半是由收編土匪成立的，有三分之二是三點會份子，信仰大哥，三點會的大哥才能指揮作戰和解決內部問題，時常向大哥要把打反動派的勝利四六開分紅發用錢。”^②湖南省委逐漸認識到：“若沒有群眾的革命勢力與革命環境來熔化土匪的根性，對雪峰山的隊伍，是沒有保證他們不叛變的”。“土匪是不易變為革命遊擊之可靠的紀律化的戰士”，“他們的生活解決後，他們沒有政治的認識，因此便沒有其他的目的與需要了”，“習慣嫖賭吃喝的浪漫生活，也就沒有迫切革命的要求了。並且他們很可以把很多的不穩定性與浪漫性帶到革命的隊伍中來，因為他們過慣了浪漫生活，決不能過艱苦的長期革命紀律性生活。所以到了危險難苦交加的時候，便要發生叛變的行為。”^③閩西黨組織也發現：“土匪流氓雖是失業及豪紳刮民黨剝削所形成，但脫離生產日久，沒生

① 毛澤東：《給林彪的信》（1929年6月14日），《毛澤東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0頁。

② 《黎日暉關於贛南工作的綜合報告》（1931年10月6日），《江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931年），第181頁。

③ 《中共湖南省委對益陽工作的指示》（1929年11月26日），《湖南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甲7，第362、368頁。

產能力,生活特殊化,破壞力極大”,“收編後,應即將其分數,或調其離開原駐地,但在政治主張及政治影響上黨絕對不能對他讓步”。^①

要改造土匪武裝,使之變為真正的紅軍,首先要打碎其原有的組織結構。土匪武裝的組織結構大致可以分成四種:第一種是匪首專制,匪首有絕對的權威,這是發育到比較高級的組織,往往是大股土匪;第二種是比較平等的合夥制,權力分散,通過商量決定行動,搶劫所得按照槍支等來分成,如湖南雪峰山土匪,“領袖是以槍之多少為標準推選的”,“軍事行動是以會議式的決定,經濟的分配,除有槍階級提出槍費外,餘則平均分配”^②;第三種是從傳統的宗族演化而來,通常是在那些土匪化的地區,如閩西某些地區的土匪“是一種氏族組織,一房的土匪,團結在一房的豪紳勢力之下,一姓的土匪,團結在一姓的豪紳勢力之下”^③;第四種是會黨土匪,在贛南很普遍,前面提到土匪成分較多的於都遊擊隊,只有三點會的大哥才能指揮。

關於改造土匪武裝的細節,保存下來的資料不多,總的來說紅軍在實踐中表現出更大的耐心。以改編井岡山王佐部為例,何長工1928年初奉毛澤東之命隻身進入王佐的部隊,當時王佐部雖然打起了紅旗,但還是為所欲為,“一下山就發洋財、殺人”,“我們在山下發動群眾,他們卻到處搞老百姓的東西,破壞老百姓的利益。他們不聽共產黨的話,人要往東他偏往西,你實行這個政策,他給你破壞。這樣山上山下就發生了尖銳的矛盾。”毛澤東叮囑何長工:“要快,但是又不能犯急性病,要講究藝術”,“你是打前站,以後還要派。你的工作能做到請求派人去,就是做到家了。現

①《中共閩西黨第二次代表大會日刊》1930年7月8-20日,《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上冊),304-305,308頁。

②《中共湖南省委通告(第七號)》(1929年11月5日),《湖南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甲7,第335頁。

③《趙亦松關於福建工作情況的綜合報告》(1928年7月29日),《福建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928年下甲),第90頁。

在如果派人多了，會引起人家懷疑的。”^①

何長工上山進入王佐部隊後，發現“事情要比預料的困難得多”。王佐戒心很重，把他安排在離司令部較遠的一處小房子裡，還派了一個“頗不簡單”的勤務兵負責監視，並警告何長工不要隨便走動，實際是暗示他“不許私下活動，不准與士兵接近”。何長工只能耐心地先接近王佐親屬和心腹部下，逐漸取得信任，動員王佐的母親勸他不要亂殺人。民團頭目尹道一是王佐最害怕的死敵，何長工借紅軍之力幫助王佐消滅了尹道一，這給王佐很大觸動，此後改造工作才真正開始。何長工先提出王佐的部隊唱歌不齊，派出一些士兵下山到紅軍中學唱歌。通過唱歌、演戲向王佐部傳播革命道理，這是野蠻搶劫生涯中聞所未聞的，引起了士兵們濃厚的興趣。然後，何長工又組織軍官和士兵到紅軍部隊參觀，官兵平等、經濟公開的紅軍制度讓他們覺得新鮮和羨慕，“甚至有的士兵參觀後，都不想回來了”。很快，“士兵們開始了新的生活，剃去了長髮，換上了新軍衣，學唱歌，學演戲，茨坪山上充滿了新的氣象”。改造工作中比較困難的是克服軍官的阻力，在部隊中組織士兵委員會和廢除打罵現象，在士兵的群體壓力下，新的制度逐漸建立起來，王佐、袁文才部改編為32團，成為紅四軍三個主力團之一。^②

首領在隊伍中影響很大，也是改造土匪武裝的關鍵。毛澤東親自做井岡山袁文才、王佐的工作，他利用一切機會找袁、王談話，給他們講政治形勢。袁、王對毛澤東很信服，有一次毛澤東和王佐談了多半夜，事後王佐興沖沖地說：“毛委員是最有學問的人，跟他談上一次，真是勝讀十年書啊！”王佐原來長年困居深山，連電燈都沒有見過，下山到湘南參加迎接朱德部隊的征戰，才見了世面，打破了蒙昧的精神狀態，似乎看到了革命的遠大前途，“內心起了很大變化”，主動提出加入中國共產黨。^③

^① 何長工：《井岡山的星星之火》，《星火燎原未刊稿（1）》，解放軍出版社2007年版，第89、90頁。

^② 《何長工回憶錄》，第122—132頁。

^③ 《何長工回憶錄》，第128、130、131頁。

對土匪武裝的改造最後還要落實在組織和成分上，也就是派入革命幹部和增加淳樸農民成分。在取得袁文才的信任後，毛澤東不失時機的派得力幹部到袁部擔任連長、副連長、排長職務，幫助練兵，“培養革命幹部”，“傳播革命種子”。^①王佐初步接受革命思想後，也主動要求派遣幹部，先後有二十幾位幹部奉派到袁、王部工作，游雪程任政治處主任、徐彥剛任參謀長，其他同志分別擔任各營、連長和黨代表，“部隊建立了黨的組織，黨員的人數一天一天增多”。^②在湖南省委巡視員杜修經的報告中也談到，32團士兵成分“多土匪與流氓無產階級，因軍隊整理的嚴，這些分子多逃跑，參加了一些新的農民進去，有同志二百餘人”^③，這支部隊逐漸成為共產黨領導下的革命軍隊。毛澤東對袁、王的評價是：“這兩個人雖然過去當過土匪，可是率領隊伍投身於國民革命，現在願意向反動派作戰。我在井岡山期間，他們是忠實的共產黨人，是執行黨的命令的。”^④

紅軍改造土匪武裝取得了相當的成功，來源於土匪武裝的力量成為紅軍建軍初期的重要組成部分。當時紅四軍的主力，除了秋收起義部隊編成的31團和南昌起義部隊編成的28團，就是袁、王部隊改編的32團。1929年初湘贛兩省敵軍3萬餘人圍攻井岡山，紅四軍主力下山向贛南、閩西遊擊（袁文才隨隊），王佐部協同留守的彭德懷紅五軍與敵軍殊死戰鬥。井岡山失守後，紅五軍突圍，王佐在極其困難的情況下並未動搖，仍率餘部堅持在山上與敵人周旋。當時“敵人對王佐也進行了很多分裂活動，叫王佐投入國民黨，給官做，發大財。王佐和王佐部隊經過改造和鍛煉，此時表現得很堅決，很能打。”^⑤湘贛邊特委的報告中提到：“五井破後，王佐部隊仍埋伏于五井山上，分散力量減少目標。後來敵人數次搜山，王佐曾與敵人鬥爭，無大損失，惟其舊部歷史甚久的綠林弟兄反水者甚多”，“王

① 陳伯鈞：《毛委員率領我們上井岡山》，《星火燎原》（1），第163頁。

② 何長工：《改造王佐部隊》，《星火燎原》（1），第211頁。

③ 《中共湖南省委巡視員杜修經的報告》（1928年6月15日），《湖南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甲6，第39頁。

④ 愛德格·斯諾：《西行漫記》，三聯書店1979年，143頁。

⑤ 《何長工回憶錄》，第216頁。

對特委尚表現信服，對革命亦尚有決心”，^①可見32團在保衛井岡山的戰鬥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贛西南紅軍主力二、四團中土匪成分也很多，但1929年春與紅四軍會師後，二、四團的組織紀律性給毛澤東留下深刻印象，甚至認為連紅四軍都比不上。他在《給林彪的信》中提到：“至於二、四團，四軍的同志見了他們直是慚愧萬分，他們是指導員支配軍官的”，“一個子彈不問過黨不能支配，他們是絕對的黨領導”。^②綠林首領出身的段起鳳是贛西南紅軍重要將領，先後擔任二團副團長和四團團長，陳毅1929年在給中央的報告中說：“段月泉很有進步，能懂得政策，受黨之指揮”。^③李文林1930年在他的履歷上寫到：“以前是個贛南的洪家首領，1927他曾領導武裝群眾（土匪）來參加土地革命”，對於黨“非常忠實，工作能力很好，並且絕對的服從黨的命令”。^④

四、清洗——信仰力量轉化為組織力量

紅軍以寬容的態度吸收土匪武裝，以很大的耐心進行改造，但隨著紅軍日益強大和走向正規化，紀律要求越發嚴格，紅軍領導者逐漸發現溫和的改造並不總能成功，難以改造的成分不得不通過嚴厲清洗解決。一般而言，長期形成的觀念和行為方式不易改變。土匪的作風是極端的自私，是搶劫他人財物據為己有，而共產黨的信仰是摒棄私有觀念。長期土匪生活留下的烙印，使不少人難以轉化為合格的共產黨員，有些人在艱苦的鬥爭中叛變投敵；還有人雖未叛變，卻經常破壞紀律。內心信仰是否真誠難以考察，但是外在紀律卻有嚴格標準。鐵的紀律是共產黨和紅軍戰鬥

①《湘贛邊特委信》（1929年3月17日），《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上冊，第61頁。

②毛澤東：《給林彪的信》（1929年6月14日），《毛澤東文集》第一卷，第67頁。

③陳毅：《關於贛南、閩西、粵東江情況的報告》（1929年9月1日），《中央革命根據地歷史資料文庫——軍事系統》（9），中央文獻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07頁。

④《贛西南特委代表李文林關於特委幹部履歷的報告》（1930年6月4日），《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上冊，第609—610頁。

力的來源，是生死攸關的問題，在殘酷的鬥爭環境下，絕不會有任何寬容，紅軍中不能融合的土匪成分只能嚴厲清洗，信仰力量也由此轉化為組織力量。

在閩西蘇區，地方紅軍中某些土匪成分逐漸顯露出危害性，不少收編的土匪如永定黃豺狗、龍岩劉烈波等先後叛變，造成很大的損失，原來比較寬鬆的收編政策不得不改變。1930年3月，閩西第一次工農兵代表大會公佈了更為嚴格的政策：“集團土匪要求收編者，要有革命事實表現，如打土豪、槍斃反動等，始得予以收編”，“集團土匪收編後，應遵守紅軍紀律，聽從政府指揮”，“集團土匪收編後，由政府派政治軍事人材指導其工作”，“幫助土豪打工農的土匪，政府應解除其武裝，懲辦其首領”。^①

由於土匪成分的影響，閩西某些地方組織竟出現了“土匪化”傾向，這也說明共產國際的擔憂是有道理的。閩西特委提到在永定縣太平裡“曾做土匪工作，但無成績。現在還有一部分同志土匪化了。”^②福建省委指出，為瞭解決經濟上的困難，“閩西各縣都有一種‘視綁票為我們唯一的工作’的傾向”，引起“我們就要變成土匪黨”的危機。^③羅明在報告中指出：“永定、龍岩、平等地的黨中，綁票和暗殺的風氣很普遍，這一問題很覺得嚴重。特別是綁票工作，可以使黨受很大的危害”。“綁票取款是土匪的方法，我們做起來有兩種惡影響”：容易使黨員腐化，脫離群眾工作；“使群眾對黨的認識模糊”，“群眾會把我們當作土匪”。^④中共福州中心市委報告提到，連江縣“遊擊隊的行動那不過是土匪而已。他們整天就是計畫去打某一地方的目標，並不是單純站在剷除這裡群眾鬥爭的障礙，幫助群眾自動鬥爭，相反的他們的前提是要看弄得錢，因此公開綁票和攔途劫掠

①《優待士兵條例》(1930年3月25日)，《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下冊，第79頁。

②《中共閩西特委報告》1929年5月11日，《福建革命歷史文件彙集(閩西)》(1928—1936年)，51頁。

③《中共福建省委對平和縣今後工作的指示》(1928年12月25日收)，《福建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928年下甲)，第352頁。

④《羅明關於閩西情況給福建省委的信》(1928年10月10日收)，《福建革命歷史文件彙集(閩西)》(1928—1936年)，第25頁。

的行為也有(如縣委鄭同志為著縣委要他負責在某限期籌一千元錢,他就指揮隊員在丹陽到縣城的路上,去搜掠行路人的腰包)”。^①福建省委對龍岩縣委的綁票活動提出嚴厲警告:“綁票不是黨的工作,是土匪的工作。省委前信已嚴厲的指出,並警告你們,以後的胡亂行為,定予以嚴重的處分。”^②

土匪成分和土匪作風對於黨內關係也有嚴重的危害。福安中心縣委書記詹如柏與福安、壽寧、霞浦、寧德等地土匪都有來往,“一些土匪頭子認為他仗義豪俠,還同他結拜把兄弟”,這還是符合聯絡土匪政策的。但是他把很多土匪作風帶到黨內,“如在壽寧,他對範浚有意見,便推舉範鐵民,而把範浚夫婦給暗殺了。陳亮也是被他當成反革命殺掉的。施霖與他有矛盾,他也曾揚言要幹掉施霖”,試圖暗殺葉飛的刺客也與他有牽連。^③以土匪手段處理黨內關係,危險不言而喻,共產黨能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堅持戰鬥並發展壯大,就是靠由鐵的紀律維護的黨內團結統一,土匪作風對黨組織危害極大。

1930年6月,毛澤東領導紅四軍前委^④和閩西特委聯席會議做出關於“流氓問題”的決議案,指出“與流氓意識爭取領導權是現在紅軍中最嚴重的任務”,進而提出嚴厲的“洗刷”政策。雖然決議中列出了多種流氓職業,不專指土匪,但其中列在第一位的是土匪。決議中羅列了多達九種流氓的惡劣特性,包括“反組織的(反紀律的、反團結的、個人自由的)”、“個人享樂主義(大嫖、大賭、大吃、大著)”、“僱傭性重”、“破壞性重”、“階級意

①《中共福州中心市委關於巡視連江工作報告》(1933年11月10日),《福建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福州)》(1933—1934年),第148頁。

②《中共福建省委對龍岩縣委意見的答覆》(1929年1月4日),《福建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929年上甲),第11頁。

③曾志:《一個革命的倖存者——曾志回憶錄》上,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6頁。

④1930年5月4日毛澤東代表前委給安遠、於都、會昌、贛縣四縣邊界特委寫了一封指示信,提出對土匪流氓的策略:既要積極爭取他們,把他們的力量用於對統治階級的鬥爭,又要防止他們的消極因素,在紅軍赤衛隊及蘇維埃中不能占多數、不能居於領導地位。(見《毛澤東年譜》,第306頁)此信與6月關於“流氓問題”決議案提出的“洗刷”政策精神上略有不同,主要因為安遠、於都、會昌、贛縣四縣邊界是新開闢的遊擊區,還在創建初期,所以要積極爭取各種武裝。

識模糊”、“反群眾”、“反社會主義”、“盲動主義(大燒、大殺、大搶)”、“流寇主義(沒有政權觀念)”。因此,“可以斷定流氓是沒有積極的革命性的,反之,一般說來他們具有充足的反革命性。他們在不得已時可以投機加入革命隊伍,但他們始終是動搖的,隨時有叛變作反革命走狗的可能”。“他們是破壞紀律最厲害的。他們的利益與整個鬥爭群眾的利益是違反的。他們在作戰上亦畏縮不前,雖有時表現勇敢,但他們是為了個人出發而勇敢”。“遊擊戰爭中的盲動主義和流寇主義都是他們的表現。每次拖槍逃跑的也都是他們。這些分子如不洗刷出去,把工農革命分子參加紅軍、赤衛隊以代替他們,改變紅軍赤衛隊的組織,則這樣的紅軍、赤衛隊是很危險的。只有把他們洗刷出去,才能健全紅軍、赤衛隊,執行偉大的階級任務”,“必須有計劃的以工農鬥爭分子來代替流氓”,“特別在黨內要洗刷流氓成分”。^①

1930年7月,中共閩西黨第二次代表大會檢討對土匪成分過於寬容的政策,提出“必要時可解決其土匪領袖甚至全部”的嚴厲措施。決議認為“過去閩西黨對流氓階級的經濟背景及其在革命中的動搖性認識不清楚,過分估量他們的革命性”,“只是一味拉攏土匪,無條件的收編為赤衛隊”,“甚至收編以後已在地方上幹出‘打農民保土豪’的反革命勾當來”,“還依舊對他敷衍,不採取斷然處置”,“有些土匪調到前方去的已經表現了動搖,也不先發制人,甚至被逃跑留為禍根”。“這是由於過分估量土匪的革命性,尤其是過分看重他們的武裝力量”,“客觀上是放去了當地廣大群眾之發動,如龍岩先後收編劉烈波、謝老媽、謝田狗,永定收編黃豺狗等”,“結果,有些地方因土匪對於群眾的壓迫,喪失了黨在群眾中的威信。土匪因過慣了搶掠生活,不能受革命的紀律,終於投到反革命方面去,向我們進攻。以後應打破對於流氓土匪的幻想,雖然有時可利用,但須在不妨礙黨爭取群眾的條件之下,在政治上不可有絲毫的讓步,必要時可解決

^①《流氓問題——紅四軍前委閩西特委聯席會議決議案》(1930年6月),《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中冊,第513—515頁。

其土匪領袖甚至全部。”^①

土匪成分影響嚴重的主要是地方部隊，在“洗刷”鬥爭中上級黨組織的幫助發揮了重要作用。巡視員許依華發現安溪、永春的黨“用拉夫式的拉進許多流氓、土匪”參加黨和遊擊隊，這些人“在內面破壞黨的工作”，使得安溪遊擊隊“寧可說是變相的土匪和流氓。隊員十一人，四人是土匪和流氓，而有破壞遊擊隊的陰謀，二人有土匪意識而受土匪的煽動，一人是有土匪意識的貧農分子”，只有四人是黨團員，而且“幾個土匪把遊擊隊所有的駁殼槍把持在他們手裡，我們好的隊員，通是壞槍”。這些土匪出身的隊員勾結反動武裝、辱罵團省委巡視員、煽動不滿情緒、主張有錢大家分。幾個黨團員“不敢向土匪鬥爭”，“甚至黨的會議為怕土匪嫌疑我們，不敢開了”，“遊擊隊成為土匪領導的遊擊隊，而不是共產黨的遊擊隊”。針對這個嚴重問題，巡視員與當地黨團幹部“會議上決定”，“儘量引進積極的貧農入黨，對所有的土匪完全淘汰”。通過秘密計畫，遊擊隊最終成功淘汰了土匪分子，收繳了土匪把持的槍支，“安溪遊擊隊從此才正式在黨的手裡”。^②

1932年4月紅軍攻佔福建漳州後，幫助漳州中心縣委建立了地方紅軍獨立三團，期間收編了不少土匪武裝。但實際上，這些人只是認為紅軍勢力大，有升官發財的機會，紅軍主力撤走後，形勢非常嚴峻。土匪首領王奕修煽動隊員說：“我們辛辛苦苦的去打土豪，所得的經濟，都是外江人與海南人所保持，我們每月只得到八元的生活費，這樣的替人家做奴隸有什麼用處。”^③漳州中心縣委書記蔡協民警惕性不夠，“投機與土匪分子還要提拔為連長、副團長。因此一般的投機與土匪分子更乘機大活動，整個第五連幾乎都被反革命土匪把持”，他們“勾結豪紳地主民團，企圖暗殺縣

①《中共閩西黨第二次代表大會政治任務決議案》（1930年7月30日），《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中冊，第213-214、225頁

②《許依華巡視泉屬報告》（1932年5月25日），《福建革命歷史文件彙集（廈門）》（1929—1932年上），第204-208頁。

③《廈門市委巡視員老黃關於漳州中心縣委工作的報告》（1933年11月9日），《福建革命歷史文件彙集（廈門）》（1933-1935年），164-165頁。

委團部負責同志，準備帶隊伍叛變”。這時黨組織才警覺起來，“決定召集靠得住的紅軍同志分配到各連”，將懷疑參與陰謀的人扣留，包括副團長王奕修、第五連連長洪振龍、副連長侯法、班長大笨、隊員牛煥、陳煙楨、負責守土豪的黃盛、清糧等，除洪振龍押解途中逃跑外，上述七人被士兵代表公審判處死刑。^①但是，土匪出身的漳州第五區常委葉火是被處決的王奕修的結拜兄弟，他與逃脫的洪振龍聯絡，煽動五區遊擊隊叛變，殺死了遊擊隊政委和五區所有負責同志，可見當時清洗鬥爭的尖銳和殘酷。^②

在閩東地區遊擊隊中，肅清土匪成分成為一場純潔內部的嚴重鬥爭。建甌、莆田、福安、連江等縣招兵買馬建立的遊擊隊中，混進了不少土匪流氓等壞成分，打仗時難以調動，卻常發生搶劫、強姦、隊員帶槍跑等惡劣事件。1933年1月，在連江遊擊隊“以李德標為首的八九個人被透堡民團所收買，以‘反對經濟不公開’等口號蠱惑人心，竟將縣委書記和支隊長拘押，圖謀率隊投敵”。^③市委領導陶鑄聞訊後採取果斷措施，“徵調最好的同志組織一特務隊”，將叛亂的土匪成分“一網打盡”，“解決八人，被捕七人，一人在逃，組織革命法庭，在慶祝肅反勝利群眾大會中，為首三人執行槍決，其餘逐出遊擊隊”。^④連江黨組織逐漸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遊擊隊中的原土匪成分膽大妄為，很有破壞能量。葉飛認為：“一支百把人的遊擊隊，只要有五六個‘土匪’分子，就能控制這支隊伍，改變政治方向，發生變質為土匪部隊的嚴重危害”。1933年10月連江召開縣委擴大會議，討論清洗遊擊隊中的土匪成分，有的領導人“只見到他們敢沖敢殺的一面，對純潔內部有不同看法”，但多數同志認為“能不能純潔內部，這是能不能保證遊擊隊不變質、牢牢掌握在黨的手裡的關鍵問題”。縣委最後統一了

①《中共廈門市委巡視員黃關於漳州紅軍第三團肅反的報告》（1933年8月14日），《福建革命歷史文件彙集（廈門）》（1933-1935年），79-81頁。

②《廈門市委巡視員老黃關於漳州中心縣委工作的報告》（1933年11月9日），《福建革命歷史文件彙集（廈門）》（1933-1935年），160頁。

③《葉飛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版，第35頁。

④《陶鑄關於福州的工作報告》（1933年5月1日），《福建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福州）》（1933-1934年），第64頁。

思想，決定對原土匪成分中“比較好的可以酌情留下”，品質不好的堅決清除。^①經過清洗的遊擊隊成為堅強的隊伍，在蘇區失敗後的三年遊擊戰爭中，克服了難以想像的困難，終於堅持下來，後來成為新四軍的骨幹。

1930年3月井岡山錯殺袁文才、王佐是無法回避的重要事件。袁、王雖然是綠林出身，但不同於一般的收編土匪，他們早在秋收起義前就已經參與了寧岡地區的革命活動，1927年迎接秋收起義部隊上山，對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創建做出了重大貢獻。二人先後入黨，成為紅軍高級將領。處決袁、王事件解放後被定為錯殺，但這一事件的發生也並非偶然。實際上，由於長期綠林生活的影響，袁、王雖然投身革命，並且經歷了許多鬥爭的考驗，但是最終還是難以達到共產黨員和紅軍將領的標準，這是錯殺悲劇發生的重要原因。共產黨員的基本要求是對共產主義的信仰，首先體現在對私有觀念的批判。紅軍是共產黨領導的有信仰的軍隊，嚴格遵循“黨指揮槍”的原則，具有鐵的紀律，與私人軍隊有根本的不同。袁文才、王佐參加革命後，雖然發生了不小的轉變，但是仍然沒有完全擺脫私人軍隊的觀念，不能完全融入革命隊伍。

1929年陳毅到上海向中央彙報時就提到，1928年4月朱毛紅軍會師後，“袁王為保存自己的老巢，很不願朱部及湘南農軍這樣多人在寧岡”。^②1929年初紅四軍為擺脫敵人圍攻出擊贛南時，毛澤東做了很多工作，說服袁文才隨軍下山。臨行之際，毛澤東對留守井岡山的彭德懷說：“袁這人很狡猾，名堂很多，他已同意隨四軍政治部工作，這就可減少井岡山以後工作的困難”，^③可見毛澤東也不得不把袁文才當做一個問題人物。

在1929年初轉戰贛南過程中，時任紅四軍參謀長的袁文才竟然私自逃回井岡山，他的逃歸不是戰鬥中沖散，而是精心策劃的離隊。紅軍有嚴格的紀律，開小差是嚴重違反紀律。紅四軍下井岡山後，遭到敵軍圍追堵

①《葉飛回憶錄》，第35-36頁。

②《陳毅關於朱毛紅軍的黨務概況報告(二)》(1929年9月1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5)，第776頁。

③彭德懷：《彭德懷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43頁。

截，連戰不利，為擺脫敵軍，在冰雪中晝夜行軍，甚至司令部遭敵襲擊，毛澤東、朱德險遭不測，處境十分險惡。紅四軍前委報告中說：“第四軍從井岡山出發以來，總計損失約二百餘槍、六百人”，“此次困難為自有紅軍最大之困難”，但是雖然困難，“士兵開小差的極少”，只有“幹部袁文才等數人脫離隊伍”。^①在給中央的報告中點到了袁的名字，可見毛澤東對作為高級將領的袁文才擅自離隊極為憤怒，因為這清楚地表明：在最困難的局面下，袁的革命立場已經動搖。

袁文才回到井岡山後，對王佐產生了不良影響，與地方黨組織發生尖銳矛盾。據說袁看到了六大決議中對土匪首領的嚴厲政策，由此產生了離心傾向。何長工當時留在井岡山擔任湘贛邊特委常委，王佐說袁文才“開小差逃回來了，怕上級知道後會殺頭，所以躲著不敢出來”，何長工為了繼續爭取袁，批評之後還讓他擔任寧岡縣委副書記。^②在紅四軍離開井岡山以前，由於紅軍的力量以及毛澤東等領導人的威望，袁、王與地方黨組織的矛盾還不突出。隨著紅四軍和紅五軍相繼離開，袁、王部隊成為井岡山主要武裝力量，他們對地方黨組織比較輕視，加之傳統的土客籍矛盾，“黨指揮槍”原則逐漸難以實行，引起湘贛邊特委對袁、王的不滿加劇。

1929年2月，楊克敏在湘贛邊特委報告中提出了“土匪問題”，認為這個問題“得不到適當解決，也是一樁阻礙進展的障礙，比如我們過去用外交手段拉攏袁、王，而沒有同時注意去奪取其群眾，以此長久的和他辦外交，有許多政策為了要遷就他而不得實行，或者至少要轉許多周折才能夠實行，這樣的瞻前慮後去做事，又怎能暢行順手呢？”。在分田問題上，客籍聚居的第四區由於“客籍領袖袁文才出面反對”，分了兩次，“終以土客籍的紛爭很難解決”。報告還認為袁、王雖名義上入黨，但並不是真正的共產黨員，“袁、王二人都非常狡猾，且有力量，對黨的認識很薄弱”，“二人根本無改變之可能，因為一則不接受批評，二則不看黨的書報（王不識

^①《紅四軍前委關於攻克汀州及四、五軍、江西紅二、四團行動方針等問題向福建省委和中央的報告》（1929年3月20日），《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中冊，第68頁。

^②何長工：《回憶中央蘇區的有關歷史》，《回憶中央蘇區》，第98頁。

字),只相信自己萬能,槍桿子萬能而已,對我們的政策,常常是面是而心非”,“我們與他們利益的衝突,終久是要爆發的”。^①

1929年夏,鄧乾元在《湘贛邊工作報告》中反映出黨組織對袁、王武裝的更加懷疑,正式提出解決袁、王的三方案。報告認為,“本來邊界的政權並不是真正的共產黨所領導的政權,而是與土匪合作的聯合政權”。“袁、王現在對我們處處懷疑,袁有另找出路脫離我們的象徵,王在袁的影響之下,亦與我們的關係日趨惡化”,然後提出“對此問題,邊界原有三策,第一是調開,此為上;二是敷衍以圖安為中;三照六次全會的指示解決之,此為下策”。^②彭德懷率紅五軍回到井岡山,形勢得到一定控制,王佐特務營在與紅五軍協同作戰中表現尚好。不過,省委巡視員張懷萬(即江漢波)提到:“第三縱隊,原定將袁王部編五百槍,但我離開贛西時,尚未編成,則以袁王多問題故也”。^③

彭德懷在1929年10月給湖南省委的報告中也對袁、王提出嚴厲批評,提到袁、王的隊伍“不管自耕農、小商人,甚至佃農,都不分皂白的捉來,罰一二石米穀或數十元後釋解,以致弄成有所謂米土豪,谷土豪之譏笑”。“還有更好笑的,什麼‘牽牛政策’,即是某鄉的農民被豪紳利用而不革命的,他們令其赤衛隊率領赤色區域內的農民將那胖豬、耕牛、白羊以及雞、鵝、鴨、兔等物一概拿個乾淨,打成大包給牛馱回,甚至有人捉來,‘有錢見父母,無錢見閻王’,使一般工農群眾多說是土匪,而不認為是赤衛隊和紅軍。這種‘搶產主義’的來源,就是王佐、袁文才二人所賜,也是他二人造成井岡山土匪化和個人信仰惟一的良策。因他兩在井岡山當大王已年深日久了,現在各個有經常老婆四五個,生活非常舒服”。“袁王二人老奸巨猾,守山成性,受不過勞苦,打不破惡習,為私人利益的結好,消

^① 楊克敏:《楊克敏關於湘贛邊蘇區情況的綜合報告》(1929年2月25日),《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上冊,第45、47、50-51頁。

^② 鄧乾元:《湘贛邊工作報告》(1929年5—8月),《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上冊,第123、131頁。

^③ 《中共江西省委巡視員張懷萬巡視贛西給中央的綜合報告》(1930年4月5日),《江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930年(一)甲),第99頁。

除舊意見，結成新團體。至五軍來湘鄂贛邊時，他更利用湘鄂贛邊地方主義，造謠五軍回平，不得來了，反被袁王的老部下拖回槍支近百數（內有一大隊黨代表乘打仗時拖去六十多支槍），他仍舊獨立行動，黨無法制裁和指揮”。^①

五軍政委滕代遠對袁文才、王佐更加不滿，早有殺袁王之心，最初只是由於毛澤東不同意才沒有實施。他在報告中說：“五軍與四軍在井岡山會合時，對袁王問題主要負責人提出討論，我主張很急堅決處（理）他們，經毛多方解釋，還是取容納訓練態度。朱毛離開井岡山時，並令袁文才同走，袁畏苦且傾向改組派，故在東固開小差回井岡山。據袁對特委負責人說，我要殺袁是毛告給他的，故對我們很畏怕，不敢會談。並造謠紅軍將消滅了，離間紅軍與工農的感情，派其黨羽來紅軍拖槍開小差，還是向外如關背、拿山、大浣、車坳、新城等處大殺大燒大搶，自美其名曰：‘打米土豪’，‘牽牛政策’，‘鞏固大小五井’（即王佐的巢穴），肅清動搖分子和反動派（凡反對袁王的就是），任意屠殺工農分子或同志，公然在湘贛邊特五次擴大會議上，手持卜子槍，口叫獨立等。”^②

雖然地方黨組織以及彭德懷、滕代遠對袁、王的評價可能有個人意氣成分，但是“黨指揮槍”的原則難以實行卻是毫無疑問的，這在中共黨內是必須解決的嚴重問題，在當時鬥爭殘酷複雜的形勢下，解決問題的方法常常是十分嚴厲的。1930年3月，地方黨組織對袁王長期積累的不滿爆發了，袁文才對此責任很大，影響了本來表現較好的王佐。一次彭德懷到王佐處，晚上傳令兵來接彭，竟使王緊張得拔出手槍來，而“袁未逃回以前”，王佐“對五軍是不懷疑的”，這當然也引起了彭德懷的警覺。^③袁文才捉到茶陵靖衛團頭目羅克韶，不但未殺，反而待若上賓，說是為了辦兵工廠，但

① 彭德懷：《關於平江暴動前後情況和經驗教訓》（1929年10月），《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歷史資料選編》第一冊，解放軍出版社2002年版，第313頁。

② 《紅軍第五軍軍委滕代遠給中央的報告》（1930年4月27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歷史資料選編》第一冊，第450頁。

③ 彭德懷：《彭德懷自述》，第142頁。

這卻不能不引起黨組織的懷疑。更有甚者，在永新縣城舉行的聯席會議上，袁、王不僅與湘贛邊特委而且和中央派來的巡視員彭清泉（即潘心源）發生激烈爭吵，王佐甚至把手槍拍在桌上，這樣的行為在共產黨和紅軍中是不可容忍的。袁、王不服從紀律，蔑視黨組織的行為被視為叛變，當夜邊區特委書記朱昌偕等親自到紅五軍駐地請彭德懷派兵，結果袁、王及其親信數十人被處決。事後贛西南特委通告稱“袁文才、王佐反對分田，反對建立蘇維埃，並勾結茶陵靖衛團擾害永新赤色政府，大會正式批准西路行委槍決袁、王兩個叛徒”^①。袁、王當時並未叛變投敵，因此處決他們確實是錯殺，但他們不能嚴格服從黨和紅軍的紀律，甚至仍把軍隊當成自己的私人武裝，是他們不能融合於革命隊伍而最終遭到清洗的重要原因。

嚴厲的清洗是紅軍成為一支強大軍隊的重要保證，不能因為蘇區幾次肅反擴大化造成慘痛損失而否定這一點。紅軍在動盪野蠻的農村中成長起來，在創建初期大力擴軍之後，必然吸入大量野蠻落後的因素，其中包括很多惡習難改的土匪成分，通過溫和的改造並不能解決全部問題，以嚴厲手段把信仰不堅定、不遵守紀律的分子清洗出去，才能創建信仰堅定、紀律嚴格的新型革命軍隊。事實上，共產黨和紅軍中對內部不良分子嚴厲清洗是其戰鬥力的重要源泉，共產黨軍隊高度集中統一，嚴格遵循黨指揮槍的原則，而國民黨軍隊常在派系紛爭中離心離德，這種差別最終成為決定國共戰爭勝敗的關鍵。雖然從現代法律和政治文明的角度來看，這種清洗是常常是相當殘酷的。

五、小結

在共產黨人通過收編、改造、清洗三個步驟解決土匪問題的過程中，表現出共產黨和紅軍中的信仰力量，以及由信仰力量轉化的強大組織力量。在紅軍和蘇區創建時期，共產黨為了迅速壯大革命軍隊，以開放的態

^①《贛西南特委通告》（1930年4月9日），《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中冊，第191頁。

度大量收編土匪武裝，土匪成分在紅軍中一度占不小的比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之後，紅軍對收編的土匪武裝進行了深刻的思想和組織改造，對難以改造的成分則通過嚴厲的清洗加以解決。隨著中央蘇區逐漸鞏固，紅軍走向正規化，除了蘇區邊緣的遊擊區，紅軍中的土匪成分越來越難以辨認了，紅軍逐漸成長為具有堅強信仰和嚴格紀律的革命軍隊。

同時，整個蘇區的民眾也被嚴密組織起來，土匪再也沒有生存的空間，在當時全國很多地區土匪仍舊肆虐的時候，蘇區的土匪問題卻得到了相當徹底的解決。閩西黨第二次代表大會決議提到，“閩西土地革命勝利已經有了一年的歷史，在這一年中工農得到了很大的勝利，社會上盜匪絕跡、煙賭肅清，生產上大大增加，真是實現了夜不閉戶、野無遊民的現象”。^①蘇區中央局決議也提到：“中央蘇區已有了貫通閩贛二十五縣疆土，在這疆土上普遍的成立了蘇維埃政權，有了相當的地方武裝，沒收了地主土地，並實行平分土地，消滅了土匪和乞丐。”^②

這初步說明，在當時動盪的中國農村，共產黨和紅軍已經成為最有能力恢復秩序的政治軍事力量。通過在偏遠農村中的艱難奮鬥，中國共產黨使得原本產生於城市的新政治信仰在落後的農村紮根，並把農村中的巨大人力資源嚴密組織起來，從而使動亂的廣大農村獲得了新的政治秩序，同時也為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獲得了取之不盡的力量源泉。雖然這一時期紅軍和蘇區規模仍然有限，但在艱苦奮鬥中生成的組織核心和農村工作方法卻有著不可限量的前途。在抗日戰爭初期混亂的廣大敵後、在日本投降後動盪的東北和華北，這個精悍的核心依靠久經錘煉的農村工作方法，迅速成長為巨人。共產黨和紅軍所遵循的是不同於舊黨派和舊軍隊的道德觀念和組織原則，是動盪的舊中國社會中的新型政黨和新型軍隊，有著巨大的戰鬥力和生命力，所以才能屢經挫折卻越戰越強，最終

^①《中共閩西黨第二次代表大會政治任務決議案》（1930年7月30日），《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中冊，第215頁

^②《目前政治形勢的分析與蘇區的緊急任務》（1932年2月19日），《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中冊，第337頁。

擊敗國民黨軍隊，成為主宰中國命運的力量。

從更廣大的世界革命的範圍來看，革命軍隊通常具有信仰和組織的優點，但是中國革命軍隊的創建又有其顯著的特殊性。法國、俄國、中國的革命常被稱為世界三大革命，法國大革命的國民自衛軍是由城市市民特別是巴黎市民在革命熱情鼓舞下組織的，他們早就受到先進思想的影響；俄國十月革命後創建的紅軍是由受革命思想影響的士兵和工人在共產黨領導下創建的，其力量中心是最先進的大城市彼得堡和莫斯科；而中國革命軍隊卻主要是在落後的農村，甚至是農村中蠻荒的偏遠地區創建成長的，士兵主體是保守落後的農民，其中包含不少農民中最野蠻的土匪成分，先進的革命思想和落後的農村環境形成了巨大的矛盾，中國紅軍的創建在這種深刻矛盾的搏鬥中，帶有特殊的複雜性和殘酷性。

第四章

朱毛之爭與紅軍權力結構的集中趨勢

紅軍在創建初期非常弱小，其中最強大的朱毛紅軍也不過幾千人，而當時全國各派軍隊總數近二百萬，主要派系蔣介石、馮玉祥、李宗仁、閻錫山、張學良各有數十萬軍隊，很難想像小小的紅軍能在二十年中發展壯大，擊敗強敵，最終奪取天下。中共軍隊為什麼成為勝利者？這是歷史研究者無法回避的問題，也是中國近現代史的核心問題之一。筆者嘗試給出的答案大致是：紅軍是新式軍隊，遵循獨特的建軍原則，使這支軍隊具有獨特的競爭力。

一、紅軍初創時期的民主制度及其弊端

民主——是這支新型軍隊最為獨特之處，或者說在紅軍創建初期，權力結構是高度分散的。眾所周知，軍隊的權力結構通常很集中，即使民主制度完善的國家也是如此。軍隊一般等級森嚴，權力高度集中於上級，下級對於上級只能嚴格服從，普通士兵被訓練無條件服從命令。但是初創的紅軍卻與眾不同，中國共產黨的骨幹是一批五四青年，新文化運動的核心理念就是民主，毛澤東直到晚年都認為井岡山紅軍是“一場槍桿子青年運動”，是“五四青年運動的繼續和發展”。^①因此當這批五四青年著手創建軍隊時，民主理念就被帶到紅軍中來，使得創建初期的紅軍有著濃厚熱烈的民主氣氛，是軍事史上少有的獨特軍隊。

^① 馬社香：《“井岡山的革命精神不要丟了”——王卓超回憶1965年毛澤東在重上井岡山期間的一次談話》，《黨的文獻》2006年第3期，第22頁。

紅軍民主制改變了傳統軍隊中士兵的消極被動角色，每一個成員都成為軍隊的主人，受到尊重、享有權力，這種主人翁地位使各級幹部戰士發揮出更大的熱情和主動性，增加了軍隊的凝聚力和戰鬥力。但是，分散的權力結構也帶來嚴重弊端，常常造成眾說紛紜、決策困難、紀律鬆弛，在殘酷戰爭中甚至危及生存，這使得建軍初期的民主氣氛難以長期維持，最終逐步走向集中。

(一)官兵平等

在紅軍對白軍的宣傳攻勢中，官兵平等被當作紅軍的重要優點加以強調。國民黨軍隊等級森嚴，軍官可以隨便打罵士兵，上級享有無上的權力，下級只有服從的義務。這甚至成為共產黨發動兵變的有利條件，百色起義重要領導人張雲逸說：“在舊軍隊裡，官長的命令是足以左右一切的。因此，首先我們就掌握了大隊的領導權，於是各級的領導權也迅速地落在我們手中。這就使黨的意圖，能夠通過行政的命令予以實現。”^①寧都起義也是只靠很少的黨員，由於爭取到趙博生、董振堂、季振同等高級將領，就發動了近兩萬人的大兵變。可見，在政治環境複雜的情況下，等級森嚴的軍隊反而是脆弱的，蔣介石也靠收買叛將擊敗李宗仁、馮玉祥等對手。

紅軍則反其道而行，實行官兵平等，官兵在政治權利上平等，反對軍官打罵士兵，士兵的人格得到尊重，下級對上級不是盲目服從，使得軍隊更加鞏固。在艱難時期，毛澤東和朱德的部隊都發生過軍官帶隊叛逃事件，但都因下級抵制而失敗。1927年12月，第1團(31團前身)團長陳浩夥同參謀長命令部隊向湘南撤退，企圖投靠國民黨三十一軍軍長方鼎英，但是遭到宛希先、張子清等幹部戰士的抵制，後來毛澤東趕到，揭發了叛變陰謀，陳浩等被處決。1928年8月，28團2營營長袁崇全試圖帶兩個連叛逃，但“各連官兵不受欺騙脅迫，忠實於革命，自動脫離袁之羈絆歸回大隊”，“袁逆隻身逃去”。陳毅感歎道：“計袁逆叛變至各部回來，前後經過

^① 張雲逸：《百色起義與紅七軍的建立》，《星火燎原》(1)，第475頁。

兩周之轉折，卒得恢復舊觀。此皆官兵忠實革命，出於自動，此點實一般雇傭軍隊所絕不能有的。”^①

紅軍的平等氣氛使士兵獲得尊嚴和精神解放，增加了部隊的凝聚力。當年的新戰士朱良才提到：“毛黨代表給我們這些新參加紅軍的同志講話，提到繳獲的現洋時，他說：我們是工農的軍隊，不是軍閥、資本家的軍隊。他們的錢都歸上級裝腰包，我們從上到下都是一樣，一塊都是一塊，一毛都是一毛”，“第二天在永新點名發錢。第一名點朱德，第二名點毛澤東，以後點大家。每人發的都是一塊現洋。”^②江華也提到，大柏地之戰“繳獲許多槍支彈藥，所以動員紅軍全體幹部戰士，凡是能背槍的都背上槍，有的戰士一人背兩三支，毛澤東同志也背著一支大槍同戰士們走在一起。”^③朱德更以和士兵同甘共苦、打成一片著稱，陳毅說：“群眾及敵兵俘虜初次看見鼎鼎大名的四軍軍長那樣芒鞋草履，十分褻褻，莫不詫異。若不介紹，至多只能估量他是一個伙夫頭，同時到現在‘伙夫頭’三個字恰成了四軍軍長的譚號。”^④

毛澤東對自己親手開創的紅軍民主制度非常自豪，在給中央的報告中重點介紹：“紅軍的物質生活，如此菲薄，又如此苦戰不息，仍能維持不疲者，黨的作用外，就是徹底的民權主義之實行。官長不打士兵，官兵穿吃一樣，待遇平等，士兵有開會言論之自由，繁縟禮節之廢除，經濟之徹底公開”。“這些辦法，使士兵特別滿意；尤其是新來的俘虜兵，他們感覺得前日的營壘中與今日的營壘中完全是兩個世界。他們雖然感覺紅軍的物質生活比較不如白軍的好，但精神得到解放，所以尚能相安。同時一個兵，前日替敵軍打仗不如今日替紅軍打仗之勇敢，乃是這種民權主義的影響。紅軍像一座火爐，俘虜兵過來馬上熔化，這是一種事實。中國不但工農群

① 陳毅：《關於朱毛軍的歷史及狀況的報告》（1929年9月1日），《陳毅軍事文選》，第3頁。

② 朱良才：《井岡山上的故事》，《星火燎原》（1），第250頁。

③ 通八達江華：《追憶與思考》，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7頁。

④ 陳毅：《關於朱毛紅軍的歷史及狀況的報告》（1929年9月1日），《陳毅軍事文選》，第8頁。

眾需要民權主義，軍隊需要民權主義更切”。^①

官兵平等對士兵的精神世界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楊開明說：“紅軍中最好的現象，就是在民權主義的施行。士兵有士兵委員會參加軍事管理，官長士兵的穿吃一樣，待遇平等，廢除肉刑”，“官長有不是處，士兵可以開會反對之，所以士兵的生活雖然苦，而看到官長也與自己沒有絲毫的差別，也感受到精神安慰，他們的人生觀因此也相當的受了影響而改變了些。每每俘虜過來的士兵，他們常常有感覺現在生活滿意的表示。他們感覺得雖然在軍閥底下物質生活比較好些，可是精神上實在痛苦，官長的生活與士兵對照，截然兩樣，官長有小廚房，官長可以去賭錢打牌，討小老婆快活。士兵呢？每月幾塊錢的餉還沒有發，有時還要被官長拳打足踢的侮辱，打了你還不許你叫屈，完全過的那供人驅策的牛馬機械生活。他們一到我們軍中來一看，完全別有天地，與他們原來的社會，完全兩樣，好似在黑暗中找到了一線光明，他們的精神上當然是愉快的。”^②

紅軍的檢討會制度也給人深刻印象，檢討會上坦誠直率的批評精神正是這支新軍隊朝氣蓬勃的獨特氣質。“檢討會大約是每個星期舉行一次，每次作戰後亦必開檢討會。這種檢討會，由全體官兵混合分組舉行，士兵在檢討會上可以批評、檢討每一個士兵，而且可以批評和檢討每一個官長，受批評者得申述理由，經過檢討以定其情節輕重，由連長、黨代表予以適當的處分。處分的方法：有勸告、警告、做苦工等，犯錯誤嚴重者，呈報上級處置。這就是所謂軍隊民主的內容。”^③

（二）士兵委員會

士兵擁有分享權力的常設機構——士兵委員會，這是紅軍民主制的

① 毛澤東：《井岡山前委對中央的報告》（1928年11月25日），《毛澤東集》第二版（2），第41頁。

② 《楊克敏關於湘贛邊蘇區情況的綜合報告》（1929年2月25日），《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上），第264頁。

③ 龔楚：《龔楚將軍回憶錄》，香港：明報月刊社1978年，166-167頁。

重要體現。紅四軍在軍、團、營、連都設有士兵委員會，“軍士執委選五人或七人為常委。團舉五人或七人為常委，營舉三人或五人為常委，連無常委機關。軍、團常委均設機關於政治部內日常辦公，營常委不設機關。各級士委的任務規定是下：1.參加軍隊管理。2.維持紅軍紀律。3.監督軍隊的經濟。4.作群眾運動。5.作士兵政治教育。”^①

士兵委員會類似北伐時期的工會和農會，是發動群眾的組織，也是群眾的權力機關，它還承擔了很多政治宣傳工作。楊開明提到：“紅軍中的士兵委員會成立有一年的光景”，“它參加了軍事管理，不過是在軍事長官和黨代表的指導之下的，而不是本行的機關。有了士委而軍中才有民眾，官長有不是處，他們可以開會說話反對，甚至處罰之（士委會中官長也參加在內）。有了士委會可以解決軍中許多的麻煩問題，如經濟公開（軍中的經濟由士兵委員會組織經濟委員會管理之）可以知道官長士兵同等待遇，沒有什麼差別。管理上，士委會可以負擔相當之責。有了士委會，兵士都有工作的，如寫標語，貼標語，發傳單，演講宣傳，組織群眾，由士委督促自動的去幹，比設政治部由政治部去督促的要強得多。士委會是由兵士選出代表，由代表會議產生出之代表士兵利益的政治組織”。^②

士兵委員會也是發動士兵、改變軍隊風氣的重要形式。方強被派到新組建的連隊擔任政治幹部，連長是舊軍人，不但經濟上有問題，而且暗中通過幫會控制連隊。方強改造連隊的方法就是組織士兵委員會，士委會成立第二天就開大會討論帳目，“經濟委員宣佈伙食帳上虧空了三十多塊錢，要大家討論。許多戰士都積極發言，有的說這是經濟手續不清，有的直接地說這是貪汙”，最後連長不得不在戰士的要求下退賠貪汙款，從此士兵委員會威信建立起來。連長通過洪幫拉攏一、二排長，企圖控制連隊，方強不顧連長的反對，由幾個秘密黨員在士兵委員會提出改編建議，並召開士兵大會通過了改編的決議。“士兵委員會的權力很大，決議誰敢

^① 陳毅：《關於朱毛軍的歷史及狀況的報告》（1929年9月1日），《陳毅軍事文選》，第9頁。

^② 《楊克敏關於湘贛邊蘇區情況的綜合報告》（1929年2月25日），《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上），第263頁。

不執行？這樣一來，連長再沒敢說什麼。戰士們從這次大會中又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認識到士兵委員會的民主權力確實是很大的。”就這樣，連隊的面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連長感到約束太多，與一、二排長密謀帶隊叛逃，結果被抓回槍斃，這個連被改造成為真正的革命軍隊。^①

士兵委員會在紅軍中的權威很大，有時甚至會超越權力界線，左右作戰計畫，著名的大柏地之戰就有士委會的影響。江華回憶：“這一天是2月9日，正是農曆除夕。敵人也未來騷擾。當夜即在大柏地宿營。第二天清晨，朱德同志命令部隊繼續前進。這時擔任前衛的三十一團三營不走了。那時，部隊內的民主還是相當大的。三營的士兵委員會到各處聯繫，堅決表示不能讓敵人趕著跑了。要走，你們走，三營是決心不走了，在這裡決一死戰，打垮尾追的敵人。前衛部隊不走，其他部隊也無法行進。三營黨代表羅榮桓同志、營長陳明同志（一說叫陳正春）見此情景，即向毛澤東、朱德同志報告。前委緊急研究”，認為地形有利，可以伏擊敵人，於是發生了大柏地之戰，紅四軍從此擺脫了瀕臨覆滅的危險處境，轉入大發展時期。^②

士兵委員會在有的部隊甚至掌握了選舉各級軍官的大權，比如在廣州起義餘部組建的紅四師中，師長由士兵委員會民主選舉產生。紅四師官兵主要是原武漢中央軍校學生，知識份子氣質濃，民主精神更強。據當時巡視員報告：“四師師長（葉鏞）則毫無實權，一切受師委之指導”。^③陳同生回憶：“部隊攻佔了花縣，進行整編，並自己命名為中國工農革命軍第四師”，“這支剛剛誕生的紅軍非常民主，師長葉鏞是由士兵委員會選出來的，黨代表王侃予是由黨員代表大會選出來的，其他負責同志也是經過群眾的選舉”。朱道南也說：“紅四師的領導人，是民主選出來的。官兵平等，薪餉一律，上自師長，下至士兵，都親如手足，團結友愛。戰士可以隨

① 方強：《我當紅軍連隊政治委員》，《星火燎原未刊稿》（1），第176—184頁。

② 江華：《追憶與思考》，第65—66頁。

③ 《中共中央巡視員陸更夫給中央的報告》（1928年9月14日），《廣東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甲12），中央檔案館、廣東省檔案館1984年，第269頁。

時找師長談話，找黨代表提意見”。^①

紅軍幹部對士兵委員會的作用評價很高。羅榮桓說：“士兵委員會有很大的權力，軍官要受士兵委員會的監督，做錯了事，要受士兵委員會的批評，甚至制裁”。“只有這樣做，才能更徹底更有效地肅清軍閥殘餘。有了民主，才能提高群眾覺悟，才能建立鞏固的集中”。^②李志民也認為：“士兵有了士兵委員會的組織，就感到自己是連隊的主人，官兵平等，有話敢說，有意見敢提，民主空氣很濃”。“這樣，士兵的主人翁思想和積極性都能充分調動起來，平時完成任務好，打仗時士氣高昂，人人奮勇爭先，多殺敵人多繳槍，又有獎賞又光榮。尤其是剛從國民黨軍隊解放過來的士兵，對紅軍中士兵委員會感觸更大，認為這是紅軍區別於白軍最明顯的一個特徵。”^③

(三)黨內民主:委員會和代表大會

紅軍是共產黨創建的軍隊，雖然當時軍中黨組織是秘密的，但各級黨支部是紅軍組織結構的骨幹，即使士兵委員會也滲透著黨組織的影響。紅軍黨的各級領導機構實行委員會形式的集體領導，稱為前委、軍委、師委等，各級委員會中都必須包含普通士兵黨員。軍中經常召開黨的代表大會，選舉領導人，決定重大問題，黨內民主是紅軍民主分權的重要結構。

中央1927年十一月會議之後給朱德發去指示信，特別強調黨內民主和集體領導：“一切黨的政策均須拿到支部會議或小組會議中討論，使每個黨員都能表示意見，有些並可向非黨的群眾宣佈”，“師委會的組織以五人為合式，除指定朱德同志為書記外，餘四人可由全體選舉，但必須有個士兵同志被選。”^④

① 朱道南口述、於炳坤整理：《在大革命的洪流中》，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87-188頁。

② 羅榮桓：《秋收起義與我軍初創時期》，《星火燎原》(1)，第130頁。

③ 李志民：《李志民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93年，第99-100頁。

④ 《中共中央給朱德並轉軍中全體同志的信》(1927年12月21日)，《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上)，第59頁。

1928年4月毛澤東和朱德兩部會合成立紅四軍,5月即在寧岡召開黨的第五次代表大會。^①11月,紅四軍又召開第六次代表大會,戰爭期間會期比較短,但重大決策都要代表大會通過。“六次大會於11月13日開預備會,14日開正式會,15日閉會,計到代表79人。四軍全軍的支部除三十二團一營遠在永新派代表來不及外,均有代表參加。各代表所攜提案計30餘種,經一度整理將意見相同者合併計得17種。大會中討論了政治、經濟、黨務各重要問題,尤其對於中國革命性質問題有長時間之辯論,這是六次大會的特點”。“新軍委選舉,最初由大會主席團提49人候選名單,經大會選定23人為六屆軍委委員,組織執委會進行一切工作。”^②決議案還規定“軍委對內是軍中黨的最高機關。隸屬於前委;對外即是邊界蘇維埃軍事委員會,指揮紅軍及地方武裝。”^③

1928年夏天中共六大強調黨內民主和集體領導,這是那一時期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的主要傾向。六大議決案提出“實行真正的民主集中制;秘密條件之下盡可能的保證黨內的民主主義;實行集體的討論和集體的決定主要問題”。^④1929年12月廣西百色起義後建立起紅七軍,前委通告要求“注意集體領導:1.黨內一切重要問題均應召集各級委員會討論決定。2.臨時問題及日常細小問題可由書記解決,但解決後應向各委員(或幹事)報告。”“實行民主化:1.黨內一切問題如無極端秘密性者,均交各級指導機關及各支部討論。2.指導機關爭執之問題可請上級決定,但盡可能召集黨員大會解決。”^⑤這個通告也反映出中共六大前後黨內的民主氣氛。

① 關於前四次代表大會記錄很少,情況不詳。

② 《紅軍第四軍第六次黨代表大會決議案》(1928年11月),《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上),第199頁。

③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朱德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第129頁。

④ 《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政治議決案》(1928年7月9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4),第320頁。

⑤ 《紅軍第七軍前委通告(第二號)》(1929年12月20日),總政治部辦公廳編:《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歷史資料選編》第一冊,第330-331頁。

當時紅四軍各級單位都由委員會實行集體領導，各級委員會中規定包括士兵和基層幹部，基層黨員代表參加高層領導機構的討論和決策。紅四軍的最高領導機構是軍委，軍委領導之下，師、團、營都有委員會，連設黨支部。在師一級作戰單位，“凡是帶有原則性的重大問題，必須經過師黨委會討論決議後方能生效”。^①唐亮擔任連指導員的同時也是師委委員，參與師一級的領導，那時各級黨委開會都有決議，會後發給各支部討論，各級黨委和支部之間保持著頻繁順暢的溝通，保證了黨組織的活力。^②

支部是黨組織的基層細胞，在連隊建立支部是紅四軍的成功經驗，是貫徹黨指揮槍原則的重要措施。毛澤東在1928年11月報告中說：“軍隊中的黨，現分連支部、營委、團委、軍委四級。支部建在連上，小組建在班上。四軍之所以艱難百戰而仍不潰散者，‘支部建在連上’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原因。兩年前，我們在國民黨軍中的組織，完全沒有抓住士兵，即葉挺部猶是每團一個支部，真是豈有此理！現在軍中黨員與非黨員之比，約為一與三之比，即平均四個人中有一個黨員。最近決定在戰鬥兵中發展黨員數量，以達到黨員非黨員各半的目的。”^③

三個月以後，毛澤東基本完成了發展黨員到半數的計畫，建立了黨組織對軍隊基層的牢固掌控。楊開明在1929年2月報告中提到：“作戰大部以連為單位，每一個作戰單位有一個支部，去處理和指揮一個作戰單位的事，很覺便當。我們的軍隊其所以打敗仗而不致於潰散，這個組織的好處應為主要的原因。紅軍中黨的歷史已有一年，有些支部還能作用，能在群眾中做核心，使群眾受我們的影響而團聚在我們的周圍去工作。黨的會議除作戰外，小組會有每星期一次，各級代表會，也能常開並能按期開。對黨員還有相當的訓練，由黨代表負其責”。“現在黨在軍中的成分比較，

① 倪志亮：《三戰三捷》，《星火燎原》(1)，第461頁。

② 唐亮：《古田會議後的一個連隊》，《星火燎原》(1)，292頁

③ 毛澤東：《井岡山前委對中央的報告》(1928年11月25日)，《毛澤東集》第二版(2)，第41-42頁。

普遍為1/2弱，三十一團党的成分約3/5，二十八團約1/2尚不足，三十二團（袁王部）約1/3”。^①

（四）軍政分權

在委員會集體領導中，政治首長和軍事首長常因突出才能和歷史威望居主導地位。政治首長就是各級黨代表，黨代表的設置在北伐時期已經開始，國民黨在蘇聯顧問的指導下，模仿蘇聯紅軍在國民革命軍中建立了名義上“軍政平等”的黨代表制度。1926年11月國民黨中常會通過的《修正國民革命軍黨代表條例》規定：“黨代表之權能與軍隊長官同，其所發命令，凡部屬人員一律執行之”，“黨代表有會同指揮官審查軍隊行政之權”。^②

但是，國民革命軍多來源於舊軍隊，軍事長官獨裁的傳統很深，實際上黨代表並沒有取得平等權力，地位遠低於同級軍事長官，常被取笑為“賣膏藥的”、“姨太太”。國共分裂之後，擔任黨代表的共產黨員被驅逐，政治領導制度雖未完全廢除，但改稱政治幹事後，地位更加低微。政工幹部周上凡回憶：“不管是政治指導員，或政治幹事，這裡的軍官毫不例外地叫我們‘膏藥’。有次我碰見一個同學好友李福田（西沉陣亡），他剛剛調來第五十九師當營長，見面互敘離別後，他說：‘你也來賣狗皮膏藥啦！你為什麼要鑽進這個死胡同？！’他舌頭一舔繼續說：‘你去找個舊長官，搞個帶兵官是不難的，或者當個參謀也好啦！這裡對政工看不上眼，比帶兵官不止低下一等，士兵也不聽你吹，你為啥要幹這玩藝兒！’好友直言關注，使我無限苦悶，什麼‘七分政治’，不過是鬼話騙人的把戲。不幹不行，一天挨過一天，混日子。”^③

^①《楊克敏關於湘贛邊蘇區情況的綜合報告》（1929年2月25日），《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上），第263頁。

^②《修正國民革命軍黨代表條例》，油印件，黨史館藏：一般465/100.1。轉引自：陳佑慎：《持駁殼槍的傳教者——鄧演達與國民革命軍政工制度》，臺北：時英出版社2009年，第197頁。

^③周上凡：《陳誠部在第四次“圍剿”中被殲記》，《“圍剿”中央蘇區作戰秘檔》，中國文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174頁。

在共產黨創建的紅軍中，卻恰好出現相反趨勢，信仰堅定的政治幹部在艱險鬥爭中地位越來越高。陳毅沒趕上南昌起義，追上南下的起義軍後，周恩來任命他擔任73團政治指導員。起義軍在潮汕失敗後，朱德帶餘部退入山區，情況非常艱難，部隊瀕臨潰散。粟裕回憶：“我們這支隊伍，人是愈走愈少了，到信豐一帶時只剩下七、八百人。不少人對革命悲觀動搖，離隊逃跑，特別是那些原來有實權的帶兵的中、高級軍官差不多相繼自行離去，給部隊造成了極大的困難，使部隊面臨著瓦解的危險”。“在師、團級政工幹部中，只剩下七十三團指導員陳毅同志了。他挺身而出，積極協助朱德同志帶領部隊。陳毅同志是在十分困難的條件下開始和堅持工作的。那時候他來到部隊不久，上下關係都很陌生，職務也不很高，再加上他是搞政治工作的，當時政治工作人員是不被人們所看重的。尤其是潮汕失敗之後，部隊面臨著極端嚴重的處境。在這一系列的不利情況下，陳毅同志完全以他堅強的革命精神和實際行動，逐漸在部隊中建立起威信。”^①但在朱德部隊中仍有較多舊軍隊傳統，雖然陳毅的地位顯著上升，但仍無法與朱德比肩，所以陳毅在給中央報告中說：“四軍未成立前”，“黨在軍隊中不能起領導作用，軍權高於黨權。”^②

1928年4月紅四軍成立後，政治領導的影響繼續上升，逐漸取得了和軍事長官同等的地位，毛澤東和朱德基本是平起平坐，有時毛澤東作為前委書記還略占上風。楊開明報告也特別強調黨代表的核心作用：“事實告訴我們，哪一連、一營、一團的黨代表好，哪一連、一營、一團的士兵就好，就會作戰，問題也少些。哪一連、一營、一團的代表弱些，哪一連、一營、一團的士兵也要壞些，作戰也不行些，問題也多了”。“黨代表的職責是，軍中政治訓練，黨的工作，督促士委會工作，幫助軍事長官工作，如軍事長官在火線上打死了，黨代表可以代行指揮軍隊。”^③

① 粟裕：《激流歸大海——回憶朱德同志和陳毅同志》，《星火燎原》（1），第88-89頁。

② 陳毅：《關於朱毛紅軍的黨務概況報告》（1929年9月1日），《陳毅軍事文選》，第22頁。

③ 《楊克敏關於湘贛邊蘇區情況的綜合報告》（1929年2月25日），《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上），第33-34頁。

雖然黨的各級委員會是集體討論決策，但書記常由政治幹部擔任，這也加強了政治幹部的地位。政治幹部一般是信仰最堅定的黨員，具有獻身精神和道德感染力，常能成為部隊的靈魂。李志民曾擔任紅五軍基層部隊黨代表，他根據自身經驗說：“紅軍初創時期黨代表制度的建立，徹底破除了舊式軍隊的‘一長制’，確定黨代表（後改為政治委員）與軍事指揮員同為部隊的首長”，“正因為黨代表在部隊中的地位和作用，各級黨代表在幹部、戰士的心目中便成為黨的領導的化身，黨代表的一言一行就是表率，就是無聲的命令，所以，我深感到自己肩負責任的重大，決心以自己的模範行動團結、帶領部隊去衝鋒陷陣”。^①

中共中央在1928年六大前後決定模仿蘇聯，將黨代表改稱政治委員，設立專門的政治部。六大軍事工作決議提出：“採用蘇聯紅軍組織的經驗，實行政治委員與政治部制度。葉挺與賀龍部隊的遭破壞，其重要原因之一，即在於他們軍隊中未設法肅清反動的官長，未實行政治委員，未設立政治訓練機關。”^②在同時期的軍事工作大綱也提出：“政治委員即為黨的代表，最好由工農分子充任，能瞭解軍事更好。”^③

但是，紅四軍領導人還是習慣黨代表這個名稱，沒有執行改名的指示。毛澤東說：“黨代表制度，依經驗所得，認為還不能廢除”。“特別是連一級，此時不可廢，因黨的支部建設在連上，黨代表對全連督促士兵委員會執行政治訓練，指揮民眾運動，在黨內即是支書。事實表現，哪一個連的黨代表較好，哪一個連就較健全些”。“朱部在湘南曾經取消了黨代表，後來感覺不好，不能維持，到邊界才又恢復過來。若改稱指導員，則與國民黨指導員相混，俘虜兵大都厭惡他們的指導員。且易一名義，於制度的本質無改，故此間決定不改。黨代表死傷太多，除自辦訓練班外，望中央

① 李志民：《李志民回憶錄》，第75頁。

② 《中國共產黨第六次代表大會軍事工作決議案（草案）》，《中共中央文件選集》（4），第491頁。

③ 《中央通告第五十一號——軍事工作大綱（採用廣東省委擴大會議軍事問題決議內容）》（1928年5月25日），《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上），第101頁。

和兩省委派可充黨代表者至少三十人來。”^①黨代表在紅軍中有很高威望，發揮著重要作用，與軍事長官平等分享領導權，這是初期紅軍權力結構的重要特點。

(五)民主分權的副作用

紅軍上下級之間、軍政之間的分權和集體領導制，充分體現了民主精神，但在殘酷戰爭環境中也出現了很多弊端。在眾說紛紜的情況下，高明的見解不易通過，傑出的領導人難以發揮才能，毛澤東在會場上有時難免垂頭喪氣。上下級之間的分權使下級有較大發言權，常使決策難以執行，甚至下級批評不得，導致紀律鬆弛。軍政之間平等分權會引發政治領導和軍事長官的爭論，沒有統一的重心，有時甚至會使軍隊分成兩個派別。

陳毅報告提到了軍中民主的副作用：“政治組織與軍事組織時常發生職權上的糾紛”，“士兵委員會的運用不好，有時士委超出職權的範圍”。“上級的命令未經下級討論，下級便不執行或者說上級包辦，說上級是家長制。軍事機關的命令也常有托故不執行的毛病”。“政治工作人員與軍官常常發生糾紛”，這種“結髮夫妻”式的軍政平等分權，“結果是天天要吵嘴”。^②

海陸豐蘇區也很快發現，教育不足的工農同志運用民主制問題不少。“實施民主制之觀察：自從黨反對機會主義之後，對黨之組織上採取民主制，至今已有五個月矣。在這頗短的時間中表現了許多好與壞之現象，好的使工農能對黨負責人加以批評、督促，每個同志都能儘量發表意見，黨之策略主張能使黨員明白。壞的方面，誤將事事都要由大家決定，如黨下一命令下去，要十個黨員幹一件事，有六人反對，因而反對命令——以農工同志居多”。“本來民主制是來反對人包辦的，不過在事實上各區本有工

^① 毛澤東：《井岡山前委對中央的報告》（1928年11月25日），《毛澤東集》第二版（2），第38-39頁。

^② 陳毅：《關於朱毛紅軍的黨務概況報告》（1929年9月1日），《陳毅軍事文選》，第19、25、24頁。

農分子之常委，打理日常事務時流於散漫，所謂秘書長者包辦一切，無形中代替了從前書記之職務，甚至來支配常委。”^①

軍事決策需要實戰經驗和特殊才能，只要有一絲一毫的偏差，就可能帶來嚴重後果，用開會表決的民主方式來指揮作戰顯然並不合適。1929年1月大庾之戰是紅四軍下井岡山以後的第一場重要戰鬥，當時“敵人就要追來了，怎麼辦？軍領導在大庾縣城的一個天主堂開活動分子會，大約有六七十人參加，有的主張打，有的主張退，何挺穎等主張打。結果採取了在遊擊戰爭時期也很少用且不該用的舉手表決方式，由於同意打的占多數，就決定在大庾迎敵”。^②結果紅四軍首戰失利，陷入被動，被敵軍追擊一個月，幾乎到了全軍覆沒的邊緣。1929年7月，湘贛邊特委召開聯席會議，特委書記鄧乾元想讓紅五軍進攻安福，彭德懷力陳攻城的困難。“但鄧乾元不聽彭德懷的意見，強行表決通過要求紅五軍攻取安福的決定，彭德懷只好服從多數的意見”。結果攻城失敗，紅五軍損失慘重，重要幹部縱隊長賀國中、軍參謀長劉志治犧牲，十一個大隊長，九個負傷。^③

上下級之間分權，特別是士兵委員會權力過大，有時造成下級不服從命令，軍官難以執行紀律、管理部隊。李志民提到：“現在連隊士兵委員會有一種極端民主化的傾向，比如，軍官在行政管理上嚴格一些，操課的時間長一些，有的士兵委員會就提意見；個別連隊甚至有士兵委員會舉手通過打連長、排長屁股的事，這樣下去會使連隊幹部不敢大膽管理，把連隊的正常秩序搞亂，削弱黨的領導。”^④龔楚也說：“自軍隊民主推行以後，紅軍內部發生了很多問題，主要的是：連以下幹部及士兵對上級發佈的命令，常常不切實執行，甚至發生反抗事件，他們要求上級一切行政措施，甚至軍事決策均須以‘民主集權制’由下而上的經過討論決定”。^⑤

① 《中共海陸豐縣委關於二月至六月的鬥爭情況給省委報告》（1928年），《海陸豐革命史料》第二輯，廣東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58頁。

② 蕭克：《朱毛紅軍側記》，第83頁。

③ 李志民：《李志民回憶錄》，第95頁。

④ 李志民：《李志民回憶錄》，第99-100頁。

⑤ 龔楚：《龔楚將軍回憶錄》，第166-168頁。

委員會集體領導制在激烈動盪環境中常常難以實行，有時湊不夠開會的人數，開會又常常爭論不休，委員能力參差不齊，有些委員只會亂髮議論，幹擾決策。當時委員會的書記或秘書長並沒有決策權，但是由於集體領導的無效，能力強、敢於負責的書記常常實際起到領導作用，這在民主氣氛高漲時期又常常被認為是“書記獨裁”。楊開明報告談到：“特委於1928年5月23日在寧岡開第一次邊界黨代表大會產生，當時書記毛澤東”，後來楊開明、譚震林、鄧乾元相繼擔任書記。“特委的事總是書記一個人處理，個人專政，書記獨裁，成為邊界的痛弊。首先毛澤東為書記時，特委就在澤東一個人荷包裡，後來開明代理書記，特委又是開明一個人的獨腳戲。”^①

蘇區地方政權民主實踐中也遇到類似問題，習慣專制傳統的民眾短期內難以學會運用民主制。毛澤東說：“鄉、區兩級乃至縣之一級蘇維埃執行委員會，都是用一種群眾會選舉的。一哄而集的群眾會，不能討論問題，不能得到政治訓練，又最便於知識份子或投機分子的操縱”。“一些地方有了代表會，亦僅認為是對執行委員會的臨時選舉機關，選舉完畢，大權攬於委員會，代表會再不談起”。“所以如此，就是因為缺乏對於蘇維埃這個新的政治制度的宣傳和教育。封建時代獨裁專斷的惡習慣深中於群眾乃至一般黨員的頭腦中，一時掃除不淨，遇事貪圖便利，不喜歡麻煩的民主制度”。“民主集中主義，在政府委員中也用得不習慣。”^②

在紅四軍實踐中，民主分權的種種弊端彙集起來，在1928年引發了損失慘重的“八月失敗”。問題早在朱、毛會師不久就有所顯露，原來毛澤東的井岡山紅軍只有約1600人，朱德領導湘南起義後帶來的紅軍、農軍總共有約8000人，這是迅猛壯大紅軍的重大戰略機遇。毛澤東本想把紅四軍一舉擴編為三個師，但是由於湘南農軍鄉土意識太強，而朱德迎合了這種

^①《楊克敏關於湘贛邊蘇區情況的綜合報告》（1929年2月25日），《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上），第269頁。

^②毛澤東：《井岡前委對中央的報告》（1928年11月25日），《毛澤東集》第二版（2），第51-52頁。

群眾意識，毛澤東的宏大計畫被否決。龔楚回憶：“紅軍整編問題，原決定編為三個師”，但“耒陽、郴州兩縣負責同志均提出反對”，他們認為赤衛隊只能打遊擊，策應主力紅軍，“將來一有機會即須返回原籍各縣遊擊”。“各縣負責人並強調：若前敵委員會強迫改編，則必招致不良後果。毛澤東當時垂頭喪氣，一言不發。朱德是精兵主義者，他倒同意各縣負責人的意見”。“毛澤東雖很不滿意，但又不能強迫改編，他乃起來說：這次改編可照各位的意見進行，但各位須要明白，我們是革命者，紅四軍是現時中國主要革命武裝隊伍，應以加入紅四軍為榮，你們部分同志的反對意見，完全是農民意識、地方主義在作祟，此後必須要糾正。”^①

由於井岡山給養困難和湘南幹部要求，後來大部分湘南農軍返鄉打遊擊，只保留了29團。但是回到湘南的農軍在嚴酷環境下無法堅持，很快潰散，事實證明少數派毛澤東是對的。時任農軍幹部的黃克誠痛惜地說：“拉到井岡山上的湘南八千子弟兵，除保留下來少量幹部和第二十九團少數部隊外，其餘都損失掉了，沒有能形成一支武裝力量”，“讓各縣武裝返回湘南打遊擊的決定，過於匆忙，欠缺周密的考慮”。^②陳毅給中央的報告也談到：“軍委常委是嫌紅軍人數太多沒有辦法整理，看見他們要走便讓他們走，以致他們回去大部受了損失，紅軍日後沒有人補充。這個舉動引起黨內極嚴重之批評。”^③

1928年7月，湘贛兩省國民黨軍對井岡山發動會剿，紅四軍決定分兵拒敵，毛澤東帶31團活動於江西一側、朱德帶28團、29團活動於湖南一側，32團留守井岡山。不料在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經的鼓動下，湘南農軍編成的29團多數士兵7月12日召開士兵委員會，竟擅自議決返回湘南，朱德勸阻無效，“毛澤東使專人送信來，他預料到我們必同意杜修經提出的湖南省委的計畫，他認為絕不可行，希望我們幸勿冒險，致遭損

① 龔楚：《龔楚將軍回憶錄》，第153-154頁。

② 黃克誠：《黃克誠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6-47頁。

③ 陳毅：《關於朱毛紅軍的黨務概況報告》（1929年9月1日），《陳毅軍事文選》，第27頁。

失。但軍中各級軍事幹部均不以為意，堅決照既定計劃準備行動”，^①最終導致慘重失敗。

楊開明報告對整個過程有極為生動的敘述：29團過不慣井岡山艱苦生活，思鄉心切，到酃縣後“突然於12號晚士兵紛紛開士委會，一不通知上級官長及黨代表，竟決定13號由酃縣去湘南，私自找好帶路的人，出動的時間都決定了。軍委（四軍黨的最高機關）得訊即召集軍委擴大會，士兵代表會，多方面解釋阻止，無效。後又由朱德召集士兵演講，亦無效”。“軍隊當時負責的同志都感覺到非常棘手，後來經過千言萬語的解釋，說暫時回去解了井岡之危，再行回湘南不遲，勉強將軍隊開動”。“一天只走了30裡，兵士垂頭喪氣，似行不行，三五成群，步伍凌亂，軍心渙散，組織解體，如果途中遇著敵人定是不能作戰，馬上潰散。二十九團在四軍中槍支雖較少，作戰能力頗強，黨亦較好，可是這一次黨完全失去了作用”。“軍至沅渡後，二十九團士兵仍要求回去。軍委看了這種情形，覺得如果勉強留住他們，不能作戰也是無用”。“向湘南進發，24號到達郴州，與范石生部激戰，初勝後敗。二十九團系湘南農民，全部潰散。二十八團當時也打坍了”。^②這次失敗導致井岡山紅軍損失一半，根據地幾乎垮臺，事後朱德沒有檢討自己的責任，引起毛澤東的不滿，為後來的朱毛之爭埋下了伏筆。

綜觀上述各種弊病，我們可以看到，在有幾千年專制傳統的中國、在以農民為主體的紅軍中，來自西方的民主分權制度必然會遇到很大困難，最主要是缺少民主制運行所必須的法治基礎。具體可以分兩個方面來談，

一、分權制中各機構的權力界限必須清晰，有明確的運作規則——也就是“法”，各權力機構嚴格依法運作，才不至於產生衝突和失效。本來士兵委員會並沒有參與軍事指揮的權力，但在中國傳統中，法僅僅約束弱者的，強者向來為所欲為。在“八月失敗”事件中，強勢的29團士兵委員會越

^① 龔楚：《龔楚將軍回憶錄》，第190-191頁。

^② 《楊克敏關於湘贛邊蘇區情況的綜合報告》（1929年2月25日），《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上），第253-254頁。

權擅自議決回鄉，無視毛澤東來信和朱德講話，使紅四軍指揮系統完全癱瘓，導致慘重失敗。

二、在法治的體系中，法高於人，即使在特殊時期授權給個人，以後仍能收回授權。比如二戰時期，邱吉爾作為英國戰時首相獲得極大權力，但戰爭剛結束，他就被英國人民選下臺，失去了權力。很多決策需要特殊的才能和經驗，盲目的集體領導使很多沒有資格的外行參與決策，導致嚴重失誤。比如在紅五軍進攻安福問題上，鄧乾元為代表的多數否定了彭德懷的意見，強行表決通過，結果攻城失敗，紅五軍損失慘重。又比如在紅四軍整編問題上，朱德和湘南幹部缺乏毛澤東那樣深遠的戰略眼光，導致紅軍喪失了迅猛擴大的極好機會，八千湘南子弟絕大部分回鄉潰散，紅軍又只剩下四千多人。在這些需要特殊才能和經驗的問題上，確實需要授權給擁有特殊才能和經驗的人。

但是，由於中國有深厚的人治傳統，缺少法治傳統，人高於法，一旦授權給強力人物，就很難有效監督，更難以收回授權，往往最終走向個人崇拜和獨裁。這個問題在紅軍初期還不嚴重，但也已經顯露出一些跡象，楊開明報告中已經提到：“黨員崇拜領袖，信仰英雄，而不大認得黨的組織。”^①這一問題在以後的歷史進程中又有很大發展，給近現代中國帶來深遠巨大的影響。

二、1929年朱毛之爭與毛澤東在紅四軍七大的挫折

紅四軍一些幹部逐漸認識到民主分權的問題，開始嘗試一些調整，特別是毛澤東為代表的一部分人傾向於權力集中和嚴格管理，但朱德為代表的多數人仍堅持分權和保障民主氣氛。兩派人在重大原則問題上產生嚴重分歧，再加上一些個人因素的影響，終於在1929年春夏之交引發了著

^①《楊克敏關於湘贛邊蘇區情況的綜合報告》（1929年2月25日），《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上），第274頁。

名的朱毛之爭，結果在紅四軍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上，毛澤東失去多數支持，實際上被趕出了他親手創建的紅四軍。

(一)朱、毛的原則分歧和個人差異

1928年4月底，朱德率軍與毛澤東會合成立紅四軍，兩位志向遠大的革命家總體合作良好，兩支部隊也逐漸趨於融合，但是毛澤東和朱德在領導原則和個人風格上都有明顯差別，也逐漸產生分歧，積累矛盾。在原則上，分歧主要集中在兩點，一、民主分權與集權的矛盾；二、軍事觀點與政治觀點的矛盾，這同時也是軍事領導與政治領導的矛盾。在個人風格上，毛澤東嚴厲細緻，讓下屬畏懼，有獨立見解，對上級不完全服從，生活上有些特殊化；朱德慈祥寬厚，有時粗心大意，對下屬寬容，對上級完全服從，生活上和士兵打成一片。

毛澤東能力很強、責任心也很強，較早感覺到分權制的弊端，痛感他的很多好想法由於意見紛雜無法實現，他的出眾能力無法充分發揮，認為如果在關鍵決策上失誤就將導致慘重失敗，已經傾向於集中權力，加上當時能力強的幹部少，毛澤東更喜歡獨斷專行。杜修經在報告中就談到：“現在邊界特委工作日益擴大，實際上一切工作與指導都集中在澤東同志身上。”^①朱德雖然是舊軍人出身，但後來在西歐遊學多年，對民主制信仰很深，認為民主是革命理想的核心，即使遇到一些困難也不能犧牲民主原則。龔楚認為：“毛澤東處事獨裁，一切軍政措施均由他個人決定，不想他人幹預，而且個性固執，不接納他人的意見；朱德則有民主作風，凡事都和大家商量決定”。^②

在軍事上，文人出身的毛澤東還處於學習時期，朱德是紅四軍威望最高的軍事領袖，中央也認為“毛在政治上強，軍事上朱強。”^③軍隊畢竟是要在戰場上決生死的，軍事能力自然極受推崇，朱德是久經沙場的戰將，早

①《杜修經給湖南省委的報告》（1928年6月15日），《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上），第131頁。

②龔楚：《龔楚將軍回憶錄》，第207頁。

③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朱德年譜》，第157頁。

在1916年護國戰爭期間已經成名，當時正值壯年（43歲），那些後起的名將如林彪（22歲）、粟裕（22歲）等當時還是經驗不足的毛頭小夥子。1928年保衛井岡山的龍源口之戰險象環生，朱德親臨火線打敗了楊池生、楊如軒帶領的五個團，使井岡山轉危為安。當1929年2月初軍部在圳下村遭突襲朱德失散時，粟裕“覺得像天塌了似的”，^①可見朱德當時在紅四軍威望之高。

毛澤東是擅長寫文章的知識份子，原來完全不懂軍事，1927年秋收起義後才開始領導軍隊，在建軍初期還只是軍事上的學徒，也沒有帶兵打贏過什麼真正的硬仗，軍事威望有限。1928年3月周魯到井岡山誤傳中央開除毛澤東黨籍，只能當師長，毛澤東向幹部戰士承認“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希望大家幫忙。^②毛澤東後來回憶這段經歷時還說：“我這個人當師長，就不那麼能幹，沒有學過軍事”，^③可見那時他在軍事上還沒有自信。蕭克也談到，毛澤東當時“指揮作戰方面沒有那麼多經驗，在井岡山時很多大仗都是朱老總指揮的。”^④毛澤東的軍事威望在1930年底全殲張輝瓚師的龍岡大捷後才建立起來，這也是1929年毛澤東與朱德矛盾激化以後，陳毅等人傾向於朱德留下、毛澤東離開的重要原因。

朱德長於軍事，擔負軍事領導責任，難免主要從軍事觀點來考慮問題，這也是長期職業軍人生涯養成的習慣。毛澤東長於政治，擔負政治領導責任，當然更多從政治觀點考慮問題。這就產生了軍事觀點與政治觀點的矛盾，同時也就是軍事領導與政治領導的矛盾。具體說，軍事觀點就是以打仗為中心，對於宣傳工作、發動組織群眾工作相對就比較輕視，只要能打勝仗，其他不考慮那麼多，只要是勇猛善戰的幹部戰士，紀律方面有些毛病就不強求了。政治觀點則要盡力爭取廣大民眾的支持，以壯大

① 粟裕：《粟裕戰爭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版，第82頁。

② 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171頁。

③ 毛澤東：《在八大預備會議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1956年9月10日），見《黨的文獻》1991年第3期，第7頁。

④ 蔣伯英：《蕭克將軍訪談錄》，《黨史研究與教學》2009年第2期，第11頁。

革命力量，這就必須制定並嚴格執行能夠得人心的政策，通過嚴肅的紀律加以保證，比如不能侵犯農民，這樣才能得到占人口多數的農民的支援；不能侵犯商人，這樣才能保證蘇區的貨物供應；不能侵犯俘虜兵，這樣才能瓦解敵軍鬥志，補充兵員、繳獲武器。

毛澤東抓工作很嚴格也很細緻，雖然表面好開玩笑，但實際性格剛烈強硬，如果達不到要求就要遭到嚴厲批評、甚至嚴重打擊，常常讓下級感到畏懼。後來長期擔任毛澤東秘書的胡喬木談到：“毛主席是很嚴格的，制定了的政策就要執行，看起來講話風趣，實際上處理事情很嚴格。”^①賴毅也談到毛澤東的細緻和嚴格：“行動委員會三、五天就要檢查一次工作，例如進行了幾次宣傳，組織了多少群眾，打了多少家土豪，沒收和分發了多少東西，籌了多少款；工作中的經驗、優缺點，以及附近的敵情等等，都要作詳細的彙報，並按級上送，直到毛委員那裡。”^②毛澤東嚴格細緻的工作作風，從他後來為制訂土地政策在尋烏、東塘、興國、長岡鄉、才溪鄉等地進行的農村調查也可以看出來，這些精密細緻的調查報告至今仍是很有價值的社會史研究資料。

朱德性情寬厚，愛兵如子，深受下屬愛戴，但幾乎沒人怕他，而且常常大而化之，不夠細心。這樣軍隊紀律、甚至軍事行動有時會出問題，比如前面提到的“八月失敗”中，朱德本人就在軍中，卻沒辦法用強硬手段控制部隊，不得不遷就29團士兵委員會，結果鑄成大錯。1932年周恩來在關於紅軍指揮權的電報中也提到朱德的缺點：“玉階不細心，有澤東負責，可能指揮適宜。”^③

毛澤東有雄才大略，也有唯我獨尊的傾向，要求下級嚴格服從，但自己卻並不嚴格服從上級，認為上級不對就不執行。他還有一些特殊的生活習慣，需要別人來適應他，比如喜歡夜晚工作，起床很晚。據胡喬木說，

① 蕭揚整理：《胡喬木談毛澤東與張聞天》，《炎黃春秋》2011年第8期，第32頁。

② 賴毅：《毛委員教我們發動群眾》，《星火燎原》（1），第185頁

③ 周恩來：《南雄水口戰役的初步總結及組織問題》（1932年7月29日），《周恩來軍事文選》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59頁。

在長征途中擔任總書記的張聞天曾下令：“所有人都要幾點鐘起床，到時候吹號”，毛澤東勃然大怒，說：“哪裡來的新兵？朱總司令也沒有禁止過我！”^①可見，毛澤東的習慣從井岡山就開始了，延續了一生，大家都得適應他。從後來朱毛之爭中朱德對毛澤東特殊化的批評來看，不少人對這一點是不滿的。

朱德打仗的時候是剛毅的將領，平時與人交往中卻很謙虛，對上級嚴格服從，對下級也很平等，喜歡和戰士們一起打球，甚至幫助戰士補草鞋，這種樸素博大的人格得到了全軍的愛戴。朱德很守紀律，在井岡山和伍若蘭結婚後，週六要過夫妻生活，竟來找支部書記何長工請假，倒把何長工搞得很尷尬，讓他以後不要再請假了。^②28團幹部何篤才認為“毛澤東過於信用順從自己的人，對持不同意見的人不能一視同仁，不及朱老總寬厚坦誠”，黃克誠也認為“毛澤東在組織路線上失掉了一部分人心”，^③這也是朱毛之爭中朱德得到更多支持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吃豬事件”和軍委問題引發的爭論

1929年1月，紅四軍主力為避開兩省敵軍重兵圍攻離開井岡山，轉戰贛南和閩西，但是遭到江西敵軍的持續追擊，處境非常危險，矛盾開始顯露，朱德舊部28團和毛澤東舊部31團差點分家。2月上旬，紅軍在大柏地之戰打敗追兵，轉危為安。3月以後，國民黨爆發蔣桂戰爭，紅四軍處境顯著改善，在閩西擊敗郭鳳鳴，佔領長汀，4月又相繼佔領瑞金、於都、寧都。紅軍在連戰獲勝的情況下，軍事觀點抬頭，和毛澤東堅持的政治觀點發生衝突，加上中央派來的高級幹部劉安恭的挑動，朱毛之爭在5、6月間爆發了。

朱毛之爭的導火索之一是“吃豬事件”，此事大概發生於5月中旬從寧都回瑞金途中，突出體現了政治觀點與軍事觀點的矛盾。當時在朱、毛身

① 蕭揚整理《胡喬木談毛澤東與張聞天》，《炎黃春秋》2011年第8期，第32頁。

② 《井岡山鬥爭口述史》下冊，江蘇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554頁。

③ 黃克誠：《黃克誠自述》，第100-101頁。

邊工作的江華和曾志都有回憶，兩人的敘述有所差別，但此事引起毛澤東和朱德直接衝突上是一致的。江華的版本是這樣的：“毛澤東同志聽說，有一豬販子從石城趕著十幾頭豬到廣昌，被三十一團軍需處截留下來，給部隊宰殺吃了。他立即派人把三十一團軍需處長楊立三同志找來，問明了情況，嚴厲批評說：‘這哪裡是革命軍隊，簡直是綠林，這樣的軍隊還能打勝仗？還能戰勝敵人？’並且讓連夜出佈告，四處張貼，公開檢討錯誤，賠償豬款。這次毛澤東同志真是氣憤極了，還接連說要撤楊立三同志的職。我們在一邊都不敢說話，朱德同志忙講情說：‘豬已經吃了，就算了。’毛澤東同志一聽這個話，很嚴肅地說：‘哪有這樣的事，吃了還能就算了？這麼大方！’”^①

曾志的版本細節更多：“在紅四軍回師瑞金的行軍途中，我和朱軍長走在一塊。那天傍晚，部隊快到宿營地的時候，我們看到田野不遠處有四隻很大的肥豬在覓食。我聽到軍長身邊的一個戰士驚訝地說：‘哇，這麼大的肥豬，一頭足有三百多斤。這一定不是窮人家養的’，‘我們把它沒收了’，”“到了晚飯的時候，我們果然就吃上了久違的豬肉”。“第二天早上剛出發，就有人來告狀，說他的豬被紅軍殺了。後來一瞭解，那豬不是地主的，而是富農經商買賣的豬。毛委員聽了彙報後很生氣，命令有關部門向那商人賠禮道歉，並退還了豬款。晚上，毛委員召開幹部會議，對此事提出了嚴厲的批評”，怒斥“我們不作調查就殺了商人的豬，就違反了黨的商業政策，是土匪行為！”劉安恭“聽了毛委員的批評後很不滿意，覺得這次批評是沖著朱軍長。因為朱軍長知道此事，卻沒有制止，也有一些責任。會後，劉安恭在軍長面前挑撥離間，說毛委員對你怎麼能這樣，說前委書記在政治上幹預太多了。軍隊是司令部對外，政治部門不能對外，政治部門不能直接幹預軍隊的事”。^②

劉安恭是中央剛派來的高級幹部，4月初到達紅四軍軍部。他是四川

^① 江華：《追憶與思考》，第70頁。

^② 曾志：《一個革命的倖存者——曾志回憶錄》（上），第93頁。

人，早年留學德國柏林大學電機工程系，在歐洲加入共產黨，1924年回國在川軍楊森部任參謀，1926年幫助朱德在楊森部從事兵運，1927年參加南昌起義，失敗後被派到蘇聯紅軍高級射擊學校學習，1929年初回國。由於紅四軍對中央的信任以及幹部人才缺乏，他剛剛到達就被委任為軍政治部主任，5月下旬又被任命為剛恢復辦公的臨時軍委書記。劉安恭和朱德是四川同鄉，又有共同的留歐經歷，還曾經在楊森部共事，加上朱德的親和力，劉安恭和朱德在思想和感情上都比較接近。同時，見多識廣的劉安恭也沒把未曾留洋、有些土氣的毛澤東放在眼裡，這使他成為朱毛之爭中的一個重要角色。

劉安恭擔任臨時軍委書記後，在朱德等的支持下，立即毫不客氣地向前委書記毛澤東發起了挑戰，在軍委會議決議“前委只討論行動問題”，實際上架空了前委和毛澤東。蕭克回憶：“對這條決定，許多人就覺得不合適，下級怎麼能決定上級的權力範圍呢？從而議論紛紛。”^①5月底，在福建永定縣湖雷舉行的紅四軍前委會議上，爭論爆發了。劉安恭、朱德等批評前委“管的太多”，“權力太集中”、“代替了群眾組織”，是“書記專政”，是“家長制”，這當然是直接針對毛澤東的。毛澤東等人認為，當時工作的重心還是軍隊，“軍隊指揮需要集中而敏捷”，由前委直接領導和指揮更有利於作戰，應取消軍委。當時爭論激烈，意見無法統一，沒有做出決議，但毛澤東作為前委書記的權威大大動搖了。^②

蕭克回憶：“湖雷會議起，大會小會進行討論，有時甚至爭論起來。那時黨內不忌諱爭論，黨的文件、黨章都規定黨內實行民主集中制，黨員對問題有看法，在未作出決定之前，可以自由討論。我們剛剛學習過的中央第六次代表大會通過的黨章說，‘在未經決議以前黨內的一切爭論問題，可以自由討論’，還說‘可以舉行爭論’。所以，大多數人從關心黨、愛護黨的角度出發，發表自己的看法，展開爭論。”^③

① 蕭克：《朱毛紅軍側記》，第89頁。

② 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277頁。

③ 蕭克：《朱毛紅軍側記》，第89頁。

紅四軍一邊打仗一邊爭論，毛澤東發起反擊，6月8日召開前委擴大會議，前委不過十多個人，白砂會議擴大到了四十一人。毛澤東正式提出書面意見，並且情緒激烈地提出辭職。他認為，在軍委架空前委的情況下，“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責任又要擔負，陷於不生不死的狀態”，批評他的反對者“對於決議案沒有服從的誠意，討論時不切實爭論，決議後又要反對且歸咎於個人，因此，前委在組織上的指導原則根本發生問題”，然後激烈地表示“我不能擔負這種不生不死的責任，請求馬上調換書記，讓我離開前委”。^①朱德表示擁護一切工作歸支部的原則，並認為紅四軍在原則上堅持得不夠，成為一切工作集中於前委，前委對外代替群眾機關，對內代替各級黨部。^②劉安恭剛到紅四軍就擔任要職並挑起爭論，引起包括陳毅在內的很多幹部不滿，而且在遊擊戰爭時期，地方政權相關事務不多，前委主要就是領導軍隊。會議最終以36票贊成、5票反對的壓倒優勢決議撤銷臨時軍委，劉安恭的軍委書記當然自動免職，他兼任的政治部主任一職也由李任予（後由陳毅）接任。

（三）紅四軍七大與毛澤東被迫離開紅軍

但是白砂會議並未解決問題，紅四軍中的爭論越來越激烈，參加爭論的範圍也越來越大，不同意見尖銳對立，嚴重影響了軍隊的團結。紅四軍6月19日第三次攻佔龍岩後，領導層決定6月22日在龍岩召開紅四軍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希望大會能夠解決爭論、統一思想、實現團結。

在紅四軍七大之前，領導人之間的分歧已經公開了，毛澤東、朱德、林彪、劉安恭等都寫了公開信，發表在《前委通訊》上。這四封信中，毛澤東的信見於公開出版的《毛澤東文集》，根據毛澤東、朱德、陳毅的年譜、傳記等資料，他們爭論的問題和觀點是基本清楚的。這幾封信是由林彪的第一封信引起的，一縱隊司令（原28團團長）林彪本是朱德的舊部，但在這次

① 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278頁。

② 中央文獻研究室：《朱德年譜》，第148頁。

爭論中他站在毛澤東一邊。6月8日白砂會議前，林彪寫信給毛澤東，信中提出“黨管理一切”的主張，旗幟鮮明地支持權力集中，而且是集中到政治領導。^①信中也有一些人身攻擊的成分：“現在四軍裡實在有少數同志的領袖欲望非常高漲，虛榮心極端發展。這些同志又比較在群眾中是有地位的。因此，他們利用各種封建形式成一無形結合（派），專門吹牛皮的攻擊別的同志。這種現象是破壞黨的團結一致的”。^②林彪在信中還鼓勵毛澤東不要消極辭職，應與不良現象鬥爭。

林彪的信給困境中的毛澤東“很大的感動”，他在6月14日給林彪的回信中表示：“因為你的勇敢的前進，我的勇氣也起來了，我一定同你及一切謀有利於黨的團結和革命的前進的同志們，向一切有害的思想、習慣、制度奮鬥。”在信中，毛澤東回避了集權、分權問題，重點談了軍事觀點和政治觀點的衝突，並對朱德等做了一些偏於個人意氣的攻擊。^③

毛澤東對單純軍事觀點提出深刻批評，認為“四軍中向來就有一些同志是偏於軍事觀點的，與站在政治觀點即群眾觀點上的人的意見不合，這是一個很嚴重的政治路線問題”，有些同志“在會議時候最厭煩的是討論宣傳和組織問題，在遊擊工作中發展單純的軍事影響而不去發展政治影響”。“對於建設湘贛邊界武裝問題，因為要從紅軍中撥槍，歷來成為一個鬥爭，這是軍事觀點、群眾觀點兩種不同的政治路線發生出來不同見解的表現。紅軍的遊民成分產生了流寇思想，同時影響到城市政策與紅軍軍紀。負責同志亦顯然發出不同的意見，一種以為軍紀破壞一些城市破壞一些也沒有什麼大要緊；另一種則與此相反。對於軍紀破壞一事，有同志以為寧可沒有這次勝利，不可有這次軍紀破壞；還有同志則沒有這種深刻的感覺，馬馬虎虎歎息一下就算了。這是最近的例子，以前的例子很多。軍紀問題是紅軍一個很大的政治問題，但因一種人主嚴，一種人主寬，效

① 中央文獻研究室：《朱德年譜》，第150頁。

② 林彪：《給毛澤東的信》（1929年6月8日），《朱德傳》，中央文獻、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8頁。

③ 毛澤東：《給林彪的信》（1929年6月14日），《毛澤東文集》第一卷，第64頁。

果便相消了。”^①

在另一個重大原則問題上，毛澤東隱瞞了自己的集權主張，也沒敢公開批評過度的民主化，這顯然是民主氣氛高漲情況下委曲求全的策略，對於針對他的“家長制”的批評，他只是被動地進行了辯解。其實毛澤東在4月5日給中央的信中，不但強調政治觀點，而且很明確地主張集中權力，反對“無政府”，他談到：“紅軍無論在什麼時候，黨及軍事的統一指揮機關是不可少的，否則陷於無政府，定要失敗。”^②但在6月14日的公開信中，毛澤東只是說：“至於攻擊四軍黨內的家長制，這個同樣是一種形式主義的觀察”，“家長制的定義是：只有個人的命令，沒有集體的討論，只有上級委派，沒有群眾選舉”。“四軍黨的集體的討論，從支部到前委歷來是如此的，各級黨部會議，特別是前委縱委兩級會議，不論是常委會、全體會，應到委員之外，差不多每次到的有非委員的負責同志參加”。“大的問題，如井岡山之出發問題討論，東固之分兵討論，此次之爭論及分兵問題討論等等，總是徵求群眾意見的。說四軍黨內只有個人命令沒有集體討論，無論如何說不過去吧?!”^③

毛澤東在信中也批評朱德等以個人領導代替黨的領導，但這種批評並沒有多少依據，帶有個人意氣的成分。毛澤東認為朱德的個人威望是“黨的領導權在四軍裡至今還不能絕對建立起來的第一個原因”，“四軍的大部分是從失敗環境之下拖出來的（這是一九二七年），結集又是失敗之前的黨的組織，既是非常薄弱，在失敗中就是完全失了領導。那時候的得救，可以說十分原因中有九分是靠了個人的領導才得救的，因此造成了個人龐大的領導權”。“在湘南失敗及大餘一路逃難形勢之下，個人沒有顯出什麼大領導，同時非依賴黨的領導就會有塌台的可能，不比第一時期有迭次的軍事勝利，這是黨的領導抬頭的第一原因”。“黨的意志極大的限度的

① 毛澤東：《給林彪的信》（1929年6月14日），《毛澤東文集》第一卷，第69頁。

② 毛澤東：《紅四軍前委致中央的信》（1929年4月5日於瑞金），《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上），第298頁。

③ 毛澤東：《給林彪的信》（1929年6月14日），《毛澤東文集》第一卷，第73頁。

伸張、個人意志感到從來未有的痛苦，一連打了幾個勝仗和一種形式主義的理論從遠方到來，這三樣匯合所以爆發了近日的爭論。”^①

朱德比毛澤東晚一天，在6月15日也寫了公開信，表示不同意“黨管理一切”為最高原則，認為如果真要實行此口號，必然使黨脫離群眾，認為“此口號——黨管理一切——是違背黨的無產階級專政的主張。黨的組織最高原則，請看第六次大會的組織決議案（已印發），我們不能有絲毫的修改。至於我個人如稍有不合原則的，即可以鐵的組織紀律決絕”。“過去有黨代替群眾機關直接管理一切的問題。如寧都、永新、遂川遊擊時，已成通例口號。我們反對此口號”。“一切工作歸支部，此原則我是極端擁護的”，“要打破家長制及包辦制。一切實際工作集中於前委，前委開聯會開了數日，各級黨部坐等命令到來，以便遵照辦理，這樣何嘗有工作歸支部呢？”^②

在爭論期間，朱德對於毛澤東以個人凌駕於黨組織的傾向提出了尖銳批評，“認為黨員在黨內要嚴格執行紀律”，指出“恰恰在這個問題上，前委書記毛澤東沒有做好，不僅自由發表意見，自由漫罵同志，而且對中央和省委的指示也不認真執行”。^③劉安恭則把紅四軍分成兩派，認為朱德是執行中央指示的，毛澤東是自創原則不服從中央指示的，為了反對家長制，應該限制毛澤東的權力，進而提出“完全選舉制度及黨內負責同志輪流更換來解決糾紛”。^④

紅四軍各級幹部戰士都積極參加到討論中來。蕭克回憶：“各縱隊、支隊黨委討論得更熱鬧了，甚至連朱毛去留問題都提出來了。四軍駐新泉的七八天，連以上尤其是支隊、縱隊幹部天天開會，老是爭論這麼幾個問題：黨應不應管理一切？是管理一切、領導一切還是指導一切？等等。

① 毛澤東：《給林彪的信》（1929年6月14日），《毛澤東文集》第一卷，第65-67頁。

② 中央文獻研究室：《朱德年譜》，第150、151頁。

③ 蕭克：《朱毛紅軍側記》，第91頁。

④ 《紅軍第四軍第七次代表大會決議案》（1929年6月22日），韓榮璋、陳朝響、陳立旭：《毛澤東與古田會議》，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4頁。

當時，領導上號召大家發表意見，放手爭論。但得不出結果，大家覺得該由上邊領導人來管了，多數幹部希望停止爭論”。“蔣桂戰爭已結束，蔣馮已妥協，我們意識到敵人要來進攻”，“紅四軍第七次黨代表大會，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為著這樣的目的召開的。”^①

在這場充滿民主精神的討論中，支持朱德的人占了優勢。到6月中三打龍岩的時候，前委已經被架空，毛澤東很孤立，被迫退出軍事決策圈。江華提到：“軍委在小池開會研究部署三打龍岩的作戰計畫，通知譚震林參加，而黨代表毛澤東沒有接到通知。當時，譚震林同志建議毛澤東同志也去參加，毛澤東同志說，沒有通知，怎麼好參加。”^②

1929年6月22日，紅四軍在龍岩召開第七次黨代表大會，政治部主任陳毅主持會議，參加的支隊幹部和士兵代表四五十人，其實和白砂會議規模差不多，大會只開了一天，通過了陳毅主持起草的《紅軍第四軍第七次代表大會決議案》。決議否定了前委下再設軍委的意見，批評劉安恭“把四軍黨分成派，說朱同志是擁護中央指示的，毛同志是自創體系到不服從中央指示。這完全不是事實，是憑空臆斷的”。決議也批評林彪的信“是不對的”，“不要離開黨而談黨的嚴重問題，因為這樣不但不能解決黨內糾紛而更使之加重”，信的內容“未免過分估量，失之推測，這是錯誤的”。^③

決議認為毛澤東、朱德都有錯誤，各打五十大板。毛澤東的錯誤有七條：“英雄思想；固執己見；過分自信；不接受批評；有報復主義；對同志有成見；工作態度不好；小資產階級色彩濃厚。”朱德的錯誤也有七條：“相信私人；有迎合群眾造成個人信仰的傾向；無形間有遊民無產階級行動的表現；工作不科學，無條件，無計畫，馬馬虎虎；無形中誇大英雄思想的表現；不能堅決執行黨的決議；不注意軍事訓練，不注意維持軍紀。”決議結論是：“此次爭論，朱毛兩同志都有同等的錯誤，但毛同志因負黨代表與書記之工作，對此次之爭論應負較大的責任”。關於朱毛的去留，決議提出：

① 蕭克：《朱毛紅軍側記》，第93頁。

② 江華：《追憶與思考》，第89、90頁。

③ 中央文獻研究室：《朱德年譜》，第152頁。

“由中央處置，在中央未派人來以前可繼續工作。”決議給“毛澤東同志予以嚴重警告，朱德同志予以書面警告。”^①大會選舉了陳毅、毛澤東、朱德、林彪、劉安恭、伍中豪、傅柏翠及各縱隊士兵代表等13人組成的新前委，在前委書記選舉中，毛澤東落選，陳毅當選新的前委書記。毛澤東明確表示不滿，氣憤地說：“會議對我個人有許多批評，我現在不辯，如果對我有好處，我會考慮，不正確的，將來自然會證明他這個不正確。”^②

陳毅主持紅四軍七大希望通過調和來統一思想、促進團結，但並沒有實現目的，兩派原則上的分歧並未解決，甚至已經無法再繼續共事。毛澤東落選後不願在前委工作，激憤地要求離開紅軍到福建地方，準備去蘇聯留學，支持毛澤東的譚震林、江華、蔡協民、曾志等也隨同離開。曾志說：“在爭論期間朱軍長曾找過我，問我的觀點如何。我當時只憑著自己入黨學到的一些理論知識和實踐體會，回答說：‘黨在軍隊中應起核心領導作用，大革命時，黨在人民群眾中，在國民黨軍隊中都是如此。’這樣，在紅四軍的‘七大’後，我被劃到毛澤東那一邊去了。我看已無法再呆在紅四軍，也就跟著毛委員去了福建。”^③江華也提到：“我們離開部隊由龍岩出發時，把我的馬也扣留下了，那時我們一行人真有些灰溜溜的樣子。”^④這是毛澤東政治生涯中的重大挫折，在三十年後1959年廬山會議上，他談到紅四軍七大還餘怒未消地說：“司令部惹不得，黨委不能討論，不然叫越權”，“還是舊軍隊東西，名為前委，只能管政治，不能管軍事。”^⑤

雖然由於幹部戰士認識水平等條件限制，紅四軍七大沒能達到結束爭論、加強團結的目的，但它表現出的民主精神在中共歷史上是非常突出的。蕭克多年以後還興奮地說：“那時候，不管上級還是下級，有意見在黨

① 賴宏：《毛澤東與紅軍》第一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年，第195-196頁。

② 陳毅在老同志座談會上的發言（1971年9-10月），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893-1949》，第203頁。

③ 曾志：《一個革命的倖存者——曾志回憶錄》（上），第94頁。

④ 江華：《追憶與思考》，第97頁。

⑤ 李銳對1959年8月1日政治局常委會的記錄稿，《廬山會議實錄》，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98頁。

內指名道姓批評。好不好？我看好，一個組織，如果主要領導人講了定性的話，不管正確與否，就沒有人敢講話了，那就危險了，如果犯錯誤就是大錯誤。四軍‘七大’的決議案批評四軍在位的黨的主要領導人是有利於黨的事業的。我曾向一位老同志談過，如果在‘文化大革命’前夕我們黨還保持像四軍‘七大’那樣一種批評精神，‘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也許就搞不起來。”^①的確，民主制度常會犯錯，但是也有糾錯的能力，這是其最主要的優點，糾錯機制失靈的政治制度是危險的。

三、中共中央對民主的認識和對毛澤東的強力支持

（一）中共中央對黨內民主的認識

中國是缺少民主傳統的國家，建黨初期的中共黨員雖然是接受五四民主思想的新青年，但他們同樣缺少運用民主制的經驗。在六大前後，紅四軍遇到的問題並不是孤立的，無論是蘇區還是白區，很多黨組織都出現了類似的內部紛爭，比較突出的有北方順直省委的長期紛爭、江蘇省委的派別活動，甚至還出現了陳獨秀領導的托陳派分裂活動。這些問題嚴重削弱了共產黨在嚴酷環境下的生存和鬥爭能力，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已經著手從思想和組織上反對極端民主化。

順直省委是中共在北方的領導重心，指導範圍包括華北數省。但是從1927年開始，順直省委陷入了長期紛爭，特別是工、學矛盾尖銳，以彭述之為代表的知識份子幹部和工人幹部難以合作。政治局委員蔡和森1927秋到1928年初兩次改組順直省委，提拔工人幹部，知識份子幹部受到排擠，引起彭述之等的強烈不滿，雙方激烈爭鬥。蔡和森和彭述之給中央寫信相互控告，甚至出現保南另立省委事件，黨組織在內鬥中幾乎陷入癱瘓狀態。中央派高級幹部陳潭秋、劉少奇到北方解決順直省委紛爭，都沒有

^① 蕭克：《朱毛紅軍側記》，第98頁。

完全成功。

劉少奇在1928年9月報告中說：“極端民主化的結果是什麼？是發展同志的個人自由和糾紛，破壞黨的組織和權威。黨的決議可以不執行或改變或反抗，命令可以不服從，黨的紀律完全破產，我看見好幾次省委給同志的警告信，同志接了看見是警告，還不等看完即勃然大怒，將信撕碎，擲入丙丁，大罵一頓。北京市委要發傳單，有一個組說沒有經他們通過，他們不發。保南同志說：省委改組他們沒有代表參加，他們不承認省委，省委不合法。京東活動同志會的決議案幾次催促要省委‘執行’，天津同志提出許多意見要省委執行，省委沒有執行即便大罵，大家是英雄好漢，驕兵悍將，省委做他們的尾巴還做不好，到處可以聽見罵省委的呼聲”。^①

中共中央在11月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嚴厲批評順直省委：“自去年九月北局成立及和森同志到北方巡視以至六次大會前，省委經過兩次改組，但順直的黨，不僅沒有進步，反而退化糟糕至不可救藥”。“組織上則極端民主化，用金錢收買同志，鬧經濟問題，小資產階級意氣的爭，派別的糾紛，在京津黨部中，鬧得一塌糊塗，因此群眾工作多被放棄，省委對下級黨部又失信仰，對外縣多失聯繫，保南則自立省委與省委對抗”。“中央政治局因為順直之錯誤，和森同志及藻文、仲一同志應負最嚴重的責任，決定開除和森政治局及常委工作，開除藻文、仲一兩同志中央委員資格”。^②直到12月周恩來到天津，經過耐心細緻的說服，順直紛爭才基本停止。

1928年11月《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告全體同志書》用了很大篇幅討論群組織原則，其中第一條要反對的就是“極端民主化的傾向”，其中談到“從前組織上有一種‘家長制’的形式，黨員群眾對於黨部，下級機關對於上級，只有機械的服從，而無活潑的黨的生活。及到改造黨的時候，許多地方又走向極端民主化的方向，同志對於黨的決議，可以隨便不執行。

^①《劉少奇關於最近順直黨內狀況的報告》（1928年9月7日），《中共中央北方局文件彙集》（一），中央檔案館1990年，第461-462頁。

^②《中共中央政治局向國際的報告》（1928年11月28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4），第720頁。

上級機關發一傳單，沒有交支部通過，支部居然提出質問。同志不得黨的許可，可以自由行動。這種小資產階級極端自由的思想，可以把黨的組織打的粉碎，以至於消滅。”^①

《告全體同志書》對各種無原則糾紛也提出嚴厲批評，包括個人意氣之爭、小組織傾向、工學界限等：“把對政治變成專門對人，便成了鬧不清的意氣之爭了。因意氣而攻擊他人，因意氣而不接受他人的批評，甚至有不站在黨的立場去考查同志的意見與工作，專以意見去推測他的動機而造成黨內無窮的糾紛”。“現在黨內許多小組織的傾向，都是由私人感情的結合，或部落的觀念形成的。少數有領袖欲的人，想造個人地位，利用這些結合，攻擊地位較高或地位相等的人，因此資產階級種種政客官僚的卑污惡濁手段，一例發生了。這是破壞黨的最惡劣的傾向。”^②

在1929年6-7月中共六屆二中全會上，極端民主化成為重要議題之一。在《組織問題決議案》指出的不正確觀念中，第一就是“極端民主化的傾向”，批評“有些同志不顧黨的主觀條件如何，不顧黨的秘密存在與嚴厲的白色恐怖，要求無條件的實行黨內民主化，甚至常借此反對指導機關的決議和指示，鬧黨內糾紛問題，削弱指導機關的威權，”認為在“黨員政治水平線低微的條件下，加以客觀上白色恐怖嚴重，黨內民主化的執行限度是應當有條件的”，提出“最高機關的決議，下級機關應當無疑地執行。在必須的時候下級黨部的要員與書記，上級黨部可以指派。”^③

1929年也是托陳反對派積極活動、走向決裂的時期，爭論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組織原則問題。在殘酷的白色恐怖中，這種劇烈的內部鬥爭已經威脅到黨的生存。8月5日，陳獨秀致信中共中央，批評中央“老是固執你們的褊狹性，而不顧及黨內德謨克拉西的重要性，而畏不同的意見如蛇

①《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告全體同志書》(1928年11月11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4)，第704-705頁。

②《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告全體同志書》(1928年11月11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4)，第705-706頁。

③中共六屆二中全會《組織問題決議案》(1929年7月9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5)，第216-217頁。

蠟，而企圖用中央威權霸蠻的造成你們意見的一致，對於不同的意見，禁止討論，或消極的不在黨報上公表出來”。陳獨秀要求“在組織上，盡可能的擴大黨內需要的德謨克拉西，例如支部及區委都實行選舉制，如有可能，省委也不可例外；黨員對於黨的政策有‘自我批評’的自由，各級黨部開會有討論政策及工作方法的自由，黨員間政治上意見不同的爭辯，准其在黨報上發表。”^①

在9月20日江蘇省委會議上，托陳派的彭述之三次發言，與中央宣傳部秘書長惲代英激烈辯論，聲稱“鐵的紀律”是“廢話”、是“官僚壓迫群眾”的工具。托陳派還積極活動，“不放棄任何一個關係，拉共產黨員轉向託派”。^②托陳派“要求公開討論一切不同路線的意見，要求把反對全國代表大會決議的意見都公開在黨報上發表，要求從支部到中央都實行民主的選舉”，抨擊中共中央“命令主義”、“一貫的命令主義”。中央10月5日反托陳派決議則認為：“黨的民主化的限度是要依據客觀和主觀的條件來決定的，如果客觀的白色恐怖異常嚴重的時候，而要求超越可能的民主化，只是‘幫助俄皇憲兵’（列寧這樣說過）的辦法”。^③11月13日，中央發出致全黨的公開信，抨擊托陳反對派“積極進行破壞黨的一致和分裂黨的活動”，“以極端民主化來鼓動同志反對上級指導機關之指導”。^④11月15日，中央宣佈開除陳獨秀、彭述之等五人的黨籍，這是這個時期中共中央與極端民主化鬥爭中採取的最嚴厲措施。與中共決裂以後，主張民主化的托陳派無法適應殘酷的鬥爭環境，大多數幹部很快被國民黨捕獲，政治上趨於消亡。

綜上，中共中央從實踐中認識到極端民主化的危害，為了維護黨組織

①《陳獨秀關於中國革命問題致中共中央信》（1929年8月5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5），740、742頁。

②唐寶林：《中國託派史》，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4年，第75頁。

③《中央關於反對黨內機會主義與托洛斯基主義反對派的決議》（1929年10月5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5），第503頁。

④《中央給各級黨部及全體同志的一封公開信》（1929年11月13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5），第543-544頁。

的生存和戰鬥能力，已經傾向於集中權力，這種縱覽全域的高度是在深山裡奮鬥的紅四軍幹部難以達到的，這也是中央能夠指導紅四軍解決朱毛之爭的重要前提。

(二)陳毅上海彙報與中央“九月來信”對毛澤東的支持

1929年初，受到共產國際的影響、也因為當時紅軍確實處境艱難，中央對形勢做出了悲觀的判斷，在“二月來信”中提出毛澤東、朱德離開紅軍，把紅軍分散成若干小的遊擊隊。中央4月指示信中仍要求毛澤東、朱德準備離軍，先派重要幹部到中央彙報工作。紅四軍七大之後，新當選的前委書記陳毅承擔了到上海彙報的任務。在去上海之前，陳毅專程到福建蛟洋向毛澤東徵詢意見，並請他回紅四軍主持前委，但“兩人在交談中又爭論起來，各執己見，未能統一”，^①毛澤東不同意回紅四軍，陳毅8月上旬動身，朱德代理前委書記。

在陳毅與中央接上關係之前，中央已收到紅四軍七大文件和內部紛爭的報告，並於8月21日發出了周恩來起草的《中央給四軍前委的指示信》，雖然由於工作人員的失誤，紅四軍並未收到這封信，但此信代表了中央對紅軍組織原則的認識。指示信不僅明確批評朱德的極端民主化傾向，而且認為毛澤東也沒有勇敢地捍衛集權制：“玉階主張固然有極端民主化的傾向，便是潤之的答覆也還不能對於軍隊中之黨的支部工作，尤其是在目前轉戰千里之紅軍中黨的支部工作有一明確的答覆。對於集權制沒有勇敢的回答他是在目前與敵人肉搏的環境中所絕對必需。”信中對“劉安恭同志企圖引起紅軍黨內的派別鬥爭”提出嚴厲批評，並且指示劉安恭離開紅四軍，“調來中央”。^②

陳毅經廈門、香港，於8月17日左右到達上海，21日以後與中央接上關係。他在上海奮筆疾書，寫了五個書面報告，詳細彙報了紅四軍幾年苦

^① 江華：《追憶與思考》，第94頁。

^② 《中央給四軍前委的指示信》（1929年8月21日），《黨的文獻》1991年第2期，第39-42頁。

鬥中積累的經驗和教訓。在《關於朱、毛爭論問題的報告》的最後，陳毅提出如果中央能派兩人替代，則朱、毛可同時離開，如果不能派出兩人，可“先派一人擔任前委書記，毛可先走，朱可暫留工作”。^①中央對紅四軍的經驗非常重視，政治局決定由李立三、周恩來、陳毅組成委員會，專門研究相關問題，並提出決議草案。在上海期間，陳毅把紅四軍在艱苦奮鬥中創造的獨特經驗提供給中央，同時在與周恩來、李立三的深入討論中，也開闊了視野，瞭解到黨的全面情況，自我感覺是上了一個學習班，特別是認識到極端民主化是對全黨的嚴重威脅，紅四軍的紛爭也是出在這個問題上，心悅誠服地轉變了觀點。

中共中央1929年9月28日發出了給紅四軍前委的指示信，此信由陳毅執筆起草，周恩來、李立三、陳毅討論定稿，史稱“九月來信”。指示信嚴肅批評了紅四軍中的極端民主化問題，推動了古田會議的召開，強化了紅四軍中政治領導以及毛澤東的權威，對紅軍政治委員集權體制的確立有深遠影響。

指示信明確提出紅軍應集中權力。“紅軍不是與工會農會同等的組織，他是經常與敵人在血搏狀態中的戰鬥組織，他的指揮應該集中。固然紅軍的兵士應該以政治教育發動他們自覺向上，但絕不能動搖指揮集中這個原則。軍隊中民主化只能在集中指導下存在，並且實行的限度必須依據客觀條件來決定伸縮，不應漫無限制，以妨害軍紀之鞏固。”對於士兵委員會的職權，指示信也做出了明確限制：“其職權規定為監督軍隊經濟，參加軍隊管理，厲行士兵政治教育，做群眾工作，與軍事機關的關係用報告建議而不能直接管涉。發生特別事件政治委員有解散兵委之權”。^②

關於所謂“家長制”，指示信明確支持毛澤東。“黨的一切權力集中於前委指導機關，這是正確的，絕不能動搖。不能機械地引用‘家長制’這

^① 袁德金：《毛澤東與陳毅》，中國青年出版社2008年版，第59頁。

^② 《中央給紅軍第四軍前委的指示信》（1929年9月28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5），第483-484頁。

個名詞來削弱指導機關的權力，來作極端民主化的掩護。前委對於一切問題毫無疑義應先有決定後交下級討論，絕不能先徵求下級同意或者不作決定俟下級發表意見後再定辦法，這樣不但削弱上級指導機關的權力，而且也不是下級黨部的正確生活，這就是極端民主化發展到極度的現象。”^①

針對紅四軍自下而上全體參加爭論的現象，指示信認為：“紅軍是生長在與敵人肉搏中的，他的精神主要的應是對付敵人。前委對於朱毛兩同志問題，沒有引導群眾注意對外鬥爭，自己不先提辦法，而交下級自由討論，客觀上有放任內部鬥爭關門鬧糾紛的精神”。“這次擴大會及代表大會的辦法是削弱了前委的權力，客觀上助長極端民主化的發展”。“對朱毛問題沒有顧及他們在政治上的責任之重要，公開提到群眾中沒有指導的任意批評，使朱毛兩同志在群眾中的信仰發生影響。再則一般同志對朱毛的批評大半是一些唯心的推測，沒有從政治上去檢查他們的錯誤，這樣不但不能解決糾紛而且只有使糾紛加重。”^②

指示信明確要求以毛澤東為核心建立政治委員制度。“黨代表名稱應立即廢除，改為政治委員，其職務為監督軍隊行政事務，鞏固軍隊政治領導，副署命令等。軍政治委員可由前委書記兼”，並且明確指定“毛同志應仍為前委書記”。雖然指示信對朱毛兩人都提出了溫和的批評：“兩同志常採取對立的形式去相互爭論”，“兩同志常離開政治立場互相懷疑猜測，這是最不好的現象。”^③但是毫無疑問，指示信在朱毛之爭中強力支持了毛澤東，要求在紅四軍建立權力集中的政治領導，並明確指定毛澤東以前委書記和政治委員的身份成為政治領導的核心。

①《中央給紅軍第四軍前委的指示信》(1929年9月28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5)，第486頁。

②《中央給紅軍第四軍前委的指示信》(1929年9月28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5)，第488頁。

③《中央給紅軍第四軍前委的指示信》(1929年9月28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5)，第483、488-489頁。

四、古田會議與政治委員權力的上升

(一)中央指示信的傳達與古田會議的前期準備

紅四軍七大之後，毛澤東離開紅軍，新任前委書記陳毅也很快去上海彙報，紅四軍的政治領導明顯削弱了。代理前委書記的朱德作風民主，但當時紅軍還是創建不久的農民隊伍，幹部戰士各方面素質都有限，甚至相當多的人是文盲，在這種情況下，紅四軍陷入眾說紛紜的混亂之中。

9月下旬，朱德率紅四軍攻佔上杭，在上杭太忠廟召開了紅四軍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熊壽祺在1930年給中央的報告中談到：“八次大會前後，前委為了請調工作問題（當時很多同志請調工作），常常討論幾個鐘頭，無法解決”。“各縱隊同志在會場上為了調人調槍這些問題，當然要為自己說話，於是爭論起來了，沒法解決。前委負責人，只說些調和話”。“當時有許多同志說，前委是各縱隊聯席會。但是前委的負責同志還以為要這樣才對，才是由下而上的民主制。八次大會時為了一個紅軍法規中的黨代表權力問題，討論了兩天仍舊沒法解決，結果還是決定請示中央”。“總之，當時前委什麼事都是民主，大家要怎樣幹就怎樣！前委事先對於選舉沒有絲毫意見”，“實行所謂‘由下而上的民主制’，一開會就得爭論半天，前委還認為這樣才是無產階級的辦法。因此當時全軍政治上失掉領導的中心，對政治分析也是大家來議，各級同志又沒有報看，哪裡議得出！在上杭時天天為調人調槍爭論。這樣極端民主化的領導，一直到陳毅同志回來之後得著中央指示，才改變了一大半。”^①

毛澤東也收到紅四軍八大的開會通知，但他拒絕到會，回信說：“我不能夠隨便回來”。大會命令他必須到會，正患嚴重瘧疾的毛澤東服從命令，坐擔架趕到上杭，但到達時大會已經結束。“大家見他身體虛弱，渾身

^① 熊壽祺：《紅軍第四軍狀況》（1930年5月），《黨的文獻》1999年第2期，第70頁。

浮腫，讓他繼續養病。”^①毛澤東這次確實病得很重，據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所藏黃琳（即江華）8月29日給福建省委的信，毛澤東感染瘧疾後，“因無西藥醫治，延長到今更為沉重。毛同志已帶數名同志伏在山中休養。他的身體經過數年軍隊的艱難跋涉，弱及不勝風飄，須要長期休養。而休養時沒有西藥醫治，真急得我們束手無策。”^②10月18日朱德給中央的報告中也提到：“毛同志久病，現雖起床，尚不能行走。”^③共產國際刊物甚至誤信傳聞，發表了毛澤東的訃告。

10月下旬，朱德率紅四軍南下出擊東江，正好遇到從上海回來的陳毅，於是連夜召開了前委會。陳毅傳達了中央指示，前委致信請毛澤東回紅四軍重新擔任前委書記。10月31日，紅四軍在廣東梅縣遭遇嚴重挫折，撤回福建。此時政治領導很薄弱，連廣東省委派到四軍的代表都注意到了，省委接報深感憂慮，給中央寫信要求派人加強四軍的政治領導：“這次攻梅失利，雖受一相當打擊，然而損失不過二百餘人；但退出東江，紅軍士兵的逃跑給我們一個驚人的數目，竟達戰爭死亡數倍以上，甚至井岡山出來的老兵士，都有逃跑者。這個失敗的主要原因，在軍事方面固然是反攻梅城的失策和退走的失敗情緒所致，尤其充分的證明四軍中的政治和黨的工作的破產。所以攻梅失敗，在軍事上失敗少，而在政治上失敗尤大，因此省委請求中央無論如何都要派一個政治上能負責的同志主持前委工作”，“萬望中央能夠接受這個意見，這是四軍的成敗所系”。^④

此時毛澤東病情已經好轉，11月26日在福建長汀與紅四軍會合。紅四軍28日召開前委擴大會議，就準備召開第九次代表大會貫徹中央指示達成了共識。當日毛澤東心情愉快地致信黨中央：“四軍黨內的團結，在中央正確指導之下，完全不成問題，陳毅同志已到，中央的意思已

① 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上卷），第286頁。

② 村田忠喜著，任常毅摘譯《1929年的毛澤東》，《黨史研究資料》1987年12期，第24-25頁。

③ 《紅四軍前敵委員會關於開往潮梅一帶遊擊情況的報告》（1929年10月18日于上杭），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黨史教研室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14），第234頁。

④ 《中共廣東省委關於紅四軍工作意見給中央信》（1930年1月16日），《廣東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甲17），第32頁。

完全達到。”^①

為了紅四軍黨的九大能取得成功，前委做了深入細緻的準備工作。12月上旬在連城新泉整訓期間，毛澤東每天召集調查會，調查紅四軍存在的問題。“參加調查會的，有各縱隊、大隊、大隊政委，連隊支部書記和士兵。每次到會十餘人，在一間民房的小廳裡開會。”毛澤東“要求到會同志如實反映平日所見所聞的官兵思想情況，作為整頓軍隊的依據”。當時軍隊風氣民主，官兵們“大膽發言，知啥說啥；說到好笑處，就哄堂大笑，無拘無束。記得羅榮桓和賴傳珠同志反映的情況最多。羅榮桓同志平日很留心部隊官兵的思想情況，經常作詳細的筆記。調查會上，侃侃而談。他把記錄材料原原本本向毛委員反映，毛委員十分滿意，時時微笑，向他點頭，對他的關心部隊政治情況表示嘉許。”^②

由於敵情變化，紅四軍12月中旬轉移到上杭古田。剛到古田，毛澤東就招集各級黨代表開了準備會。賴傳珠回憶：“開到古田的後一天，忽然接到通知，要我到軍部開會。到了軍部一看，各支隊、縱隊的黨代表全到了。此外還有一部分大隊的黨代表”。毛澤東宣佈“這次會議是為了徹底肅清四軍黨內存在著的各種不正確傾向”，接著“分組討論。我參加了研究如何克服非組織觀點的小組。”“經過十多天的討論，大家不但對錯誤思想的產生根源及其危害性取得了一致的認識，而且找到了糾正的方法。這次會議雖然才開了十多天，但是我卻感覺到就像進了一次學校，各方面有了很大的提高。我回到十二大隊之後，立即召開了支部委員會，傳達了會議的精神”。^③熊壽祺也談到：“九次大會的各種提案都是在大會前由前委召集支隊以上的書記、宣傳、組織開會起草，前委審查以後提到大會的”。“這樣一來，九次大會便有精神了，只開了兩天，決定了很多的工作路

①《毛澤東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國人民解放軍出版社重印1984年，第26頁。

② 吳仁聲：《古田會議前後散記》，《重評古田會議》，龍岩地委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1984年，第54-55頁。

③ 賴傳珠：《古田會議前後》，《重評古田會議》，第34-35頁。

線，絕不像八次大會時無組織狀態的開了三天毫無結果。”^①

(二)古田會議強化政治委員，但仍重視士兵委員會

由於中央的指示信和長達一個月的細緻準備，紅四軍中關於重要問題已經基本統一了認識，接受了中央的指示，所以紅四軍黨的九大——即“古田會議”召開的時機已經成熟。實質工作在會前已經完成，會議本身只是形式上的認可，開了兩天就順利結束。會議決議案涉及了很多方面，但中心內容是關於權力結構的兩個方面，這部分列在決議的前面：第一，紅軍權力應該集中；第二，權力應該集中於政治領導。

第一，紅軍應集中權力，決議是通過批評“極端民主化”來闡述的。決議指出：“紅軍黨在接受中央指示之後，極端民主化的現象，確實減少了許多，例如黨的決議之比較的能夠執行，‘由下而上的民主集權制’、‘先交下級討論，再由上級決議’等口號之沒有人說了”。“極端民主化的危險，在於損傷以至完全破壞黨的組織，削弱以至完全毀滅黨的戰鬥力，使黨擔負不起鬥爭的責任，由此走到革命的失敗”。“在組織上，厲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生活。其路線是：1、黨的領導機關要有正確的指導路線，遇事要拿出辦法，以建立領導的中樞。2、上級機關要明瞭下級機關的情況，及群眾生活情況，成為正確指導的社會來源。3、黨的各級機關決議事情，不要太隨便。一成決議，就須堅決執行。”^②

第二，權力應集中於政治領導，也就是各級政治委員，是黨指揮槍，不是黨和槍平行，更不是槍指揮黨。關於這一點，決議是通過批評“單純軍事觀點”來闡述的。決議嚴厲批評“軍事領導政治”的傾向，指出有些同志“承認軍事政治二者的對立，不承認軍事只是達到政治任務的工具之一。甚至還有說‘軍事好，政治自然會好，軍事不好，政治也不會好’的，則更進一步而承認軍事是政治的領導了”，強調“離了對群眾的宣傳、組織、武裝、

^① 熊壽祺：《紅軍第四軍狀況》（1930年5月），《黨的文獻》1999年第2期，第70頁。

^② 《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1929年12月），《毛澤東集》第二版（2），第81-82頁。

政權等目標，就是完全失去了打仗的意義，也就根本失去了紅軍存在的意義”。決議批評某些幹部“把政治工作機關隸屬於軍事工作機關，提出‘司令部對外’的口號。這種路線發展下去，便有走到脫離群眾、以軍隊壟斷政權、離開階級地位的危險，如像國民黨軍隊所走的的道路一樣”。^①在決議最後，硬性規定“軍事機關一切命令”，“政治委員須副署”，^②在制度上確立了政治領導的權威。

重新當選前委書記的毛澤東 1930 年 1 月 6 日在給中央的報告中談到：“十二月一個月前委的工作”是“召集九次大會接受中央的指示”；“用各種方法，建立紅軍的政治領導”；“糾正黨內各種傾向”。毛澤東欣慰地說：“此一月的光陰易過，紅軍在表面中在於政局沒有驚人的動作，但於今後的鬥爭，卻建立了基礎。”^③中央 2 月 1 日給廣東省委的信中也提到：“四軍前委完全接受中央的指示，前委一切問題已解決。潤之來信很積極，發展方向他們亦接受中央指示”，“潤之現已複職，中心的政治領導亦已確立，此稍可使中央放心”。^④

古田會議後政治委員的地位越來越高，以政治委員為中心集中權力成為紅軍的基本原則，這是黨指揮槍的實際體現。中共中央 1930 年 3 月給鄂豫皖紅軍的指示信明確規定：“政治委員是代表政權與黨兩方面來領導軍隊的，政治委員在政治上、在黨的立場上比軍官許可權大，即在軍事上一切問題亦應得政治委員的副署。”^⑤

當然，紅軍權力結構從分散到集中是一個漸進的演變過程，古田會議

①《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1929 年 12 月），《毛澤東集》第二版（2），第 78-79 頁。

②《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1929 年 12 月），《毛澤東集》第二版（2），第 124 頁。

③《紅四軍前委員向中央的報告》（1930 年 1 月 6 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黨史教研室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14），236 頁。

④《中央關於紅四軍問題給廣東省委的指示信》（1930 年 2 月 1 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黨史教研室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14），第 238 頁。

⑤《中共中央關於成立紅一軍及軍事工作的指示》（1930 年 3 月 18 日），總政治部辦公廳編：《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歷史資料選編》第一冊，第 422 頁。

雖然批評了極端民主化，但士兵權力和士兵委員會也受到重視。古田會議特別通過了保護士兵人身權力的《廢止肉刑問題》決議，嚴厲批評“各部隊中凡打人最厲害的，士兵怨恨和逃跑的就越多”，“二縱隊逃兵比任何縱隊多，原因雖不止一個，然二縱隊下級官長的大多數打人的習慣最厲害，乃是重要原因之一。二縱隊曾發現過三次自殺事件（排長一士兵二），這是紅軍最大的汙點”，決議決定“由最高軍政機關會銜發佈廢止肉刑的通令，並頒佈新的紅軍懲罰條例”。^①

《廢止肉刑問題》決議明確規定了士兵委員會的監督權：“由士兵會召集士兵代表會議，除擁護這個改革，以後要自覺地遵守紀律外，並要森嚴群眾的紀律制裁，以達到肉刑廢止後的良好收穫”。^②士兵委員會的監督權給軍官不小的壓力。耿飆擔任紅三軍九師教導隊長兼指導員時，一名隊員不但遲到，而且言語頂撞。年輕氣盛的耿飆忍不住火，“順手給了他一拳”，“這事成了士兵委員會的議題，他們當晚便召集了軍人大會，對我實行‘彈劾’”，“士兵委員會事先顯然做了準備，對‘民主’程式安排得很有板眼。先是輪流念《古田會議決議》、《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等條文，每念一段，士兵委員會的主席就宣佈‘耿飆同志’犯了第幾條，並由大家舉手認可”。“我犯的錯誤是‘軍閥主義’、‘官長打士兵’和《八項注意》中‘不許打人罵人’的前半部。‘說話和氣’一條，大家認為可以忽略不計。”最後，士兵委員會決定對耿飆罰款一元，這大約是半個月的零花錢，他在幾十年以後還清楚地記得這個教訓。^③古田會議後大約一年多的時間內，士兵委員會仍然有相當大的權力。

可以說，古田會議一方面在高層加強政治委員的集中領導權，同時在基層保障士兵的基本權力，從而壓縮了中層幹部的權力空間，改變了以往

① 《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1929年12月），《毛澤東集》第二版（2），第117-118、120頁。

② 《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1929年12月），《毛澤東集》第二版（2），第120頁。

③ 耿飆：《耿飆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91年，第131-132頁。

中層幹部對上可以抗拒領導，對下可以打罵士兵的權力過大現象。中層幹部的權力過大是造成部隊組織鬆散的主要方面，普通士兵的的權力保障加強了士兵的忠誠，增加了紅軍的凝聚力，使得士兵能夠對軍官起到監督作用，所以紅軍中屢有叛變的幹部，但是他們一般都無法拉走軍隊。

毛澤東有明顯的平民傾向，對基層群眾比較信任，而對中層幹部和中間機構比較懷疑。他直到晚年仍對士兵委員會念念不忘，在文革前一年重上井岡山時憂慮地說：“隨著我們掌握政權，現在全國各行各業都建有黨的組織，成為領導機構。黨的力量加強了，但自覺接受群眾監督，實行政治民主，保證我們黨不脫離群眾，比井岡山時士兵委員會要差多了。全國性的政治民主更沒有形成為一種制度、一種有效的方式，井岡山時期士兵委員會是有很大作用的”，“全國都需要推行政治民主”。“現在工廠的工會可以監督廠長書記嗎？誰又來監督我們的市委書記、省委書記？誰來監督中央的領導？”王卓超回憶談話情景時說：“那天下午，毛主席情緒激動，又有幾分憂鬱”，一直說了兩個多小時。^①由此可見，紅軍時期士兵委員會的經驗與毛澤東在文革時期嘗試群眾性直接民主是有關聯的。

五、政治委員與士兵委員會的消長——紅軍的權力集中趨勢

（一）共產國際指示強化政治委員，撤銷士兵委員會

從1929年到1930年，國民黨各派軍隊陷入持續混戰，紅軍和蘇區形勢好轉，到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分散的遊擊隊迅速整編為正規紅軍的大部隊。1930年夏天，中央要求紅軍中的黨組織完全公開：“紅軍是中國革命主要動力之一，在目前猛烈擴大紅軍路線之下，加強黨在紅軍中的領導，是保障中國革命勝利主要條件之一，因此黨在紅軍中必須完全公開，

^① 馬社香：《“井岡山的革命精神不要丟了”——王卓超回憶1965年毛澤東在重上井岡山期間的一次談話》，《黨的文獻》2006年第3期，第23-24頁。

改變過去秘密組織方式”。^①黨組織直接出面領導軍隊，士兵委員會等群眾組織的重要性就下降了。

1930年7月，中央第147號通知要求紅軍集中權力，這預示隨著蘇區政權的鞏固和大規模戰爭的開始，紅軍建軍初期權力分散階段走向終結。“紅色區域的軍事政治指導機關，無疑要採用絕對的強有力的集中形式。這不但是無產階級專政的雛形，而且是在大規模的國內戰爭時期戰爭區域必然要採用的指揮形式”。“紅軍本身的指導機關即由政委，黨的書記，軍事主管官三人組織軍事政治蘇維埃（即現在的前委），以政委為主席，決定一切工作。”通知明確批評極端民主化的危害：“小資產階級分子，時常藉口黨內民主不夠，要求擴大黨內民主，主張無限制的實行自我批評”，“擴大無原則的鬥爭，這是極危險的危害黨的傾向，在客觀上必然走到瓦解黨的道路”。^②

中共是共產國際的支部，蘇聯經驗對中國紅軍建設影響很大。俄國1917年二月革命後，布爾什維克通過士兵委員會瓦解了舊軍隊，但正式紅軍大規模建立之後，為了加強黨對軍隊的控制，建立了政治委員制度，士兵委員會也被逐漸取消。隨著中國紅軍和蘇區進入新發展階段，共產國際也指示中共強化政治委員制度，逐步取消士兵委員會。馬馬耶夫1930年4月談到中國紅軍時說：“我覺得，政治部和支部為士兵委員會制度所取代了”，“士兵委員會的職能不僅是管理方面的，士兵委員會還幹預指揮員的任用。這是十分嚴重的弱點之一”。“政治委員的問題同樣提得不突出、不明確，也就是說提得很不好。我不知道他們那裡是否有政治委員。在毛澤東的軍裡有政治委員，但其他部隊有無政治委員我不清楚”。“我們應該告訴黨，政治委員是一把指向指揮員太陽穴的手槍。政治委員是黨和革命政權的代表”。“我毫不懷疑，士兵委員會作為瓦解敵軍的手段是好

^①《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組織任務》（1930年7月22日全國組織會議通過），總政治部辦公廳編：《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歷史資料選編》第一冊，第527頁。

^②《中央通知第一四七號》（1930年7月21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6），第178-179、188頁。

的,但士兵委員會作為組建新紅軍的手段則不太好。”^①馬馬耶夫後來對蔡和森明確說:“是否需要士兵委員會?”,“在擁有堅強的黨政機關的軍隊中,不要士兵委員會”。^②

在5月下旬上海召開的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上,共產國際的指示已經傳達,不過當時沒有直接取消士兵委員會,而是先提出限制到連級以下。中共中央大概是吸收了各地紅軍代表的意見,根據實際情況採取了漸進取消的政策。廣東省委在會後給東江紅軍的信中提到:政治委員的職權比軍長大,士兵委員會限制在連一級,“連以上如營、團、師、軍等不用有兵士委員會之建立。”^③

關於紅軍建設,共產國際7月29日給中共發出系統全面的指示信,其中特別強調政治委員制度。“作為黨的代表政治委員制度在軍隊中是與黨組織平行存在並且高於這些組織之上的”。“團、師、軍政治委員對於黨支部和他下屬的政治委員都具有上級黨組織的一切權力,領導他們的黨的工作,如果支部工作中出現反黨傾向可以解散支部。”“政治部設有政治部主任,他完全服從該部隊政治委員的領導。在戰鬥環境中,政治委員本人要最大限度地關注作戰問題”。共產國際甚至認為,在極端情況下,政治委員有權處決同級指揮員:“政治委員作為黨的代表與指揮員享有同等權力,他監督指揮員,使指揮員的作戰行動符合革命的利益。一旦發現有叛變嫌疑,政治委員有權將指揮員交審判,如有明顯的叛變行為,政治委員有權處決。指揮員的命令如無政治委員的簽字和該部隊加蓋印章是無效的。”^④

①《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書記處處務委員會擴大會議第14號記錄》(1930年4月15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9),第115-117頁。

②《馬馬耶夫給別爾津的書面報告》(1931年1月7日於莫斯科),《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10),第20頁。

③《中共廣東省委、中央軍部南方辦事處給東江、惠屬兩特委及十一軍、十二軍軍委信》(1930年6月15日),《廣東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甲18),第61頁。

④《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就紅軍建設和遊擊運動問題給中共中央的指示信》(1930年7月29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9),第238-239頁。

在指示信中，共產國際明確提出撤銷士兵委員會。“如果說蘇聯組建紅軍時士兵委員會起了瓦解沙皇舊軍隊的作用，從而保證了儘快向建立紅軍的過渡，那麼在中國軍閥部隊中士兵委員會也將起這樣的作用。在中國組建紅軍的情況下，士兵委員會起著政治上團結軍隊中普通士兵、提高他們階級覺悟的作用。但是，由於這樣的委員會與黨組織平行存在，他們試圖履行監督、指揮和進行政治工作的任務，所以它們隱藏著最壞意義上的‘委員會至上’的因素，潛伏著士兵委員會對抗黨組織的危險。這就是為什麼黨在開始時保留士兵委員會”，“而以後黨的任務是徹底撤銷士兵委員會。”^①

(二)六屆三中全會後，政委獲得最後決定權，士兵委員會走向消亡

周恩來和瞿秋白從蘇聯回國後，1930年9月下旬主持召開六屆三中全會，傳達共產國際的指示，強調提高政治委員權威，取消士兵委員會。周恩來在9月30日關於紅軍問題的報告中說：“過去對政治委員的職權不提高，政治委員等於虛設或只做政治工作，這樣決不能建立政治委員的威信”。“提高政治委員的權威，建立政治委員的制度，鞏固黨在紅軍中的領導地位。紅軍中只容許黨在政治上之唯一的領導，故政治委員的作用是異常大的”。周恩來也傳達了取消士兵委員會的指示：“士兵委員會要把上層組織完全取消，連的兵委組織要逐漸減少它的職權，一直做到取消。”^②

10月24日《中央政治局關於蘇維埃區域目前工作計畫》是共產國際指示的具體落實，政治委員的權力得到強化，士兵委員會走向消亡：“黨在紅軍中的領導，要提到最高度”，“首先便是政治委員應有的許可權要完全

^①《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就紅軍建設和遊擊運動問題給中共中央的指示信》（1930年7月29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9），第239-240頁。

^②周恩來：《目前紅軍的中心任務及其幾個根本問題》（1930年9月30日），總政治部辦公廳編：《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歷史資料選編》第一冊，第540頁。

實現起來，他要成為一軍的主幹，他有監督軍事指揮員的權力，他有管理政治部與指導黨的組織的權力。過去有不少紅軍對於政治委員的職權還不甚予以尊重，甚至還有因襲國民黨的殘餘習慣，視政治委員為無足輕重的，這是最不應容許的事。原有士兵委員會的組織，要使他的許可權逐漸縮小一直做到消滅。”^①

在《中國工農紅軍政治工作暫行草案》中，政治委員獲得了超越同級軍事長官、凌駕集體領導的最後決定權：“政治委員不僅是蘇維埃政權在紅軍中的政治代表，而同時是中國共產黨在紅軍中的全權代表。他是代表政權及黨的雙重意義，執行黨在紅軍政治路線及紀律的完全負責者。”“政治委員有監督一切軍事行動、軍事行政的權力。”“政治委員在與同級軍事指揮員有爭持時，政治委員有停止軍事指揮員命令之權”，“在未得上級指示以前，須依照政治委員的意見執行”。“在發現該部一切人員（由同級軍事指揮員以至戰鬥員）有反革命或以破壞軍隊組織為目的的行動時，政治委員有執行革命法律之權”。^②據曾任七軍政治委員的龔楚說，情況緊急時下級政委甚至有權處決上級軍官：“如同級指揮員有背叛革命行動時，政委有將之逮捕之權，甚至因情況緊急，不及逮捕時得指令特務員槍殺指揮員之權，甚至下級政委對上級指揮員亦有權指令特務人員捕殺之”。^③

到這個階段，政治委員毛澤東已經不再和朱德平起平坐，取得了明顯優勢地位。據富田事變後到上海報告的段良弼說：“毛澤東使朱德處於單純執行自己命令的地位，剝奪了他作為總司令的幾乎所有權力”。^④朱德曾向彭德懷、黃公略等指揮員抱怨說，他“沒有任何權力，毛澤東不

①《中央政治局關於蘇維埃區域目前工作計畫》（1930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6），第461頁。

②《中國工農紅軍政治工作暫行草案》（1930年），總政治部辦公廳編：《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歷史資料選編》第一冊，第602-603頁。

③龔楚：《龔楚將軍回憶錄》，第399頁。

④《蓋利斯給別爾津的信》（1931年2月10日於上海），《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10），第62頁。

拿他當回事，他什麼事也幹不了。”^①段良弼的報告是誇大的，但也不完全是虛構。

不過當時各地紅軍與中央聯絡困難，獨立性仍比較強，中央政策的傳達需要一定時間，紅軍的士兵委員會在1930年仍有很大權力。王平回憶，在8月下旬一、三軍團會合後討論第二次進攻長沙時，士兵委員會仍然很活躍：“那時，部隊軍事民主比較好，各連都有士兵委員會。各級領導的作戰意圖都向士兵委員會公開，有時還聽取他們的意見。我當時是機槍連士兵委員會委員長，聽到傳達彭德懷、滕代遠不同意打長沙的意見。士兵委員會權力很大，在連隊對幹部還有監督權，甚至可以提出意見罷免連排長。”^②

1931年初六屆四中全會之後，中央著手推動在各地紅軍貫徹新方針。1月29日《中央給贛東北特委的指示信》提出：“兵委的組織要從他的許可權縮小直做到完全消滅為止，團營以上的兵委，現在便應取消。十軍現在已進到大規模的紅軍組織了，故兵委的存在，多少總要妨礙集中制的執行，為戰爭的利益，應將它取消而更提高黨的威權。”^③3月10日《中央給湘鄂西特委信》要求“政治委員的領導在紅軍中必須提高起來，他要成為監督行政代表黨指導政治工作的中心人物”，^④3月30日皖西教導二師報告也提到：“在政治工作人員聯席會議上，決定將士兵委員會改為紅色戰士委員會，漸次縮小其職權”。^⑤

從共產國際指示到中共中央決議，再到各地紅軍落實，用了一年多時間，耿飆被士兵委員會罰款事件發生在1931年上半年，另據十二軍幹部張

①《別斯帕洛夫同溫裕成秦邦憲談話記錄》(1931年2月11日於上海)，《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10)，第76頁。

②王平：《王平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版，第23-24頁。

③《中央給贛東北特委的指示信》(1931年1月29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7)，第111頁。

④《中央給湘鄂西特委信》(1931年3月10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7)，第181頁。

⑤《皖西教導二師編組與部隊素質等情況給中央的報告》(1931年3月30日)，總政治部辦公廳編：《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歷史資料選編》第一冊，第669頁。

南生的日記，他所在部隊5月6日還改選過士兵委員會。^①歐陽欽在報告中談到，他7月20日離開中央蘇區前連級還有士兵會：“士兵會（現在叫做士兵會）現在仍有，以連的單位組織，沒有上層機關，在政治委員領導下工作，他們的工作審查經濟文化運動——識字壁報娛樂等，參加區中工作及幫助維持軍風紀等，但對於軍事行（動）則不幹預。”^②可見，此時中央蘇區的士兵委員會已經取消了軍、師、團、營級組織，只保留連級以下機構，職權也大大壓縮了。

在這個時期，紅軍的政治氣氛也發生了很大變化，1930年12月毛澤東領導了紅一方面軍黃陂肅反，1931年上半年中央派來的鄧發、左權等在閩西紅軍也大規模肅反。中央蘇區前後有數千人被捕被殺，未被牽連的人也謹言慎行，不敢再輕易批評上級，紅軍建軍初期的寬鬆環境已不復存在，取消士兵委員會並未遇到太大的阻力。大致是在1931年下半年以後，除了在新建紅軍或國民黨軍起義部隊（如寧都起義），紅軍中一般不再建立士兵委員會，以前建立的士兵委員會也逐步取消，由政治部、列寧室等機構替代其職能，^③政治委員集權制從此確立為紅軍的核心制度。

六、小結

中國共產黨在南昌起義初創軍隊，但來不及改造國民黨軍隊的傳統，起義軍缺乏嚴密組織和精神力量，在優勢敵軍的圍攻之下難以生存，潮汕

① 張南生：《一個紅軍戰士的日記》，《黨史研究資料》（5），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20頁。

② 歐陽欽：《中央蘇維埃區域報告》（1931年9月3日），《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上冊，第373-374頁。

③ 鄂豫皖紅軍的紅色戰士會至少保留到1933年，在7月2日中央代表邵達夫向鄂豫皖省委、紅軍師級幹部沈澤民等傳達中央指示時，省委幹部都反對取消紅色戰士會，見《邵達夫給中央的報告》（1933年7月），《鄂豫皖革命歷史文件彙集》（2），第359頁。1932年1月3日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曾翻印《中國工農紅軍士兵會章程》，知否僅限於教學不可知，此處存疑，見《中央革命根據地歷史資料文庫——軍事系統》（10），第1046頁。解放戰爭時期，連隊士兵委員會在1947-1948年新式整軍運動中恢復，1949年定名為革命軍人委員會。

潰敗是難以避免的。

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廣州起義餘部的改造才是紅軍——這一新式軍隊誕生的關鍵，在毛澤東、朱德、陳毅、葉鏞等紅軍領導人的艱苦探索中，在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的指導下，紅軍樹立了宏大的政治理想，建立起高度民主的權力結構，各級黨委實行集體領導，軍事領導和政治領導平等分權，士兵擁有權力很大的士兵委員會，軍隊中重大決策要經過黨的代表大會。在這種民主氣氛中，幹部、戰士煥發了主動精神，被塑造成有信仰、有尊嚴的革命者，以黨代表、黨委、黨支部為主體的政工制度則是紅軍的靈魂，使紅軍有能力在極端險惡的鬥爭中生存下來，並抓住有利時機迅猛地發展壯大。

但民主分權結構在嚴酷的鬥爭中也暴露出決策困難、迎合群眾意識等弊端，並造成了慘重損失。1929年，紅四軍領導人朱德、毛澤東等在紅軍的建軍原則上發生重大分歧，毛澤東傾向於集中權力，而朱德堅持民主分權。在紅四軍七大的民主討論中，毛澤東失去多數支持，被迫離開紅軍。同一時期中共各級組織中普遍發生了極端民主化的問題，常常造成組織的癱瘓甚至分裂，以周恩來、李立三為核心的中共中央認識到了這一問題，在朱毛之爭中強力支持毛澤東。1929年底召開的古田會議是紅軍走向集中權力結構的關鍵一步，而政治委員制度的貫徹意味著權力逐步集中於政治領導人，“黨指揮槍”的原則在這種體制之下大大強化，但士兵委員會仍受到尊重。

1930年以後，隨著蘇區政權鞏固和紅軍規模擴大，共產國際指示中共強化政治委員制度，取消士兵委員會。政治委員集權的趨勢不斷加強，直至取得了凌駕集體領導的“最後決定權”，這一過程中有時甚至引發激烈黨內鬥爭和代價高昂的肅反。紅軍終於被打造成一支高度集中統一、擁有鐵的紀律和強大精神力量的軍隊，這支軍隊最終決定了中國的命運。

然而，在革命戰爭中形成的高度集中的權力機構，卻給建國後的和平年代埋下了隱患。在民主集中制中，民主和集中的平衡應隨形勢的

變化而調整。在殘酷的戰爭年代，偏于集中是險惡環境中必需的；到了和平建設年代，過度集中就未必適合了，最終導致了大躍進、三年困難和文化大革命的災難。對中共歷史上民主與集中複雜關係的深入研究，可以為現代中國提供寶貴的經驗和教訓，豐富和深化中國人的政治智慧。

第五章

紅軍的崛起與革命重心向蘇區轉移

1927年下半年，中共在各地發起大規模武裝暴動，創建了紅軍。但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廣州起義相繼失敗之後，共產國際領導人認為中國革命的第一個高潮已經過去，進入了類似俄國1905年到1917年的十二年沉悶期。布哈林認為，在這個時期中共的主要工作是耐心爭取群眾、發展組織，等待下一個高潮。此時紅軍即使可以在偏僻山區勉強生存，也很難有大的發展，這是1928年2月共產國際九次全會到6月中共六大的主流觀點。^①

斯大林雖然比布哈林更重視紅軍，但也認為近期很難建立政權。他在六大前接見周恩來、瞿秋白等中共領導人時說：“俄國1905年以後，農民運動也有發展，可是整個說來，它沒能動搖政權”，“只有當我們開始攻佔最重要的城市的時候，才能夠說，革命運動處於高潮”。“農民運動最重要的結果，土地革命最重要的結果，是創建紅軍”，“最重要的是爭取那些參加戰鬥的人們來建立人數眾多的紅軍。在目前時期，在總的領導革命的事業中，這是最主要的問題。”^②“農民遊擊戰爭是農民革命行動的宣傳。過去有的，將來也是有的。是不是它們可以取得一省政權？不可能的。不過只是革命準備時期。如一壺水在未開前，亦有波動，海潮亦有起伏，

^① 九次全會還承認中國城市和農村革命不平衡，農村有發展，城市嚴重挫折，對紅軍前途更樂觀一些。六大總體更悲觀，所以周恩來後來認為六大比九次全會有後退，主持六大的布哈林不如斯大林。

^② 《斯大林同志同中共代表瞿秋白、向忠發、周恩來、李立三等人談中國革命問題》（1928年6月9日），《黨的文獻》1988年1期，第3-6頁。這個記錄與周恩來的記錄大體一致，內容和詞句略有差別。

但不是高潮。”^①可見，斯大林對紅軍的重要性有深刻認識，但認為短期內還難有大的作為。

布哈林是中共六大的實際領導者，他更重視群眾運動，而不是紅軍，他與斯大林的差別在1926年11月共產國際七次全會就有所表現。布哈林在六大政治報告中說，“在這一個階段上，我們已經被打傷了，失敗了”，應當休養生息，暫時退守，“聚集自己的力量，整頓我們的隊伍”，他要求紅軍分散成小的遊擊隊，流動作戰，不要集中在一個地方，成為農民的經濟負擔，把“最後一個老母雞吃了”。^②1928年底到1929年初，各地紅軍在敵軍圍攻中處境艱難，似乎印證了布哈林的看法，所以中共中央發出“二月來信”，要求毛澤東、朱德、賀龍等著名紅軍領導人離開軍隊，把紅軍分散成小的遊擊隊。

但中國革命發展卻出乎共產國際的預料，毛澤東、彭德懷、賀龍等紅軍領導人一致對“二月來信”提出異議，1929年3月蔣桂戰爭爆發後，紅軍的形勢大為好轉。紅四軍在贛南和閩西開闢出大片新的蘇區，初步奠定了中央蘇區的規模，鄂豫皖和湘鄂西蘇區也獲得了長足的發展，年底廣西百色起義之後又建立起紅七軍。紅軍成長為中共組織中最有力的部分，對全國政局也產生了重大影響。

毛澤東在1930年1月給林彪的信中，明確提出建設農村革命政權、逐級發展紅軍、波浪式擴大，甚至要一年奪取江西，這已經包含了“農村包圍城市”的基本要素，是與俄國革命完全不同的戰略，顯示出中國革命已經在實踐中逐漸探索出新道路。斯大林在1930年夏天也認識到中國革命的特殊性，在7月共產國際新決議中要求中共把蘇區和紅軍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實行從城市到農村的戰略轉變。斯大林的認識比毛澤東晚半年，在周

① 彩繽紛《周恩來對斯大林同瞿秋白和中共其他領導人會見情況的記錄》（1928年6月9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檔案資料叢書》（7），第479頁。

② 布哈林：《國際代表在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關於政治報告的結論》（1928年7月），《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檔案資料叢書》（11），第183、180頁。

恩來回國之前，他當面叮囑要把紅軍問題放在中國革命的第一位。^①六屆三中全會和四中全會之後，中共中央逐步實行從城市向農村蘇區的戰略轉移，這對中國革命的前途影響深遠。

一、紅軍在組織中地位演變与中国革命新道路

紅軍是中共在1927年武裝暴動中創造的新生事物，對中共組織產生了強烈衝擊，各級黨組織與紅軍之間出現了各種矛盾衝突，最終紅軍在中共組織中的位置逐漸從邊緣走向中心。同時，紅軍在組織建設上的探索也為中共組織成長做出了重要貢獻。

（一）紅軍初建，活動於偏遠農村，定位模糊

在與國民黨左派的最後合作中，中共掌握了張發奎第二方面軍的一些部隊，並利用這些軍隊為骨幹，先後發動了1927年8月南昌起義、9月秋收起義和12月廣州起義。這些起義雖然先後失敗，但起義軍餘部撤退到農村地區繼續鬥爭，創建了最初的紅軍。朱德、陳毅率領南昌起義軍25師餘部撤往湘南，董朗率領南昌起義軍24師餘部撤往海陸豐，毛澤東率領湖南秋收起義餘部撤往江西寧岡井岡山，葉鏞、徐向前率領廣州起義餘部撤往海陸豐，這四支軍隊是最早的主力紅軍。

在農民運動勢力強大的湖南、湖北、廣東、江西等地，地方黨組織也發動了聲勢浩大的農民暴動，參加的農民動輒數萬，組建了相當規模的農民自衛軍。這些暴動也在國民黨軍隊的鎮壓中先後失敗，國民黨軍和地主武裝嚴厲清鄉，到處追殺農運幹部和革命農民，很多人被迫逃亡深山，但仍然伺機反攻，有時深夜回鄉殺戮地主，有時襲擊民團奪取槍支，他們成長為大大小小的紅色遊擊隊。

紅軍選擇的落腳點多是受農運影響的地區，紅軍與農運相結合，形

^①《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中共中央文獻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83頁。

成了中共最早的農村根據地，建立了蘇維埃政權。海陸豐是第一個蘇區，南昌起義和廣州起義的兩支餘部彙聚於此，結合澎湃經營多年的鄉村勢力，本來實力最強，但是由於地形不利和軍事策略失誤，很快在強敵進攻中失敗。朱德領導的紅軍發動湘南起義後在當地難以立足，1928年4月撤往井岡山與毛澤東部會合，後又會合彭德懷部和贛南紅軍，開闢了中央蘇區。鄂豫皖幾支紅色遊擊隊在中央派來的徐向前、許繼慎、曾中生等領導下，整編成紅軍，開創了鄂豫皖蘇區。賀龍、周逸群受中央委派到湘鄂西，召集舊部，整編遊擊隊，開創了湘鄂西蘇區。三大蘇區之外，還有方志敏開創的贛東北蘇區、百色起義後開創的左右江蘇區等一些小的蘇區。

1928年夏天，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開，在共產國際的幫助下，中共通過代表大會重建了中央機構。但六大仍以城市工人運動為中心，對紅軍和蘇區並不重視，加上工人幹部替換知識份子的傾向，選舉產生的新中央領導中工人顯著增加，向忠發成為中共中央總書記。在這一時期，中共組織實際上分成了兩個部分：在城市，中共中央以上海租界為基地，努力恢復城市工人運動，但頻頻遭遇挫折，各地城市組織經常被國民黨破獲，工作難以開展；在農村，紅軍和蘇區雖然也屢遭挫折，卻獲得了長足發展，積累了很多成功經驗。城市的中央與各蘇區紅軍聯繫時斷時續，中央難以瞭解各蘇區的情況，紅軍也難以得到中央的指示。

紅軍已經逐漸成為中國革命的核心力量，但最初無論共產國際、中共中央、各級組織、還是紅軍領導人自己，都沒有充分認識到這一點。此時紅軍在中共組織中的定位不明確，紅軍在革命中將發揮怎樣作用也不清楚，甚至長於戰略思維的毛澤東對紅軍前途的認識也很模糊。在毛澤東1928年11月給中央的報告中有這樣的感歎：“我們一年轉戰各地的經驗，深感全國革命潮流之低落。一方面有少數小塊地方建設了赤色政權，一方面全國還沒有普通的民權，工人農民以至民權派的資產階級，一概沒有言論集會權”，“紅軍每到一地，冷冷清清的”。“我們深深感覺寂寞，我們時刻盼望這種寂寞生活的終了。要轉入到沸熱的全國高漲的革命中去，則

包括城市小資產階級在內的政治的經濟的民權主義鬥爭的發動與完成，乃是必經的道路。”^①

從這段話可以看出，雖然毛澤東在一年多農村武裝鬥爭中，創造出一套建設紅軍、建設根據地的獨特方法，自信紅軍和小塊區域紅色政權可以生存，不易被敵人消滅。但他當時也沒有看清紅軍和農村根據地的遠大前途，並沒有把紅軍看成中國革命的決定性力量，仍寄希望於城市民權運動的高漲，希望在全國沸騰的民權革命中，結束連報紙都看不到的寂寞農村遊擊生活。

（二）與地方組織關係不順，紅軍常遭受損失

紅軍在建立初期，與中央的關係、與省委的關係、與地方組織的關係都沒有理順，甚至可以說矛盾重重。有時中央、省委、地方組織給紅軍帶來很大幫助，有時也帶來很大麻煩。中共組織體系對容納紅軍這個新生事物沒有經驗，在不斷的磕磕碰碰中，紅軍的重要性才顯現出來。

初創時期的紅軍幾乎遊離於中共組織之外，與中央、省委和地方組織的聯繫都不緊密。紅軍常遭優勢敵軍圍攻，不得不四處遊擊，黨組織找到紅軍都很困難。從1927年秋天到1928年夏天幾個月裡，中央與各地紅軍之間沒有建立有效聯繫，有的紅軍隊伍最少時只剩幾百人，甚至幾十人，在偏僻山區孤獨奮鬥，各自為戰。中央既無法瞭解紅軍的情況，也無法將指示送達。1927年12月中央給朱德的信提到：“自從三河壩與潮州的交通被敵人切斷後，黨的指導機關即與二十五師全體同志失了聯絡。潮州失守後，粵省委曾兩次派人追趕你們，及你們退武平，轉入江西信豐時，江西省委又派人前往接洽，最後知道你們已越大庾嶺而入湖南，中央乃又命湖南省委派人與你們接洽。但一切都是徒勞，始終未得趕著你們。現時你們的蹤跡，但從報紙上的記載和輾轉傳來的消息，似乎正駐紮在桂東和

^① 毛澤東：《井岡山前委對中央的報告》（1928年11月25日），《毛澤東集》第二版（2），第59頁。

桂陽一帶，惟仍未能證實”。^①

江西省委於1928年春天與朱毛紅軍建立了聯繫，決定成立贛西南特委，讓毛澤東當書記，以便於省委指揮紅軍。但由於“軍隊關係是流動的性質”，特委不能跟著流動，又決定改為其他人。但毛澤東卻來信要求組織前敵特委，以便紅軍指揮地方組織。省委拒絕了這個要求，認為“沒有組織的必要，一切的工作可委軍委以負擔”。^②可見，江西省委與紅軍在建立聯繫的最初階段，就在權力劃分上出現了分歧。

中央領導人通過江西省委得知朱毛兩部會合後很高興，於1928年6月寫信給紅四軍：“現在黨內的情形的確已有很大的變化”，“同時全國政治也有很多的變化，只可惜這些材料不能達到你們，以前中央雖曾派人來找你們，但以交通的關係而終無一次能與你們接頭，以致中央和你們彼此間的意見互不能達到。這次由江西省委轉來你們的信知道你們的近況中央甚為欣慰！”^③直到1929年3月，中央與湘鄂西的聯繫仍很困難，中央知道賀龍那裡缺少幹部，想多派軍事人才過去，但是“因為交通的阻礙，你們的駐防地又無一定，所以尚未派人去。”^④

當紅軍和地方黨組織建立起聯繫時，有時卻帶來麻煩。紅軍往往活動在國民黨控制薄弱的各省邊界三不管地區，幾省省委都想指揮，往往形成多頭領導的矛盾。這從各個蘇區的名稱就能看出來：湘贛蘇區、鄂豫皖蘇區、湘鄂西蘇區、湘鄂贛蘇區等等。井岡山根據地在毛澤東的報告裡一般叫“湘贛邊界”，橫跨湖南、江西兩省。1928年5月，湖南省委發來指示，要求井岡山紅軍受湖南省委指揮：“兄處即成立軍事委員會，指揮所屬一

①《中共中央給朱德並轉軍中全體同志的信》（1927年12月21日），總政治部辦公廳編：《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歷史資料選編》第一冊，第31頁。

②《中共江西省委給中央的報告》（1928年5月10日），《江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八年）》，第248、253頁。

③《中共中央致朱德、毛澤東並前委信》（1928年6月4日），總政治部辦公廳編：《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歷史資料選編》第一冊，第65頁。

④《中共中央給賀龍及湘鄂西前委的指示信》（1929年3月17日），總政治部辦公廳編：《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歷史資料選編》第一冊，第193頁。

切部隊。委員會主席指定為潤之同志，由七人組織，人選由兄處決定報告省委，“軍委在黨的方面，是最高的軍事組織，暫時受湖南省委指揮”。^①

6月中央又發來指示，要求井岡山紅軍同時受湖南省委和江西省委指揮：“如前委在江西境內時受江西省委指導，在湖南境內時受湖南省委指導，同時與兩個省委發生密切關係”，“前委每十天須送一報告到兩省委的接頭處”。^②毛澤東在給兩省省委的信中說：“吉安來信，始知江西省委已批准湘贛特委之組織（茶陵、攸縣、酃縣、寧岡、蓮花、永新、遂川），批准於五月二十一二兩日召集各縣代表大會”，“兩省委及中央之派人即可召集工農兵代表大會選舉”。^③井岡山根據地上述七縣，茶陵、攸縣、酃縣屬於湖南，寧岡、蓮花、永新、遂川屬於江西，湘贛邊界特委既要受湖南省委領導，又要受江西省委領導。

但是，省委的指示常常是脫離實際的，有時甚至是荒謬的。湖南省委對武裝鬥爭毫無經驗，一系列脫離實際的指示給紅軍帶來很大損失。1928年6月26日，湖南省委給井岡山發了兩封指示信，給四軍軍委的信要求“毫不猶疑的立即執行！”“先解決永新之敵軍，然後再殺出一條血路，向湘南資興，耒陽，永興，郴州發展”，並且異想天開地認為到了湘南“四軍可立即擴充到十二團”。^④同日給湘贛邊特委的信也要求“立即向湘南發展，留袁文才同志一營守山”，“澤東同志須隨軍出發，省委派楊開明同志為特委書記”。^⑤

毛澤東在1928年11月給中央的信中憤怒地說：湖南省委對井岡山的指示，“六七月間數星期內，曾三變其主張。第一次袁德生送信來，贊成中

①《湖南省委來信》（1928年5月），《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上），第106頁。

②《中央給前敵委員會的信》（1928年6月4日），《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上），第121頁。

③《毛澤東給湖南江西省委轉中央的信》（1928年6月16日），總政治部辦公廳編：《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歷史資料選編》第一冊，第75頁。

④《中共湖南省委給紅四軍軍委的指示信》（1928年6月26日），《湖南革命歷史文件彙集》（6），第68、69頁。

⑤《中共湖南省委給湘贛邊特委的指示信》（1928年6月26日），《湖南革命歷史文件彙集》（6），第67頁。

段政權計畫。第二次杜修經、楊開明送信來，主張紅軍毫不猶豫的向湘南發展，只留二百枝槍會同赤衛隊保衛邊界，並謂是‘絕對正確’的政策。第三次袁德生又來，相隔不過十天，這次信上除罵了我們一大篇外，卻主張紅軍向湘東去，亦謂是‘絕對正確’的政策，而且亦要我們‘毫不猶豫’。我們接受了這樣硬性的指示，不從則跡近違抗，從則明知失敗，真是不好處。當第二次信到時，軍委、特委、永新縣委聯席會議，認為往湘南危險，決定不執行省委的意見。乃數天之後，卻由杜修經、楊開明堅持省委意見，利用了第二十九團的鄉土觀念，二十九團乃以省委命令為藉口，把紅軍拉攻郴州，致邊界和紅軍一齊失敗。紅軍戰鬥力約損失一半，邊界則被焚之屋、被殺之人不可勝數，各縣相繼失陷，至今未能完全恢復。”^①

毛澤東能力強、在黨內地位也高，對省委的瞎指揮很不滿，不過當領導人能力較弱時，卻對根據地沒有明確主管感到困惑。1929年8月鄧乾元在報告中抱怨：“一年來邊界黨成了共產黨不要的兒子，簡直沒有人來照顧，雖然此一區的工作與湘贛兩省都有不可脫的關係，但必須確定究竟誰是湘贛邊界特委的主管者，以免再成為邊界獨立黨。”^②

地方黨組織常常不考慮紅軍實力有限，希望紅軍冒險進攻城鎮，赤衛隊和群眾跟著進城捉地主、收穫戰利品，導致彭德懷幾次吃了大虧，差點全軍覆沒，他對地方黨組織的火氣比毛澤東還要大。彭德懷在報告中說：“五軍失敗中所得所見的最大教訓”之一，“是地方主義，足令紅軍有瓦解的危險”。1928年8月1日“第一次地方黨部請求進攻長壽街”，“令赤衛隊瞞沒敵人之數量，說敵只有二三百人，待接觸時已有朱耀華三團之眾，這次被打得落花流水，幾難收拾！而平東的黨不但不將散兵收集，反將散兵的槍支繳了，反令赤衛隊將士兵暗殺，希圖擴大赤衛隊的武裝組織。同時地方同志有在紅軍裡拖槍一杆回縣者，黨部即賞洋一元，因此使紅軍裡的

^① 毛澤東：《井岡山前委對中央的報告》（1928年11月25日），《毛澤東集》第二版（2），第62頁。

^② 鄧乾元：《湘贛邊界五月至八月工作報告》（1929年8月），《湘贛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上冊），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9頁。

士兵對工農懷疑和怨恨！”8月15日“第二次進攻長壽街”，“受黃金洞(平江東部)黨部請求，說敵不過一營，待接觸後乃知有陳光中之一師，是役損失幾使全軍覆沒到盡”。“這些事實都是證明當時地方黨部並沒有把幫助紅軍行動看成是自己的責任和自己的工作”，“不僅有害於紅軍，同時有害於黨。”^①

(三)紅軍不同意中央“二月來信”，毛澤東提出革命新戰略

毛澤東對紅軍受地方組織制約很不滿，提出主力紅軍應由中央直接指揮，他在1929年4月給中央的信中說：“超地方性質的紅軍，不但不宜受縣委與特委的指揮，並不宜限定受某一省委指揮。五軍在平瀏，四軍在湘南及湘贛邊界多次的失敗在地方主義指揮之下。超地方的紅軍必須在中央直接指揮之下，才能適合革命環境的需要，而不受地方主義的累害。”^②

當時各省省委非常薄弱，往往就是幾個人住在城市，深居簡出，靠中央匯款勉強生存，在白色恐怖下難以開展工作，經常被軍警破獲，不斷有人犧牲和叛變。這樣的省委機關沒有能力領導紅軍，其主要作用就是在中央和紅軍之間傳遞消息。潘心源1929年7月要求改組湖南省委時說：“現在的省委，算不到一級政治的組織，只能說是由中央到各地方黨部中間之一個交通機關，或者還不能算是一個好的交通機關，因為許多國際及中央的重要文件都有時不能達到下級黨部”。^③

紅軍領導人很盼望和中央建立聯繫，把紅軍的情況報告中央，同時得到外部信息和中央指示。毛澤東在1929年4月信中提到：“從去年八月起共有三個報告給中央，一個是去年八月毛澤東在邊界失敗時寫的一封長信，討論割據問題及湖南省委的政策，由湖南省委轉中央”，“一個是去年十一月起接到中央六月來信紅軍須重回湘贛邊界時前委做的一個報告，

① 彭德懷：《關於平江暴動前後情況和經驗教訓》（1929年10月），總政治部辦公廳編：《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歷史資料選編》第一冊，第309頁。

② 毛澤東：《紅軍第四軍前委給中央的信》（1929年4月5日），《毛澤東文集》第一卷，第61頁。

③ 《潘心元致中央組織部信》（1929年7月），《湖南革命歷史文件彙集》（7），第206頁。

歷史的敘述湘贛邊界鬥爭的經過及割據問題政策計畫等，由湘贛二省委附上”。“以上兩重要報告，中央一個也未收到，無怪對我們情形完全隔膜了”。“三年以來中央的刊物我們一本沒有收到”，“在湘贛邊界時因敵人的封鎖，曾二三個月看不到報紙，去年九月以後可以到吉安、長沙買報了，然亦得到很難，到贛南閩西以來，郵路極便，天天可以看到南京、上海、福州、廈門、漳州、南昌、贛州的報紙，到瑞金且可看到何鍵的機關報長沙《民國日報》，真是撥雲路見青天快樂真不可名狀。以後望中央每月有一信給我們，我們亦至少每月給中央一信報告。”^①

但是，當紅四軍在1929年春攻佔閩西，與中央建立起直接聯繫時，中央“二月來信”卻讓紅軍分散成小部隊，毛澤東、朱德離開紅軍。在4月5日回信中，毛澤東直率提出不同意見：“我們感覺黨在從前犯了盲動主義極大的錯誤，現時卻在一些地方頗有取消主義的傾向了”。“以‘連’或‘營’為單位單獨行動，分散在農村中，用遊擊的戰術發動群眾，避免目標，我們從前年冬天就計畫起，而且多次實行都是失敗的。因為：（一）紅軍不是本地人”；“（二）分開則領導機關不健全，惡劣環境中應付不來，容易失敗。（三）容易被敵人各個擊破。五軍在平瀏，四軍在邊界，在湘南因分兵而被敵人擊破者共有五次之多。（四）愈是惡劣環境，部隊愈須集中，領導者愈須堅強奮鬥”，“只有在好的環境裡才好分兵遊擊，領導者也不如在惡劣環境時刻不能離。”^②

彭德懷也認為中央指示不妥，他在4月4日信中說：“在反革命高潮時不宜分兵。分則氣虛膽小，以致賣槍脫逃；因紅軍不是本地人，又不全是好黨員，即平日是好黨員，到危急時也有許多不堅決的。領導人能力亦大有關係，有些同志是忠實的，但到了緊急時想不出辦法，以致被消滅。這是非常危險的。這種嚴重時期，只有領導者下決心與群眾同辛苦，同生

^① 毛澤東：《紅軍第四軍前委給中央的信》（1929年4月5日），《毛澤東文集》第一卷，第61-62頁。

^② 毛澤東：《紅軍第四軍前委給中央的信》（1929年4月5日），《毛澤東文集》第一卷，第55-56頁。

死，集中力量作盤旋式的遊擊，才能度過難關，萬萬不能取藏匿躲避政策，否則就立刻上了消滅之途。”^①毛澤東和彭德懷當時都在江西瑞金，他們給中央回信的時間只差一天，應該是事先經過討論達成一致的。

賀龍在湘鄂西接到內容相同的中央指示信，獨立提出了相似的反對意見。他在4月17日給中央回信中說：“關於中央指示的：(A)中央要我們把紅軍分散成為數十人一隊之隊伍，因此間環境關係及同志缺乏單獨帶隊的經驗，暫難辦到”。“(B)雲卿同志(即賀龍)因紅軍無人負責及路途阻隔之故，暫難去中央工作，這並不是雲卿不願意去滬，而是實際的困難。”^②

黨指揮槍是紅軍的基本原則，毛澤東雖明確提出不同意見，但對中央關於他個人的安排卻表示服從，並歡迎中央派人來視察，以此表示紅軍是黨的軍隊，而不是個人的軍隊。毛澤東說：“現在黨的指導機關是前委，毛澤東為書記，軍事指揮機關是軍司令部，朱德為軍長。中央若因別項需要朱毛二人改換工作，望即派遣得力人來。我們的意見，劉伯承同志可以任軍事，惲代英同志可以任黨及政治，兩人如能派來，那是勝過我們的。中央去年六月來信說派賀昌同志來視察，不知為何沒有來，現在從福建來交通極便，以後務望隨時派人來視察。”^③彭德懷、賀龍直言不能離開紅軍，而毛澤東雖不同意分散紅軍的政策，但表示個人服從中央安排，說明他對列寧主義革命黨的組織原則有更深的理解。

中央對紅軍情況瞭解不多，沒有固執己見，接受了幾位紅軍領導人的意見，同意紅軍脫離地方組織領導，由中央直接指揮，也不再要求紅軍分散、領導人離隊。周恩來後來說：二月指示信“朱德、毛澤東同志不同意。後來蔣桂戰爭起來了，我們覺得紅軍有可能發展，就作罷了”。^④湖南省委

①《彭德懷給黨中央的信》(1929年4月4日)，總政治部辦公廳編：《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歷史資料選編》第一冊，第195頁。

②《中共湘鄂西前敵委員會給中央的報告》(1929年4月17日)，總政治部辦公廳編：《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歷史資料選編》第一冊，第206頁。

③毛澤東：《紅軍第四軍前委給中央的信》(1929年4月5日)，《毛澤東文集》第一卷，第57頁。

④周恩來：《關於黨的“六大”的研究》(1944年3月3、4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輯》(11)，第244頁。

也不再要求指揮紅軍，在1929年9月決議中規定：“五軍軍委歸中央直接指揮，湘贛兩省委派負指導之上的責任，將來五軍在湘贛邊界特委所管轄的區域工作時，湘贛邊界特委得派三個在五軍會議席上有表決權之代表，參加五軍各種工作及行動上的計畫討論及決定”。^①這說明，紅軍的經驗和實力逐漸得到了中央和省委的認可，省委已經接受和紅軍的平行關係，紅軍在黨組織中的地位越來越高。

周恩來、李立三、陳毅共同討論定稿的1929年9月中央給紅四軍的指示信中說：“紅軍存在於反動政局走向崩潰及土地革命向前發展的過程中，中國的地勢廣闊也是一個條件，從你們過去的艱苦經驗中就可以證明。先有農村紅軍，後有城市政權，這是中國革命的特徵，這是中國經濟基礎的產物。如有人懷疑紅軍的存在，他就不懂得中國革命的實際，就是一種取消觀念。”^②“九月來信”中的這一段主要是肯定紅軍可以生存，反對取消觀念，類似毛澤東1928年10月在湘贛邊界第二次代表大會決議中的意思，這個決議後來收入《毛澤東選集》時就定名為《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九月來信”比毛澤東一年前起草的決議更進了一步，提到紅四軍經驗證明農村紅軍能建立城市政權，但當時紅四軍經驗中的所謂城市政權也只是長汀、瑞金等小城市的政權，中共中央仍沒有把紅軍看成決定革命前途的主導力量。

共產國際、中共中央和紅軍領導人對紅軍及農村根據地的認識是逐步深化的，周恩來對這個過程有清晰的回顧。六大時，“布哈林對中國蘇維埃、紅軍運動的估計是悲觀的。他認為只能分散存在，如果集中，則會妨害老百姓利益，會把他們最後一隻老母雞吃掉，老百姓是不會滿意的。他要高級幹部離開紅軍，比方說，要調朱德、毛澤東同志去學習。所以我們回國後就指示要調朱德、毛澤東同志離開紅軍”。毛澤東在1928年“也

^①《湘贛邊界目前工作任務決議案》（1929年9月6日），總政治部辦公廳編：《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歷史資料選編》第一冊，第269頁。

^②《中共中央給紅四軍前委的指示信》（1929年9月28日），《周恩來軍事文選》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93頁。

還是認為要以城市工作為中心的。開始他還主張在閩浙贛邊創造蘇區來影響城市工作，配合城市工作”，到1930年1月“給林彪的信中才明確指出要創造紅色區域，實行武裝割據，認為這是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也就是要以鄉村為中心”。斯大林比毛澤東晚了半年，“他把中國紅軍問題放在中國革命問題的第一位，不是在一九二八年，而是在一九三〇年紅軍打長沙的前夜，這是接受了一九二九年紅軍發展的經驗。”^①周恩來的敘述揭示了紅軍、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三個層次的互動，展現出中國革命在這種互動中從積累經驗到戰略轉變的過程。

毛澤東是中國革命新道路的實際開創者，他總結紅軍和蘇區兩年多來發展的經驗，在1930年1月5日給林彪的信中，明確提出了與蘇聯道路不同的全新革命戰略。毛澤東批評林彪“認為在距離革命高潮尚遠的時期做建立政權的艱苦工作為徒勞，而有用比較輕便的流動遊擊方式去擴大政治影響，等到全國各地爭取群眾的工作做好了”，“來一個全國暴動，那時把紅軍的力量加上去，就成為全國形勢的大革命。你的這種全國範圍、包括一切地方的、先爭取群眾後建立政權的理論，我覺得是於中國革命不適合的。”毛澤東批評的這種戰略，其實就是斯大林、布哈林原來設想的類似俄國十月革命式的道路。毛澤東在實際經驗中總結出了全新的戰略，即“朱毛式、賀龍式、李文林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據地的，有計劃的建設政權的”，“擴大武裝組織從鄉暴動隊、區赤衛大隊、縣赤衛總隊、地方紅軍以至於超地方紅軍的，政權發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擴大的政策”。^②這已經包含了“農村包圍城市”戰略的基本要素，顯示出毛澤東確實是中國革命實際鬥爭中產生的傑出戰略家。而斯大林遠在莫斯科，在1930年夏天也認識到中國革命的特殊性，放棄了自己原來的想法，指導中共實行戰略轉變，對中國革命的推進發揮了重要作用。

① 周恩來：《關於黨的“六大”的研究》（1944年3月3、4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11），第244、240、241頁。

② 毛澤東：《給林彪的信》（1930年1月5日），《毛澤東集》第二版（2），第128-129頁。

二、革命形勢好轉，紅軍集中整編，從邊緣走向中心

從1929年開始，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產生了樂觀情緒，認為革命高潮將要再起，但城市工人運動仍是關注重點。9月25日，蘇聯《真理報》發表了《中國即將出現新的革命高潮》的社論，提到“1928年中國參加罷工的總人數也至少有四十萬人。對於革命失敗後工人運動處於低潮的中國來說，這個數字毫無疑問是具有極其重要的象徵意義的”。“1929年頭幾個月上海碼頭工人舉行了罷工，天津、香港的鐵路員工舉行了罷工，天津和上海的電車工人、發電廠工人、礦業工人、紡織工人以及縫紉工、店員也舉行了罷工。”社論最後認為：“這些事實確實證明，出現這種巨大高潮的前提條件正在以越來越快的速變形成。轉折的時刻已經到來。”^①

1929年10月，共產國際致信中共中央，明確提出：“中國進到了深刻的全國危機的時期”。“中國各省群眾的農民土地運動，一般的是在生長，以及蘇維埃區域保存著，而且最近更在擴大並鞏固起來，南方有著不斷的遊擊戰爭——這都成為革命潮流之中的一個支流，順著這個支流，將要生長成為全國革命運動將來強有力的高潮”。“共產黨如果不在自己隊伍裡面，戰勝一切種種小資產階級的動搖，那就不能執行發動，組織和領導新的革命高潮的作用。”^②很明顯，共產國際認為中國革命形勢已經好轉，正在從退守時期轉入進攻時期。

從1929年春到1930年，國民黨連續發生派系戰爭，南京政府遭遇嚴重危機。中共中央也認為中國革命在復興之中，而且對在農村發展壯大的紅軍越來越重視。為了加強對紅軍的領導，讓紅軍承擔更重要的任務，中央著手把分散的遊擊隊集中整編成主力紅軍。但李立三、向忠發等整

^① 《中國即將出現新的革命高潮(真理報社論)》(1929年9月25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11)，第573、576頁。

^② 《共產國際執委致中共中央委員會的信》(1929年10月26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檔案資料叢書》(11)，第578、582、586頁。

編紅軍的目的是進攻大城市，而不是鞏固發展農村根據地，甚至由於把遊擊隊都編入紅軍，脫離蘇區向外進攻，從而削弱了蘇區武裝，導致地主武裝乘機反撲，這時中共中央在戰略上還是城市中心論，但紅軍日益成為革命的主力。

(一)中共中央強力推動紅軍集中整編

中央軍事部在1929年還比較低調，對紅軍主要是間接指導，沒有直接指揮各地紅軍作戰的計畫。10月工作大綱提出“加強對全國軍事工作的指導”的辦法，只包括“通告與公開指導信”，“開始軍事上的巡視工作”，“有計劃的分別調各省負責同志及有直接關係的同志來中央談話”，“召集專門討論軍事問題的會議”，“對各省各部隊的問題很迅速的予以指導或答覆的信件”，創辦《軍事通訊》“以供給各地軍事問題的材料，解釋軍運策略，答覆軍事上的問題，使成為訓練一班同志軍事頭腦的刊物。”^①

1930年3月初，周恩來去莫斯科彙報，李立三在向忠發支持下控制了中央大權，開啟了盲動冒進的所謂“立三路線”時期。3-4月間，中共中央連續發出指示，強力推動紅軍集中統一整編，力圖將全國紅軍指揮權集於中央軍委，以便發動全國規模的攻勢。中央4月3日通知認為，“現在全國紅軍的發展指揮統一問題，已非常嚴重而必要，過去因為沒有嚴格的規定，對各地紅軍，除中央指揮外，各省省委以至特委都可以指揮，於是指揮的系統既紊亂而決定又常不免有抵觸，比如中央決定江西之二、三、四團及二遊擊大隊為第三軍，而現在前委又決定為第六軍。陽新大冶紅軍中央決定為第八軍，而廣西又自己組織第八軍。又如中央根據全國的政治形勢，決定某部紅軍向何方發展，而省委或特委又有與中央不同的方向的決定”。“因此中央決定關於紅軍的指揮問題，以後各地已組織的正式紅軍，一切指揮權完全統一於中央軍委”。“地方的赤衛隊遊擊隊及一切地方

^①《中央軍事部關於目前軍事工作計畫大綱》(1929年10月17日)，總政治部辦公廳編：《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歷史資料選編》第一冊，第297頁。

性的武裝,均應漸次集中組織為紅軍”,“成立紅軍後則指揮權應移交中央軍委。”^①

集中整編是中央加強對紅軍領導的主要措施。在中央的直接指示下,鄂豫皖三支在不同區域發展起來的紅軍,被集中整編成第一軍。1930年3月中央指示信提到:“邊特境內原有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師的紅軍,三十一、三十二兩師且有長期的鬥爭歷史。可是過去三師紅軍是各自為戰的,是不相聯繫的,是束縛在地方觀念、保守觀念的深淵裡”。“中央認為在目前要配合湘、鄂、贛等省先勝利的工作準備,無疑的要把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師紅軍在集中組織、統一指揮原則之下聯繫起來,將這三師編成第一軍”。中央鼓勵鄂豫皖紅軍“衝破保守觀念、地方觀念”,特別批評“三十二師的地方觀念更是異常嚴重問題,他們拒絕與各方革命力量的聯合,他們認為三十二師是商城地方的軍隊,這是非常錯誤的;三十一師一樣的還有很濃厚的保守觀念”,“如果不肅清這些傾向,是無法擴大紅軍的。”^②

中央指定了鄂豫皖第一軍的領導機構和人選,重要職位由中央派去的曹大駿、許繼慎、徐向前等擔任。指示信要求“立即將中央派來成立第一軍的工作人員分往各師整理,再經過三師的代表聯席會議成立前委與軍部。前委應由政治委員兼書記、軍長、副軍長、政治部主任、兵士同志二名、三師的師長、邊特的一人成立之。中央更指定曹大駿同志為政治委員兼前委書記,許繼慎同志為軍長,徐向前同志為副軍長,熊受暄同志為政治部主任,兵士同志李桂良同志參加前委,餘一人另選定,邊特一人由邊特決定。三十一師徐向前同志兼師長,三十二師仍以周維炯同志充師長,三十三師調劉英同志充師長,李榮桂同志為政治委員”,“三十一師政治委員仍舊,三十二師政治委員中央派來王培吾同志充當,三十一師師委書記仍舊。以上的名單,中央巡視員與邊特召集三師師委會議上當然可以斟

①《中央通知第一〇三號》(1930年4月3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6),第55-56頁。

②《中共中央關於成立紅一軍及軍事工作的指示》(1930年3月18日),總政治部辦公廳編:《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歷史資料選編》第一冊,第418-419頁。

酌出人,但必須經過中央的核准。”^①

中央規定紅軍由中央軍委直接指揮,紅軍前委與地方邊區特委和省委是平行的,不受省委領導。“前委與邊特的關係是橫的關係,前委與省委的關係也是橫的關係,而直接隸屬於中央軍委。故邊特與省委只能以橫的關係供給前委的政治領導而不能指揮前委,前委更不能直接受邊委與省委的支配,意見有不同時,直接決之於中央,在未受到中央指示時,前委有自己處決的權力。”^②實際上,此時毛澤東在中央蘇區已不滿足於與省委平行,而是傾向由紅軍前委領導地方組織,這導致他和江西省地方幹部產生尖銳矛盾,是引發富田事變的誘因之一。

中央軍委制定了統一整編全國紅軍的宏大計畫,明確規定各軍番號和發展方向,仍把武漢、南昌、廣州等大城市作為進攻目標。軍委規定:“第一軍:統一三師的指揮”,“三十一、三十二兩師集中力量向著京漢鐵路發展,三十三師向著長江發展”;“第二軍:堅決的由湘西拖出,由宜都公安石首向著長江下游發展,與六軍取得密切的聯繫”;“第三軍:猛烈的擴大,集中力量向著贛江下游發展,奪取吉安南昌九江”;“第四軍:轉變路線,猛烈的擴大,急進的向外發展,擴大全國的政治影響,使成為全國紅軍的模範,現在應領導第三軍,協同動作向著贛江下游奪取吉安、南昌、九江”;第五軍:“應由湘贛邊界向著湖北的長武鐵路方面發展。與八軍取得密切聯繫”;第六軍:“注意與二軍聯繫,向著長江下游發展,集中各遊擊隊到紅軍中來,準備成立第十軍的基礎”;第七軍:“應從柳州桂林取道湘桂邊界向著廣東的北江發展,總的目標是廣州”;第八軍:“注意在交通區域遊擊時常打斷武長鐵路的交通,擴大政治影響,總的目標是向武漢。”^③

中央軍委也開始醞釀在中央蘇區、湘鄂西等不止一個軍的地區,在

①《中共中央關於成立紅一軍及軍事工作的指示》(1930年3月18日),總政治部辦公廳編:《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歷史資料選編》第一冊,第421-422頁。

②《中共中央關於成立紅一軍及軍事工作的指示》(1930年3月18日),總政治部辦公廳編:《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歷史資料選編》第一冊,第422頁。

③《中央軍委軍事工作計畫大綱》(1930年4月15日),總政治部辦公廳編:《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歷史資料選編》第一冊,第432頁。

各軍之上建立更高一級的領導機構——軍團。“全國的紅軍都應集中指揮於中央軍委之下，同時為適應鬥爭環境各軍協同動作起見，必須成立軍團以上的統一指揮機關，目前應該準備成立的這種機關有三：一是湘鄂贛交界的三、四、五等軍，一是湘鄂邊界二、六、十等軍，一是閩粵桂十一、十二、七等軍，其他為第一軍以及蘇浙皖等省的紅軍，候其發展程度如何再定。”^①

1930年4月《中央軍委軍事工作計畫大綱》提出了年底前擴大紅軍到五十萬的宏偉規劃，並且具體規定了各軍在5月30日前和年底前的擴軍人數。這個計畫明顯帶有空想色彩，很能體現李立三的領導風格，五十萬的數字並非根據紅軍發展的實際情況而定，竟然是這樣確定的：“斯大林同志曾說過，中國革命成功，須要有紅軍五十萬，我們現在即以五十萬紅軍為我們發展的標準數目。”^②

1930年4月中央軍委擴大紅軍計畫表

	現有人數	到5月30日擴大人數	本年年底擴大人數
第一軍	4500	7000	21000
第二軍	5000	7000	21000
第三軍	4000	7000	21000
第四軍	10000	14000	35000
第五軍	4000	7000	20000
第六軍	4500	10000	30000
第七軍	6000	12000	30000
第八軍	4000	7000	15000
第十一軍	3000	6000	15000
第十二軍	7000	13000	30000
第十三軍	2000	5000	15000

①《中央軍委軍事工作計畫大綱》(1930年4月15日)，總政治部辦公廳編：《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歷史資料選編》第一冊，第431頁。

②《中央軍委軍事工作計畫大綱》(1930年4月15日)，總政治部辦公廳編：《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歷史資料選編》第一冊，第433-434頁。

续表

	現有人數	到5月30日擴大人數	本年年底擴大人數
第十四軍	2000	5000	15000
其他全國紅軍赤衛隊遊擊隊農民武裝等	48000	100000	250000
合計	104000	200000	518000

(二)各地紅軍迅猛發展,成為影響全國的新興力量

中共中央的恢弘擴軍計畫也並非全是空想,1927年朱德的南昌起義餘部只有七百多人,毛澤東的秋收起義餘部也只有七個連不到一千人,當時全國紅軍加在一起只有幾千人。1928年下半年形勢非常險惡,各地紅軍和遊擊隊都在為生存鬥爭。但從1929年春季開始,國民黨主要軍事派系蔣介石、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等矛盾加深,集中兵力進行大規模戰爭,顧不上圍攻紅軍。蘇區周圍敵軍兵力空虛,紅軍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空間,各地紅軍抓住時機積極進攻,迅速壯大。

周恩來1930年3月說,紅軍已經發展到6.27萬人,2.89萬支槍,廣泛分佈於南方127個縣。^①比如湖北陽新縣黨組織在1927-1928年遭到國民黨殘酷鎮壓,殘存的紅軍遊擊隊活動非常艱難,但到1929年形勢大為改善,9月3日縣委報告中提到:“遊擊戰爭近幾個月來已由黑夜暗殺行動變成白天幹,打殺豪紳地主案件及收稅人員不下數十次”。^②1930年何長工帶紅五軍五縱隊到鄂東一帶,收編陽新、大冶等地遊擊隊,程子華領導大冶兵暴又帶來幾百人,很快創建了實力不俗的紅八軍。

1930年初,紅四軍進軍江西,旗開得勝,2月25日在東固殲滅唐雲山獨立十五旅。當時紅四軍軍委代理書記熊壽祺說:“這一個時期是前進的

^① 周恩來:《紅軍的數目與區域》1930年3月,轉引金沖及《中國共產黨在革命時期三次“左”傾錯誤的比較研究》,《黨的文獻》2000年第2期,第72頁。

^② 《中共陽新縣委工作報告》(1929年9月3日),《湖北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0),中央檔案館、湖北省檔案館1985年,第128頁。

形勢，群眾非常熱烈，士氣亦很壯盛，政治上經濟上群眾都感覺向前了，以前一個月不上兩元零用錢，現在有了三四元，以前在山邊走，現在到了平原”。“在富田養精蓄銳，天天叫準備‘進攻敵人’，士兵早晚點名都是說進攻敵人，前幾天的口號是‘攻取吉安’，這幾天的口號是‘進攻敵人’。六個口號：1.進攻敵人消滅軍閥混戰。2.進攻敵人武裝維護蘇聯。3.進攻敵人建立贛西南蘇維埃政府。4.進攻敵人徹底分配土地。5.進攻敵人擴大工農武裝。6.進攻敵人奪取江西全省政權。”^①

全國紅軍中，中央蘇區紅軍實力最大，主力紅軍就有四、五、六三個軍。為了各軍聯合打大仗，毛澤東在1930年2月推動成立了高一級的領導機構，當時叫做“共同前委”，這與中央建立軍團的計畫不謀而合。熊壽祺稱：“前委派代表三人組織代表團赴陂頭贛西特委處，遂提前於‘二七’在陂頭開贛西特委，四、五、六軍軍委的聯席會議”。“國內革命高潮的勃興”，“尤其是江西的發展形勢，有在南方各省中首先勝利奪取全省政權之可能。遂決定組織四、五、六軍共同前委，指導四、五、六軍及贛西南、閩西、東江。準備四、五、六軍大集中，奪取江西全省政權。”^②

“共同前委”是毛澤東等順應形勢發展自行成立的，必須得到中央的批准。本來中央4月來信要求毛澤東“無論如何，必須出來一次”，到上海參加5月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③不過後來還是熊壽祺被派去上海，他彙報了成立“共同前委”的情況，請求中央批准：“縱隊之上從前是前委，現在是軍委。因為‘二七’時陂頭聯席會成立了一個四、五、六軍的共同前委，四軍前委即改為軍委，歸現在的新前委指揮。毛澤東同志脫離四軍軍委，專任前委工作”。“前委成立後仍然隨四軍走，現在前委是同四軍一塊的。前委委員遍佈於贛西南、贛東、贛北、閩西、東江，四、五、六軍都有委

^① 熊壽祺：《紅軍第四軍狀況——從1929年7月到1930年4月》（1930年5月），總政治部辦公廳編：《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歷史資料選編》第一冊，第473頁。

^② 熊壽祺：《紅軍第四軍狀況——從1929年7月到1930年4月》（1930年5月），總政治部辦公廳編：《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歷史資料選編》第一冊，第472-473頁。

^③ 《中央給四軍前委並轉三、四、五軍總前委的信》（1930年4月24日），《中央革命根據地歷史資料文庫——黨的系統》（2），第801頁。

員”，常委五人是毛澤東、朱德、曾山、劉士奇、潘心源，候補常委黃公略、彭德懷。前委日常辦公的只有毛澤東、朱德、曾山，“這個前委在鬥爭上是很需要的，希望中央能夠批准，我來時毛澤東同志也是這樣對我說的。”^①

實際上，中央4月聽取五軍政委滕代遠當面彙報，已經認可了共同前委。滕代遠在報告中談到：“二月初，朱毛部隊亦由閩來贛南之東固。集四、五、六軍的兵力，匯合贛西南有組織的群眾百八十萬的偉大力量，真有奪取南昌的趨勢和可能性，吉安當不攻而自下了。四軍前委召集贛西南特委，四、五、六軍委聯席會議於東固”，“對於軍事行動，主張四、五、六軍集中兵力先解決撫州，可以進窺南昌，或速擊劉和鼎，與贛東方志敏取聯繫。黨決(定)西特、南特、邊特合併為贛西南特委，下設南路行委、西路行委、北路行委。四軍前委擴大為四、五、六軍的前委，以已成立的贛西蘇維埃進行籌備江西省蘇維埃”。^②中央4月24日寫信確認，成立總前委“與目前對紅軍的中心任務——集中組織、統一指揮、向外發展、猛烈擴大，是相符合的。”^③可見，毛澤東、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在集中統一紅軍上意見相同。

紅軍集中整編的政策很快貫徹到了地方，各地紅軍都開始從分散的小股遊擊隊整編成較大的隊伍。中央的激進很快引發地方狂熱，閩西蘇維埃政府5月宣傳大綱稱：“閩西政府主要計畫，是接受共產黨中央的指示、將一、二、三、四、五、六各團編為中國紅軍第十二軍”，“頭一步打下潮汕，與第十一軍匯合，發動東江全境群眾起來；第二步向惠州發展，與廣西紅軍第七軍聯合進攻廣州，促成廣東全省總暴動。各縣要馬上集中武裝，增編赤衛隊常備隊，加緊訓練向外遊擊”，“誰懷疑擴大紅軍，誰反對統一指揮，誰不執行集中武裝，誰便是放鬆了奪取潮汕擴大鬥爭的路線，那麼

① 熊壽祺：《紅軍第四軍狀況——從1929年7月到1930年4月》（1930年5月），總政治部辦公廳編：《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歷史資料選編》第一冊，第493-494頁。

② 《紅軍第五軍軍委滕代遠給中央的報告》（1930年4月27日），總政治部辦公廳編：《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歷史資料選編》第一冊，第443頁。

③ 《中央給四軍前委並轉三、四、五軍總前委的信》（1930年4月24日），《中央革命根據地歷史資料文庫——黨的系統》（2），第801頁。

客觀上便等於幫助反革命派。”^①

1930年夏天是立三路線最狂熱的時期，中央在各地成立行動委員會，集中統一指揮紅軍和地方組織。7月21日第147號通知提出：“黨的組織在武裝暴動時，完全要軍事化，全黨形成一個軍營，一切指揮絕對集中，完全以軍令行之，下級黨部絕對服從上級，黨員絕對服從黨的命令”，“目前黨的組織都要適合此種組織形式才能在嚴酷的階級戰爭中動員全黨爭取革命勝利。”通知要求黨和團暫時打破各自組織系統，成立“行動委員會”集中一切權力，“行動委員會在行動中，是最有權威的集中的組織，下級絕對服從上級執行一切命令”。^②“行委”的設立，打亂了黨的組織系統，為1930年下半年江西黨內衝突埋下了隱患。

三、立三路線挑戰共產國際，六屆三中全會確定戰略轉變

(一) 李立三命令進攻大城市，與共產國際發生激烈衝突

共產國際7月23日決議案提出了以蘇區和紅軍為中心的新思路，要求建立蘇維埃中央政府，這是革命重心從城市向農村轉移的重大戰略決策。決議案認為：“暫時我們還沒有全中國的客觀革命形勢。工人運動和農民運動的浪潮還沒有匯合起來。這些運動總合起來還不能夠保證必要的力量，去襲擊帝國主義和國民黨的統治。農民的革命鬥爭，現在能夠勝利的，還只不過在南部幾省發展著”。“蘇維埃的運動，已經對於黨提出組織蘇維埃中央政府，以及調節這一政府的行動的任務。這個任務是有第一等重要意義的。對於中國工農蘇維埃政府的問題，黨應當注意到：要在最有保障的區域建立起真正的紅軍——完全服從共產黨的指導而能夠

^①《閩西蘇維埃政府關於擴大鬥爭宣傳大綱》(1930年5月10日)，總政治部辦公廳編：《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歷史資料選編》第一冊，第462頁。

^②《中央通知第一四七號》(1930年7月21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6)，第205-206頁。

做這一政府的支柱的紅軍”。^①

共產國際認為雖然中國革命形勢高漲，紅軍也日益強大，但還沒到攻佔大城市、奪取全國勝利的階段，應該先鞏固已經建立的蘇區政權，提高紅軍的品質，而不是盲目擴大規模。共產國際8月8日電報強調“建立一支堅強的、組織嚴密的、政治上堅定的、有充分保障的紅軍，是中共工作中目前的中心環節”。“中共在支持遊擊運動並促進其發展的同時，決不應放鬆解決當前中心的、具有決定性意義的課題——先建立一支人數不太多，但組織嚴密的‘鐵的’紅軍。”^②

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在對革命形勢高漲的判斷上、在紅軍集中和加強政治領導上，意見基本一致。但是在1930年6月至8月期間，中共中央在李立三的狂熱領導下陷入空想之中，認為短期內有佔據幾個省的可能，命令各地紅軍集中起來攻打武漢等中心城市，同時命令上海、南京等地下黨舉行暴動。政治局在李立三主導下6月11日通過了《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首先勝利》的激進決議。6月12日，中共中央致信共產國際，要求在國際決議上確認中共的激進路線：“恩來同志並轉共產國際主席團：中國革命猛烈發展，已接近直接革命形勢，中央決定堅決執行對軍閥戰爭的失敗主義的路線，極力爭取一省與幾省的首先勝利，要求在國際對中國問題的決議上確定這一路線，中央不同意建立蘇維埃根據地等類的割據觀念。”^③

李立三為核心的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之間，發生了逐步升級的激烈衝突，事後共產國際大大強化了對中共的控制，這對中國革命產生了深遠影響。本來中共從成立就是共產國際的支部，接受共產國際的領導和經費資助，按照列寧主義的下級服從上級的原則，應該服從共產國際的指

①《共產國際執委政治秘書處關於中國問題議決案》(1930年7月23日通過)，《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12)，第210-211頁。

②《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給中共中央政治局的電報》(1930年8月8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9)，第278頁。

③《中共中央致共產國際主席團信》(1930年6月12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6冊，第136頁。

示。但是，當時李立三等人表現出了強烈的、但很不成熟的獨立性，認為共產國際不懂中國國情，錯誤判斷了中國革命形勢，拒絕聽從共產國際遠東局的意見，甚至當面發生激烈爭吵，同時對何孟雄、王明等持不同意見的幹部進行打壓。

中共中央的激進計畫進入實施階段後，與共產國際的爭論日益尖銳。7月18日，中共中央給共產國際發電：“中國共產黨為堅決將軍閥戰爭變為國內戰爭，決定在南京組織士兵起義，在上海準備總罷工，在武昌舉行暴動”。^①7月23日共產國際回電：“我們堅決反對在目前條件下在南京、武昌舉行暴動以及在上海舉行總罷工。”^②7月29日，共產國際專門做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關於遠東局與中共政治局之間在1930年2月17日至8月期間接連發生的分歧’的決議》，認為中共中央“表現出了對共產國際執委會代表團領導的錯誤態度；中央無視遠東局的禁令發表自己的政治決議，從而破壞了共產國際的紀律；中央錯誤地對待代表團留下的成員（羅同志等）所作的必要批評”。^③

7月27日，彭德懷率紅三軍團攻佔長沙，這大大鼓舞了李立三、向忠發等的狂熱激情。在一份通報中，共產國際對當時的中共中央做了如下描述：“佔領長沙之後，政治局決定成立革命軍事委員會，把中央的一切權力交給該委員會。這樣一來，政治局實際上被解散了”。“黨火速地被改編成一種軍事組織，為首的是李立三所領導的行動委員會。他們甚至解散了共青團中央，把共青團與黨組織合併，並論證說，這樣做是出於統一行

①《中共中央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電報》（1930年7月18日於上海），《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9），第219頁。

②《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給中共中央的電報》（1930年7月23日於莫斯科），《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9），第225頁。

③《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關於遠東局與中共政治局之間在1930年2月17日至8月期間接連發生的分歧’的決議》（1930年7月29日於莫斯科），《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9），第236頁。

動的需要。”^①

李立三、向忠發等對共產國際的態度也更加強硬，進而發展到公開對抗，在8月1日、3日會議上兩人與遠東局代表激烈爭吵。斯托利亞爾8月5日信中詳細描述了當時的情況：“在目前十分危急的時刻，存在著現時領導人和中共同共產國際決裂的很大危險”。“李立三動員所有的負責同志和全黨來反對共產國際。他公開把黨和共產國際對立起來。他拒絕執行共產國際的決議，而政治局不顧並反對共產國際的堅定不移的指示。通過了十分重要的關於時局的決議，在李的領導下要求共產國際如李立三所希望的那樣糾正路線。”李立三在8月1日和3日會議上說：“共產國際不僅不理解中國目前的形勢，而且不理解中國革命總的傾向”，“忠於共產國際的電報，但我們就會對中國革命犯罪”。“中央不顧共產國際電報，已經決定在南京、漢口等地開始舉行暴動。還必須在北京、天津、開封等地舉行暴動”。更令人震驚的還有：“我們的戰略應是挑起國際戰爭”，“共產國際現在應轉而採取進攻政策，首先是蘇聯。蘇聯應全力準備作戰”，“蒙古應宣佈自己為蘇維埃中國的一部分並派軍隊進攻華北”。^②

中共中央在8月5日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以強烈的語氣拒絕莫斯科的指示電，要求支持中共的激進路線：“國際無從明瞭實際情況，自然要反對現在組織武裝暴動與總同盟罷工。所以再將現在革命猛烈發展的情形電告，(請)求國際批准中央的決定，並立刻動員各國支部猛烈擴大保護中國革命運動，特別是予我們以實力的援助。”^③

8月6日，遠東局緊急召集與中共政治局的聯席會議，會上遠東局成員不僅嚴厲批評中共中央，而且鼓動共青團起來反對中共中央。“遠東局

①《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書記處關於中共內部狀況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的通報》(1930年10月9日於莫斯科)，《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9)，第365頁。

②《斯托利亞爾給洛佐夫斯基的信》(1930年8月5日於上海)，《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9)，第257-260頁。

③《中共中央政治局給共產國際主席團的報告》(1930年8月5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12)，第228頁。

向中央委員會向它認為需要找的同志發出呼籲。共青團的同志有全權捍衛共產國際的路線”。“李立三很清楚他實行的是與共產國際路線相對立的政策”。斯托裡亞爾警告中共政治局“存在危險的傾向，試圖把黨和共產國際對立起來”，“任何把某種路線與共產國際的路線對立起來的嘗試，任何動員黨反對共產國際、削弱共產國際威信的嘗試都會導致將這些嘗試的始作俑者逐出共產國際的行列。”^①

李立三和向忠發並未屈服，當面激烈對抗。李立三針鋒相對地反駁：“遠東局認為，政治局犯了嚴重錯誤，這種看法不對”。“我們只是想讓共產國際和聯共(布)瞭解和懂得形勢和事態的發展。駐莫斯科的中國代表沒有向共產國際說清楚中國革命發展速度有多快”，向忠發“大聲喊叫，不讓發言者繼續發言。”^②

在聯席會議爭吵後，遠東局8月7日向共產國際執委會寫信彙報，特別強調中共中央的對抗態度將導致共產國際失去領導權，並明確提出將李立三撤職：“共產國際有可能喪失領導權”，“問題不僅在於政治局拒絕了你們的電報，而且還在於它是如何被拒絕的。請認真讀一下8月1日和3日政治局兩次會議的記錄”，“李立三動員政治局和全黨反對莫斯科的決議”。“我們向全體中央委員和共青團發出了附在後面的激烈反對李立三的宣言並越過政治局開始與其他同志討論形勢”，“應該解除李立三的領導職務”。^③遠東局的埃斯勒還於8月9日緊急乘飛機到武漢，試圖阻止暴動，與長江局書記項英發生激烈爭執，項英在10日給中央的報告中說：“毛子於昨日抵此，真是荒唐”，“真氣煞人”。^④

①《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聯席會議記錄》(1930年8月6日於上海)，《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9)，第265-268頁。

②《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聯席會議記錄》(1930年8月6日於上海)，《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9)，第267-268頁。

③《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書記處的信》(1930年8月7日於上海)，《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9)，第275-277頁。

④《江鈞向中央的報告》(1930年8月10日)，《中共中央長江局文件彙集》(一九二七年、一九三〇年)，第227、228頁。

8月8日,向忠發繞過共產國際組織體系,直接寫信給斯大林,繼續堅持總罷工、暴動和進攻大城市的主張:“遠東局的同志們對罷工運動的巨大規模表示懷疑”,“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不同意這一決定,我理解這是因為共產國際執委會當時對中國的實際狀況瞭解不夠詳細,沒有收到關於革命飛速發展的詳細報告”,“我們還請求您給予支持。這不僅對於中國革命,而且對於世界革命都是十分重要的問題”。^①

(二)立三路線的破產及其最後抵抗

李立三和向忠發在1930年夏天表現出驚人的獨立精神,可惜這種自信心並沒有成熟的判斷力作為支撐。8月13日,斯大林在給莫洛托夫的電報中做出了激烈回應:“中國人的傾向是荒誕的和危險的。在當前形勢下,在中國舉行總暴動,簡直是胡鬧。建立蘇維埃政府就是實行暴動的方針。但不是在全中國,而是在有可能成功的地方。中國人急於攻佔長沙,已經幹了蠢事。現在他們想在全中國幹蠢事。決不能容許這樣做!”^②

8月25日,蘇共政治局會議完全否定了中共中央的政策,決定李立三解職到莫斯科接受審查,會議記錄中有:“這種情況下還沒有佔領大城市的重大機會。現在號召工人在漢口、上海、北京、奉天等大城市舉行武裝暴動(就像李立三所希望的那樣)是最有害的冒險主義”。“我們一再建議政治局堅決放棄這樣的計畫。必須一天也不遲疑地集中一切力量組建堅強的、裝備精良的、清除了富農分子的和真正置於共產黨領導下的紅軍,並在業已佔領的地區為它建立哪怕一兩個真正牢固的據點,而不要熱衷於試圖立即擴大蘇維埃根據地”。“共產國際執委會認為,以前同中共中央代表團完全一致制定的所有決議和指示仍然有效。李立三同志務必儘快

^①《向忠發給斯大林的信》(1930年8月8日於上海),《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9),第283-284頁。

^②《斯大林給莫洛托夫的電報》(1930年8月13日於索契),《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9),第300頁。

到這裡來。”^①

中國形勢發展也與李立三的預期背道而馳，彭德懷佔領長沙僅十天就被迫撤出，上海、南京、武漢的總罷工和暴動根本無法實現，進攻武漢更是毫無可能。周恩來8月19日回到上海，詳細傳達了共產國際的新戰略，在內外不利形勢的壓力之下，李立三等人不得不屈服。政治局8月25日給共產國際寫信，承認錯誤，但還有相當保留，不肯承認路線錯誤，也不肯解除李立三的職務：“政治局在聽取伍豪（即周恩來）同志的報告和解釋後，完全同意共產國際對以下問題的意見”，“以前在這些問題上所存在的分歧，現在已不復存在了。政治局通過決議，要堅定不移地貫徹共產國際執委會的一切指示，並要同一切企圖把政治局或政治局某個委員的政治觀點與共產國際路線對立起來的行為進行堅決的鬥爭”，“政治局請求共產國際執委會允許李立三同志不去莫斯科。”^②

李立三在當時的中共中央有很大的影響力，糾正李立三錯誤並非易事。9月8日，中共中央再次致電共產國際，雖然承認錯誤，但強調右傾分子的活動，仍然抵制李立三解職去莫斯科：“中政局完全同意來電的指示，承認最近期間的策略是有害的。正在堅決的執行轉變”。“在這一轉變中，右傾機會分子已利用之作反中央的活動，將中央路線與國際路線對立起來。中央堅決在自我批評的基礎上，執行策略的轉變，堅決反右派及調和派的鬥爭”，“政治局因為工作需要的關係請准立三暫不來國際”。^③所謂右傾分子，顯然指何孟雄、羅章龍、王明等反對李立三的人。

但遠東局不能容忍桀驁不馴的李立三繼續留在中共中央。9月12日雷利斯基給共產國際的電報強調，李立三雖然開始承認自己的錯誤，但仍在耍手腕，“這種手腕以及他不久前的明確反共產國際的立場使他不可

①《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第5號（特字第×號）記錄——致中共中央》（1930年8月25日於莫斯科），《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9），第331-332頁。

②《中共中央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的信》（1930年8月25日於上海），《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9），第333-334頁。

③《中央政治局接受國際關於停止武漢南京暴動的指示致國際電》（1930年9月8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6），第266頁。

能繼續留在政治局和中國，因為這會給糾正所犯的錯誤和執行決議造成極大困難。我們堅持要求把他召到莫斯科來。請用相應的回電給予支持。”^①遠東局9月16日寫信給周恩來和瞿秋白，對六屆三中全會做了詳細指示，要求務必肅清李立三的影響，硬性規定李立三10月15日前必須動身去莫斯科：“即將召開的全會，除對形勢作出評價和提出黨目前的任務外，還應該研究這些錯誤，評估李立三同志所犯的這些錯誤對你們的工作產生了什麼影響”，“這次會全是在代表大會之後的最高級會議，在這次會議上應該對黨的一切缺點進行最嚴厲的布爾什維克式的批評”。“李立三同志動身的最後期限定在10月15日。”^②

（三）六屆三中全會佈置革命重心向蘇區轉移

六屆三中全會於9月24—28日召開，由瞿秋白、周恩來主持，參加的中央委員、各地方組織、各黨團代表共30多人。雖然名為三中全會，但六大選出的36名中央委員中實際到會的只有14人，卻補選了15名新的中央委員。值得注意的是，紅軍領袖毛澤東被補選為政治局候補委員、朱德被補選為中央候補委員，這說明紅軍開始受到重視。

全會重點是傳達共產國際最新指示，糾正立三路線，把中共工作重心從城市向蘇區轉移，這是中共建黨以來根本性的戰略轉變，說明共產國際在幫助中共把握方向上確實起了重要作用。周恩來在傳達國際決議的報告中說：“我們要鞏固現有的蘇維埃區域，將分散的蘇維埃區聯合起來，集中與加強紅軍的領導，發動更廣大的農民群眾，建立中央蘇維埃政府向工業中心城市發展。換句話說，就是要有鞏固的基礎向前發展，要深入的向外擴大，中央過去對此工作之注意不足，中央只注意到紅軍的發展與擴大，可是放棄了鞏固與加強，尤其是對蘇維埃區域，中央直接的指導是很

①《雷利斯基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電報》（1930年9月12日於上海），《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9），第347頁。

②《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給周恩來和瞿秋白的信》（1930年9月16日於上海），《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9），第349—350頁。

不夠的”，“過去中央對於蘇區的中心任務注意得不足”，“一定要使紅軍成為國內戰爭的主要力量”。^①

六屆三中全會結束後，中共中央向共產國際報告：“全會一致接受共產國際執委會的一切指示，並根據這些指示以真正布爾什維克的勇氣對黨在所報告的時期內的全部工作進行了自我批評。李立三同志也同樣對自己進行了無情的批判。”“李立三將在10月中動身。”^②但實際上，六屆三中全會雖然糾正了李立三的冒險路線，也解除了李立三的職務，但對中央領導機構並沒有大的改組。當初狂熱支持李立三的領導人，自總書記向忠發以下，都沒有承擔多大責任，李立三的重要支持者李維漢和賀昌補選為中央委員，李維漢還直接進入了政治局。

自從中共六大強調工人成分以來，很多如向忠發這樣文化不高、領導能力有限的工人進入中共領導層，形成了不太成熟的領導集體。周恩來1944年曾談到，在六大選舉中，“有多選工人為中央委員的傾向。三十六個中央委員中就有二十一個是工人。過去大革命中湧現出來的工人領袖雖然不少，但黨對他們的教育不夠，而知識份子幹部中有許多是五四運動中湧現出來的，做了許多實際工作，有經驗的不少。由於太強調工人成份，很多較好的知識份子幹部參加中央工作就受到了限制，如劉少奇同志只被選為審查委員會的書記，沒有被選為中央委員。惲代英同志也沒有選上，到二中全會才補上。這和後來中央很弱是有關係的。”^③

正因為中共中央整體水平不高，知識不多的工人幹部比例較大，而李立三在早期工人運動中影響很大，所以才會出現李立三冒險路線主導中央的局面，這也導致中央的威信遭到各級組織的嚴重質疑，其中反對最激烈的是王明為首的留蘇學生群體和以羅章龍、何孟雄為首的老幹部群體。

① 周恩來：《關於傳達國際決議的報告》（1930年9月24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12），第314-315、319頁。

② 《中共中央政治局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的電報》（1930年10月5日於上海），《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9），第358頁。

③ 周恩來：《關於黨的“六大”的研究》（1944年3月3、4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11），第245-246頁。

四、革命重心移向蘇區：加強聯繫、派遣幹部、建立中央局

(一)加強與蘇區的聯繫：無線電與信使

六屆三中全會後，遠東局認為中共黨內問題已經解決，開始把注意力放在幫助中共實現向蘇區和紅軍的戰略轉移，包括建立可靠聯繫、從城市派遣大批幹部到蘇區。但當務之急是儘快把最新指示送到蘇區，由於聯絡困難，三中全會糾正立三路線的方針並沒有及時到達紅軍，毛澤東、朱德、彭德懷的紅一、三軍團仍在爭論進攻長沙或南昌，賀龍在湘鄂西消息更加閉塞。

當時中央與紅軍的聯繫很不可靠，甚至出現了很奇特的情況，紅軍通過敵軍之手才得到了中央的指示。毛澤東1930年9月給中央的報告提到：“中央長江局及軍事委員會八月初給我們的信由張輝瓚搜得，報告國民政府，國民政府發往各省，何鍵發往各縣，因此我們在株洲拾得一份。我們討論結果，認為中央的指示完全正確，奪取武漢是全國性質的階級大戰”。^①八月初是立三路線最狂熱的時期，這個指示當然是讓紅軍進攻武漢。

遠東局對新指示難以到達紅軍十分焦慮，10月30日寫信給中共中央：“毛澤東和朱德指揮的我們的軍團在準備進攻南昌”，“彭德懷的軍和受他影響的部隊好像也在向長沙進發”。“在長沙失敗之後還沒有得到足夠加強的兵力去攻佔像南昌和長沙這樣兩個由敵軍加強設防的較大中心城市”，“指揮紅軍的這種戰術，除再次遭到失敗外，不會有任何別的結果”。“在江西，我們在30個縣擁有蘇維埃政權，而只有10個縣城在我們手裡。在其餘的20個縣城，政權掌握在有產階級的手裡。我們的領導同志

^① 毛澤東：《給中央的報告》（1930年9月17日），《中央革命根據地歷史資料文庫——軍事系統》（9），第446頁。

不去奪取這些縣城和建立連成一片的蘇區，而是熱衷於攻佔大城市”。“在後方不鞏固的情況於熱衷於‘攻佔’大城市來建立根據地——這是冒進，是超越當前的某些現實任務。另一方面，這也證明，中央的指示，根據最近一次全會的決定還沒有傳達到地方”。“毛澤東、朱德和彭德懷的行動再一次有力地說明，在上海和蘇區之間儘快建立通訊聯絡機構和在蘇區建立堅強的軍事政治領導是必要的。”^①

由於紅軍日益重要，共產國際派經驗豐富的蓋利斯擔任軍事顧問，專門指導中共軍事工作。蓋利斯在12月3日信提到：“以前李立三的方針雖然在上海這裡正在被根除並在很大程度上已被根除，但仍在那裡度著自己的蜜月”。“毛澤東於今年10月14日即我們的軍隊放棄吉安之後所寫的一封信中有很明顯的反映”，“他指出，6月以來他沒有接到中央的指示。最近一個指示是李立三的指示，是在6月份收到的。黨的會議和領導人討論後認為它是正確的。既然李立三的指示是正確的，那麼佔領南京和漢口也就是當時最迫切的任務了”。^②蓋利斯後來又提到：“存在過簡直是荒唐可笑的局面”，賀龍那裡直到1930年12月才在接到並討論李立三5個月前的指示，“我們已經在聲討李立三了，而在那裡他的指示還被認為是正確的，並且加以貫徹執行。”^③

中共中央12月10日給紅軍發出新訓令，要求糾正李立三路線：“過去中央在立三同志左傾盲動路線領導之下（這路線已被共產國際和中央最近決議痛加批評了），對於根據地問題，犯了很大的錯誤。我們當時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於佔領大城市（長沙，南昌，武漢等），我們簡直未注意到鞏固後方，建立具有堅固組織的和正確執行黨的路線的蘇維埃政權

①《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給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1930年10月30日於上海），《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9），第443-445頁。

②《蓋利斯給別爾津的信》（1930年12月3日於上海），《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9），第516-517頁。

③《蓋利斯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書記處處務委員會擴大會議上所作的《蘇區和紅軍》的副報告》（1931年5月7日於莫斯科），《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10），第281頁。

之根據地”。“因此我們錯過了許多可以增強自己和削弱敵人的好機會。紅軍和蘇維埃政權機關的關係很不密切有時竟至沒有關係。”^①但是新訓令能否及時到達紅軍仍是可疑的，很多紅軍部隊仍在按以前李立三的指示行動。

為加強對紅軍的領導，遠東局把建立無線電聯繫當成重點。10月20日蓋利斯在信中談到：“無線電臺比我所指出的價格貴得多”，“一部電臺需要700到750美元。而一部用於向符拉迪沃斯托克發報的100瓦的大型電臺需要1200美元，現在我已經為自己預訂了一部100瓦的電臺、為上海預訂了一部50瓦的電臺和為各軍預訂了兩部15瓦電臺。我所有的錢都用在這上面了。100瓦的電臺過三周就能做好，50瓦的也一樣，而兩部15瓦的電臺要經兩個月才能準備好，這些電臺都是從美國訂購的”。^②

在六屆四中全會前後的兩個月（1930年12月-1931年1月），激烈黨內鬥爭嚴重幹擾了向農村戰略轉移的步驟。四中全會之後，蓋利斯1931年2月4日對中央軍事部提出了嚴厲批評：“沒完沒了地開會、辯論，提出問題大都不夠具體，而關於派人到蘇區的具體的實際的工作、同紅軍建立聯繫、領導蘇區和紅軍、由地方黨組織派人和提出瓦解國民黨軍隊、在靠近前線的地帶和凡有條件的地區開展遊擊運動的具體任務等等卻很少過問。時間在流失，軍閥已開始對蘇區發動第二次進攻，而在這樣的工作狀態下我們不能同紅軍一起較為認真地參加打退軍閥進攻的鬥爭。我們在很大程度上是這場鬥爭的消極旁觀者”。^③

蓋利斯直接給中央軍事部佈置任務，要求建立每兩周聯繫一次的制度。“現在同紅軍的聯繫是極不可靠、極不正常的。沒有聯繫，就沒有也不可能通過黨、蘇維埃系統以及軍隊系統進行的領導。應該組建聯絡局，

①《中共中央給紅軍的訓令》（1930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6），第509-510頁。

②《蓋利斯給別爾津的信》（1930年10月20日於上海），《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9），第417頁。

③《蓋利斯給周恩來的信》（1931年2月4日於上海），《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10），第44-45頁。

使上海每兩周就能從紅軍各單獨行動的部隊和單獨的蘇區獲得情況報告”，“並且要求蘇區根據此表每兩周報告一次。只有在這樣的聯絡體制下才能對紅軍和整個蘇區進行符合實際的領導”。“為了做到這一點，應當由絕對可靠的人在下列地點：上海、香港、汕頭、天津、廈門、廣州、漢口，九江（或南昌）設立聯絡中心”。“無線電臺應該連同無線電報務員一起立即從漢口調往賀龍處”，“三部電臺和無線電報務員調往毛處，立即將電臺從天津調往第1軍。無線電報務員的培訓工作，應看作是一項最重要的戰鬥任務，要非常積極地加速辦理這件事。”^①中共中央很快按蓋利斯的要求制定了問題表，3月寫信給各蘇區，要求按表回答問題，“每月初一及十五做報告給中央”。^②

建立無線電聯繫是重中之重，當時還處於準備階段，主要是給紅軍購買、運送電臺和培訓技術人才。周恩來2月19日向遠東局彙報了工作進展：“除兩人外，他們都已動身前往，但只是去香港，下面的路程眼下還沒法定。有兩人留下來給賀龍運送電臺。三天前我們就已決定，他們應在最近一周內動身”。“關於無線電臺”，“我們買了一台大的、兩台小的。大的是給毛買的，兩台小的是為第7軍和第8軍買的。隨後我們打算從香港和天津給賀龍和第2軍運去無線電臺。但結果發現，香港和天津的電臺沒有馬達，它們只有靠電力才能運轉，賀龍那裡沒有電，因此需要為賀龍購買新的帶馬達的電臺。”^③米夫3月28日的信提到：“關於無線電設備。第1軍有一台收報機。已給賀龍、朱毛活動地區及其他地區送去了收報機。現在幹部問題十分尖銳。無線電收發報員不夠。這裡沒有可能進行速成培訓。我們的第一所學校垮了。第二所在培訓，但學員至少要過兩個月

①《蓋利斯給周恩來的信》（1931年2月4日於上海），《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10），第45-46頁。

②《中央為建立交通關係及報告制度給各蘇區及紅軍的信》（1931年3月），《中央革命根據地歷史資料文庫——黨的系統》（3），第1553頁。

③《雷利斯基同向忠發和周恩來談話記錄》（1931年2月19日於上海），《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10），第87-88頁。

才能畢業。”^①

1931年3月，中央派出的無線電人才武雲甫、曾三、塗作潮經香港到達中央蘇區，他們與龍岡大捷中俘獲的技術人才王諍、劉寅等一起成為紅軍無線電技術骨幹，但是由於電臺功率太小，無法建立蘇區和上海的聯繫。直到第二次反圍剿繳獲公秉藩部的100瓦電臺之後，無線電聯繫才終於在1931年秋天建立起來。^②雖說上海為蘇區買了一些電臺，但很難通過封鎖線送到蘇區，甚至密碼都要記在腦子裡帶進去，即使在閩西通道也是如此，“小商販很願意把火柴、食鹽和煤油從白區運往我區，因為這些商品在蘇區價格昂貴。不過軍閥們禁止這樣做。因此他們對所有貨物都檢查得很仔細。很難將無線電設備運到那裡。”^③中央蘇區後來的幾部電臺多數是戰鬥中從敵軍繳獲的，還有就是寧都起義部隊帶來了八部電臺。^④鄂豫皖蘇區的幾部電臺也是在戰鬥中繳獲的，湘鄂西蘇區的電臺是上海送去的，與鄂豫皖和湘鄂西建立無線電聯繫大致是在1932年春天。^⑤

1931年秋天以前，上海與蘇區之間主要聯繫方式還是信使，但信使往返一次要兩個月時間，而且承受著巨大的風險，通常一半的信使會被敵人抓住。米夫給莫斯科的信中提到：“我們有信差服務，而且這種服務在不斷改善。只是很難找到可靠的、適應當地條件的人。通常有50%的信使落人敵人手中，這對工作是很大的損失。”^⑥

① 米夫：《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信》（1931年3月28日於上海），《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10），第204頁。

② 李強：《一次劃時代的通信革命》，《紅軍的耳目和神經——土地革命時期通信兵回憶錄》，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4頁。

③ 《雷利斯基同周恩來、張國燾和向忠發談話記錄》（1931年3月27日於上海），《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10），第183-184頁。

④ 王諍：《從半部電臺開始》，《紅軍的耳目和神經——土地革命時期通信兵回憶錄》，第53-54頁。

⑤ 李文采：《洪湖電波》，《紅軍的耳目和神經——土地革命時期通信兵回憶錄》，第208-209頁。

⑥ 米夫：《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信》（1931年3月28日於上海），《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10），第204頁。

(二)中央決定派60%幹部去蘇區,紅軍給上海送來大筆經費

革命重心轉移也體現在人力投入方向的變化,也就是把大批幹部從城市派往蘇區和紅軍。但是由於國民黨的嚴厲封鎖,這項工作最初遇到很大困難。蓋利斯在1930年10月20日信中提到:“一些人陸續被派往蘇區,但是他們離開上海後就再也知道他們的情況了”。一個半月前,中央派關向應經武漢去蘇區建立中央局,但是“目前他回來了,因為他無法找到我們的部隊”,“在存在警察、軍閥、富農和豪紳的道道搜查情況下,他無法穿越鬥爭地帶。他說,在搜查時我們的許多同志被逮捕了,凡是不能對警察或當地農村資產階級衛隊提出的到哪裡去和去幹什麼等問題作出令他們滿意的回答的人,統統槍斃”,“在靠近前線的地帶籠罩著最野蠻的恐怖氣氛。”^①

中共中央決定把大部分幹部派往蘇區。向忠發提到:“對於蘇區工作的加緊,現在正依照國際的指示,要從中央政治局起以百分之六十的幹部力量去加強與鞏固蘇區的領導”。“軍事幹部不論是在莫學過軍事的或在國內做過軍事工作的,都要以百分之九十以上派往蘇區。”^②派幹部去蘇區在六屆四中全會前後中斷了一個月,會後又繼續進行,而且到達的比例也明顯提高,說明聯繫通道更加可靠了。據周恩來1931年6月份的報告:從1930年9月至1931年4月,中央共向蘇區派了228人,其中172人到達。其中:向中央蘇區派了67人,57人到達;向鄂豫皖第1軍派了48人,43人到達;向湘鄂西第2軍派了39人,18人到達;向贛東北方志敏的第10軍派了19人,10人到達;向何長工的湘鄂贛第8軍派了4人,全部到達;向孔荷寵的湘鄂贛第16軍派了11人,9人到達;向第9軍派了14人,12人到達;向閩

^①《蓋利斯給別爾津的信》(1930年10月20日於上海),《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9),第411、414頁。

^②《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給共產國際的報告》(1931年2月22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7),第134頁。

西第12軍派了14人,12人到達。派送和抵達的情況見下表:^①

向蘇區派遣幹部統計表

派送年月	派送數量	抵達數量	比例
1930年9月	29	19	65.5%
1930年10月	21	16	76.2%
1930年11月	32	19	59.3%
1930年12月	36	23	63.9%
1931年1月	0	0	——
1931年2月	36	31	86.1%
1931年3月	35	33	94.3%
1931年4月	39	31	79.5%
總計	228	172	75.4%

軍事顧問蓋利斯也積極籌畫進入蘇區,直接指導紅軍,但外國人通過封鎖線困難更大,最終沒能成功。蓋利斯說:“我們去蘇區的問題——這是我們局以及我們同中國人的會議的議事日程上不斷提出的一個問題”,“外國人現在進入蘇區要比中國人更困難。我向中國人提供1000美元作為這項工作的費用,並指出,我們準備步行幾百俄裡,不要求任何舒適的條件”,“即使只有20-30%的成功機會也準備行動”,“那裡極其需要領導。”^②中共後來嘗試由任弼時和王稼祥陪同他去蘇區,不過蓋利斯剛上船就被識破假身份,沒能離開上海。^③

閩西通道是當時聯繫中央蘇區的最重要交通線,在溝通信息、輸送人員和資金上發揮了很大作用。這條通道是從上海經香港到汕頭,然後沿韓江北上到達福建永定,進入閩西蘇區。3月27日,中共政治局向遠東局

^①《雷里斯基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書記處的信》(1931年6月10日於上海),《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10),第323頁。

^②《蓋利斯給別爾津的信》(1930年10月20日於上海),《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9),第418頁。

^③《蓋利斯給別爾津的信》(1931年2月28日於上海),《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10),第149-150頁。

報告：“從閩西派人到中央區是很容易的，已派許多人到那裡去了”。護送任弼時和王稼祥的信使已經返回，“他們倆是3月15日到達閩西的。到那裡是很容易的。在上海和汕頭都沒有遇到任何困難”。^①5月7日，蓋利斯在報告宣稱：“現在已經同各蘇區建立起這樣的聯絡線路。這種聯繫正在進行。不管怎麼說，現在我們有可能把自己的人派到蘇區去，把我們的指示發到那裡。”^②

蘇區成為革命中心的突出標誌是紅軍能夠經濟上自立，甚至還可以支援中央，這也是中國革命從共產國際支配下走向獨立的關鍵一步。以往中共中央經費幾乎全靠共產國際支持，中央再把經費分配給各省省委。1930年11月，蓋利斯信中提到：當時中共中央平均每月從莫斯科收到1.5萬美元，大約相當於不到5萬中國元，“它要用這筆款項支付自己機關費用，要開展工作，往蘇區派遣人員，租用住房，出版報紙、雜誌、傳單等出版物。顯然，這筆錢是不夠用的，難怪每一次會見周恩來的時候，他都提出經費問題。”此時紅軍已經相當強大，有很多繳獲，可以支援中央，“在蘇區的各軍中都有些值錢的貴重物品（例如第10軍，據由那裡來的一位同志報告說，它積攢有價值10萬墨西哥元的貴重物品）”。^③

實際上，早在1930年5月毛澤東派熊壽祺到上海彙報時，就讓他給中央帶去了一些在南雄、大餘繳獲的金子。^④紅一軍團10月攻佔吉安，繳獲很多，毛澤東又爽快地承諾：“對中央款子，決付十萬元金子，匯五萬元現款”。^⑤當時設在香港的南方局是重要中轉站，閩西蘇區11月1日給南方

①《雷利斯基同周恩來、張國燾和向忠發談話記錄》（1931年3月27日於上海），《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10），第183-185頁。

②《蓋利斯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書記處處務委員會擴大會議上所作的《蘇區和紅軍》的副報告》（1931年5月7日於莫斯科），《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10），第281頁。

③《蓋利斯給別爾津的信》（1930年11月28日於上海），《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9），第480、479頁。

④ 蕭克：《蕭克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97，第130頁。

⑤ 毛澤東：《給中央的報告》（1930年10月14日），《中央革命根據地歷史資料文庫——軍事系統》（9），第506頁。

局的信中提到：“簡××同志已達到否？他去時帶去金子一百二十兩”，“朱毛付給中央匯單五萬元。此單有期限，不能在此停留，故我即著偉×同志帶單到你處轉中央”。“贛西南有十多萬金子要付給中央，已在閩西組織一百名參觀團到贛提款回來，我寫信要他們即籌四十萬元給南局中央，他們的錢很多”。^①南方局11月16日給中央的信中提到了這筆錢：“送上信，系杜同志由閩西來信及五萬元的匯單交大姐帶來，請查收”，“我們收到的金子約值八九〇〇，暫留作南局整個經費、送香港工人到紅軍去及交通站一大份費用，所以沒有帶來”。^②

到1931年2月，中央收到來自蘇區的經費已相當可觀。賀龍沒等中央開口就主動送來2萬元，在蘇區也非常貧窮的情況下，這體現了紅軍將領對黨組織的忠誠。蓋利斯給周恩來的信中提到，“從賀龍那裡得到的2萬元應分攤給軍事部各個方面的工作”，應派專人帶著指示到毛澤東、賀龍以及第10、16、1軍去，“從那裡帶來錢或者貴重物品。他們在這方面能夠幫助上海。賀龍未經請求就這樣做了。毛也想送來，第10軍準備給錢。錢是有的，只是需要拿到手。”^③2月下旬，中央提款員易爾士把中央蘇區的資金帶到上海，米夫給共產國際的信提到：“工作將會進行得更快些，因為現在有錢。中央從毛澤東那裡得到了價值約10萬墨西哥元的黃金，從賀龍那裡得到了1.5萬墨西哥元的黃金。”^④

1931年5月7日，蓋利斯在莫斯科作《蘇區和紅軍》報告時，很興奮地談到這個問題：“送錢這個事實說明蘇區對中央和共產國際的態度。在中國，讓一個將領給某地送錢，這簡直是聞所未聞的事情。相反，將領們只

①《杜××自閩西給南方局信》（1930年11月1日），《福建革命歷史文件彙集》（8），第191-192頁。

②《中共南方局致中央信》（1930年11月16日），《中共南方局文件彙集》，中央檔案館1985年，第106頁。

③《蓋利斯給周恩來的信》（1931年2月4日於上海），《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10），第49頁。

④米夫：《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給共產國際的信》（1931年2月22、23、25、28日於上海），《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10），第143頁。

從事奪取錢財的活動。當我們的中央提出關於經費支援的問題時，它在不長的時間裡就從1軍團和3軍團，從賀龍軍團和毛澤東軍團那裡得到了20萬元”。^①

(三)革命重心轉向蘇區：籌建蘇區中央局和中央分局

1930年8月，周恩來從莫斯科回來傳達國際指示後，中共中央立即提出了在蘇區設立中央局的初步構想。中央在8月29日給長江局並轉各省前委、行委的信中提到：“中央決定在湘鄂贛這一廣大蘇維埃區域中成立中央局，其管轄區域以所有蘇維埃區域為範”。^②中央決定派政治局候補委員關向應去主持中央局，“一月後可更有人去，直接由中央指導”。^③關向應帶著中央9月1日指示信到武漢，中央讓他與長江局“討論此信後，應立即動身前往蘇區組織蘇區中央局”。^④但當時兩湖地區戰事緊張，敵軍盤查嚴密殘酷，關向應沒能穿越封鎖線，被迫回到上海。

1931年1月六屆四中全會後，中國革命重心向蘇區轉移的進度加快，其中重要舉措就是在各蘇區建立中央機構：在中央蘇區建立中央局，在鄂豫皖和湘鄂西蘇區建立中央分局。1月17日，共產國際在報告中指出：“為了保證切實和儘快執行共產國際執委會關於建立地區蘇維埃根據地和組建正規紅軍核心的指示，責成遠東局和中共中央在預定作為蘇維埃政權和擴充軍隊根據地的地區真正組建中共中央局”。^⑤中共政治局1月

①《蓋里斯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書記處處務委員會擴大會議上所作的《蘇區和紅軍》的副報告》(1931年5月7日於莫斯科)，《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10)，第280頁。

②《中央關於再度佔領長沙的戰略與策略給長江局並轉湘省委、湘鄂贛前委及行委的信》(1930年8月29日)，《中央革命根據地歷史資料文庫——黨的系統》(2)，第1054頁

③《中央關於在湘、鄂、贛三省區域成立中央局給長江局的信》(1930年8月29日)，《中央革命根據地歷史資料文庫——黨的系統》(2)，第1055頁。

④《中央給長江局的信》(1930年9月1日)，《中央革命根據地歷史資料文庫——黨的系統》(2)，第1083頁。

⑤《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書記處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的書面報告》(1931年1月17日於莫斯科)，《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10)，第35頁。

20日決議也提出：“最高限度的集中並鞏固我們在蘇維埃區域鬥爭的領導。為著達此目的必須增加並鞏固蘇維埃區域中央的成份”。^①

在蘇區建立中央機構的重要原因是擔心紅軍各自為戰，無法建成強大統一的軍事力量。蓋利斯談到，彭德懷“指揮該軍作戰時沒有同毛澤東商量，沒有制訂共同的計畫。結果出現了這樣的情況：他孤軍奮戰，而毛澤東卻在看著。在第二次攻打長沙時，出現了同樣的情況——沒有協調行動。沒有共同的有計劃的指揮行動”，“在同一個蘇區，甚至在同一個軍內，行動也不協調，直到最近還出現這種情況。”^②

建立中央局是這一時期的關注焦點，在莫斯科、遠東局和中共中央的通信中頻繁出現。蓋利斯2月4日寫信催促周恩來：“派中央局成員去蘇區（毛澤東和賀龍那裡及第1軍）之事已久拖不決，難以容忍。派人的可能性是有的。應該立即將所有已經任命的人派去。”^③米夫信中也強調，如果“有堅強的有威信的中央局，那麼所有這些缺點大都是可以克服的。”^④共產國際2月20日又催促中共要立即建立中央局：“我們認為再拖延蘇區中央局和蘇維埃民政當局的建立是極端危險的，有礙于建立根據地和紀律嚴明的紅軍。請採取果斷措施，立即在贛南建立有威望的中央局”。^⑤向忠發2月22日向共產國際報告：“對蘇區中央局，已決定再派政治局委員三個人去和其他得力同志，成立九個人的蘇區中央局。對鄂西、鄂豫皖兩

①《中央政治局關於軍閥進攻蘇維埃區域的決議案》（1931年1月20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7），第53頁。

②《蓋利斯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書記處處務委員會擴大會議上所作的《蘇區和紅軍》的副報告》（1931年5月7日於莫斯科），《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10），第278—279頁。

③《蓋利斯給周恩來的信》（1931年2月4日於上海），《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10），第47頁。

④米夫：《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信》（1931年3月28日於上海），《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10），第204頁。

⑤《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的書面報告》（1931年2月20日於莫斯科），《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10），第112頁。

處，亦決定組織中央分局，派兩個中央委員去主持分局。”^①

遠東局的設想是，政治局仍設在上海，但當政治局與蘇區聯繫中斷時，由中央蘇區的中央局領導其他蘇區的中央分局。雷利斯基3月2日說：“在軍事問題上中央蘇區的中央局將起主要作用”，“蘇區所有的局都應該同上海的政治局及其他所有的局建立密切聯繫。當這些聯繫中斷，而同中央區中央局的聯繫還存在時，那麼顯然中央區的中央局要把領導權抓到自己手裡。”^②中央3月給各蘇區的信中提到：“蘇區有中央局，毛澤東同志為中國工農革命委員會主席，朱德同志為紅軍的總司令，各蘇區的報告（給中央的報告）也應送給他們。”^③米夫3月28日向共產國際彙報了建立中央局和中央分局的進展：“項英10月就走了，12月他已在第12軍地區”，任弼時、王稼祥和顧作霖也已動身前往那裡，夏曦已前往賀龍那裡，沈澤民已前往第1軍，張國燾將於4月1日或2日出發。^④

實際上，項英已於1931年1月15日與毛澤東會合，並立即宣佈成立蘇區中央局，擔任代理書記，毛澤東、朱德、曾山為委員。4月份，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也進入中央蘇區，進一步加強了蘇區中央局內的中央成分。夏曦於3月到達湘鄂西蘇區，成立了湘鄂西中央分局。張國燾也於4月到達鄂豫皖蘇區，成立了鄂豫皖中央分局。

中國革命重心從城市向農村轉移，不完全是共產國際和中共的主動選擇，也是受實際形勢的逼迫。在城市，國民黨統治力量集中，中共一年內經過立三路線、羅章龍分裂和顧順章叛變等嚴重挫折，革命力量損失慘重。據1931年2月中共中央的報告：“過去上海黨員有一千三百多，現在

①《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給共產國際的報告》（1931年2月22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7），第134頁。

②《雷利斯基同沈澤民、張聞天和趙容（注：康生）談話記錄》（1931年3月2日於上海），《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10），第163頁。

③《中央為建立交通關係及報告制度給各蘇區及紅軍的信》（1931年3月），《中央革命根據地歷史資料文庫——黨的系統》（3），第1553頁。

④米夫：《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信》（1931年3月28日於上海），《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10），第204-205頁。

清查結果，要以能工作與到會繳費的才算黨員恐不到八百人。香港經過大破獲，中上級幹部被捕四十多，現在工作方開始恢復，黨員只一百五六十人，而真正能做工作的恐亦不及百人。武漢累次破獲後，市委都難立足”。“長沙、嶽州、九江、南昌等地的工作，始終沒有恢復。天津黨員在生產中的不及二十人，只唐山礦工黨員較多點，但也沒有健全的支部生活。滿洲大破獲後，僅撫順、大連、營口有點黨的工作，但亦甚微弱。總之，一切非蘇區的中心城市工作，經過立三路線及調和主義的時代給了很大的損害後，到現在都還沒有很好的轉變。”^①

遠東局在叛徒迭出的上海遭遇極大危險，3月30日電報顯示：“我們面臨出現新的叛變的危險。蓋里斯和米夫繼續逗留是非常危險的”，“請注意，這裡只剩下遠東局兩名成員了”。^②掌握中央機密的特科負責人顧順章4月被捕叛變後，中共中央和遠東局都面臨被捕的直接威脅，雷利斯基在6月10日信中說：“四全大會後我們有很多人被捕。光上海一地我們就平均每天損失三人。”^③總之，革命力量在城市越來越難以立足，在农村蘇區卻有巨大發展空間，革命重心向蘇區和紅軍轉移，既是共產國際高層的戰略決策，也是形勢演變的結果。

無論如何，中國革命的重心已經不在城市，而在紅軍和蘇區了。從1930年開始，中共中央在共產國際的指導下逐步走向戰略轉變，中央領導幹部分批進入蘇區，力圖通過中央局和中央分局建立更加集中的組織體系。但是事情並非像米夫料想的那樣，中央機構的建立可以消除摩擦和分歧，在權力結構從鬆散到集中的轉變中，中央領導與地方幹部之間發生了激烈衝突。在當時殘酷危急的戰爭環境中，這種衝突有時甚至會引發嚴重的後果。

①《中共中央致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電——報告四全大會經過》(1931年2月22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12)，第527-528頁。

②《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電報》(1931年3月30日於上海)，《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10)，第210頁。

③《雷利斯基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書記處的信》(1931年6月10日於上海)，《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10)，第318頁。

五、小結

中共在1927年下半年的暴動中創建了紅軍，紅軍與農運結合開創了農村革命根據地。但是在最初的兩年多時間，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並沒有把紅軍當做中國革命的主要力量，紅軍在中共組織中處於邊緣地位，和中央、省委、地方組織的關係沒有理順，各級組織給紅軍的指示常常脫離實際，甚至給紅軍帶來損害。在不斷磨合的過程中，紅軍的重要性日益顯示出來，在中共組織中的地位也逐漸從邊緣走向中心。

1930年是中國革命戰略轉變的關鍵之年。國民黨各派軍隊發生了大規模內鬥，最後演變成關係各派存亡的中原大戰。紅軍獲得了巨大發展空間，迅速成長為影響全國政局的重要力量，同時全球資本主義世界陷入史上最嚴重的經濟危機，產生了全面的恐慌。巨大的發展機遇使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對革命形勢做出了樂觀的判斷，但同時也引發了權力結構混亂，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之間、各級黨組織和中共中央之間、各部紅軍之間都產生了嚴重分歧。中共組織體系經受了激烈衝突的考驗，走向進一步的集中和強化。

中共中央和各地紅軍感到形勢大好，抓住機會迅猛發展，這時以李立三為核心的中共中央產生了強烈的獨立傾向，不顧遠東局和莫斯科的反對，試圖自主發動城市暴動，同時命令紅軍進攻武漢、長沙、南昌等大城市。但是李立三的極不成熟的嘗試沒有成功，對大城市的進攻先後失敗，中共在城市的力量也在冒險盲動中損失慘重。

毛澤東1930年1月首先提出以紅軍和蘇區為重點的中國革命新道路，半年以後斯大林也認識到中國革命的特點，做出了把革命重心從城市向農村轉移的重大決策，提出把紅軍和蘇區放在第一位。六屆三中全會結束了李立三的領導，遠東局和中共中央把工作重心放在戰略轉移上，努力建立與蘇區的無線電聯繫，大批幹部被派往蘇區，並籌畫建立蘇區中央局和中央分局，六屆四中全會後革命重心向農村轉移的速度大大加快，這

是關係到中國革命前途的重大轉變。

毛澤東等紅軍領導人在中國農村開創的事業影響了世界革命戰略，共產國際逐漸認識到了中國革命的特殊性，把中國紅軍當做世界革命的最重要成果之一。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曼努伊爾斯基在1931年3月共產國際執委會十一次全會發言中驕傲地說：“在中國，革命危機加深的實際表現是，在擁有數千萬人口的土地上建立了蘇維埃和紅軍。這是當前中國革命高漲的決定性因素，它使中國站到整個殖民地世界的民族革命運動的最前列，這是革命高漲的最高形式”。^①

共產國際東方部部長庫西寧表現出對中國革命特殊道路的極大興趣，他在1931年4月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會議上說：“革命是以獨特的方式進行的，而在每個單獨的國家，它自然也是以獨特的方式進行的，何況是在中國。但要理解中國革命的這種特殊性並不那麼容易”，“現在我們應該學習說中國話”。“中國黨內工人只占5-6%時，幾乎所有的同志都會感到驚奇”，“這樣的事實其他任何地方都沒有。中國的紅軍是跟任何別的地方完全不一樣的。蘇維埃也是完全不同的”。“在中國我們見到的是完全不同的順序。先是個別共產黨人組建紅軍支隊，而這些支隊建立起新的無產階級政權。然後建立蘇維埃的基礎，後來開始——只是今天才開始——建立黨的中心；然後著手組織貧農，最後才解決最重要的任務——發展廣泛的無產階級階層”。“一切看起來都跟我們最年輕的瑪律丁諾夫同志在這裡所說的一樣：這仿佛是奇跡。他甚至說這是魔法”。^②

①《曼努伊爾斯基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十一次全會發言》(1931年3月26日晚)，《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12)，第597頁。

②《庫西寧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討論中國問題會議上的講話》(1931年4月15日於莫斯科)，《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10)，第237-238頁。

第六章

六屆四中全會與羅章龍另立中央

1931年1月的六屆四中全會在中共黨史上影響很大，米夫派留蘇學生從此進入中央領導層，在中國革命從城市向農村戰略轉移的關鍵階段，開啟了長達四年的所謂“王明路線”時期。本來六屆三中全會糾正立三路線之後，中共中央已經把工作重點放在戰略轉移，但是共產國際收到最新報告後，對李立三的批評上升到路線鬥爭，同時羅章龍、何孟雄、王明等對三中全會未能改組中共中央，反而繼續壓制反對李立三的人也很不滿。米夫到中國後，王明等留蘇學生得到重用，羅章龍、何孟雄反對派的要求則被拒絕，他們在六屆四中全會後憤而走向分裂，發生了黨史上罕見的羅章龍另立中央事件。

羅章龍、何孟雄反對派大致形成於1930年9月六屆三中全會前，但他們在全會上遭到了壓制。國際來信和米夫11月到上海後，中共中央最初只向共產國際認錯，繼續壓制反對派。但是從12月中旬開始，中央轉而向反對派公開認錯，12月23日九十六號通告開啟了黨內民主高潮。反對派以緊急會議為號召、以全總、江蘇省委、蘇准會等為基地，試圖自下而上改組中共中央，取得中央領導權。華北黨組織也在九十六號通告影響下在天津自發成立了緊急會議籌備處，奪取了省委權力。

但莫斯科最終確定召開六屆四中全會，米夫拒絕了反對派要求，計畫保留多數原中央領導、引入少量留蘇學生、同時吸收部分反對派，組成一個三結合的新中央。六屆四中全會上發生了激烈衝突，失敗的羅章龍派憤而走向決裂，他們成立“非常委員會”，引發全總、江蘇、華北、東北等不少黨組織分裂，但由於自身局限、中共分化瓦解和國民黨的殘酷鎮壓很快

失敗。激烈的黨內鬥爭使中共白區黨組織元氣大傷，悲觀失望情緒瀰漫，失去一批經驗豐富的幹部，中共在白區的影響急劇衰落。

羅章龍、何孟雄反對派從形成到走向分裂，既有政治上的原因，也有組織上的原因。反對派的形成，大致是因為政治上反對立三路線；反對派最後走向分裂，則主要是在組織上不滿米夫改組中央的計畫以及對黨內民主的壓制。本章力圖重建反對派從形成到失敗的基本史實，並嘗試分析當時中共在組織上的兩難處境：李立三強調集中卻犯下重大失誤，羅章龍呼籲民主卻走向組織分裂，民主集中制的革命黨常常不得不面對艱難的選擇。

一、反對派初步形成，中共中央持續壓制

（一）反對派在六屆三中全會前初步形成

1930年5月到8月是立三路線最狂熱的時期，以6月11日政治局決議《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首先勝利》為標誌，李立三為核心的中共中央要求各地都採取進攻路線，白區黨組織在這種盲動之中損失慘重。在這個階段，反對派還沒有形成，只有個別人公開提出不同意見。何孟雄一直是中共黨內具有獨立思想並敢於公開表達的高級幹部，他本來是江蘇省委的主要領導人之一，但是在1929年反對中央兼江蘇省委的紛爭中，被降職到上海擔任滬東區委書記，後來又調任滬中區委書記。

在立三路線統治時期，上海通常每週開一次區委書記聯席會議，有時中央領導也參加。據時任閘北區委書記的黃理文回憶，在一次區委書記會議上，李立三公開宣稱“工人要大幹，不要小幹，只要有人領導，一呼百應，罷工就能罷起來”。何孟雄當場起來反駁，認為“實際情況不是這樣的”，在另一次區委書記聯席會議上，江蘇省委常委、上海工聯黨團書記王克全也說過類似的話。^①

^① 黃理文：《1930年江蘇省委和閘北區委的一些情況》，《黨史資料叢刊》1981年第3輯，第28頁。

但像何孟雄、王克全這樣公開質疑的很少，還算不上一個派別，後來屬於反對派的很多人當時並不反對立三路線，甚至是立三路線的支持者。比如羅章龍就沒有公開反對，在7月9日中央工作人員會議上，起來反對6月11日決議的是王明、博古、王稼祥、何子述等幾個留蘇學生。王明後來說：“羅章龍那天雖然也出席了，可是沒有說一句反對這個決議案的話，而且聲明同意這個決議。”^①據向忠發的報告，後來反對派的不少重要骨幹都曾支持立三路線，比如“蔡伯真同志當時因為努力反對何孟雄同志而取得滬中區委書記，等到國際來信後，蔡伯真同志卻又投入右派的營壘”；“戴曉雲一向是立三路線執行者，等到立三路線揭發之後，他也由‘左’而跑到右”；“李求實、張昆弟、林育南等同志都是立三主義統治時期被稱許為很進步的同志，但以後都成為右派中的健將”。^②

1930年8月下旬，周恩來、瞿秋白從莫斯科回到上海，傳達了共產國際7月23日決議，批評了李立三的錯誤。在準備召開六屆三中全會的時期，反對派初步形成，在何孟雄周圍逐漸聚集了一些人。9月1日上海區委、產委聯席會議上，何孟雄再次與李立三發生激烈衝突，何孟雄提出了“立三路線”的說法，他認為：“發生了許多工作上的弱點，是立三指導路線得來的結果。斯大林同志所分析的”，“中國革命與世界革命的形勢，與立三所說的不同。”^③但是李立三不但沒有接受意見，反而粗暴禁止何孟雄繼續發言，罵他是“取消派的暗探”，並且會後把何孟雄撤職。產委書記、印刷工人領袖沈先定在會上聲援何孟雄，要求公佈共產國際指示，也遭到壓制。^④

① 王明：《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鬥爭》（1931-1932），《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八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210頁。

② 向忠發：《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給共產國際的報告》（1931年2月22日），《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八冊，第76頁。

③ 何孟雄：《在上海區委、產委聯席會議上的發言》（1930年9月1日），《何孟雄文集》，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74頁。

④ 《江南省委關於部分改組省委給中央政治局的報告》（1930年12月23日），《江蘇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甲9），中央檔案館、江蘇檔案館1984年，第544頁。

但何孟雄等人並未屈服，他們已經知道共產國際對李立三的批評。9月8日，何孟雄給中央寫了《政治意見書》，而且意見書“並不是他個人的意見寫的，而是開小組組織會議討論後寫的”。徐錫根參加了這個小組組織會議，他是政治局委員，較早聽到周恩來、瞿秋白傳達共產國際決議對李立三的批評，很可能是他把消息擴散了。^①何孟雄在意見書中明確說：“我在工作檢閱中有許多地方又遇到中央路線行不通，最近聽說國際對於中央路線也有根本指示（決議案和電報），因此，要求中央宣佈交全黨討論”。^②李立三堅持認為自己大體正確，只是策略失誤，並說服周恩來、瞿秋白為了維護中央的權威，不能承認路線錯誤。在9月12日上海活動分子會議上，周恩來批評何孟雄如果“把國際路線和中央路線分開”，“可以動搖同志”。^③

在9月底六屆三中全會上，周恩來作傳達共產國際決議的報告，報告內容應該是遠東局、瞿秋白、周恩來、李立三、向忠發等協商妥協的結果。報告否認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有根本的路線分歧，認為只是個別策略上出現錯誤：“中央的錯誤，是否路線上和國際不同呢？完全不是的。路線上沒有什麼不同的，中共黨的目前任務是在奪取廣大群眾，集中革命力量，組織革命的戰爭，積極準備武裝暴動，去推翻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統治，建立蘇維埃政權，這些是和國際的指示無絲毫的不同，而是完全一致的。只是因為對目前的革命發展形勢在程度與速度上有了過分估量，遂致造成中央個別的策略上的錯誤。”^④

報告用了相當篇幅批評何孟雄等人右傾：“我們是接受國際批評，指出立三同志在思想上多負責一些，但不能允許任何同志的挑撥，如孟雄同志那樣說‘立三主義’等話”。“他們利用中央個別的錯誤，加以造謠誣蔑，

① 王明：《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鬥爭》（1931-1932），《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八冊，第213頁。

② 何孟雄：《政治意見書》（1930年9月8日），《何孟雄文集》，第186頁。

③ 何孟雄：《在上海活動分子會上的發言》（1930年9月12日），《何孟雄文集》，第186頁。

④ 周恩來：《關於傳達國際決議的報告》（1930年9月24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12），第314頁。

他們主要的是發揮自己路線”。“右派的路線是什麼呢”，“對革命形勢有過低的估計，不相信革命新高潮的到來”，“對於農民戰爭的意義看得非常之輕，認為攻長沙是一個部落的行為，認紅軍為流氓土匪”，“對於主觀力量悲觀，認為不能領導任何鬥爭”，“對於政治罷工的觀念動搖”。“因為何孟雄的活動，以及政治觀念不清楚的，或者真是有自己路線暗藏著的人，它們懷疑中央與國際的路線是否相同，在江蘇已有陳韶玉（即王明），劉峻山等同志已表現出它們調和的傾向，這也是黨要和它們堅決鬥爭的”。^①

六屆三中全會決議案認為中央政治局的路線是“正確的，是和共產國際的路線是一致的”，只有一些策略失誤，比如“忽略蘇維埃根據地的重要，忽略工業區域日常鬥爭和政治問題的聯繫。”^②決議卻用相當篇幅批評右傾分子，“說城市工人沒有革命的鬥爭，沒有同盟罷工的可能，只能實行日常的經濟的小鬥爭”；“說農民戰爭是‘部落式的暴動’”；“造謠挑撥說黨內實行純粹的委派制度，‘弄得同志都不敢講話’，發展煽動無原則的派別鬥爭”；“利用中央政治局策略上組織上的個別錯誤，不但造謠誣蔑挑撥離間，進行小團體的活動，而且宣傳中央的路線和國際是不一致的”，“這些分子的領袖，又正好就是從二中全會以前、江蘇問題的爭論、反對陳獨秀鬥爭的最初階段以來，一貫的是反對中央的”，^③這顯然指何孟雄。

在瞿秋白的政治討論結論中，羅章龍與何孟雄都受到點名批評，這說明羅章龍也已成爲反對派的代表人物。瞿秋白明確批評羅章龍右傾：“並不是以前過於注意總同盟罷工、武裝暴動，而現在是要將他放的很遙遠的前途去。如果以爲現在占第一位的是‘小範圍的鬥爭’，那就是客觀上是犯了右傾。章龍同志認爲政治罷工和總同盟罷工現在不應當占‘第一

① 周恩來：《關於傳達國際決議的報告》（1930年9月24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12），第325-326頁。

② 《關於政治狀況和黨的總任務議決案》（1930年9月），《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七冊，第465頁。

③ 《關於政治狀況和黨的總任務議決案》（1930年9月），《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七冊，第478-479頁。

位’，就是犯了這種錯誤。”^①瞿秋白對何孟雄的批評更是升級到反黨高度：“中共中央最近有一點錯誤，絕不是總的政治路線不正確，而右派機會主義的分子卻利用來反黨。我以為孟雄的立場顯然是這樣的”。^②

三中全會結束不久，中央就在10月12日九十一號通告重複李立三的言辭，猛烈攻擊何孟雄等：“三全擴大會公開的指出何孟雄同志在上海區書聯席會上利用中央政治局的個別錯誤，加以造謠污蔑，公開的向中央進攻，這完全是取消派在黨內暗探的作用”。“何孟雄同志這一發動，完全不是偶然的，它自從江蘇代表會後累次提出與省委不同的意見，多是從右傾的觀點出發的”，“這些觀點的匯合，遂形成了一貫的系統的右傾機會主義的路線”。^③

在六屆三中全會上，中共中央不僅在政治上壓制了反對派，在組織上也是如此。這是一次擴大會議，六大選出的36名中央委員中只有14人出席，另有中央審查委員2人出席，而列席代表則多達20人，結果補選出15名新的中央委員，立三路線支持者江南省委書記李維漢和北方局書記賀昌都當選中央委員，李維漢直接進入政治局。李立三雖然被要求去莫斯科接受批評，但仍保留了政治局委員的位置。這很難讓反對派服氣，何孟雄在10月5日給總行委的信中說：“不是我的意見，如何承認，替人承認錯，萬事罪己，這種認錯的態度不是布爾什維克黨員認錯的態度”，^④這明顯是拒絕承認六屆三中全會的結論。

(二)國際來信後，中共中央籌畫緊急會議，但繼續打壓反對派

1930年8月以前，共產國際並沒有把李立三的錯誤上升為路線鬥爭，

① 瞿秋白：《中共擴大的六屆三中全會政治討論的結論》（1930年9月），《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七冊，第528頁。

② 瞿秋白：《中共擴大的六屆三中全會政治討論的結論》（1930年9月），《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七冊，第520頁。

③ 《中央通告第九十一號》（1930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6），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424頁。

④ 何孟雄：《政治意見書》（1930年10月5日），《何孟雄文集》，第190頁。

7月29日政治委員會關於中共與遠東局分歧的決議中，第一條就說“中共中央總的說來執行了正確的方針”。^①但周恩來、瞿秋白離開莫斯科後，共產國際陸續收到後續報告，特別是8月1日和3日李立三等激烈對抗遠東局的會議記錄，認為中共中央拒絕服從共產國際的領導，違反了列寧主義革命黨的組織原則，破壞了布爾什維克組織體系。共產國際10月寫信給中共中央，把批評上升到路線鬥爭的高度，認為“在中國革命最重要的時機，有了兩條原則上不同的政治路線互相對立”。“立三同志的發言之中，有最危險的精神”，“就是說共產國際不知道當地情形，說中國的例外情形，說共產國際不瞭解中國革命的發展趨勢的理論。他竟敢於把對於共產國際的忠實和對於中國革命的忠實互相對立起來，他在八月三日政治局會議上說，忠實於共產國際，遵守共產國際的紀律是一件事，忠實於中國革命又是一件事”，這是“敵視共產國際的言論。”^②

共產國際不是各國共產黨的鬆散聯盟，而是高度集中的列寧主義革命黨，執委會作為最高權力機構，在向各國支部提供經費的同時，也要求各國支部嚴格服從。馬季亞爾嚴厲批評中共領導人：“史大林對你們說——不要到長沙去，要不好的。莫洛托夫說：現在拿大城市是紅軍力量所不夠的。中國同志都同意了。到了中國，又發命令要第二次進攻長沙。第二次沒有成功，中央又發通告要第三次進攻”。“我可以數出好幾十個議決案，對於中國革命都是對的；都是中國同志所簽名的，後來卻是不實行”。“這種情形必須取消，然後國際的議決案和指示再不會變成一紙空文。”^③馬努伊斯基更尖銳指出中共的獨立傾向如果不制止，將導致共產國際的滅亡：“你們表現了很厲害的地方主義”，“說蘇聯有狹隘的民族成見，說俄國人不瞭解中國情形”。“最危險的是，表面上是同意我們的決定，實

①《關於遠東局與中共政治局之間在1930年2月17日至8月期間接連發生的分歧》（1930年7月29日於莫斯科），《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9），第235頁。

②《共產國際執委關於立三路線問題給中共中央的信》（1930年10月），《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12），第351、360頁。

③《共產國際執委主席團關於立三路線的討論》（1930年12月），《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12），第405頁。

際上執行自己的路線”。“議決案只管通過，到了中國仍舊執行自己的路線。如果這種情形是國際與共產黨的互相關係的基礎，那麼，我們可以使國際滅亡。”^①

中共中央接到指示信之前，青年團的王盛榮、陳昌浩、陳績之、凱豐、宋磐銘等留蘇學生剛好準備回國，青年國際負責人要求他們自下而上反對中共中央的錯誤路線。^②這些留蘇學生大約11月初回到國內，傳播了共產國際的新指示，何孟雄、羅章龍、王明等聞訊士氣大漲。一時間黨內暗潮洶湧，他們到處表達不滿，積極進行小組活動。溫裕成提到：“一些同志從青年共產國際學校回到祖國後，他們說，薩法羅夫同志召集他們進行談話，他講到：‘在中國黨內有盲動主義錯誤，以及立三左傾機會主義路線。這條路線是很嚴重的，你們回到祖國後應該同它進行鬥爭。’現在基層有許多奇怪的情緒，無疑是因這些人散佈了上述談話。此外，他們還說，已經看過孟雄的聲明並認為他的聲明是正確的，而中央的聲明是錯誤的”。^③

中共中央11月16日接到國際來信，表示接受批評，但同時繼續壓制反對派。11月25日《中央政治局關於最近國際來信的決議》只承認三中全會“對於立三同志路線顯然不充分的揭發，包含著對於‘左傾’錯誤的調和態度”。同時，決議仍堅持“集中全力反對黨內機會主義的消極態度和實際工作上的機會主義”，拒絕在黨內公開辯論立三路線的要求，並強調“反對露骨的機會主義的曲解的企圖”，這顯然是針對反對派的。中央並不想召開新的會議，只想把決議“用通信方法詢問所有的中央委員是否同意”。^④

①《共產國際執委主席團關於立三路線的討論》(1930年12月)，《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12)，第416頁。

②楊奎松：《王明上臺記》，《民國人物過眼錄》，廣東出版集團、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52頁。

③《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記錄》(1930年11月18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9)，第461頁。

④《中央政治局關於最近國際來信的決議》(1930年11月25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12)，第362-363頁。

中央也不得不認可何孟雄的部分觀點，但批評他的活動在組織上起著破壞作用。11月18日政治局會議上，周恩來說：“應該召集那些已經知道共產國際來信的同志們（例如，從莫斯科回來的同志）開一個會，並號召他們站在鞏固黨和幫助中央領導的立場上開展自己的工作。不允許他們不經組織同意採取分裂黨的方式”。“關於孟雄的問題，需要緊急作出答覆，而且這個答覆應該是總的答覆。他所提出的正確思想，我們應該承認是正確的，但是他攻擊黨的活動是以破壞黨為出發點的。黨應該徹底調查，他在支部工作中是如何進行活動的，並應該在一些支部中同他的破壞活動進行鬥爭。”^①

11月，王明奮筆疾書，寫出了好幾萬字的《兩條路線》，猛烈抨擊立三路線和三中全會。27日，陳原道、王明、博古更是成立了留蘇學生反對派組織“臨時小組”，並起草了《臨時小組的決定》。這是一份與中央決裂的意見書，態度非常強硬，奪取領導權的意圖顯露無疑：“我們在討論了共產國際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三中全會決議、11月16日共產國際來信和25日中央政治局決議之後，一致通過以下決議”，“三中全會怯懦地採取了機會主義的、‘市僧式的’和妥協的方針”，“把共產國際路線和李立三路線混為一談”，“李立三路線在領導機關中仍然很有勢力。政治局11月25日決議只是耍外交手腕承認了自己的錯誤”。“我們認為黨中央領導已經垮臺”，“應該把那些堅決支持李立三路線的不肯悔改的機會主義分子驅逐出（中央、各局、省委）領導機關”，“應該把那些在與李立三路線和其他錯誤傾向的鬥爭中表現堅定的同志推舉和吸納到領導機關中來”。^②

但是，12月11日《中共中央告同志書》在批評立三路線和三中全會調和主義之後，仍然拒絕黨內“公開辯論”，繼續攻擊反對派是黨的主要危險，號召“黨必須堅決的鬥爭反對這種露骨的機會主義曲解的企圖，反

^①《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記錄》（1930年11月18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9），第458-459頁。

^②《臨時小組的決定》（1930年11月27日於上海），《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9），第468-470頁。

對這種最有害的右傾機會主義”，“要實行絕不調和的兩條戰線的鬥爭——反對‘左’傾和右傾的機會主義，集中火力對付右傾的主要危險，”^①不過這次沒有再提以中央委員通信通過新決議，因為緊急會議的計畫已經啟動了。

新任遠東局書記米夫11月中旬也到達上海，他的使命是否定三中全會，改組中共中央，指導中共實現戰略轉移。擔負如此重要職務和重大責任的米夫此時只有29歲，比王明大三歲，比周恩來小三歲。在上海指導中共的這段時間，米夫確實表現得年輕氣盛、不夠成熟老練。12月2日，米夫從上海給共產國際寫信，詳細報告了立三路線的危害、三中全會不成功的原因，讚揚了他的得意門生王明等的正確立場，並在結尾要求從莫斯科派張國燾、蔡和森前來助陣。米夫認為三中全會沒有成功，主要是周恩來和瞿秋白回來之後，“遇到了組織嚴密的李立三集團，他們開始有些動搖，因而採取了調和主義態度”。^②

根據遠東局指示，中共中央12月9日做出《中央政治局關於召集中央緊急會議的決議》，提出通過召開中央緊急會議來糾正三中全會的錯誤：“政治局認為必須通過新的政治決議案，以糾正三中全會的嚴重錯誤，而徹底明確的完全遵照國際路線來規定黨的任務和策略”。^③遠東局在12月10日給中共中央的信中，說明了“緊急黨代表會議”的詳細計畫，這個設想和後來召開的四中全會明顯不同。計畫主要是糾正三中全會，批判立三路線，只提出李立三退出政治局，沒有觸及瞿秋白，還特別把幫助蘇區反圍剿當做主要任務。緊急會議的設想如下：“遠東局得出結論：緊急召開為期一天的黨代表會議（應遵守一切必要的保密規劃）是適宜的，參加人員為在上海的中央委員、各省委代表和共青團中央局成員。遠東局認為，

①《中共中央告全黨同志書》（1930年12月11日），《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七冊，第744頁。

②《米夫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信》（1930年12月2日於上海），《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9），第503頁。

③《中央政治局關於召集中央緊急會議的決議》（1930年12月9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12），第450頁。

這次代表會議應該通過一個包含下列內容的簡短決議：“根據共產國際執委會來信的精神對李立三同志的路線作出評價”；“提出把新幹部，首先是工人積極分子提拔到領導崗位上的任務”；“提出黨動員各個方面力量來反擊對蘇區的總圍剿問題，將此作為最主要的任務”；“指出中共領導對共產國際執委會代表機構所採取的不老實態度”；“遠東局認為，讓李立三同志退出政治局是適宜的”。^①

(三)王明等米夫派留蘇學生準備上臺

米夫對中共中央的不信任由來已久，1928年中共六大期間就曾嘗試把自己的學生推上中共領導崗位，當時沒有成功。周恩來說：米夫“散佈了一些對中國黨負責人輕視、不相信的話，有影響。在‘六大’籌備選舉時，他在籌備選舉的委員會中說過，中國黨負責人理論上很弱，現在有些較強的同志如王明、沈澤民等，暗示可以提拔他們參加中央。當然，當時是沒有什麼人理他的（後來傳出去說，米夫要提他們當中央委員），可是這種說法卻起了影響，造成了東方大學等校學生對黨的負責人輕視，以致後來發生了反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鬥爭。”^②

六大時米夫想讓王明等進入中共領導層還得不到普遍認可，但到1930年12月情況就完全不同了。在共產國際看來，王明等人在立三路線時期和三中全會前後的表現說明，這些年輕學生的政治水平和對共產國際的忠誠，不僅高於犯了嚴重錯誤的李立三和向忠發，也高於領導三中全會不力的瞿秋白。在12月共產國際執委主席團關於立三路線的討論中，皮亞特尼斯基重點談了留蘇學生進入中共領導層的問題。這說明立三路線鬧獨立性之後，提拔更受信任的留蘇學生進入領導機關已經是共產國際高層的共識，而非米夫的個人意見。

^①《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給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1930年12月10日於上海），《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9），第528-529頁。

^②周恩來：《關於黨的“六大”的研究》（1944年3月3、4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11），第245頁。

皮亞特尼斯基說：“在蘇聯有許多學校有好幾百中國同志在那裡學，他們之中有很好的同志知道列寧主義布林塞維克的理論和實際。他們回去了，但是不能夠做到領導工作，為什麼？我們以前不明白，而現在明白了，因為有一種小團體利益妨礙他們加入領導機關。費了很多力量和錢才能夠把他們派回中國去，然而秋白或者立三不要他們做黨的工作，我以為這是無論如何是不能夠允許的。”^①遠東局的埃斯勒對王明等在1930年的作用也大大讚賞：“戈盧別夫（即王明）和其他許多中國同志，特別是幾個月前剛剛從蘇聯回國的青年同志在這種情況下起了特別積極的作用。他們是保證貫徹執行共產國際政策的動力。”^②

事實上，在王明等人回國之前，米夫等已給他們佈置了逐步取得中央領導權的重任，後來王明一躍進入政治局、博古不是中央委員卻主持中央不是偶然的，而批判立三路線大大加快了王明等人的上升速度。1930年秋季，羅章龍和王明兩派都對立三路線和中央很不滿，10月王明主動找機會與羅章龍在虹口公園進行了一次談話，透露了米夫對改造中共領導層的一些想法，特別是王明等留學生的重大使命，尋求羅章龍的支持。據羅章龍回憶：“從談話中知道他是有充分準備的，所以談話條款分明，他一氣談了一點多鐘，歸納起來有如下幾點：（1）王首先宣稱他這次是負有國際特別使命同國來的”，“中國黨的領導必須撤換，從上至下要徹底改組換班才能執行國際路線。（2）王對目前國內外革命形勢說右傾是主要危險”。“（3）王明特別著重介紹旅莫支部的英勇鬥爭事蹟”，“眉飛色舞，感到自豪”。“（4）王說全總是工人幹部精華所在”，“要求全總同志和他們一道完成國際所交付的重大任務”。“（5）王表示受國際委託回國進行上項工作，國際指定他與國際通訊用特別郵政信箱”。^③

①《共產國際執委主席團關於立三路線的討論》（1930年12月），《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12），第430頁。

②《埃斯勒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書記處會議上的報告》（1931年2月20日於莫斯科），《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10），第93頁。

③《羅章龍回憶錄》（下），溪流出版社2005年版，第455頁。

王明最自負的是自己的理論優勢，他認為中共中央所以屢犯錯誤，就是因為理論水平太低。王明認為：“中國的黨向來沒有革命的理論，因此也談不上革命的行動。只有像他們這樣具有‘高度理論修養’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掌握了中國黨的命運，才会有真正的中國革命。”^①羅章龍回憶：這一時期王明、博古曾多次找他談話，希望拉攏全總工人幹部組成改造中共中央的同盟。王明、博古“說話間必稱米夫，意思是說他們就是米夫的代言人，一切是奉命而行的。他們強調全盤改組中共各級領導機構”，“希望在中央工委系統和全總黨委系統得到有力的支持”，“王又說他們這次回來奉有特殊使命，所謂特殊使命不是回來做一般工作，而是做中央領導工作”。^②

共產國際信任自己訓練的留蘇學生並不奇怪，中共中央早已經有劉少奇、任弼時等留蘇學生，他們曾經留學蘇聯，而且回國較早，已經積累了不少實際經驗。但是從四中全會的結果來看，米夫雖然也讓劉少奇、任弼時進入政治局，他重點提拔的還是自己的親信——米夫派留蘇學生，尤其是把毫無經驗的王明連越幾級、火箭式提升到領導崗位，這說明米夫的派別傾向相當明顯。

二、黨內民主爆發，反對派爭奪領導權

（一）九十六號通告與黨內民主爆發

遠東局批評了中共中央的“不老實態度”，來自下面的抗議壓力也越來越大，中共中央對反對派的態度在1930年12月中旬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先是16日通過了向何孟雄和王明等認錯的決議，然後又在23日九十六號通告中號召自下批評、黨內民主化，這大大鼓舞了反對派的氣勢。反

① 羅章龍：《致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函》（1979年10月），《羅章龍回憶錄》（下），第733頁。

② 《羅章龍回憶錄》（下），第456頁。

對派更加積極活動起來，準備自下而上改組中共中央，取得領導權，這裡就涉及一個大問題——黨內民主。

1928年中共六大強調黨內民主和集體領導，但是在實踐中卻出現很多弊端，中共在白區最重要的地方組織江蘇省委和順直省委都發生混亂，紅四軍也發生了“朱毛之爭”，毛澤東甚至一度被趕出紅軍。為糾正偏差，中共中央在整個1929年一直反對“極端民主化”，逐漸建立起比較集中的權力結構。但是在權力集中以後，同樣發生了嚴重偏差，李立三利用中央權力推行盲動路線，對下級不同意見採取處分、撤職等高壓政策，獨斷專行的結果是在錯誤道路上越走越遠，造成慘重損失，也遭到了共產國際的批評。於是黨內民主的呼聲又高漲起來，無論是羅章龍、何孟雄反對派，還是王明派，都要求擴大黨內民主。可以說，羅章龍、何孟雄等自下而上改組領導機構的嘗試，就是這次黨內民主爆發的直接產物。

蘇准會黨團書記林育南得知緊急會議計畫後，給中央寫信強烈呼籲黨內民主：“‘家長式的領導’、‘命令主義’、‘委派制度’、‘懲辦制度’等等都繼續擴大起來，這完全是違反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的組織原則，這使黨員達到消極、達到盲從，使黨脫離群眾，減弱黨戰鬥力量”。“緊急會議上應明白指出過去黨組織制度的根本錯誤，從此應堅決徹底的改正，肅清一切家長式領導的命令、委派、懲辦等制度，保證黨內必要限度的‘民主化’，發展黨內布爾什維克的‘自我批評’和‘政治討論’，儘量在秘密工作條件許可之下實行黨的選舉。總之必須以正確的‘民主集中制’代替‘家長制度’，以說服和教育同志的態度去執行‘鐵的紀律’以代替‘懲辦制度’。”“緊急會議上必須準備——在不久的將來，召集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①王明在《兩條路線》中同樣要求“在組織上實行布爾什維克的民主集中制

^① 林育南：《給中共中央的信》1930年，《羅章龍回憶錄》（下），第451頁。說明：《羅章龍回憶錄》中不準確的地方很多，使用必須非常小心，盡可能用其他資料核對，但其附錄裡保存了不少有價值的文獻。

的原則，堅決反對家長制度、命令主義、委派制度、懲辦制度”。^①

12月16日，政治局通過了向反對派認錯的《關於何孟雄同志問題的決議》，決議與11日《中共中央告同志書》完全不同，轉而承認“何孟雄同志政治意見書一般的是正確的，是合乎國際路線所要求的觀點，來反對當時中央立三路線的觀點的”。“中央代表發言上給孟雄同志以取消派暗探作用和一貫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批評和攻擊，是很大的錯誤”。“江蘇省委總行委停止孟雄同志的工作，後來省委擴大會沒有要孟雄同志出席並開除其候補省委委員，這是嚴重的錯誤，並且這些攻擊與處分，完全是抑制自我批評的家長制度與懲辦的具體體現——這本是立三路線的組織原則。”^②同日，中央也做出了《關於取消陳韶玉、秦邦憲、王稼齋、何子述四同志的處分問題的決議》。

12月23日，中共中央又發出後來追悔莫及的《中央通告九十六號》，這是向全黨公開徹底承認錯誤。通告承認接到國際來信後，中央政治局在11月25日、12月9日“兩決議案中，在中央告同志書中，還是保持著調和主義的態度”，“中央政治局現在公開承認這些錯誤，並暴露這些錯誤於全黨”。通告承認中央壓抑黨內民主，“家長制度的統治抑制了黨的自我批評，打擊了為國際路線而鬥爭的同志”，“使布爾什維克黨的生活變成了毫無生氣的官僚機關，使黨的領導走上一錯再錯的覆轍”。通告號召“自下的自我批評，而反對抑制與恐懼自我批評，必須堅決實行黨內民主化”，提出“採取非常緊急的辦法，在適合秘密條件下，產生新的政治決議來代替三中全會的一切決議”，^③這顯然是指緊急會議計畫。

中央抵抗了好幾個月，突然向反對派認錯，明顯是受到了遠東局的壓力，而米夫似乎只想到批評立三路線和調和主義，沒有預料到中央喪失威

① 王明：《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鬥爭》（1931-1932），《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八冊，第177頁。

② 中共中央《關於何孟雄同志問題的決議》（1930年12月16日），《何孟雄文集》，第215-216頁。

③ 《中共中央緊急通告（中央通告九十六號）》（1930年12月23日），《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七冊，第747-748頁。

信可能引發嚴重後果。後來六屆四中全會決議承認九十六號通告“在反對右傾分子的鬥爭中，解除黨的武裝”，“這個通告說政治局一直到最近只是在繼續和加強立三路線”，“更使黨在中央領導之下去實行反對理論上實際上的立三路線的鬥爭發生困難。”^①僅僅一個月以後，王明領導江蘇省委通過的《對於中央第四次擴大會議總結及目前黨的任務的決議》中就反過來批評極端民主化了，指責羅章龍派“要求極端民主化，以便利於他們反黨活動，實行他們分裂黨的陰謀，”^②可見九十六號通告引發的後果讓米夫和中央深感後悔。

中央在12月中下旬的連續認錯中威信掃地，黨內民主聲勢大漲，長時間受到壓抑的反對派爆發了。他們不滿足於自下而上的批評，在群情激奮的情勢下，開始自下而上改組領導機構，爭奪領導權。中共江南省委是立三路線時期由江蘇省委升級而來的，是中共在白區最重要的地方組織，領導範圍包括上海、江蘇、浙江、安徽。原書記李維漢因為追隨立三路線已經喪失威信，12月23日江南省委常委會議不經中央許可，自行改選領導機構，新常委會給中央政治局的報告很強硬：“今日省委常委全體會議決議部分改組省委指導機關，克全代理書記，並通過常委名單七人”：何孟雄、王克全、夏曦、蔣雲、許畏三、沈先定、陳資平，“望政治局立刻批准。”^③

新當選的代理書記王克全是當時很受推重的工人幹部，1930年8月武漢長江局項英感覺人手不足，寫信給中央說：“請求中央在上海派一最好幹部（如王克全之類）來此，參加主席團，負工會總責。”^④不過，江南省委

①《中共六屆四中全會決議案》（1931年1月），《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八冊，第18-19頁。

②《羅章龍右傾分裂主義批判資料》1972年5月鉛印本，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圖書館館藏，第18頁。

③《江南省委關於部分改組省委給中央政治局的報告》（1930年12月23日），《江蘇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甲9），第543頁。

④《中共長江局關於目前武漢形勢與工作狀況向中央的報告》（1930年8月20日），《中共中央長江局文件彙集》，第251頁。

和中央同在上海，中央迅速做出反應，力圖重新控制局勢。中央拒絕承認江南省委違反組織原則的改選，12月25日任命王明為代理江南省委書記。此時王明還不是中央委員，但事實上已經進入中共領導層。

中央陷入了牆倒眾人推的尷尬境地，各主要領導12月28日分別參加上海五個區的積極分子會議，會上都遭到圍攻，甚至被要求“開除黨籍”，只有徐錫根因與反對派早有聯繫，境遇較好。何孟雄說：“昨天召開了五個區的積極分子會議”，在滬中區周恩來代表政治局講了話。會議決定，撤銷周恩來的政治局委員和中央委員職務，還提出了把他開除出黨的要求。瞿秋白出席了閘北區的會議，“會議也決定撤銷他的政治局委員和中央委員職務，並把他開除出黨。理由是：他在莫斯科呆了兩年，而回到中國後背叛了共產國際。向忠發同志出席了滬東區會議。會議決定撤銷他的總書記職務”。關向應出席了法租界的會議，同樣也決定撤銷他的政治局委員和中央委員職務。“徐錫根同志出席了滬西區會議並發表了反對政治局的講話。全體與會人員都贊成他的意見，並且歡迎他站出來反對政治局中的李立三分子。電話局支部作出決定，要求撤銷所有容忍三中全會犯錯誤的人的政治局委員職務。”^①

反對派不滿足於中央在九十六號通告的退讓，不僅繼續猛烈攻擊原中央領導，而且也開始攻擊王明等留蘇學生。以羅章龍為書記的全國總工會黨團1931年1月1日開會通過《關於對中央九十六號緊急通告的異議及意見》，認為“中央的威信是喪失得乾乾淨淨，中央的領導在政治上早已完全破產”，要求“立即停止中央行使權威”，“根本改造政治局”，廢除三中全會決議及補選的中央委員，對“嚴重錯誤主要責任的中央領導人”，“給予組織上最嚴厲的制裁”。決議要求由國際代表領導組織臨時中央機關，速即召集緊急會議，“要求堅決的實行引進工人同志及群眾組織能幹的幹部到領導機關參加工作，肅清自中央到各級黨部的工人同志為招牌，小兒

^①《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成員與何孟雄和溫裕成的談話記錄》（1930年12月29日於上海），《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9），第565-566頁。

和書生為實質的最虛偽的惡劣方式。”^①這意味著反對派不僅與原中央決裂，也與留蘇學生派決裂了。

九十六號通告傳到天津，也立刻引發了華北黨組織的混亂。當時華北黨組織的領導機構設在天津，立三路線時期設立了賀昌為書記的北方局。立三路線遭到批判後，中共中央於12月9日決定“北方局的組織取消”，成立河北省委，負責範圍包括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北部、陝西、甘肅，^②與江南省委並稱為中共白區重要地方組織。

互濟會順直辦事處黨團1931年1月1日致信中央和遠東局，要求“立即停止中央政治局，由遠東局直接召集臨時代表大會（緊急會議）”，“立即停止河北省委職權，由反立三路線最堅決的黨部和黨團，發起召集各黨部、黨團聯席會議，暫行代替省委職權”。^③在1月3日天津市委擴大會上，本來中央已決定調往上海的曹策突然發起挑戰，“開會時曹策和另外一個常委臨時提議今天的會議要改為緊急會議，一致通過，趙茨平主席，曹策報告人”，童長榮作為立三路線執行者受到批判，也“沒有抵抗”。天津緊急會議認為，立三路線的第一個來源是六大產生的中央，“第二個來源是黨的家長制度”；會議宣佈“黨的領導，中央、省委和天津市委的領導破產”，“停止中央和省委的職權，號召各地黨部一致鬥爭”，速來天津“召集緊急會議”。會議宣佈童長榮被撤職，選出了新的天津臨時市委，曹策、趙茨平、趙普為常委。^④

1月5日，曹策、阮嘯仙、張昆弟等宣佈成立“緊急會議籌備處”，曹策（天津）、蔣曉海（互濟會）、李友才（唐山）、徐樹文（共青團）為常委，張昆弟

①《反對羅章龍右傾分裂主義資料彙編》（文革時期鉛印本），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圖書館收藏，第4-5頁。

②《中共中央關於取消北方局組織的決定》（1930年12月9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土地革命時期》（上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年，407頁。

③《革命互濟會河北辦事處黨團關於立三路線問題致中央和國際遠東局的信》（1931年1月1日），《河北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甲22），中央檔案館、河北省檔案館1999年，第114頁。

④《童長榮關於河北反立三主義路線的鬥爭與右傾機會主義反黨的報告》（1931年2月3日），《河北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甲7），第24-26頁。

為籌備委員，李友才為秘書長，蔣曉海為宣傳部長，曹策為組織部長。^①1月7日，河北省委機關開直屬支部組長聯席會，籌備處派人參加，“曹策出席作了四小時以上痛哭流涕的報告，煽動省委工作人員自由選擇工作，對省委罷工怠工，為籌備處工作。嘯仙同志代表省委出席，在會議上正式決議直支加入籌備處，派吳華梓作代表參加籌備處工作，承認籌備處總的精神正確，組織上是群眾反立三路線的布林塞維克創作，指出省委阻礙反立三路線鬥爭，政治上組織上都完全破產”，“省委機關整個動搖，秘書長起直至大部分工作人員都加入籌備處”。^②

嘯仙是代理河北省委書記、張昆弟是省委委員，吳華梓(吳化之)是省委秘書長，由於九十六號通告的影響，河北省委多數幹部沒有反對“緊急會議籌備處”，反而幫助它奪取了華北黨組織的領導權。“緊急會議籌備處”在天津成立之後，派人到北京、唐山、山西、陝西等地活動，曹策後來回憶說，他們派人到各地是準備召集大會。^③雖然大會計畫沒有成功，但在各處都引發了黨組織的混亂，中共在華北的組織體系基本癱瘓。

(二)反對派爭奪領導權，遠東局嘗試說服未果

緊急會議的計畫已經公開，在中央權威崩潰的情況下，各級組織已經開始自發準備緊急會議，試圖改組中共中央和各級領導機構。但是，共產國際執委會卻最終確定召開六屆四中全會。莫斯科的決定很可能是在1930年12月23日以後的幾天內到達上海的，因為23日的九十六號通告還是延續著召開緊急會議的意思。

共產國際給遠東局的電報草稿標明不早於12月18日，從草稿到正式稿、再到發出，上海要晚幾天才能收到電報。共產國際指示四中全會的主

①《河北臨時省委關於籌備處反省委反中央問題的報告》(1931年3月12日)，《河北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甲7)，第118-119頁。

②《最近一個月的河北情形》(1931年3月14日)，《河北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甲7)，第127頁。

③曹策：《河北緊急會議籌備處與北平天津黨組織》，《北京革命史回憶錄》第二輯，北京出版社1991年版，第35頁。

要任務是：“(1)無條件地執行共產國際執委會在電報和信函中提出的路線”；“(2)修改和批判三中全會的決議”；“(3)團結全黨去執行共產國際執委會的路線”，“應取消三中全會進行的把李立三的支持者拉進中央的補選”，把瞿秋白“趕出政治局，用新的力量補充中央委員會，達到新老幹部的團結並堅決消除他們之間發生衝突的可能”。從電稿可以看出，四中全會最重要的任務是改組中共中央，共產國際執委會明確要求提拔“新的力量補充中央委員會”，預料到準備四中全會有一定難度，特別提到如果“需要推遲一段時間的話，我們將不反對。”^①

此時共產國際是維持中共黨內秩序的主要權威，但米夫和遠東局面對的局勢有點棘手。中共中央已經在連續認錯之後威信掃地，而四中全會的主體顯然是原中央委員，其中還包括已被宣佈為錯誤的三中全會增選的15個中央委員，由這些人開會來決定中共的新領導機構和新政策，很難說服已經在民主熱潮中動員起來、群情激奮的反對派。不僅如此，米夫早就想把王明等得意門生提拔到中共領導崗位，而且在批判立三路線之後，這個想法已經得到共產國際高層的認可，但王明等留蘇學生經驗和資歷都很不夠，在中共黨內很難得到羅章龍、何孟雄等反對派資深幹部的支持。

所謂羅章龍、何孟雄反對派並不是一個嚴密的組織，只是在反立三路線和調和主義大旗下聚集起來的幹部群體。他們力圖通過黨內民主自下而上改組中共中央和各級組織，但他們的政治思想並不一致，其中很多人並沒有成熟的政治思想，他們的要求主要是在組織上爭取領導權。具體講，反對派的基地包括以兩任黨團書記羅章龍、徐錫根領導的全國總工會，以何孟雄、王克全為核心的江蘇省委及上海地方組織，以黨團書記林育南、秘書長李求實為核心的蘇准會，還包括鐵總、海總、互濟會、華北地方組織等。反對派多數是有長期鬥爭經驗和歷史功績的幹部，很多是中

^①《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的電報草稿》(不早於1930年12月18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9)，第543-544頁。

國工人運動的骨幹，其中不少是中央委員，他們看不起王明等毫無經驗的留蘇學生，自以為有資格取代屢犯錯誤的中央。

米夫在後來給共產國際的信中，談到了當時王明派和羅章龍派鬥爭的情況：“舊的領導被排擠到了一邊，整個黨內鬥爭實際上是由其他兩派人在進行”。一派是號稱“青年共產國際派”的王明、王稼祥、沈澤民、夏曦、陳原道等，“公認這一派在共產國際來信前早就對李立三路線進行了原則性的鬥爭”；另一派包括全總的幾名工人領袖，“以何孟雄和羅章龍為首，在四中全會前夕活躍起來。起初，這兩派以‘不成文的協議’（或未商定的聯盟）方式共同反對立三主義和立三派分子。但很快——越往後越明顯——暴露出了這兩派之間的分歧。在反立三主義鬥爭最激烈的時候，實際上黨內展開了這兩派之間的鬥爭，這實質上構成了四中全會前夕（12月）和全會期間整個黨內鬥爭的內容。”^①

此時原中共領導已經失去威信，為順利召開四中全會，遠東局成員不得不親自出馬做何孟雄等的工作。在12月29日遠東局成員與何孟雄、溫裕成的談話中，何孟雄明確反對召開四中全會，堅持召開能容納更多本派代表的緊急會議，他認為“出席四中全會的將是一些舊中央委員，他們不瞭解群眾在做什麼，黨內群眾在想什麼”，原政治局成員應撤職，王明等缺乏經驗，應該由反對派的代表人物進入新的政治局。談話記錄中有：“在回答需要撤銷哪些人的政治局委員和中央委員職務時”，何孟雄回答，應該撤銷周恩來、瞿秋白、向忠發、關向應、項英的政治局委員，撤銷李維漢和賀昌的中央委員職務。何孟雄還說：“所謂的青年派”王明等人“只會寫點東西，而且常常寫一些連他們自己也不明白的東西”。“在回答同志們會建議什麼人進入政治局以取代他們建議開除的那些政治局委員時”，何孟雄說：“來自實際工作中的工人積極分子”。很顯然，何孟雄不能接受毫無經驗和功績的年輕留學生後來居上，擔任中央領導。遠東局成員談話後

^① 米夫：《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給共產國際的信》（1931年2月22、23、25、28日於上海），《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10），第117頁。

形成了這樣的印象，何孟雄“是個精力充沛型的人，政治上受過良好的教育，是位明白事理的人。但是他給我留下一個狡猾的印象，他善於利用工人與政治局作鬥爭，他自己想當領袖。”^①

12月30日，埃斯勒同徐錫根進行了談話，徐雖然是政治局候補委員，但此時倒向了反對派。他在談話中猛烈攻擊中央，同時攻擊王明等留蘇學生，想要掌權的意圖十分明顯：“目前在黨內，特別是在上海，形成了非常危急的形勢。基層黨組織反對中央並要求堅決進行改組。我的意見以及工人同志的意見是：應該解決政治局和中央改組的問題。一切錯誤都是中央犯的”。“這個中央是沒有希望的。基層黨組織不信任這個中央。對回來的大學生也一點兒不信任，在基層黨組織中對他們存在著強烈的反感情緒。當然，他們會寫，但是他們沒有任何實踐經驗。戈盧別夫（即王明）曾經在上海工作過，但是他進行過無原則的鬥爭。”^②

徐錫根甚至代表全總提出了新政治局和中央委員名單，談話記錄中有：“問：關於中央委員會和政治局的組成你有什麼建議？答：我們在自己內部曾討論過多次，我這裡有一份完整的名單。”中央領導人中應該撤職的有：李立三、項英、關向應、羅登賢、李維漢、溫裕成、瞿秋白、周恩來。中央委員會和政治局應該由這些同志組成，政治局：陳郁，張國燾，羅章龍，盧福坦。中央委員會：李慶強，徐炳根，韓連會，沈先定，許畏三，楊立安，寧迪卿，汪第萬，周逸群，劉林元，劉達潮，曾山，滕代遠，王首道，劉希奇，李財舍，林育南，劉子載，何孟雄，蕭明，陳雲，李震瀛，李富春，徐阿梅，孟堅。“問：這個名單你是怎麼擬定的？”“答：我們在中華全國總工會討論過這個名單，它是討論的結果。”^③

1931年1月3日，埃斯勒又與徐錫根、陳郁和王克全進行了談話，這三

①《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成員與何孟雄和溫裕成的談話記錄》（1930年12月29日於上海），《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9），第567-568頁。

②《埃斯勒同徐錫根談話記錄》（1930年12月30日於上海），《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9），第569-570頁。

③《埃斯勒同徐錫根談話記錄》（1930年12月30日於上海），《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9），第571-572頁。

人是遠東局準備提拔進入領導核心的工人幹部，徐錫根、陳郁將被提升為政治局委員，王克全將被提升為政治局候補委員。談話的核心是四中全會的代表組成和新中央的人選，但這三個人的意見明顯接近反對派。徐錫根提出羅章龍等應該進入新政治局：“有些同志建議增加兩名政治局委員。應該進入政治局的還有羅章龍和盧福坦。”陳郁則提出：“不能同意四中全會的人員組成，我認為，曾經支持過李立三的中央委員應該退出中央委員會。”王克全也認為：“四中全會的大多數應該由與李立三進行過鬥爭的人員組成。他們應該擁有表決權。我們反對周恩來，他對南京起義負有責任。向忠發所犯的錯誤太多，他不應該留在總書記職位上。必須改組所有領導機構。”^①

從這份全總討論產生的中央領導名單可以看出，羅章龍等確實有全面掌握中央領導權的意圖。他們力主召開緊急會議，反對召開以原中央委員為主體的四中全會，以便容納更多本派的支持者，在會議中取得多數優勢，徹底改組中央。中共中央12月中旬讓步過大，反對派的期望值很高，不會輕易滿足了，共產國際成員與反對派主要代表的多次談話都沒有取得滿意結果。讓遠東局更為不滿的是，他們和李立三一樣具有相當的獨立性，不像王明等人那樣完全服從，這使得反對派很難得到共產國際的信任。

反對派的危險傾向使得米夫認為必須嚴格控制四中全會，與反對派無法合作，只能採取分化瓦解的方法，孤立羅章龍、何孟雄等知識份子領袖，力爭把受他們影響的工人幹部拉過來。在後來給共產國際的信中，米夫對反對派做了政治分析：反對派“要求立即撤銷所有中央委員的職務並將他們開除，立即停止政治局的活動，緊急召開代表大會，它把從原則高度同立三主義的鬥爭完全轉化為狹隘小集團的、純粹個人的鬥爭”。何孟雄在同雷利斯基同志談話時，“完全否認黨內右的危險”，而郭妙根則“重

^①《埃斯勒與徐錫根、陳郁和王克全的談話記錄》（1931年1月3日於上海），《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9），第585-586頁。

複了陳獨秀關於紅軍是匪幫的胡言，他公開講中國蘇維埃運動沒有前途，共產國際七月來信的方針和決定是不正確的”。我們很清楚，第二派“只是利用這一鬥爭和打著這一鬥爭的旗號追逐小集團的而不是黨的利益，它所謂的反對立三主義的鬥爭不是從共產國際的立場出發的，而主要是從右派立場出發的。”^①

米夫的方案是由原中央領導、王明等留蘇學生、從反對派分化的工人幹部組成三結合的新中央。他在2月底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說明了改組中央的思路：“為舊領導中的優秀分子保留領導工作機會”；“把堅定地為共產國際路線而鬥爭的所謂‘青年人’推上負責工作崗位”；“使工人同志離開羅章龍，使他們脫離派別分子的影響，爭取使他們同‘青年人’和舊領導中的優秀部分聯合在一起。關於後一項任務，即關於分化羅章龍派的必要性再說兩句。何孟雄和羅章龍是陳獨秀式的舊知識份子幹部的典型代表。但他們這一派包括部分工人。其中有徐錫根、陳郁、余飛、王克全，他們都是中央委員”，“被羅章龍拉進了不是追求黨的利益的派別。雖然他們不是黨內優秀的工人分子，但失去他們畢竟沒有任何意義，相反，應使他們脫離羅章龍的影響，同時還應把他們推上重要的領導崗位。”^②

三、六屆四中全會與羅章龍等的分裂活動

(一)六屆四中全會上的激烈衝突

米夫分化反對派、成立三結合中央的計畫有其合理性，但落實計畫需要時間，也需要合適的人來做細緻的說服工作。實際上，張國燾已經動身回國，他和反對派領袖羅章龍、何孟雄是北大同學，一起開創了北方工人

① 米夫：《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給共產國際的信》（1931年2月22、23、25、28日於上海），《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10），第118頁。

② 米夫：《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給共產國際的信》（1931年2月22、23、25、28日於上海），《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10），第118-119頁。

運動，在工人幹部群體中有很深的歷史影響，是與反對派溝通的最佳人選，連周恩來都認為：如果張國燾早點回來，“和他們事先談談，可能一切迎刃而解。”^①也許是米夫對共產國際的權威過於自信，也許是白色恐怖下黨內混亂狀態拖下去太危險，六屆四中全會在沒有充分準備的情況下倉促召開了。

1931年1月7日，擴大的六屆四中全會在共產國際代表^②的直接領導下召開，會議開了一整天。“到會的人數三十七人：工人成分二十二，農民一，中央委員二十二，非中央委員十五人。”^③不少學者認為米夫通過增加列席代表才操控了四中全會，但實際上15名列席代表中7人屬於反對派。下面是四中全會出席名單和他們在全會前後對遠東局的態度，當然這裡的“支持”或“反對”是相對的，比如瞿秋白、李維漢、賀昌受到降級處分，他們的“支持”未必心甘情願，只是遵守紀律，不敢對抗共產國際而已，具體投票時有些人的選擇可能受到會場氣氛影響。此表是根據會議前後檔案材料中對各人表現的記錄，結合羅章龍、李維漢、張金保、陳郁等會議參加者的回憶綜合而成，大致如下：

(A)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22人，其中6人為三中全會補選)：

支持派(14人)：向忠發、周恩來、關向應、羅登賢、任弼時、顧順章、溫裕成、陳雲、周秀珠(女)、徐蘭芝、袁炳輝、瞿秋白、李維漢、賀昌

反對派(6人)：羅章龍、史文彬、張金保(女)、王鳳飛、王克全、余飛

動搖派(2人)：徐錫根、陳郁

(B)列席人員(15人)：

① 張國燾：《我的回憶》(第二冊)，第460頁。

② 楊奎松在《王明上臺記》中根據俄國檔案中署名亞伯特的德文總結發言，認為是遠東局新來的德國人亞伯特主持。不過，1930年7月29日共產國際決定的遠東局組成6人名單中無亞伯特，四中全會前後和中共接觸的遠東局代表大多是德國人羅伯特(埃斯勒)，1931年2月20日在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執委會彙報四中全會過程的也是他，當時革命者用很多別名，或許亞伯特是羅伯特(埃斯勒)的別名。

③ 《中共中央致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電——報告四中全會經過》(1931年2月22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12)，第523-524頁。

支持派(8人):王明、沈澤民、王稼祥、陳原道、夏曦、博古、柯慶施、顧作霖

反對派(7人):何孟雄、韓連會、許畏三、沈先定、肖道德、邱泮林、袁乃祥^①

四中全會的準備是秘密的,這也許是白色恐怖下的安全考慮,也許是故意不讓反對派有機會事先準備。羅章龍等到會場後才知道要召開四中全會,他們公開表示異議,羅章龍、韓連會、王鳳飛提議改為召開緊急會議,國際代表則堅持按原計劃召開四中全會。向忠發主持表決,會議記錄顯示:“贊成國際代表意見的十九票”,“反對國際代表提議的,無”,這大概就是羅章龍等後來說會上有十九人集團的由來。^②其實無論是緊急會議,還是擴大的四中全會,都只能由遠東局召集,出席名單由遠東局確定。會場上出席人員已經很難改變,名稱的差別意義有限,投票有一定隨意性。反對的“無”,當然不是說無人反對,羅章龍等不想剛開會就與國際代表決裂,他們最關注的還是涉及權力分配的領導機構改組。

全會開了一整天,政治報告和政治討論佔用了主要時間,其中雖然有爭論,但總體還算順利進行。向忠發做了政治報告,表示既要反對立三路線,也要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王明作了很長的理論性的發言。瞿秋白、周恩來、李維漢等作了自我批評的發言,多數代表都發了言,大致都批評立三路線和三中全會。^③反對派雖然也表達了一些不同意見,羅章龍談到“目前沒有革命高潮”,何孟雄說“不要誇大了右傾危險”。^④但總的來說,反對派對共產國際的政治路線表示支持,並沒有提出獨立的政治主張,何

① 出席六屆四中全會37人名單據王健英編:《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彙編——領導機構沿革和成員名錄》,紅旗出版社1983年版,第145-146頁。

② 徐保琪《對有關黨的六屆四中全會幾個史實的補正》,《黨史研究資料》1984年第11期,第212頁。

③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上),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第325-328頁。

④ 《中央政治局關於1月17日全總黨團會議與江蘇省委報告的決議》(1931年1月20日中央政治局通過),《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12),第475頁。

孟雄還在發言中說：“我同意忠發同志報告。”^①

最激烈的對抗發生在領導機構選舉過程中。在政治局選舉中，遠東局提出了十六人名單，會議記錄顯示：總表決結果，“二十一票通過遠東局提出的中央政治局名單”；在中央委員會選舉中，遠東局提出了一個名單，史文彬提出了另一個名單，會議記錄顯示：總表決結果，“贊成遠東局名單的二十票，反對二票”，通過；“贊成史文彬名單七票”，否決。^②遠東局的政治局和中委名單拒絕了反對派的大部分要求，他們非常失望，憤而退場，雖然被人拉住，但拒絕參加表決。羅章龍描述了當時激烈混亂的場面：“座中諸同志不耐，以腳擦地板，會場上一片噓聲四起，登時秩序紊亂。”^③工人代表袁乃祥對提升王明參加中央領導極為憤怒，“聲色俱厲”說：四中全會“是充滿欺騙、詭詐、奸謀的醜惡把戲，你們背叛黨章，違反全體黨員的意志。”^④王明對這一場景也印象深刻，說袁乃祥當時“拍案咆哮”。^⑤

遠東局掌握了會場上的多數，在混亂中勉強完成了選舉。分化反對派的策略發揮了一定作用，徐錫根、陳郁等反對派的重要人物勉強接受了四中全會，他們當選政治局委員。陳郁說：“我深刻考慮和分析了當時情形，當時我想若我還繼續反對中央立場，顯然是違背黨利益，所以自己決定不反對，主張開會，另方面我仍是希望四中全會可能會解決目前黨一些需要的任務，所以自己轉變了過去反對立場”。^⑥埃斯勒在共產國際彙報時也說：“工人小組領導人陳郁和徐錫根同志在這次全會上表現得信心不足，但比較守規矩。”^⑦

①《在黨的六屆四中全會上的發言》（1931年1月7日），《何孟雄文集》，第213頁。

②徐保琪《對有關黨的六屆四中全會幾個史實的補正》，《黨史研究資料》1984年第11期，第207-208頁。

③《羅章龍回憶錄》（下），第460頁。

④《羅章龍回憶錄》（下），第628頁。

⑤陳紹禹：《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奮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7），第714頁。

⑥陳郁：《反立三路線中我的錯誤經過——陳郁同志在延安中央黨校時思想總結的第三部分》，《羅章龍回憶錄》（下），第678頁。

⑦《埃斯勒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書記處會議上的報告》（1931年2月20日於莫斯科），《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10），第97頁。

毫無疑問，六屆四中全會的主要任務就是改組中共中央，選舉結果：李立三、瞿秋白、李維漢退出政治局，陳郁、任弼時、王明、劉少奇、王克全五人加入政治局；中央委員會退出了李維漢、賀昌，而補選了韓連會、沈先定、許畏三、王盡仁、黃蘇、王明、沈澤民、夏曦、曾炳春九人。從改組結果看，多數中央領導繼續留任，但也讓不少反對派的工人幹部進入中央，陳郁、王克全進入政治局，韓連會、沈先定、許畏三等進入中央委員會。但反對派的靈魂人物羅章龍、何孟雄被刻意壓制，反對派要求羅章龍進政治局、何孟雄進中央委員會未被接受，大概是考慮到這兩位北大出身的知識份子不像工人幹部那樣容易控制。留學生進入中央領導層的並不多，王明、沈澤民、夏曦進入中央委員會，王明直接進入政治局，博古則連中央委員會都沒有進。政治局16人名單包括：正式委員9人（向忠發、周恩來、項英、張國燾、徐錫根、盧福坦、任弼時、陳郁、王明）、候補委員7人（關向應、羅登賢、毛澤東、溫裕成、顧順章、劉少奇、王克全），這就是米夫計畫的由舊中央、留蘇學生、工人幹部三方結合的新領導集體。

（二）羅章龍等反對四中全會的分裂活動

實際上，羅章龍預料到遠東局不會接受本派的要求，在四中全會前已經提出了分裂的主張，而且開始了分裂的準備。徐錫根說，“四中全會前，羅章龍、何孟雄便找徐錫根、王克全、陳郁等同志開小組式的會議，討論黨的前途，羅章龍即主張分裂”。^①徐錫根後來在聲明書中說：“四中全會以前，我曾經與文虎（即羅章龍），孟雄，大漢（即李震瀛）等同志最初談過一次話，主要的是對緊急會議與四中全會問題，大家一致主張開緊急會議，同時說到黨的前途問題”，“文虎主張離開黨與分裂黨的鬥爭”。^②

米夫也提到羅章龍在四中全會前已開始做分裂的準備：“羅章龍早在

^①《中共中央致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電——報告四中全會經過》（1931年2月22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12），第524-525頁。

^②《擁護四中全會宣佈脫離右派的聲明書》，《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12），第549頁。

全會以前就有意識地、精心地和深思熟慮地拼湊了反黨集團，採取了分裂黨的方針。從涉及派別分子的一些聲明中和根據現在發現的一系列事實可以清楚地看到：(1)羅章龍在四中全會前一周就將總工會印刷廠轉移到了另一個只有他知道的地方；(2)他把工會的資金留在他自己那裡；(3)他在四中全會後立即編寫和出版了他那本有名的小冊子；(4)在全會後第二天他在一家旅館裡召開了這個派別領導人的會議，羅章龍在會上作出了關於開始公開反對中央、反對四中全會和反對我局的決定；(5)早在四中全會前他就成立了自己的上海省委”。^①

1931年1月8日，四中全會後僅一天，反對派即召開“反對四中全會代表團會議”。參加此會的自稱十六代表，大致包括四中全會上持反對派立場的十三人：羅章龍、史文彬、張金保(女)、王鳳飛、王克全、余飛、何孟雄、韓連會、許畏三、沈先定、肖道德、邱泮林、袁乃祥，加上會後又倒向反對派的二人：徐錫根、陳郁，以及到上海後卻沒能參會的東北中央委員唐宏經。會上通過了羅章龍起草的《力爭緊急會議反對四中全會的報告大綱》，成立了由羅章龍、何孟雄、徐錫根、王克全、王鳳飛五人組成所謂“臨時中央幹事會”，開始在組織上準備分裂。^②

反四中全會代表團會議開過以後，羅章龍的小冊子《力爭緊急會議反對四中全會的報告大綱》“即由全總印廠鉛印分發，經全總交通路線發到各省各工會中去，江蘇經王克全的活動，連敵人士兵支部中都散進去了。”^③羅章龍回憶，《大綱》提出後，“在綱領上簽名者有九十六人，包括上述第九項各級黨組織負責人”，“鉛印五千份，分送黨內各支部作為報告討論之用。同時將綱領轉寄各蘇區支部。綱領譯文送第三國際、赤色職工

① 米夫：《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給共產國際的信》(1931年2月22、23、25、28日於上海)，《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10)，第121-122頁。

② 《中共中央致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電——報告四中全會經過》(1931年2月22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12)，第525頁。

③ 《中共中央致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電——報告四中全會經過》(1931年2月22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12)，第525頁。

國際、少共國際以及各國兄弟黨。”^①

《大綱》集中表達了羅章龍等的政治主張，首先就是要徹底改組整個中共中央，“從根本的解決政治上組織上諸問題。”《大綱》聲稱反對派陣容強大，“包含有中央委員之一部分，全總黨團，海總黨團，鐵路總工會辦事處黨團，上海工聯黨團，上海反帝同盟黨團，蘇維埃區代表團全體同志，蘇准會工作全體同志，江南省委外縣委員會書記全體同志，北方天津黨部，山東省委，青島市委，上海各區委（開北滬東滬西法南護中等）及上述各地的所屬多數產業支部，中心支部，中央直屬小組以及全國積極的工會幹部同志等（青島上海天津武漢海員鐵路蘇區廈門等地）”。^②

《大綱》抨擊四中全會違反民主原則，沒有合法性，“是絲毫沒有民主化的包辦式的會議”；同時指責四中全會沒有完成改組中共中央的任務，保留了多數犯錯誤的原中央成員，而新選入的王明等人毫無經驗：“周恩來、向忠發、項英、任弼時等仍舊繼續中央政治局的領導，李立三、瞿秋白仍使其隱藏中央委員會之內，對於毫無工作經驗同樣犯有立三路線錯誤的陳紹虞等，使其加入政治局負領導重責。”羅章龍派不敢反對共產國際，把矛頭指向了米夫，抨擊米夫曲解國際路線，刻意提拔自己的私人親信王明等人，“堅決的要求國際撤換他的職務，糾正他的錯誤”。^③

值得注意的是，在四中全會上沒有表示反對的徐錫根、陳郁，僅僅一天之後又倒向反對派，說明這些工人幹部政治上確實不太成熟。陳郁回憶：“我對中央新成分那些人，他們過去沒有做過什麼工作，又沒有受過革命鬥爭中鍛煉，那時我對那些人是沒有一點信仰的情緒”。“四中全會後，在全總黨團會議上，自己的發言是堅決反對這個會議，主要內容是這次會議沒有解決問題。”相對於王明等人，徐錫根、陳郁等受長期領導工人運動

①《羅章龍回憶錄》（下），第487頁。

②《力爭緊急會議反對四中全會報告大綱》（1931年1月），《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12），第464-465頁。

③《力爭緊急會議反對四中全會報告大綱》（1931年1月），《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12），第467-469頁。

的羅章龍等影響更大。陳郁說：“羅章龍那些人在他們未分裂黨之前，我個人對他們信仰當然比較好，主要是我知道他是工運工作很長歷史，在鬥爭中鍛煉出來的幹部”。“當時我思想上認識對中國革命重要性主要是工人運動，自己的重視黨內幹部也是從工人運動中有鍛煉的幹部是較相信的，的確我有些偏向是過分看重工人運動和不足夠認識革命其他部分的傾向的毛病”。^①

在反對派的積極活動下，很多黨組織都受到了影響，甚至發生了分裂，其中比較重要的是江蘇省委、全總黨團等。王克全、許畏三、蔣雲、陳資平、吳國治、劉瑞龍“在江蘇省委發動，反對四中全會後新中央政治局改組的新省委，而佔領省委機關，召集江蘇二次代表大會選出的一部分省委委員成立第二省委”；“王鳳飛便在上海的閘北，蔡伯真、彭澤湘在上海的中區，蔣雲便在外縣來上海的同志中成立他們的第二區委，宣告外縣工作獨立，來反對省委來分裂黨”。^②王克全等“還侵佔工會經費作為第二黨第二工會的活動費”。^③“全總黨團大多數同志在羅章龍、徐錫根、余飛三同志領導之下，公開的反對四中全會，反對國際代表在國際路線下的領導”。^④

當時在江蘇省委工作的劉曉回憶：“王克全帶了幾個人闖到老靶子路十號的省委秘書處的秘密機關，要接收省委文件。負責省委財務工作的彭休士和我都在場，我們拒絕交出，他們就吵吵嚷嚷不肯甘休。”^⑤李初梨擔任上海滬東區巡視員，是王明的支持者，據他回憶：“滬東區是何孟雄等

① 陳郁：《反立三路線中我的錯誤經過——陳郁同志在延安中央黨校時思想總結的第三部分》，《羅章龍回憶錄》（下），第678-681頁。

② 《中共中央致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電——報告四中全會經過》（1931年2月22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12），第525頁。

③ 《關於開除王克全黨籍決議案》（1931年1月30日中央政治局通過），《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12），第499頁。

④ 《中央政治局關於1月17日全總黨團會議與江蘇省委報告的決議》（1931年1月20日中央政治局通過），《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12），第474頁。

⑤ 劉曉：《黨的六屆三、四中全會前後白區黨內鬥爭的一些情況》，《紅色往事》第一冊，濟南出版社2012年，第126頁。

人的大本營，反對四中全會的人最多，只有張琴秋一人擁護四中全會”。1月17日，他和張琴秋去華德路小學參加支部會，參加者有二三十人，大家情緒非常激動，“都是昏頭昏腦。支部大會作出決議反對四中全會，這時張琴秋站起來宣佈：我代表區委解散你們支部大會”，說完兩人趕緊離開會場，不然很可能挨一頓打。^①

(三) 共產國際說服反對派的最後嘗試

遠東局為阻止黨的分裂，1月17日召集全總黨團二十多人在滬西一個花園別墅開會，羅章龍後來稱其為“花園會議”，但是會上仍然是激烈對抗，當場決裂。中共中央報告提到，“全總黨團在羅章龍、徐錫根領導之下於一月十七日會議席上公開反對四中全會，反對國際代表，並成立與黨對立的決議”。^②

羅章龍回憶，在會上“國際代表輪流發言，作了長篇講話，態度極為強硬”，講話主要意思包括：“當前中共黨內主要問題是右傾”，“對國際應絕對服從，國際指示是絕對正確的，四中全會是體現國際正確路線的”。“王明雖然犯過組織紀律錯誤，但他們是真正的布爾什維克，政治上很正確，中國革命離開他們是不行的”。但是反對派並未屈服，“國際代表發言後，在坐的中委、幹部都積極發言，也講了幾個鐘點”。他們的發言內容包括：“王明本人脫離實際，脫離群眾”；“反對四中全會的鬥爭是辨別黨內大是大非的原則性鬥爭，我們要求國際代表以中國革命為重，對四中全會決議收回成命，定期召開七大會議或緊急會議”；“堅持不同意王明當選中央委員”。國際代表最後宣稱：“你們反對國際路線，反對四中全會就是反黨、反國際”。^③

埃斯勒報告也提到工人幹部的動搖和全總黨團會議上的決裂：“四中

① 李初梨：《六屆四中全會前後紀實》，《中共重大歷史事件親歷記》第一編，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09頁。

② 《中共中央致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電——報告四中全會經過》（1931年2月22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12），第525頁。

③ 羅章龍：《致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函》（1979年10月），《羅章龍回憶錄》（下），第734—735頁。

全會後，在有一名右派參加的編輯委員會內，這名同志拒絕了他在一天前投票贊成的決議。徐錫根和陳郁又開始搖擺不定，他們成了企圖把上海組織和工會抓到手的右派集團的工具。全會後一兩天，海員工會黨團領導人、政治局委員陳郁同志就作了反對四中全會的報告。四中全會後幾天還召開了中華全國總工會黨團會議，出席會議的大約有20名同志。另一名政治局委員同時又是紅色工會領導人的徐錫根同志在會上發表了講話。他在那裡開展了反對四中全會的鬥爭，這次會議變成了精心策劃的攻擊共產國際及其政策的會議，共產國際代表的決議案“被否決，這時他們就離開了會場。”^①

張金保回憶，表決中只有羅登賢、關向應、杜作祥和唐某四人支持國際代表的決議案。^②會議通過了反對四中全會的《全總黨團對於四中全會擴大會議決議案》，明確反對“引進同樣犯有堅決執行立三路線、調和主義、絲毫無實際工作經驗的陳韶玉等負政治局領導重責”，同時強烈抗議國際代表“對於多數同志們提出的政治意見，不採用黨內正確的思想鬥爭的方式，而實行一種無原則的謾罵、挑撥、誣蔑同志的宣傳和煽動，並且一再強迫同志通過其無理由的決議”，“要求國際撤換負四中全會主要錯誤責任的代表，另派真正能夠執行國際路線的代表來領導中國革命”。^③

四、羅章龍等成立“非常委員會”及其對各地影響

(一)中共中央發動反擊，反對派在上海遭遇挫折

羅章龍等的分裂活動很快遭遇意外挫折。當時白色恐怖很嚴重，國

①《埃斯勒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書記處會議上的報告》(1931年2月20日於莫斯科)，《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10)，第97-98頁。

②張金保：《張金保回憶錄》，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69頁。

③《全總黨團對於四中全會擴大會議決議案》1931年1月17日，楊奎松《“中間地帶”的革命——國際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第247-248頁。

民黨特務機關非常狡猾，如果被捕中共黨員叛變，答應做特務工作，可能被很快釋放，此人就不知不覺成了潛伏的暗探。^①但中共有嚴格的秘密工作規則，一般是縱向單線聯繫，所以暗探的破壞也有限。但當黨內鬥爭達到高潮，很多秘密規則都被打破，橫向聯繫增加，到處串聯談話，輕率召開人數眾多、人員混雜的會議，這就給國民黨特務機關大規模破獲創造了機會。

1931年1月17日，反對派在東方飯店舉行江蘇、上海活動分子會議，顯然由於叛徒告密，參會者遭到了租界巡捕的突襲，後來又有多人在中山旅社等地被捕，林育南、何孟雄、李求實、龍大道等三十多人很快被移交國民黨政府，其中24人被上海警備司令部2月7日槍殺於龍華。被捕遇難者大多是江蘇、上海的地方幹部，其中林育南、何孟雄、李求實、龍大道等幾人是反對派的重要骨幹。不過出席四大全會的反對派主要成員十幾人中，只有何孟雄一人被捕，加入反對派的中央委員都安然無恙。東方飯店事件確實對反對派造成嚴重打擊，但這個打擊還不是致命的。

面對反對派的分裂活動，中共中央迅速展開了分化瓦解工作，積極爭取各個地方組織和反對派重要成員，很多組織和個人又回到中央領導下。1月17日，王明主持江蘇省委常委會通過了《擁護四大全會反對右派分裂黨的行動的決議》，批評王克全“在政治上既走上與右傾機會主義一致的立場，當然不可免地在組織上要走上分裂黨的統一，和破壞黨的組織的行動的地步。”^②劉曉回憶，在爭奪上海地方組織的鬥爭中，王明為首的省委派他去和滬西區委談判，威脅如果反對省委，就要停發生活費。當時多數黨的工作者都沒有職業，沒有其他收入，很多人為生活所迫，不得不服從組織，與何孟雄等反對派斷絕關係。^③反對派控制的印刷廠也很快被奪

① 徐恩曾：《我和共產黨鬥爭的回憶》，《細說中統軍統》，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92年，第185頁。

② 《擁護四大全會反對右派分裂黨的行動的決議》（1931年1月17日江蘇省委常委會通過），《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12），第472頁。

③ 劉曉：《黨的六屆三、四大全會前後白區黨內鬥爭的一些情況》，《紅色往事》第一冊，第128頁。

走，羅章龍說：“劫奪印廠是由臨中派政治保衛科負責人顧順章親率十餘人偽稱工部局包探，引便衣武裝前往印廠搜查，首先進廠把全體職工禁管。李梅羹時正生病，臥床不起，彼等進屋，不由分說，將印廠機器設備及紙張等全部裝上預先準備好的幾輛汽車運走。”^①

1月20日，政治局召開會議，通過《中央政治局關於1月17日全總黨團會議與江蘇省委報告的決議》：“號召全黨，要有布林塞維克的堅定性，要像一個人一樣，堅決的反對這一反黨反國際的右傾機會主義行動”。決議宣佈撤銷王克全在江蘇省委和上海工聯的領導職務，撤銷羅章龍、徐錫根、余飛在全總黨團的領導職務，改組全總黨團和上海工聯黨團。海總領導陳郁雖然在政治局承認了錯誤，仍被要求召開海總黨團召開會議，在會上書面檢討，海總黨團也被改組。^②

陳郁是反對派三個政治局委員中第一個承認錯誤的，他在政治局會議上放棄了反對派立場。陳郁說：“我當開始反對四中全會時，自己是沒有估計到羅章龍等人，把個非委會去分裂和建立第二黨”。“中央政治局第一次會議（四中全會後幾天）在會議上提出這個問題時候，我是承認自己所作的行動是錯誤，聲明放棄自己反對四中全會立場”，“但政治局委員徐錫根，王克全兩人在會議上仍堅持他們原來反對四中全會立場”。^③陳郁脫離反對派後，許炳良、譚壽林、馬驥、朱寶亭等氣憤地寫信譴責：“雙方決勝關鍵時刻，你忽見利忘義，臨陣脫走”，“你一念之差不僅丟盡工人階級的體面”，“還貽誤自己一生名譽。”^④

1月25日，中央向全黨和共青團發佈《中央委員會為肅清李立三主義、反對右派羅章龍告全體黨員和共青團員書》，號召“給一切派別和小組織以無情的反抗”，“不要聽信那些人召集你們去作繼續不斷的討論和談

①《羅章龍回憶錄》(下)，第513頁。

②《中央政治局關於1月17日全總黨團會議與江蘇省委報告的決議》(1931年1月20日中央政治局通過)，《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12)，第476頁。

③陳郁：《反立三路線中我的錯誤經過——陳郁同志在延安中央黨校時思想總結的第三部分》，《羅章龍回憶錄》(下)，第679—680頁。

④《許炳良、譚壽林、馬驥、朱寶亭等給陳郁信》1931年，《羅章龍回憶錄》(下)，第499頁。

話，去開秘密的分裂黨的會議”，並威脅要把這些分裂分子開除出黨。^①1月26日，改組後的全總黨團通過決議：“全總黨團常委會完全同意中央對羅章龍、徐錫根撤銷工作立刻停止小組織活動的決議，如果他們仍繼續分裂黨的小組織的活動，黨應給他們以組織上的制裁。”^②

1月26日，王明主持召開上海活動分子會議，通過決議支持四中全會，譴責王克全、蔣雲等另立省委，要求中央開除王克全政治局候補委員；譴責閘北區委書記王鳳飛和朱秀英等另立區委，要求中央開除王鳳飛中央委員；譴責滬東區委書記錢靜安立場不穩，反復無常；最後提出“迅速召集各種會議（區委會，活動分子會，支書聯會，各部會，各委員會，各黨團會，團的各種會議）及廣大的教育說服工作”，反對分裂，維護黨的統一。^③

2月4日，江南省委書記王明報告了反對派在上海的失敗：“右翼反對派已被粉碎，並已完全投降”。2月3日，“反對派省委決定解散並回到黨內。王克全寫了聲明，請求同陳紹禹會見並進行談話。上海右翼反對派領導人作出這個突然決定，主要是因為最近一周內上海的幾乎所有區委和關鍵性支部、三個省的某些縣委和市委在弄清右翼反對派的分裂和詆毀活動後立即脫離了反對派”。“在曾經是清一色反對派的滬中區，所有支部現在都處於我們的影響之下。昨天舉行了該區積極分子大會，有7個支部的代表參加。大會通過了反對反對派的分裂活動、反對王克全、支持四中全會、支持中央和省委的決議”，滬北、滬南、滬西區也實現了類似的轉變，“只有東區情況不妙。”^④米夫也提到滬東區是反對派最後的基地：“羅章龍的支持者將自己力量都集中在滬東區。他們在其他組織中不再起任

①《中央委員會為肅清李立三主義、反對右派羅章龍告全體黨員和共青團員書》（1931年1月25日），《六大以來》（上），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23-124頁。

②《全總黨團常委決議案》（1931年1月26日通過），《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12），第481頁。

③《上海活動分子會議關於擴大的四中全會總結與上海黨的目前工作決議案》（1931年1月26日），《江蘇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6），第169-175頁。

④《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成員同陳紹禹談話記錄》（1931年2月4日於上海），《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10），第38頁。

何作用。至於滬東區，他們起初利用自己原有的聯繫保留了三個支部。近幾天才把他們從那裡趕走。現在他們沒有一個支部，只是在兩三個支部內有個別幾名成員。”^①

中共中央在2月22日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詳細敘述了反對派重要人物的轉變過程：“徐錫根同志則經中央政治局多次解說之後，現在正式宣告脫離右派小組織，向黨寫過兩次聲明書”，王克全則在被開除後，“向黨聲明他願立刻停止第二省委活動”。“中央省委對他們加緊鬥爭，右派便在黨內宣告破產，所以全總黨團中余飛等同志便開始承認錯誤，海總黨團徹底轉變”，“江蘇省委中沈先定、劉瑞龍等同志亦誠懇的承認錯誤，各區委中外縣工作人員中亦多部分轉變過來，尤其是上海各支部最初被右派蒙蔽而反對四大全會的，現在亦已多回到國際路線下來，而擁護四大全會，並反對右派。”^②

中央宣佈反對派回黨的三項條件：1、立即停止反黨小組織活動，並寫聲明書承認錯誤；2、在黨指定的會議上和工作中去承認和改正自己的錯誤；3把原來擔負的工作組織交待清楚並公開向黨宣佈自己參加羅章龍右派活動的經過及自己所知道的關於這反革命派的一切情形。^③米夫還提到把徐錫根和王克全等送去莫斯科學習的計畫：“將來我們可能要派一些人去莫斯科。例如，徐錫根和王克全的問題就可能是這樣，在四大全會上，我們曾有點輕率地把他們推舉為政治局候選人，現在他們請求去學習。”^④

① 米夫：《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信》（1931年3月28日於上海），《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10），第206-207頁。

② 《中共中央致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電——報告四大全會經過》（1931年2月22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12），第526頁。

③ 《反對羅章龍右傾分裂主義資料彙編》（文革鉛印本），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圖書館藏，第10頁。

④ 米夫：《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給共產國際的信》（1931年2月22、23、25、28日於上海），《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10），第140頁。

(二)羅章龍被開除黨籍，成立“非常委員會”

到1月底，反對派不少核心成員已經屈服，徐錫根和余飛寫了擁護四大全會的聲明書，中央政治局1月27日通過決議，永遠開除羅章龍黨籍，決議稱羅章龍“利用全總機關作為進行第二黨組織與活動的大本營”，“決定開除羅章龍的中央委員與永遠的開除羅章龍的黨籍，並報告共產國際請求批准。”^①

羅章龍等人被開除黨籍後，反抗更加激烈，於1931年1月31日成立了“中國共產黨非常委員會”。羅章龍說，非常委員會“是國際代表和臨時中央宣佈開除許多同志的中委、黨籍，並停止他們的工作以後，才被迫成立的”，“主要是中共六大中委、全總、鐵總、海總、上總以及北方、東北區、江蘇、山東和全國蘇維埃準備會議委員等在上海的老幹部”，^②主要成員有：羅章龍、史文彬、李震瀛、王仲一、唐宏經、袁乃祥、沈先定、張昆弟、王鳳飛、譚壽林、張金保等。

“非常委員會”3月4日寫信給共產國際，^③要求“迅速撤換米乎，收回成命，解散非法成立的臨時中央”，“迅速派公正人員查明四大全會事件經過，對肇事人員予以紀律制裁”。^④“非常委員會”還發出了《告全黨同志書》，號召“各支部根據非委‘提綱’通告文件內容開展全黨討論”，“以實際革命行動為表率批判米、王集團”。^⑤同一時期，“非常委員會”在《致中共各蘇區信》中，呼籲“禁止米、王死黨進入蘇區”，“米乎、王明、向忠發等罪行重大，如派人竄入蘇區，對首惡應處理制止，以平民憤”。^⑥

①《關於開除羅章龍中央委員及黨籍的決議案》(1931年1月27日中央政治局通過)，《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12)，第493-494頁。

②羅章龍：《致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函》(1979年10月)，《羅章龍回憶錄》(下)，第735-736頁。

③《中國共產黨非常委員會致共產國際的信》(1931年3月4日)，楊奎松：《“中間地帶”的革命——國際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第249頁。

④《中共中央非常委員會致共產國際信》，《羅章龍回憶錄》(下)，第494頁。

⑤《中共中央非常委員會告全黨同志書》，《羅章龍回憶錄》(下)，第496頁。

⑥《中共中央非常委員會致中共各蘇區信》，《羅章龍回憶錄》(下)，第497-498頁。

“非常委員會”有許多資深的工運領導人，他們走向分裂後，派人到各地聯繫，華北、東北黨組織受到較大影響。羅章龍說：“非常委員會”宣佈“偽中央及其一切決議與命令一律無效。黨的一切問題聽候召集臨時會議（即緊急會議）成立七大會合理解決”。“非委中央乃派人分途出發，前往北方、南方與中部地區佈置新任務與新工作。決定文虎赴北京、唐山、遼沈、哈爾濱各地”，“又決定蘇准會代表迅速回到本蘇區開展武裝與工農群眾工作。”^①

（三）羅章龍分裂活動對北方黨組織的影響

“非常委員會”雖然在上海成立，但2月以後在江蘇和上海就走向衰敗，受影響時間更長的是北方黨組織。1931年1月5日天津成立“緊急會議籌備處”的時候，並不知道要召開四中全會。1月21日袁乃祥回到天津以後，帶來了四中全會的消息，並鼓動籌備處反對四中全會。張金刃（即張慕陶）、韓連會、王仲一等從上海回來後，與曹策等一起成為籌備處的核心人物。在1928年蔡和森寫的北方幹部簡歷中，張金刃、韓連會、吳雨銘被認為是順直地區最強的三個幹部，^②此時三人都加入了反對派，對華北黨組織破壞之大可以想見。

籌備處在張金刃等的領導下，宣佈自己就是省委，除了早已控制的天津市委，還派吳華梓去北平，郝清玉去直南，曹振華去山西、保屬，葉善之、袁乃祥、張昆弟去唐山。在籌備處的影響下，北平召開代表大會“通過加入籌備處與反四中全會”，趙作霖、肖鳴等成立第二市委，北京大學、中國大學等重要支部倒向反對派；順直互濟會黨團加入籌備處；^③保屬特委在曹振華、徐步雲等領導下加入籌備處，“太原特委表示積極參加籌備處，直

①《羅章龍回憶錄》（下），第487-488頁。

②《蔡和森關於北方幹部簡歷》（1928年8月3日），《中共中央北方局文件彙集》（一），中央檔案館1992年，第143頁。

③《最近一個月的河北情形》（1931年3月14日），《河北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甲7），第130-132頁。

南特委承認籌備處精神正確”。除了京東唐山黨組織對籌備處進行抵制，華北多數黨組織倒向反對派。^①

在2月6日《河北緊急會議籌備處給中央非常委員會幹事局信》中，籌備處明確支持羅章龍等的“非常委員會”，認為黨內存在“兩個絕不相同的鮮明旗幟，一方面是真正布林塞維克的營壘——由反四中全會十六個代表所領導的全國各地為堅決執行國際路線、徹底肅清立三路線、反調和主義鬥爭的黨部和黨團。一面是小資產階級的集團——由十九個人所領導的李立三派及陳紹禹派的小組織。”籌備處甚至認為羅章龍等不夠勇敢，建議“非常委員會”宣佈代行中央職權：“1、中央非常委員會的組織，應立刻公開號召全黨，它是目前黨的最高領導機關。2、中央非常委員會幹事局應確定執行中央臨時政治局職權，制定各項決議，領導全國工作，統一全國鬥爭，並迅速準備全國緊急會議的召集。”^②

籌備處在支持“非常委員會”的同時，也要求經費支持，2月10日給“非常委員會”的信提到：“緊急會議的籌備及陝西去人都萬分急需經費，此間零星接待萬難維持，望急設法寄款為要，並望即批准預算”。^③籌備處確實派人去了陝西，本來陝西省委接到中央四中全會文件後，2月15日表決接受四中全會決議，但是從山西來的籌備處代表到達並報告後，陝西省委又“開始動搖猶豫了，由常委會又成立一決議，反對四中全會”，“參加河北緊急會議籌備處”。但是到3月28日，陝西省委召開全體會議，又轉向擁護四中全會，回到中共中央旗下。^④

1月底，徐蘭芝、陳原道、賀昌等組成的中央代表團到達天津，2月6日

①《河北臨時省委關於籌備處反省委反中央問題的報告》（1931年3月12日），《河北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甲7），第122-123頁。

②《河北緊急會議籌備處給中央非常委員會幹事局信》（1931年2月6日），《河北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甲7），第49-51頁。

③《河北省緊急會議籌備處關於工作情況及經費問題致中央非常幹事會的信》（1931年2月10日），《河北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甲7），第58頁。

④《陝西省委第六次全體會議決議案》，《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甲3），中央檔案館、陝西省檔案館1992年，第326頁。

召集會議並決議成立河北省臨時省委，同時宣佈“解散右傾機會主義分裂黨行動的籌備處組織及天津臨時市委”。^①河北臨時省委以徐蘭芝為書記，陳原道為組織部長，這時站到臨時省委一邊的人數不多，包括阮嘯仙、余澤鴻、賀昌、蔣曉野、周啟敦、侯鏡如、胡錫光、陳複、北平市委書記劉錫五等，臨時省委還派陳原道去唐山，派阮嘯仙去北平，派吳正廷去直南，派薄一波去保屬，傳達四中全會精神，努力使地方組織脫離籌備處的影響。^②當時華北黨組織陷入混亂，幸而北方軍委（省軍委）有相對獨立完整的工作系統，臨時省委借此與各地方組織恢復聯繫，與籌備處展開艱苦的爭奪。^③臨時省委2月18日決議開除張金刃、韓連會、曹策、葉善之黨籍，2月24日又開除吳華梓黨籍。

在中共中央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提到，羅章龍等“派張金刃、韓麟會、王仲一到順直去，唐宏經到滿洲去；李震羸到香港去，進行第二黨的活動。”“惟順直黨中，機會主義根基較深，而右派一些領袖又多在順直做過工作，如吳雨銘、韓連會、張金刃、袁乃祥、李希逸、張昆弟、王仲一甚至韓麟符，他們都集中在天津，並且還影響了一些幹部，所以那裡的鬥爭還很艱苦，中央現在更派負責同志去巡視。”^④這位負責同志，就是剛從蘇聯回來的政治局委員張國燾，他於2月下旬在天津召集“北方區緊急會議”，一定程度穩定了北方黨組織。^⑤但是，一直到三月份，雖然河北臨時省委逐漸佔據優勢，一些參加過籌備處活動的人開始回到黨內，但是籌備處還在繼續活動。

4月8日，雙方的鬥爭以出人意料的方式結束。在狂熱的黨內鬥爭

①《河北省臨時省委擁護四中全會與接受中央對河北黨工作指示的決議》（1931年2月6日），《河北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甲7），第47頁。

②《河北省臨時省委報告》（1931年3月4日），《河北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甲23），第88-90頁。

③薄一波：《七十年奮鬥與思考》上卷，中共黨史出版社1996年，第110頁。

④《中共中央致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電——報告四中全會經過》（1931年2月22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12），第525-527頁。

⑤張國燾：《我的回憶》（第二冊），第475頁。

中，秘密工作規則失效，人心動盪之中也容易出叛徒。當天河北臨時省委召開常委全體會議，同一天籌備處也召集秘密會議。國民黨天津公安局顯然獲得了準確情報，同時搜捕了兩處會場，逮捕了河北臨時省委徐蘭芝、陳原道等13人，也逮捕了緊急會議籌備處張金刃、吳華梓等11人。^①籌備處無力重建，基本覆滅；河北臨時省委雖然遷往北平之後重新建立，但下層組織經過大動盪之後損失慘重。當時北平基層黨組織主要是在各大學，在這場黨內鬥爭中，“北大支部整個瓦解了”，有的跟籌備處跑，有的消極了。當楊織如受命恢復組織時，有人傷感於黨內鬥爭翻臉無情，表示只想安心讀書，有人說暗探時常出沒不要再來，有人三言兩語打發，有人甚至直接將其推出門外。^②華北黨組織元氣大傷，短期內難以恢復。

東北黨組織受到分裂活動的影響也比較大。1931年1月下旬，唐宏經和徐文雅夫婦回到瀋陽進行分裂活動，受到了滿洲省委抵制，“省委已嚴厲拒絕與他們發生任何組織關係，指斥他們的錯誤，反對他們這種活動，禁止他們在滿洲黨內作任何活動。”^③但是唐宏經在北滿有深厚基礎，他2月7日到哈爾濱積極活動，影響了一批人，在2月16日北滿特委會議上，參會8人中只有3人支持四中全會，另外4個特委成員和共青團領導人張乃文都支持反對派，他們佔據了特委機關。^④雖然滿洲省委後來開除唐宏經等人黨籍，重建了北滿特委，但損失已經難以挽回，“哈爾濱從前聽說有七個士兵支部，但都是把持在右傾小組的分子手裡，所以現在一個也沒有了。”^⑤

在上海失敗後，羅章龍1931年春季親自到哈爾濱，此時唐宏經雖已被

①《河北臨時省委關於省委被破壞情況致中央的信》（1931年4月21日），《河北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甲7），第192-193頁。

②楊織如：《30年代初北平地下黨鬥爭片段錄》，《北京革命史回憶錄》第二輯，第42-43頁。

③《中共滿洲省委緊急通知》（1931年1月31日），《東北地區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甲7），中央檔案館等1988年，第58-59頁。

④《東北地區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甲31），第35-51頁。

⑤《中共滿洲省委給中央的報告》（1931年4月24日），《東北地區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甲8），第46-47頁。

捕,但反對派仍有一些基礎。羅章龍準備利用士兵支部策劃兵變,但沒有成功。據他說:“文虎與當地非委在哈爾濱軍事策劃佈置已有頭緒,但事為羅登賢所偵知,便極力從中加以破壞”,“當丁超得知部下有異圖時,便採用嚴厲鎮壓手段,將軍中地下黨組織主持人捕去,更利用哈爾濱投敵的中共黨員作眼線,繼續破壞非委的組織”。^①

分裂活動對南方影響不大,李震瀛以全總巡視員身份到香港後,受到廣東省委的冷遇。廣東省委2月1日給中央的信提到,廣東省委與李談話並看了全總文件後,決定“省委未有接到中央已開四中全會通告及四中全會決議案以前,省委對四中全會的政治上組織上的決議無從討論”,全總文件“不發到各級黨部,對全總黨團的意見在未接到四中全會的通告和決議以前亦不應討論。”^②

(四)羅章龍嘗試影響蘇區但沒有成功

雖然羅章龍派認為城市工人運動是革命的重心,對蘇區和紅軍比較輕視,但“非常委員會”仍試圖通過“蘇准會”影響蘇區黨組織。中共原計劃1930年12月11日廣州起義紀念日召開全國蘇維埃大會,成立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蘇准會”是為全國蘇維埃大會制定文件的籌備會,有各蘇區代表參加。蘇准會秘書長林育南和黨團書記李求實都是反對派骨幹,很多蘇區代表受到了羅章龍派的影響,1月7日《蘇准會工作人員會議決議案》也提出“徹底改造黨的領導機關”,和全總1月1日決議立場一致。^③“在四中全會黨內鬥爭期間,蘇准會代表首先在反四中全會提綱文件上簽名贊成,並立即加入中共中央非常委員會作為非委成員之一”。^④

3月中旬,中央蘇區在蘇准會的代表肖道德、胡家珍、戴辰生從上海回

^①《羅章龍回憶錄》(下),第693頁。

^②《中共廣東省委給中央信》(1931年2月1日),《廣東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甲19),中央檔案館、廣東檔案館1982年,第15-16頁。

^③《蘇准會工作人員會議決議案》1931年1月7日,見楊祖培:《反立三路線、反調和路線之剖析》,《近代史研究》1982年2期,第72頁。

^④《羅章龍回憶錄》(下),第485頁。

到贛西南,其中肖道德曾作為列席代表參加六屆四中全會。他們“在特委宣傳四中全會的不好”,很明顯是在傳播羅章龍等人的主張。中央局此時雖沒有得到四中全會的文件,但嚴厲制止他們反中央的宣傳,後來又發現他們只有蘇准會的介紹信,“料知他們非中央派回,是與右派有關係的”,將他們作為AB團逮捕。^①

羅章龍還試圖利用和各蘇區領導人的個人關係,進行分裂活動。羅章龍是中共最早的黨員之一,長期在中央擔任重要工作,和各個蘇區的領導人都比較熟悉,他給中央蘇區的毛澤東、鄂豫皖蘇區的張國燾、湘鄂西蘇區的夏曦、賀龍都寫了信,試圖拉攏他們支援自己的分裂立場。

毛澤東是和羅章龍私交最深的蘇區領導人,他們在長沙共同創建新民學會,在北京遊學期間更是一個鍋吃飯、一張床睡覺,是年輕時的親密朋友。羅章龍另立中央後在給毛澤東的信中說:“如果說當時作為堂堂之黨,正正之旗的中共中央及全黨,對此竟萬馬齊喑無聲,不加評論,不加抨擊,不僅寧非咄咄怪事!如果是這樣下去,不僅是中國革命蒙上奇恥大辱,而且適足以證明全黨無人了!這難道是無關輕重的小事,可以坐視不理嗎?!”羅章龍稱讚毛澤東“對革命忠心耿耿,疾惡如仇,是黨的中流砥柱”,希望毛“對此小撮壞人篡奪行徑,毀黨叛革命奸謀”,“奮起反擊,樹之風聲則群小懾服,全體黨員聞風回應”。^②但毛澤東不但沒有支持,反而毫不客氣地批評羅章龍過分在意“雞蟲得失小節”,表示自己“決不預聞個人恩怨門戶之私。”^③

羅章龍與張國燾私交也很深,兩人在北京大學求學期間接受了共產主義,共同參與了中國共產黨的創建,共同開創了北方工人運動,又一起在中央共事很久。但是,當張國燾回國後試圖勸說羅章龍時,羅一直避而不見,也許他在何孟雄等被捕犧牲後,擔心遭到暗算。這種擔心也不無道

①《蘇區中央局報告》(1931年7月8日寫發,11月6日帶到),《中央革命根據地歷史資料文庫——黨的系統》(3),第1677頁。

②《羅章龍致毛澤東信(殘件)第二件》,《羅章龍回憶錄》(下),第502頁。

③《羅章龍致毛澤東信(殘件)第一件》,《羅章龍回憶錄》(下),第501頁。

理，張國燾提到，當時遠東局代表波蘭人（應該指雷利斯基）確實曾提出暗殺羅章龍。^①不過後來在張國燾夫人楊子烈來訪之後，羅章龍給已去鄂豫皖蘇區的張國燾寫了一封信，希望張國燾“反戈一擊，肅清內奸”，同時希望張重用受自己影響的蘇准會代表，“鄭芹瑞、錢伯符、曾中聖、徐朋雲諸同志均屬革命英才，應加垂青，予以愛護”。^②

羅章龍給湘鄂西領導人賀龍也寫了信。信中說：“湘鄂西出席蘇准會代表團已會畢返原防駐地，此間近日情況當由他們當面轉，一切請按非委‘提綱’施行。”^③夏曦與羅章龍在參與湖南新民學會時就比較熟悉，四中全會後曾經受命去勸說羅章龍。夏曦前往湘鄂西蘇區建立中央分局後，羅章龍給夏曦的信中說：“石廬見訪，傾談竟日，非委提綱已蒙理解”；“德昌為人極為明白通達，智勇兼資，緩急可以相助”；希望夏曦“揮兵靖難，撥亂反正”。^④

但是，羅章龍這些對蘇區領導人的分化都沒有成功。“非常委員會”既要面對國民黨的殘酷鎮壓，又要面對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的分化瓦解，他們擁有的資源有限，逐漸力不從心，分崩離析。共產國際對中共處於支配地位，一個直接的原因就是：當時中共中央的絕大部分經費是由共產國際提供的。反對派拒絕服從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後，很快被斷絕了生活補助費，他們的基本生活陷入困境，政治活動更難開展。非委女工部長張金保回憶：“我們這些人的生活由此處於極端困難的境地。有的賣光了自己家中有限的一點值錢的東西，晚上睡在地板上，經常餓肚子，有的只好到救濟難民的地方去喝一點施粥度日。我則依靠金澤霖沿街叫賣瓜子、小孩玩具來維持生活。”^⑤

羅章龍在東北活動一年，在哈爾濱難以立足，1932年潛回上海。九一

① 張國燾：《我的回憶》（二），第461頁。

② 《羅章龍致張國燾信》，《羅章龍回憶錄》（下），第499-500頁。

③ 《羅章龍、王仲一致賀龍、賀錦齋》，《羅章龍回憶錄》（下），第500頁。

④ 《羅章龍、劉鄴致夏曦信》，《羅章龍回憶錄》（下），第501頁。

⑤ 張金保：《張金保回憶錄》，第173頁。

八事變和上海一二八抗戰之後，群眾運動出現復興之勢，他也曾嘗試重整旗鼓，但收效不大，於1933年4月被捕。^①羅章龍被蔡元培保釋出來後，一直在大學教書，退出了政治生活。雖然羅章龍反復辯解說國民黨中央社發佈的《羅章龍自首聲明》是馬邵武偽造的，他並不知情。^②但是自首聲明公開發表後，殘餘的羅章龍派失去首腦，很快走向消亡。福州本來沒有羅章龍派，在北京參加過羅章龍派活動的學生高凡民來到後，聯合一些被中共開除的黨員，成立第二市委，甚至組織起有27支槍的閩東北工農遊擊第三支隊，但是“自從羅章龍自首以後，頗有兔死狐悲之感，活動沒有從前那樣積極了”。^③

先後參加反對派的重要人物中，羅章龍、李震瀛、邱泮林脫離政治活動；張金保、唐宏經1940年代重新回到中共，史文彬也想重回中共，但病死在去延安的路上；張金刃1932年曾一度恢復黨籍，但1933年被再次開除，他繼續在西北軍和東北軍中從事革命活動，1941年被國民黨殺害；張昆弟死于湘鄂西肅反；王仲一病死在國民黨獄中；更多的人包括徐錫根、王克全、余飛、沈先定、許畏三、吳雨銘、韓連會、袁乃祥等則對革命前途絕望，被捕後成了叛徒，他們的特務活動給中共白區黨組織造成了嚴重破壞。

反對派雖然走向了失敗，但是失去了這些經驗豐富的工運骨幹，中共在工人運動中的組織也受到很大損失。埃斯勒在共產國際執委會東方書記處會議說：“黨和工會完全脫離了群眾。我們同工人罷工和日常鬥爭的聯繫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薄弱。我們不能認真地開展某種運動，不能動員基層組織進行工作。工會、中華全國總工會（其領導已經重新改組）很快就失去了會員。例如，上海如今才600名工會會員，也就是說

①《社會新聞》2卷4期（1933年1月），轉引自《羅章龍右傾分裂主義批判資料》1972年5月鉛印本，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圖書館藏，第72-73頁。

②《致中共中央政治局函》（1979年10月），《羅章龍回憶錄》（下），第738頁。

③《中共福州中心市委關於職工反帝工作和羅章龍派活動情況報告》（1933年5月5日），《福建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3），79頁。

比黨員還少。”^①

五、小結

中共是民主集中制的革命黨，但民主和集中之間本有內在矛盾，何時應該民主，何時應該集中，是始終需要面對的難題。中共六大之後強調民主，但引發了很多混亂，於是轉向集中，反對極端民主化。但中共當時並沒有成熟的、眾望所歸的領袖，李立三等集中權力以後，卻推行脫離現實的空想政策，造成慘重損失。據張國燾說，“本來共產國際寄望於周恩來”，希望他“擔負起中共中央的實際領導責任”，1931年特別“邀請他去莫斯科，以便面授機宜”，“誰知後來，他回到中國以後，仍不以第一首腦自居”。^②周恩來有自知之明，而瞿秋白書生氣很重，結果六屆三中全會不但沒能完全糾正立三路線，反而把李立三的支持者李維漢、賀昌等補選進中央委員會，同時繼續壓制不同意見，三中全會後的中共中央仍然難以獲得全黨的信任和尊重。

羅章龍、何孟雄在五四運動中接受了民主思想。在1921年中共建黨之初，何孟雄本來接近無政府主義，反對一切集權，當羅章龍勸他加入時，他特別強調“須以黨內實行充分民主為條件”，羅章龍回答：“只要大家意志堅強統一，內部誰敢專制？萬一將來黨內發生妄人，群眾自然把他打倒”，^③這段對話可以看成後來另立中央的思想源頭。1930年他們對李立三等拙劣的、災難性的集權領導非常不滿，希望通過黨內民主改組領導機構，這甚至一度得到遠東局和中共中央某種程度的認可，所以才有九十六號通告的發佈。但當時中共畢竟是共產國際的支部，黨內民主是受限制的，共產國際是中共的上級，提供了中共中央絕大部分經費。羅章龍等的

^①《埃斯勒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書記處會議上的報告》（1931年2月20日於莫斯科），《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10），第92頁。

^②張國燾：《我的回憶》第二冊，438-439頁。

^③羅章龍：《椿園載記》，東方出版社1989年版，第104-105頁。

要求被獨斷專行的米夫拒絕後，憤而走向組織決裂。但他們自視過高，仍把城市工人運動當做革命的重心，輕視紅軍和蘇區，對政治形勢的判斷完全脫離實際，等待他們的是白色恐怖下的殘酷現實。他們當中有的心灰意冷、退出了政治活動，更多的被捕後成了叛徒，幫助國民黨抓捕昔日同志，中共組織也因失去一批經驗豐富的幹部遭受重大損失。

共產國際在中共組織發展中起到的作用是複雜的，一方面中共是在共產國際指導下建立的新組織，初期並不成熟，既沒有眾望所歸的領導核心，也沒有嚴密的組織紀律，經常陷入內部混亂之中，共產國際是全黨公認的權威，在中共組織的穩定和建設中發揮著難以替代的作用；另一方面，共產國際領導人是在莫斯科遙控指揮的外國人，對中國國情終究隔膜，對不熟悉的中國領導人不信任，無論是六大選拔大量工人幹部進入中央，還是六屆四中全會後重用留蘇學生，都產生了明顯的負面影響。

遠東局領導米夫只有 29 歲，不夠成熟老練，也是導致六屆四中全會後發生組織分裂的原因。在米夫的指導下，中共中央在 1930 年 12 月中旬對反對派讓步過大，幾乎是繳械投降，自陷於被動地位。當反對派的民主熱情被激發起來，米夫卻沒有耐心與之充分溝通，只是居高臨下的強制命令，倉促召開四中全會，體現了其傲慢自大和對中國幹部的輕視。他過於急切地把毫無經驗和功績的留蘇學生王明等人提拔到領導崗位，是難以服眾的。雖然中國共產黨當時仍年輕幼稚，但已有十年鬥爭歷史，領導了規模巨大的工人運動、農民運動和武裝鬥爭，湧現出不少有傑出才能和歷史功績的領導人。王明等人才二十多歲，回國工作只有一年多，期間沒有表現出傑出才能，也沒有顯赫功績。羅章龍、何孟雄等有經驗、有才能的幹部很難心悅誠服地接受王明等的領導，這和後來毛澤東對王明、博古等的憤怒情緒是一樣的。

米夫不惜失去一批經驗豐富的老幹部，把得意門生王明扶上了中共領導人的地位。但是，無論是王明，還是後來在中央蘇區實際掌權的博古，很難說他們有獨立的政治思想、有自己的路線。正如羅章龍、何孟雄等批評的，他們只是些缺少經驗的年輕學生，他們只會寫點文章，而且是

寫一些他們自己都不太明白的文章，以他們的才能和威望根本不可能在黨內取得領導地位，他們完全是共產國際特別的米夫強加給中共的聽話的代理人。王明、博古自己也認為他們只是堅決貫徹國際路線，1931-1934年的所謂“王明路線”時期，實際就是共產國際試圖通過留蘇學生嚴格控制中共的時期。

第七章

紅軍爭論、黃陂肅反與蘇區中央局的初建

困難形勢是對組織的考驗，迅猛發展的形勢也同樣如此。1930年國民黨大規模派系戰爭給中共帶來巨大機遇，但尚不成熟的中共組織在急速發展中出現了混亂。在城市，李立三主導的中共中央與上級、下級都發生激烈對抗，結果中央喪失威信，被共產國際改組，留蘇學生進入領導層，心懷不滿的羅章龍派走向決裂。在農村，紅軍在集中整編方面取得巨大進展，先是中央蘇區紅軍在毛澤東領導下成立了共同前委，然後各地紅軍又在中央指示下建立了軍團和方面軍，但紅軍各自為戰的情況仍很嚴重，不同來源的紅軍會合時，常常爆發激烈爭論，造成決策困難。同時，紅軍與地方組織關係緊張，毛澤東與江西行委之間出現嚴重分歧，這是黃陂肅反和富田事變的誘因。蘇區中央局的建立是革命重心向農村轉移的關鍵一步，中共中央力圖借此解決矛盾衝突，整合各種力量，在蘇區建立黨、政、軍一體化的軍事政治體系。

一、紅一方面軍統一指揮權過程中的激烈爭論

1929年底古田會議之後，中央蘇區紅軍的權力結構趨向集中，政治委員的權威明顯上升，毛澤東取得主導地位。但紅軍中的民主氣氛仍很濃厚，政治委員還沒有凌駕集體領導的最後決定權，重大決策需要集體討論決定，特別是當兩支獨立活動的軍隊集中統一指揮時，常常會發生激烈的爭論，決策相當困難。毛澤東、朱德的一軍團和彭德懷的三軍團在1930年夏秋實現統一指揮，成立了一方面軍，為第一次大規模反圍剿戰爭奠定

了組織基礎，但這也是一個伴隨著激烈爭論的曲折過程。

(一)紅軍二攻長沙失敗，峽江會議爭論激烈

1930年2月陂頭聯席會議上，紅軍四、五、六軍（後改稱三軍）和贛西特委決定成立共同前委，毛澤東為書記，朱德、彭德懷、潘心源、劉士奇、陳毅、黃公略為常委。^①但在1930年上半年，四、六軍在贛江以東，五軍和新建的八軍在贛江以西，幾支主力紅軍還是各自為戰。7月份，按照中央指示，毛澤東將四軍、三軍（原六軍）、十二軍編為一軍團，彭德懷將五軍、八軍編為三軍團。

7月底，彭德懷率部攻佔長沙，但僅十天又在優勢敵軍反攻下敗退出來，這時毛澤東的部隊在南昌附近，無法配合作戰。毛澤東部和彭德懷部當時並沒有建立有效聯繫，更談不上統一指揮了。毛澤東是根據“報載何鍵向五軍前進”，才“決定去瀏陽”援助五軍，^②半路在一張繳獲的明信片上看到“彭匪確已佔領長沙”這樣一句話，才知道五軍攻佔了長沙。^③周恩來談到這個問題時痛心疾首地說：“指揮問題，也是一嚴重問題”，“六個月來，這樣的教訓真太多了，就最近進攻長沙來說，沒有一個總司令部，彭德懷規定計劃後，只以友軍的態度通知朱毛紅軍以及第二集團軍等，結果不但這一計畫在時間上發生問題，在行動聯繫上更完全不能實現配合的作用。如果我們能早在六月以前就注意到這一問題，那麼至少也不像現在這樣的現象。所以，在今天如果仍忽視這一問題，真要成為罪惡了。”^④

8月23日，從長沙撤出的三軍團與趕來支援的一軍團在瀏陽會師，成立了紅一方面軍，朱德為總司令，毛澤東為總政委。紅一方面軍前委會議

①《中共江西省委巡視員張懷萬巡視贛西南給中央的綜合報告》（1930年4月5日），《江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一九三〇年（一）甲，第93頁。

②毛澤東：《給贛西南特委並轉中央信》（1930年8月19日），《中央革命根據地歷史資料文庫——軍事系統》（9），第401頁。

③賴毅：《從井岡山到贛南》，《回憶中央蘇區》，第50頁。

④周恩來：《目前紅軍的中心任務及其幾個根本問題》（1930年9月30日），總政治部辦公廳編：《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歷史資料選編》第一冊，第539頁。

討論決定再攻長沙，8月24日發出《向長沙推進的命令》。“當時有些同志看到三軍團第一次攻打長沙取得很大勝利，繳獲大批武器裝備和物資，部隊武器裝備大大改善，個個穿起嶄新的軍裝，面貌煥然一新，十分羨慕，認為三軍團僅一個軍團的兵力就能攻下長沙，現在兩個軍團合兵一處，打下長沙更沒有問題；加之當時黨內軍內總的指導思想仍然是要攻打中心城市，爭取一省數省的首先勝利，因而攻打長沙的主張便占了上風。”^①

長沙敵軍憑藉工事固守，紅軍圍攻十幾天進展不大。9月10日晚，全軍對長沙發起總攻，激戰一夜未能得手，傷亡很大，被迫從長沙撤圍。一打長沙之後，三軍團的八軍和五軍就鬧分家，而且鬧的相當激烈。二打長沙失敗後，長期獨立活動的一軍團和三軍團有再次分家的傾向，紅軍的集中統一計畫遇到嚴峻挑戰。

彭德懷在這一時期受立三路線影響，對進攻大城市比較積極。當時八軍政委鄧乾元對進攻長沙比較消極，在第一次佔領長沙敗退以後，不僅“主張五、八軍分家”，而且“提出一個書面意見”，批評彭德懷“部落領導和個人獨裁”，“在八軍中鼓動群眾反對彭德懷”。^②結果彭德懷以鄧乾元說“打長沙是軍事冒險、奪取武漢更是遙遙無期”為由將其撤職，留黨察看三個月，讓比較激進的袁國平接任。^③二打長沙時，彭德懷還以違抗命令的罪名，處決了與鄧乾元觀點接近的八軍四師師長盧匿才，直接在稻田裡用刀砍了，吓得全軍“鴉雀無聲”。^④

紅軍從長沙附近撤到江西後，紅一方面軍和江西地方黨組織也爆發激烈爭論。毛澤東主張打吉安，但贛西南幹部認為這過於保守，主張打南昌。贛西南特委報告中提到，“前委派來傳達佈置攻吉安與擴大紅軍等意見同志毛澤東、朱雲卿等參加討論的結果，我們對總行委自動提出

① 李志民：《李志民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93年，第111頁。

② 《中共湖南省委給長江局的報告》（1930年10月3日），《湖南革命歷史文件彙集》（8），第238頁。

③ 《紅三軍團前書記彭德懷向中央的報告》（1930年9月20日），《湘鄂贛革命根據地文獻資料》（第一輯），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78頁。

④ 王平：《王平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版，第22頁。

如下建議”，“一、三軍團入贛第一步作戰計畫，應當先奪取南昌、九江”，“吉安敵人留給二十軍消滅，二十二軍仍應迅速立即向撫州前進，奪取撫州並進攻南昌”，“我們只有火速打下南昌、九江，才能完成一軍團爭取革命首先在武漢勝利，奪取全國革命前途”。“當時代表前委來的毛澤東同志等反復申述先打吉安、樟樹理由，意見要爭取武漢勝利，必須建立江西政權，要能即刻建立政權，必須先打下吉安”。“我們認為，他們這一申明有如下錯誤見解”，“忽視了打九江、南昌之迫切”，“不徹底明瞭主要城市可以爆發一個廣大群眾革命鬥爭的新策略”。^①當時立三路線雖已在上海受到批評，但消息並沒有傳到蘇區，贛西南幹部揮舞立三路線的大旗，毛澤東對中央路線也不好公開反對，“反復申述”四個字生動揭示了他貫徹軍事戰略的艱難。

9月29日袁州會議上，“三軍團有的同志提出不打長沙就去打南昌。毛澤東同志堅決反對。一軍團的幹部早有教訓，也同意不打南昌。但當時三軍團的幹部、湖南省委書記王首道同志、長江局代表周以栗同志卻都贊成去打南昌，使毛澤東同志處於為難地位”，不少人質問毛澤東：“你又不打長沙，又不打南昌，執行不執行中央路線”。^②袁州會議最後決定，一軍團先進攻防守較弱的吉安，三軍團進攻樟樹並擔任警戒任務，有機會再合兵進攻南昌。兩軍雖暫時分開，但相隔不遠，可以配合作戰。

10月4日，紅一軍團攻佔吉安。15日，紅一軍團離開吉安北上，在17日峽江總前委全體會議上，又發生激烈爭論，毛澤東甚至提出辭職。何長工說：“周以栗以長江中央局代表的身份拍著桌子要我們按立三路線去打大城市，袁國平同志也同意。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同志說，這樣，我這個總前委書記不好當了”。“後來，對到什麼地方去落腳的問題又爭論起來了”，“毛澤東同志說，江西的敵軍都是客軍，對地方的守備並不那麼熱心；當地的靖衛團不是紅軍的敵手，易於擊潰。從地理環境看，湘江贛江之間

^①《中共贛西南特委報告》（1925年10月25日），《江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一九三〇年（二）甲，第124-126頁。

^②滕代遠：《袁州、羅坊會議前後的情況》，《回憶中央蘇區》，第129頁。

有兩條鐵路，一是粵漢路、一是南潯路，敵軍易於調集；而贛江與閩江之間則沒有這樣的鐵路，而且有武夷山、羅霄山脈做屏障，敵軍不易調集，也難於對付我們。從群眾條件來看，閩贛也有廣泛的革命根據地”。“參加會議的人數約有二十人：毛澤東、朱德、彭德懷、林彪、滕代遠、袁國平和我、鄧萍、張純清、譚震林、羅炳輝、羅榮桓、古柏、蔡會文、黃公略、李井泉、劉作農、宋喬生、李文林、曾山、曾炳春、譚政等。由古柏和李井泉做記錄。到會的還有長江局代表周以栗”。^①

峽江會議上爭論的焦點是過江問題，三軍團主要是湖南人，不想東渡贛江遠離家鄉，彭德懷、何長工也主張三軍團在贛江與湘江之間，提出“井岡山就不要了？！”這樣尖銳的問題。毛澤東沒有最後決定權，只能耐心說服。“會議情緒激烈，開了一夜，天都快亮了，我們持不同意見的同志才基本上同意部隊東渡贛江。毛澤東同志堅持以理服人，為了使一、三軍團團結奮鬥，他做了大量的說服工作，不但會上做，而且在會後仍然堅持做。思想工作是比較長期的複雜的，為了適應我們持反對意見的這部分同志的思想有一個轉變過程，結束後，沒有將部隊馬上東渡贛江，一軍團反而向袁水流域開展工作的三軍團靠攏。”^②峽江會議決定了往江西發展的大方向，雖然仍提到進攻南昌，但說服三軍團過江，就避免了一、三軍團再次分家，為集中主力打第一次反圍剿的大殲滅戰奠定了基礎。

（二）第一次反圍剿在即，“誘敵深入”戰略艱難確立

1930年10月下旬，蔣介石取得了中原大戰的勝利，開始調集重兵準備進攻中央蘇區。得到敵情變化消息後，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和江西省行委10月25日在羅坊召開聯席會議，討論應對策略，最終決定放棄進攻南昌，不在蘇區邊緣作戰，採取“誘敵深入”方針，撤退到蘇區腹地尋找戰機。這是決定蘇區命運的重大決定，整個過程爭論非常激烈，決策很艱難。譚

^① 何長工：《回憶三次反‘圍剿’前後的幾次重要會議》，《回憶中央蘇區》，第131-132頁。

^② 何長工：《回憶中央蘇區的有關歷史》，《回憶中央蘇區》，第99頁。

震林回憶：“撤離長沙後，一路上開了許多會。那不是一次會、兩次會，還是三次、四次會，而是開了許許多多次的會。每到了一個地方都開會，做一些同志的思想工作。”^①毛澤東後來總結說：“戰略退卻，在沒有經驗時，說服幹部與人民的問題是更加困難的問題。當軍事的領導還沒有達到對戰略退卻這樣的問題可以而且應該集中到最少數人乃至一個人手裡而為幹部所承認時，困難問題就發生了。”^②

江西省行委書記李文林等擔心“誘敵深入”使大片蘇區被敵軍佔領蹂躪，三軍團不願遠離湖南家鄉。但是，在蘇區邊緣作戰沒有把握、風險很大，一、三軍團分開則很難打大的勝仗，易被優勢敵軍各個擊破。在中央新指示沒有到達的情況下，毛澤東無法公開反對立三路線，不得不耐心說服。郭化若說：“羅坊會議開了好幾次，最後一次非常重要。這次會議，彭德懷同志沒有參加。會上正式決定了‘誘敵深入’的方針，頒發了‘圍前村命令’。會議的內容和決議均由周以栗同志轉告彭德懷同志。因為周是長江局的代表，是代表中央說話的，地位很高，彭德懷同志只好同意了。”^③

三軍團政委滕代遠說的更詳細：“毛澤東同志說服和爭取了周以栗同志，然後和周以栗同志一道來說服三軍團幹部”，“我們的轉變並不是開一次會議就解決了的，而是毛澤東同志費了很大功夫，盡了最大的耐心，開了許多次會”。“面對強敵的進攻，怎麼打？在什麼地方打？當時有兩種不同的主張：一種是主張把戰場擺在峽江一帶，一軍團在贛江東面、三軍團在贛江西面，東西兩路夾攻敵人；另一種是毛澤東同志的意見，主張誘敵深入，退卻到根據地作戰，把敵人放進來打。兩種意見進行了爭論。最後，毛澤東同志說服了大多數幹部，彭德懷同志也同意了毛澤東同志的意見。三軍團渡過贛江，兩個軍團向根據地的中心區域——甯都的黃陂、小布地區退卻集結，準備粉碎敵人第一次大‘圍剿’”。^④在這段時間，周以栗

① 譚震林：《談中央紅軍反第一、二、三次大“圍剿”》，《回憶中央蘇區》，第147頁。

② 毛澤東：《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1936年），《毛澤東集》第二版（5），第136頁。

③ 郭化若：《回憶第一次反“圍剿”期間的有關史實》，《回憶中央蘇區》，第138頁。

④ 滕代遠：《袁州、羅坊會議前後的情況》，《回憶中央蘇區》，第127-130頁。

利用中央代表的權威，並充分發揮能言善辯的特長，在確立“誘敵深入”戰略上給毛澤東幫了大忙，也引發了江西行委幹部的不滿。

三軍團領導勉強接受了新戰略，但要說服中層幹部也不容易。三軍團在1930年獲得巨大發展，實力今非昔比，總兵力超過一軍團，心態自然也與1928年底幾百人投奔井岡山時不同了。5月下旬，贛西南特委報告就提到“五軍有六個縱隊，最近他們槍支大發展，比四軍還要多一千左右”。^①三軍團7月底攻佔長沙後，繳獲很多，裝備大大改善，彭德懷在信中提到在長沙“軍用品有充分的補充”，“服裝做了，軍容為之一整”。^②三軍團的發展壯大讓一軍團羨慕不已，三軍團幹部當然更加自信，更傾向於獨立活動。

彭德懷比較顧全大局，雖然他本人也有疑慮，但還是靠個人威望在三軍團執行了羅坊會議決策。周以粟、滕代遠、袁國平主持召開團以上幹部會議，進行渡江動員，六師師長郭炳生^③說：“到了江東，地形、人情又不熟，部隊非垮不可。你們這個辦法是冷水洗屁，越洗越小”，這種粗話引得哄堂大笑。“會議從上午開到下午，爭論非常激烈，發言的大多是軍事幹部，言詞也比較偏激；而政工幹部多數從組織原則方面考慮，認為總前委已經作出決定，即使遇到一些困難，也應該服從上級的決定”。“傍晚，彭德懷從江邊回來參加會議，看到會場上亂哄哄的有點生氣，馬上叫大家安靜下來，耐著性子說服大家。”^④

（三）中央堅持集中紅軍，毛澤東取得龍岡大捷

雖然中央批判了立三路線，但李立三領導時期集中整編紅軍政策卻得到延續，以後也從未改變。立三路線時期，集中紅軍是為了進攻大城

① 《中共贛西南特委給紅四軍前委的信》（1930年5月22日），《江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一九三〇年（一）甲，第155頁。

② 《彭德懷來信》（1930年9月21日），《湘鄂贛革命根據地文獻資料》（第一輯），第481頁。

③ 郭炳生1932年任五軍二師師長時試圖帶隊叛變，但部隊大都被政委彭雪楓追回，他只拉走很少一部分。

④ 李志民：《李志民回憶錄》，第124-125頁。

市，六屆三中全會把重點轉向鞏固蘇區、穩步發展。周恩來在9月30日報告中強調：“我們黨的中心任務，具體說來，就是一方面把蘇區整個地聯繫起來，集中指導到全國蘇維埃臨時中央政權之下，集中紅軍，加強紅軍，在幾個主要蘇區建立起鞏固的根據地而向外發展。”^①新戰略與毛澤東的意見基本一致，但共產國際對毛澤東並不完全信任，還是要從中央派人建立中央局，直接領導蘇區。

10月24日《中央政治局關於蘇維埃區域目前工作計畫》是這一時期關於紅軍和蘇區的綱領，其中反復強調集中統一的重要性。計畫指出：“集中與統一的軍事指揮”是先決問題，“戰略只有在各部分紅軍在統一的指揮之下一致行動與相互配合的基礎上，才能收到實效。過去各不相顧的現象，在現在敵人進攻紅軍的過程中，只有更易給敵人以各個擊破的利便。在這裡，我們指責過去各個集團軍尤其是第二集團軍不能與一三集團軍一致行動的錯誤”。“軍事上最重要缺點便在沒有偉大規模戰爭的準備，軍事指揮還不能集中，行動還不能一致”。“紅軍現時的作戰已超過了過去遊擊戰的範圍而開始進入大規模的戰爭狀態；因此，小規模的遊擊隊已不復能成為這種革命戰爭的主力”。^②

中共中央決定建立蘇區中央局和中央軍事委員會，直接掌控各蘇區紅軍。“中央政治局便決定在中央蘇區立即設立中央局，目的在指導整個蘇維埃區域之黨的組織，同時，並在蘇區成立中央軍事委員會以統一各蘇區的軍事指揮”。“革命軍事委員會有全權指揮所屬的紅軍與一切武裝力量，只有其上級政府與黨的蘇區中央局或特區委員會可以變更其決定。地方政府與地方黨部均無權干涉”。^③

中央指定在項英到達蘇區之前，由毛澤東代理中央局書記，這對強化

① 周恩來：《目前紅軍的中心任務及其幾個根本問題》（1930年9月30日），總政治部辦公廳編：《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歷史資料選編》第一冊，第534頁。

② 《中央政治局關於蘇維埃區域目前工作計畫》（1930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6），第430、435、459頁。

③ 《中央政治局關於蘇維埃區域目前工作計畫》（1930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6），431-432、440頁。

毛澤東的領導地位有很大作用。10月29日《中央關於對付敵人“圍剿”的策略問題給一、三集團軍前委諸同志的指示》規定：“蘇區中央局在江鈞同志（即項英）未到達前，可先行成立，暫以澤東同志代書記。委員名單另附。軍事指揮必須統一，依中央上次通知，仍以朱德同志為一三兩集團軍總司令，當其他部隊與中央區發生作戰聯繫時，亦歸一三集團軍總司令指揮。中央軍委暫不組織，候江鈞到後再成立，目前一切政治軍事指導統集中到中央局。”^①

中央指示的反圍剿策略也與毛澤東的思路基本一致。12月10日《中共中央給紅軍的訓令》指出：“現在反動統治階級，進攻紅軍的兵力計算將調往和已調往的在十師以上，來與紅軍第一三軍團作戰，企圖消滅紅軍的主力”。“第一三軍團在目前情況之下，應以贛南和贛東南為作戰地區；而以閩粵贛為後方地”，“該兩軍團在防禦時或由防禦轉為攻勢時的兵力部署，須集中主力于主要決戰方面。極力避免分散兵力（放棄吉安的情況），否則會有被敵人各個擊破的危險”。“一三軍團及第十二軍均在紅軍前敵總司令朱德同志及總政治部主任毛澤東同志直接統一指揮之下行動，第七軍和第十軍在與一三軍團取得聯繫後，亦須立即聽受其指揮。”^②

紅軍權力機構逐漸趨於集中後，早期官兵生活絕對平等的政策也發生改變。12月10日《中共中央給紅軍的訓令》提到：“在有些部隊中，曾有一種極端民主化的傾向，無論那一方面，指揮員和戰鬥員都是一樣，這是要廢除的。要估計到，指揮員是負有戰鬥的配備和指揮的重大責任，他們比戰鬥員要多勞力和勞心。因此站在他的工作效力上說，無論在物質上，勤務上，應當比一般戰鬥員有較好的條件。”^③

政治委員集權體制的建立在不同的紅軍部隊存在差別。多數政治委員是書生出生，缺少軍事經驗，鄧中夏在二軍團擔任政治委員就不成功，

①《中央關於對付敵人“圍剿”的策略問題給一、三集團軍前委諸同志的指示》（1930年10月29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6），第482頁。

②《中共中央給紅軍的訓令》（1930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6），第511-512頁。

③《中共中央給紅軍的訓令》（1930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6），第517頁。

經常不顧賀龍等將領的意見，固執己見，導致軍事失敗。賀龍說：“鄧很孤立，其他軍、師長、政委都同意我的意見。但鄧一定要打，使用了他政治委員的最後決定權”，結果打了敗仗。^①當指揮員在政治、軍事能力都很強的時候，他們在各自部隊中仍起中心作用，比如三軍團司令彭德懷和一軍團司令林彪，政治委員只能起輔助作用，難以成為中心。劉作撫報告提到：“五軍政治委員滕代遠同志忠實勇敢，不過性情懦弱，雖然在五軍幾年了，都沒有什麼政治影響，就是五軍士兵群眾中也沒有什麼深厚的印象，”五軍全部士兵“信仰彭德懷個人”。^②

毛澤東無疑是當時紅軍中最重要的政治委員。雖然他也是書生出身，但經過1927年以來的艱苦歷練，他不僅積累了豐富軍事經驗，而且逐漸顯示出傑出軍事才能。1930年秋冬，毛澤東說服了眾多不同意見，克服了黃陂肅反和富田事變帶來的軍心浮動，指揮一、三軍團撤退到蘇區中心設下埋伏，12月30日一舉殲滅張輝瓚第十八師九千多人，這就是紅軍歷史上戰果空前的龍岡大捷。毛澤東詩興大發，寫下“萬木霜天紅爛漫，天兵怒氣衝霄漢。霧滿龍岡千嶂暗，齊聲喚，前頭捉了張輝瓚！”此役打破了敵軍對中央蘇區的第一次圍剿，令人信服地強化了毛澤東的核心領導地位。龍岡大捷後，“部隊在討論中發言很熱烈，有的在行軍途中還邊走邊討論，異口同聲地說，這一仗打得真過癮，誘敵深入才能打大勝仗；對總前委、毛澤東同志提出的戰略方針從心裡信服了。這時，蘇區群眾的情緒也很高，紛紛傳說‘紅軍裡頭有能人，毛澤東賽過諸葛亮’。”^③

當然，當時毛澤東的領導地位還沒到不可挑戰的程度。本來他並不想殺龍岡大捷中俘虜的十八師師長張輝瓚，但在群眾大會上眾怒難犯的情況下，張輝瓚還是被殺了，“主要原因是群眾對他太憤恨”。^④“毛澤東

① 賀龍：《回憶紅二方面軍》，《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1期，第13頁。

② 《中共贛西南特委劉作撫同志給中央的綜合報告》（1930年7月22日），《江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一九三〇年（一）甲，第235-236頁。

③ 李志民：《李志民回憶錄》，第137頁。

④ 李志民：《中央蘇區反一、二、三次大‘圍剿’的片斷回憶》，《回憶中央蘇區》，第149頁。

同志已經交代過，張輝瓚放下武器後，願意捐款捐槍捐醫藥，請求免他一死，可以不要殺。但中央宣傳部個別同志仍然把他交給群眾去開大會，結果被憤怒的群眾一刀割下腦袋，放在門板上順贛江漂流下去”。^①十八師被紅軍殲滅、師長張輝瓚被殺的消息傳開之後，在國民黨統治區引起極大震動。自1927年以來，蔣介石認為共產黨已不足為患，他到這時才猛然醒悟，真正厲害的對手不是李宗仁、馮玉祥和閻錫山，而是共產黨領導的紅軍。

二、黃陂肅反與富田事變

肅反發生的原因很複雜，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的指示是政策前提，直接誘因是1930年10月紅軍攻佔吉安之後，毛澤東在繳獲的材料中發現蘇區有奸細與敵軍通信，據此認為在敵軍大規模進攻之際，必須先清除內奸。同時，毛澤東在集中指揮權的過程中，始終面對激烈紛雜的不同意見，感覺十分棘手，這也讓他懷疑這些不同意見中包含有敵人奸細的作用。同時，農村環境中形成的簡單粗糙作風大大加劇了肅反的破壞性。

(一)紅一方面軍黃陂肅反

字面意義上的AB團是1926年底由段錫鵬、周利生、程天放等人在江西成立的反共組織，到1927年4月以後已經不復存在。^②但是，在江西黨內文件中，還是習慣於把各種反對革命的勢力泛稱為AB團、改組派，一般是把支持蔣介石南京政府的稱為AB團，把接近汪精衛國民黨左派的稱為改組派。

贛西南蘇區肅AB團是從1930年5月從地方組織開始的，很快走向失控，9月份達到高潮，抓了幾千人，上千人被殺。10月13日贛西南特委會

^① 耿飆：《耿飆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91年，第120頁。

^② 戴向青、羅惠蘭：《AB團與富田事變始末》，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0頁。

議記錄提到：“黨過去殺一千多AB團，內中一定含有很多可以教育過來的”，^①不過這個階段肅反對紅軍影響不大。值得注意的是，後來被打成AB團的叢允中等人，此時卻是肅反的領導者，他們在8月二全會議後很積極地整肅AB團。“叢允中說過他從南京調江西工作，路過九江看見碼頭上掛著段錫鵬的紅布標語，又在‘二全會議’後，叢允中殺害丘會培、凌開招等一批同志時，說他們就是AB團反革命”。^②二全會議是江西黨內鬥爭非常激烈的一次會議，叢允中在會後肅反殺人，不能排除他借肅反打擊反對派的意圖。紅軍剛開始肅反時，贛南地方組織還專門派人來幫忙，“贛南特委派左基中、周高潮、馬木彬來紅三軍團專門組成一個辦公室，動員打‘AB團’”。不過後來糾正肅反錯誤時，紅三軍團又召開公審大會，把這三個人殺了。^③

一軍團10月4日攻佔吉安，繳獲不少間諜在蘇區活動的材料，懷疑已經有大批奸細混入蘇區。這也並非多慮，蔣介石的親信、剿匪司令部秘書長鄧文儀認為，情報工作是國民黨圍剿蘇區戰爭獲勝的重要因素。當時蔣介石的諜報機關主要是中統、軍統和秘書處第三科，鄧文儀說：“我們也派了些人打入滲透共匪的組織和工作”，“共匪的群眾組織都有我們的細胞，我們在前方與軍隊黨政工作人員密切聯繫，在後方情報都很迅速確實，反間諜反情報工作成效卓著，這是當時反共鬥爭勝利的主要因素。”^④雖然鄧文儀是在談到圍剿鄂豫皖蘇區時說的這些話，而且不免有誇大的成分，但說明國民黨派間諜進入蘇區、滲透群眾組織的情況確實存在。

不少紅軍幹部也認為間諜活動是真實存在的，只是沒有後來抓的那麼多。郭化若認為：“AB團在當時肯定是有的。我們從兩個跡象可以看

① 《贛西南會議記錄》（1930年10月13日），《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上冊），第631頁。

② 戴向青、羅惠蘭：《AB團與富田事變始末》，第95頁。

③ 《王平回憶錄》，第25-26頁。

④ 鄧文儀：《武漢反共鬥爭怎樣轉敗為勝》，《反共鬥爭經驗談》，臺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72年版，第155-156頁。

出：1、紅十二軍成立之初軍長伍中豪在福建遭到地主武裝襲擊，就是AB團告密的；2、小布埋伏打不成，被譚敵發覺，也是由於AB團告密。這說明有反革命。”^①李廷序說：“應該肯定，當時反革命分子是混到我們隊伍裡來了。這也說明肅反是必要的。”^②李志民也認為：“當時敵我鬥爭十分尖銳、複雜，國民黨特務機關通過各種管道派遣特務對紅色根據地進行滲透、破壞，這是客觀事實”。^③

在大軍壓境的險惡形勢下，紅軍處於弱勢地位，面臨生死存亡的考驗，肅清間諜被當作極為緊迫的任務，一切違反紀律、牢騷不滿、意見分歧等都成為疑點，成為追查奸細的線索。“四軍在贛東與敵接戰時，某部隊上火線發謠風逃跑，由此找到紅軍中的線索，破獲了整個方面軍AB團組織”。^④1930年11月底，紅一方面軍三萬多人在黃陂開始了全軍肅反，這是紅軍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肅反。

李志民對這段歷史有生動回憶：“我是軍黨委秘書長兼組織部長，也是肅反委員會的成員之一，參加過審訊，領導叫怎麼搞就怎麼搞，當開始審出‘AB團’成員時，我曾大吃一驚，認為自己過去思想麻痹，敵人已經鑽進我們軍部來了還沒有察覺。可是，過了幾天，‘AB團’越抓越多，我便逐漸產生了懷疑，不相信會有那麼多‘AB團’；特別是對刑訊逼供的做法看不慣，心想：古代小說中寫過許多‘屈打成招’的冤案，我們怎麼能搞這一套呢？但在當時的形勢和政治氣氛下，誰也不敢提意見，誰提了意見，輕者說你‘右傾’，重者會引火焚身，也被當成‘AB團’抓起來，招來殺身之禍”。^⑤

農民出身的幹部戰士擅長衝鋒陷陣，卻並不擅長精密細緻的反間諜工作。在野蠻粗糙的環境中，捕風捉影、刑訊逼供成了抓AB團的主要方

① 郭化若：《回憶第一次反“圍剿”期間的有關史實》，《回憶中央蘇區》，第142-143頁。

② 李廷序：《對於都北部地方革命武裝的回憶》，《回憶中央蘇區》，第45頁。

③ 李志民：《李志民回憶錄》，第138頁。

④ 《贛西南的（綜合）工作報告》（1931年9月20日帶到），《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上冊），第421頁。

⑤ 李志民：《李志民回憶錄》，第140-141頁。

法。“那時候抓‘AB團’的做法，完全憑主觀想像和猜測，不調查、不研究、不分析、不講事實，甚至把隊伍集合起來，排成一列長隊，首先宣佈‘AB團’是反革命組織，‘AB團’特務必須自首才有出路，然後察言觀色，看有膽怯、畏縮或臉變色的人，就命令出列帶走，進行誘供、刑訊逼供。”^①“用燒紅了的烙鐵烙背部，哪個滋味可不好受哇！”熬不過酷刑招認的大都被槍斃，堅決不招的還有機會活下來，二十七團書記官周貫五一連兩天大刑都挺了下來，最終熬過了肅反。^②

有的親歷者認為肅反擴大化的重要原因是沒有執政經驗。黃克誠說：“我對‘AB團’的存在及其危害性，對‘階級決戰’的口號和所謂‘地主富農鑽進革命陣營破壞革命’的事實，開始一段深信不疑，對上級的指示和部署，完全是自覺地遵照執行，從而鑄成遺憾終生的大錯”。^③李廷序也說：“當時為什麼會犯這個錯誤呢？主要是沒有經驗。反革命頭上又沒寫字，我們初掌政權，過去又沒有做過這項事情。但這段時間不長，只幾個月，在這幾個月中，殺錯不少人”。^④

知識份子大多富裕家庭出身，在肅反中更容易受到懷疑。三軍九師肅反最積極的是矮個子炊事班長，他是師士兵委員會主席，也是肅反委員會委員。他的理論是：“文化高的人肯定家裡有錢，有錢的人就是資產階級”，“像宣傳隊長呀、衛生隊長呀、書記官呀、參謀呀，都是文化高的人，十有八九是AB團分子。像我這樣苦出身大字不識的人，就根本不可能是AB團！”^⑤于都縣委的秘書黃維漢“經常去看別人寫字，字寫得好的人就作‘AB團’殺了；還經常去聽別人說話，若是說話的人講得有條理，也作‘AB團’殺了。在他手上錯殺了很多人。”^⑥“師一級都成立了肅反委員會”，“殺人權就放在師級，往往是憑口供就殺人，也沒有什麼申訴和辯護。三軍團

① 李志民：《李志民回憶錄》，第139頁。

② 袁林：《征途漫漫——我的紅軍生涯》，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第98頁。

③ 黃克誠：《黃克誠自述》，第86頁。

④ 李廷序：《對於都北部地方革命武裝的回憶》，《回憶中央蘇區》，第45頁。

⑤ 袁林：《征途漫漫——我的紅軍生涯》，第97頁。

⑥ 曹金山：《陳毅同志救了我》，《回憶中央蘇區》，第206頁。

打下長沙時，從監獄裡出來跟隊伍走的知識份子被殺了不少。講怪話也有掉腦袋的危險。”^①

肅反使部隊陷入恐怖之中，普通戰士也惶惶不可終日。當時只有十幾歲的小戰士邱會作留下了終生難忘的記憶：“運動開始沒幾天，八連政委就被抓走，聽說他是‘AB團’。沒幾天，我們的二排長也不見了，不久又有幾個班長沒了，被抓走殺了。看到這些熟悉的人一夜之間就成了‘反革命分子’喪了命，我有點緊張”。“前幾天傳來的消息，說已經調到省裡當共青團巡視員的黑子也是‘AB團’，而我正是他介紹入團的，這會不會牽連到我？”“晚上我就病倒了”，“三班長來了，向我做瞭解釋，我這時才明白了我參加的不是‘AB團’的團，而是共青團的團”。“打‘AB團’活動不久就停止了，但紅軍中相當一批中下層指揮員被無辜地殺掉了，使初建不久還很弱小的紅軍大大地傷了元氣。這場政治大災難，有政治路線錯誤的原因，這是主要的，但是以落後地區農民組成的紅軍部隊的愚昧也加重了這場風潮的災難性。”^②

隨著肅反的展開，被捕被殺的人越來越多，紅軍損失慘重。“因為‘AB團’出在江西的富田、東韶一帶，而紅五軍中多數是湖南平江、濟陽一帶的人，所以抓‘AB團’的重點對象大多找我們東渡贛江以後在江西參軍的新戰士”。“新戰士入伍不久，認識的都是同鄉，於是，抓到一個‘AB團’就供出一大片同鄉、同學，像滾雪球似地越供越多”。“經過刑訊逼供的人大多屈打成招，一承認是‘AB團’，不幾天就槍斃了。當時紅五軍不到一萬人，肅反就誤殺了二三百人，搞得人人自危，嚴重削弱了部隊的戰鬥力”。^③“李井泉、楊立三同志當時負責審問總司令部直屬機關的AB團”，“到達黃陂時，總司令部有五個副官，肅AB團時殺了兩個”。^④“一個在無意中戴歪

① 江華：《追憶與思考》，第109頁。

② 邱會作：《邱會作回憶錄》，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11年版，第20-22頁。

③ 李志民：《李志民回憶錄》，第139-140頁。

④ 劉戀：《紅一方面軍總司令部在甯都黃陂、小布、青塘等地活動情況》，《回憶中央蘇區》，第169頁。

了軍帽的戰士也被抓，他在酷刑之下胡亂地供認該連隊有不少 AB 團，但又推脫說記不起名字。矮個子班長威迫全連列隊，逼迫他逐個指認，他在昏昏迷迷中，把五十多人指認為 AB 團”。^①

關於黃陂肅反被捕、被殺總人數的史料很少。毛澤東在《總前委答辯的一封信》提到：“此次紅軍中破獲 AB 團四千四百以上”。^②1931 年 2 月《蓋利斯、米夫和馬雷舍夫同任弼時談話記錄》提到：“中央提款員在返回途中（在長沙地區）宣讀了毛的呼呀書，呼呀書中說，軍隊清洗了約 4000 名 AB 團分子，因此它在政治上和在作戰能力方面大大加強了。”^③同日《雷利斯基同向忠發和周恩來談話記錄》也提到：“最近撤出吉安後，我們軍隊的同志——毛、朱、彭——對軍隊進行了清洗，他們清除了大約 4000 人，有的被槍斃，多數被逮捕”。^④

有的學者認為被捕的 4400 人全部被殺，但這種說法難以成立。在各蘇區肅反中，從沒有把被捕人員全部處決的政策，一般都允許工農出身的士兵自首，很多人被紅軍開除，他們在部隊中消失了，但並未被殺。還有幹部雖然被逮捕，但堅決不承認，後來不但被釋放，還官復原職，比如紅三軍 27 團團長李聚奎和副團長陳華堂，他們獲釋後立刻帶隊參加了第一次反圍剿。^⑤雷利斯基談話中也提到，多數只是被捕，被殺的是一部分。按前面李志民的說法，五軍不到 1 萬人殺了 200-300 人；蕭克提到，工農出身的可以自首，十二師抓了 100-200 人，分兩次殺了 80 多人，當時四軍共 7000 多人，抓了 1300 多 AB 團，殺了約一半，就是 600 多人。^⑥

① 袁林：《征途漫漫——我的紅軍生涯》，第 99-100 頁。

② 《總前委答辯的一封信》1930 年 12 月 20 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黨史教研室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 14 冊，第 634 頁。

③ 《蓋利斯、米夫和馬雷舍夫同任弼時談話記錄》（1931 年 2 月 19 日於上海），《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10），第 81 頁。

④ 《雷利斯基同向忠發和周恩來談話記錄》（1931 年 2 月 19 日於上海），《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10），第 84 頁。

⑤ 《李聚奎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 1986 年，第 91-95 頁。

⑥ 文宏（搜集整理）：《關於富田事變及江西蘇區的肅反問題》，《江西文史資料選輯》1982 年 2 輯，第 110 頁。

不同部隊肯定是有差別的，大致五軍殺的少些，三軍殺的多些，四軍在兩者之間。歐陽欽1931年9月報告稱：“紅軍中的AB團在一次戰爭前只第三軍及廿軍比較嚴重，其他各軍比較少，但三軍經過大的破壞已經漸次肅清，其他各軍亦有破壞”，^①《總前委答辯的一封信》也提到“三軍的AB團，特別佈置的多”，^②這說明出自贛西南的三軍在肅反中被殺比例肯定更高。紅一方面軍當時包括紅一軍團約16500人和紅三軍團約17000人，^③總共約33500人。少量新部隊未集中，黃陂附近大約有30000人，被捕4400人，約占15%；粗略估計，其中可能有一半被殺，大約2000人，占總人數7%左右，這是相當嚴重的損失。

有一點值得注意，黃陂肅反被殺總人數比較多，但其中高級幹部相對較少。鄂豫皖紅軍白雀園肅反和湘鄂西紅三軍肅反被殺人數大約是幾百人，但鄂豫皖白雀園肅反被殺的有許繼慎、周維炯兩個師長，潘皈佛、高建鬥、王則先、肖方、王明、魏孟賢六個團長，封俊、江子英、袁高甫、吳精赤、劉性成五個團政委，十個團政治處主任，陳昌浩肅反報告中提到的團級以上幹部有23人。湘鄂西紅三軍肅反被殺的師級以上幹部就有段德昌、唐赤英、宋盤銘、盛聯鈞、王一鳴、胡慎己、傅光夏等，夏曦四次肅反中僅第一次就整肅了團級以上幹部28人，有威望有能力的幹部大多被殺。^④相對於鄂豫皖蘇區和湘鄂西蘇區，中央蘇區紅一方面軍的黃陂肅反中高級幹部被殺的不多，李志民說：“這一次肅反在紅五軍中沒有誤殺到團以上幹部還算萬幸。”^⑤

① 歐陽欽：《中央蘇維埃區域報告》（1931年9月3日），《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上冊），第385-386頁。

② 《總前委答辯的一封信》1930年12月20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黨史教研室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14冊，第634頁。

③ 《蓋利斯給別爾津的書面報告》（1930年11月30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9），第490-492頁。

④ 見本書第九章、第十章。

⑤ 李志民：《李志民回憶錄》，第140頁。

(二)富田事變的誘因——贛西南領導人與毛澤東的分歧

1929年初，毛澤東因敵軍重兵圍攻帶紅四軍下井岡山，2月中旬在贛南初遇李文林領導的二、四團，當時他對贛西南黨和紅軍評價很高，認為雖然公開武裝割據是長遠目標，但在敵我力量過於懸殊的情況下，不公開建立政權的贛西南模式更符合實際。他在4月給井岡山邊界特委的信中大力推薦東固經驗：“兩年來的經驗，在全國至少有一省用總暴動方法推翻統治階級以前，小區域蘇維埃政權公開的割據，是有害而無利的。如湘南，如醴陵，如平江，如永新、蓮花、遂川，不僅失掉群眾，連黨亦幾乎失掉完了”，“農村城市的經濟基礎一齊毀壞完了”。“這番我們到東固，則另是一種形式，反動勢力是驅逐了，權力完全是我們的，但公開的政權機關和固定的赤衛隊卻沒有。郵路是照常的，商業貿易是照常的，邊界所受的痛苦此間完全沒有。敵軍到來尋不到目標，黨的組織和群眾的組織（農民協會）完全秘密著。在接近總暴動之前，這種形式是最好的。”^①

蕭克的回憶更加生動：“據說是進蘇區了。奇怪的是，這兒沒有蘇區那種熱鬧場面，看不到蘇維埃的名義，也沒有農民協會招牌，尤其明顯的是沒有燒房子的現象”。“紅四軍所到之處，總是要打土豪，要燒掉舊的衙門、警察所等等國民黨行政機關，在東固地區卻沒有這種事。然而，紅四軍三千餘人一到就有軍需供給，不僅有飯吃，還有蔬菜、豬肉吃，經常有人送東西來，我們住了六七天，沒打土豪，但生活得比較好”。^②

但到1930年，國民黨發生大規模派系戰爭，蘇區周邊敵我力量對比發生重大變化，革命形勢迅猛發展，毛澤東的想法變了，認為必須順應形勢，建立公開割據政權。他在1930年1月信中批評林彪不注意建立政權的遊擊思想，強調“有計劃建立政權”，“政權發展是波浪式向前擴大”，甚至要“一年爭取江西”，^③這標誌著毛澤東農村包圍城市革命戰略初步成型，於

^① 毛澤東：《前委來信（摘要）》（1929年4月13日），《黨的文獻》2008年2期，第15頁。

^② 蕭克：《朱毛紅軍側記》，第132-133頁。

^③ 毛澤東：《給林彪的信》（1930年1月5日），《毛澤東集》第二版（2），第127-129頁。

是他對不公開建立政權的贛西南模式態度就不同了，認為這在新形勢下是消極右傾。

此時在贛西南蘇區，劉士奇是激進派，江漢波是保守派，他們圍繞進攻吉安、整編紅軍、土地政策等發生激烈爭論。劉士奇批評省巡視員江漢波（即張懷萬）“取消為攻吉安而組織的總行委及紅軍總司令部，主張二、四團分開遊擊”，“反對群眾熱望的沒收一切土地平均分配”，認為“否認政權的急需也是江同志最大的錯誤”。^①二七會議後贛西南特委報告提到：“江漢波的思想確實代表了贛西南黨內一部分右傾分子，影響鬥爭不小”，“故西特正確主張的執行發生了許多阻礙，致形成黨內的分裂，分配土地、建立政權各項中心工作都因此停頓在半生半死的狀態中。正在這樣黨內政治紛爭不能解決的嚴重關頭，四軍前委率四軍由閩來贛”，幫助贛西南打開了局面。^②

毛澤東率四軍到贛西南後，1930年2月7日主持召開陂頭會議，明確支持激進派劉士奇，認為贛西南部分領導人過於保守。“土地遲遲分配是極端嚴重的機會主義”，“平分能奪取群眾，否則不能奪取全部群眾，據他處各處的經驗，皆如是”，會上發生了“嚴重的爭論”，“結果按毛同志的意見通過”。^③會議決定建立公開的蘇維埃政權，徹底分配土地，擴大紅軍，進攻贛西南中心城市吉安，贛西、贛南、湘贛邊三特委合併成贛西南特委，由劉士奇擔任書記，王懷、李文林、肖道德、叢允中為常委，並且“由前委負責開除江漢波的黨籍”。^④

但受到批評的贛西南領導人並不服氣，而且新特委書記劉士奇性格

① 劉士奇：《中共贛西南特委書記劉士奇給曾覺非同志的信》（1930年2月28日），《江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一九三〇年（一）甲，中央檔案館、江西檔案館1988年，第51-52頁。

② 《中共贛西南特委給江西省委的報告》（1930年3月），《江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一九三〇年（一）甲，中央檔案館、江西檔案館1988年，第60-61頁。

③ 《中共江西省委巡視員張懷萬巡視贛西南給中央的綜合報告》（1930年4月5日），《江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一九三〇年（一）甲，第92頁。

④ 《中共贛西南特委給江西省委的報告》（1930年3月），《江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一九三〇年（一）甲，第61、67頁。

急躁，“有不滿意的地方即亂罵，在亂罵的言詞中常有‘槍斃’的話語”，^①這也加劇了贛西南的黨內鬥爭。在立三路線時期，李文林5月到上海參加了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他回來後再次與劉士奇發生激烈衝突。劉士奇拒絕李立三對贛西南“農民意識濃厚，保守觀念，武裝不集中”的批評，“說中央指示不對”，不肯召集會議讓李文林傳達中央指示。在8月5日召開的贛西南二全會議上，劉士奇遭到多數幹部反對，從第二天起就拒絕出席，結果會議決定開除劉士奇黨籍，選舉曾山為書記，王懷、李文林、郭承祿、肖道德為常委，郭貞、陳婉如為候補常委。^②贛西南領導人自以為得到了中央的支持，對毛澤東的總前委也不很尊重了，此時立三路線代表中央，毛澤東自己也被批評為農民意識、不積極進攻，拿贛西南領導人沒有辦法。

紅軍10月攻佔吉安後，贛西南黨、團、工會等按立三路線指示合併，成立江西省行動委員會，李文林為書記，曾山、段良弼、叢允中等為常委，李白芳為秘書長，實際上就是新的江西省委。李志民說：“江西省總行動委員會(省委)某些領導人對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和毛澤東同志提出的‘放開兩手誘敵深入，大量消滅敵人’的戰略方針抵觸較大，認為這是‘右傾機會主義’，是‘退卻路線’；而他們‘打到南昌去’的方針才是革命的進攻的路線”。“他們利用根據地群眾懼怕敵人燒殺搶掠、搞白色恐怖的心理，欺騙、控制群眾，不讓群眾同紅軍見面，對我們進行封鎖。所以，當我們紅三軍團逐步向永豐以南的黃陂、小布地區收縮時，越向蘇區中心地區，越見不到群眾，有時甚至連帶路的嚮導也找不到。”^③

這更讓毛澤東懷疑爭論不是簡單的意見分歧，而是有人故意破壞。很多贛西南領導人是地主富農家庭出身，毛澤東進而懷疑他們受家庭影

①《中共贛西南特委劉作撫同志給中央的綜合報告》(1930年7月22日)，《江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一九三〇年(一)甲，第254頁。

②《中共贛西南特委朱昌譜給中央的工作報告》(1930年10月)，《江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一九三〇年(二)甲，第133-137頁。

③李志民：《李志民回憶錄》，第128-129頁。

響，站到了土地革命的對立面。按當時的革命道德，這就可以劃為敵人了。據當時毛澤東的秘書徐復祖回憶，毛澤東早就“批評叢允中做了三年特委書記，腳不越雷池一步，工作沒有發展，就是不抓武裝，就是不分田。”^①隨著國民黨大軍壓境，形勢越來越緊張，毛澤東和江西省行委的矛盾也越來越尖銳。

從組織結構的角度來看，江西省行委與紅一方面軍前委之間權力劃分模糊也是爆發衝突的重要原因。立三路線時期，中央在1930年3月的指示中規定：“前委與省委的關係也是橫的關係，而直接隸屬於中央軍委。故邊特與省委只能以橫的關係供給前委的政治領導而不能指揮前委，前委更不能直接受邊委與省委的支配，意見有不同時，直接決之於中央”。^②中央7月21日通知又賦予行委很大權力：“黨的組織在武裝暴動時，完全要軍事化，全黨形成一個軍營，一切指揮絕對集中”，“行動委員會在行動中，是最有權威的集中的組織”。^③“行委”的設立，帶來了組織系統的混亂，江西省行委試圖幹預紅軍作戰，而紅軍是蘇區的決定性力量，前委希望地方組織配合紅軍，雙方的上下級關係不清楚，都想指揮對方，這引發了尖銳矛盾，成為富田事變的重要誘因。

(三)黃陂肅反波及地方，富田事變爆發

紅軍1930年10月在吉安繳獲的材料中涉及了李文林等，於是毛澤東把敵人奸細和土改滯後、戰略分歧等爭論聯繫到一起，把贛西南當成了肅反的重點地區。離開吉安之前，毛澤東10月14日給中央寫信說：贛西南黨“呈一非常嚴重的危機，全黨完全是富農路線領導”，“黨團兩特委機關、贛西南蘇維埃政府、紅軍學校發現大批AB團分子，各級指導機關，無論內外多數為AB團富農所充塞”。為要“肅清富農領導，肅清AB團，贛西南黨

^① 徐復祖：《毛澤東同志關懷邊區武裝》，《回憶中央蘇區》，第80頁。

^② 《中共中央關於成立紅一軍及軍事工作的指示》（1930年3月18日），總政治部辦公廳編：《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歷史資料選編》第一冊，第422頁。

^③ 《中央通知第一四七號》（1930年7月21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6），第205-206頁。

非來一番根本改造，決不能挽救這一危機”。^①

中央代表周以栗與毛澤東意見一致，也主張堅決肅反，他對陳正人說，八月贛南特委二全會議“是AB團操縱”。^②他在10月19日給湘東特委的信中說：“在贛西南自黨團的最高機關、西南兩特委、西南蘇府直至支部與赤衛隊、紅軍、紅色郵局，充滿了AB團，很有計劃的與鄧英等聯絡一舉消滅贛西南蘇區的大暴動。幸此吉安奪取，這一陰謀被破壞鎮壓，這是多麼嚴重的教訓！”^③

吉安繳獲的名單在肅反中起了關鍵作用。“佔領吉安時發現了在黨、蘇維埃政權和軍隊中活動的AB團分子的名單。根據這份名單，許多省委委員都是AB團分子。很難斷定名單中指出的人真是AB團分子還是這裡的AB團分子的挑撥離間，要使我們的同志倒在槍口之下。這份名單在通過毛關於逮捕省委的決定時起了很大作用。”^④據朱德說，吉安繳獲的文件“涉及AB團，這是國民黨的秘密特務組織，在整個蘇區進行破壞和組織暗殺網”，“AB團員的名字都是密碼，共產黨在好幾個月內都譯不出來。但文件也有不少疏忽的地方，提供了重要線索。例如，有一張收條便是由東固——興國蘇區的一個地主用真名簽字的。這一地區的共產黨領袖之一李文林，就是這個地主的兒子。”^⑤

肅反很快波及江西省行委和新建立的二十軍，總前委根據吉安繳獲的材料，11月首先逮捕了江西省行委書記李文林，又根據肅反中得到的供詞，於12月3日派總政治部秘書長李韶九帶毛澤東的信和一連士兵到江

① 毛澤東：《給中央的信》（1930年10月14日），《中央革命根據地歷史資料文庫——軍事系統》（9），第505頁。

② 《關於李文林被錯殺的情況調查》，《江西黨史資料》（1），江西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1987年，第332頁。

③ 周以栗：《給尺冰同志轉湘東特委諸同志信》（1930年10月19日），《中央革命根據地歷史資料文庫——軍事系統》（9），第507頁。

④ 《蓋利斯、米夫和馬雷舍夫同任弼時談話記錄》（1931年2月19日於上海），《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10），第82頁。

⑤ 史沫特萊：《偉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時代》，三聯書店1979年版，第322頁。

西省行委駐地富田。李韶九此時執掌肅反大權，深受毛澤東的信任，但實際上他卻是不值得信任的人。劉作撫7月給中央的報告就提到李韶九擔任三軍一縱隊政委不稱職，他一方面攬權包辦，另一方面卻“只於未出發前的訓話非常的勇敢，作戰則畏懼怕死”，“一縱大部分人不滿意他”，“最不滿於李的是北路地方黨部與群眾”，“北路已向特委建議撤銷他的工作給與處分”。^①毛澤東重用品質不好的李韶九，也是肅反嚴重擴大化並激起富田事變的原因之一。

毛澤東讓李韶九帶給省行委的信中說：“黨內地主富農成分現在舉行大規模叛變，此問題在贛西南還是異常嚴重，必須運用敏捷手段立即鎮壓下來。紅軍中危機已得挽救，地方的危機必須迅速挽救”。“特派李韶九同志率兵一連代表總前委及工農革命委員會幫助省委省蘇捕捉李白芳等，並嚴搜贛西南的反革命線索，給以全部撲滅”。“省委接到此信務必會同李同志立即執行撲滅反革命的任務，不可有絲毫的猶豫”。“贛西行委及紅軍學校方面須防AB團聞信暴動，故處置亦須迅速，二十軍須找得線索來一個大的破獲，二十二軍已大批破獲”。“各縣各區須大捉富農流氓動搖分子，並大批把他們殺戮。凡那些不捉不殺的區域，那個區域的黨與政府必是AB團，就可以把那地方的負責人捉了訊辦。”^②

僅兩天之後，根據龍超清的最新口供，毛澤東12月5日又致信李韶九：“異常嚴重的黨內地主富農反叛已經形成了極普遍的局面，你們需下決心給他一個撲滅。為了要找得線索不可和前次破獲特委機關一樣將首要殺得太快了。本日據龍超清供稱段良弼是省委機關總團長，袁肇鴻是宣傳科長，組織科長是江克寬，除江克寬現在東韶即由我們去捉外，段良弼、袁肇鴻是重要犯須立即捉起詳審外，再則李白芳更比段袁重要，諒你

^①《中共贛西南特委劉作撫同志給中央的綜合報告》（1930年7月22日），《江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一九三〇年（一）甲，第234頁。

^②《總前委致省行委信》（1930年12月3日），轉引戴向青、羅惠蘭：《AB團與富田事變始末》，第98頁。

們已捉了，並且你們要從這些線索找得更重要的人。”^①

李韶九12月7日到達富田後，會同曾山、陳正人，抓捕了省行委和二十軍幾個重要領導人，包括省行委常委、贛西南團特委書記段良弼、省行委秘書長李白芳，省行委軍事部長金萬邦，省蘇維埃財政部長周冕、紅二十軍政治部主任謝漢昌等，幾天之內抓捕了一百多人，緊急處決了四十多人。

從毛澤東的兩封信可以看出，他對形勢做了極為嚴重的判斷，認為在敵軍大舉進攻的嚴峻情況下，黨內潛藏的敵對分子正在策劃大規模叛亂。毛澤東似乎完全相信了刑訊逼供中得到的口供，認為黨內存在一個系統性的反革命組織，認為這些高級幹部不可能隨便亂供。他在《總前委答辯的一封信》中說：“如果段、李、金、謝等是忠實革命的同志，縱令其一時受屈，總有洗冤的一天，為什麼要亂供，陷害其他同志呢？別人還可以亂供，段、李、金、謝這樣負省行委及軍政治部主任責任的為什麼可以呢？”^②

毛澤東似乎沒有想到刑訊逼供可以讓人承認任何罪名，段良弼的陳述生動回答了他的問題：“我覺得人生在世死是不可免的，不過遲早的關係與死法的不同耳。於是兩個大手指幾被其打斷，身體已被燒爛，幾成體無完膚了。忽然停止打，李韶九道：良弼你要死我不給你死，無論如何你要承認是AB團與說出你們的組織，否則給你一個不生不死。”段良弼聽此話，心理上再也無法承受，說“承認好了”。李韶九“馬上拿我從打地雷公的刑場解下來，拿起筆來要我承認，我握筆寫了我是AB團。但李韶九不許，還要寫出AB團的組織，否則再受第二套刑罰”。“於是執筆隔了大約一小時，心中總是在思索如何是好，偶然心生一計，我料到此次被捉的人恐無生存，於是我寫了李白芳是的，寫完之後心悔不該，這是非布爾什維克的行動，但李韶九令士兵將我解到囚房裡面去，後提李白芳審問

^①《總前委給韶九同志並轉省行委信》(1930年12月5日)，轉引戴向青、羅惠蘭：《AB團與富田事變始末》，第99頁。

^②《總前委答辯的一封信》(1930年12月20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黨史教研室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14冊，第634頁。

也受了同樣的慘刑，結果也承認了，俟後一一提審與受刑罰，結果被捉者皆體無完膚。”^①

12月9日，李韶九押解謝漢昌到東固二十軍軍部肅反，會同軍長劉鐵超，準備大批抓捕二十軍幹部。二十軍是剛從贛西南農民遊擊隊升級而來的，並沒有經過多少組織紀律訓練，也缺少合格的幹部，編成正規紅軍的條件並不成熟。劉作撫7月報告認為“編二十軍不對，應當擴充四、六軍才正確”。^②劉士奇10月報告說得更詳細：“二十軍是地方赤衛隊（特務隊）編成的，有槍兩千五百枝”，“軍事政治幹部非常不夠，地方主義的色彩比較要濃厚點”，“政治水平比三軍還差得遠”。^③二十軍幹部戰士思想簡單，政治上不成熟，突然遇到肅反被冤的複雜局面，出現了過激反應。174團政委劉敵12月12日帶領獨立營武力反抗，抓捕了李韶九和軍長劉鐵超，又和謝漢昌一起帶二十軍直屬隊佔領富田，釋放了被捕的二十多人，然後把二十軍拉到贛江以西，並把紅軍學校繳械。更為嚴重的是，他們不僅自己走向分裂，還向地方組織和群眾公開發出“打倒毛澤東，擁護朱彭黃”的口號，試圖製造紅一方面軍的更大分裂。

段良弼、叢允中、李白芳等在吉安附近的永陽仍自稱江西省行委，並在12月28日按立三路線精神發出進攻吉安通告：“以武漢為中心爭取一省與數省政權的首先勝利，是有十二萬分的可能”，“現在敵人已進至赤色區域，即是我們圍繳敵人的槍的時機到了，就是奪取吉安爭取江西首先勝利的時刻到了”。“決定一九三一年一月一日起至七號止為擁護全國蘇維埃紀念周，各縣區須開群眾大會擁護，七號為奪回吉安總攻擊。”^④他們在

①《省行委緊急通告第九號》（12月15日），轉引自戴向青、羅惠蘭：《AB團與富田事變始末》，第104頁。

②《中共贛西南特委劉作撫同志給中央的綜合報告》（1930年7月22日），《江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一九三〇年（一）甲，第237頁。

③《中共贛西南特委劉士奇給中央的綜合報告》（1930年10月7日），《江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一九三〇年（二）甲，第88頁。

④《江西省總行委緊急通告》（1930年12月28日），《江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一九三〇年（二）甲，第160-161頁。

1931年1月1日的決議中提到合法性問題：“省行委是合法的，因為省行委的委員除陳正人、曾山以外其中的委員皆存在，因此省行委是合法的，即是過去的省行委”，“省行委毫無疑問的要存在，並且要領導廣大勞苦群眾堅決奪回吉安，爭取江西首先勝利。”^①

在富田事變中，贛西南紅軍和地方組織都受到影響。“贛西特委書記王懷同志也受到謝漢昌、劉敵等人的影響，後來與他們結成了一夥，還召開了所謂贛西特委擴大會議，指出紅二十軍在富田舉行事變打省蘇維埃政府不是反革命行為”，謝漢昌、劉敵、段良弼、李白芳等人“在河西蘇區宣傳他們的所謂黨內正在進行工人階級與農民階級兩條路線鬥爭的謬論，使河西蘇區黨員和群眾的思想極端混亂，甚至還影響到河東蘇區部分人民和部分黨員的認識也漸漸模糊起來。”^②

紅一方面軍在蘇區遭到了如同在白區的形勢。譚震林說：“為什麼不去東固？因為東固、富田有AB團。他們造謠，說我們逃跑，不打白軍，使那裡的群眾產生懷疑，不信任我們。”^③贛南新成立的三十五軍回到信豐城，看到“城裡出現很多標語，‘打倒毛澤東，擁護朱彭黃——贛南行委宣’”。^④贛南行委郭承祿、肖國璋、馬榮瀾等偽造了陳毅的信，要求三十五軍支持反對毛澤東的活動，但三十五軍羅貴波等識破了偽信，反把郭承祿等三人扣留，派人洗刷反毛標語。^⑤

叢允中還偽造了毛澤東的信件，信上說要逮捕朱德、彭德懷、黃公略，企圖孤立毛澤東，製造紅軍分裂。彭德懷識破了偽信，宣佈支持毛澤東，對維護紅軍團結發揮了關鍵作用。他“當即寫了一個不到二百字的簡單宣言，大意是：富田事變是反革命性質的”，“陰謀分裂紅軍，破壞粉碎白軍

① 《江西省行委第二次常委會擴大會議案》（1931年1月1日），《江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一九三一年甲，第4-5頁。

② 曾山：《贛西南蘇維埃時期革命鬥爭歷史的回憶》，《回憶中央蘇區》，第19頁。

③ 譚震林：《談中央紅軍反第一、二、三次大“圍剿”》，《回憶中央蘇區》，第146頁。

④ 陳必達：《回憶三十五軍和獨立三師》，《回憶中央蘇區》，第104頁。

⑤ 羅貴波：《憶在反“圍剿”鬥爭中誕生的紅三十五軍》，《紅軍反“圍剿”·回憶史料》，解放軍出版社1994年，第247-248頁。

進攻的計畫；一、三軍團在總前委領導下團結一致，擁護毛澤東同志”。但黃公略聽了彭德懷的講話，只和鄧萍說了句“老彭還是站在毛這邊的”就走了，沒有和彭德懷交流，^①這說明他的看法有所不同。黃公略領導的紅三軍出自贛西南，也許受軍隊情緒的影響，他曾經有過猶豫，但後來還是決定和朱德、彭德懷一起支持毛澤東。

朱德、彭德懷、黃公略公開宣言支持毛澤東，避免了主力紅軍的分裂，中央六屆三中全會指示的及時到達也發揮了作用。12月17日朱彭黃宣言稱：“我們敢說毛澤東同志是沒有錯誤的，尤其是毛澤東同志領導的總前委的工作路線，完全與中央最近三全大會的路線相符合”。“我們敢大叫一句‘朱毛彭黃’團結到底，打倒反革命的AB團取消派”。^②18日，朱彭黃又給贛江以西的曾炳春、王懷、段起鳳並轉二十軍一封公開信，強調誘敵深入“是整個一方面軍總前委的策略，已不是澤東同志個人意見，所謂反對澤東同志右傾，等於無的放矢，尤其所謂毛澤東好用政治手段造成一系勢力的謠言，更是不從實際說話，挾意攻私，小人伎倆，不值一辯”。“革命潮流低落的荒謬理論，就使一般小資產出身的革命分子，對革命動搖悲觀加入AB團，騎牆起來。革命勝利他們是共產黨領袖，革命失敗他們是AB團，所謂進了保險團，紅白都去得。一種最無聊最可恥的卑鄙行動”。^③

在敵人大軍圍攻的危急形勢下，富田事變領導者公開提出“打倒毛澤東，擁護朱彭黃”的口號，並且召開擴大會議，公開說“毛澤東想作黨皇帝”，“毛澤東佈置要將江西的忠實幹部一網打盡，造成清一色的江西毛黨”。^④叢允中等還偽造信件，試圖分裂紅軍，這可能給紅軍帶來全面崩潰的危險，是富田事變被定為反革命事件的重要原因。當然，富田事變導致

① 彭德懷：《彭德懷自述》，第165-166頁。

② 《朱德、彭德懷、黃公略為富田事變宣言》（1930年12月17日），《中央革命根據地歷史資料文庫——軍事系統》（9），第601-602頁。

③ 《朱德、彭德懷、黃公略給曾炳春等一封公開的信》（1930年12月18日），《中央革命根據地歷史資料文庫——軍事系統》（9），第604頁。

④ 《中央局給西路同志信》（1931年2月4日），《中央革命根據地歷史資料文庫——黨的系統》（2），第1372頁。

紅軍發生局部分裂混亂，同時給國民黨十八師師長張輝瓚造成了錯覺，他以為有機可乘，輕率孤軍深入，反而給毛澤東送上了險中取勝的機會，這樣複雜的因果關係是任何人都預料不到的。

三、蘇區中央局的初建與中央肅反政策的實施

(一) 項英初建中央局，對富田事變相對寬容

毛澤東得到富田事變的消息非常憤怒，認為是反革命暴動，派十二軍去追擊，幸而二十軍過到贛江以西，兩軍沒有實際交戰。毛澤東認為富田事變恰恰證明了AB團確實存在，肅反非常及時。《總前委答辯的一封信》強調：“AB團已在紅軍中設置了AB團的總指揮、總司令、軍師團長，五次定期暴動，制好了暴動旗，設不嚴厲撲滅，恐紅軍早已不存在了。”^①

雖然毛澤東領導紅軍取得龍岡大捷的輝煌戰績，但黃陂肅反和富田事變還是對他的威望產生了不利影響。黃克誠、李志民等幹部已經對肅反產生了懷疑，不相信這麼多熟悉的同志竟是暗藏的AB團，痛惜枉殺戰友，朱德、黃公略等高級將領也有保留意見。據龔楚回憶，朱德曾對他說：“殺AB團引起的富田事變，也完全是老毛一個人所弄出來的。許多同志全給自家人殺害了”，“現在好了，中央遷到蘇區來了，一切由黨來解決，不能由一個人來決定了。”^②

項英於1931年1月上旬到達蘇區，1月15日在小布宣佈建立蘇區中央局，並在周恩來未到的情況下，代理中央局書記，此時中央局只有項英、毛澤東、朱德三人能在一起開會。中央局成立的第二天即通過決議，認為：“富田事變在客觀上說，正是反動的AB團取消派等及黨內一般動搖分子相匯合的一種反黨反革命的陰謀總的爆發”。“雖然段良弼、李白芳、謝

^①《總前委答辯的一封信》(1930年12月20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黨史教研室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14冊，第634頁。

^②龔楚：《我與紅軍》，香港：南風出版社1954年，第266頁。

漢昌等仍然打著紅旗，聲言擁護中央，但是富田事變在事實上是毫無疑義的是一種反革命的行動；即使在組織上還沒有證明他們全部是AB團取消派，但是他們反黨破壞革命的行動在客觀上是與AB團取消派等的聯合一致的反動行動”，並且把段良弼、李白芳、謝漢昌、劉敵、金萬邦五人開除黨籍，決議同時也批評總前委在肅反中刑訊逼供和擴大化錯誤。^①

決議認為沒有在組織上證明富田事變領導者是AB團，只是客觀效果上是反革命行動，與毛澤東的說法顯然不同。這個決議能夠在中央局通過，表明項英和朱德不同意原來毛澤東的看法，甚至毛澤東自己可能也有所轉變，或許他也意識到肅反錯殺了很多同志。毛澤東非常自信，極少承認錯誤，但是在紅軍肅反問題上，他後來曾不止一次公開承認錯誤，承認殺錯了人，進而主張黨內鬥爭不開殺戒。毛澤東在中共七大上公開說：“內戰時期，我就打過AB團”，“那時候殺了許多人，應該肯定地說，許多人都殺錯了”。^②他在中共八大預備會議上談及江西蘇區肅AB團時又說：“肅反時我犯了錯誤，第一次肅反肅錯了人。”^③

1931年2月，鄧小平、李明瑞率紅七軍從廣西抵達贛南，剛好趕上富田事變發生不久，當時贛南行委曾一度支持富田事變，被三十五軍強行改組。新成立的贛南臨時行委進退兩難，宣佈與毛澤東的總前委和富田事變後的永陽行委都斷絕關係。贛南黨組織後來在報告中說：“贛南黨受富田事變的影響，東西河交通關係斷絕和敵人的進攻，所以當時雖然建立了蘇區黨的最高指導機關——中央局，和建立了贛西南黨的領導機關——贛南特區委，也無從和他們發生關係，接受他們的指導，這一時期，贛南黨活似一個沒有爹娘沒有依靠的小孩子一樣”。^④

①《中央局通告第二號》（1931年1月16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黨史教研室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14冊，第639-640頁。

②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結論》（1945年5月31日），《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22），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517頁。

③《黨的文獻》1991年第3期，第7頁。

④《中共贛西南特區委西河分委給中央的綜合報告》（1931年6月16日），《江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一九三一年甲，第80頁。

鄧小平接觸了贛南幹部，為解決衝突做了一些工作，他4月底到上海彙報時的報告對富田事變有清晰的敘述。鄧小平一方面堅決反對分裂紅軍，同時也對肅反擴大化提出批評，持相對客觀的立場。他說：“過去總前委與省行委向來有衝突，如對軍閥混戰的分析，引敵深入的戰術，開除劉士奇等問題，省行委常罵總前委是右傾，總前委常指省行委中有AB團的作用，故有富田事件之爆發”。“此事發生後一般同志特別是幹部非常恐慌，人人自危以致不敢開口，特別不敢批評總前委。贛南臨時行委對此問題的處置是在中央未解決此問題前，與總前委、省行委均斷絕關係。我到後與他們討論到此問題，批評他們這種脫離組織的解決辦法不對，仍須與兩方發生固有組織關係，但聲明富田事件候中央解決”，“他們同意了這個意見”。“我對總前委之反AB團的方式亦覺有超越組織的錯誤，這種方法事實上引起了黨的恐怖現象，同志不敢說話”。^①

七軍在解決富田事變中發揮了建設性作用，而二十軍發動富田事變，犯了嚴重錯誤，不能再保留番號。中央5月決定把二十軍編入七軍，同時提醒七軍前委：“在改編二十軍時，應當很謹慎的、很周到的不使二十軍的群眾發生了誤會，要把AB團的陰謀在群眾中揭發出來，要把二十軍中擁護總前委的可靠的幹部和士兵群眾奪取過來，合編為七軍”。^②紅七軍從廣西轉戰千里到達江西，損失很大，由此得到相當的補充，而二十軍被取消了番號，大部分幹部後來被處決。

（二）段良弼上海告狀，遠東局和中共中央做出嚴厲決議

謝漢昌、段良弼、李白芳等帶二十軍過到贛江以西後，認為只有中央才能解決問題。1931年1月，段良弼等出發去上海找中央告狀，力圖推倒毛澤東，他們於2月初到達上海。段良弼報告說：“軍閥發起第一次進攻

^① 鄧小平：《七軍工作報告》（1931年4月29日），總政治部辦公廳編：《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歷史資料選編》第一冊，第690-691頁。

^② 《中央給七軍前委信》（1931年5月14日），《中央革命根據地歷史資料文庫——黨的系統》（3），第1612頁。

時，毛澤東和朱德主張採取不戰而放棄陣地的策略。例如放棄東固。農民中產生了很大的不滿情緒。數萬人同紅軍一起走了”。“省委立即召開了省委全會。全會決定建議紅軍指揮部開始同敵人作鬥爭。省委書記李文林同志把這一決定轉達給了毛澤東和朱德同志。毛把他抓了起來。此外，毛還立即派出一個連去逮捕省委全體成員以及蘇維埃政府的全部機關工作人員和政府成員”。“這個連還被毛派往紅20軍”，於是引發了富田事變。^①段良弼極力誇大毛澤東與朱德、彭德懷等的分歧，暗示朱德、彭德懷等同情他們，“毛澤東使朱德處於單純執行自己命令的地位，剝奪了他作為總司令的幾乎所有權力”。“毛同彭德懷在進攻方向問題上存在重大分歧。”^②

2月中旬，湘東南黨委書記劉士奇和中央提款員易爾士到達上海，他們帶來了對毛澤東有利的報告，他們並不是毛澤東派出的，這更增加了報告的可信性，而段良弼卻在上海失蹤了，從此下落不明。任弼時2月向遠東局彙報時提到：“中央司庫還有湖南委員會的代表團，在動身前都沒有跟毛打招呼”。“湘東南委員會儘管不瞭解事件的真相，還是做出了反對暴動分子的決定：不承認永陽的省委，解除紅20軍湖南獨立師的武裝，支持毛”，“帶來了下列文件：(1)朱、彭、黃(彭的政委)的聲明；(2)他們告20軍紅軍戰士書；(3)毛給省委書記的信；(4)20軍暴動團長給中央的信；(5)毛的呼喚書”。“朱、彭和黃在聲明中稱20軍的行動是反革命行為。他們指出，以他們為一方同以毛為另一方的意見分歧是AB團分子的挑撥離間，不存在任何分歧——他們是團結一致的”。^③

中共中央和遠東局綜合分析後，接受了劉士奇代表團的說法，雖然他們認為毛澤東的肅反也有些過火。遠東局談話記錄提到：“根據第二個代

①《別斯帕洛夫同溫裕成秦邦憲談話記錄》(1931年2月11日於上海)，《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10)，第73-74頁。

②《蓋利斯給別爾津的信》(1931年2月10日於上海)，《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10)，第62-63頁。

③《蓋利斯、米夫和馬雷舍夫同任弼時談話記錄》(1931年2月19日於上海)，《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10)，第79-80頁。

表團提供的信息，第一個代表團、或 AB 團的或受 AB 團影響的代表團把我們都給迷惑了”。“根據毛、朱、彭等人在東固附近一起與軍閥作戰”，“從三人的聲明中可以得出結論，他們之間沒有重大分歧。AB 團分子在製造分裂”。“政治局已作出決定，贊同毛在同階級敵人鬥爭方面的路線，但他的行動有些過火”。^①

段良弼的告狀甚至起了反作用，他們並不清楚立三路線已被清算，批評毛澤東不攻打大城市，反而證明毛澤東早已自覺反對立三路線，與共產國際不謀而合。向忠發、周恩來向遠東局彙報時提到：“‘AB 團’根據自己的需要很好地利用了李立三的政策。他們對我們的同志說，你們為什麼不執行中央的方針，不去攻打大城市，而呆在農村”。“領導同志中的分歧在去年 6 月（注：應為 8 月）江西省委舉行第二次全會時就發生了。這次全會討論了中央關於黨的路線的來信”，“這封信中談到，讓紅軍奪取農民的所有武器，沒有講加強蘇區，而是講佔領大城市。毛反對這個路線。他就此寫信給全會，證明這個路線是錯誤的。他建議首先清除蘇區的一切反革命組織”，“他說，現在去大城市，會使現有的根據地變得不鞏固”。^②很明顯，毛澤東的主張更加符合共產國際的政策。

中央決定派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組成代表團，加強蘇區中央局，解決富田事變，2 月 23 日給第一方面軍總前委、江西省委、各特委、各地方黨部的指示信稱：“中央特決定立即派出代表團前往蘇區組織中央局，並委託代表團以全權調查與解決這一問題。在中央代表團沒有到達以前，從總前委起，江西省委，各特委各紅軍黨部一直到各地黨的支部都要立即停止這一爭論，無條件的服從總前委的統一指導，一致的向敵人進行殘酷的戰爭。中央代表團到達以後，中央局立即組織起來，各地黨的組織與紅軍

①《蓋利斯、米夫和馬雷舍夫同任弼時談話記錄》（1931 年 2 月 19 日於上海），《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10），第 82 頁。

②《雷里斯基同向忠發和周恩來談話記錄》（1931 年 2 月 19 日於上海），《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10），第 83-84 頁。

必須統一於這一指導之下，應絕對服從中央局關於這一事變的解決。”^①

3月18日，遠東局做出正式決議，把富田事變定性為反革命事件，肯定了毛澤東的立場：“看了我們所掌握的關於江西十二月事變的全部材料之後，遠東局得出以下看法：1、紅20軍的暴動”“毫無疑問是階級敵人及其主要戰鬥組織——反布爾什維克聯盟策劃和進行的反革命活動”，“一定數量的黨員同志乃至整個紅軍支隊(20軍)受到‘AB團分子’的矇騙，被捲入到階級敵人的這場罪惡活動中，這一事實決不能減輕這場活動的反革命本質”。“2、在毛澤東同志領導下的前委同階級敵人作堅決鬥爭的方針基本上是正确的。這種同革命敵人毫不妥協地作鬥爭的方針應該在今後貫徹下去。”^②

遠東局要求立即解散永陽的省行委，20軍回到軍部指揮之下，否則武力解決：“逃跑的永陽省委作為這次反革命活動的領導者應該立即解散，其活動應該停止。對它不聽從這種要求的行為必須用毫不留情的符合革命利益的鬥爭進行回擊”。“現在的20軍領導應該使全軍返回紅軍並絕對執行總部的一切命令。不履行這一(要求)將會引起同該軍的殘酷武裝鬥爭”。“革命軍事委員會應該採取一切必要措施，把20軍重新置於自己的控制之下，不允許我們的其他軍事部隊將來再發生這樣的事情。”^③

從紅軍權力結構的角度，遠東局強調紅軍必須集中權力，公開批評上級是不允許的：“20軍暴動的慘痛經驗使我們不得不認為，並不是軍隊中的所有黨組織都領會了中央和全黨賦予它們的使命”。“軍隊黨組織的基本任務是維護紅軍部隊的革命紀律和戰鬥力”，“每個黨員和共青團員的首要的和基本的任務是執行由上級機關任命的指揮員和政委的命令”。“不執行命令、批評作戰命令和計畫、批評最高指揮員的策略是絕對

①《中央給第一方面軍總前委，江西省委，各特委，各地方黨部的信》(1931年2月23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7)，第141頁。

②《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關於富田事變的決定》(1931年3月18日於上海)，《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10)，第175-176頁。

③《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關於富田事變的決定》(1931年3月18日於上海)，《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10)，第177頁。

不允許的”，“公開批評(在會議上、用公開信等)紅軍指揮部的作戰計畫和命令是不允許的，即使在紅軍以外的黨組織(即在非軍事黨組織)內也不允許。”^①

從黨的組織體系角度，遠東局強調決不允許通過分裂紅軍來解決黨內分歧，武裝反抗上級必須受到最嚴厲懲罰：“十二月事變表明，受反布爾什維克聯盟引誘和欺騙的20軍部分黨員認為，他們所發現的黨內分歧可以通過分裂軍隊來加以解決，所以走上了使20軍脫離紅軍部隊並同蘇維埃機構和其他紅軍部隊進行武裝鬥爭的道路”。“必須毫不含糊地宣佈，任何黨內分歧，無論是關於紅軍問題的還是關於我們的一般經濟、土地和組織政策問題的分歧，都決不應引起不僅是軍隊的分裂，更不要說脫離，而且還不應造成拒絕執行最高軍事指揮部指令的行為和軍隊紀律的下降。對於我們的黨員拒絕履行這種起碼的義務的行為，作出的反應應該是實行最嚴厲的懲罰。”^②

遠東局關於富田事變的決議深入闡發了“黨指揮槍”的原則，對中共軍隊建設影響非常深遠。中共中央政治局也在3月28日做出關於富田事變的決議，其內容與3月18日遠東局決議基本一樣，從這裡也可以看出六屆四中全會以後中共中央對共產國際的態度。^③

(三)中央代表團到達，新中央局推動肅反再度升溫

1931年4月，中央代表團到達蘇區中央局所在地寧都縣青塘，傳達了遠東局和中共中央的決定，任弼時等推翻了項英主持通過的富田事變決議，組成了新的中央局。新中央局認為：“中央局關於富田事變的解決，也是錯誤的。中央局的通告說：‘不能肯定富田事變是AB團取消派的暴

①《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關於富田事變的決定》(1931年3月18日於上海)，《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10)，第178頁。

②《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關於富田事變的決定》(1931年3月18日於上海)，《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10)，第178-179頁。

③《中央政治局關於富田事變的決議》(1931年3月28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7)，第203-209頁。

動’，又說：‘富田事變是由黨內無原則派別糾紛演進而成的’，這是模糊了富田事變的反革命性，沒有認清富田事變是AB團領導的，立三路線的一部分擁護者的參加的反革命暴動，而用‘黨內派別鬥爭’來解釋這個事變。這種解釋是非常錯誤的，脫離階級立場的，這種解釋是放鬆了反AB團的鬥爭，使AB團能夠在這種錯誤的解決之下，能繼續活動，繼續發展他們的組織，所以中央局的決定不僅是錯誤的，而且是非常危險。”^①

據曾山回憶：項英“責成曾炳春同志親自到河西永新蘇區去把二十軍帶過河東來，並隨帶中央局指示，通知贛西特委負責人和參加富田事變的領導人過江來蘇區中央局開會。他們以為富田事變僅僅是黨內鬥爭，並且認為他們可以得勝，同時更錯誤地估計項英同志是支持他們的。所以，除段良弼做賊心虛，拐了大批現款，藉口到上海黨中央去告毛澤東同志而逃走以外，其他人都過河東蘇區來了。王懷同志也來了。這時，江西省蘇維埃政府正在蘇區中央局領導下舉行各縣蘇維埃聯席會議”，“聯席會議決定首先把富田事變頭子劉敵執行槍決，然後進行公審富田事變的幾個頭子謝漢昌、李白芳等。由周以栗同志主持公審，各縣都派有代表參加，我也參加了。在公審中，毫無逼供現象，被審的人完全可以自由自在地談他自己的意見。他們不承認是反革命組織，而肯定是一個反毛團的組織。”^②

富田事變的主要參與者最後基本都被處決了。郭化若說：“我當時是肅反委員會秘書長。我記得第二次反‘圍剿’後，抓到李文林。我參加了審問。李文林說：‘你們不要動刑。我不是AB團分子。我在上海彙報時見過陳獨秀，我是陳獨秀單派的。’審問後，我向毛澤東同志作了彙報。根據他的口供，看來不是AB團，於是把他放了。以後王明路線搞肅反擴大化時還是把他殺了”。“我又把叢允中抓來，這回沒動刑，只是向他交待政策，並用了‘誘供’（比‘逼供’更厲害）。這樣，他自編了一些謊話，我們信

^①《中共蘇區中央局擴大會議決議第一號——關於接受國際來信及四中全會決議》（1931年4月），總政治部辦公廳編：《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歷史資料選編》第一冊，第695-696頁。

^②曾山：《贛西南蘇維埃時期革命鬥爭歷史的回憶》，《回憶中央蘇區》，第20頁。

以為真，就把他殺了”。“劉敵回來後，總部開庭審問他。那時主持審問的是朱德同志和董必武同志。審問時，要劉敵說出‘為什麼要把部隊帶到河西去’。他招認是AB團。於是把他殺了。”^①

1931年春夏，國民黨連續發動第二次、第三次“圍剿”，幾十萬敵軍深入到蘇區腹地，形勢極為險惡，蘇區面臨生死存亡的考驗。為鞏固爭政權，新中央局再次強化肅反，似乎沒有接受前一年肅反擴大化的教訓，沒有考慮到肅反在農村落後環境中可能導致的失控。吳德峰的肅反工作報告提到：“在三次戰爭前後，把AB團擴大到無以復加，如各機關打了一次AB團大部被捕後，從他處調一部分人來，不久又被供為AB團而全部被扣留（如郵政局）”。“當時把AB團的力量估計得太大，看得太神秘，以致弄得腳忙手亂。對消極怠工分子，不採取教育的方式，提高他的積極性，不考察他消極的來源，一律認為這些分子都是AB團，有計劃的來搗鬼，如夜間說夢話，不挑禾草，不去開會（勝利縣），因家中有困難不願意出席全蘇會（興國）等認為是AB團而被扣。因之造成動輒得咎的形勢，弄得人人自危噤若寒蟬”。“打AB團最激烈的時候，兩人談話，都可被疑為AB團，所以彼時的黨團員如果沒有上級來人參加，都不敢開會。在三次戰爭中，省保衛處有一個奇怪的意見，就是認為富農全體有被認為AB團的可能，提出把富農完全扣留起來，候戰爭結束後，再審查釋放，甚至於公開的說，寧肯殺錯一百，不肯放過一個”。^②

在這一時期，肅反機構成了超黨超政府的無上權威的獨裁機構，肅反成了一切工作的中心。“因為對AB團估量過分，所以當時一切機關都認為打AB團是中心、最中心的任務，把一切工作停頓起來，用全力去打AB團”。“省保衛處自認為是代表黨、代表政府的，一切問題獨斷獨行，形成一個超黨超政權的組織”，“更有憑藉肅反權利而實行其假公濟私的，如零北區有一個村肅反委員與一苦力爭野老婆，將苦力捉來說他是AB團用嚴刑

^① 郭化若：《回憶第一次反“圍剿”期間的有關史實》，《回憶中央蘇區》，第141-142頁。

^② 吳德峰：《江西蘇區中共省委工作總結報告（續二）~肅反工作》（1932年5月），《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上冊），第479-480頁。

拷打”。^①

這一輪肅反深入波及到地方，當時地方幹部普遍文化水平不高，作風粗糙強硬，加上戰爭環境的緊張殘酷，刑訊逼供再次成為主要手段，指名問供、草率處決普遍存在。吳德峰在報告中提到：“所有 AB 團的破獲完全是根據犯人的口供去破獲的，並沒有耐心去考查犯人的口供和搜查旁證，審犯人的技術，全靠刑審”。“犯人招供的，必須要他工作一級的反革命的反革命組織完全招出”，“犯人不(得不)在各機關捉熟人誣供，沒有熟人的，則看見過某機關袖章上人名的，即據以招供，所以在當時所有工作人員在袖章上不是把名字塗去，就是把他放在袋子裡面，有許多被供人與供他的人對質時，彼此都不認識的(如勝利縣)”，“甚至有開一名單——向犯人提問的，有用暗示的方法，要犯人招供的”。“凡被兩個犯人以上供出的人，不論事實是否符合，更不耐心去另找旁證證明招出的口供忠實與否，即將被供人拘來(如零北區像這樣拘捕共計不下千餘人，各縣大都如是)，依樣葫蘆的來審訊，尤有怪者，在三次戰爭劇烈之時，天天在行動中，而拘捕之人犯，又多無時間來審訊，於是把拘捕的人犯或被 AB 團供有組織的機關內工作人員站隊點名，詢問，如承認加入 AB 團的，即允許自首自新，不承認的即認為是 AB 團堅決分子處以死刑(省保衛處處置一次整個保衛隊，就是這個辦法)。”^②

1931 年夏天第三次反圍剿戰爭後期，中央覺察到肅反簡單化和擴大化的危害，8 月 30 日發出給蘇區指示信：“中央肯定反 AB 團的鬥爭是絕對正確而必要的”，“但不是每一個地主殘餘或富農分子便一定是 AB 團”。“農民中的落後意識，群眾中黨員中的不滿情緒和腐化現象，常常被 AB 團拿來利用，但不是每一個黨的錯誤路線執行者和擁護者，每一個落後的農民，每一個犯有錯誤傾向或行動的黨員或群眾便一定是 AB 團”。“你們對

^① 吳德峰：《江西蘇區中共省委工作總結報告(續二)~肅反工作》(1932 年 5 月)，《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上冊)，第 480-481 頁。

^② 吳德峰：《江西蘇區中共省委工作總結報告(續二)~肅反工作》1932 年 5 月，《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上冊)，第 477-479 頁。

AB團的鬥爭一方面是將他簡單化了”。“另一方面你們又將AB團擴大化了”，“過分誇大敵人的破壞力量與減弱我們自己階級的堅信心，這是有危害的。”^①

(四)閩西蘇區肅社會民主黨

在遠東局和中央強化肅反政策的影響下，閩西也很快肅出了所謂“社會民主黨”。1930年12月，鄧發、左權、肖勁光等先後到達閩西，在坑口召開黨代表會議，成立閩粵贛省委，鄧發擔任閩粵贛特委書記，左權任十二軍軍長、肖勁光為參謀長。這些中央派來的幹部執掌軍政大權後，積極貫徹中央路線，12月閩粵贛代表大會把傅柏翠開除黨籍，是閩西肅反的先聲。

事實上，傅柏翠參加革命確實有些勉強，他在政治上是改良主義者，對中共激烈的階級鬥爭政策並不認同，最初因為與陳祖康、羅明是好朋友被拉入黨，陳祖康叛變、羅明調走以後，他越來越表現出脫離中共的趨向。上杭北四區完全是傅柏翠的勢力範圍，他被開除黨籍後，一個月的時間內，“上杭北四區二百多黨員在傅柏翠的領導底下，全體退出黨籍，區委支部宣佈取消”，“區鄉蘇維埃宣佈取消，另行成立農民聯合會”，還提出了“土地、和平、自由三大要求”。^②

閩西肅反大致從1931年2月開始，在閩粵贛特委書記鄧發和閩西蘇區裁判部長林一株的推動下，很快擴大化。3月中央已經得到報告，其中提到傅柏翠以社會民主黨的名義活動。“以傅伯翠為首的主力已經脫離12軍。傅伯翠是福建的農民領袖，地主的兒子。他現在正在我區招募部隊同我們作鬥爭”，“他們拼湊了所謂的‘新共產黨’。工作常常是以社會民主黨的名義進行的”。“反對我們的第一次暴動是在廣州起義周年日之際

①《中央給蘇區中央局並紅軍總前委的指示信》(1931年8月30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7)，第372-374頁。

②《中共閩粵贛特委給羅明的信》(1931年1月30日)，《閩粵贛革命歷史文件彙集》(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一年)，中央檔案館1984年，第27頁。

在傅伯翠的領導下進行的。此後又發生過另外幾次騷亂”。王稼祥和任弼時到達當地的那天，剛好發生了一次暴動。“傅伯翠的人奪走了10條槍，解除了警衛的武裝，還拿走了錢和食品。他們尋找黨的書記和司令部長官，打算把他們殺死”。“在鄉村貧農中作口頭宣傳時，傅伯翠的人使用了這樣的口號：‘你們為蘇維埃政權奮鬥了三年。現在你們沒吃沒穿。這是給你們的錢，拿去吧，給自己買點吃的穿的。’他們把錢散發給窮人。”^①

中央代表團對閩西肅反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3月15日到達永定虎崗與閩粵贛特委會合，正碰上閩西黨與傅伯翠的衝突。三人在3月23日給中央的信中說：“十二軍內的許多政治工作人員，以及紅軍黨的中級幹部，各級蘇維埃政府機關負責的”都是社會民主黨，“我們認為這次特委破獲社黨一般是對的，所捕人都是根據三個至五個人的口供而實行逮捕的，許多與抄出的名單是相符合。被捕的大多數，並未經拷打”。“我們是主張採取嚴厲的制裁。一切加入社黨而負有責任的”，“一切加入社黨而在黨團、政府及工會、紅軍中負責的，均實行槍決”。“現在的情形很嚴重，然在鄧發來後，總算某部分工作中是有進步的”，“尤其是最後社會民主黨的破獲等，這都算是進步的工作”。^②

鄧發得到中央代表團的支援後，肅反更加堅決，在黨、政、軍系統中一批又一批地破獲了所謂“社會民主黨分子”，地方黨組織損失慘重。5月27日，杭武縣東五區發生武力反抗的坑口事變，很快遭到嚴厲鎮壓。閩粵贛省委7月15日工作報告稱：“永定的黨一貫來受社會民主黨的把持”，“龍岩的社黨，十一次破獲他們的縣委”，“龍岩黨大部分是社黨，負責人大部分是社黨負責人”，“龍岩二千的黨員現在只剩二百，一千的團員現在只剩二十餘人了”。“杭武縣委也只剩下一個書記（還是我們派去的），其餘的人員也沒有”。“汀連的縣委及各機關，在最近的半月來也破獲了大批的社

①《雷利斯基同周恩來、張國燾和向忠發談話記錄》（1931年3月27日於上海），《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10），第184頁。

②《家、弼、霖自閩粵贛蘇區來信》（1931年3月23日），《閩粵贛革命歷史文件彙集》（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一年），第72-76頁。

黨，縣委書記外，全體是社黨，縣蘇主席、肅委主席、軍委主席也是社黨，各群眾團體也是社黨把持”。“我們在六月總共槍決了八百二十四個社黨，入模範監獄的有二百六十六人，釋放的有一百人，半年來所扣留的社黨不下四千人（整個閩西），槍決的也不下二千人了”。^①中央巡視員8月3日的報告更為驚人：“據新從那邊來的同志的談話，現在被我們捕殺的已有三千人，拘禁的仍不算”。^②

中央逐漸對肅反擴大化有所警覺，8月29日寫信提醒閩西黨組織：“中央認為你們堅決反對社會黨是對的，但你們對社會黨的認識和處置是不夠而且有許多的錯誤：第一，你們把蘇區內部的階級鬥爭和肅反工作的對象只認為是社會民主黨（從你們的文件和工作中可以看得出），這顯然是把複雜出問題簡單化了”，“你們把社會黨組織看著無微不入神妙不可測了”。“第二，因為你們把蘇區一切不好的現象都只看作社會黨的作用，所以蘇區的黨，團，蘇維埃以及種種群眾組織，在實際工作中的錯誤和缺點，都就不能得到正確的仔細的檢閱和糾正，自然亦就不能發展真正的自我批評。”^③

雖然7月鄧發去江西擔任中央局委員，但閩西肅反至少持續到9月。中央巡視員余澤鴻在8月31日給中央的信中提到：“此間昨日開群眾大會紀念彭楊，白沙到近二千人，我參加。下午槍決社黨二十餘人，我也打了兩個，痛快！”“政治保衛處林一株（是副處長），最近發現是社黨特委書記，最近扣留，我也去拷問的，他已承認，說出許多材料”。^④在中央的幹預下，羅明、郭滴人等開始糾正肅反擴大化，林一株9月被以社會民主黨罪名處決，標誌著肅反基本結束。閩西肅反殺了三千人左右，結果是“幹部的缺

①《中共閩粵贛省委報告第十三號》（1931年7月15日），《閩粵贛革命歷史文件彙集》（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一年），第226-232頁。

②《中央巡視員巡視福建情況報告》（1931年8月3日），《福建革命歷史文件彙集》（7），第326頁。

③《中央致閩粵贛蘇區省委的信》（1931年8月29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7），第350頁。

④《中央巡視員餘澤鴻自閩粵贛蘇區給中央的信》（1931年8月31日），《閩粵贛革命歷史文件彙集》（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一年），第290頁。

乏真是萬分困難，過去縣委縣蘇的負責人，現在留下不上十分之一，區委區蘇的負責人，至多也留不上十之三”。^①

1931年底周恩來經過閩西蘇區，實地瞭解到肅反擴大化的嚴重後果，12月18日給中央政治局寫了一封很沉痛的信。信中說：“我入蘇區雖只三日，但沿途所經，已見到閩西解決社黨所得的惡果是非常嚴重的”，“現在許多群眾不敢與共黨接近，恐怕結果又是社黨。究竟社黨與共黨之別在哪裡，何種情形方可算罪，群眾簡直答不出。擴大紅軍，說群眾不積極，十二軍團長團政治委員親口對我說閩西群眾不好，而他們一下子便拘捕五六十人（在一百人之中全都是農民而且多是貧農），給以嚴刑（只據別人一點口供，還說不打不招，等審問清白，連釋放都難，因為身體已傷），對群眾將成如何影響！這樣無怪現在擴大紅軍之遇到最大的困難了”。^②

中央1932年1月21日致信閩西省委，嚴厲批評閩西黨在肅反中捕殺大量工農，犯了嚴重政治錯誤：“中央認為閩西黨目前最大的任務是在同肅反中的嚴重錯誤做最堅決的鬥爭。黨要絕對禁止對於沒有確切的反革命證據的工農分子實行逮捕，嚴刑拷打與殺戮”。“難道在一個支部內因為書記或其他少數分子是社黨，所以能以此證明其他的同志都是社黨，以致要逮捕整個支部的同志，而加以嚴刑拷打嗎？”“我們黨的力量是建築在群眾對於黨的信仰與擁護上，而絕對不是建築在我們的槍桿子上。恐怖政策，絕對不能消滅蘇區內部的反革命。卻正相反，恐怖政策的繼續，正是在替反革命分子造成良好的環境！”^③

中央局的建立本來是要在蘇區加強統一領導、解決紛爭的，但是由於遠東局和中共中央做出了嚴厲的決議，同時從上海來的領導人並不熟悉

①《中共閩粵贛省委報告第十四號》（1931年8月20日），《閩粵贛革命歷史文件彙集》（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一年），第250頁。

②《糾正肅反中的嚴重錯誤——周恩來給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1931年12月18日），總政治部辦公廳編：《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歷史資料選編》第一冊，第835頁。

③《中央為肅反問題致閩西省委信》（1932年1月21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8），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3-64頁。

農村環境，也沒有充分吸收原來蘇區肅反的經驗和教訓。結果在1930年肅反剛剛造成重大損失的情況下，中央蘇區肅反在1931年又很快重蹈覆轍，再次出現嚴重的擴大化，不得不再次糾正。可見，執掌政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常常是要付出很大的代價之後，才能逐漸取得一點進步，慢慢學會建立有效的政治秩序。

四、小結

中央蘇區是中共最重要的根據地，它是由毛澤東的隊伍、朱德的隊伍、彭德懷的隊伍、李文林的隊伍等許多獨立活動的紅軍共同開闢出來的。隨著蘇區的發展，獨立活動的小隊伍開始整編成統一指揮的大隊伍。各支部隊在走向集中統一指揮的過程中，不斷在融合中發生紛爭，也不斷在紛爭中走向融合。

1930年，蘇區和紅軍都獲得重大發展，但毛澤東與贛西南領導人的矛盾也日趨尖銳，在立三路線支持下，李文林為書記的江西總行委與毛澤東的總前委在政治、軍事方針上都有重大分歧。國民黨中原大戰結束，開始調集重兵準備進攻蘇區，紅一方面軍和中央蘇區面臨空前嚴重的威脅。毛澤東提出“誘敵深入”的方針，艱難說服了紅軍中的不同意見，但遭到李文林等江西行委幹部的質疑和反對。紅軍攻佔吉安後繳獲了一些敵人間諜的材料，引起毛澤東的警覺，認為有反革命分子打入紅軍和蘇區內部，於是發動了大規模肅反。

肅反發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肅反過程中發生了嚴重的擴大化，這和當時革命隊伍生長於野蠻環境，多數幹部戰士文化不高、思維簡單粗暴有很大關係。1930年12月初的黃陂肅反演變成紅軍歷史上一場大災難，刑訊逼供盛行一時，紅一方面軍30000多人的隊伍，竟有4400人被捕，被殺的人數難以有精確的統計，粗略估計達到2000人左右，造成了嚴重損失，並引發了富田事變。

遠東局和中共中央關於富田事變的決議深入闡釋了“黨指揮槍”的

原則，影響深遠。決議認為，集中的權力結構是布爾什維克組織的力量來源，雖然毛澤東領導的肅反有些過火，但富田事變武裝反抗上級更加不可容忍，黨內分歧絕不可以用分裂紅軍的軍事手段解決。項英初建中央局時蘇區肅反有所緩和，但中央代表團到達後，新蘇區中央局再次推動大規模肅反，並深入波及整個蘇區，閩西肅反短短幾個月竟然殺了3000多人，這是指上級領導的集中肅反，在各地基層群眾性肅反中被殺的人數就很難統計了，蘇區中央局建立初期就在肅反問題上出現了較大的偏差。

在殘酷戰爭中，中共既要通過肅反來鞏固蘇區和紅軍，又要避免肅反擴大化的嚴重後果，不得不在兩難之中尋找平衡。在付出了高昂代價之後，中央蘇區和紅軍才逐漸建立起高度集中統一的組織結構。從蘇聯經驗出發，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認為肅反是蘇區建立政權的必要手段，強調“站在鞏固蘇維埃政權的觀點上，各蘇區應厲行肅清反革命的工作”，“應該注意政權內部政府機關中，紅軍赤衛隊中，工農勞動團體中，文化教育經濟機關中，甚至共產黨青年團中有無階級的敵人反革命的偵探暗藏在內，有無進行破壞政權破壞黨尤其是破壞紅軍的陰謀和組織”。“各蘇區在革命勝利的第一秒鐘便應有肅清反革命委員會的組織，施行對反革命的鎮壓，同時就要逐漸的開始籌備並建立自上而下有系統的、經常的、政治保衛局的組織和工作”。“肅反委員會要隨著它自己工作的深入與有系統，逐漸開始政治機關中紅軍中各級‘政治保衛局’的建立”。^①

相對於精密細緻的現代工業社會，傳統農業社會比較簡單，成長於農村環境的中共幹部不免作風簡單粗糙。他們在戰場上勇猛無畏，但並不擅長反間諜這種精細工作，同時緊張殘酷的戰爭環境中也不可能詳細調查案情，結果每次大規模肅反都走向失控，造成巨大損失。中國共產黨人追求最新的政治理想，但是他們卻不得不在偏遠落後的農村建立基

^①《中央政治局關於蘇維埃區域目前工作計畫》(1930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6)，第440-442頁。

地,而且長期處於弱勢地位,時刻面對關乎生死存亡的戰爭,在鞏固政權、建立政治秩序的過程中遇到了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難。我們在探索這段歷史的時候,只有努力深入到當時的情境當中,才能獲得比較全面確切的理解。

第八章

中央蘇區集中體制的全面建立

中共中央逐步遷入蘇區，標誌著中國革命重心從城市轉移到農村。1931年1月蘇區中央局成立，11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正式建立了與國民黨南京政府分庭抗禮的國家政權。蘇區政權的控制和動員能力是非常驚人的，其中肅反和政治保衛制度發揮了很大作用，這是中共在力量懸殊的反圍剿戰爭中，能以小小蘇區對抗重兵圍攻數年之久的重要原因。

中央領導機構的權力集中趨勢也很明顯。在中共中央進入蘇區以前，毛澤東在蘇區集中權力的努力得到了中央的支持，但是隨著中央領導人分批到來，他們和毛澤東產生了分歧。毛澤東對自己的能力和經驗非常自信，認為新來的領導人經驗不足，在一系列衝突之後，他在寧都會議上被取消了軍事指揮權。博古和李德相繼進入蘇區之後，這兩個經驗不足的年輕人依靠共產國際的信任執掌了蘇區領導權。中共建立了控制動員能力超強的集中體制，但在頂端掌握最高權力的卻是不合格的領導人，這給中國革命前途帶來重大危機。

一、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建立集中政治保衛制度

(一)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政治保衛局系統

中央蘇區初期的肅反及富田事變帶有一定偶然性，隨著政治保衛機構逐步建立，政治監督成為系統性和制度性的日常工作，蘇區的政治氣氛趨於嚴肅，紅軍和蘇區早期寬鬆的民主氣氛逐漸消失。1931年6月《中央

給紅軍黨部及各級地方黨部的訓令》要求：“蘇區內部肅清反革命的工作，必須變成經常性的系統工作，必須立即在各蘇區成立起‘政治保衛處’專門組織”。^①

1931年11月，蘇區黨和全國代表大會接連召開，宣佈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黨代表大會決議肯定了肅反是偉大勝利，同時也批評了肅反擴大化和肅反中心論，是一個相對平衡的決議，預示著政治保衛制度向正規化發展：“大會完全同意中央和中央局擴大會對富田事變的決議：富田事變是AB團反革命的暴動。當時黨的領導機關對於這個事變的處置方法是完全正確的”。“但是在肅反工作中仍舊有很大的錯誤”，“把一切反動分子，一切不滿分子，一切犯了錯誤的人都當做AB團看待”，“黨內生活與群眾政治生活落入非常狀態。這是把反AB團的鬥爭簡單化了，並且過分估量AB團的力量，輕視革命力量，因此發生恐怖，而把AB團擴大化了，並且在處理AB團時未能每次都把領袖與被欺騙被威脅的分子分別開來。這一切錯誤形成了一種非常錯誤非常有害的‘肅反中心論’”。“肅反的專門組織不健全，破獲反動的工作不能成為一種專門的特殊工作”，“這一切都是極嚴重的錯誤。”^②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後，把制止肅反擴大化、建立秩序作為當務之急。中央執行委員會在12月13日第六號訓令中提出：“臨時中央政府成立，蘇維埃政權已經得到了更進一步的鞏固，在這個時候蘇區中有一件急於要做的事，就是建立革命秩序，保障群眾的權利”。訓令規定：“一切反革命的案件，都歸國家政治保衛局去偵查逮捕”，然後向國家司法機關（法院或裁判部）提起訴訟，由司法機關判決。縣級司法機關沒有判決死刑的權力，省級司法機關判決死刑之後，被告人也可以向中央司法機關上訴。訓令還特別規定，除了建立蘇維埃不滿六個月的新區，地方蘇維埃政府不

^①《中央給紅軍黨部及各級地方黨部的訓令》（1931年6月10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7），第303頁。

^②中央蘇區第一次代表大會《政治決議案》（1931年11月），《中共中央文件選集》（7），第450、456-457頁。

得擅自逮捕反革命嫌疑犯，發現情況只能報告當地政治保衛局。^①

地方幹部是蘇區肅反中出現嚴重擴大化的重要因素，六號訓令嚴格限制地方的肅反權力，就是為了制止地方上亂抓人、亂殺人的現象。當時蘇區地方幹部大都是工農出身，革命立場堅決，但文化程度很低，多半不識字，沒有管理經驗，作風簡單粗暴，“對上級的命令和文件，多半不能瞭解，也就不能執行”，受到批評就說：“我是工農，我也不曉”。1932年3月《人民委員會命令第六號》專門規定：“每一區、縣、省蘇都要設識字班，所有的委員和工作人員，都要強迫他們努力識字”。^②“強迫識字”的效果畢竟有限，當時受過教育的大都出身于地主富農等敵對階級，革命政權不得不大量提拔思維簡單粗糙的工農幹部，這樣的執政條件在很長的歷史時期都帶來了負面影響，而在蘇區肅反中這個問題造成的損失尤其嚴重。

新建立的政治保衛局系統集中了蘇區的肅反大權。國家政治保衛局局長是鄧發，偵察部長錢壯飛，執行部長李克農，預審科長胡底，秘書長歐陽毅，總務處長雷經天，保衛大隊長吳烈。^③1932年1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政治保衛局組織綱要》規定：“國家政治保衛局的任務，在以其集權的系統組織與革命群眾的信賴和說明，經常的系統的執行檢舉和消滅一切公開的尤其是秘密的暗藏的反革命的組織和行動，以保衛和鞏固蘇維埃政權”。“新的蘇區一般的都要經過肅反委員會的工作階段。在肅反委員會存在的地方，國家政治保衛局應與其發生系統上的管轄關係，且要逐漸轉變其成為政治保衛局的下級組織。”^④政治保衛局向各級政府和軍隊派出特派員，特派員是公開的，“以便各革命團級與群眾告密”。^⑤

①《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訓令第六號》（1931年12月13日），《紅色中華》1931年12月28日。

②《人民委員會訓令第六號》，《紅色中華》1932年3月2日。

③《歐陽毅回憶錄》，中共黨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126頁。

④《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政治保衛局組織綱要》（1932年1月27日），總政治部辦公廳編：《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歷史資料選編》第二冊，第16頁。

⑤《國家政治保衛局訓令》（1932年1月29日），《中央革命根據地歷史資料文庫——政權系統》（6），第171頁。

政治保衛局的組織原則是高度集中，垂直領導，無論是紅軍還是地方政府都無權干涉。“國家政治保衛局的組織原則，是完全集權的”。“國家政治保衛局的上下級關係，除了特別障礙以外，是一貫的垂直系統，下級對上級的命令須絕對服從”。各分局各特派員、分局長“工作的關係上絕對隸屬於國家政治保衛局。地方政府及紅軍指揮機關無權改變或停止國家政治保衛局的命令，如有抗議只能提到人民委員會解決。”^①在這種垂直制度下，即使在權力集中的軍隊裡，領導人也難以保護自己的部下。當時“軍團這一級設立保衛局，作為同政治部平行的機構。師以下設特派員。保衛部門實行垂直領導，即特派員受上級保衛部門領導，而不受同級政治機關領導”。二十二師政治部主任劉道生發現政治部的秘書長、宣傳部長、師直總支書記都被特派員抓起來了，又沒有什麼證據，但也只能對特派員說：“如果你堅持要殺，我們也可以向上級反映”。^②特派員擁有讓人畏懼的權力，以至於紅軍中流傳著這樣的順口溜：“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特派員來談話”。^③

紅軍中政治保衛人員和軍政領導發生了很多矛盾，軍委不得不於1933年2月1日發佈訓令，強調權力邊界：“如犯軍事紀律者而同時又為反革命犯，則處罰其犯軍事紀律之權屬於軍事指揮員及政治委員，而處理其反革命犯事宜概歸政治保衛局。這一切必須分別清楚，不得混亂。”^④軍委2月9日訓令則強調保衛系統的獨立性：“在紅軍中的特派員是保衛局在紅軍中活動的一個基本單位，他所擔負著的任務是極其重大”。“六十一團不經過保衛局組織上的允許，擅自調動特派員工作，這是在組織上破壞保衛局建制的錯誤”，“必須保持保衛局的獨立性，保持保衛局一貫的垂直系統”。“各部紅軍軍政首長，應該尊重特派員許可權，並尊重保衛局的組織

①《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政治保衛局組織綱要》（1932年1月27日），總政治部辦公廳編：《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歷史資料選編》第二冊，第16-17頁。

②羅東進：《我的父親羅榮桓》，遼寧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9頁。

③《楊得志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第115頁。

④《中革軍委、總政治部關於明確紅軍中國家政治保衛局及特派員的許可權的訓令》（1933年2月1日），總政治部辦公廳編：《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歷史資料選編》第二冊，第322頁。

系統”。“保衛分局及特派員行使職權時，如逮捕、拘留乃至審訊、制裁等問題，同級軍政首長應完全尊重分局及特派員的意見，如不同意，只能向上級陳述，而不能妨害分局長及特派員行使職權”。^①

江西政治保衛局吳德峰的報告詳細回顧了省級政治保衛機構的建立過程。1930年11月攻下吉安後，省及各縣都成立了肅反委員會。三次反圍剿戰爭中，省肅反委員會於1931年7月改為省保衛處，公略、永豐、萬泰等縣也改為政治保衛處，“興國、贛縣、雩都等縣，仍為肅反委員會，其他各縣尚未成立肅反機關”，“組織系統未經統一，省保衛處亦未積極去領導和指示下級的工作，關係上不密切，形成各自為政的獨立機關”。在這種情況下，地方上很容易出現亂殺人現象，“拘捕之反革命分子先後由各縣保衛處或肅反委員會審判處置”，“表上所列的數目是有冊可稽的，如省保衛處處決兩次整個的保衛隊，完全沒有登記，各縣處置人犯，亦沒有完全登記，如公略縣報告處決的人數，據調查所得，東固一區也不止此數”。三次反圍剿時，許多縣丟失了處置犯人記錄，“各縣聯席會議時各局長口頭報告，各縣處死刑估計在有冊可稽的一倍以上。”^②

江西省政治保衛處於1932年1月1日改為政治保衛局江西省分局，下設四科：第一、二科科長吳德峰，第三科科長李克農，第四科科長周興，“旋因周興過去有助長李韶九錯誤的事實，由總支決定留黨察看，並停止其工作”。“二月中接到中央政府國家保衛局的組織綱要，依照組織法將內部改組，吳德峰兼任偵察部，李克農擔任執行部。四月底李克農調去中央局，兩部由吳德峰一人兼辦”。“省保衛局委員會由李富春、陳毅、吳德峰三人組織之，除常事務外，一切行政、組織、審判，都由委員會通過執行”。保衛隊有士兵70名，其中貧農58%、工人24%、雇農13%、中農5%。各縣也陸續建立起政治保衛局，局長大多選擇貧農出身的幹部擔任，縣以下各區設

①《中革軍委、總政治部、國家政治保衛局訓令》（1933年2月9日），總政治部辦公廳編：《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歷史資料選編》第二冊，第328-329頁。

②吳德峰：《江西蘇區中共省委工作總結報告（續二）~肅反工作》（1932年5月），《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上），第476-477頁。

特派員。^①

(二)政治氣氛出現四個月緩和期(1931年12月——1932年3月)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後，政治保衛機構逐漸正規化，政治監督成為日常工作，疾風暴雨式的群眾性肅反告一段落，政治氣氛在1931年12月至1932年3月之間出現了四個月的緩和時期。政治保衛局秘書長歐陽毅回憶：“我到國家政治保衛局的時候，大規模的肅反運動已近尾聲，正在糾偏。在周恩來的領導下，糾正肅反的擴大化、簡單化傾向。我們雖然仍然擔負著肅清革命的任務，但非常強調政策，要重證據，嚴格禁止逼供信。殺一個真正的罪犯，要層層上報，最後經過黨中央批准。濫捕濫殺現象得到遏制”。^②

據江西省的報告：“在蘇大會後，十二、一、二、三幾個月中”，“擴大化簡單化的錯誤，逐漸走到停頓狀況，群眾看見過去所謂AB團的分子，一批一批允許自新自首了，甚至豪紳地主富農也快些出來了”，於是群眾認為工農分子加入AB團都不要緊，“不捉不打不殺”，看見富農豪紳因無證據也有釋放出來的，認為“不肅反了”、“現在不要殺人了”。根據中央政府的訓令，區鄉政府不能隨便拘捕人犯，區鄉幹部及群眾認為“不要捉人了”、“群眾無權了”。^③

蘇區中央局書記周恩來1931年底到達蘇區後，為糾正肅反擴大化做出了努力。在緩和的形勢下，中央局為了爭取人心、減少恐怖氣氛，公開處分了對肅反擴大化負有直接責任的李韶九，而對負有領導責任的毛澤東只作了不點名批評。1932年1月《關於處罰李韶九同志過去錯誤的決議》認為：“李韶九同志在肅反工作中所做的嚴重錯誤一般的是在黨當時

① 吳德峰：《江西蘇區中共省委工作總結報告（續二）~肅反工作》（1932年5月），《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上），第481頁。

② 《歐陽毅回憶錄》，第127頁。

③ 《江西蘇區中共省委工作總結報告（續二）~肅反工作》補充（1932年5月），《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上），第487-488頁。

錯誤的領導之下造成的，而他加以擴大，甚至違背上級的決定去獨斷獨行以致形成極錯誤的肅反中心論”。“中央局決定予李韶九同志以留黨察看六個月的處分，派到下層去(做)群眾工作”。“過去黨的指導機關對於檢查黨員工作與生活這一任務完全忽視。這種錯誤就使像李韶九同志這樣犯有嚴重錯誤的人竟能繼續主持江西肅反工作至八九月之久”。^①

在幾個月緩和時期，政治保衛機構工作逐漸正規化。1932年3月《中央執行委員會檢查瑞金工作後的決議》提到：“過去的錯誤，如隨意捕人、偏信口供、使用肉刑等，已有大的轉變，並且對於過去政治犯在縣蘇已遵照第六號訓令正式開庭審判，革命秩序相當建立”。^②刑訊逼供的審問方法被廢除，政治保衛工作的重點是佈置工作網和清理積案。當時江西省的大部分積案是所謂“罰款犯”，也就是為籌款被抓起來的地主，可見初期的肅反委員會還有經濟職能。

吳德峰在報告中說：“省局在三月以前，大部分工作是幫助勝利、興國二縣清理政治積犯案。先後共清理了九百四十九案，幫助勝利縣清理罰款犯六百餘人，並將各縣罰款犯撥交縣蘇處理，因為過去政治犯罰款犯都是由保衛局處理的”。“工作網者，複已有相當的佈置，永豐、贛縣、興國、勝利已建立了一部分”，“五月二十八日將各縣偵探部長，調到省局授以技術”。“審訊犯人之刑審，在三月以後，完全廢除，審判技術，除寧都、雩都、樂安外，其餘各縣，均有相當的進步”。“截至五月止，省局及各縣審理反革命案件，統計一千二百四十案”。“省局及縣局審理犯人預審終結後，作成控訴書向省或縣蘇控訴，經裁判部審理判決，報告上級政府批准後執行。”^③

在和平建設氣氛中，政治保衛機構辦事程式制度化，不再輕易批准殺

①《關於處罰李韶九同志過去錯誤的決議》1932年1月25日，轉引自戴向青、羅惠蘭：《AB團與富田事變始末》，第210-211頁。

②《中央執行委員會檢查瑞金工作後的決議》(1932年3月29日)，《紅色中華》1932年4月6日。

③吳德峰：《江西蘇區中共省委工作總結報告(續二)~肅反工作》1932年5月，《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上)，第484頁。

人，處決犯人要經過嚴密的審查手續。據江西省報告：“蘇大會後的二三個月，中央政府的一切工作，帶著和平建設的傾向，而對肅反工作，也偏重于和平的建立革命秩序上。富田事變的重要AB團的首領經過五六月不殺，有些應該處死罪的反革命分子，卻很輕的處罰，地方上（如瑞金）所拘捕的反革命的豪紳地主、民團團總群眾恨之刺骨的，要求中央政府處決的，而中央政府卻以證據不足為詞，一個都不批准。”^①

在緩和時期，很多人避免了被錯殺的命運。曹金山回憶，1931年11月贛西南特委書記陳毅在於都縣說：“現在黨的政策好了，即使是‘AB團’分子，也准予自新自首，不會殺頭了”。陳毅“動員大家自報，是不是‘AB團’分子。這時會場沉默，鴉雀無聲，是有一個小時沒有人講話。在這種情況下，陳毅同志拿出筆記本來點名。點到了名字的，就站到天井裡，由武裝人員跟隨著。這樣，一共點到了幾十個人的名”。“這次也點到了我的名，搞得我思想很緊張，全身出汗。接著，當場提審，清楚一個就放一個。不一會，被扣押的人全部放了。所有口供也當場燒毀了”。陳毅說：“這個是‘AB團’，那個是‘AB團’，實際上的‘AB團’分子很少。我們要接受教訓。希望今後要慎重，再不要亂殺人了。”^②

這時紅軍中地主富農子弟或紀律不好的，一般是開除軍籍。軍委1932年2月訓令提到：“紅軍中對淘汰和開除紅軍太隨便了，許多人開除回到家鄉，或有些外省人不能回去，流落在邊區，地方黨部和政府只知是紅軍出來的，如何出來不知道。他們不能走出去，還是流（浪）在蘇區之內，甚至發生不滿的怨言，當了幾年紅軍，身經數十戰，結果如是，別人聽了也寒心，”^③這樣溫和的訓令大概只能出現在這四個月的緩和期。

① 《江西蘇區中共省委工作總結報告（續二）~肅反工作》補充（1932年5月），《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上），第488頁。

② 曹金山：《陳毅同志救了我》，《回憶中央蘇區》，第206-207頁。

③ 《中革軍委關於糾正擴紅工作中缺點的訓令》（1932年2月16日），總政治部辦公廳編：《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歷史資料選編》第二冊，第55頁。

(三)政治保衛再度強化,判決中強調階級意識

但是,政治保衛程序正規化與嚴酷的戰爭環境產生了矛盾。特別是在鬥爭尖銳的紅白交界邊區,地方幹部和群眾希望通過嚴厲政策震懾敵對分子,對限制很多的溫和肅反政策意見很大。蘇區北部邊緣廣昌附近的南廣縣委報告:“縣蘇裁判部單憑審問犯人來判決犯人,將許多要犯釋放出去,造成群眾中恐懼不敢報告而與反動勢力苟安的嚴重形勢。甘竹、長陂、大株等區的群眾為這一問題對政府不滿意”。^①

據江西省報告:“對於處決犯人,省政府保衛局核准的,還要待國家政府保衛局的審查,因為手續的繁重”,“一個要殺的反革命分子的批准要經過一二月。在四月以前,也未注意分別赤色腹地與邊區的形勢不同,而不瞭解在殘酷的革命戰爭環境,和群眾的階級仇恨,而偏講條文組織手續,因此反革命分子不能得到即時的處決,甚至有些地方(如零都、尋鄔),反革命的主要分子脫逃沖獄等事都發生”。“興國縣保衛局只憑犯人口供而將豪紳地主、民團團總釋放。邊區不能即時的處決反革命分子,而要等待上級的指示,違反群眾的意識,如是新發展區域群眾鬥爭還未起來的,看見了釋放豪紳地主出來,表示得更消沉,甚至不敢要地主的田,在老蘇區如興國龍沙區則表示對政府不滿,邊區群眾則憤於等待遂至走到群眾秘密的將反革命分子殺了,才報告政府”。省委聽到下層的意見後,“一方面將首要犯處決,將搗亂造謠的豪紳、地主、富農重新拘捕,一方面利用在各地處決首要,進行加緊肅反的群眾運動,動員群眾參加公審,舉行群眾大會來處決反革命分子”,“四月以後,對肅反工作的停頓,才有相當的轉變”。^②

1932年3月,蘇區中央局再次作出強化肅反的決議,強調“因為對

^①《中共南廣縣委給蘇區中央局的綜合報告》(1932年10月),《江西省革命歷史文件彙集》一九三二年(二),第97頁。

^②《江西蘇區中共省委工作總結報告(續二)~肅反工作》補充(1932年5月),《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上),第488-489頁。

肅反的停頓，一般被群眾打落了的非階級份子又乘機活動，企圖翻案抬頭，因此右傾錯誤，成為目前鬥爭中主要危險，我們要集中火力來克服”。“目前肅反停頓的錯誤，不是偶然的，而是來源於黨內對革命發展形勢的估量不足，不瞭解某區階級鬥爭日益尖銳化的形勢，不瞭解革命戰爭的環境”。^①

於是，政治保衛工作再次進入緊張時期，直到長征前再也沒有明顯的緩和。蕭克說：“許多不該處理的人在三二年三、四月又給處理了。”^②邊區幹部和群眾對沒有處決權意見很大，政府不得不於1932年6月發佈第十二號訓令，更改了六號訓令，再次把處決權下放到縣級：“1931年12月13日中央執行委員會所頒佈的第六號訓令，其第二項有‘縣一級司法機關，無判決死刑之權’的規定。但當目前發展革命戰爭的時期，在事實上，縣裁判部都不判決死刑，省裁判部在工作上，要發生許多困難，很難按照這個規定去執行，因此本執行委員會決定改為，縣一級裁判部有判決死刑之權，但沒有執行死刑之權，判決死刑後，必須得省裁判部的批准後才能執行，倘若有些縣與省的中間被白區所隔斷，則縣一級裁判部才有判決死刑和執行死刑之權。”^③

1932年4月，中央局取消河西特委，成立河西道委，派賀昌擔任書記，管轄贛江以西的上猶、崇義、遂川、南康等縣，這是敵我鬥爭尖銳的邊區。賀昌到達不久，即開展紅五月運動周，在上猶、崇義舉行了兩次公審大會，判決了一百多人，“處決了四五個，判決徒刑的有一些，自新釋放較多”。^④可見，在肅反正規化以後，即使是在緊張時期，判處死刑的比例也不高。任弼時在1944年湘贛工作座談會上也提到：“第二次肅反則比較有秩序

①《中共江西省委接受中央局肅反工作決議的決議》（1932年3月10日），《江西省革命歷史文件彙集》一九三二年（一），第56頁。

②蕭克：《關於中央蘇區的幾個問題》，《回憶中央蘇區》，第198頁。

③《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執行委員會訓令第十二號》1932年6月9日，《紅色中華》1932年6月16日。

④《中共河西道委給蘇區中央局的綜合工作報告》（1932年5月17日），《江西省革命歷史文件彙集》一九三二年（一），第110頁。

些,捉的也比較少一些”,“因為第一次高潮時社會秩序沒有建立起來,區鄉都可以殺人,後來秩序漸漸建立,已經不像過去一樣混亂”,“裁判部已經設立了,不能隨便殺人”。^①

江西省政治保衛分局省局及下轄九縣 1932 年 5 月處置犯人統計表^②

成分	處決	監禁	罰苦工	釋放	合計
豪紳地主	29(51.8%)	4(7.1%)	20(35.7%)	3(5.4%)	56(100%)
知識份子	3(8.8%)	3(8.8%)	5(14.7%)	23(67.6%)	34(100%)
富農	20(16.4%)	7(5.7%)	40(32.8%)	55(45.1%)	122(100%)
流氓	12(25%)	4(8.3%)	19(39.6%)	13(27.1%)	48(100%)
中農	8(5.4%)	4(2.7%)	16(10.9%)	119(81%)	147(100%)
貧農	15(3.2%)	5(1.1%)	47(10.2%)	395(85.5%)	462(100%)
雇農	0	0	2(3.4%)	56(96.6%)	58(100%)
工人	6(3.2%)	3(1.6%)	29(15.5%)	149(79.7%)	187(100%)
其他	15(12.1%)	2(1.6%)	31(25%)	76(61.3%)	124(100%)
合計	108(8.7%)	32(2.6%)	209(16.9%)	889(71.8%)	1238(100%)

江西省保衛分局統計了省局和萬泰、永豐、樂安、公略、興國、於都、贛縣、勝利、寧都九縣 1932 年 5 月處置犯人資料,經整理見上表。從統計表可以看出,在肅反政策中貫徹了鮮明的階級區分。雇農釋放比例高達 96.6%,死刑沒有;貧農釋放也高達 85.5%,死刑只有 3.2%;而豪紳地主釋放只有 5.4%,死刑則高達 51.8%;貧農被釋放的比例是豪紳地主的 16 倍,而豪紳地主被判死刑的比例是貧農的 16 倍,階級對比相當懸殊。

在蘇區人口的階級構成上,窮人數量遠多於富人,貧農遠遠多於地主。這表現在被處置的犯人中貧農有 462 人,地主只有 56 人,貧農是地主的 8 倍;大致屬於中共依靠階級的貧農、雇農、中農、工人合計 854 人,而屬於敵對階級的地主、富農合計 178 人,前者是後者的 5 倍。由於中共在肅

^① 任弼時:《回顧湘贛蘇區工作》(1944 年 10 月 26 日),《江西黨史資料》(1),江西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 1987 年,第 149 頁。

^② 《江西省革命歷史文件彙集》一九三二年(一),第 126-127 頁。

反中對工農依靠階級比較溫和，而工農階級在處置犯人中占70%，所以總體釋放比例高達71.8%，死刑8.7%。

在判處死刑的情況下，當時政策是召開群眾大會公開處決，反對秘密處決。保衛局希望處決能夠發揮政治影響，讓群眾看到過去的統治階級被消滅，產生徹底翻身的感覺。吳德峰在報告中提到：肅反初期“處決人犯僅有一小部分是群眾大會處決，其餘都是藉口群眾怕死老，於夜間處決”，“處決犯人，間有殘酷辦法，剖腹剜心(各縣都有此現象)”，“造成群眾恐怖”。肅反工作正規化之後，“凡判決之案，內經過公審執行，在公審中，得到不少的效果”，“如興國、雩都、公略、勝利等縣犯人隱瞞事實，因處置較輕者，群眾均補事實來證明他的罪惡”，“在永豐處決了羅煥南以後，群眾說，現在是真正的革命，有幾人自動來當紅軍，打破了和平保守和悲觀失望的觀念。”^①

即使肅反又進入緊張時期，正規制度還是防止了基層大規模濫殺的發生，在主管幹部比較謹慎的情況下，這一點尤其明顯。福建省裁判部長張華先連續發佈訓令禁止刑訊逼供，1932年8月27日訓令稱：“我們蘇維埃的法庭，是要廢除一切肉刑，用口才上的技術工夫來審問犯人，並且要到各方面去搜查材料，證實犯人的犯罪行為”。^②9月9日訓令再次強調：“中央執行委員會辦法第六號訓令，嚴格的廢止肉刑歷時已愈半載，但是各級政府對該項訓令之執行非常不夠”，“以後各級政府及地方武裝如再有用肉刑的事情，當以非常蘇維埃法令治罪！”^③9月12日訓令要求各縣裁判部報送省裁判部批准的死刑案件，如果僅報審判記錄和判決書，“很難斷定該項判決書是否正確，容易弄成錯誤”，“必須將原有的材料和證據全

^① 吳德峰：《江西蘇區中共省委工作總結報告(續二)~肅反工作》(1932年5月)，《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上)，第479、484-485頁。

^② 《福建省蘇維埃政府訓令裁字第二號》(1932年8月27日)，《福建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5)，第315頁。

^③ 《福建省蘇維埃政府訓令裁字第三號》(1932年9月9日)，《福建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5)，第339頁。

部送來，否則不批准”。^①

(四)政治保衛制度鞏固蘇區和紅軍，但也會傷及無辜

政治保衛工作的重點是鞏固紅軍，特派員在部隊中發展秘密工作人員，形成工作網。連一級設工作網隊長，排、班設工作網員。^②當時高級幹部的警衛員都要經過保衛局的訓練，警衛員不僅有保衛的職責，也有監視的職責。^③

國民黨起義部隊由於成分複雜、舊軍隊傳統深，成為監控的重點，比如廣西百色起義成立的紅七軍。鄧小平在報告中提到：“七軍本是和平轉變來的，轉變後的改造工作非常不夠，致有三次叛變事實之發生，都是舊的基礎(包括兵油子)沒有肅清的結果。”^④紅七軍後來經歷了嚴厲的整肅，曾任七軍政委的龔楚回憶：“紅七軍初到江西時，毛澤東要調整紅七軍的幹部，為全軍同志所反對。他們就指紅七軍內有改組派的反動組織”，“要在紅七軍進行‘肅清改組派’的清黨運動。起初殺了二十多個幹部，其中還有兩個高級政治幹部”。^⑤不過即使如此，還是會有擅於偽裝的漏網之魚，比如來自寧都起義26路軍的幹部胥江漢，紅軍長征前後，他取得組織信任被任命為閩贛省軍區參謀長，靠著個人經驗和能力，“閩贛省軍區實際上操縱在胥手裡，大大小小的權都被胥的人掌握了”。在蘇區失敗後的混亂中，胥江漢帶隊到福建仙遊叛變投敵。^⑥

嚴厲的政治氣氛對鞏固部隊起了相當作用，紅軍對間諜和叛變的警惕性很高。廣昌獨立師的師長兼政委龍普霖是黃埔學生出身，1932年4-5

① 《福建省蘇維埃政府訓令裁字第四號》(1932年9月12日)，《福建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5)，第343頁。

② 陳複生：《九死複生——一位百歲老紅軍的口述史》，中央文獻出版社，2010年，第50頁。

③ 陳複生：《九死複生——一位百歲老紅軍的口述史》，第59頁。

④ 鄧小平：《七軍工作報告》(1931年4月29日)，總政治部辦公廳編：《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歷史資料選編》第一冊，第692頁。

⑤ 龔楚：《我與紅軍》，第243頁。

⑥ 馬步英：《憶閩贛軍區始末》，《紅軍反“圍剿”·回憶史料》，第267-268頁。

月間他帶部隊向國民黨駐紮的南豐開進。當天晚上，突然發現國民黨的隊伍包抄過來。早就對這次行動存有疑心的三個團政委聚在一起，包括十一團政委胡楚夫、十團政委李純安、十二團政委賴際發。他們認定師長龍普霖想要帶領隊伍投敵，帶人到師部把龍普霖抓了起來，然後帶著部隊快速撤出險境。後來發現，“龍普霖同國民黨勾結大概已經有三、四個月了，國民黨還派來一個奸細到龍普霖那裡當副官”。“經臨時中央蘇維埃最高法院審判，將龍普霖和國民黨派來的那個奸細一起槍斃了。”^①

中央給所有蘇區都施加了很大壓力，沒有大規模破獲反革命組織的贛東北蘇區受到嚴厲批評。1932年9月《中央給贛東北省委的信》咄咄逼人地指出：“我們不能相信在贛東北蘇區內沒有像閩西、中區、鄂豫皖、湘鄂西各蘇區那樣總的領導機關。零星的破獲固然需要，然而我們必須從這種零星的破獲一直追蹤到總的領導機關。比如關於弋陽縣委的事件”，“這是最露骨的反革命行動。敵人所以能夠黑夜長驅深入直達縣委機關，當然不單是還有外人告密，而縣委委員中某些人也是這一陰謀的直接參加者。對於這些縣委的委員，省委當時應有極迅速的行動，嚴密的從這些委員那裡尋找更多的線索，而不能以留黨察看三個月了事”，“需要更多的無產階級的警覺性與堅決性，不放鬆在每一事件中反黨與反蘇維埃的分子，而把一切可疑的事件追究到底。”^②

在極度緊張的戰爭環境中，紅軍要全面清除階級異己分子。即使本人沒有任何可疑的表現，只要出身于地主、富農等敵對階級，就被認為有叛變危險，是需要清除的階級異己分子。1932年10月《中革軍委關於清洗出階級異己分子的訓令》認為：“中國的革命運動，目前已是進到了殘酷的階級武裝鬥爭的階段。在這一階段中，一切動搖不可靠的階級異己分子都會而且必然或早或遲的叛變革命而跑到敵人的營壘中去，故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的革命武裝隊伍——紅軍，必須最堅決的一開始就把這些分

① 吳法憲：《吳法憲回憶錄》，第23頁。

② 《中央給贛東北省委的信》（1932年9月25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8），第487頁。

子排斥出去，以嚴整自己的隊伍”。“三軍團的作戰科長舒適於本月二十三日在前線上逃跑了。查舒適原系平江地主出身，他的父親是被赤衛隊殺了的，這樣很明顯的叛變前提擺在面前，乃我們一些同志，特別是領導的同志，對階級鬥爭發展為革命戰爭認識不夠，以致對於階級的異己分子，不但沒有採取最嚴厲的必要的手段，而且給予了他們以很重要的工作。過去郭炳生、侯中英叛變的教訓，痛猶未止，現在又忽視如故，這是何等嚴重的錯誤呢?!”^①

政治保衛局的監督範圍不限於間諜、叛逃等嚴重問題，而是擴大到包括消極怠工、貪汙腐化等現象。湘贛蘇區一度甚至“把殺人當成完成任務的一種手段，籌款、擴紅、動員歸隊都要殺人”。^②李克農在1933年1月《國家政治保衛局中革軍委分局密令第二號》要求各級分局“迅速嚴密的審查各級分局幹部成份及政治堅定性和其工作狀況。堅決撤銷一切消極怠工、階級異己、貪汙腐化的分子。”^③高度集中的政治保衛制度大大加強了政權的控制力和動員力，幾乎把蘇區的人力、物力都發揮到了極限，對抗國民黨幾十萬大軍的長期圍攻。

但是，在嚴厲氣氛下，獨立思考、愛提意見的幹部不易生存，上級一旦發生偏差，也難以得到糾正。黃克誠提到何篤才“在古田會議之前朱、毛的爭論當中，反對毛澤東的正確意見，從此便不受重用”。“他曾對我說過，毛澤東這個人很了不起！論本事，還沒有一個人能超過毛澤東；論政治主張，毛澤東的政治主張毫無疑問是最正確的。我問他：既然如此，你為什麼要站在反對毛澤東的一邊呢？”“他說：毛澤東過於信用順從自己的人，對持不同意見的人不能一視同仁，不及朱老總寬厚坦誠。何篤才還舉例說，像李韶九這個人，品質很壞，就是因為會順從，騙取了信任，因而受到

①《中革軍委關於清洗出階級異己分子的訓令》(1932年10月25日)，總政治部辦公廳編：《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歷史資料選編》第二冊，第245頁。

②王首道、王震、蕭克等：《湘贛根據地革命鬥爭的回憶》，《江西黨史資料》(1)，第165頁。

③李克農：《國家政治保衛局中革軍委分局密令第二號》(1933年1月20日)，總政治部辦公廳編：《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歷史資料選編》第二冊，第322頁。

重用”。後來，雖然有師政委黃克誠的極力保護，何篤才還是在1931年的第二次肅反中被殺，黃克誠也因為抵觸肅反被撤職。^①

1933年初，國民黨發動了對蘇區的第四次大規模圍剿戰爭。為應對險惡形勢，蘇區中央執行委員會於3月15日發佈二十一號訓令，不再強調肅反由政治保衛局專門負責，而是要求一切機關共同參與。訓令指出：“革命與反革命的戰爭已進到生死決戰的時候，敵人除開軍事力量以外，更有計劃的在蘇區內部組織反革命活動”。“蘇維埃政府及一切革命機關，要施行武裝的及群眾的保衛。為了鎮壓反革命，對於重要反革命分子，要不猶豫的迅速的給以逮捕和處決”。“邊區各縣的裁判部，對於已捕犯人，凡屬罪惡昭著證據確實的分子，首先是這些人中的階級異己分子，應立即判處死刑，不必按照裁判部暫行組織和裁判條例第二十六須經上級批准才能執行死刑的規定”。“對於敵人進攻區域及邊區內的地主富農分子，應該分別處置。其有反革命事實的，應立即逮捕，嚴厲懲辦，不讓他們有絲毫活動的餘地。”^②

6月1日，司法人民委員部也發佈命令，要求各級裁判機關“堅決地執行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二十一號訓令，各級裁判機關應定出具體的執行辦法。對於罪惡昭著，事實確鑿，群眾要求處以死刑的階級異己分子，應速即執行死刑”。^③自此以後，蘇區的肅反氣氛越來越緊張，可見在殘酷激烈的戰爭環境中，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建立初期的正規化和法制化成果很難保持。

二、共產國際遠程操控，毛澤東失去軍事指揮權

在政治保衛系統建立起對蘇區全方位控制的同時，中共中央權力集中的趨勢也繼續發展。隨著中央領導逐步遷入蘇區，毛澤東與中央的關

① 黃克誠：《黃克誠自述》，第100-102頁。

②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中央執行委員會訓令第二十一號》（1933年3月15日），《中央革命根據地歷史資料文庫——政權系統》（7），第640-641頁。

③ 《中央司法人民委員部命令第十四號》（1933年6月1日），《中央革命根據地歷史資料文庫——政權系統》（7），第763頁。

係也發生了變化。項英到達蘇區之前，毛澤東和中央在集中權力上是一致的，他有力地集中了中央蘇區黨和紅軍的權力，領導第一次反圍剿戰爭取得輝煌戰果。但是，隨著中央把革命重心遷移到蘇區，先是1931年1月項英到達並成立蘇區中央局，4月任弼時等陸續到達，11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整個中央機關逐步遷到中央蘇區，毛澤東逐漸與中央其他領導人產生了越來越大的矛盾，終於在1932年10月寧都會議被取消了軍事指揮權，實際上被排除出核心決策圈。

(一)反圍剿連續獲勝，毛澤東出任中央局書記和政府主席

項英到達蘇區成立中央局之後，很快就和毛澤東出現分歧，批評毛澤東領導肅反出現嚴重偏差。不過在中央局建立初期，機構很薄弱，曾山在贛西南，“連會議都不能參加”，毛澤東和朱德主要精力用於軍隊，“事實上在中央局做工作的只有項英一人”。項英對蘇區和紅軍工作都缺少經驗，只能做幾個決議，實際管不了什麼事。軍事委員會的情況也差不多，“事實上只有項英一人跳進跳出，結果形成中央局與革命軍事委員會是一而二，二而一，除發了口號通令，在工作上沒有建立起來”。^①郭化若說：“蘇區中央局的書記和中央軍事委員會的主席雖然是項英同志，但事實上還是毛澤東同志在管事。”^②

1931年4月，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到達蘇區，17日召開了中央局擴大會議，傳達四中共全會的決議。遠東局和中共中央都對毛澤東領導的肅反表示支持，項英不得不承認錯誤。擴大會議還選舉彭德懷、林彪、周以栗、曾山^③、陳毅為中央局委員，請求中央批准。^④顯然，毛澤東等認為外來領導人不熟

①《蘇區中央局報告》（1931年7月8日寫發，11月6日帶到），《中央革命根據地歷史資料文庫——黨的系統》（3），第1674、1679頁。

②郭化若：《回憶第一次反“圍剿”期間的有關史實》，《回憶中央蘇區》，第143頁。

③曾山主持江西省蘇維埃工作，他在項英到達時的中央指定中央局9人名單裡，在任弼時抵達時中央新指定的7人名單裡沒有了。

④《蘇區中央局第一次擴大會議情況的報告》（1931年4月），《中央革命根據地歷史資料文庫——黨的系統》（3），第1576頁。

悉蘇區和紅軍，要求在中央局中增加本地幹部表決權。中央沒有直接答覆，但在5月《中央關於蘇維埃區域黨的組織決議案》中規定：“中央局或中央分局是代表中央的，他有權可以改正和停止當地最高黨部的決議與解散當地黨委”，“中央局或中央分局只能由中央派遣或指定”。^①

擴大會議後不久，中央局就圍繞第二次反圍剿戰略發生激烈爭論。郭化若說：“蘇區中央局形式上是項英同志掌權，實際上權力掌握在任弼時同志手裡，由王稼祥同志出主意，顧作霖同志打先鋒”。“當敵人第二次‘圍剿’快要來到的時候，項英同志得悉蔣介石興兵二十萬，比第一次增加了一倍”，“主張‘分兵退敵’，把紅軍開到四川去。”^②歐陽欽也提到：“到了青塘，蘇區中央局便開會。討論的問題是第二次反‘圍剿’打不打，先打哪一路敵人和選擇在哪個地點打。當時我任蘇區中央局的秘書，開會時我做記錄”。“毛澤東同志主張要打”，有些人“主張退出中央蘇區，到四川去，說斯大林都講過四川是最好的根據地。所以，會上支持毛澤東同志意見的是少數”。^③

據歐陽欽1931年9月報告，4月中旬第一次討論二次反圍剿時，最初決策是“分兵退敵”，過幾天的第二次討論時，又決定“應該打一仗再分”，多數人主張打十九路軍，但“澤東同志意見認為在進攻我們的人中，蔣蔡比較是強有力的，在歷史上未曾打過敗仗”，“我們現在主要的是擇敵人的弱點打破，打蔣蔡沒有絕對勝利的把握，我們應打王金鈺這路”。4月31日第三次討論時，“由澤東同志先報告，這一次討論的精神則完全轉變了，認為目前全國革命是高漲的，我們應取積極進攻策略”，“並且承認過去的‘分兵’策略是機會主義”。^④

在第二次反圍剿戰爭中，項英提出放棄中央蘇區到四川，而毛澤東顯

① 《中央關於蘇維埃區域黨的組織決議案》（1931年5月），《中共中央文件選集》（7），第269頁。

② 郭化若：《回憶第一次反“圍剿”期間的有關史實》，《回憶中央蘇區》，第140頁。

③ 歐陽欽：《回憶蘇區中央局“青塘會議”》，《回憶中央蘇區》，第160頁。

④ 歐陽欽：《中央蘇維埃區域報告》（1931年9月3日），《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上冊），第367-368頁。

示出傑出軍事才能，領導紅軍取得橫掃七百里的大勝。在夏天更大規模的第三次反圍剿戰爭中，毛澤東指揮紅軍再次險中取勝。任弼時等認為，項英“猶豫不決（特別在軍事行動上），領導戰爭能力弱”，而毛澤東“有獨特見解，有才幹”。^①中央局10月11日致電中央：“項英因解決富田事變完全錯誤，認為是黨內派別鬥爭，因此喪失信仰；工作能力不夠領導，中央局決以毛澤東代理書記，請中央批准”，^②同時再次提出增加五人的請求。中央10月下旬回電明確拒絕中央局增加成員，強調“地方幹部對於中央局的成分無任意變更之權”，“中央局成分無擴大之必要”，但同意“中局書記由澤東代理”，^③共產國際也在11月3日會議“批准中共政治局關於任命毛澤東同志為蘇區的書記”。^④

反圍剿戰爭連續取勝之後，毛澤東憑藉才能和功績重新成為蘇區領導核心，不僅取代項英擔任了中央局代理書記，而且在11月成立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當選政府主席。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是在共產國際的指示下成立的，中央1931年6月訓令提到：“國際屢次指示中國黨在蘇維埃區域必須建立起臨時中央政府，中央亦屢次指示中央蘇區要定期召集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並要其他蘇區選派代表到中央蘇區去”。^⑤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政府主席人選時，逐漸確認兩點：一需要有全國威信，二是現在蘇區工作。最後會議傾向於毛澤東。10月，中央電告蘇區中央局：“人民委員

①《任弼時在延安整風會議上的發言提綱》（1943年11月4日），轉引自章學新：《任弼時提出“以毛代項”為中央局代理書記始末》，《中共黨史研究》1993年第1期，第86頁。

②《蘇區中央局十月真電》（1931年10月11日），《中央革命根據地歷史資料文庫——黨的系統》（3），第1792頁。

③《中央致蘇區中央局電（複中局10月真電）》（1931年10月30日前），《中央革命根據地歷史資料文庫——黨的系統》（3），第1813頁。

④《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13），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65頁。

⑤《中央給紅軍黨部及各級地方黨部的訓令》（1931年6月16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7），第312頁。

會主席一人，決定毛澤東”。^①11月，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江西瑞金召開，宣告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毛澤東當選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大致相當於列寧去世前在蘇聯擔任的職務。

當然，共產國際並沒有把毛澤東當成中國的列寧。六屆四中全會上，共產國際不惜中共中央發生分裂，把王明等年輕留蘇學生提拔到中共領導層，就是為了避免李立三對抗莫斯科的歷史重演，要求中共對共產國際絕對服從。毛澤東是有極強獨立見解的人，顯然並不符合這種要求。共產國際指示中共把革命重心遷到蘇區，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是要把蘇聯經驗搬到中國來，在中國建立一個類似蘇聯的國家。既然建立了國家，當然一切都要正規化，但蘇區實際情況與蘇聯相差極大，毛澤東等蘇區幹部感到蘇聯經驗未必符合實際，幾乎就在11月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同時，毛澤東的所謂“狹隘經驗論”就在贛南會議上成為批評對象。

軍事和政治制度的正規化包含相當的合理性，但實際戰爭決斷則更多是從經驗中得來，需要對敵我實際情況的深入瞭解和敏銳洞察。共產國際遠在莫斯科，很難根據中國革命實際提出合理的戰略，而任弼時、項英、顧作霖等缺乏軍事經驗，對共產國際盲目服從。戰爭勝敗關乎蘇區存亡，毛澤東自恃軍事才能過人，頑強堅持自己的獨立見解，與中央局其他成員的矛盾一步一步走向激化。

（二）共產國際要求進攻城市，蘇區中央局出現嚴重分歧

1931年11月《米夫給斯大林的信》標誌著共產國際的戰略發生變化。米夫認為雖不應像立三路線那樣進攻全國中心城市，但應進攻分隔蘇區的地區中心城市。米夫說：“我們曾建議中國紅軍在開始時期不要佔領大城市”，“中國紅軍擊退了敵人的第一、第二和第三次進攻。因此，關於一些中心城市的問題已經有所不同了”。“我們不能就此停留，而應該從防禦

^①《中央致蘇區中央局第一號電》（1931年10月），轉引自章學新：《任弼時提出“以毛代項”為中央局代理書記始末》，《中共黨史研究》1993年第1期，第88頁。

轉入進攻，乘勝追擊，以便鞏固我們的勝利，這就要求佔領一些中心城市”。“把分散的蘇區聯結起來，把分散作戰的紅軍軍團集結起來，以及成立中央蘇維埃政府和廣泛開展它的活動，也要求我們佔領中心城市。”^①米夫是共產國際中國事務主管，他的意見被共產國際接受，成為1932年指導紅軍和蘇區的主要戰略。

1931年春季，中共中央在上海的組織遭到嚴重破壞，尤其是特科負責人顧順章和總書記向忠發等先後被捕叛變，使中央機構和遠東局遇到極大危險，幾個月無法正常運作。遠東局書記米夫、軍事顧問蓋利斯、中央領導人王明等重要人物先後撤到蘇聯，年底周恩來也去了蘇區，只留下相對不重要的博古、張聞天等組成臨時中央。他們冒著被捕犧牲的危險堅守崗位，維持中央運作，但他們也知道自已不是決策者，主要是在莫斯科和蘇區之間起聯絡作用。

進攻地區中心城市的新戰略傳到上海後，臨時中央1932年1月9日通過決議：“中央蘇區不但恢復了第一次‘圍剿’前的區域並佔領了贛南會昌、尋烏、安遠、信豐各縣，並且正在圍攻贛南的中心城市——贛州”，要求“必須依照中央最近的軍事訓令來努力求得將中央區、閩粵贛、贛東北、湘鄂贛、湘贛邊各蘇區聯繫成整個一片的蘇區，並以占取南昌、撫州、吉安等中心城市，來結合目前分散的蘇維埃根據地，開始湘鄂贛各省的首先勝利。”^②

1932年初的贛州戰役是莫斯科方針影響蘇區的結果。贛州是隔離中央蘇區主體與湘贛蘇區的主要障礙，被選作首先需要攻佔的地區中心城市，這引發了毛澤東與中央局其他成員的激烈爭論。毛澤東何嘗不想把蘇區連成一片，實際上早在1929年3月他就提出：“以贛南閩西二十餘縣為範圍，從遊擊戰術，從發動群眾以至於公開蘇維埃政權割據，由此割據

① 米夫：《米夫給斯大林的信》（1931年11月20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13），第78-79頁。

② 《中共中央關於爭取革命在一省與數省首先勝利的決議》（1932年1月9日），《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九冊，第35、41頁。

區域以與湘贛邊界之割據區域相連接”。^①4月他又強調：“江西我們力量的現狀，贛西、贛北、贛南、贛東，各個孤立，不相聯屬”，“紅軍有一個工作的總目標，使孤立的各地互相聯屬起來。”^②1930年3月，毛澤東率紅四軍攻打贛州，但沒有成功。他從實戰經驗中認識到，紅軍實力有限，沒有重武器，進攻重兵防守的城市傷亡很大，即使攻下來也很難長期佔領，更好的選擇是避開交通便利的城市，先在偏遠地區建立牢固的根據地。他在1931年底的中央局會議上提出“沿福建、廣東、江西和湖南邊界上的三山建立蘇區的計畫”，但遭到多數人反對。^③

在1932年1月中央局會議上，毛澤東力陳贛州地形不利進攻，敵軍防守堅固，援軍很近，不打為好，但被與會多數否決。“毛澤東同志是希望前線指揮作戰的同志根據實際情況發言，幫忙做做工作，說服左傾機會主義放棄打贛州的錯誤意見。結果彭德懷同志幫了倒忙。他說二十天能打開贛州。這一說正符合了中央局任弼時、顧作霖、王稼祥等同志的意見。”^④結果，紅軍圍攻贛州一個多月，3月初遭到敵人強大援軍反擊，損失慘重。贛州戰役危急時，項英親自到東華山古廟，請正在休養的毛澤東立刻冒雨下山到前線參加決策。^⑤贛州戰役失利使毛澤東對外來幹部的不滿加深了，更加堅信自己的軍事才能無可替代。

3月中旬，軍事委員會又否決了毛澤東集中兵力的建議，把紅軍分成兩路。雖然毛澤東率東路軍4月攻佔閩南重要城市漳州，繳獲大量物資，但是因兵力不足又被迫退出，未能進一步擴大戰果，毛澤東仍是不滿意的。據龔楚回憶：進攻贛州失敗後，軍事委員會召開軍事會議，毛澤東反對分散兵力：“打贛江西岸，打福建，我都同意，但須集中兵力打一處，五軍

① 毛澤東：《紅軍第四軍前委給中央的信》（1929年3月20日），《毛澤東軍事文選》第一卷，第54頁。

② 毛澤東：《前委來信（摘要）》（1929年4月13日），《黨的文獻》2008年2期，第15頁。

③ 《周恩來、王稼祥、任弼時和朱德給中共中央的電報》（1932年5月3日於瑞金），《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13），第146頁。

④ 蕭克：《關於中央蘇區的幾個問題》，《回憶中央蘇區》，第198-199頁。

⑤ 《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367頁。

團亦須參加作戰，若能集中三個軍團的兵力，攻打一面，即攻無不克，若分散兵力，恐怕無一可達到目的”，但他的意見被否決。毛澤東認為分兵戰略“大錯特錯”，在漳州戰役後激憤地說：“攻福建沒有成功，阻礙了革命力量的發展，他們這班書生”，“要負完全責任！”^①

1932年5月，毛澤東和中央局多數成員的矛盾激化了。毛澤東在贛州戰役失敗後尖銳抨擊進攻贛州是“李立三路線的繼續”，而5月3日周恩來、王稼祥、任弼時、朱德給上海的電報則激烈批評毛澤東的“政治路線乃是百分之百的右傾機會主義，它低估了目前的形勢，完全背離了共產國際和中央的指示。中央局所有其他委員都反對這條路線”，“我們決定同毛澤東的錯誤進行鬥爭，並在黨的機關報上進行批評。”^②從這封電報可以看出，在中央局中以毛澤東自己為一方，以周恩來、王稼祥、任弼時、項英、顧作霖、朱德、鄧發為另一方，雙方的分歧已經尖銳化了，多數人主張在蘇區公開批評毛澤東。

但共產國際卻要求團結毛澤東，上海臨時中央把共產國際的指示轉給了蘇區中央局。^③毛澤東從漳州前線回來後，中央局在6月初的會議上按照國際指示實現了和解。中央局在給上海的電報中稱：“毛澤東同志表現出很好的態度，深刻承認了自己以前的錯誤，完全放棄了自己向東北擴張的意見。所有問題都迎刃而解了”，“我們的討論是在同志式的氣氛中進行的，只限於中央局委員之間。這並不妨礙毛澤東的領導工作。目前我們正齊心協力地執行中央的指示，不會再有任何衝突。”^④

毛澤東與中央局其他成員和解後，仍被委以在前線領導紅軍的重任。周恩來在6月10日給上海的電報中說：“毛澤東身體極弱，他仍留在

① 龔楚：《龔楚將軍回憶錄》，第446頁。

② 《周恩來、王稼祥、任弼時和朱德給中共中央的電報》（1932年5月3日於瑞金），《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13），第147-148頁。

③ 《中共中央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的電報》（1932年5月27日於上海），《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13），第156頁。

④ 《中共蘇區中央局給中共中央的電報》（1932年6月9日於瑞金），《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13），第164頁。

高山地區工作，他失眠，胃口也不好。但他和部隊一起活動，在主持作戰行動時精力充沛，富有才華。局決定派他去前線策劃軍事行動，他也希望去前線。”^①

(三)寧都會議爭論激烈，毛澤東失去軍事指揮權

1932年6月，蘇區中央局決策集中紅軍主力向北進攻，與鄂豫皖、湘鄂西呼應，力爭在贛江流域取得大突破。6月17日決議提出：“中央蘇區紅軍的行動，必須達到最高度的積極化，必須與其他蘇區紅軍更加有互相配合”，“全國主力紅軍的統一指揮系統必須建立起來，紅軍的主力必須集中”。“要努力做到解除紅軍主力‘分散’籌款‘分散’做地方工作的任務”，“使紅軍用全力於決戰方面，到白色統治區域去開展勝利的進攻”，“依據中央新的軍事訓令，中央蘇區紅軍，應迅速的求得贛江流域的連續勝利，以奪取贛州，吉安，樟樹，南昌，九江等城市為目的，來配合目前尚隔斷著的幾個蘇區，以開展江西的首先勝利”。^②

6月中旬，中央紅軍主力重新集中，取消東路軍、西路軍番號，恢復紅一方面軍總部，這符合毛澤東的想法。7月初，紅軍在南雄、水口戰役中擊退了南部廣東部隊的進攻，穩定了南線戰局，然後全軍向北。7月21日，周恩來到達江西信豐紅軍總部，與毛澤東、朱德、王稼祥一起擔任紅軍前線領導，任弼時在後方代理中央局書記。中央局成員提議由周恩來兼任紅一方面軍總政委，但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7月25日聯名致電中央局，仍推毛澤東擔任總政委：“我們認為為前方作戰指揮便利起見，以取銷政府主席一級，改設總政治委員為妥，即以毛任總政委，作戰指揮權屬總司令、總政委，作戰計畫與決定權屬中革軍委，關於行動方針中央局代

^①《周恩來給中共中央的電報》(1931年6月10日於瑞金)，《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13)，第166頁。

^②《蘇區中央局關於爭取和完成江西及其鄰近省區革命首先勝利的決議》(1932年6月17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8)，第249頁。

表有決定權”。^①

中央局派周恩來到前線本身就暗示了對毛澤東的不信任，他在前線經常自作主張，並不完全服從中央局的指示。按理周恩來作為中央局書記不應親自出馬，但任弼時、項英、顧作霖、鄧發不懂軍事，只有周恩來軍事經驗比較豐富。其實所謂中央局意見，很大程度就是共產國際通過上海轉達的意見，周恩來在黨和紅軍中威望很高，又是遵守紀律的典範，自然是控制前線紅軍、貫徹國際指示的最佳人選。

中央局最初仍堅持周恩來任總政委，但周恩來回信認為，如果這樣無法發揮毛澤東的才能，“弄得多頭指揮，而且使政府主席將無事可做”。“澤東的經驗與長處，還須儘量使他發展而督促他改正錯誤”，“玉階不細心，有澤東負責，可能指揮適宜”。^②中央局接受了周恩來的意見，中革軍委8月8日發佈通令：“奉中央政府命令，特任毛澤東同志為紅軍第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③

但是，周恩來到前線後，仍無法解決前方和後方的矛盾。周恩來比較謙虛謹慎，覺得自己到蘇區不久，經驗不足，對開創蘇區的領導人比較尊重，堅持推毛澤東為總政委，但這也使國際指示難以貫徹。8月10日左右，紅一方面軍秘密北上發動進攻，17日攻佔樂安，20日攻佔宜黃，23日攻佔南豐，紅軍連戰獲勝，消滅國民黨西北軍高樹勳部第二十七師三個旅。但是新的情報顯示，國民黨軍毛炳文、李雲傑、許克祥等部在南城附近集結了十七個團的重兵。紅軍總部根據情況變化放棄了進攻南城的計畫，命令紅軍後撤至南豐、宜黃附近，分兵發動群眾、籌款，等待時機，但這顯然違反了6月17日中央局決議中紅軍主力集中作戰，不再做地方工作

① 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提議由毛澤東任總政委》（1932年7月25日），總政治部辦公廳編：《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歷史資料選編》第二冊，第178頁。

② 周恩來：《南雄水口戰役的初步總結及組織問題》（1932年7月29日），《周恩來軍事文選》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59頁。

③ 朱德、彭德懷、王稼祥：《中革軍委關於紅一方面軍總政委毛澤東已到軍工作的通令》（1932年8月8日），總政治部辦公廳編：《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歷史資料選編》第二冊，第196頁。

的決定。

8月底，周恩來致電中央局並轉上海臨時中央，報告了紅軍的行動。9月7日中央局來電對紅軍後撤待機表示不滿，指示紅軍進攻永豐。紅軍總部8日回電表示異議，認為“西襲永豐不僅疲勞未回復，且敵軍將先防我西進，襲取永豐將成為不可能”。“方面軍現在小布、安福、平田一帶休息七天絕對需要，已令二十二軍及十二軍在宜樂、宜南之間廣大發展遊擊運動與新蘇區。”^①

1932年8-9月，湘鄂西蘇區和鄂豫皖蘇區在國民黨重兵圍攻下苦戰失利，陷入絕境，紅軍主力被迫突圍，兩大蘇區相繼陷落，中央局對一方面軍長時間沒有發動進攻策應湘鄂西和鄂豫皖非常不滿。紅軍總部9月23日提出的計畫仍然是等待時機，中央局25日堅決反對，認為“在目前全國蘇區紅軍積極行動艱苦作戰中，我們不同意你們分散兵力，先赤化南豐、樂安”，“這在實際上將延緩作戰時間一個月以上”，“可以演成嚴重錯誤”。^②

周恩來在前方紅軍總部和後方中央局之間努力調和，逐漸感覺力不從心。9月24日，周恩來以個人名義給中央局發了一封電報，提出在前方召開中央局全體會議，徹底解決軍事指揮問題。周恩來一向性格溫和，但這份電報措辭相當激烈，可見他對爭論不休的困局已經忍無可忍：“前方組織既不是集權於個人負責制，各人能力又均有長有短，許多事件既不能決之於個人。而且時常變更其解釋的原則，尤令人無所適從，有時爭論則不勝其爭論”。“我以為既主張在前方開會，則須開全體會，徹底解決一切原則上的問題而不容再有異議，否則前方工作無法進行得好，尤其是軍事行動上，必須行專勿疑，大家都不放心，事情一定做不好，即使有錯，也要在檢閱時予以批評，遇事干涉，遇事不放心，即不錯也會弄錯！”“再則前方負責人太多，我意與其各執一見，不如抽出人來做前方與後方的群眾工

①《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384-385頁。

②《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386頁。

作，或到河西去都可，我想我還是到後方來，否則必須有另一辦法解決”。“我亟望中央局全體會議能在前方開成”，“根本解決這一困難問題。”^①

紅軍總部25日致電中央局，堅持認為不能盲目進攻：“攻城打增援部隊是無把握的，若因求戰心切，魯莽從事，結果反會費時無功”。“我們認為打開目前困難局面，特別要認識敵人正在佈置大規模的進攻中區，殘酷的戰爭很快就要到來，必需勿失時機地採取赤化背面地區”，同時提議立即在前方召開中央局全體會議。但中央局26日回電，仍堅持“攻城打增援部隊”的指示，同時拒絕召開中央局全體會議：“項英、鄧發已去閩西參加會議，你們亦須隨軍前進，中央局全體會議不可能開。”^②

但是，紅軍總部沒有執行中央局指示，反而發佈了繼續待機的訓令。中央局收到訓令後勃然大怒，29日致電前方：9月26日訓令收到，“我們認為這完全是離開了原則，極危險的佈置。中央局決定暫時停止行動，立即在前方開中央局全體會議”。^③任弼時等30日動身當天，電告上海臨時中央：“毛澤東同志對擴大中央蘇區、佔領中心城市和爭取一省或數省首先勝利的鬥爭表現動搖。他的擴大蘇區到……東部山區的機會主義路線仍在繼續，他常常試圖加以實施，忽視黨的領導，而提拔幹部是從私人關係出發”。雖然周恩來“在那裡，但他實際上很難貫徹局的意見”。“我們堅決而公開地批評毛同志的錯誤，並想把他召回到後方蘇維埃政府中工作”。^④

10月上旬，中央局全體會議在寧都召開，這次會議實際上成了對毛澤東的批評會，重點批評毛“等待觀念”、“不尊重領導機關”等，批評的主力是任弼時、項英、顧作霖等。毛澤東並不服氣，據理力爭，周恩來努力調和分歧，但並不成功，最後通過了周恩來取代毛澤東擔任總政委的決定。據

① 周恩來：《亟須解決戰略原則與發展方針問題》（1932年9月24日），《周恩來軍事文選》第一卷，第186-187頁。

② 《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386-387頁。

③ 《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388頁。

④ 《中共蘇區中央局給中共中央的電報》（1932年9月30日於瑞金），《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13），第210頁。

《蘇區中央局寧都會議經過簡報》：“會議中批評澤東同志認為早應北上，過去七個月都錯誤了之不正確觀點”。“會議中批評了澤東同志過去向贛東發展路線與不尊重黨領導機關與組織觀念的錯誤，批評到前方同志對革命勝利估計不足，特別指示澤東同志等待觀念的錯誤”，“開展了中央局從未有過的反傾向的鬥爭。對前方戰爭領導，留在後方中央局同志對於過去前方領導不能統一，認為戰爭領導必須求得專一獨斷，迅速決定問題，提出由恩來同志負戰爭領導總責，澤東同志回後方負中央政府工作責任。因恩來同志堅持要毛同志在前方助理或由毛同志負主持戰爭責任，恩來同志亦在前方負監督行動總方針責任。在大多數同志認為毛同志承認與瞭解錯誤不夠，如他主持戰爭，在政治與行動方針上容易發生錯誤。最後是通過了恩來同志第一種意見，但最後批准毛同志暫時請病假，必要時到前方。”^①

10月12日，中革軍委發佈通令，解除了毛澤東總政委職務：“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毛澤東同志，為了蘇維埃工作的需要，暫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所遺總政治委員一職，由周恩來同志代理。”^②甯都會議被撤銷總政委職務，是毛澤東在紅四軍七大落選前委書記後又一次重大挫折，自此以後直到遵義會議，毛澤東在兩年多的時間裡被排擠出了黨和紅軍的核心決策圈。

上海遠東局和臨時中央對毛澤東的態度很矛盾，此時埃韋特已經到上海擔任新的遠東局領導人，他在10月8日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說：“毛澤東迄今還是有聲望的領袖，因此為實行正確路線而與他進行鬥爭必須謹慎行事”，“反對目前撤銷毛澤東的職務”。^③臨時中央11月給中央局的

① 《蘇區中央局寧都會議經過簡報》（1932年10月21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8），第529-530頁。

② 朱德、彭德懷、王稼祥：《中革軍委關於紅一方面軍兼政委毛澤東暫回政府工作遺職由周恩來代理的通令》（1932年10月12日），總政治部辦公廳編：《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歷史資料選編》第二冊，第231頁。

③ 《埃韋特給皮亞特尼茨基的報告》（1932年10月8日於上海），《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13），第217-218頁。

電報一方面批評“澤東及其他純粹防禦路線的擁護者，沒有充分看見國內階級力量對比的變化”。另一方面要求對毛澤東“以說服的態度，設法爭取他贊成積極鬥爭的路線”，並且明確說：“我們反對現在將他召回。如果他服從黨的紀律，在目前採取這一步驟，將給紅軍與政府以極嚴重的影響”，“爭取領導的一致，這是鬥爭成功的前提。”^①

莫斯科的共產國際領導人經驗更為豐富，考慮問題更全面，他們保護毛澤東的態度更堅決，甚至對他的戰略思想也抱有幾分同情。共產國際1933年3月給中共的電報說：“在保衛蘇區時，對於中央蘇區來說特別重要的是要保持紅軍的機動性，不要以巨大損失的代價把紅軍束縛在領土上。應該事先制定好可以退卻的路線，做好準備，在人煙罕至的地方建立有糧食保證的基地，紅軍可以在那裡隱蔽和等待更好的時機。應避免與敵大量兵力發生不利遭遇，要採取誘敵深入、各個擊破、渙散敵人軍心和使敵人疲憊的戰術，還要最大限度地運用遊擊鬥爭方法”。“對於毛澤東，必須採取最大限度的克制態度和施加同志式的影響，為他提供充分的機會在中央或中央局領導下擔任負責工作。”^②

三、博古推動反羅明路線，李德執掌蘇區軍事大權

(一)博古等到達蘇區，反羅明路線打擊地方幹部

毛澤東與任弼時、項英等發生矛盾不是偶然的，這在當時各蘇區普遍存在。中共把革命重心轉移到農村後，大批中央幹部進入蘇區，這些外來幹部對於蘇區情況並不熟悉，往往對困難估計不足，急於求成，與蘇區本地幹部發生矛盾。為了維護集中的組織結構，中央發動了黨內鬥爭。本

^①《中央關於軍事路線給蘇區中央局的指示》(1932年11月)，《中共中央文件選集》(8)，第542-544頁。

^②《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給中共中央的電報》(1933年3月19-22日於莫斯科)，《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13)，第353-354頁。

來毛澤東是所謂“狹隘經驗主義”的最大代表，但他是政府主席，國內外影響很大，也很受共產國際重視，而且毛澤東基本遵守黨紀，雖在高層會議上固執己見，但並未公開違反組織決議。所以他在高層受到內部批評，被解除了軍事指揮權，但沒有受到公開批判。福建臨時省委書記羅明、江西幹部鄧小平、毛澤覃、謝唯俊、古柏被選作了“右傾機會主義”的代表，受到公開批判，一場嚴厲的黨內鬥爭席捲了中央蘇區。

1933年1月，臨時中央在上海無法立足，博古、張聞天等進入蘇區與中央局會合，自此中共中央完全遷入蘇區。中央局2月15日對福建省委提出嚴厲批評，撤銷了羅明的領導職務，揭開了反羅明路線鬥爭的大幕：“中央局檢閱了福建省委工作之後，認為省委是處在一種非常嚴重的狀態中，在省委內一小部份同志中，顯然形成了以羅明同志為首的機會主義路線。這一路線對於目前革命形勢的估計是悲觀失望的，對於敵人的大舉進攻表示了張惶失措，認為在杭永岩蘇區內群眾的革命鬥爭已經低落”。中央局決定“在黨內立刻開展反對以羅明同志為代表的機會主義路線的鬥爭”。^①

博古當時只有26歲，由於得到共產國際特別是米夫和王明的信任，成為中央負責人。他剛進入蘇區就大力鼓吹進攻路線，批判羅明、楊文仲為代表的所謂“退卻路線”。他2月16日在給紅軍學校的報告中說：面對敵人的大規模的第四次圍剿，“在我們黨內（很可惜的，甚至在黨的領導同志內），有一部動搖懦弱無氣節的小資產階級分子，受著階級敵人的影響，充分地暴露了那種悲觀失望，退卻逃跑的情緒，以致形成他們自己的機會主義的取消主義的逃跑退卻路線”，“這個機會主義的退卻路線最明顯的代表者，便是從前福建省委的代理書記羅明同志與新泉縣委書記楊文仲同志。”^②

^①《蘇區中央局關於閩粵贛省委的決定》（1933年2月15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9），第94-95頁。

^②博古：《擁護黨的布林雪維克的進攻路線》（1933年2月16日在工農紅軍學校第四期畢業生的黨團員大會上政治報告），《中共中央文件選集》（9），第463頁。

博古上升到路線鬥爭的高度，警告中間派不要動搖，不要站錯立場：“這裡清清楚楚的放著兩條路線，一條是黨的布林雪維克的進攻路線，一條是機會主義的走向取消主義去的退卻逃跑的路線”。“對於這兩個原則不同的路線的模稜兩可的態度，是最有害的腐朽的自由主義，任何對於擁護黨的總路線的不澈底、溫和、半途而廢，實際上將完全的成為機會主義退卻路線的俘虜，而給革命與整個蘇維埃運動以極大損害。很可惜，我們閩粵贛省委的另外一部分同志正是處於這樣的狀態之中”。^①

羅明的主要罪名，就是說邊區敵強我弱，群眾生活得不到保障，情緒低落，很難擴大紅軍。羅明提到：“邊區群眾一時上山，一時下山，一時太平，一時又大恐慌，因此開會，集中武裝等等都很難動員”。“有些群眾說被敵人進攻幾次，就弄得這樣苦了，上級還要說準備長期戰爭，這樣下去怎樣得了呢？”“請我們最好的領袖毛主席，項主席，周恩來同志，任弼時同志，或者到蘇聯去請斯大林同志或列寧同志復活，一齊到上下溪南，或者到其他地方去，對群眾大演說三天三夜，加強政治宣傳，我想也不能澈底轉變群眾的情緒。”^②結果羅明被撤銷一切職務，成了取消主義退卻逃跑路線的代表，福建與羅明觀點接近的軍區司令員譚震林、蘇維埃主席張鼎丞、省委常委郭滴人、組織部長劉曉等都被撤職。^③

通常認為，批判“羅明路線”從一開始就是針對毛澤東，但這種說法嚴格說來並不準確。張聞天當時也在中央局刊物《鬥爭》上發表了《什麼是羅明同志的機會主義路線》和《羅明路線在江西》，不過他後來在延安整風時期的《反省筆記》中說：“當時我反對羅明路線時，主觀上並未想到這是為了要反對毛澤東同志。當時我覺得毛澤東同志已經不在位，再去反已經沒有什麼意義。這從我寫的文章中也可看出”，以追查“江西小組組織系

① 博古：《擁護黨的布林雪維克的進攻路線》（1933年2月16日在工農紅軍學校第四期畢業生的黨團員大會上政治報告），《中共中央文件選集》（9），第467-468頁。

② 博古：《擁護黨的布林雪維克的進攻路線》（1933年2月16日在工農紅軍學校第四期畢業生的黨團員大會上政治報告），《中共中央文件選集》（9），第464-465頁。

③ 羅明：《關於“羅明路線”問題的回憶》，《中共黨史資料》1982年第2輯，第257頁。

統”為名，“直接針對毛澤東同志的”，是李維漢。^①毛澤東讀完《反省筆記》後，專門到張聞天住的窯洞對他說：“我一口氣把它讀完了，寫的很好！”^②這說明毛澤東對張聞天的說法也大致認可。在極端險惡的環境中，毛澤東以非凡的勇氣和毅力親手開創了中央蘇區，取消主義的罪名確實很難加到他的頭上。

1933年初，蔣介石調集重兵對中央蘇區發動第四次圍剿，周恩來、朱德、彭德懷、林彪等指揮紅一方面軍於2月27日、3月16日兩次採用大兵團伏擊戰法，殲滅黃埔系主力部隊11師、52師及59師、9師一部，取得中央紅軍歷史上空前的大捷。贛州戰役危急時項英等不得不請毛澤東下山助戰，這次勝利似乎證明：沒有毛澤東，紅軍照樣可以打勝仗，甚至可以打更大的勝仗，因而使得毛澤東東山再起的機會更加渺茫了。同時這次勝利大大鼓舞了博古等進攻路線的鼓吹者，他們掀起來更大規模的反退卻路線的鬥爭，開始打擊一切不同意見，建立權力更加集中的體制。

當反對羅明路線擴展到江西的時候，影射毛澤東的意思日益明顯，他的弟弟毛澤覃也被公開點名批評。在4月江西三個月工作總結會議上，鄧小平、毛澤覃、謝唯俊、古柏被選作江西羅明路線的代表，對他們的批判也更加上綱上線，提升到了反黨派別和小組織的高度。李維漢在5月6日《為黨的路線而鬥爭——要肅清在江西的羅明路線，粉碎反黨的派別和小組織》中，稱會議“揭發了在江西的羅明路線（即‘單純防禦路線’），並一致給了鄧小平、毛澤覃、謝唯俊、古柏等以嚴重的打擊，他們是羅明路線在江西的創造者，同時是反黨的派別和小組織的領袖。”^③

李維漢文中透露出，蘇區幹部對外來幹部非常不滿，稱他們是只會“找岔子”的“洋房子先生”，這很符合毛澤東的一貫態度。李維漢稱：“毛

① 張聞天：《反省筆記》，轉引自《何方談史憶人：紀念張聞天及其他師友》，世界知識出版社2010年，第40頁。

② 劉英：《劉英自述：張聞天夫人口述歷史》，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08頁。

③ 李維漢：《為黨的路線而鬥爭——要肅清在江西的羅明路線，粉碎反黨的派別和小組織》（1933年5月6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9），第491頁。

澤覃、謝唯俊、古柏等在四中全會後，不僅沒有承認自己執行立三主義的錯誤，而且造成一種胡說：‘大城市上產生了立三路線，我們蘇區的山上，卻全是馬克思主義。’正因為如此，他們在黨大會前後，提出了機會主義的口號，進行反對中央局的活動。拿‘洋房子先生’的口號反對中央局的領導，拿‘找岔子’的口號，反對中央局和省委對工作的批評。抵抗和破壞指導機關的指示，‘合我的口味就執行，不合就不執行’。“他們的通訊、談話和討論，完全向黨秘密起來”，“明顯的是一種小組組織形式的結合”。^①這個受到批評的所謂“小組組織”，顯然就是指所謂“毛派”，他們的罪名主要不是取消主義，而是結成小組組織反對上海來的中央領導。

在反羅明路線的同時，中央宣傳部又發動了反叛徒鬥爭，用意很明顯，就是警告那些“悲觀失望”的所謂“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如果不改正錯誤，就可能成為叛徒。1933年3月《中央宣傳部關於反對叛徒鬥爭的提綱》宣稱：“在這一個生死的戰鬥中，混入我們隊伍中的小資產階級分子，革命的半途伴侶，不可救藥的機會主義者，以及一切投機的敗類，不是自覺的自動變節，便是在國民黨嚴刑拷打或威迫利誘之下投降”。“中國革命的波濤，一瀉千里，一批一批地把那些殘渣敗滓都淘汰下去。陳獨秀、彭述之等的落伍，譚平山、施存統之流的‘別樹旗幟’，組織第三黨，羅章龍、何孟雄等的取消革命，徐錫根、胡均鶴、余飛之投奔南京，恨與劊子手蔣介石‘相見之晚’，以至孫際明等的‘唯三民主義足以救中國’，皆莫不是‘時代的必然產物’”。^②

在殘酷的路線鬥爭中，蘇區籠罩在緊張氣氛中，任何可疑點都是危險的，如果和白區通信就可能受到懷疑。據龔楚回憶，周恩來以嚴肅的口吻說：“你以前在廣西工作時，沒有堅定的政治立場，走進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道路。現在又對農民政策沒有徹底的認識，保持狹隘的農民保守觀念，

^① 李維漢：《為黨的路線而鬥爭——要肅清在江西的羅明路線，粉碎反黨的派別和小組織》（1933年5月6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9），第497-498頁。

^② 《中央宣傳部關於反對叛徒鬥爭的提綱》（1933年3月13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9），第120頁。

動搖了同志們的意志”，“黨中央已決定開除你的黨籍一年，並給你一個學習機會，希望你能徹底轉變”。後來中央還在紅軍總部召開規模很大的思想鬥爭會，鬥爭龔楚和同樣被撤職的十六軍軍長孔荷寵。朱德特別關切地提醒龔楚：“不要寫信回家，因為政治部已截留了由白區家裡寄來的信，應在蘇區另外找一個思想前進的女同志作老婆，以免給人以攻擊的口實。”^①應該說，黨組織對孔荷寵和龔楚的判斷是準確的，這兩個人後來都成了叛徒。

“右傾機會主義者”不僅被批判撤職，有的還受到勞動改造的處罰。紅軍長征後，在三年遊擊戰爭初期發揮關鍵作用的曾紀才對陳毅說：“他們鬥爭我，說我是機會主義，勞動改造了兩年。如今隊伍打散了”，“想去找隊伍，又怕他們說我是機會主義，不要我。還怕他們夜裡把我殺掉。”^②曾紀才後來被捕，不屈而死，最終證明自己是堅定的革命者，但是在真正的考驗來臨之前，誰會叛變，誰不會叛變，事先很難預料。這就是中共長期不得不面對的兩難抉擇，在力量懸殊的殘酷鬥爭中，嚴厲的黨內鬥爭可以強化組織，但同時也會造成誤傷。

（二）李德進入蘇區，執掌軍事大權

通過嚴厲的黨內鬥爭，中共建立起高度集中的權力結構，推動了紅軍的正規化，如果由傑出的領導人來指揮，應該能夠發揮很大效能。毛澤東在1934年1月《武裝民眾與建設紅軍》中也認為：“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建立，統一了全國紅軍的領導，使各個蘇區各個戰線的紅軍部隊，開始在統一的戰略意志之下，互相呼應與互相配合地行動起來。這是由散慢的遊擊隊的行動進到正規的與大規模的紅軍部隊的行動的重要關鍵。”^③

① 龔楚：《龔楚將軍回憶錄》，第501頁。

② 陳毅：《憶艱苦的三年遊擊戰爭》，《回憶中央蘇區》，第508頁。

③ 毛澤東：《武裝民眾與建設紅軍》（1934年1月），總政治部辦公廳編：《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歷史資料選編》第二冊，第563頁。

但實際情況是，蘇區在建立起空前強大的集中體制的同時，領導權卻落在了一個缺少經驗的青年和一個不懂中文的外國人手裡，這樣的結果顯然是災難性的。在高度集中的權力結構中，一方面有利於傑出領導人發揮才能，不受幹擾地迅速決策；另一方面，如果領導人不合格，則很難自下而上地糾正錯誤，這種權力結構的最大弱點不幸成了當時中央蘇區的現實。

從組織原則上講，博古上面還有上海遠東局和莫斯科的共產國際，但由於距離遙遠，二者實際上很難發揮領導功能。蘇區的軍事行動在1932年受到的外來干涉不多，雖然要接受共產國際確立的大方針，但具體行動主要由蘇區中央局幾領導人討論決定。原來的軍事顧問蓋利斯1931年離開後，遠東局在上海沒有軍事顧問。遠東局領導人埃韋特不懂軍事，對幹預軍事行動比較慎重，他在1932年10月給莫斯科的報告中說：“如果我們試圖由此來幹預軍事行動的領導，甚至把它掌握在自己手裡，那是完全錯誤的。這樣做缺乏一切前提條件，而且由此進行幹預也是完全不可能的。”^①

1933年春天，新的軍事顧問弗雷德到了上海，開始積極指揮蘇區作戰。他當過中級軍官，有一定軍事經驗，但是他是外國人，又不在軍中，很難知己知彼，提出的計畫往往脫離實際。弗雷德在夏天提出兩個拳頭打人的戰略，把主力紅軍分為東、西兩路軍，以東路軍進攻福建十九路軍。博古不懂軍事，對上海的指示完全服從，領導東路軍的周恩來、朱德根據實際情況提出了不同意見。6月21日博古等卻回電絲毫不許變通：“看了你對滬指示提出的提議，我們仍持原電的意見”。“滬指示編組東方軍團及其作戰綱領，主要的是改進從前一手打人的單一作戰線，而成為更有利的配合各方的兩根作戰線”。“你對於目前的利益和慮及如滬所預見的地形，甚至行軍的困難，只令東方軍團在泰邵作戰，而束縛其主力向東面邊展，

^①《埃韋特給皮亞特尼茨基的報告》(1932年10月8日於上海)，《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13)，第218頁。

結果將不能達到滬所說的前途。”^①

博古等6月22日再次致電周恩來，否定前線領導人的變通計畫：“新計畫長電已接到，這計畫我們認為不適合的”，“粵敵目前尚不是我們改變上海總計畫的理由，而且更急迫要我們執行上海計畫之第一步，以威脅十九路軍右側翼”，“上海電最主要的為建立兩作戰線，以準備八九月之總進攻”。^②嚴守紀律的周恩來6月23日複電服從命令，不過表現出明顯不滿情緒：“廿二日兩電悉。絕對服從你們命令，並立即執行。我要求在部隊調動中回瑞一行，面陳不同意見或改在博生開軍委會或中局會。因許多問題非電文所能詳，許多批評完全不是我們原意也。”^③朱德、周恩來7月11日給軍委的電報又要求“請勿急，尤請勿直接命令彭滕，使他們無所適從，時時請命，反束縛不能機斷專行。”^④

博古不懂軍事，只能機械服從上海遠東局的指示，甚至直接轉發上海指示給紅軍領導人。9月底蔣介石發動第五次圍剿，東方軍不得不回師江西，《蘇區中央局轉發上海關於近期內作戰方針的來電》稱：“滬電如下”，“我們特別關心的是黎川周圍的戰爭”，“東方軍在迅速的完成集中以後，應沿著福建的邊界向前推進，以便在黎川以北與敵人作戰。”^⑤

博古等為了貫徹弗雷德在上海制定的作戰計畫，在1933年秋“向各地區各部隊派遣大批‘欽差大臣’，去進行所謂‘改造和充實各級領導機關’”，對提意見不聽話的幹部“進行‘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大批地進行懲罰和撤換，隨意提拔同他們氣味相投、只知隨聲附和的人”。^⑥當三軍團領

①《秦邦憲、項英、王稼祥、劉伯承對上海軍事指示之說明》(1933年6月21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9)，第245頁。

②《蘇區中央局對新作戰計畫之意見致周恩來電》(1933年6月22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9)，248頁。

③《周恩來複中央局電》(1933年6月23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9)，第249頁。

④李志民：《李志民回憶錄》，第211頁。

⑤《蘇區中央局轉發上海關於近期內作戰方針的來電》(1933年10月初)，《中共中央文件選集》(9)，第355-357頁。

⑥李志民：《李志民回憶錄》，第221-222頁。

導人彭德懷、滕代遠仍然提出不同意見時，10月27日軍委電告朱德、周恩來：“軍委已決定了戰役問題，望轉告彭、滕，停止建議。”不久，滕代遠被調出紅三軍團，彭德懷的中革軍委副主席的職務也在1934年1月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上被免去。^①

1933年10月，弗雷德的助手李德進入蘇區，成為唯一在蘇區的共產國際代表。李德是德國人，1900年生於慕尼黑，1932年春天剛從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畢業，被蘇聯紅軍參謀部四局派往中國，秋天到上海參加遠東局工作。^②從李德的履歷來看，他並沒有多少實戰經驗，只在一次大戰後的德國革命中參加過短期街壘戰，所以他只能做軍事顧問弗雷德的助手。李德的工作態度積極負責，在1933年3月的工作報告中，嚴厲批評王明過分誇大蘇區和紅軍的實力，認真核實出紅軍總數只有8萬，裝備很差，與國民黨對比懸殊。^③10月，李德冒著生命危險穿越封鎖線，期間在小船艙裡平躺了兩天兩夜，終於到達蘇區。^④這是幾次宣稱要回國參加五中全會的王明沒做到的，也是以前的軍事顧問蓋利斯和他的上級弗雷德沒能做到的。

李德身在蘇區和紅軍當中，比上海和莫斯科都更瞭解情況，這使他敢於對抗自己的上級弗雷德，成了博古的主心骨。李德剛到蘇區，博古就毫不客氣地拒絕了弗雷德的軍事計畫，在10月20日給上海遠東局的電報中說：“收到你們14日電報後，軍事委員會在18日進行了討論”，“由於計畫建立在放棄內線作戰和繞過敵人翼側向前推進的基礎之上，軍事委員會不能同意這個計畫”，“這種戰術是極其危險的”，“我們的主要任務是全力保衛我們的主要地區”。李德“只是解釋了你們的電報，但沒有積極堅持

① 李志民：《李志民回憶錄》，第228頁。

② 王新生：《李德來華的身份及任務新探》，《近代史研究》2009年1期，第146頁。

③ 《布勞恩關於中央蘇區軍事形勢的書面報告》（1933年3月5日於上海），《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13），第330-336頁。

④ 奧托·布勞恩：《中國紀事1932-1939》，現代史料編刊社1980年，第40-42頁。

執行這個電報。^①這是委婉的說法,李德後來在回憶中明確說自己“反對這個計畫”。^②

上海和莫斯科的領導人明白自己遠離戰場,很可能脫離實際,只好給李德和博古留出更大權力空間。遠東局接到博古的拒絕電報後,不但沒有堅持,反而在30日電報中說:“我們的建議不意味著干涉革命軍事委員會共同一致的決定”,“你們在當地,應該根據你們的判斷行事”。^③對於上海和瑞金的分歧,莫斯科在1934年1日電報中從原則上支持了瑞金:“關於我們提出的作戰問題的建議,或者我們從上海提出的這種建議,你們只應看作是建議。無論從這裡還是從上海都不能像你們那樣清楚地瞭解戰場上的形勢。因此與戰場上的形勢有關的所有問題,都應由中央和革命軍事委員會研究決定”。“你們的部隊應該避開蔣介石的進攻部隊,在迅速重新部署後,從北面和南面同時打擊進攻19路軍的蔣介石部隊的翼側和後方,最好是在它們之間發生衝突的時候。重複一遍,這只是建議,你們可以改變或根本不採用。”^④

李德和博古得到莫斯科的支持後,更不把上海的弗雷德放在眼裡。遠東局領導人埃韋特2月向莫斯科報告了雙方的衝突:“最近頻繁出現這樣的情況:革命軍事委員會在實行弗雷德提出的建議時,往往做一些改動(有時是大的改動,有時是小的改動,但同樣都具有重要意義)”。“弗雷德對此作出的反應越來越多”,“越來越主張批評瓦格納(即李德),進而宣佈取消他的代表資格,原因是瓦格納不執行他的指示”。“存在這樣的危險性:弗雷德和瓦格納之間的意見分歧可能演變成同中央和其他組織關於各種錯誤或關於未利用局勢和對局勢利用的不夠的更嚴重的意見分

①《秦邦憲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的電報》(1933年10月20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13),第555-556頁。

② 奧托·布勞恩:《中國紀事1932-1939》,第85頁。

③《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給中央蘇區的電報》(1933年10月30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13),第578頁。

④《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給中共中央的電報》(1934年1月2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14),第7-8頁。

歧。”^①由於弗雷德和埃韋特也發生了激烈的衝突，埃韋特有時甚至拒絕發出弗雷德給蘇區的電報，弗雷德就這樣逐漸失去了影響力，李德在博古的支持下幾乎是獨掌軍事大權。

然而，李德和博古雖然比上海和莫斯科的人更瞭解情況，但三十出頭的李德剛從軍校畢業，只是見習軍官的水平，他自己後來也承認：“我沒有經驗，對在中國受委託的工作沒有做好準備”。^②他完全不懂中文，對紅軍和國民黨軍隊都不可能深入瞭解，完全做不到知己知彼。二十幾歲的博古則連基本的軍事常識都沒有，但他們卻看不起紅軍領導人。毛澤民1939年在莫斯科說：“朱德和毛澤東同志沒有博古和李德同志那樣深厚的政治知識，沒有進過李德上過的那樣軍校，沒有讀過博古和李德讀過的那些德文版和俄文版的馬列著作”，“在很有學問的博古和李德同志的眼裡，朱德和毛澤東好像是‘農村傻瓜’”。^③

本來李德只有建議權，並沒有決定權，但博古把李德奉若神明，把他的所有建議都當成決定，從不提出異議。就這樣，李德執掌了蘇區軍事大權，而當時蘇區壓倒一切的中心工作就是戰爭。李德自己也說：“實際上我掌握了紅軍行動的決定權。這大大超出了我的工作範圍，在客觀上篡奪了紅軍在一年期間的指揮權。表面上看，我沒有擺出大人物的樣子。我不只一次強調說，我作為顧問沒有任何權力”，“而實際上我對每個涉及紅軍的問題都提出了建議，並且直到紅軍進入貴州省之前，我的所有建議均被採納”。^④

國民黨軍在第五次圍剿中採取了步步為營的碉堡戰術，紅軍很難得

①《埃韋特給皮亞特尼斯基的信》(1934年2月13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14)，81-82頁。

②《布勞恩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書面報告》(1939年9月22日於莫斯科)，《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15)，第351頁。

③《毛澤民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書面報告》(1939年8月26日於莫斯科)，《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15)，第326頁。

④《布勞恩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書面報告》(1939年9月22日於莫斯科)，《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15)，第344頁。

到機會打自己擅長的伏擊戰，博古、李德專權又無能，更加重了前線將士的困難。當時博古、李德“不給前線指揮員臨機應變之權，特別是在第五次反‘圍剿’開始後，每次戰鬥都要由坐在瑞金的李德按一份很不精確的作戰地圖進行部署，甚至有時連一門炮、一挺機槍應配置在什麼位置上，都要由李德在電話裡按地圖示定。正因為他不瞭解情況，經常朝令夕改，來回折騰，搞得前線指揮員手足無措，往往延誤戰機。周恩來總政委對此十分氣憤，不得不給博古、項英發電，請求在相當範圍內給予部署命令之全權。”^①

林彪也對軍委指揮的呆板和瑣碎非常不滿，1934年4月3日寫了一封很長的意見信。他認為“決心遲緩這是軍委最大的缺點”，“以致失了不少的可以取得勝利的機會”。“軍委對各部任務的規定及執行的手段過於瑣細，使下級無機動餘地。軍委憑極不可靠的地圖去規定部隊位置”，“很多地方錯的一塌糊塗，特別是偏僻的地域或大山中更錯的厲害，因為那些畫圖的傢夥是很馬虎的，他遇著那種地方大概僅僅調查一下，並未實地測繪”。軍委“一直干涉到很多小的戰術部署，則是無論如何不適用的”。^②

但是，李德傲慢自大，看不起中國人，拒絕接受意見。後來遵義會議決議嚴厲批評李德“領導方式是極端的惡劣。軍委的一切工作為華夫同志（即李德）個人所包辦，把軍委的集體領導完全取消，懲辦主義有了極大的發展，自我批評絲毫沒有，對於軍事上以一切不同意見，不但完全忽視，而且採取各種壓制的方法，下層指揮員的機斷專行與創造性是被抹殺了。”^③李德年輕氣盛，修養不足，對紅軍幹部的態度都非常粗暴，經常發脾氣罵人，他的翻譯伍修權都感到難以忍受，多次要求調動工作。^④

博古在六屆四中全會連中央委員都沒選上，在主要領導人離開上海

① 李志民：《李志民回憶錄》，第236頁。

② 《林彪關於作戰指揮和戰略戰術問題給中革軍委的信》（1934年4月3日），《中央革命根據地歷史資料文庫——軍事系統》（13），第3268-3270。

③ 《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遵義會議）》（1935年1月8日政治局會議通過），《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0），第469-470頁。

④ 伍修權：《回憶與懷念》，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第109頁。

的情況下進入領導層，李德只是軍校新畢業生，他們執掌中共領導權的合法性顯然大有疑問。中共中央從1931年1月六屆四中全會以來，在白區遭到連續破壞，損失慘重。16個政治局委員中，羅登賢、溫裕成犧牲，徐錫根、盧福坦、顧順章、王克全叛變，向忠發叛變後被殺，陳郁犯了嚴重錯誤，仍然擔任中央領導職務的只剩下8人：正式委員5人（周恩來、項英、張國燾、任弼時、王明）、候補委員3人（關向應、毛澤東、劉少奇）。王明在莫斯科，張國燾在四方面軍，任弼時在六軍團，關向應在二軍團，在中央蘇區的只有周恩來、項英、毛澤東、劉少奇4人，中央領導機構顯然需要補充。

六屆五中全會1934年1月在瑞金召開，確認了博古等人的領導權。這是中共在自己政權範圍內召開的第一次中央全會，標誌著中共成了擁有軍隊和政權的黨。在政治局改組中，在位的8個政治局委員都留任，留蘇學生在中央的支配地位得到認可。四中全會上，只有王明一人從非中央委員躍升為政治局委員。五中全會上，博古、張聞天、王稼祥、凱豐、李竹生、顧作霖、康生多達七人從非中央委員躍升為政治局委員，他們當中五人是留蘇學生，顧作霖和康生雖不是留蘇學生，但政治傾向與他們接近，這使得留蘇派在政治局中取得優勢。紅軍領袖的地位也有所上升，毛澤東從候補委員晉升正式委員，朱德直接成為政治局委員，彭德懷當選中央候補委員。原政治局中的工人幹部損失很大，雖補充了陳雲、鄧發，但工人幹部占優的局面不復存在。新的政治局成員包括：正式委員13人（王明、博古、張聞天、周恩來、項英、張國燾、任弼時、毛澤東、朱德、陳雲、鄧發、康生、顧作霖），候補委員4人（劉少奇、王稼祥、凱豐、李竹生）。^①名單是由共產國際確認的，博古等人執掌蘇區大權獲得了合法性。

毛澤東“因病”沒有參加六屆五中全會，卻參加了幾天之後召開的第二次蘇維埃代表大會，並且代表中央執行委員會作了長篇報告。雖然二

^① 王健英：《中共六屆五中全會改組中央考析》，《中共黨史研究》2013年第10期，第117-118頁。

蘇大會中央執行委員會仍選毛澤東為主席，但又選了一個原來沒有的中央行政機關——人民委員會，張聞天為主席，實際上分走了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大部分權力，毛澤東作為政府主席被進一步架空了。

到1934年夏天，戰局越來越被動，蘇區被一點點壓縮，陷入不利的陣地戰，博古和李德難以應對這樣的局面。毛澤東認為自己的軍事經驗能發揮作用，在會議上也更活躍了一些，但是博古、李德的主導地位並未改變。1934年6月上旬，政治局召開了一次擴大會議，討論軍事問題，各軍團高級幹部從前線回來參加。“當討論第一個戰略問題時，毛澤東曾熱烈發言，他說：這個戰略提案比較正確，但仍嫌不夠徹底，他認為根本可以不設防，要設防亦僅能派地方部隊守備。紅軍主力應集結於北面之閩贛邊區之寧化、石城間，待敵深入。然後選擇有利目標及有利戰場，以三倍至五倍以上之兵力向敵突襲”。但李德等“堅持要以紅軍主力之一部擔任防守北面防禦陣線，而將提案通過。”^①甚至10月長征開始以後，朱德給項英電報中還有“訓令因李德同志病，尚未寫”的話，^②可見不經李德之手，紅軍總司令朱德是無法發佈軍事訓令的。

博古、李德的經驗和能力都不足，他們執掌蘇區最高權力一年多，讓毛澤東、周恩來等才智出眾的領導人服從指揮，完全是靠共產國際對他們的信任，甚至是米夫和王明對博古的個人信任。在1934年，這四個實際執掌中共大權的人都相當年輕：米夫33歲、王明30歲、李德34歲、博古27歲，斯大林和共產國際高層雖然幾次要求保護毛澤東，但終究不能真正信任他，這幾個年輕人即使經驗和能力有限，但他們是懂俄語的、能夠深入交流的、值得信任的，而毛澤東、李立三、羅章龍等是有獨立性的、難以信任的。共產國際是中央集權的嚴密組織體系，但是它有一個弱點：由於不同國家語言和文化的差別，這個國際組織內部難以建立相互信任，這給作為共產國際支部的中國共產黨帶來了嚴重的負面影響。

① 龔楚：《龔楚將軍回憶錄》，第541頁。

② 《朱德關於贛南軍區地方部隊配合野戰軍突圍戰役致項主席電》（1934年10月20日），《江西黨史資料》（2），江西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1987年，第13頁。

四、第五次反圍剿中紅軍和蘇區的緊張狀態

1933年9月，第五次反圍剿戰爭開始，戰局逐漸惡化，中央蘇區被壓縮得越來越小，必須動員一切力量才能抵抗重兵圍攻的巨大壓力，整個蘇區進入高度緊張的狀態。人力的動員很快達到極限，中共在總人口只有幾百萬的蘇區，提出了擴大百萬紅軍的口號。1934年1月，六屆五中全會決議提出“動員一切力量一切資源，發揚黨和群眾的積極性到最高限度，來擴大和鞏固紅軍，將一切其他的任務圍繞在這個任務的周圍。一切黨的工作應該在‘一切為著國內戰爭前線上的勝利’的列寧的口號之下進行。尖銳的革命形勢要求我們在盡可能的短時期內實現創造一百萬鐵的紅軍的口號。”^①

在極度緊張的狀態中，蘇區的政治氣氛也越發嚴厲，在擴大紅軍中成績不佳的幹部都受到處罰。1934年1月，《中央關於擴大紅軍突擊月總結的決定》稱：“擴大紅軍的動員是同開展殘酷的階級鬥爭不能分離的（許多地方對於破壞擴大紅軍的分子，採取了自由主義的態度），因此在我們的動員中表現了各地方工作不平衡的嚴重現象”。“給軍委過去寧化突擊隊長楊岳彬同志以最後嚴重警告，全總執行局突擊隊長黃子剛同志以嚴重警告，中央政府過去會昌突擊隊長古柏同志交中央黨務委員會討論他的黨籍問題，福建省委書記譚秋同志撤銷工作。”^②

2月9日，張聞天簽署人民委員會第五號命令，“給予國家政治保衛局及其分局在下列條件下有直接拘捕處決反革命之特權”，也就是不經司法機關審判即可處決。命令規定：邊區保衛局、戰線上的紅軍保衛局對於敵軍偵探、地主叛變分子、刀匪首領、地主富農出身的刀匪，可以“不經過法庭，採取直接處置”，而且其他政府機關、軍政首長都無權干涉，有爭議只

^①《目前的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1934年1月18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0），第39頁。

^②《中央關於擴大紅軍突擊月總結的決定》（1934年1月5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0），第4、6頁。

能上報人民委員會。^①

由於戰事始終被動，紅軍中悲觀動搖情緒開始出現，以往少見的叛逃現象越來越多。五軍團十三師師長陳伯鈞日記中從1934年初頻繁出現戰士甚至幹部叛逃的記錄，比如1月10日，“召集警備連連長、指導員作了一次深刻又嚴肅的談話，為的是消滅逃亡問題。該連近二、三日來一連逃跑了五個戰士”；2月21日，“友軍逃跑幹部數名，敵已知我企圖”；2月23日，“卅九團昨（廿二日）晚逃走一人，系五十九師俘虜，並帶槍彈”；3月5日，“卅七團逃走（帶槍）一連指導員”；3月7日，“卅七團又發現拖槍逃跑三人”；3月8日，“卅七團不到半月連續拖槍投敵者十一名，情形極為嚴重”。^②

《紅星報》1934年2月報導：“最近仍然發現個別部隊有極少數份子拖槍投敵的現象。特別是第七團發生了一個班長、一個連長投敵的事實，主要的原因是由該團負責人官僚主義的領導與階級警覺性的缺乏，政治委員更要負主要的責任。因此，軍委已將該團政委莊紀鳳同志撤職，並調至軍團政治部討論他的錯誤和責任問題，團長劉家鈺同志亦撤換工作。某師亦發生了一個偵查長投敵，甚至某師還發生一個指導員投敵的可恥現象”。“以鎮壓反革命的嚴厲手段來對付這些卑污可恥的叛徒，拿出過去七軍和獨立四師的紅色戰士對付李明瑞、龍普林的手段來對付這些叛徒是絕對必要的。”^③

紅軍十人團成為政治保衛局的重要基層組織，對鞏固部隊中發揮了不小的作用。十人團的任務是“克服和預防逃跑現象的發生”。“十人團的團員必須是政治堅定、作戰勇敢、努力工作熱心，並在紅軍戰士中是有信仰的共產黨員、青年團員及完全具備上述條件的紅軍戰士，但十人團團長

①《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命令第五號》（1934年2月9日），《中央革命根據地歷史資料文庫——政權系統》（8），第1419頁。

②《陳伯鈞日記·文選》上卷，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2年版，第72-87頁。

③《完全消滅個別投敵現象》，《紅星報》（1934年2月25日），總政治部辦公廳編：《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歷史資料選編》第二冊，第687頁。

必須是共產黨員”。“十人團以連(伙食單位同)為單位組織之,吸引群眾自願報名加入,經過全連軍人大會通過,和連指導員審查,獲得團政治委員批准成立之。”十人團的具體任務是:“察覺人員中的可疑行動,應立即報告首長和政治部並注意監視”;“在駐軍時輔助軍政首長查街、巡夜和禁止任何人自由外出和外宿”;“在行軍時防止故意落伍或裝病掉隊的分”;“在戰時對膽小、畏怯、喜發謠風的分子應經常注意,隨伴他們,鼓起他們的膽量和勇氣,防止他們的恐慌和騷亂;對於自由離開火線逃往後方的分子,應鼓動並督責他們攜著武器到前線去,同時要防止怕死的分子,借著裝病、自殘(自己打傷自己)、假裝送傷兵、送信、採買等虛偽辦法,離開火線躲在後方。”“十人團有權逮捕逃跑的分子,並得解除個別的或集體的逃跑者的武裝,但只能逮捕送交上級軍政首長轉相當機關處分”。^①

第二補充師的十人團在護送新戰士到前線的路上發揮了很大作用。出發前,每個十人團員和政治戰士都接受了具體任務。行軍時,他們合理分工,分佈在佇列不同位置,帶領戰士講笑話、唱山歌,提高大家的情緒。“十人團的同志,每個都具有很高的階級警覺性和責任心。如九連有個戰士在中途回答群眾歡迎的口號,有意無意的喊‘消滅共產黨’,該連的十人團員立即揭發,並派人監視考察其行動;第六連的十人團員能關心二連兩個迷途的戰士,把他送回二連駐地;第二連的十人團員看見一個地方連長與他同鄉戰士在房子裡鬼頭鬼腦的談話,能立即向指導員報告”。“八團一千三百多新戰士,一百五六十個運輸員,自興國出發到了前線,竟沒有逃亡,沒有一個病員和掉隊的”。^②

模範連十人團的警覺性達到了驚人的程度,抱怨吃的不好可能被逮捕,甚至上廁所跑的遠一點都受到懷疑。一個戰士說紅軍苦,沒鹽吃,立即被報告。一個故意丟炸彈丟槍的,“查出是混入紅軍的地主,報告上級

①《紅一方面軍關於反逃跑十人團的組織與工作綱要》(1933年7月10日),總政治部辦公廳編:《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歷史資料選編》第二冊,第415-416頁。

②《第二補充師護送工作的進步》,《紅星報》(1934年6月20日),總政治部辦公廳編:《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歷史資料選編》第二冊,第795頁。

逮捕槍決了”。一個人企圖投敵，被十人團發覺；“一個當過大刀會開過小差，工作一貫消極的壞蛋，也被十人團發覺，把他逮捕送上級”；一個衛生員說紅軍沒油鹽吃，上高山沒錢用，白軍好有錢用，十人團發覺逮捕送裁判所；“有一個跑很遠的地方去解手，實際上沒有解手，十人團當時發覺了以後，便與之談話”。^①

為了在危急形勢下鞏固蘇區，政治保衛被提到了新的高度。隨著國民黨軍步步進逼，在蘇區革命中遭到打擊的地主富農殘餘勢力活躍起來，準備響應敵軍。黨組織號召“對於這些反革命的活動必須採取最無情的鎮壓。加強肅反機關的工作，擴大保衛隊的武裝力量，嚴密赤色戒嚴，來肅清新區邊區土匪、民團、大刀會、童子兵以及敵探與反革命組織的活動”。“必須最大的提高革命的警覺性，揭發隱藏在蘇維埃機關內進行暗中破壞活動的階級異己分子與害蟲，給他們以嚴厲的革命的制裁。”^②

隨著肅反氣氛越來越緊張，很多“反革命分子”被查了出來，由於邊區形勢嚴峻，查出反革命分子可以不經裁判部審判，直接處置。1934年4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司法程序》規定：“邊區的地方保衛局，在戰線上的紅軍保衛局，對於敵人的偵探、法西斯蒂分子、刀匪、團匪及反革命的豪紳地主，有權採取直接處置，不必經過裁判部。在嚴重的緊急的反革命案件上，國家政治保衛局及其地方分局、紅軍分局、軍區分局，有權採取緊急處置”。^③

紅軍總政治部1934年6月發出關於檢舉的訓令，認為隨著敵人向核心蘇區逼近，戰爭愈加緊張殘酷，必須把隱藏在部隊中的階級異己分子與不可靠的分子檢舉出去。“對於那些隱瞞成分，假冒工人、農民混入部隊，或者過去雖然表現過積極努力，而現在卻表現出政治動搖的地主、富農出身的分子，應該堅決從部隊中檢舉出去，絕對不能再容許這些分子存留在

① 劉志堅：《鞏固紅軍模範連十人團工作的檢查》（1934年8月17日），總政治部辦公廳編：《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歷史資料選編》第二冊，第871頁。

② 《五中全會給二次全蘇大會黨團的指令》（1934年1月），《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0），第77頁。

③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司法程式》（1934年4月8日），總政治部辦公廳編：《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歷史資料選編》第二冊，第718頁。

部隊中”。“在檢舉與洗刷階級異己分子和壞分子的過程中，要加緊肅反鬥爭。因為這些分子，往往與反革命分子有關係，或者被反革命分子所利用，甚至有時他們自己就是反革命分子。因此必須有極高度的階級警覺性，協同保衛局採取堅決的手段，處置反革命分子”。^①

在生死存亡的決戰中，氣氛緊張到極點，任何不滿都可能被當成反革命活動，絕對服從上級命令才能生存。1934年8月，袁國平在《高虎腦戰鬥的政治工作》強調：“我們要堅決在中革軍委統一意志領導之下，團結像一個人一樣的行動起來，絕對服從上級指揮，與堅決執行上級一切命令。”^②紅軍出發長征之前，陳毅受了重傷，住在醫院，沒人敢告訴他關於長征的消息：“當時有些高級幹部來看我們，他們不好講，我也不問，問起來使他們狼狽，講了便是洩露了秘密，那時要殺頭的。”紅軍長征之後，陳毅被任命為留守司令，他提出必須轉變思路，從正規作戰轉向遊擊戰，但沒人敢回應，陳毅回憶：“我講了後，有些人還是有顧慮，很害怕，怕說他是動搖分子，怕殺，不敢暴露思想”。^③

但是，即使紅軍和蘇區建立起高度集中的強大組織系統，把蘇區的人力和物力動員到最大極限，也很難扭轉當時國共之間懸殊的力量對比，更何況集中一切領導權力的還是博古、李德這樣不稱職的領導人。到1934年秋天，戰局越來越嚴峻，蘇區被大大壓縮，中共中央不得不於10月率領紅軍踏上長征之路。

五、小結

從1930年夏天開始，斯大林認識到紅軍和蘇區代表了中國革命的前

① 《總政治部關於檢舉問題的訓令》(1934年6月16日)，總政治部辦公廳編：《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歷史資料選編》第二冊，第786頁。

② 袁國平：《高虎腦戰鬥的政治工作》(1934年8月14日)，總政治部辦公廳編：《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歷史資料選編》第二冊，第860頁。

③ 陳毅：《憶艱苦的三年遊擊戰爭》，《回憶中央蘇區》，第496、530頁。

途，決策把中國革命重心從城市轉到蘇區。六屆三中全會接受了國際指示，籌畫建立蘇區中央局，六屆四中全會後戰略轉移的速度大大加快。

中共中央遷入蘇區是逐漸進行的，領導人項英、任弼時、周恩來、博古等分批進入。蘇區中央局和中央分局建立的目的，就是加強對蘇區和紅軍的領導，在殘酷的戰爭環境下，政治保衛局系統對建立集中領導體制發揮了重要作用，蘇區依靠這種高度集中的體制動員一切力量，對抗國民黨數十萬大軍的持續圍攻。

新來的領導人由於對蘇區實際情況理解不深刻，往往急於求成，與毛澤東為代表的當地領導人發生意見分歧。在1932年10月的寧都會議上，毛澤東被取消了軍事指揮權，博古等人還通過發動反羅明路線鬥爭打擊地方幹部，進一步集中權力。但大權獨攬的博古、李德卻不是合格的領導人，他們經驗不足，才能有限，給反圍剿作戰和蘇區的命運帶來不利影響。

在反圍剿戰爭的巨大壓力下，紅軍和蘇區處於持續的高度緊張狀態。中共政治保衛系統通過建立“十人團”等嚴密的組織，實現了對人力、物力最大限度的控制和動員。但由於力量過於懸殊，加上領導不力，紅軍無法打破國民黨的第五次圍剿，不得不在1934年10月突出重圍，開始傳奇性的艱險長征，中國革命也由此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第九章

鄂豫皖中央分局與白雀園肅反

1931年1月六屆四中全會後，中共加快了戰略重心向農村轉移的進程，除了在中央蘇區建立中央局，還決定在鄂豫皖蘇區和湘鄂西蘇區建立中央分局。鄂豫皖中央分局的成立經歷了一些變化，最初名單中並不包括後來的核心張國燾。3月10日，中央做出《關於鄂豫皖蘇維埃區域成立中央分局決議案》，規定：“未與江西中央蘇區打通以前，中央分局完全直隸於中央政治局，其職權系代表中央政治局而高於各省委”。“鄂豫皖中央分局成立後，原鄂豫皖邊特即應取消。鄂豫皖中央分局應經過黨團領導鄂豫皖特區蘇維埃政府工作，在政府下組織鄂豫皖革命軍事委員會，直接受中央分局指導”，“紅軍第四軍及皖西獨西立師統歸特區軍委會指揮”。^①

決議案指定了中央分局成員名單，剛當選中央候補委員的沈澤民擔任書記，曾中生擔任軍委書記。“中央分局的組織定九人，中央政治局除決定沈澤民，舒傳賢，曠繼勳，方英，曾鐘聖，柯慶施六同志外，並決定由當地邊特中推選三人。此外，青年團的負責人（書記），亦須加入中央分局，為當然委員，報告中央批准。分局以澤民同志任書記，傳賢同志任組織，方英或慶施同志任宣傳，鐘聖同志任軍委書記”。因曾中生曾經積極支持立三路線，決議還特別提到：“鐘聖同志，必須在堅決的放棄立三路線與對立三路線調和主義的錯誤，而堅決執行國際路線的條件下，才能參加中央分

^①《關於鄂豫皖蘇維埃區域成立中央分局決議案》（1931年3月10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7），第186-187頁。

局，與擔任軍委書記。”^①

但中央很快決定改派張國燾去主持鄂豫皖中央分局。沈澤民的經驗和威望都明顯不足，而張國燾是資深的中央領導人，四中全會後從莫斯科回國，再次進入中央核心決策圈，分量顯然比沈澤民重得多，更有能力代表中央去加強對鄂豫皖的領導。張國燾和陳昌浩在負責安全的政治局候補委員顧順章親自護送之下，4月初從上海出發，4月10日左右到達鄂豫皖蘇區，4月17日與從另一方向到達的沈澤民會合。中央在5月6日決議中規定：“中央局的責任，應該是中央在當地的直接的代表，他有權力否認黨委的決議，甚至有權力解散黨委”，“中央指定張特立、沈澤民與陳昌浩為中央局的委員，特立為書記，特立同志兼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澤民同志兼鄂豫皖省委書記。”^②

鄂豫皖中央分局第一號通知發佈於5月16日，宣佈即日取消鄂豫皖特委。^③中央分局委員為張國燾、沈澤民、陳昌浩、舒傳賢、曠繼勳、方英、曾中生、柯慶施、郭述申、周純全、高敬亭十一人，同時成立軍事委員會，成員為張國燾、沈澤民、陳昌浩、曠繼勳、曾中生、徐向前、鄭行瑞七人。張國燾擔任中央分局書記和軍事委員會主席，成為鄂豫皖蘇區最高領導人。^④

一、中央分局發現鄂豫皖紅軍存在嚴重紀律問題

鄂豫皖紅軍的成長有一定特殊性，它不像中央蘇區紅軍那樣包含秋收起義和南昌起義的正規部隊，幾乎完全是由農村遊擊隊發展而來的，帶

①《關於鄂豫皖蘇維埃區域成立中央分局決議案》(1931年3月10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7)，第188-189頁。

②《中共中央關於成立鄂豫皖省委以及根據地與紅軍建設等問題的指示》(1931年5月6日)，總政治部辦公廳編：《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歷史資料選編》第一冊，第703頁。

③《鄂豫皖中央分局通知第一號》(1931年5月16日)，《鄂豫皖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甲1)，中央、湖北、河南、安徽檔案館1985年，第2頁。

④《張國燾關於鄂豫皖區情況給中央政治局的綜合報告》(1931年5月24日)，《鄂豫皖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甲1)，第42頁。

有濃厚的傳統農民起義軍的缺點，要把這樣的農民隊伍建設成紀律嚴明的革命軍隊，是需要一個過程的，而且其中似乎難免要經過一個嚴厲整肅的階段。

1931年4月張國燾、沈澤民、陳昌浩進入鄂豫皖建立中央分局時，鄂豫皖紅軍主力已經由幾支分散的遊擊隊整編為紅四軍，轄第十、十一、十二、十三師和彭楊軍校。軍長曠繼勳（後改徐向前），政委曾中生。各師師長分別是劉英、周維炯、許繼慎和徐向前，彭楊軍校校長為蔡申熙。紅四軍雖然已經進行了一系列的整頓，在正規化上取得了一定進展，但是仍然存在嚴重的紀律問題，特別是存在相當多的誘姦甚至強姦婦女的行為，而且這種行為存在于不少高級幹部，這時的鄂豫皖紅軍很難說是合格的紅軍。

皖西領導人方英在1931年7月給中央的報告中提到：“曠繼勳和中生在河口命令地方黨部佈置路線，準備找六個女子共同分配，但因種種原因，中生的事幸沒有完成。在擴大會時，澤民同志提議組織‘審查此問題’，在常委中雖然收集了很大材料，但國燾同志不同意此種小題大做，所以沒有通過。紅軍與蘇維埃尚未有建立親密的聯繫，以為蘇維埃是紅軍招待所，尤其對於婦女的關係惡化非常。四軍到麻埠時有七區一個十六七歲少女被紅軍強姦，十二師卅六團到霍山”，“也發生強姦少共青團員事件。紅軍南下時，到各處都有強姦事發生，還有少數女子心為擁護紅軍是解決性的問題，是唯一要務。自動把慰勞紅軍的婦女分配給團長、參謀長睡覺。”^①事實上，這種風氣在鄂豫皖蘇區由來已久，地方幹部中早就存在類似的問題，何玉琳在1929年給中央的報告中就提到：“安、麻、陂、光黨裡負責人除最少數外，約有四分之三的多數，總與數十、數百女人發生性的關係，因此養成進步婦女向墮落、腐化、浪漫方面走”。^②

①《方英關於紅四軍和蘇維埃政權建設問題給中央的報告》（1931年7月1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鄂豫皖時期（下）》，解放軍出版社1993年版，第279頁。

②《何玉琳給中央的報告》（1929年9月8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鄂豫皖時期（上）》，解放軍出版社1993年版，第365頁。

從上述材料可以看出，紅四軍還帶有明顯的傳統農民起義軍的特點，帶有野蠻落後的印記，即使像曾中生、曠繼勳這樣的紅軍高級領導人，也難免在對待婦女上存在問題。當年的革命者多有些“英雄”氣概，有些人比如師長許繼慎就認為“愛好醇酒美人，乃是英雄本色”。^①高級幹部如此，下級幹部和士兵的紀律就更難保證了，紅四軍當時還達不到紀律嚴明的標準。29歲的沈澤民比較書生氣，在6月擴大會議上準備展開鬥爭，倒是張國燾更老練一些，大概覺得下車伊始，不宜馬上鬥爭當地幹部。但中央分局擴大會議的決議中還是明確提出：“擴大會議特別指出一部分紅軍幹部及戰士對婦女的不正確的關係是極嚴重的錯誤行為，這種行為要引導到紅軍脫離群眾，應當嚴格糾正，並且指出黨的組織特別是紅軍中負責同志，對於這種行為不加糾正，是政治上的嚴重錯誤，以後同志中犯此錯誤者，應照行黨的紀律範圍以外的制裁。”^②在中央分局第一次擴大會議總結報告中再次提出：“反對不正確的兩性關係，對婦女的昏亂行為，特別是紅軍中負責同志首先改正去影響士兵。”^③

不僅如此，鄂豫皖紅軍的有些部隊是收編民團、土匪、幫會等發展而來的，成分極其複雜，組織結構上深受幫會影響，紀律更難改善。特別是皖西紅軍三十二、三十三師，一度幾乎脫離了黨的領導，上級委派擔任師委書記、黨代表的徐子清、徐其虛、戴亢君三名高級幹部先後被擅自殺害。1929年鄂豫邊革命委員會報告中提到：“三十二師是由民團拖出來的幾十支槍及農民收繳土匪所埋藏的槍支二十余支”，“成份流氓分子太多，政治工作可以說沒有做，對外影響不太好，很多農民說他是土匪”。^④1930年六安縣委的報告中也提到：“三十三師的軍紀是不大好的，尤其是這次(打)

① 張國燾：《我的回憶》第三冊，第97頁。

② 《鄂豫皖中央分局第一次擴大會議政治決議案》（1931年6月），《鄂豫皖蘇區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甲1），第96頁。

③ 《鄂豫皖中央分局第一次擴大會議總結報告》（1931年6月30日），《鄂豫皖蘇區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甲1），第135頁。

④ 《鄂豫邊革命委員會報告》（1929年），《鄂豫皖蘇區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甲2），第66-67頁。

英山、霍山為最壞，差不多形同土匪。”^①

1930年鄂豫邊特委《關於商城三十二、三十三師的報告中》提到：“商城方面，過去青紅幫的組織很多，因此黨內多參有幫的組織，同時各種份子異常雜紊，因此組織都不健全”，“一切不純的份子如紅幫內份子都在黨內軍內負重要責任，一般同志的地位思想和地方觀念充滿黨內，前次解決徐□□，二次解決戴□□（三十二師黨代表，商，同志），都是這些份子的這些觀念的造成，王子渥、徐瀾亭、徐泉、崔海峰、崔德偉等不經組織決定，不令旁人知道秘密解決的，因此弄得一般同志人人自危，談話，開會，做事，都是相互留心，猜疑敷衍。”^②徐向前也提到，第一次和商城部隊會合時，由於對方“以前發生過槍殺特委委員的事，我們也有顧慮，晚上睡覺枕著槍，以防意外”，第二天早晨發現商城部隊不辭而別，“他們有戒心，也不奇怪。”^③可見，當時鄂豫皖紅軍不同部隊之間，相互都能感覺到類似江湖火拼的危險氣氛。

1930年1月，商城還曾發生八名幹部險些被殺、被迫出逃的嚴重事件。1929年12月25日，三十二師攻下商城，中央巡視員郭樹勳和劉英等來到部隊，準備整頓三十二師，調原師長周維炯到上海受訓，改由劉英擔任師長。不料在會議中，參與殺害徐子清、徐其虛、戴亢君的李梯雲、王澤渥、徐乾等極力煽動阻撓，控制會議，氣氛極為緊張。會議期間，縣委書記孔文彬接到士兵委員會常委項弼的秘密報告：李梯雲、王澤渥、周維炯、肖方等私下開會，“說我們都是第三黨，信陽中心縣委也是第三黨，決定馬上扣留解決我們”。結果，中央巡視員郭樹勳、師委書記郭天民、師長劉英、縣委書記孔文彬、黨代表吳荊赤、政治部主任李榮桂、九十八團黨代表王

①《六安縣委軍事報告第二號》（1930年4月15日），《鄂豫皖蘇區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甲4），第139頁。

②《鄂豫邊特委關於成立鄂豫邊革命委員會經過的報告·附5：關於商城三十二、三十三師的報告》（1930年初），《鄂豫皖蘇區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甲2），第80頁。

③徐向前：《歷史的回顧》，解放軍出版社1987年，第82頁。

子良、九十七團黨代表金佛廣等八人連夜出逃。^①

中央巡視員郭樹勳逃到潢川以後，1月19日寫信給中央，不僅報告了被迫出逃的過程，而且提到周維炯“不願來上海受訓練”，“怕中央處分他們”，“對黨表示不滿”，“三十二師商城同志完全反對接受開動軍隊的命令”，認為“三十二師和商城黨的危機，嚴重得非常，指導機關充滿了投機分子和腐化的東西。三十二師被流氓等所把持，軍隊的前途危險非常，真有共產黨員不能起作用，因此我們對商城和三十二師的黨，要用極大的力量來改造”。^②

郭樹勳2月19日給中央寫出更詳細的報告，對三十二師提出尖銳批評：師委常委劉殿元“英雄思想很濃厚”，“在農村奸誘農村婦女，士兵非常不滿意，因為士兵犯了受處分，上級犯了，一點處分也沒有”。“司令部鬧得烏煙瘴氣，是他吞煙吐霧的地方，紅軍中吸食大煙真是奇怪現象；一般流氓在司令部自由往來，戲子成天掛著紅軍徽章在到處耀武揚威”。“我以後參加了軍隊中許多支部、小組的會議，在這些會議中，知道黨在軍隊中沒有影響，同志比群眾還落伍些，當攻下商城的時候，同志為著搶東西互相打架，有的把金錢帶回家去，甚至有許多因為暴富了，脫離隊伍放棄革命了，這主要的是沒有建立起黨的政治影響和樹立黨的紀律。”^③

1930年春天紅一軍成立，三十二師改編為二師，三十三師改編為三師。鄂豫邊特委綜合報告又提到：“二師是由幾個同志在商城民團內工作，拖出來一部分”，“利用‘幫’的路線收編一些小股土匪，所以二師的成份，十分之六是農，十分之四是土匪”，“成立封建的組合、部落的組合、姓氏的結合、‘幫’的結合等。負責人互相發展私人勢力，互爭領袖等，因此以前有排斥外來同志等行動”。“三師開始是二師在六安、霍山遊擊，繳了

①《郭樹勳巡視河南商城情況給中央的報告》（1930年2月19日），《鄂豫皖蘇區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甲5），第328-333頁。

②《豫南巡視員郭樹勳關於商城及三十二師黨內糾紛問題給中央的報告》（1930年1月19日），《河南革命歷史文件彙集》（4），中央檔案館、河南省檔案館1983年，第217-220頁

③《郭樹勳巡視河南商城情況給中央的報告》（1930年2月19日），《鄂豫皖蘇區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甲5），第322-325頁。

一些武裝交給六安編成遊擊隊，後又收編了一部土匪編成的，士兵成份，內面大部分是農民，小部分是土匪”。“一師因為士兵的成份較好，在群眾中的行動較好一些，二、三師參加(雜)土匪成份，到處行動不好，如買東西不給錢，偷農民家的東西等，弄得農民說二、三師是土匪”，“二師尾大不掉，故意與軍部為難”。^①

1931年初，紅一軍和十五軍合編為紅四軍。雖然在成立紅一軍和成立紅四軍兩次整編中都曾進行混編，力圖改善部隊的成分和紀律。但是，由於沒有採取更為嚴厲的措施，主要幹部仍是原來的，有些部隊的風氣積重難返，甚至有些黨派去的幹部也受影響腐化墮落了，紅軍中仍然存在嚴重的紀律問題。在軍隊的整肅中，溫和的批評教育往往難以取得顯著成果，嚴厲的肅反卻可能短期內徹底改變部隊的組織結構和作風。

肅反決不僅僅是表面的“逼、供、信”，沈澤民的報告中透露出肅反的深層意味：“反對那種只知道從反動分子口中查問口供的簡單的肅反方法”，“紅四軍中肅反的經驗告訴我們，那些改組派、AB團、第三黨等等反動分子，平素引進富農，打擊工人、貧農成分的積極幹部，經濟上浮支濫費，侮辱婦女，劫奪貧苦農民的糧食肥豬，在軍事上故意違反命令”。^②從沈澤民的報告中可以解讀出這樣的意思，他把一切違反紀律的行為都列為整肅的對象，到底是不是真的改組派、第三黨，到底有沒有AB團，倒未必要深究了，實際上是憑藉肅反這樣一個嚴厲手段來整頓紀律。

二、紅軍公開對抗中央分局引發白雀園肅反

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擊敗國民黨，其根本原因是在“黨指揮槍”的原則之下，建立了集中統一、紀律嚴明的強大軍隊；而國民黨則由於黨權

^①《鄂豫邊特委綜合報告(續)》(編者判定1930年12月)，《鄂豫皖蘇區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甲2)，第192、194頁。

^②《肅反工作與兩條戰線》(黨中央1931年12月24日收到)，《鄂豫皖蘇區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甲1)，第535頁。

屈服於軍權，軍隊成為黃埔系、桂系、西北軍、東北軍、晉軍等不同派系的鬆散聯合，無法形成強大統一的力量。

但是共產黨貫徹“黨指揮槍”原則絕非一帆風順，而是經歷了嚴重的鬥爭，鄂豫皖肅反某種程度上也是這種鬥爭的一部分。由於國民黨軍對蘇區的殘酷圍剿，中共中央和紅軍的聯繫很困難，領導也就相應削弱了。張國燾、沈澤民、陳昌浩等進入蘇區建立中央分局，實際就是要貫徹“黨指揮槍”的原則，代表中央加強對鄂豫皖紅軍和蘇區的領導。但是，他們卻受到某些紅軍將領的抵制，1931年7月方英報告提到紅軍對中央分局的態度：“四軍在國際路線領導之下，在會議上不得不承認其錯，而是在實際上是種種辦法來破壞中央分局之威信，如說國燾同志不懂軍事，澤民同志太書生不能領導等等，弄成軍委在四軍中沒有什麼威信”。^①

中央分局和紅四軍幹部之間很快在發展方向上產生了分歧。由於前兩年戰爭的破壞，1931年春夏鄂豫皖蘇區發生了嚴重饑荒，當年的長江大水災又加重了危機。麻城縣委報告提到：“現在赤區已有五六千人沒有飯吃”。^②蘇區遭受如此大的困難，與1930年紅軍按立三路線向外進攻也有關係，雖然紅軍在蘇區外獲得很大勝利，實力增長，但“後方黃麻蘇區陣地大受敵軍蹂躪，糧食被毀，生產破壞”，“群眾遭受很大的損失”。^③1931年春中央分局成立後，下大力氣發起糧食運動，號召在蘇區每一片土地上播種。到夏秋糧食將熟的時候，蘇區周邊的白軍和地主武裝都蠢蠢欲動，要到蘇區來搶收糧食，保衛糧食成為一個嚴重問題，所以中央局不希望紅軍主力遠離蘇區。

但是紅四軍領導人曾中生等認為，蘇區經濟困難，“兩次‘包剿’以來，全軍不但沒發過一個零用費，而且衣服草鞋都弄到非常困難的地步。這

①《方英關於紅四軍和蘇維埃政權建設問題給中央的報告》（1931年7月1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鄂豫皖時期（下）》，第279頁。

②《鄂豫皖中央分局通知第七號》（1931年6月10日），《鄂豫皖蘇區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甲1），第60頁。

③《鄂豫皖中央分局第一次擴大會議政治決議案》（1931年6月），《鄂豫皖蘇區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甲1），第89頁。

樣全軍士氣遂呈每況愈下的危險現象，兵士潛逃日有所聞”，紅四軍必須南下向外發展才能解決給養問題。在6月擴大會議上，反對南下的沈澤民與曾中生、餘篤三、許繼慎等發生了激烈爭論，由於“得到了國燾同志贊成”，南下計畫“最後以多數意見表決”通過。^①

但是，張國燾同意南下也著眼於幫助中央蘇區對付第三次圍剿，所以命令紅四軍主力攻下英山後，向東出潛山、太湖，“威逼安慶，威吓南京”，而且要求紅軍及時回來保衛秋收，“大致規定這一行動以一月為期”。^②陳昌浩在1931年8月8日向中央報告：“紅軍主力現有十、十一、十二師之各兩團及軍部教導團一團共七團向南行動，主要目的是援助中央蘇區，佔據英山，近逼安慶。”^③

但是，紅四軍南下主力8月1日順利攻下英山後，並未按原計劃向東進攻潛山、安慶方向，而是自行決定繼續向南，佔據蘄水，繳獲“二十余斤金子，千八百斤銀子，數萬現洋”，“相當的解決衣服問題”，^④這大大改善了紅軍的物質條件，卻違背了中央分局的軍事計畫。紅四軍領導人也知道違反軍令，8月20日直接寫信給黨中央，解釋改變計畫的原因。

中央分局得知紅四軍擅自改變計畫後非常不滿。當時張國燾病重瀕危，分局書記由沈澤民代理，8月27日沈澤民起草了給紅四軍的信，^⑤提出嚴厲批評，認為紅四軍為瞭解決自身的經濟問題，“放棄援助中央蘇區，抗拒分局指示，放棄後方赤區，給敵人以良機緊攻中央蘇區，給敵人以可能擾亂後方赤區與秋收，使後方二百萬群眾不能安全秋收，這樣解決經濟問

①《徐向前、曾中生關於紅四軍情況及行動方向的意見給中央的報告》（1931年8月20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鄂豫皖時期（下）》，第358頁。

②《鄂豫皖中央分局、軍委會給曾中生、徐向前的信》（1931年8月27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鄂豫皖時期（下）》，第367頁。

③《致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的信》（1931年8月8日），《鄂豫皖蘇區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甲1），第191頁。另外，此信編者所加題目有誤，從信的內容看，是給中央的信。

④《徐向前、曾中生關於紅四軍情況及行動方向的意見給中央的報告》（1931年8月20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鄂豫皖時期（下）》，第359頁。

⑤張國燾：《我的回憶》第三冊，第98頁。

題，是工農紅軍絕不出此，是負責黨與蘇維埃的使命來領導紅軍的同志絕不應當出此”，進而批評紅四軍“對這次分局指示完全採取了一種外交式的接受，實際上走到公開的拒抗”，命令紅四軍“接信後火速回來，不能有絲毫的停留”。^①

9月初收到中央分局的信以後，紅四軍領導人很不服氣，在回信中激烈批評“分局的這種指示，完全憑藉片面的根據和純主觀出發，與我們前方行動的事實意義和客觀環境是絕對不相符合的”，質問中央分局：“進攻安慶威脅南京，是這樣輕率不加準備而可發出軍令嗎？”進而抨擊中央分局：“命令合近代編制一師不足的紅軍去取安慶威逼南京，這恐近於共產黨之誇大狂了”，“未免太近於紙上談兵了”。^②

紅四軍的對抗行動很快進一步升級，曾中生在雞鳴河召集了全軍連指導員以上幹部大會，會上“群情激憤”，^③通過了猛烈攻擊中央分局的決議，並且把對抗中央分局的回信散發到了地方黨部和非黨組織中。雞鳴河會議是一個嚴重事件，改變了爭論的性質和範圍。上下級之間發生爭論，在共產黨的組織原則上是允許的，即使言辭激烈一些，在革命隊伍中也不算大錯，彭德懷罵過李德，徐海東罵過沈澤民，林彪在會理會議前寫信批評過毛澤東，這些爭論都限制在少數領導人之間，是正常的工作爭論。但是，紅四軍領導人召集大會，通過反對上級領導的決議，印發反對上級領導的文件，性質就完全不同了，等於是軍隊公開對抗上級黨的領導，這就和1935年9月15日張國燾煽動反對中央的“阿壩會議”很類似了。雞鳴河會議顯然違反了“黨指揮槍”和“下級服從上級”原則，由於中央分局直接代表中央，紅四軍連“全黨服從中央”的原則也一併違反了。

中央政治局1931年3月關於富田事變的決議已明確規定：“紅軍中的

①《鄂豫皖中央分局、軍委會給曾中生、徐向前的信》（1931年8月27日），《鄂豫皖蘇區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甲1），第224-225頁。

②《紅四軍給鄂豫皖中央分局的信》（1931年10月21日帶到），《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鄂豫皖時期（下）》，第389-390、392-393頁。

③徐向前：《歷史的回顧》，第151頁。

各級黨部的主要任務是保持和加強紅軍的革命紀律和戰鬥力。因此執行上級機關、指揮員與政治委員的命令是每一個黨員團員第一步的基本任務”。“不執行命令，批評這種命令和行動計畫，批評上級指揮員的戰略，是絕對不允許的”。“即在紅軍以外的黨部，亦不容許在公開會議或公開文件中批評紅軍指揮部的行動計畫和策略”。“絕不容許拒絕執行上級軍事機關的命令和破壞軍事紀律，我們軍隊中的黨員，對於這種拒絕執行基本任務的行動，應採取最嚴厲的制裁。”^①

中央分局擔心紅四軍抗命不回蘇區，任命陳昌浩代替曾中生擔任紅四軍政治委員。陳昌浩在兩次乘“列寧號”飛機空降未果的情況下，於9月13日飛馬趕到紅四軍駐地，接管了指揮權，“在四軍幹部反對昌浩同志的空氣之下，昌浩同志在迅速進行肅反”。^②紅四軍回到蘇區白雀園以後，中央分局通過了關於紅四軍錯誤的決議。決議在軍事計畫上做了一定的自我批評，承認“選擇安慶的目標，而不首先詳加考慮從英山至潛山至安慶，一般地形與群眾鬥爭狀況的不利之點，在決定戰略上，是疏忽的”，但重點是批評紅四軍在組織上的錯誤，認為雞鳴河會議是“非常嚴重的錯誤”，“動搖了黨在紅軍中的威信，這是最危險最有利於敵人的行動，這種行為如果繼續下去，足以破壞黨、紅軍和整個蘇區”。“這個會議上竟將四軍答覆中央分局和軍委會的信印刷散發，事後調查這個文件竟散發到了皖西的地方黨部和非黨組織中去。中央分局嚴厲的指出，這是反黨的、羅章龍右派所首用過的鬥爭方式。”^③

綜上所述，中央分局和紅四軍幹部關於進軍方向的爭論是正常的工作分歧，甚至四軍的意見更符合實際。但是中央分局是四軍的上級，是代表中央來領導紅四軍的，四軍在沒有迫不得已的理由的情況下，應該服從

①《中央政治局關於富田事變的決議》（1931年3月28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7），第207-208頁。

②《鄂豫皖中央分局張國燾給中央的報告》（1931年11月25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鄂豫皖時期（下）》，第458頁。

③《鄂豫皖中央分局關於紅四軍的決議》（1931年10月），《鄂豫皖蘇區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甲1），第376-378頁。

中央分局的領導，這正是“黨指揮槍”原則的體現。四軍領導人認為中央分局領導不懂軍事，輕率地違反了分局和軍委的命令，在遭到批評後，不但拒絕接受，反而召開大會，進行激烈的對抗，這顯然是嚴重違反了共產黨的建軍原則。

當時的四軍軍長徐向前晚年談到雞鳴河會議時也不得不承認，當時“十二師政治部主任吳煥先同志不同意這種做法，認為在組織上、行動上應執行分局的命令北返。”徐向前本人也認為，雞鳴河會議“是下級組織召開活動分子會議反對上級組織的指示，這是不妥當的。結果，給張國燾抓住了把柄。”^①徐向前、倪志亮 1945 年撰寫的《鄂豫皖蘇區紅軍歷史》也承認：“當時軍部在組織上確有反抗分局命令的現象。對分局的命令如有不同意見，可以由軍部向分局提出，不應召集支書、指導員以上幹部會議進行反對執行分局命令的討論，這在軍事組織上是不允許的。”^②

軍事策略正確與否，是可以討論的，但是紅四軍在組織上無疑違反了“下級服從上級”原則，特別是還違反了更為嚴格的“黨指揮槍”原則，這無疑是非常嚴重的問題。中共中央在得知中央分局與紅四軍的衝突以後，在 1931 年 11 月 3 日信中嚴肅地指出：“四軍領導幹部違抗中央局的命令，自由決定佔領武穴回兵進取六安的策略是嚴重的政治上與組織上的錯誤”。“在組織上四軍違抗軍事委員會的命令，自由的更改軍事計畫，拒絕中央分局的正確指示，召集非黨會議來反抗中央局的決議，印發中央局的決議到地方黨部及軍隊下級黨部去，並且不經中局向中央報告，企圖蒙蔽中央，是嚴重的反黨的錯誤。這種錯誤非但是布爾什維克黨所不能容許，而且是污辱了工農紅軍中的政治工作的光榮”。^③

事實上，以雞鳴河會議為高潮的紅四軍抗上事件是引發白雀園肅反

① 徐向前：《歷史的回顧》，第 151 頁。

② 徐向前、倪志亮：《鄂豫皖蘇區紅軍歷史》（1945 年），《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鄂豫皖時期（上）》，第 34 頁。

③ 《中央給鄂豫皖中央分局的信》（1931 年 11 月 3 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鄂豫皖時期（下）》，第 405-406 頁。

的主要原因。前面曾經提到,即使發現了四軍領導人中存在嚴重侵犯女性的問題,中央分局也只是公開提出批評,在被批評者承認錯誤的情況下,並未採取更嚴厲的措施,受到批評的幹部仍擔任原職。但“黨指揮槍”是共產黨建軍的根本原則,如果有人觸犯了這一條,情況就大不相同了,必然會引起上級黨組織的震怒,遭到嚴厲的處分,加上當時複雜的政治形勢讓中央分局懷疑有敵對勢力混入紅軍,於是直接引發了大開殺戒的白雀園肅反。

三、當時政治派系極為複雜也是肅反誘因

重大歷史事件往往不是單一原因的,肅反中發生很多冤案,只有放在1930年前後複雜的政治派系鬥爭的背景中,才能獲得全面深刻的認識。1927年國共分裂後,國民黨和共產黨又先後發生了自身的分裂,國民黨左派先後成立了以汪精衛、陳公博為首的改組派和以鄧演達為核心的第三黨,共產黨也先後分裂出以陳獨秀、彭述之為首的托陳派和另立中央的羅章龍派。這些人都曾是大革命期間並肩戰鬥的戰友,很多人之間都有深厚的私人關係。當時勝負未定,這些派別都在積極活動,招募成員,擴大組織。在這種情況下,一個人很容易在不同組織之間發生搖擺,組織上也很容易對成員的忠誠產生懷疑。中國共產黨在整肅組織方面最為嚴厲,這是發生冤案的重要原因,但也正是這種嚴厲態度使中共鍛造出最為嚴密的黨組織。

在鄂豫皖蘇區的肅反中,被視為主要危險的是改組派和第三黨,陳昌浩1931年11月總結肅反的文章即名為《肅清改組派、第三黨、AB團》,^①AB團在1927年後早已不復存在,但改組派和第三黨確實是1928年到1931年間很有影響的國民黨左派組織。改組派是1928年由汪精衛派的陳公博、

^①《肅清改組派、第三黨、AB團》(1931年11月),《鄂豫皖蘇區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甲1),第476頁。

顧孟余、王樂平等人創建，他們以上海為基地，創辦《革命評論》、《前進》等刊物和大陸大學，提出“民生革命”、“民生政治”等主張。改組派1928年冬天召開全國代表大會，正式成立“中國國民黨改組同志會”，並建立了各地支部，號召反蔣，在對南京政府感到失望的知識青年中有很大影響。每當馮玉祥、李宗仁、閻錫山等軍事實力派起兵反蔣的時候，往往以汪精衛和改組派為政治招牌。在1929-1930年歷次反蔣戰爭先後失敗後，1931年2月因在約法問題上產生分歧，蔣介石囚禁胡漢民於湯山，引發廣東、廣西通電反蔣，汪精衛為首的反蔣派系聚集廣州，成立廣州國民政府，改組派再次活躍起來。

鄂豫皖蘇區臨近武漢，受1927年國民黨左派的武漢政府影響較大，是改組派較為活躍的地區。在1929年蘇區創建初期，共產黨和改組派的鬥爭相當激烈。舒傳賢1929年給中央的報告提到：“霍山國民黨在十七年直至今年四月，都傾向汪精衛派，到今年四月後正式加入改組派，他們一方面抓政治機關，一方面抓群眾”。“六安의國民黨在過去派別很多，現在國民黨分兩派，一派屬改組派，一派屬蔣派的，但他們時常內訌，又只見抓政治機關以及城市群眾，不大注意鄉間的群眾。”^①1929年鄂豫邊革命委員會報告幾次破壞改組派組織，殺死改組派“湖北省委一人，特派員兩人，河南省委一人，縣委、區委及活動分子七、八十人”。^②鄂豫邊特委1930年2月給中央的信中提到：“曹大駿同志在信陽介紹黃安反動首領、湖北改組派省委車若愚入黨，請中央注意考查介紹原因，因為鄂東北各縣受改組派的破壞不小。”^③1930年5-6月間是鄂豫邊特委反對改組派最緊張的時期，“一般同志都是全部動員，當時舉行‘反改運動周’，進行廣泛的宣傳”。^④

①《舒傳賢關於六、霍黨務、軍事情形給中央的報告》(1929年9月2日)，《鄂豫皖蘇區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甲4)，第2-3頁。

②《鄂豫邊革命委員會報告》(1929年)，《鄂豫皖蘇區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甲2)，第62頁。

③《鄂豫邊特委給中央信》(1930年2月16日)，《鄂豫皖蘇區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甲2)，第113頁。

④《鄂豫邊特委給湖北省委的報告》(1930年9月20日)，《鄂豫皖蘇區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甲2)，第132頁。

由於當時形勢錯綜複雜，敵我鬥爭很殘酷，黨內形成了嚴厲的風氣，往往僅憑猜疑就從嚴處置。1927年湖北省委全省暴動計畫中就明確提出：“在鄉村中殺盡豪紳、地主、政府官吏，應當取斬草除根的態度，不要絲毫姑息。寧願誤殺幾個，不要少殺一個”。^①1929年8月，深受信任、擔任軍委秘書的黃埔四期生白鑫叛變，致使中央農民部長彭湃、軍事部長楊殷等五人被捕遇害，周恩來臨時有事沒去開會才倖免於難。1931年4月，政治局候補委員、負責機密安全的顧順章叛變，造成很大損失，危及了整個中共中央的安全，接著總書記向忠發也被捕叛變。血的教訓讓中共不得不以最嚴厲的態度來整肅組織，對任何可疑的行為都不放過。在殘酷的鬥爭中，這嚴厲態度逐漸成為傳統。

早在1929年，鄂東北就發生了特委常委盧玉成等作為改組派被殺事件。1929年春天，“盧帶兩個湖南人做軍事工作的來，盧向鄂東北特委報告，他因過去同學反動派認得被捕至漢口，只監禁了半天，他自己因和魯滌平的參謀長寫信請他援救，他登時派二人持條前來將他釋放。他在漢口有許多舊相識，在政治上有勢力，於是趁勢在漢口多住住，以便多探看反動政局的情勢和找一找武漢舊的失掉聯絡的同志”。“漢陽公安局長是他的老同學，知道他是CP分子，勸他不要幹，他也裝做說不幹了，這局長因和他交情極好，百事任他的便”。盧玉成帶胡勳和段中玉到蘇區後，被委以重任，分別擔任特委常委、團長、團政治指導員。但是很快有消息說“被捕釋放者是反動收買的奸細”，特委又在三人的言行中發現了一些所謂“疑點”，於是“先審盧玉成，用重刑，盧始終抗辯，不承認有叛黨事”，盧勳則未經審問，直接在睡夢中被打死，三人先後被殺。“鄂東北特委認定盧玉成、胡勳、段中玉是改組派”，^②但在給中央的報告中，特委卻沒有提到任何確切的證據，這很可能是個冤案，由此案可以看出在殘酷鬥爭環境下黨

^①《湖北省委關於全省總暴動計畫》(1927年12月31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鄂豫皖時期(上)》，第151頁。

^②《鄂東北特別區委員會給中央的報告》(1929年9月8日)，《鄂豫皖蘇區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甲5)，第173-175頁。

內形成了極易產生冤案的嚴厲氣氛。

第三黨大致是指1930年夏天鄧演達回國後組織的“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其成員是一些曾與中共關係密切的國民黨左派和前中共黨員。他們雖然堅決反對蔣介石，但也不認同共產黨的道路，批評中共的武裝鬥爭是“乘此機會行其盲動亂動的陰謀，以加大破產的速度，以陷全國人民於死地。”^①他們要在共產黨和蔣記國民黨之外走第三條道路，其核心主張是“平民政權”，相信“只要本黨的農民政綱土地政綱實現出來，平民政權建設起來，則所謂紅軍必然自潰，而紅軍威劫下的農民必然和真正代表他們的革命行動握手擁抱。”^②第三黨計畫通過“黃埔革命同志會”建立自己的軍隊，奪取全國政權。黃埔革命同志會的骨幹既包括陳烈、余灑度等脫黨的前共產黨員，也包括很多國民黨員，甚至蔣介石的親信陳誠由於與鄧演達關係親密，不僅其領導的十八軍不少重要將領如羅卓英、周至柔、蕭乾等與第三黨有關係，陳誠還從十八軍公積金中每月支5000元作為第三黨活動經費，鄧演達先後派莊明遠、陳烈、邱新民、曹金輪、胡一、施方白等多人到十八軍開展工作。^③

1931年2月，蔣介石囚禁胡漢民，引發甯粵分裂，政局動盪起來。5月，汪精衛、孫科、李宗仁、白崇禧、張發奎、陳濟棠等成立廣州國民政府，與蔣介石南京政府分庭抗禮。7月，蔣介石調集30萬軍隊發動對中央蘇區第三次圍剿，陳誠的十八軍是參戰主力。第三黨認為機會來了，7月中下旬擬訂了“以江西為中心，武漢、西北、華北同時響應”的武裝起義計畫，派人到各地聯絡黃埔革命同志會會員參加軍事行動。廣東方面孫科表示支援起義計畫，並答應給予經費支持，改組派和第三黨形成了某種程度的合作。^④

① 鄧演達：《二十年四月反對南京偽國民會議宣言》（1931年4月），《鄧演達先生遺集》，香港：楊逸棠發行1932年版，第208頁。

② 鄧演達：《怎樣去復興中國革命——平民革命？》（1932），曾憲林、萬雲主編《鄧演達歷史資料》，華中理工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315頁。

③ 楊資元、馮永寧：《鄧演達》，廣東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60頁。

④ 楊資元、馮永寧：《鄧演達》，第259、262頁。

1931年8月20日，紅四軍領導人曾中生、徐向前在給中央的報告提到：“打下英山後，有名鐘蜀武者，自稱來找許繼慎的，經我們秘密審訊以後，他說名義上是從南京政府派來運動許繼慎倒戈，實際上他是第三黨，受鄧演達之命來找許繼慎的。這一問題，我們除了密報到中央分局外，還有一件事要報告中央的，就是他加入余灑度（黃埔一期學生，第三黨的）所主辦之黃埔革命同學會，是共產黨員袁鏡銘、劉庭傑兩人介紹，袁、劉二人過去中生在中軍工作時曾知道黨派過他們工作（劉庭傑到南通工作），可見這些第三黨分子還是夾在黨內的，應請中央加以特別的注意。鐘某我們還在密禁著，將解到中央分局去，由中央分局處辦。這裡我們要負責。許繼慎在組織上當然不會有什麼問題，然而許多社會關係不能打斷這一點，我們已嚴重警告他。”^①

許繼慎自1927年5月武漢保衛戰負傷以後，在上海生活了將近三年。在上海期間，許繼慎的社會關係比較複雜，與很多方面都有聯繫。他是安徽六安人，在當地青年中很有威望，中央應地方要求派他到鄂豫皖。徐向前在回憶錄中提到：“倪志亮同志從上海開會回來，曾悄悄對我說過：中央打了招呼，說許繼慎這個人關係複雜。”^②中央1931年11月給鄂豫皖中央分局的信中也提到：“許繼慎，中央除得到你們的報告外，並得到情報說：‘改組派曾聲稱如北伐軍到達兩湖，許繼慎部即可響應’，又許曾致信王保需擔保釋放其父（被我們逮捕的土豪）。據此，中央局對許應作嚴厲的考查。”^③

許繼慎與第三黨的核心人物朱蘊山關係相當密切，據說在許繼慎去鄂豫皖臨行前，“朱蘊山千方百計地籌集了一萬元送給許繼慎”，^④可見關係非同一般。朱蘊山是老同盟會員，是北伐期間是與鄧演達關係密切的

①《徐向前、曾中生關於紅四軍情況及行動方向的意見給中央的報告》（1931年8月20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鄂豫皖時期（下）》，第363-364頁。

②徐向前：《歷史的回顧》，第156頁。

③《中央給鄂豫皖中央分局的信》（1931年11月3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鄂豫皖時期（下）》，第407頁。

④鮑勁夫：《許繼慎將軍傳》，解放軍出版社1986年版，第88頁。

國民黨左派，與中國共產黨的關係也相當友好，甚至還參加了南昌起義。^①朱蘊山協助鄧演達創建了第三黨，是第三黨最核心的成員，許繼慎與朱的關係如此密切，又掌握兵權，在1931年夏天第三黨的軍事計畫中很可能被看作潛在的爭取對象。

後來被當作許繼慎“通敵”證據的信全文如下：

“繼慎吾兄無恙。

前由鐘俊同志奉書吾兄，幸荷察納，欽佩無極！比得鐘同志返命，即為詳呈校座，奉批照辦。匍匐來歸之子，父母唯有涕淚加憐，或竟自傷其顧之不周耳，寧忍加責難於其子哉！蒼蒼者天，於孝行役。分無再見，乃復來歸。雖猶千里，心實歡喜。只所須名義防地，俟鐘俊同志赴贛請示校座，自當照給。校座返京百務待決，故一時未能縷縷呈耳，顧吾兄之勿慮也。西望停雲，我心勞結。諸希自珍，以候寵命。並頌戎安！

弟曾擴情再拜

九月十九日”^②

此信是以黃埔一期同學曾擴情名義寫給許繼慎的，有的研究者認為此信是曾中生、徐向前8月20日信中提到的鐘蜀武帶來的，但這與此信的落款9月19日顯然矛盾，而且其中還有“前由鐘俊同志奉書吾兄”、“鐘同志返命”等內容。關於被派到英山聯絡許繼慎的鐘蜀武，史實上存在很多的疑點。陳昌浩說鐘蜀武就是信中提到的鐘俊，雖然確實被捕，但並未押送中央分局，而是“出一個假佈告說鐘蜀武是蔣介石派來的偵探，現已執行槍斃。其實老許放他走了，並給有信和路費路單。還有一個鐘梅橋是鐘俊之弟，在十二師政治部住三十一天，走的時候給了他一個出來的介紹信”。^③綜上，可以推測曾擴情帶信給許繼慎應該不止一次，至少是兩次，8

① 胡允恭：《憶朱蘊山前輩》，《金陵叢談》，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40頁。

② 鮑勁夫：《許繼慎將軍傳》，第135-136頁。

③ 《陳昌浩在彭楊學校報告肅反經過》（1931年11月22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鄂豫皖時期（下）》，第446頁。

月20日以前是第一次，送信人鐘俊雖曾被抓，但可能又被放走了，確實如曾擴情信所說曾經“返命”，鐘梅橋後來也離開了。9月19日以後第二次帶信時，肅反已經開始，帶信人不明情況，結果被人信俱獲。

由於相關史料缺失太多，許繼慎冤案的許多細節難以完全搞清，只能嘗試對現有材料進行解釋。曾中生、徐向前8月20日信中提到鐘蜀武（鐘俊）的供詞有一定可信度，即他名義上受曾擴情委派，代表蔣介石南京政府，實際上是代表第三黨來爭取許繼慎參加鄧演達的軍事計畫，8月1日紅四軍攻下英山，正是第三黨使者四出、積極策動武裝起義的時候。鄧演達7月13日給黃琪翔的信中說：“近日消息甚多，都說‘快動’，但是我恐怕‘草頭’（注：蔣介石）還是會敗於紅軍手上，使我們動手更易些”。^①第三黨人物是國民黨左派中的左派，他們和中共的關係相當友好，自鄧演達、朱蘊山以下後來大都被當作“共產黨的朋友”。許繼慎在上海時與第三黨的核心人物朱蘊山關係極為密切，許本人又是比較重視私人感情的人，前面提到他給一個叫王保需的朋友寫信擔保釋放其父，所以雖然鐘蜀武（鐘俊）被抓捕、送交軍部審問，但在許繼慎的影響下還是被放走了，鐘俊回去後自然要向曾擴情覆命，於是才有了第二封信。

張國燾、陳昌浩等雖然查獲了代表“校座”蔣介石的曾擴情第二封信，但並未輕信這封信的內容，沒有相信許繼慎投靠蔣介石，實際上仍然主要懷疑他與第三黨的關係。陳昌浩稱：“許繼慎，是由上海來的，他當時就與第三黨有很密切的關係。因此，那時中央派人與他談話，老許表示悔過，結果中央派他來當第一軍軍長，實際上許繼慎又奉了第三黨中央的命令而來。”^②由於許繼慎在上海確實曾與第三黨的核心成員關係密切，又放走了自稱第三黨的聯絡人鐘俊，黨中央和中央分局對他與第三黨的關係產生了很深的懷疑，於是引發了許繼慎被殺的著名冤案。

^①《鄧演達一九三一年致黃琪翔的兩封信》（1931），曾憲林、萬雲主編《鄧演達歷史資料》，第284-286頁。

^②《陳昌浩在彭楊學校報告肅反經過》（1931年11月22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鄂豫皖時期（下）》，第444頁。

四、白雀園肅反被殺人數並非 2500 人

關於 1931 年 9-11 月紅四軍白雀園肅反被殺人數，徐向前在《歷史的回顧》中說：“白雀園‘大肅反’，是鄂豫皖根據地歷史上最令人痛心的一頁。將近三個月的‘肅反’，肅掉了兩千五百名以上的紅軍指戰員”。^①據此，許多研究者認為白雀園肅反有 2500 多人被殺。

但是，主管肅反的是政治委員陳昌浩，軍長徐向前當時無權過問，他只知道紅四軍經過肅反少了 2500 人，但並不知道這些人的具體命運。陳昌浩才是最直接的見證人，他提到整肅人數的主要有三份材料：

材料一：1931 年 13 期《紅軍週刊》有署名“昌浩”日期 1931 年 11 月的文章《肅清改組派、第三黨、AB 團》，其中提到：“我們的勝利，不僅是逮捕了八百個改組派、AB 團、第三黨分子，不僅是摧殘了反革命的幾乎全部幹部，不僅是捉了許繼慎、周維炯、肖方、姜鏡堂這般反革命的首領，而且是根本破壞改組派、AB 團、第三黨的反革命組織，而且是淘汰了大批反革命分子——富農（約二千人）”。^②

材料二：《列寧報》63 期（1931 年 12 月以前）有署名“陳昌浩”的文章《紅四軍中反對反革命的偉大勝利》，其中有：“我們的勝利，不僅是逮捕了一千個改組派、AB 團、第三黨分子，不僅是一般消滅了反革命組織，不僅是擒住了反革命的首領周維炯、許繼慎、肖方、姜鏡堂，不僅是剷除了一千以上的富農、流氓、地痞”。^③

材料三：1931 年 11 月 22 日《陳昌浩在彭楊學校報告肅反經過》中提到：“這次共計肅清改逆一千人，富農及一切不好的分子計一千五六百人”，後面又說：“我們的勝利，不僅是肅清了一千個改逆、AB 團、第三黨分

① 徐向前：《歷史的回顧》，第 152 頁。

② 《肅清改組派、第三黨、AB 團》（1931 年 11 月），《鄂豫皖蘇區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甲 1），第 477 頁。

③ 《紅四軍中反對反革命的偉大勝利》，《鄂豫皖蘇區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甲 1），第 533 頁。

子和將近兩千個富農”。^①

分析上面三份材料，我們可以看出，三份材料都涉及兩個數字，一個是作為反革命組織成員的人數，一個是作為富農等異己分子的人數。陳昌浩有時用準確數字，有時用大概數字。八百人、一千五六百人應該是準確數字，一千、兩千這樣的大概數字是從準確數字衍生出來的。據此，紅四軍白雀園肅反應該是查出了反革命組織成員約八百人和富農等異己分子一千五六百人。

作為富農等異己分子的一千五六百人是否被殺了呢？我認為在此處以往存在對史料的誤讀，這一千五六百人是被驅逐出紅軍，遣送回原籍，當時並未被殺。實際上，即使在政策最偏激的時期，也沒有僅僅因為是富農就要殺掉的政策，1927年暴動時期有些地方曾經出現過殺地主的階級滅絕行為，但是短期的、局部的，後來最多不過是“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鄂豫皖中央分局1931年10月決議明確提出要“徹底淘汰紅軍中的富農分子。富農出身的分子，除對政治上特別堅定作戰特別勇敢，有長期革命鬥爭歷史的以外，一概洗刷出去”。“被淘汰的分子，一概須交軍委會發給各縣蘇維埃，送回原籍，並通知各紅軍組織以後不再吸收。”^②鄂豫皖蘇維埃政府11月8日通知規定：“對紅軍淘汰出來的富農分子的好土地，在本政府通知二十二號已說明瞭，應當收回另給以壞的土地”，“各縣蘇維埃要嚴格的防止這些富農分子再混入紅軍中去”。^③12月2日又發出通知：“如發現富農、被淘汰的富農和反動嫌疑份子再混入到我們的組織中去時，即唯縣蘇是問，即應予以革命紀律制裁。”^④很顯然，紅四軍中查出的

①《陳昌浩在彭楊學校報告肅反經過》(1931年11月22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鄂豫皖時期(下)》，第445、451頁

②《鄂豫皖中央分局關於紅四軍的決議》(1931年10月)，《鄂豫皖蘇區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甲1)，第384-385頁。

③《鄂豫皖區蘇維埃政府通知第二十三號》(1931年11月8日)，《鄂豫皖蘇區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甲3)，第180頁。

④《鄂豫皖區蘇維埃政府通知第二十四號》(1931年12月2日)，《鄂豫皖蘇區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甲3)，第185頁

富農分子是被送回原籍了，並未被殺。

那麼，約八百人的反革命組織成員是否全部被殺了呢？也不一定。1931年11月鄂豫皖蘇區《改組派自首條例》規定：“改組派的首領，除潘皈佛、程柔佛巴魯、丁超等外，其餘改組派的群眾，一律准其自首，絕對保障其生命的安全，並予以政治上的出路。”^①陳昌浩在彭楊學校報告中籠統說“這次共計肅清改逆一千人，富農及一切不好的分子計一千五六百人”。^②既然富農並未被殺，那麼“肅清”並不等於“殺”是很明顯的。由此可以推斷，被定為改組派、第三黨群眾的被捕人員也並未全部被殺，紅四軍白雀園肅反被殺的人數應該少於800人。

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中是這樣說的：“這次的肅反案，被捕者約六百人，軍人占三分之一；實際被整肅的有許繼盛（慎）等百餘人，其中判死刑者約三十人，判處各種刑期的徒刑者約百人。”^③張國燾的回憶錄是多年之後憑記憶在香港寫的，當時沒有多少參考資料，而且有開脫自己責任的傾向，所以這些數字未必準確。但是，他提到“被捕者約六百人”和實際被捕者八百人相比，誤差並不算很大，所以他的說法也並非完全沒有史料價值，至少這和《改組派自首條例》規定的懲辦首領、准許改組派群眾自首的政策是相吻合的。根據《改組派自首條例》，並參考重要當事人張國燾的回憶，白雀園肅反被殺者很可能是被捕八百人中的少數，但是要確定具體人數在現有的史料基礎上還比較困難，有待於新史料的發現和進一步的深入研究。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肅反被殺者中幹部比例很大，給鄂豫皖紅軍幹部隊伍造成了超過半數的重大損失。當時紅四軍總共只有四個師十二個團，遭到整肅的就有許繼慎、周維炯兩個師長，潘皈佛、高建門、王則先、肖方、王明、魏孟賢六個團長，封俊、江子英、袁高甫、吳精赤、劉性成

^①《改組派自首條例》（1931年11月），《鄂豫皖蘇區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甲1），第463頁。

^②《陳昌浩在彭楊學校報告肅反經過》（1931年11月22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鄂豫皖時期（下）》，第445頁

^③張國燾：《我的回憶》第三冊，第107頁。

五個團政委，十個團政治處主任（從 28 到 37 團），還有三分之二以上的營長、連長、連指導員。^①千軍易得，一將難求，雖然白雀園肅反被殺人數遠不到以往認為的 2500 人，但給鄂豫皖紅軍造成的損失仍然是非常慘重、難以彌補的。

五、地方幹部在肅反擴大化中起了重要作用

肅反的機器一旦開動起來，總是難免擴大化的結果，中下層幹部的作用不可忽視，這卻又是常常被人忽視的。以往人們往往把肅反歸因於高級領導人打擊異己，比如鄂豫皖蘇區的張國燾、沈澤民、陳昌浩對紅四軍領導人的不滿。

但是，能夠挑戰張國燾領導權的，無非是幾十個軍、師、團級幹部，肅反在基層和地方鋪開後，數以千計的人被殺，這並不是發動肅反的高級領導人希望看到的，而且對抗中央分局的主要人物曾中生當時只是被當成犯錯誤的同志，在白雀園肅反中並未被殺。實際上，肅反擴大化的重要動力是中下級幹部，他們或者由於個人恩怨，或者由於思想偏狹，或者為了整頓紀律，也很熱衷於肅反。還有很多人因為文化不高和政治素質不足，作風簡單粗暴，缺乏最基本的判斷力，很容易在狂熱中失控濫殺。

鄂豫皖蘇區的創始人之一戴季英就很喜歡搞肅反，當紅四方面軍突圍西進以後，他在新組建的紅 25 軍擔任 74 師政委。當時的師長徐海東提到：“師政委戴季英親自下手，把 220 團的政委、參謀長等 49 名黨團幹部捆起來”，“把 79 團特務連指導員吊起來，拷打逼供不成，又綁在板凳上用刑。那個指導員曾任過皖西北少共道委宣傳部長，參加革命只有 17 歲，聰明活潑，能力很強，他怎麼是反革命呢？當政委百般拷打問不出口供時，叫他的警衛員拉出去殺。我急了，忙說：‘政委，一點兒口供沒有，為什麼殺人

^① 陳昌浩：《紅四軍反對反革命的偉大勝利》（1931 年 10 月），《鄂豫皖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甲 1），第 532 頁。

家?’他說：‘你不懂肅反的事，沒有口供這證明他是反革命堅決分子，不願說出他們的組織來。’”“49個人，被殺了，我知道以後，落下淚來”，“越想越難過，一夜沒睡，兩個眼泡都哭腫了。”^①在25軍進入陝北蘇區後，戴季英又積極參與了針對陝北地方領導人劉志丹等的肅反，直到中央紅軍到達才被制止。

當時絕大多數地方幹部知識水平很低，作風簡單粗暴，在肅反中很容易亂殺人。鄂豫邊特委報告提到：“在破壞改組派方面，開始決定的原則是：解決改組派的活動分子及首領，奪取其群眾”，“但在執行上，一般同志因為沒有在城市內過慣複雜生活，對農村加入改組派稍有一點能力的，即認為活動分子不敢釋放，因此造成過分的屠殺”。^②鄂豫邊特委還提到，“當地方黨部反富最激烈的時候，大批富農和動搖的群眾，往紅軍中跑，紅軍說地方黨亂殺人”。^③1945年徐向前、倪志亮在《鄂豫皖蘇區紅軍歷史》也提到：“六安獨立團的肅反中，有一次班長以上的幹部一律以反革命罪名逮捕了，這一次一下子就捕了二百餘人。這說明在地方武裝中肅反逮人殺人也是很厲害的”。^④

英山中心縣委領導下9個縣的黨組織在肅反中幾乎垮臺，大部分幹部都被當成“反動分子”，中心縣委甚至粗暴地提出整個黨組織都要推倒重來。縣委在1932年1月報告中說：“反動分子充滿了各級領導機關”，“如皖西整個特委會剩下方英同志、一二事務人員；少共特委軍事委員會幾乎完全是的；英山黨團中委會只剩下黨團書記、黨團婦委書記、交通、火夫，其餘完全是的；各縣如六安、霍山、商城只剩下少數同志，其餘全盤是的。”英山中心縣委領導下有英山、羅田、太湖、蘄水、蘄春、宿松、黃梅、廣濟、潛

① 徐海東：《生平自述》，三聯書店1982年版，第22-23頁。

② 《鄂豫邊特委綜合報告》（編者判定1930年12月），《鄂豫皖蘇區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甲2），第162-163頁。

③ 《鄂豫邊特委綜合報告（續）》（編者判定1930年12月），《鄂豫皖蘇區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甲2），第198頁。

④ 徐向前、倪志亮：《鄂豫皖蘇區紅軍歷史》（1945年），《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鄂豫皖時期（上）》，第36頁。

山九個縣，“整個黨組織完全被第三黨破壞了”，“八個區書記同時是第三黨書記，支部書記有半數以上是第三黨，甚至整個是第三黨的支部”，最後的結論竟然是“英山領導下之各縣，皖西北的各縣也是如此，整個的黨還要在群眾中重新創造。”^①

在黃安縣政治保衛局的高壓之下，仙居區曾經爆發過反抗肅反的群眾暴動，最後被鎮壓。“政治保衛局在仙區首先逮捕了區蘇維埃政府主席祝鳳階和熊海峰、秦國珍等人；接著又抓走了10餘名鄉幹部，進而捉到村蘇一級。”這激起了仙居區幹部和群眾的憤怒，“1932年2月20日，縣保衛局一行9人攜帶手槍、繩索到仙區抓人。當他們進入王家沖時，周圍各村幾百名男女老少手持沖擔、鋤頭、扁擔，‘呵吶’喧天跑了出來”，“大家一湧齊上，解除了保衛局人員的武裝，並將他們捆綁起來。”雖然在區委書記徐德聰等的勸說下，群眾放了保衛局人員、還了槍，但是3月8日黃安縣保衛局還是在禹王城召開群眾大會，將徐德聰等63人以“改組派”罪名一次性集體處決。^②

中央分局覺察到地方上的粗暴風氣，曾於1931年11月寫信給鄂豫邊特委，制止亂殺人的行為。信中指出：“你們黨內用槍斃來做執行黨的紀律的一種方法，是非常危險的一種方法”。“在黨內有死刑，結果一定要引到消滅自我批評與黨內民主，民主集中制要轉到成為家長統治與寡頭專制”。“一旦以如此嚴峻的紀律相繩，必然人人自危造成黨內恐怖，一旦形成黨內恐怖，黨的分崩瓦解就不遠了。”^③從這封信也可以映射出當時地方幹部在推動肅反擴大化中所起的作用。

①《英山中心縣委給中央的報告》（1932年1月7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鄂豫皖時期（下）》，第472-474頁。

②《“仙區事件”的爆發》，《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鄂豫皖時期（下）》，第475-476頁。

③《鄂豫皖中央分局給鄂豫邊特委信》（1931年11月24日），《鄂豫皖蘇區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甲1），第437-438頁。

六、小結

肅反是中國革命歷史中最為複雜的問題之一，重建史實已有相當的難度，尋求理解更是難上加難。在敵強我弱的殘酷鬥爭中，革命力量原本不足，而1930年代各個蘇區的革命隊伍卻都發生了大規模自相殘殺的慘劇，造成革命力量的嚴重損傷，這實在是讓人難以理解。歷史是豐富的，也是複雜的，任何一個重大事實都往往不是單一因素的結果，而是多種內因與外因交錯編織而成。在鄂豫皖蘇區肅反的慘烈歷史中，我們大致可以看到一支成長於野蠻環境的農民隊伍，在錯綜複雜的內外矛盾中，向紀律嚴明的革命軍隊的艱難痛苦的蛻變。

鄂豫皖中央分局的使命是加強中央對蘇區和紅軍的領導，分局領導人張國燾、沈澤民、陳昌浩等確實發現鄂豫皖紅軍中存在很多嚴重紀律問題。更為嚴重的是，紅軍在南下行動中公開召集大會對抗分局的領導，嚴重違反了“黨指揮槍”的組織原則。再加上當時政治派別錯綜複雜，經常出現叛變，於是肅反就成為整肅紀律、強化組織的重要手段，鄂豫皖蘇區的白雀園肅反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發生的。

六屆四中全會後上臺掌權的留蘇派，雖然由於他們的經驗不足和教條主義給中國革命帶來很大損失，但是他們在嚴密黨的組織紀律和加強紅軍的正規化建設上，還是做出了相當的努力，而組織嚴密的黨和軍隊正是革命成功的最重要條件，因此留蘇派在中國革命史上的作用，也值得進一步深入研究。

第十章

湘鄂西中央分局與夏曦四次肅反

中共中央在六屆四中全會前後派重要幹部到蘇區建立中央局、中央分局，強化對蘇區和紅軍的領導。1931年春夏曦到湘鄂西蘇區擔任中央分局書記後，由於經驗認識的差別，由於對權力分配的歧見，由於領導能力的不足，甚至由於個人品格的缺陷，與開創蘇區的地方領導人萬濤、段德昌、賀龍等發生了激烈衝突。萬濤等違反組織原則，發動了自下而上推翻夏曦領導的活動，在中共湘鄂西第四次代表大會上幾乎成功，但在中央幹預下最終失敗。為維護領導地位、強化集中統一領導，夏曦發動了殘酷的肅反，前後約三千人被捕。夏曦領導能力嚴重不足，無法像張國燾那樣在肅反後建立牢固的權威，以至於為勉強維持領導地位，在1932-1934年間先後四次肅反，湘鄂西重要幹部大多被殺。夏曦直接領導的肅反殺了大約幾百人，多數是幹部，賀龍回憶中說上萬人被殺是誇張的，或者是用了比較寬泛的統計口徑。

湘鄂西肅反主要發生在1932年5月到1934年6月，蘇區失敗和激烈動盪的戰爭環境使得相關史料保存很少，只有少數檔案和多年後的回憶。本章試圖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儘量收集相關材料，重建基本歷史事實。同時，筆者也嘗試突破兩條路線鬥爭為主線的簡單分析框架，試圖通過中共努力建立集中統一的組織結構、並由此引發激烈權力衝突的角度，重新探討湘鄂西蘇區肅反發生的深層原因。

一、中央分局成立前的湘鄂西初期肅反

蔣介石在1928年控制南京政府後，擁護汪精衛的部分國民黨左派成

立了改組派，從事既反蔣也反共的政治活動。國民黨左派曾在武漢建立政府，因此改組派在武漢附近地區比較活躍。在1932年夏曦領導的大肅反之前，湘鄂西蘇區就有針對改組派的鬥爭，這些初期肅反規模也不小，但手段還比較節制。

改組派是大革命時期與中共較為接近的國民黨左派，不少人與中共黨員私交不錯，他們確實曾嘗試與紅軍合作，甚至想滲透進紅軍內部。1930年，湘鄂西特委在“六軍中發現了改組派組織，已槍斃了幾個分隊長、兵士，據探的消息，裡面已有三十餘人的組織。”^①沔陽縣委提到，改組派“在團防裡面有一部分的活動，尤其是商團，一方面利用脫黨的份子與我們黨內接洽合作、同盟，收編我們的紅軍，幫助紅軍子彈和經濟等等的可笑舉動，他們想利用這種種方法以混入紅色區域裡面來活動。”^②

1930年，湘鄂西蘇區進行了規模較大的肅反，被逮捕的有500多人，但審問發現多數只是自稱改組派，並不是真正的改組派，後來以自首的形式釋放了。湘鄂西團組織報告稱：“現在鄂西鬧的最凶的，便是改組派的問題。經我破獲改組派的審訊結果”，“他們所組織的，大半是被黨團所處罰不滿意黨團的分子，不過他們曾在外面受到改組派一點影響，他們以為改組派是反黨的，他們反黨就是改組派，所以有許多不知改組派是什麼，只覺我是反黨的，就是改組派，而自己承認。現在如各處捉到一個改組派來審訊，便要供出許多人，以鄂西江、石、監、沔各縣來計算，現以改組派的罪名而被押的，已有五百多人。黨對這一問題的決定，採取自首政策”。^③

當時農村革命骨幹大多是沒受過教育的年輕貧農，他們革命勇敢堅決，但也難免有簡單粗暴的缺點，這是後來肅反擴大化和發生各種殘暴行為的群眾基礎。沔陽縣委報告鮮活地表現出這一點：“自中央“八七”會議

①《中共湘鄂西特委給中央的報告》(1930年6月10日)，《湘鄂西蘇區革命歷史文件彙集》(4)，中央、湖北、湖南檔案館1987年版，第342頁。

②《中共沔陽縣委報告》(1930年11月)，《湘鄂西蘇區革命歷史文件彙集》(4)，第406頁。

③《團湘鄂西第二次代表大會主席團致團中央的信》(1930年12月18日)，《湘鄂西蘇區革命歷史文件彙集》(3)，第43頁。

以後，沔陽黨完全走於盲動，發展的黨員亦未有深刻的訓練，那時候忙於燒房子、殺人、綁票的緊張工作裡面，也無有功夫來訓練同志”。“他們都是自稱為活閻王，誰不是威嚴赫赫，群眾都呼為爹爹們，同志們聽得這種名詞，也感覺非常榮譽和愉快，結果就成了群眾中的特殊階級，每一個黨員在群眾中都成了閻王地位，高呼一聲，群眾就俯首應喏，只怕連頭也不敢抬吧！”^①

1931年，湘鄂西蘇區繼續有針對改組派的肅反鬥爭，但規模不大。中央分局8月報告提到：“最近破獲改組派甚多，逮捕數十人。從前二軍中在此下級幹部多已加入，並牽及紅軍中幹部一、二人。現在一方面加緊反改組派宣傳，一方面正在嚴格審訊。惟改組派在湘鄂西有較大組織，不可否認。黃極會、白極會等，亦系改組派領導，最近在消滅這些組織頗有成效。”^②宋盤銘在11月的報告也提到：“黨內還存在有少數階級異己分子、敵人，如改組派這種分子潛伏在黨內，在潛江還發現過黨的區委秘書和區政府的秘書是改組派，被破獲了，還有黨區委負責的同志也是改組派的暗探。這樣看來，在黨的組織內潛伏的反動分子還是有的”。^③總之，在1932年以前，湘鄂西蘇區肅反鬥爭已經開始，但在革命陣營內部影響還不算很大。

二、萬濤等推翻中央分局書記夏曦的嘗試及失敗

在六屆四中全會上，徐錫根成為政治局正式委員，夏曦是新當選的中央候補委員。中央派他們去湘鄂西蘇區，本來是徐錫根任中央分局書記，夏曦任省委書記，與鄂豫皖蘇區張國燾和沈澤民的搭配類似。1931

① 《中共沔陽縣委報告》(1930年11月)，《湘鄂西蘇區革命歷史文件彙集》(4)，第409頁。

② 夏曦、楊光華：《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湘鄂西省委給中央的報告》(1931年8月18日)，《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一)，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版，第678頁。

③ 宋盤銘：《宋盤銘關於湘鄂西情況給中央的綜合報告》(1931年11月22日)，《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一)，第739頁。

年5月31日湘鄂西分局報告提到：“錫根同志來說，中央決定此間另組織湘鄂西省委，中央分局另行組織，錫根任中央分局書記，夏曦任省委書記”，“錫根同志第二次申明書未見。他近兩月來政治態度若何，請中央稍為通知。但是我們因為信仰中央，對錫根同志口頭傳達之組織改變，我們完全執行。”^①

徐錫根參加了羅章龍派分裂活動，雖然後來退出，但也很難再得到信任。1931年春夏之間，顧順章、向忠發等接連叛變更加快了工人幹部的失勢。徐錫根不久即被調離湘鄂西蘇區。宋盤銘報告提到：“中央從前決定要錫根同志負責，但錫根被派到江右去了，以後又生病，實際上是沒有做多少工作”。^②對徐錫根的懷疑是有道理的，他果然在1932年叛變，為國民黨特務機關工作，抗日戰爭期間給中共南方黨組織造成重大損失。

夏曦1931年3月到達湘鄂西，先建立起中央分局，擔任書記。當時遠東局決定派夏曦去湘鄂西還有特殊原因，他是“賀龍的私人朋友，因此把他派到那裡去也是好的。”^③徐錫根5月到來，但又很快離開，夏曦坐穩了湘鄂西中央分局書記的位置，成為湘鄂西黨和紅軍的最高領導人。但從實際結果看，夏曦的經驗和才能都不足以擔當這樣重要的責任，領導能力不足和加強領導的任務之間產生了難以調和的矛盾，這個矛盾是湘鄂西連續四次肅反的重要原因。

夏曦領導能力不足從他剛到蘇區就表現出來了，有時悲觀失望，有時猶豫不決，引起了段德昌等重要幹部的不滿。“段德昌率九師打周老咀和老新口兩個據點，準備把周老咀、老新口、新溝咀聯成一片。正當九師節節勝利向前發展之際，夏曦在周老咀把傷病兵遣散了，段對夏這種做法表示不滿意，批評夏曦同志是退卻逃跑和悲觀失望，並說這種情緒會把蘇區

①《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給中央的報告》(1931年5月31日)，《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一)，第644-645頁。

②宋盤銘：《宋盤銘關於湘鄂西情況給中央的綜合報告》(1931年11月22日)，《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一)，第742頁。

③《雷利斯基同向忠發和周恩來談話記錄》(1931年2月19日於上海)，《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10)，第87頁。

搞失敗的。”^①夏曦“每次會一晚開不完，因此有些同志都怕開會。有的說：‘夏曦又要念經了。’的確，夏曦顧忌很周到，但正因為太顧前顧後顧左顧右了，所以每每遇事不決，或決而重變”。“軍事長官（九師師長段德昌等）對夏曦不滿”，段德昌氣憤地說：“中央過去給我們派了個鄧中夏來，鬧了一團糟，現在又派來了毫不懂軍事、遲疑不決的夏曦，對我們無絲毫的具體指示，只會叫我們拼命。”^②

1931年秋天，湘鄂西圍繞九師行動、三軍錯誤、發展方向等發生激烈爭論，以萬濤為首的多數地方幹部對夏曦的不滿爆發了，嚴重的對立情緒使萬濤等違反組織原則，策劃了自下而上推翻夏曦領導地位的行動，而且行動顯然得到了賀龍等軍隊幹部的同情，這一事件是肅反擴大化的重要起因。

（一）圍繞“九師行動”和“三軍錯誤”的激烈爭論

1930年12月，湘鄂西主力紅二軍團在澧州和松滋楊林寺遭遇慘敗，被迫脫離洪湖核心區，在鄧中夏、賀龍帶領下先向西、再向北，撤到鄂西北山區房縣一帶，紅二軍團縮編為紅三軍，原二、六軍縮編為七、八師。但是原六軍軍長段德昌留在了洪湖，他收集傷病員和在楊林寺打散的紅軍餘部，經過堅苦卓絕的奮鬥，又建立起九師，成為洪湖蘇區新的主力紅軍。為了壯大革命力量，蘇區一直希望紅三軍返回，夏曦1931年6月寫信給賀龍：“三月間，中央派我到湘鄂西及二軍團工作，代理中夏同志職務”，“亟盼你率隊回來指揮湘鄂西整個軍事行動，務希依照中央分局決定執行”。^③

1931年夏天，長江中游發生了歷史罕見的大水災，湘鄂西蘇區陷入嚴

① 賀龍：《賀龍關於一九三〇年冬至一九三四年間湘鄂西武裝鬥爭問題的談話》（1961年4月18-20日），《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二），第652-653頁。

② 莊東曉：《莊東曉關於湘鄂西蘇區情況給中央的綜合報告》（1934年1月23日），《湘鄂西蘇區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第374、363-364頁。

③ 《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夏曦給雲卿的信》（1931年6月5日），《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一），第647頁。

重困境。長江以北的蘇區主體絕大部分被淹沒，吃飯都困難。長江以南情況好些，但是秋收時可能面臨敵人搶穀的危險。九師原計劃過到江南，後來覺得太冒險，最終決定向北發展。夏曦、楊光華8月報告中提到：“監利、沔陽、漢川、江陵蘇區（江左全體蘇區）百分之九十五被水淹沒，一片汪洋，如困大海，災民近百萬。江右亦淹沒一部分”。“華容蘇區情形嚴重，正在秋收，敵人×有乘機搶穀之勢。江右我×只有三百左右，尚可發動遊擊戰爭，所慮者敵人掠奪谷米而去。九師原本準備渡江右，因水勢增漲，而且作戰沒有把握（過江右只能勝利，敗則無退路，水勢更漲，更經危險），因此，中止過江。在江左蘇區，紅軍已成饑軍（有十來天沒有吃飯，吃的雜糧），因此決定移師潛江、天門，並消滅徐德佐旅。”^①

1931年8月2日，湘鄂西軍委做出《關於九師最近行動的決議》，決定由萬濤帶領九師主力向北部潛江、天門進攻，擴展蘇區。“九師目前唯一的任務就是在鞏固和擴大蘇區的原則之下，保存紅軍基本實力的條件之下圖軍事上的發展，因此決定以二十五團鞏固後方，二十六團向潛江、天門發展。二十六團的具體任務是：1、最主要的任務首先必須以極大決心給徐德佐旅以嚴重打擊，消滅其實力，擊破敵人‘圍剿’我們之一方。2、發展潛江、天門遊擊戰爭（從奪得敵人武裝中分一部分武裝給當地農民），並使潛江、天門與監利、沔陽、漢川邊區聯成一片。3、盡可能的佔領天門，鞏固這一區域。4、保證隨時（在後方有必要時或前方失利時）可以回到赤區。5、保持與後方之一定的交通線，以便輸送和取得政治消息與指示”。“軍委主席萬濤同志到部隊中去指揮一切工作，他對於一切政治、軍事有最後決定權。”^②

萬濤是湘鄂西蘇區重要創始人之一，此時被任命代替鄧中夏擔任三軍政委，和段德昌一起率九師主力出征，擁有最後決定權。在出發前的談

^① 夏曦、楊光華：《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湘鄂西省委給中央的報告》（1931年8月18日），《湘鄂西蘇區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第87-88頁。

^② 《湘鄂西省革命軍事委員會關於九師最近行動的決議》（1931年8月2日），《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一），第673-674頁。

話中，夏曦提到北進過程中如能聯繫賀龍，就爭取讓三軍回來。如果三軍主力返回，湘鄂西紅軍壯大幾倍，形勢必然大為改觀，這顯然也是重大任務。此時夏曦對萬濤很信任，對地方幹部也比較尊重，他在8月給中央的報告提到：“三軍政治委員我不能兼顧，中央分局決定派萬濤同志擔任，他已隨九師出發。萬濤，四川人，由湖北省委派到洪湖工作已兩三年，去年任二軍團政治部主任，後在特委任組織部長，現任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團之一（主席團三人，即賀龍、夏曦、萬濤）。他前曾到過中央，恩來同志大概認識他。就此問同志說，以他為適宜。請中央批准。”^①

九師北進相當順利，“八月十五佔領潛江城，一部於十七日佔領沙洋，一部於二十一日佔領荊門。徐德佐旅已消滅二團。潛江已成立革命委員會。我們計畫將鄂中鐘祥、京山、天門、潛江、荊門各縣造成赤區，南與漢川、沔陽、監利老蘇區打成一片，北與鄂北特委取聯繫，東與鄂豫皖聯絡，西與三軍取聯繫，在軍事上頗有把握。”^②但是，九師佔領沙洋以後，得到了三軍的消息，臨時決定改變原來向東進攻天門的計畫，轉而向西進攻荊門，希望聯繫上紅三軍。經過一些曲折之後，九師9月28日在劉猴集與三軍會合，傳達中央指示後，和三軍一起返回了蘇區。綜觀九師北上行動，確實由於把重點轉到聯繫三軍而放棄了開拓天門的任務，但是畢竟打了勝仗，重創了徐德佐旅，用繳獲的武器擴大了一個團（27團），並且接回了紅三軍，使蘇區紅軍增加了數倍，總體上是一次成功的軍事行動。

但是夏曦的看法卻大不相同，據楊光華回憶：“省委得知紅三軍主力回洪湖的喜信，我（當時任臨時省委代理書記）找來團中央代表宋盤銘同志和省蘇維埃主席崔琪同志商量，由軍委和省委共同主持召開一個聲勢浩大的軍民聯歡大會”。“我們三人商量妥當後，滿懷喜悅地去請示中央分局的夏曦，令人掃興的是一去了就碰上夏曦大發雷霆。我們問其原因，夏

^① 夏曦：《夏曦給中央的報告》（1931年8月27日），《湘鄂西蘇區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第91頁。

^② 夏曦：《夏曦給中央的報告》（1931年8月27日），《湘鄂西蘇區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第90頁。

把萬濤的報告向我一板說：‘你看，把中央分局、軍委主席團、省委都當成他的後勤部，豈有此理！’”。“次日聽說夏曦到前方去了。第三日萬濤同志從前方回來，持中央分局兼軍委主席夏曦的命令和派遣信來到省委，說夏曦派他回來做省委宣傳部長工作，代理三軍政委被撤職。”^①

夏曦的不滿大概來自兩個方面，首先九師北進確實未能按計劃完成擴張蘇區的任務。夏曦發現在前方將領自作主張的情況下，在後方很難指揮紅軍，這與寧都會議上任弼時、項英等對毛澤東的不滿類似。此時夏曦已決心親自領導紅軍，因此一定要誇大九師錯誤，把萬濤撤職。其次，江南蘇區秋收時遭到敵人蹂躪，中央來電責問。本來在當時敵我力量懸殊的情況下，保衛江南蘇區幾乎不可能，夏曦本可如實彙報，但他卻把責任推到萬濤帶九師北進脫離蘇區。這樣沒有擔當的領導作風很難贏得下級的尊重，顯示出夏曦缺乏領導人應有的氣度。

夏曦到前方和紅軍會合後，給自以為得勝歸來的九師領導當頭一棒，宣佈處分決定：“九師打下沙洋後，即違反省委決議，實際是脫離蘇區不要後方的冒險輕進的行動。萬濤、德昌、培英同志應負責任，現由軍委會公開明令撤銷萬濤同志政治委員之職，調後方工作，德昌、培英兩同志予以警告。”^②同時，夏曦對剛回蘇區的三軍也提出嚴厲批評，並且宣佈改組三軍，取消軍部、師部，編為五個大團，幹部降級使用，這些不成熟的舉措引起各級幹部強烈不滿，也使夏曦陷入孤立境地，雙方產生了強烈對立情緒。

三軍軍長賀龍對夏曦的批評很不服氣：“夏曦說我們（彭之玉帶的材料）南下是一貫錯誤，這是沒根據的。我們當時主要是肅清三路線，到蘇區才個把月，打了勝仗，什麼‘一貫錯誤’？但他們卻只批評”。“他指使省委決定把整個部隊編為五個大團，取消軍部，所有幹部一律降級。我即

^① 楊光華：《湘鄂西黨的‘四大’前後》（1981），《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二），第723頁。

^② 《中共湘鄂西省委給中央的報告》（1931年10月15日），《湘鄂西蘇區革命歷史文件彙集》（2），第123頁。

與夏爭論,我說:省委無權決定,我是中央分局委員,軍委副主席。是分局領導省委?還是省委領導分局?你們憑什麼決定?這個決議是錯誤的。我可以不執行的,我又說:請召開個黨員大會,大家投票,如果贊成你,我回中央去。”^①

九師師長段德昌對夏曦的處分也很不滿。“九師出去時只有一個多團,回來時又擴大了一個團,這些功績夏曦一概抹殺,並令省委作出關於九師行動的決議,挑起他們反對段德昌(省委當時有楊光華、彭之玉、崔琪、馬武等人)。主要爭論是關於江南失守,也聯繫了立三路線和退卻逃跑。段德昌不同意這個決議,他責問夏曦說江南蘇區失守是你的事還是我的事?部隊可以調你為什麼不調?你談話在先,決議在後,你談完話我們就走了,怎麼怪我們?況且當時平地皆是水,在襄河兩岸怎麼開展遊擊戰爭?夏曦同志無言以對。”^②

夏曦與多數紅軍幹部發生了嚴重對立。賀龍說:“實際上他是與整個新前委爭論,新前委有萬濤、劉鳴先、孫德清、段德昌、陳培英和我,萬濤任書記。在竹根灘打了六天仗,就爭論六天,部隊無人指揮。會上党的同志、軍事幹部都批評夏曦”。“我說我是軍分會主席、三軍軍長,可是省委卻可以隨意作出決議取消軍部、師部,你說是執行不執行?你談話和決議是兩個東西是不是陰謀?江南失守是誰之過?處分了段德昌又不去通知他對嗎?三軍南下錯在那裡?我說你來洪湖才幾天,地形不熟,與紅軍關係不深,與群眾不熟,組織三軍前委不要萬濤同志參加是非驢非馬的組織,你給所有幹部以處罰,今後怎麼再與他們見面。你辦的幾件事,那一件是有黨性的對得起党的”,“夏曦在當時是十分孤立的”。^③

萬濤對夏曦的不滿是最激烈的,他以三軍政委名義率九師主力26團

① 賀龍:《賀龍關於一九二七年冬至一九三四年間湘鄂西武裝鬥爭問題的談話》(1961年2月2日),《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二),第648頁。

② 賀龍:《賀龍關於一九三〇年冬至一九三四年間湘鄂西武裝鬥爭問題的談話》(1961年4月18-20日),《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二),第653頁。

③ 賀龍:《賀龍關於一九三〇年冬至一九三四年間湘鄂西武裝鬥爭問題的談話》(1961年4月18-20日),《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二),第653-654頁。

北進，回來時不僅九師擴大一個團，還把三軍主力七、八師都帶回來了，蘇區軍事實力大增，自以為功勞不小，結果卻遭到羞辱性的撤職處分。萬濤被趕出紅軍、回到地方後，在省委會上聽夏曦的愛人譚國甫提到“中央由於東山失守的真象不明而問夏曦的電文，以及夏曦對中央複電的電文（譚國甫管電臺，翻譯電碼）”，瞭解到夏曦在江南失守問題上推卸責任，他的怨憤更加激烈了。^①

萬濤不僅公開表示對處分的不滿，還把官司打到了中央。他10月18日寫信給中央：“出沙洋，折入京山，造成天門的赤區，這固然是軍委的決定。要與三軍取聯繫同樣是軍委的決定”，“事實上，九師不去取聯繫，三軍絕對不會下來的”。“夏曦同志對二十五團負責同志說：‘不要提九師了，九師反革命了！’”“反革命的罪名，我是絕對不承認的。”^②10月25日，萬濤再次致信中央：“關於九師行動問題，十月十九日在潛江舉行省委談話會（因省委代理書記未到會），完全同意了我書面報告上的意見”。“我們承認在沙洋時急於去聯繫三軍，放鬆了主要任務是錯誤的。但其他非事實的罪名，我們在未瞭解以前是不承認的”。“我請求中央根據最近各種材料作出結論”。^③

（二）萬濤發動批判夏曦“右傾逃跑主義”的鬥爭

在“九師行動”爭論尚未平息的情況下，1931年11月因在紅軍的發展方向上出現新的分歧，萬濤發動地方幹部批判夏曦“右傾逃跑主義”，其根本目的是推翻夏曦的領導地位。

洪湖核心蘇區雖然群眾條件很好，但是距離武漢很近，水路交通發達，利於敵人進攻，而不利於防守，洪湖葦蕩雖能隱藏遊擊隊，卻很難容納

① 楊光華：《湘鄂西黨的‘四大’前後》（1981），《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二），第724頁。

② 萬濤：《湘鄂西萬濤關於九師行動的報告》（1931年10月18日），《湘鄂西蘇區革命歷史文件彙集》（2），第131-132頁。

③ 《湘鄂西萬濤為九師行動問題致中央信》（1931年10月25日），《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一），第737頁。

萬人以上的主力紅軍。紅三軍討論是否回洪湖時就有人認為，洪湖地區“湖港紛歧，大部隊難以展開，大部隊當然不能躲藏，躲藏是自取滅亡”，“不顧一切沖入江、石、監、沔赤區，無異是自投羅網”，“從井救人，人固不救，救者亦死”。^①紅三軍回洪湖一年就不得不再次突圍撤出，證明這個看法是有道理的。事實上每次只要國民黨內部停止派系戰爭，湘鄂西蘇區就會很快遭到圍攻而失守，這個區域在客觀條件上是難以長期堅持的。

當面臨敵人新的圍剿時，段德昌提出向北部山區發展，這個建議得到了夏曦的支援。從湘鄂西紅軍一次又一次被迫上山才能生存的事實來看，這個發展方向是比較符合實際的。當然，紅軍主力離開意味著洪湖蘇區再次遭到敵人蹂躪，這是蘇區地方幹部和群眾最不願意看到的。因此唐赤英向省委傳達紅軍決策時，引起萬濤等地方幹部強烈不滿，他們把矛頭直指夏曦，掀起了批判夏曦“右傾逃跑主義”的運動，進而到中央告狀，力圖推翻夏曦。

據省委書記楊光華回憶：“夏曦派唐赤英（軍委參謀長）到省委來傳達前方的意見，省委才召開常委會議，聽取唐的傳達，唐出人意外地說出了中央分局、軍委關於反第四次‘圍剿’的決定，要把紅軍主力拉到鄂豫邊區去，洪湖只留遊擊隊和敵周旋，還說省委是否搬家的問題，特來徵求省委的意見。我們聽了這個決定感到驚奇，還沒有來得及仔細考慮時，萬濤一拍桌子站了起來就罵：‘娘的，鄧中夏把紅軍主力帶走，搞逃跑主義，害得我們好苦啊！夏曦又要搞逃跑主義，把紅軍主力帶走，讓我們再吃立三路線時的苦頭！難道中央代表都是這樣幫倒忙的嗎？’”^②

省委幹部提出反對意見後，夏曦基本放棄了原來的想法。但是萬濤並未善罷甘休，發動了清算夏曦右傾逃跑主義的鬥爭，在中央分局和省委聯席會議上又發生了激烈的爭論。“清算夏曦右傾逃跑主義路線問題，被

^①《紅三軍經營荊當遠新根據地的計畫》（1931年4月15日），《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一），第636頁。

^②楊光華：《湘鄂西黨的‘四大’前後》（1981），《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二），第724-725頁。

萬濤弄的滿城風雨。湘鄂西的領導幹部，聽到夏曦要重複鄧中夏右傾逃跑主義路線，無不咬牙切齒，恨之入骨，一直鬧到召開由中央分局、省委聯席會議，在聯席會議上，萬、夏發生了激烈爭論，“爾後就一直鬧到訴之於中央，兩次派人到中央打‘官司’。第一次，中央分局和省委共同指派宋盤銘同志去中央，萬濤控訴夏曦的罪狀是：(一)夏曦不執行並違反中央的路線，自己搞一條右傾逃跑主義路線；(二)關於九師行動的決議問題，欺騙中央，事後又對九師及萬濤同志的錯誤處理問題，省委對他進行了批評；(三)中央分局、省委聯席會議決定，不同意夏當三軍政委，應回分局主持全部工作，要求中央派人來，擔任三軍政委”。^①

萬濤趁夏曦與賀龍率軍到前線的機會，11月20日組織召開省委擴大會議，試圖利用地方幹部的不滿情緒，自下而上否定夏曦的領導，從中共當時的組織原則來看，這幾乎是一次“造反”。“會前關於夏曦要拋棄洪湖根據地的意見，已傳到各地黨部”，“討論最熱烈的問題還是軍事問題。第一個是夏曦想拋棄洪湖根據地，第二個是右江失守的問題”。“擴大會並一致同意調夏曦離開軍隊，決定魏士筠來中央報告一切”。“擴大會後，各地充滿了對夏曦的不滿，同時中央分局的威信大大降低。省代會前和他由部隊回後方這一時間中，夏曦的信仰差不多掃地”。^②

省委在擴大會議後給中央寫了報告，對夏曦提出嚴厲抨擊，實際上是要中央撤換夏曦：“這次省委擴大會議(十一月二十日)，關於中央分局的領導問題，爭執甚烈，各地到會的代表，極大多數對中央分局的領導公開表示懷疑”，“他們大多數一致的意見，認為：夏曦同志是一貫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有的說是一貫的取消主義”。“夏曦同志在紅軍中的領導，省委認為不適宜的，曾托宋同志向中央報告，同時紅軍中一般幹部均對軍部不滿，當然對夏同志的信仰也很低，請中央迅速解決這一問題。至於夏曦

① 楊光華：《湘鄂西黨的‘四大’前後》(1981)，《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二)，第725-726頁。

② 莊東曉：《莊東曉關於湘鄂西蘇區情況給中央的綜合報告》(1934年1月23日)，《湘鄂西蘇區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第368頁。

同志在中央分局的領導，省委沒有具體意見，的確他有些觀點是成問題，請中央酌量解決。但現在中央分局事實上早已沒有了，中央須派人來建立和加強對湘鄂西黨的領導。”^①

省委在萬濤影響之下12月1日做出了關於九師行動的新決議，推翻夏曦原來的處分決定，這等於是下級公開對抗上級。省委決議稱：“省委起初未看清九師行動的錯誤，自己應負主要責任，而把一切錯誤歸於九師負責同志和萬濤同志的身上。同時不去考究事實，竟憑空提出許多非事實的批評”，“當時撤銷萬濤同志政委職權是不正確的”。“組織前敵軍委，不要政委參加，更是不正確的，這是破壞了紅軍政委制度，這是兒戲的處理軍事。同時決定九師同志的處罰，又不當面宣佈，這是非布爾什維克的組織方式。”^②

擴大會議前，省委已經派出宋盤銘到中央告狀，宋盤銘在上海寫了報告，其中提到：“最近有很多的爭論，主要的是三軍出去不出去的問題。在潛江失敗後，夏曦就提出向外發展，紅軍的主力到京山去，可以把鄂北作後方去造新的根據地”。“省委大多數的同志認為這樣是退卻的意見，我們是不同意的”，“我提議一定要很快的加強湘鄂西中央分局的領導。”^③擴大會議後，萬濤等認為宋盤銘還沒有掌握最新情況，於是又派省委秘書長蔚士鈞到上海，要求他務必說服中央處理夏曦。

（三）萬濤等試圖在湘鄂西四大推翻夏曦，但在中央幹預下失敗

1932年1月22日，中共湘鄂西第四次代表大會在監利周老咀召開，大會代表127人，代表湘鄂西蘇區兩萬多名黨員。萬濤、潘家辰等反對夏曦

①《中共湘鄂西省委給中央的報告》（1931年12月3日），《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一），第747-748頁。

②《中共湘鄂西省委關於九師行動結論的決議》（1931年12月1日），《湘鄂西蘇區革命歷史文件彙集》（2），第150頁。

③宋盤銘：《宋盤銘關於湘鄂西情況給中央的綜合報告》（1931年11月22日），《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一），第744頁。

的人顯然在會前有充分的聯絡，賀龍等高級將領也支持他們，這次大會在前期成了聲討夏曦的大會，夏曦的領導地位在事實上已不復存在，自下而上推翻夏曦的計畫接近成功。

夏曦作為中央分局書記、湘鄂西黨的最高領導人，在剛開會做了6個鐘頭政治報告以後，接下來兩天始終處於遭圍攻的境地。當時“空氣緊張到極點，大部分是對軍事問題對夏曦的不滿。”^①“部分同志反夏曦同志的情緒，加之潘家洵派別分子的從中活動，將政治問題中心完全集中到夏曦同志是主張‘退卻路線，是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這一點上，要夏曦同志承認這一錯誤”，夏曦始終“受到嚴重的攻擊，政治問題討論的三天中完全在鬧這些問題”。^②“到會代表幾乎一致批評夏曦，有七十多個人向夏曦提出了一系列的問題，都是大問題，如土改侵犯中農利益，地主殺全家，富農送出蘇區，發展蘇區、江南失敗、軍隊改編、處分整個紅軍、打老新口時遣散傷患及地方幹部等等，把夏曦同志整的沒有辦法。下面拍桌子，夏在上面像死人一樣。”^③

大會原計劃第四天上午做結論，一共127名代表，公開發言批評夏曦已經有70多人，沒發言的還有不少，反對夏曦的遠遠超過半數，可以想見大會將做出怎樣的決議。但是在大會的第三天，到中央告狀的蔚士鈞和中央代表關向應趕到，他們帶來的中央精神使形勢發生了戲劇性的大逆轉。

在中共中央看來，雖然夏曦的領導有不成熟之處，但萬濤、潘家辰等自下而上推翻中央分局領導的錯誤更大，因為這從根本上動搖了中共集中統一的組織體系。作為一個列寧主義的革命黨，依據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黨指揮槍等原則建立的嚴密組織體系是中共力量的源泉，是

① 莊東曉：《莊東曉關於湘鄂西蘇區情況給中央的綜合報告》（1934年1月23日），《湘鄂西蘇區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第369頁。

② 《中共湘鄂西省委給中央工作報告》（1932年3月），《湘鄂西蘇區革命歷史文件彙集》（2），第302頁。

③ 賀龍：《賀龍關於一九三〇年冬至一九三四年間湘鄂西武裝鬥爭問題的談話》（1961年4月18-20日），《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二），第654頁。

取得成功的關鍵，是不容挑戰的。中央從1931年1月六屆四中全會開始，一直試圖加強對蘇區的領導，夏曦是中央分局書記，是代表中央來領導湘鄂西的，萬濤、潘家辰等推翻夏曦的嘗試，自然被當作對抗中央、違背組織原則的嚴重錯誤。

1932年1月《中央給湘鄂西黨中央分局和省委的信》可以看作對萬濤等的回答，中央雖然認為夏曦的領導存在一些缺點，但強調組織原則不允許有任何質疑：“中央分局的組織是中央在四中全會後加強對蘇區領導的一種方式。現在許多光榮的勝利，已經證明這種領導方式的偉大成功。同樣在湘鄂西亦已表現他顯著的成績。中央分局是中央的代表機關，他代表中央直接指導蘇區工作，他在蘇區有最高的權力”。“中央認為在目前條件下只有中央分局才能保證湘鄂西黨真正去執行國際和中央的路線，他無條件是應當而且必須存在，懷疑中央分局的的路線與組織的正確性，甚至提議取消中央分局是極端嚴重的錯誤”。^①

大會在蔚士鈞和關向應趕到後休會了一天半，主要由關向應、蔚士鈞、夏曦召集高級領導人傳達中央精神。大會重新開會後，形勢完全逆轉，其中蔚士鈞對萬濤的揭發和他報告在上海思想轉變的過程起了關鍵作用，蔚士鈞的角色類似1929年“朱毛之爭”中去上海彙報並轉變思想的陳毅。“蔚士鈞說：派我去中央是萬濤挑選的中間人物，但動身之前萬對我私下吩咐，去控告夏曦，務必得到中央處理夏曦的決定。我把萬的要求向中央講明以後，中央認為萬濤指控夏曦是別有用心的，為此留我在中央受訓，使我提高了認識，明辨了是非，明白了萬濤反對夏曦就是反對黨中央。中央派我回來揭露萬濤的反黨陰謀，我向大會表示，我受了萬濤的影響，經中央教育後，堅決與萬濤的反黨行為劃清界限，爭取做一個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②

^①《中央給湘鄂西黨中央分局和省委的信》(1932年1月22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8)，第77頁。

^②楊光華：《湘鄂西黨的‘四大’前後》(1981)，《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二)，第727頁。

關向應是另一個起到關鍵作用的人，他是政治局候補委員，直接代表中央，為了維護湘鄂西中央分局的威信，他來給級別較低的夏曦當副手。“關說：中央認為以萬濤、潘家辰為首的小宗派反黨活動，是反中央的，反國際路線的陰謀活動，中央命令立即制止這種反黨行為，不許用任何理由加以辯護，以免混淆是非，從而維護黨的統一領導，這是我黨更加布爾什維克的崇高紀律。中央號召湘鄂西黨在中央分局統一領導下，對反黨分子進行嚴肅批判，給予無情打擊。這個命令一宣佈，會場氣氛大變，從反夏曦一變而為反萬濤、潘家辰。楊成林在主席臺上更是把萬濤、潘家辰罵得狗血淋頭。賀龍同志在主席臺上沒有發言”。“最後，通過了夏曦的《爭取一省數省首先勝利》的政治報告和《為黨的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鬥爭》的決議”。^①

會後省委向給中央詳細報告了大會逆轉的經過：“第四天上午準備做結論，恰好關同志及魏士筠同志已到會場”，“即宣佈停止會議。當晚由夏、關二同志召集萬濤、光華、崔奇分頭個別談話，指出反中央分局及派別分子潘家洵企圖從中活動”。“次日上午，由中央分局關、夏、宋、賀四同志召集主席團及舊常委光華、崔奇、馬武、楊成林、溫榮親、彭之玉各同志開會”。“這次開了一天，次晨召集全體舊省委及全體主席及各地總代表開一會議，關於同志中進行反中央分局鬥爭問題及同志中的錯誤”。“萬濤同志在這次會議中的報告，承認錯誤的程度很不夠。在這次會議中又重新指出萬濤同志的態度的錯誤，繼續進行大會，先由光華、崔奇、之玉、士筠等同志說話，向大會報告這一鬥爭內容及揭發反中央分局的錯誤”，“潘家洵同志不但不承認自己的錯誤，而企圖在大會上反攻，謾罵這般自動承認錯誤的同志是卑鄙，誣害”。^②

萬濤、潘家辰等推翻夏曦的計畫在中央幹預下失敗，《中共湘鄂西第

^① 楊光華：《湘鄂西黨的‘四大’前後》（1981），《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二），第727頁。

^② 《中共湘鄂西省委給中央工作報告》（1932年3月），《湘鄂西蘇區革命歷史文件彙集》（2），第302-303頁。

四次代表大會政治任務決議案》對萬濤、潘家洵等提出了嚴厲的批評：“萬濤同志以領導者的地位在自己影響之下，團結了一部分同志在擴大會議開始向中央分局作復仇的鬥爭，採用兩面派的手段來反對中央分局，企圖將省委與中央分局對立，團結了反黨分子（如潘家洵），用種種謊言去動搖黨和紅軍領導”。“萬濤同志根據自己不正確的觀點去反對中央分局正確的領導，去作復仇的鬥爭，完全是反黨的鬥爭”。“萬濤同志在大會的表示是不夠的”，“特別是潘家洵沒有承認自己的錯誤”。^①

四次大會後，夏曦、宋盤銘於2月25日給中央寫了報告，特別強調“潘家洵在大會完全沒有承認錯誤；萬濤承認亦不徹底。”^②3月8日，夏曦又發表文章，抨擊“萬濤同志自己影響之下，團結了一部分同志（如尉士均、彭國才、李良耀、栩栩等同志），大呼特呼中央分局是一貫的取消主義的領導，省委書記是調和派。萬濤、潘家洵同志反又用兩面派的手段來掩蓋是反中央分局鬥爭的領導者”。“省四次代表大會在中央指示之下，揭露了萬濤同志的保守主義”，“萬濤同志還不肯承認自己承認的錯誤。”^③

在決議、文章和給中央的報告中，夏曦反復強調萬濤、潘家辰沒有完全承認錯誤，聯繫到四次大會轉向批判萬濤、潘家辰後，賀龍並未發言表示支持。很顯然，夏曦並不認為在四次大會上獲得了徹底的勝利，湘鄂西黨內鬥爭的已經終結。相反，夏曦認為反對他的人並未真正服氣，只是被迫服從中央的權威，事實也確實如此。因此，從“九師行動”和“三軍錯誤”爭論開始，中間經過省委擴大會議和四次代表大會，直到後來的殘酷肅反，是一場連續的黨內鬥爭。肅反擴大化不是偶然發生的，賀龍說得很清楚：“三軍回洪湖後的一些問題的爭論是四大會上的爭論和‘肅反’殺人的

① 《中共湘鄂西省第四次代表大會政治任務決議案》（1932年1月27日），《湘鄂西蘇區革命歷史文件彙集》（2），第219-220頁。

② 夏曦、宋盤銘：《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給中央的報告》（1932年2月25日），《湘鄂西蘇區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第150頁。

③ 夏曦：《中共湘鄂西省委擴大會議的政治錯誤》（1932年3月8日），《紅旗》副刊《布林塞維克》第一期，《湘鄂西蘇區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第170-171頁。

根子。”^①

三、夏曦領導湘鄂西蘇區第一次肅反

湘鄂西肅反是在中央指示推動下展開的，1932年1月中央專門作出關於肅反的決議，一方面強調要“最堅決”、“最無情”的開展肅反；另一方面也提醒防止像中央蘇區特別是閩西那樣肅反擴大化。決議提出：“要從最堅決的階級立場上，把一切階級的異己分子從黨內蘇維埃內與職工會內洗刷出去。要最無情的對付一切反革命團體的領導分子”，“必須用很大的決心，成立政治保衛處，有計劃的與有組織的同這種反革命團體做鬥爭。”決議同時也強調：“我們絕對要防止誇大這些反革命團體的力量”，“對於他們內部的領袖與群眾，應該從階級的立場去處罰他們，應該把主動與被動者嚴格的分別開來。”^②

湘鄂西蘇區肅反是從地方開始的，中央分局在1932年4月決議中強調不要擴大化、最好不用刑審、允許自首、縣級沒有殺人權。決議稱：“湘鄂西黨對於肅反工作還沒有明確的工作路線，表現著許多錯誤和弱點”，“對付反革命鬥爭的方法，沒有思想的鬥爭，沒有系統的檢查，只是逮捕和拷打、槍決，而且沒有根據的亂捕、亂打、亂殺。對於懷疑黨、蘇維埃策略的，甚至對於批評黨、蘇維埃的，就以反革命對待，造成群眾中的恐怖心理”。“有時誇大了反革命團體的力量，把一切消極怠工的分子、犯錯誤的分子都懷疑是改組派，造成一種恐怖狀態”。“目前必須採用下列的辦法”，“立刻頒佈自首條例及蘇維埃的被欺騙加入反革命團體自首的傳單，號召自首”，“各縣政治保衛處不准處死刑，最好不用刑審。”^③

① 賀龍：《賀龍關於一九三〇年冬至一九三四年間湘鄂西武裝鬥爭問題的談話》（1961年4月18-20日），《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二），第658頁。

② 《中央關於同蘇區內反革命團體鬥爭的決議》（1932年1月12日），《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二），第11-12頁。

③ 《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關於黨在湘鄂西蘇區同反革命團體鬥爭決議》（1932年4月16日），《湘鄂西蘇區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第196-198頁。

湘鄂西軍委4月發出改造紅三軍的訓令，肅反運動進入紅軍。訓令稱：“中央蘇區的富田事變和紅四軍肅反的教訓，很嚴重的教訓了我們，各種反革命的派別，如改組派、AB團、第三黨、取消派、托洛斯基派、羅章龍派，他們總是想打入紅軍和破壞紅軍。他們破壞紅軍的方法是組織拖槍到白軍去，洩漏軍事秘密供給白軍，在火線上打死自己的人，故意造謠動搖軍心，故意打敗仗來犧牲戰士，違抗上級的命令”。“我們從前在二軍團時代曾經破獲過一批改組派，同時我們三軍內拖槍到白軍去的也間或發覺，並發生有連長拖槍的事。我們也發覺有個別反革命分子利用我們經濟的困難來煽惑我們的戰士，想來瓦解我們紅三軍，幫助著徐源泉的進攻。因此就不能說紅三軍中沒有反革命的活動，我們大家必須估計到反革命分子在部隊中的搗亂”。^①

5月，肅反愈演愈烈。據楊光華回憶：“襄北在天門、漢川縣委所在地捕獲了一個敵軍營長名張錫侯，經過審訊，他供出天漢縣委軍事部長楊國茂是他們同夥，張又供出八師參謀長胡慎已。夏曦以軍委主席團主席身份，命令在前方組織軍事法庭，並任命朱勉之為軍事法庭庭長。”^②賀龍說：“紅三軍的‘肅反’是軍部住在吳堰嶺時開始的。紅八師的特務隊長犯紀律——殺雞、殺牛吃，關向應同志把他捉來一整，他承認了是‘改組派’，第二天就捉了胡慎已，這時後方的‘肅反’已經大規模展開了。‘肅反’是後方先開始的。不久，軍部回到洪湖，盧冬生同志的特務隊就被調去周老咀專門看‘改組派’犯人去了。”^③楊光華和賀龍的說法有一定差別，不過他們都認為胡慎已被捕是紅軍肅反開始的重要標誌。

從5月到6月，夏曦“成立了一個警衛團，以羅統一為團長，直屬軍委主席夏曦指揮，逮捕了省政治保衛局局長彭國才，從前方調朱勉之帶領在

① 《湘鄂西省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團關於改造紅三軍的訓令》（1932年4月），總政治部辦公廳編：《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歷史資料選編》第二冊，第111-112頁。

② 楊光華：《罪惡肅反的起源及其實際經過》（1984年10月24日），《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二），第730-731頁。

③ 賀龍：《賀龍關於一九三〇年冬至一九三四年間湘鄂西武裝鬥爭問題的談話》（1961年4月18-20日），《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二），第657頁。

押‘犯人’到後方，調監利縣委書記馬武為政治保衛局局長，朱勉之為政治保衛局審判長，組織了新的政治保衛局機構而開始向省委進攻，逮捕了省委常委萬濤。”^①

肅反由政治領導人夏曦、關向應直接指揮保衛局進行，即使是軍隊中的肅反，賀龍等軍事領導人也無權過問。賀龍說，夏曦“下令捉了孫德清，孫是在與我一同到七師師部時被捉的。同時被捉的還有七師的政治部主任孫之濤，孫是四大文豪之一。那時捉人都是夏曦給關一個條子，關即按照夏的指示捉。條子根本不給我看”。“文家墩戰鬥之後，在紅三軍中大肆捉人。”^②

雖然中央分局4月決議裡還說最好不用刑審，但肅反大規模展開後，實際上還是以刑訊逼供為主要方法。九師二十七團團長楊嘉瑞回憶：“他們對我用了刑，將我的手拇指和腳拇指用很細的繩索紮了起來，放在一條板凳上，兩頭狠勁一拉，痛得我頭昏眼花，接著就指問口供，要我‘自首’。我不肯‘自首’，他們就用皮鞭抽打我，將我打的昏死過去。醒來後，他們又拿出事先寫好的名單，念一個，要我重複照念，這就算是我的口供了。這些名單絕大多數我不認識。”後來楊嘉瑞利用小便的機會逃跑，到抗日戰爭時期才重新歸隊。^③

當時省委幹部、潘家辰夫人莊東曉回憶：“每當深夜，所謂‘犯人’被打的呼叫聲，吵得我幾乎沒有一夜能合眼，只有利用白天來補睡。一天中午，大概看守的人飯後休息去了，我矇矓中只見一個滿身是傷似人非人的陰影在蠕動，這是誰？我幾乎叫出聲來，見他頻頻搖手示意，細看之下，才認出原來是紅九師政委戴君實。他走前幾步細聲對我說：‘莊同志，您大概不要緊的，希望您能照著列寧主義的路線來發展中國黨的事業！我是

① 楊光華：《罪惡肅反的起源及其實際經過》（1984年10月24日），《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二），第731頁。

② 賀龍：《賀龍關於一九三〇年冬至一九三四年間湘鄂西武裝鬥爭問題的談話》（1961年4月18-20日），《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二），第657頁。

③ 楊嘉瑞：《在監利的日子裡》，《湘鄂西風暴——監利革命歷史回憶》，長江文藝出版社1986年版，第57頁。

摧殘黨的，當打得我受不住、他們指著名單叫我認的時候，我那時昏了，我都認了，凡是我知道的和我聽說過的名字我都認了。”^①

楊成林本來是夏曦的支持者，但是他親眼目睹刑訊逼供之後，竟嚇得逃跑了。楊光華說：“我們派楊成林同志去監審。所反映的情況更是可惡已極，不但嚴刑逼供，還指名問供，各種毒刑無所不用”。“監審第三天，楊成林就告訴我說：‘不得了，他們要供到我們頭上了。’誰知他留了一個條子給夏曦就跑了”，“上面寫道：夏鬍子，我楊成林決不是反革命，也絕對不作反革命，永別了！”^②

大批紅軍幹部被打為改組派，省委5月底向中央報告：“紅軍中已破獲改逆最高領導機關——軍事委員會，以胡慎己負總責（系紅八師參謀長），以九人組織，其餘委員系鄧希禹（系八師二十四團參謀長），朱壽謙（系紅八師特務長）、傅光夏（紅八師政治部主任）、謝錫章（紅八師二十四團第一營營長）、劉樹植（紅七師二十團團長）、黃正金（紅九師參謀）、李孝侯（紅九師二十七團參謀長）、樵繼漢（紅八師二十四團政委），此外有劉革非（紅七師十九團政委）、朱璧容（紅九師副官長）、熊管理員（紅九師的，名字未詳）、羅漢（紅軍第三團補充團長），以上名單已逮捕”。“紅軍中破獲之起源，則由紅七師二十一團之一排在新溝咀鳴槍罷崗（全排不放哨，系排長領導）及中央分局所發之改造紅三軍決議在部隊中發表，發動反軍閥制度的殘餘的鬥爭，引起群眾的積極性，按破獲案件之供詞與部分的自動報名自首而擴大，我們估計中級幹部亦不少，現只破獲領導機關，正在繼續進行破獲中。”^③

6月，潘家辰因拒不認錯被開除黨籍。^④7月，夏曦宣稱已查獲反革命

① 莊東曉：《歷史教訓要講清楚》，《湘鄂西風暴——監利革命歷史回憶》，第97-98頁。

② 楊光華：《罪惡肅反的起源及其實際經過》（1984年10月24日），《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二），第733頁。

③ 《中共湘鄂西省委關於破獲改組派給中央的報告》（1932年5月26日），《湘鄂西蘇區革命歷史文件彙集》（2），第412、414頁。

④ 《中共湘鄂西省委關於開除潘家洵黨籍的決議》（1932年6月19日），《湘鄂西蘇區革命歷史文件彙集》（2），第437頁。

數百人，其中軍隊幹部 150 以上、地方幹部 300 左右。夏曦向中央報告：“自省四次代表大會後，我們對於肅反已有相當注意，五月間開始在天漢縣（漢川之襄北天門之東的區域）破獲，以至破獲三軍中全部反革命組織，又因此線索破獲全蘇區整個反革命組織”。“紅軍中之反革命是以第三黨為主幹。八師參謀長胡慎己（原九師參謀長）是一九三〇年中央派到湘鄂西工作，他當時就是第三黨的分子，他到湘鄂西同時是鄧演達派來的。”紅三軍共查獲重要反革命分子團級以上軍事幹部 19 人、政治幹部 9 人，下級幹部百餘人；軍委直屬機關共查獲軍事幹部 13 人、政治幹部 4 人、醫生 6 人，軍隊幹部總共 150 多人。地方組織主要在省委、縣委查獲重要幹部 23 人，事務技術人員 40-50 人，地方幹部總共 300 人左右。^①

湘鄂西蘇區失敗後，省委書記楊光華逃到上海，1932 年 12 月他給中央的報告顯示，到蘇區失敗以前，大部分軍隊和地方幹部都被打成反革命了。當時中央還沒有批評湘鄂西肅反，楊光華是把肅反當作成績來炫耀：“省委常委中有兩個（萬濤、楊成林），還有一個嫌疑□□；執委中除夏曦、賀龍及一個實際負江南縣委書記之工人方國生，江陵縣委書記之工人李家芬（曾經做過省總委員長）及□□系嫌疑外，其餘都是反革命分子。省委機關中從組織部長楊成林，一直到幹事是清一色”。“各縣：沔陽縣委全部，江陵縣委全部，川陽縣委全部，江南縣委只書記不是，潛江縣委書記有嫌疑，其餘都是，天漢縣委全部，天潛縣委全部，京山、荊門、雲孝縣委書記都是（縣委中記不清楚），監利縣委除書記外，其餘大部分的。宜昌特委全部。襄北特委，襄北特委除一個團的是嫌疑外，其餘都是的”。“紅軍中一個師長，三個師政治委員，一個軍參謀長，另□□□□嫌疑，三個師參謀長，三個師政治部主任，師政治部組織科長、宣傳科全部，政治、社會兩科記不清楚，但主要負責人大部分都是。團長、政委、參謀長大部分的。”^②

① 夏曦：《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夏曦關於肅反等問題給中央的報告》（1932 年 7 月 8 日），《湘鄂西蘇區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第 226-233 頁。

② 楊光華：《關於湘鄂西具體情形的報告》（1932 年 12 月 19 日），《湘鄂西蘇區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第 338-339 頁。

肅反被捕者被集中關押在中央分局和省委所在地瞿家灣，第一次肅反被捕總數約為兩千人。楊光華說：“各縣及紅軍中的主要反革命首領都集中到保衛局了，各縣則沒有處決權。”^①莊東曉也提到：“大批在軍隊中捕起來的都一齊押到瞿家灣(省委、中央分局所在地)，省的機關都空出以押犯人”。“不幾天，省各機關的肅反也開始了，各機關內集體辦公室內坐著辦公的與吃飯的人數與日減少，省蘇的秘書長、土地部長、文書科，省委的組織部長、文書科、發行科、互濟會、反帝大同盟、工會的工作人員皆相繼不見”，“此時確有草木皆兵、人人自危的景象”，“據說當時被捕犯人將及兩千”。^②

當時黨內階級觀點佔有優勢，肅反被捕的重要幹部多數受過教育，出身於相對富裕的家庭，他們大都被殺，而工農分子大多通過“自首”被釋放。省委5月緊急通知提到：“並不是凡有之改組派等執行殺盡，而是要根據省蘇所頒佈之自首條例，作廣大宣傳，號召誤入者自首，自首者概免殺罪。”^③湘鄂西中央分局給鄂東道委的指示也提到：“你們的鬥爭方法還只是逮捕、槍斃，這是異常不夠的，你們可詳細參考中央關於與蘇區內反革命團體鬥爭的決議案”，“你們必須展開蘇區內部的階級鬥爭”，“分化那些被欺騙的群眾，以孤立反動領袖”。^④省委6月做出決議：“對於反革命分子的處置，要從階級的立場去處置，號召工人、貧農××分子自首”，“對於工人、貧農、中農分子則完全××教育方法為原則，組織訓練隊、生產隊，使他們瞭解自己的錯誤。”^⑤夏曦在7月給中央的報告也提到：“同時定出有自

① 楊光華：《關於湘鄂西具體情形的報告》(1932年12月19日)，《湘鄂西蘇區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第343頁。

② 莊東曉：《莊東曉關於湘鄂西蘇區情況給中央的綜合報告》(1934年1月23日)，《湘鄂西蘇區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第371、374頁。

③ 《中共湘鄂西省委緊急通知》(1932年5月15日)，《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二)，第317頁。

④ 《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給鄂東道委的信》(1932年3月)，《湘鄂西蘇區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第187頁。

⑤ 《中共湘鄂西省委關於同湘鄂西反革命團體鬥爭和糾正肅反中錯誤的決議》(1932年6月19日)，《湘鄂西蘇區革命歷史文件彙集》(2)，第442-443頁。

首條例，發表傳單，號召被欺騙壓迫加入反革命派之分子自首”。“在肅反當中我們已經表現明顯的階級路線，分別出工農階級與地主富農階級，分別出主動的與被動者，下層工農分子現已有三百人恢復自由”。^①

1932年7月，國民黨軍隊發動了對湘鄂西蘇區的第四次圍剿，由於敵人兵力強大，同時也由於肅反削弱了紅軍和黨的力量，戰局始終被動，蘇區逐漸縮小，在被敵人佔領的區域，肅反當然無法再進行了。到9月初，中央分局、省委所在地瞿家灣被敵軍攻佔，蘇區全面失敗，紅三軍主力八、九兩師和七師分別突圍到襄北，夏曦帶地方部隊獨立師退入洪湖，但也無法立足，被迫撤離蘇區。撤退過程損失慘重，“中央分局、省委和蘇維埃政府的大批幹部幾乎全部被拋棄在淪陷了的鄂西地區內。就連夏曦最信任的政治保衛局和政治保衛隊，也只帶出了幾個人。”^②

在失敗撤退的混亂之中，肅反被捕者有的被殺，有的被放，有的趁亂逃走。據楊光華1932年12月給中央的報告：“在肅反得出總結的時候，就發出舉行公開審判的通告，決定各方由群眾會議選派代表參加，但因敵人進攻緊急環境上的關係，沒有舉行成功。敵人進攻新溝咀時，很忙的將犯人全部遭到洪湖當中，後敵人攻破柳關佔領瞿家灣時”，“夏曦同志留洪湖同馬武同志解決反革命，除將主要首領與做過毒辣工作的處決”，“其餘自首的及欺騙的下層分子都釋放了。”^③又據楊光華1984年回憶：“省委機關的非武裝人員，在沒有計劃退卻的情況下，向洪湖逃去。有的被俘。（謝覺哉同志也被俘。據他親眼看見夏曦殺人，來不及就用麻袋裝著往湖裡沉，真是慘不忍聞。）”^④

從柳直荀的命運也可見當時的混亂情況。謝覺哉說：“一九三二年又

① 夏曦：《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夏曦關於肅反等問題給中央的報告》（1932年7月8日），《湘鄂西蘇區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第242-243頁。

② 賀彪：《湘鄂西紅軍鬥爭史略》，華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213頁。

③ 楊光華：《關於湘鄂西具體情形的報告》（1932年12月19日），《湘鄂西蘇區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第343頁。

④ 楊光華：《罪惡肅反的起源及其實際經過》（1984年10月24日），《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二），第736頁。

看到他在湘鄂西省蘇當財政部長”，“一天，忽不見了，初疑其因事出發，後知其被捕，被捕原因，未及宣佈而蘇區失敗，直荀同志及其他很多同志都從此不知下落。”^①甚至主持肅反的夏曦也搞不清狀況，到1934年3月還在給中央的報告中詢問：“據傳聞柳克明、潘家辰現逃上海，請中央查有無其事。”^②當然，根據後來的調查，柳直荀、潘家辰都未能倖存。

潘家辰和莊東曉夫婦是很受信任的留蘇學生，共產國際高層很早就對夏曦肅反提出了質疑。共產國際7月14日收到湘鄂西肅反的報告，其中提到潘家辰和莊東曉，馬季亞爾19日就給政治委員會寫信表示懷疑，認為二人是“很有名的人物，也是很老的黨員”，必須謹慎處理，同時提到他們和夏曦有分歧，暗示夏曦借肅反打擊不同意見。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皮亞特尼斯基8月9日親自致電中共，過問二人情況。^③中共中央為此給湘鄂西發了電報，因此夏曦不敢處決他們兩個。莊東曉在蘇區失敗後，“天天隨著保衛隊跑兵”，此時保衛隊已頻臨潰散，她體力不支掉隊，被國民黨軍俘獲，後趁亂逃出，1933年在張家口抗日同盟軍中才重新找到黨組織，^④而潘家辰很可能是死於亂軍之中。

四、紅軍退出洪湖地區後的第二、三、四次肅反

(一)湘鄂西紅軍第二次肅反

1932年10月，夏曦帶領獨立師餘部與三軍主力會合于六房嘴，在敗退的混亂之中，紅軍紀律難以維持，失敗情緒嚴重，夏曦解決這些問題沒有別的辦法，還是肅反。他在會合之後幾乎立刻開始了新的肅反，即湘鄂

① 謝覺哉：《謝覺哉日記》（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731頁。

② 《夏曦、賀龍、關向應給中央的報告》（1934年3月17日），《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二），第571頁。

③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處政治委員會第265號記錄》（1932年8月9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13），第194-196頁。

④ 《莊東曉的信》（1933年12月19日），《河北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甲12），第354-355頁。

西紅軍第二次肅反。1932年11-12月間，紅三軍在敵軍圍追堵截之中無法立足，只好繼續向北，轉戰于秦嶺、巴山之間，行軍7000餘裡，中間只休息過兩天半，處境極其危險，而夏曦的二次肅反始終不曾間斷。

夏曦在給中央的報告中說：“此次正是我們失敗之後，差不多每天有敵人追擊，每天戰爭和行軍，部隊的建制也是破壞了，完全失卻統率的機能，完全不能聽從指揮，槍一響建制即完全紊亂。所以每天部隊中丟槍、拋棄軍用品以及少數的拖槍投向敵人都隨時發生，軍旗都在此時被改組派分子拋給敵人。尤其嚴重的是階級路線的破壞，在農村中，破壞了階級利益，到小的街道上，所有的東西完全沒收一空”。“二次肅反，亦是這時開始”，“一直繼續到長途行軍的終結”。“二次肅反共逮捕二百四十一人。這二百四十一人中，有一個師長王一鳴，一個軍參謀長唐赤英，其次即是團長、營長以及一次肅反中所殘餘的政治機關人員，連長這一級是很少數的。”^①

據紅三軍衛生處長賀彪回憶：“被捕的‘改組派’、‘反革命’約200人。為了看管、審問方便，看押人員將我們分門別類。凡從洪湖突圍出的地方幹部被編為一個連，因為這些人中不少曾任過鄉、區、縣的蘇維埃主席，因而被稱為‘主席連’。紅軍幹部編成一個連，稱之為‘幹部連’。我是紅三軍衛生處長，自然被編在‘幹部連’。此後，在向湘鄂邊轉移的7000裡征途中，我一直作為犯人隨部隊行動。行軍時，腳鐐才被取下，但手銬要戴著。為了防止‘犯人’逃跑，戰士們看押方便，我們每個人脖子上系著麻繩，然後用一根長繩把全連人拴到一起”。“12月末，部隊到達巫山縣，準備翻越巫山，渡過長江。一天晚上，‘幹部連’的犯人按不同情況分別關押在幾個地方。第二天早上，除了我和兩名年輕的副團長外，‘幹部連’的其他‘犯人’統統被處決；行軍時我發現，‘主席連’也少了許多人。”^②

夏曦的不斷肅反讓賀龍非常不滿，雙方爆發激烈衝突，夏曦幾乎對賀

① 《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給中央的報告》(1934年9月15日)，《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二)，第625頁。

② 賀彪：《賀彪回憶錄》，第71-72頁。

龍下手，賀龍也準備反抗，在關向應的苦心調和之下，才沒有徹底決裂。賀龍說：“在行軍過程中，部隊是很苦的，沒有東西吃，吃柿子、核桃、高粱稗子，但夏曦同志還不斷殺人。對段德昌、王炳南等皆不相信，開會不找他們，並且兩次企圖下我的手”。“一次在王店，夏曦同志企圖加害於我，要我寫申明書”。“我說：你給我寫申明書，民國十二年，我在常德當第九混成旅旅長時，你拿著國民黨湖南省黨部執行委員身分的名片，來找我接頭，問我要十萬塊錢。我請你吃飯開了旅館，還給你五萬塊錢。這雖然沒有收條，但是事實。你殺了這麼多人，是什麼黨員？你給我寫申明書。鬧的下不了臺。關出來調停”。“另一次是在竹林關。他把我和關的警衛員槍皆下了，還逮捕了兩個警衛員，我問他是什麼意思？為什麼你的警衛員槍不下？我把身上帶的一支白朗林手槍，也掏出來放在桌子上，說：還有一支你要不要？你要也不給。這是我的。我當營長時就帶著它了。那時槍皆上了頂門火了，時刻準備著”。^①

（二）第三次肅反與解散黨組織

1932年12月底，紅三軍在巴東南渡長江，到達湘鄂邊的鶴峰。1933年1月，中央分局在毛壩召開會議，會上賀龍提出停止肅反，並對關向應說通過自下而上的選舉變更領導，但遭到關向應嚴厲批評，認為這是違反組織原則的。中共中央是最高領導機關，可以在遵義會議以民主方式變更領導，但湘鄂西中央分局是中央派出機構，只有中央才能變更其領導。賀龍回憶：毛壩會議討論後，我向夏曦提出“肅反停一個時期，有了反革命再說麼！他不同意。這時我第一次向小關提出‘你當書記。我們開個會選一下麼！選他是選誰。’小關批評我無組織無紀律，批評的很嚴厲。”^②

1933年1月13日，紅三軍進佔桑植，但是28日又在優勢敵軍進攻下

① 賀龍：《賀龍關於一九三〇年冬至一九三四年間湘鄂西武裝鬥爭問題的談話》（1961年4月18-20日），《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二），第659頁。

② 賀龍：《賀龍關於一九三〇年冬至一九三四年間湘鄂西武裝鬥爭問題的談話》（1961年4月18-20日），《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二），第660頁。

被迫撤出，退回鶴峰毛壩。這時夏曦又開始了第三次肅反，九師與鶴峰地方幹部大受摧殘。在連續失敗之下，夏曦領導威信蕩然無存，由於害怕反對者借黨的會議聯絡反抗，他竟提出解散紅軍的黨組織。九師師長段德昌對夏曦提出激烈批評，後又和宋盤銘寫聯名信提出返回洪湖。夏曦為了維護自己的領導地位，拿不出別的辦法，還是肅反，以“分裂紅軍”的罪名殺了段德昌。

夏曦給中央的報告說：“三次肅反是退出桑植後，在恢復與發展巴東、建始、施南的蘇區過程當中，當時改組派的口號：‘立即回洪湖去’，山上不能創造蘇區，包穀飯不好吃，山路不好爬”。“從桑植退出後，在走馬坪與獨立師會師，獨立師主要的是湘鄂邊獨立團編製成的”，“周小康、陳葉平、楊英等在湘鄂邊的改派差不多是公開活動”。“三次肅反的開始，從破壞獨立師的改組派的組織，一直到段德昌”。“三次肅反共逮捕了二百三十六人，主要的是段德昌與軍參謀處長和湘鄂邊獨立團的改派分子”。“在三次肅反以後，黨的組織解散了，因之黨的工作與政治工作是完全停頓的。”^①

賀龍的回憶更加生動：“退出桑植開第二次毛壩會議，夏提出解散黨，創造新紅軍。大家都不同意；我講解散黨我不同意，我在舊軍時就想參加黨，到南昌暴動才加入；我只曉得紅軍是黨領導的，解散黨我不同意，別的道理我說不出。段接著也補充發言，段不滿意，說：‘你把紅軍搞完了，蘇區搞垮了，你是革命的功臣還是罪人?!’小關不斷的插話，想叫我們不講。宋盤銘也講了，他說：‘我從小被黨送到莫斯科，在莫斯科加入黨，解散黨我不同意’”，“以後到金果坪就解散黨了”。“段德昌、宋盤銘寫信來建議回洪湖。夏就說段德昌要帶九師跑，我說他不會跑，要跑他還寫信回來。結果還是調回來，在鄖陽關調回來，在金果坪殺了”。^②

在1933年3月24日巴東縣金果坪會議上，夏曦不顧其他領導人的反

① 《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給中央的報告》(1934年9月15日)，《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二)，第625-626頁。

② 賀龍：《賀龍關於一九三〇年冬至一九三四年間湘鄂西武裝鬥爭問題的談話》(1961年4月18-20日)，《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二)，第660-661頁。

對，下令解散黨組織。按當時組織原則，夏曦作為政治領導有最後決定權，他認為：“到了三次肅反以後，感覺到黨在沒有清洗以前，黨的活動，供了改派的利用，當時覺得改造黨已經不能依靠舊的幹部，因此決定解散，重新登記”。^①《清洗條例》規定：“因為反革命派別暗藏在黨內活動有幾年的歷史，並且在肅反的過程中發現大部分幹部加入了反革命派別，因此決定將地方上、紅三軍中、遊擊隊中、各級黨的委員會、支部幹事會一律解散，所有共產黨員實行清洗，重新登記”，“清洗期間紅軍中以一個月為限”。^②

夏曦名義上說清洗後重新登記，但解散後很長時間並未重新登記，造成歷史上罕見的、一支主力紅軍沒有黨組織的怪現象。廖漢生說：“多數黨員在肅反中被殺，以為當時黨員都是改組派，及至發展到解散全黨，取消一切政治機關及連隊支部，當時全軍只剩下四個黨員（賀龍、關向應、夏曦、蘆冬生——蘆為與中央聯絡之交通），司令部之組織亦無形取消，由於沒有參謀人員與政治機關，打仗則依靠幾個警衛員去傳達賀之口述命令。”^③

解散黨組織後，夏曦繼續在鶴峰擴大肅反，這時把肅反中沒有被殺的“改組派”組成“自首連”，竟成了戰鬥力最強的骨幹，這表現出幹部戰士的忠誠，也揭示了肅反擴大化的荒謬。廖漢生回憶：“由於肅反，很多主要幹部被殺，回鶴峰後肅反仍未停，部隊恐怖逃跑之現象甚嚴重”。“過去當過團長者除賀炳炎一個人外（賀炳炎也押了二十九天）再無別人，人皆不願當幹部，不願當黨員，人皆不願擴兵，因擴兵及介紹了熟人來，出了問題怕受連累，在毛房二人相遇一說話即有嫌疑，一塊買些花生吃，即以‘好吃會’之名殺掉，在隊列前號召自首，如不自首即指名拉出殺之，鶴峰郊外每

① 夏曦：《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給中央的報告》（1934年9月15日），《湘鄂西蘇區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第424頁。

② 《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關於湘鄂西蘇區及紅三軍中共黨員青年團員清洗條例》（1933年3月24日），《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二），第542-543頁。

③ 廖漢生：《紅二軍團歷史片斷》（1946年12月15日），《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二），第682頁。

日皆有被殺之屍體十數具不等”。“每團轄三連，每團內有一個‘自首連’，都是過去所謂自首後未殺之改組派排連營幹部，但打仗專靠自首連打，繳到武器彈藥後得送給其餘兩個連。”^①

在鶴峰的肅反不僅在紅軍中進行，也波及到地方幹部，不少在當地有經驗、有威望的幹部被殺，使紅軍失去了與群眾的聯繫。鶴峰本是有深厚群眾基礎的老根據地，山區地形也比較有利。鶴峰蘇區的失守，雖然是敵軍重兵圍攻的結果，但肅反破壞了群眾基礎也是重要原因。當地一位老幹部說：“周小康、陳協平、陳奇謨、董朗、郭天明等同志，肅反被誣，死於江北”，“鶴峰、桑植、石門老根據地，沒有熟悉情形的老幹部去聯繫群眾。蘇區不能恢復，只能在湘鄂川黔邊境，長期遊擊”。^②

（三）第四次肅反和關向應的轉變

1933年5-6月間，夏曦又開始了第四次肅反，殺害了九師政委宋盤銘、七師師長葉光吉、七師政委盛聯均等。據夏曦報告：“四次肅反，一共逮捕一百七十二人，主要的是宋盤銘以及七師師長葉光吉同師政治委員盛聯均和軍政治部政務科長以及軍管理科科長江器也”，“這一次肅反的開始是起於九師二十七團以及師部各部處聯合著反對師長擁護宋盤銘。”^③

1933年夏天，敵軍圍攻紅三軍，形勢惡化，在鶴峰也站不住腳了。賀龍在銀石坪會議又提出停止肅反，得到關向應的支持，毅志標等被釋放。不過當賀龍再次提出變更領導、由關向應主持工作時，又一次遭到堅持組織原則的關向應拒絕。賀龍說：“銀石坪會議沒鬥，那時候他倆是悲觀失望，特別是夏曦，我鼓勵夏曦，並說再肅反不行了，才放了毅志標。到銀石

^① 廖漢生：《紅二軍團歷史片斷》（1946年12月15日），《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二），第682-683頁。

^② 獵人：《湘鄂西紅軍遊擊紀略》，《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二），第697-698頁。

^③ 《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給中央的報告》（1934年9月15日），《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二），第626頁。

坪我也提了要小關搞。”^①從這裡也可以看出，當時的組織原則有潛在危險，一方面集中統一的組織在對敵鬥爭中很有力量；但另一方面，當領導者發生錯誤時，很難自下而上糾正。

穀志標回憶：“1933年7月，我被當成‘改組派’分子抓了起來，其罪名是‘與改組派分子盛聯鈞有來往’。熟悉情況的同志都知道，盛聯鈞是黨的優秀幹部，是七師政委。當時我作為軍部的參謀，曾請盛聯鈞介紹過七師經常活動的宣恩一帶的地形，並根據他的介紹繪製出該地區簡單的線路圖，以備行軍打仗使用。就是因為這一點‘來往’，夏曦便決定將我抓起來，準備送鶴峰的燕子坪砍頭處死。後經關政委查證後，才將我釋放，使我得以倖存至今。”^②

當時對於貧農出身的所謂“改組派”分子，一般不會殺害，而是仿照鄂豫皖蘇區的做法，把他們開除軍籍、趕出紅軍。但當時蘇區已經淪陷，地主還鄉團正在瘋狂報復，“開除了他們的軍籍，這對他們來說就等於只有死路一條了”，“讓他們離開自己的隊伍，就無異於把他們送給反革命‘還鄉團’。他們有家不能歸，離開紅軍就無出路。很多同志苦苦哀求，不要讓他們離開紅軍。但‘左’傾分子最後還是把他們大部分趕走了。”^③

7月，紅三軍縮編為兩個師後分開行動，賀龍、關向應帶領軍部和九師，夏曦、盧冬生帶領七師，到12月會合時，紅三軍總共只剩下三千餘人。失敗退出洪湖後，關向應對肅反的態度逐漸發生變化，分開行動後，關向應和賀龍在一起，思想也逐漸與賀龍接近。本來關向應是受中央派遣，專門到湘鄂西來支持夏曦的，在1932年1月湘鄂西四大上，他對維護夏曦的領導地位起到了關鍵作用。在肅反初期，關向應對夏曦也是支持的。但是隨著肅反的惡果逐漸暴露，他積累了經驗，也開始懷疑夏曦的不斷肅

① 賀龍：《賀龍關於一九三〇年冬至一九三四年間湘鄂西武裝鬥爭問題的談話》（1961年4月18—20日），《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二），第661頁。

② 穀志標：《回憶紅軍時期的關向應》，《關向應紀念文集》，大連出版社2002年版，第291頁。

③ 黃新遠：《對湘鄂西肅反擴大化的回憶》，《湖南黨史資料通訊》1982年第9期，轉引自賀彪《湘鄂西紅軍鬥爭史略》，第241頁。

反，轉而保護一些人。李文清說：“我和吳子傑、譚友林、劉林、楊秀山、成均、樊哲詳、羅坤山、穀志標等人，都是關政委從虎口裡營救出來的。”^①關向應的這種轉變得得到紅三軍幹部戰士的擁護，所以肅反糾正後，受到普遍憎恨的夏曦無法繼續在二軍團工作，而關向應一直留在原部隊、並始終享有很高威望。

1934年初，紅三軍幾乎喪失了全部根據地，被迫在湘西龍山、永順、桑植、大庸、慈利等地遊蕩，但肅反仍沒有停止。紅三軍此時處於最危險的境地，部隊只剩三千多人，子彈極少，幾乎沒有能力打硬仗，隨時都有覆滅的可能。一年多時間連續四次肅反，大批骨幹被殺，紅軍元氣大傷，黨組織也被解散。在險惡的情況下，紅三軍之所以能夠倖存下來，一方面靠幹部戰士的忠誠和勇敢，另一方面賀龍作為領袖的個人威望和軍事才能也起了關鍵作用。廖漢生認為：“當時部隊恐怖逃跑很嚴重，捆殺了很多人，取消了政治機關與黨的組織之保證，部隊未全垮而能保存下來，固然賴於在土地革命鬥爭中之覺悟所鼓舞，然而端賴賀龍同志個人威望所維繫”。^②

五、在中共中央和任弼時幹預下結束肅反

在1934年初極為困難的情況下，夏曦不但沒有反思自己的錯誤，為了維護他領導肅反的正確性，甚至還在2月寫了《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關於肅反總結與清黨的決議的報告大綱》，其中炮製出一個“反革命大聯合”的荒謬概念，不但認為各種反共派別在湘鄂西都有代表，而且這些彼此敵對的派別還結成了大聯合：“反革命的大聯合——改組派造成了清一色的系統 1. 改組派——周逸群、萬濤為首領；2. 第三黨——胡慎己、唐赤英為首領；3. 託派——劉鳴先、潘家辰為首領；4. 陳獨秀派——侯蔚文

^① 李文清：《紅三軍的一面旗幟》，《關向應紀念文集》，第299頁。

^② 廖漢生：《紅二軍團歷史片斷》（1946年12月15日），《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二），第683頁。

為首領；5.秋白主義者——李劍如；6.羅章龍派——張昆弟、王進之；7.AB團分子——零星的發現；”以上各派“均加入改組派、並且又用新共產黨的名義活動”。^①

1934年3月，夏曦在給中央的報告裡宣揚了肅反成就：“湘鄂西蘇區及紅三軍經過四次肅反，前後逮捕三千多人，黨蘇幹部十分之九為改組派，因是決定解散黨和青年團的下級組織，舉行清黨清團重新重記。”^②夏曦不僅認為自己肅反成績很大，還要幫助中央和其他蘇區肅反，提醒中央注意一些人可能是改組派：“肅反中得到過去湖南省委之田子厚口供，現在湘贛省委書記王首道在湖南省委時為改派，言之確鑿。段德昌供，聽說鄺繼勳是改派”。“唐赤英供劉伯承政治上不堅定，但未確指其與改派有關。唐赤英又供他是在上海時由中央和運處一個王文清介紹入改派，又湘鄂贛省委宣傳部長龍秀寅是改派，又據人說，孔荷寵處有一個人經常來往長沙形跡可疑；聽說孔部肅反亦多，故提出，請注意。”^③

但這兩個文件已經是夏曦領導肅反的尾聲了，關向應等重要領導人已經轉變，對肅反的抵制力量越來越大，而夏曦自己也在連續失敗之中喪失了信心，日益消極，不再力圖強化領導，逐漸失去了肅反的動力。當然，這個變化不是一天發生的，有一個權力逐漸轉移的過程。1934年春，紅三軍挺進到貴州東部，廖漢生回憶：“夏曦同志之領導，（一九三四年春）在貴州沿河印江之間之南腰界開會檢討，夏承認自己錯誤，但有人質問他是怎樣錯誤時，夏大發脾氣又與賀龍同志爭吵起來，未果而散。”^④

1934年6月在貴州沿河縣召開的楓香溪會議是重要轉折點，類似於

①《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關於肅反總結與清黨的決議的報告大綱》（1934年2月16日），《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二），第566頁。

②《夏曦、賀龍、關向應給中央的報告》（1934年3月17日），《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二），第570頁。

③《夏曦、賀龍、關向應給中央的報告》（1934年3月17日），《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二），第570-571頁。

④廖漢生：《紅二軍團歷史片斷》（1946年12月15日），《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二），第683頁。

中央紅軍的遵義會議。楓香溪會議決定停止流浪，利用貴州東部敵軍薄弱的有利條件，著手創建黔東蘇區，同時停止肅反，恢復黨組織。賀龍回憶：“到了楓香溪以後，我說再也不能這樣走了。我先與小關交換了如何創造黔東根據地；怎樣爭取神兵的問題，在會上提出後，夏曦不同意爭取神兵的工作，同意建立黔東根據地，晚上召開幹部會議”。“小關在會上作了報告，報告內容：登記黨、團員，恢復黨的組織，派一批幹部去作地方工作，小關主要是以自我批評的方式講的”。“夏曦在黔東時期，一直是消極的，行軍到宿營地就是吃飯、睡覺。沒有做什麼工作”。“黔東這個時期的工作，是紅三軍的一個很大的轉變，肅反停止了，提拔了一批幹部；建立了黨，恢復了政治機關，在各縣建立了遊擊隊和獨立團，擴大了紅軍，建立了根據地”。^①

在楓香溪會議後恢復黨組織過程中，關向應發揮了重要作用。黃學忠回憶：“在楓香溪會議上，決定要立即恢復紅三軍各級黨組織和政治機關”。“關向應來到我們一連，參加了兩天軍人大會，他來我們連是為恢復黨、團組織，進行黨團員登記的”。“由於連續不斷進行‘肅反’，部隊中廣大官兵感到人人自危，民主生活早就被恐怖氣氛所代替，說錯了話，或者給上級提條意見，往往被當成‘改組派’抓起來，誰敢說什麼呢？開了大半天會，大家低著頭默不作聲。曾經吃過‘肅反’苦頭的同志，則淚流滿面，泣不成聲。看到這種情景，關向應宣佈休會，第二天繼續開。當晚，他找連裡原是黨員的連長、副連長、排長個別談話，對他們進行苦口婆心地說服教育，曉之以理，要他們在第二天的軍人大會上帶頭講話”。“當時我心裡顧慮重重，怕提了意見，再次被抓起來。關向應在旁看見後，笑著對我說，有什麼委曲就說出來，憋在心裡是很難受的。我和連裡十多個原是黨員、團員的，都一個一個把憋在心裡的委曲和意見講了出來，關向應同大家一起歡暢地笑了。”^②

^① 賀龍：《賀龍關於一九三〇年冬至一九三四年間湘鄂西武裝鬥爭問題的談話》（1961年4月18-20日），《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二），第662頁。

^② 黃學忠：《懷念關向應同志》，《關向應紀念文集》，第312-313頁。

楓香溪會議雖然停止了肅反，但由於並未觸動夏曦的領導地位，軍中的恐怖氣氛難以消散，轉變的過程是緩慢的。1934年7月，中央通訊員到達貴州沿河紅三軍總部，帶來中央5月6日的指示信，動搖了夏曦的領導地位，大大加快了轉變的進程。其實早在一年前的1933年7月21日，中央就已經在指示信中對湘鄂西肅反擴大化提出了嚴厲批評，可惜紅三軍早已失去聯繫中央的電臺，而這封信也未能送到。這封信中明確批評“湘鄂西黨的工作是不能令人滿意的”，“在五月五日的信中你們以為‘湘鄂西蘇區的失敗’，是因為‘黨，蘇維埃和紅軍的大多數幹部是改組派’。這種見解是不正確的，誇大的。事實上改組派只是少數”。“把蘇區內反革命派，看作是‘了不起’的力量，結果在肅反中犯了許多錯誤”。^①從這裡可以看出，高度集中的權力結構，一方面有強大力量，同時也存在嚴重弱點。只因溝通不暢，電臺聯繫中斷，一封關鍵的指示信未能送達，湘鄂西紅軍的肅反就又持續了一年，損失巨大，各級組織幾乎喪失了自主糾正錯誤的能力，只能消極被動地等待中央指示，如果中央出現偏差，就更加難以糾正。

1934年5月6日，中央再次寫信嚴厲批評湘鄂西肅反：“除了你們自己少數人外，完全不相信群眾與自己的同志，解散了所有的地方黨部與團部，而將反革命的力量反擴大到不可思議的程度，以至使你們終日陷入疑神疑鬼的恐怖中生活著，這種恐怖遂造成了你們把肅反當作一切工作中心的根本錯誤！實際上你們是作了反革命挑撥離間的俘虜，取消了兩條戰線的思想鬥爭，這是極大的罪惡！而且你們這樣的肅反如繼續向前發展，可以走到你們自己少數人也相互懷疑，猜忌與不信任的結果。我們絕對不能同意你們的意見：‘黨蘇幹部十分之九為改組派’，這種估計完全是不正確的，誇大的！事實上改組派只是最少數”。^②

湘鄂西中央分局接到中央來信後，表示完全服從，8月4日通過了接

^①《中央給湘鄂西中央分局的信》（1933年7月21日），《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二），第547、549頁。

^②《中央給湘鄂西中央分局信》（1934年5月6日），《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二），第581頁。

受中央指示的決議：“中央分局認為五月六日的指示信，首先是對於我們的錯誤與罪惡嚴厲的指斥，是我們轉變工作的主要樞紐”。“一九三三年三月金果坪中共分局會議，犯了不可容許的機會主義的錯誤。首先便是解散紅軍中、地方上黨和團的組織，舉行重新登記，取消省蘇維埃政府的名義”，“這便是等於解除了自己的武裝。”^①9月，中央分局又通過恢復黨籍、團籍的決議：“最近中央來信嚴厲批評我們解散黨和團的錯誤，中央分局完全接受中央的指示”。“紅軍中的黨與團現已恢復，在清黨的過程中，尚有個別自己未登記的黨團員應即恢復”。“在肅反過程中有被改組派供過的黨團員，而只僅僅是供過，沒有事實證明，而這個黨團員在實際工作中表現好的，仍可恢復黨籍和團籍。”^②

中央來信嚴厲批評後，夏曦的領導地位已經動搖，中央分局通過決議糾正夏曦錯誤以後，關向應逐漸成為新的政治領導核心，放手進行恢復黨團的工作。廖漢生回憶：“接到中央五中全會指示，夏曦錯誤才逐漸被人認識，在關向應同志之主持下來恢復黨的組織，關自認支書，介紹了一些黨員入黨，由於在肅反中殺的多為黨員，故多數人不敢入黨，過去之老黨員亦不敢承認自己為黨員而重新登記，有的人要他人入黨，即以雙腕繩捆之疤痕出示，如楊秀山（現晉綏獨四旅政委）重新登記後因畏懼被殺而逃跑至三裡之遙，後念及在敵人統治下何處可逃，故又返回，又如原大青山騎兵團長蔡九，可以英勇戰鬥不畏犧牲，但決不入黨，直到1938年由賀龍、關向應介紹解釋方入黨。”^③又據楊秀山回憶：“由於夏曦搞‘肅反’的影響，許多領導同志和黨團員慘遭誣害，我也因為參加團的活動，當成‘改組派’被抓了兩次。那時黨團都被取消了，承認是團員不是自找麻煩嗎！所以，我不敢說自己是團員。後來關向應再三詢問，我不敢撒謊，才承認我早就是

①《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關於接受中央指示及五中全會決議的決議》（1934年8月4日），《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二），第605-606頁。

②《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關於紅軍中黨團員黨籍、團籍問題的決議》（1934年9月），《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二），第619頁。

③廖漢生：《紅二軍團歷史片斷》（1946年12月15日），《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二），第683頁。

團員了。”^①

1934年10月24日，率先西征的紅六軍團在貴州印江縣與紅三軍會師。會師對兩軍都有重大積極意義，遭到圍追堵截的紅六軍團得到了休整機會，而紅三軍得以利用紅六軍團的電臺與中央恢復聯繫，並且在政治局委員任弼時的主持下，取消了夏曦的災難性領導，糾正了肅反造成的黨和軍隊組織混亂狀態。廖漢生回憶：“六軍團到後人數很少，疲勞不堪，由二軍團掩護其休整。兩個軍團相比，六軍團政治領導很好，但紀律很差；二軍團由於肅反後，政治領導差，但能拖，紀律好，相互影響對二軍團有很大幫助。”^②按廖漢生的說法，肅反的恐怖至少帶來一個好處，二軍團的比較守紀律。

會師後，紅三軍恢復紅二軍團番號，二、六軍團合力進攻湘西，佔領了永順、大庸、桑植等縣，在四省交界創建了湘鄂川黔蘇區。1935年1月下旬在大庸縣丁家溶，任弼時主持召開了紅二軍團黨的積極分子會議，徹底清算了夏曦的領導錯誤，撤銷了他的職務。“在任弼時同志主持下，開檢討會，清算了夏曦同志之右傾機會主義領導，夏曦被撤職，除賀龍及關向應同志外，其餘二軍團幹部猶有餘怖，仍皆未敢發言。”^③

在會上，任弼時對夏曦領導的肅反擴大化提出嚴厲批評：“夏曦同志當時誇大反革命力量，在反革命活動面前，驚慌失措，認為部隊中連長以上的幹部，有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改組派，逮捕的在二千人以上”，“沒有詳細審查而逮捕槍決，或開除軍籍”。“夏曦同志同樣認為，湘鄂西地方黨、蘇維埃區、縣、省級的幹部，也有百分之八、九十是改組派。只是由於退出蘇維埃太張惶倉促，沒有來得及把他們都拘捕和槍決，只好以命令來宣佈解散這些組織”。“把工作中同志們所有的錯誤缺點都看成是反革

① 楊秀山：《回憶關向應》，《關向應紀念文集》，大連出版社2002年版，第283頁。

② 廖漢生：《紅二軍團歷史片斷》（1946年12月15日），《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二），第684頁。

③ 廖漢生：《紅二軍團歷史片斷》（1946年12月15日），《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二），第684頁。

命搗鬼，因而取消了思想鬥爭，造成黨和部隊中嚴重的肅反恐怖現象。把戰士和黨團員的自發性、創造性、積極性完全抑制下去，同志們有意見不敢說，甚至互相猜疑。夏曦同志在那時恐怕只能相信自己一個人是唯一堅決革命的，其他的似乎都不可靠了。在這種恐怖與不信任、以肅反為一切工作中心的下面，沒人敢說話，或自動去工作，人人覺得有被人認為是改組派而遭拘捕殺頭的危險。這種情況的嚴重，的確可以走到自己解體的危險前途。”^①

中央接到任弼時的報告後，不同意撤掉夏曦的全部職務，要求在批評他的錯誤後，保留他在領導機關工作。中央1935年3月給任弼時電報稱：“最近期內夏同志在實際工作中新犯的錯誤，應該指出批評，在領導機關內部開展鬥爭是應該的。但你們所採取的組織結論，是不恰當的”，“蘇區目前是處在一個極端困難的環境，領導機關內的團結一致，比什麼都重要”。“夏曦同志必須繼續在領導機關內工作，以同志的態度，在實際工作中說服與糾正他的錯誤”。任弼時對夏曦採取了團結的方針，保留了他湘鄂川黔邊區革命委員會副主席和省委委員的領導職務，1935年5月又任命他為紅六軍團政治部主任。^②

夏曦卸下湘鄂西最高領導人的重擔後，似乎又恢復成正常的高級幹部。據當時六軍團領導人蕭克說，夏曦“到六軍團當政治部主任，做了很多工作。他平易近人，我和王震同志都承認他有水平，尊重他。一九三六年三月，我軍退出畢節，在野馬川、七星關地區，他去歸附我們的綠林部隊席大明部工作，該部背棄諾言，反水，夏曦同志過河時不幸溺水犧牲”，“在批判他的錯誤的時候，不能過分強調個人責任。”^③曾有傳聞說夏曦落水後，戰士由於對他以前肅反不滿，故意不去救他，這個說法是不確切的，對

① 任弼時：《在紅二軍團黨的積極分子會議上的報告》（1935年1月27日），《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四），第52-53頁。

② 《中共中央給任弼時並轉省委電》（1935年3月31日），《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版，第410-411頁。

③ 蕭克：《紅二、六軍團會師前後》，《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1期，第17-18頁。

夏曦不滿的是二軍團戰士，犧牲時夏曦已調到六軍團工作。

夏曦本人也屢次對肅反殺害同志表示悔恨。二方面軍開始長征後，“戰鬥不斷，傷病員增多，給部隊行動帶來了很大困難。當時醫療條件差，對每位傷患的照顧難以周全”。夏曦在六軍團衛生部和同志們的談話中，提到自己在湘鄂西主持肅反時的擴大化錯誤，沉痛地說：“我一想起來就感到內疚，這是我還不了的帳啊。一定得解決好傷患問題，受傷的同志都是有功之人，不能再讓我有負於傷患啊。”^①

六、夏曦肅反被殺人數考辨：幾百人被殺，大多是幹部

湘鄂西蘇區肅反被殺人數是關於這段歷史的基本問題，但是卻出現了不同的說法。由於當時局勢的動盪和管理的粗糙，絕大部分史料沒有保存下來，最終的精確數字難以確定，不過還是可以努力去接近歷史真相。

關於被殺人數，由於賀龍元帥的權威地位，他1961年回顧二方面軍歷史時談到的一個數字流傳很廣。賀龍說：“夏在洪湖一直殺了幾個月，只在這次‘肅反’中就殺了一萬多人。”^②按賀龍的說法，單是第一次肅反就殺了一萬多人，不少人據此認為湘鄂西是肅反殺人最多的蘇區。但是，賀龍當年作為軍事領導人並不參與肅反領導，領導肅反的是政治領導人夏曦和關向應。賀龍自己也說：“那時捉人都是夏曦給關一個條子，關即按照夏的指示捉。條子根本不給我看。”^③賀龍談到的這個數字並沒有得到其他史料的支援，他回憶時肅反已過去三十年，很可能是痛惜激動之下的誇張說法。

① 宋威：《改正錯誤中的夏曦》，《黨史研究與教學》1991年第2期，第42-43頁。

② 賀龍：《賀龍關於一九三〇年冬至一九三四年間湘鄂西武裝鬥爭問題的談話》（1961年4月18-20日），《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二），第657-658頁。

③ 賀龍：《賀龍關於一九三〇年冬至一九三四年間湘鄂西武裝鬥爭問題的談話》（1961年4月18-20日），《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二），第657頁。

當然還有一種可能，賀龍使用的是廣義的肅反概念，也就是說把基層組織和群眾為鞏固政權大規模殺戮地主、富農等的激烈行為也包括了。任光明在文章中提到了另一個數字：“1985年至1987年，中央組織部清理落實肅反被錯殺人員時，僅洪湖所在的荊州地區有名有姓被錯殺的人員就有2850人。”^①但筆者認為，在蘇區失敗的混亂之中，甚至夏曦本人都搞不清楚是否殺了柳直荀、潘家辰，1985年距離洪湖肅反發生已過去53年，當事人大多都已去世，幾十年後不太可能搞清誰被錯殺，誰是死於其他原因。在1980年代的大和解時期，按照歷史問題“宜粗不宜細”的原則，平反冤假錯案本有“一風吹”的傾向，落實政策會給家屬帶來好處，難免把各種原因死去和失蹤的人上報為錯殺人員，各級機關也很難核實。這個時期調查使用的肅反概念也比較寬，得到的數字往往誇大。

本書中使用的是狹義的肅反概念，主要指在黨、政、軍系統內部的集中肅反，不包括針對地主富農等敵對勢力的肅反。夏曦1934年9月向中央彙報了肅反被捕和被殺人數，使用的大致就是狹義肅反概念。當時肅反親歷者賀龍、關向應等都在，記憶仍很清晰。任弼時自兩軍會合後，即隨二軍團行動，同時調夏曦去六軍團。到1935年1月丁家溶會議，任弼時已經在二軍團工作了近三個月，親自做了大量調查，他在報告中採用了被捕二千人以上這個數字，應該是經過賀龍、關向應認可的。因此，夏曦報告即使有掩飾錯誤的傾向，也不敢偏離事實太多。

夏曦在報告中說：“一次肅反的材料，失敗時沒有帶出來，逮捕的約計千餘人，處死刑者約百數十人，這些分子，最大部是一九三一年以前加入的。二、三、四次肅反逮捕的總數，共六百四十九人：二次二百四十一人；三次二百三十六人，四次一百七十二人”。“審判的結果：二次十四人（不確）處死刑，三次處死刑的五十六人，四次處死刑的四十一人。因病死的共二十八人；其餘大部分自首釋放；有四十餘人開除紅軍軍籍送出蘇區。二、三、四次未書明如何判決的：二次一百九十八人，三次六十九人，四次

^① 任光明：《“萬夏之爭”與湘鄂西蘇區肅反》，《紅岩春秋》2011年6月，第13頁。

二十六人。未書明如何判決中，在二次裡有一部分是處死刑的或逃跑，三、四次則系立即開釋的或開釋未書明的”。“對於下層的幹部，一、二、三次從連長以下大部分准其自首，戰士完全不逮捕，至第四次，團長有幾個准其自首，恐怖情緒也減弱了。”^①按照夏曦報告中的說法，四次肅反加起來，總共被捕人數約兩千人，被殺和病死的約三百餘人，最後情況不明的（被殺或逃跑）也有約三百人。

夏曦提到的數字可能有所縮小，實際被捕人數可能約三千人，不是兩千人。半年之前，夏曦3月17日曾向給中央報告肅反成就：“湘鄂西蘇區及紅三軍經過四次肅反，前後逮捕三千多人”。^②筆者認為被捕約三千人的數字比較可信，當時夏曦把肅反當作成績，沒有掩飾的心理，這個數字得到了其它史料的支持。莊東曉1934年1月23日給中央寫的報告談到：“據說當時被捕犯人將及兩千”。^③莊東曉說的是自己親歷的第一次肅反，加上後三次肅反被捕人數，大致與總共約三千人數字吻合。夏曦報告中提到二次肅反逮捕241人，也與賀彪的回憶大致吻合，賀彪說：“像我這樣被捕的‘改組派’、‘反革命’約200人。”^④

綜上，夏曦領導的湘鄂西四次肅反被捕總人數約為三千人，被殺人數缺少其他材料，只好暫時採用夏曦報告的數字，因為當時肅反管理很嚴，被捕人員並不容易逃跑，如果把情況不明的大部分算作被殺，則被殺人數約為六百人，至少是在數百人這個數量級。當然，雖然湘鄂西肅反的領導比較集中，但是地方幹部肅反中擅自抓人、殺人的情況也很難避免，實際受害人數肯定會高於這個數字，基層群眾自發殺戮地主、富農的數量就更難以統計了。

① 夏曦：《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給中央的報告》（1934年9月15日），《湘鄂西蘇區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第429-430頁。

② 《夏曦、賀龍、關向應給中央的報告》（1934年3月17日），《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二），第570頁。

③ 莊東曉：《莊東曉關於湘鄂西蘇區情況給中央的綜合報告》（1934年1月23日），《湘鄂西蘇區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第374頁。

④ 賀彪：《賀彪回憶錄》，第71頁。

湘鄂西肅反受害人集中于黨員幹部，部隊中連以上幹部90%被當成改組派，地方黨和蘇維埃縣級以上幹部也是90%被當成改組派，蘇聯留學回來派到湘鄂西的四十多個學生幾乎都被當成改組派，他們大多被拘捕殺害，^①蘇區有威望、有能力的幹部大部分都被殺了，革命骨幹損失非常慘重。

七、小結

六屆四中全會前後，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為了把革命重心轉移到農村，為了加強對紅軍和蘇區的集中統一領導，先後派項英、任弼時等到中央蘇區組建中央局，派張國燾、沈澤民、陳昌浩到鄂豫皖，派夏曦、關向應到湘鄂西，建立中央分局。

這些代表中央的領導人到達蘇區後，在加強集中統一領導的過程中，都與開創紅軍和蘇區的地方領導人發生了衝突。在中央蘇區，毛澤東在寧都會議被取消了領導權；在鄂豫皖，張國燾通過殘酷的肅反取得了絕對控制；湘鄂西肅反也是這種權力衝突中的一部分。由於農村革命隊伍中簡單粗暴的風氣，肅反嚴重擴大化了，遠遠超出了為建立統一領導的必要程度。

夏曦領導湘鄂西肅反還有其特殊的悲劇特點，那就是夏曦領導能力的嚴重不足，與中央賦予他建立集中統一領導的使命之間，形成了無法克服的矛盾。張國燾有較強的領導能力，在通過肅反打擊了部分反對者之後，他在四方面軍建立了牢固的權威。但是夏曦缺乏必要的領導能力，他通過肅反打擊了反對者，卻沒有能力贏得下級的敬畏，以至於為了勉強維持領導，不得不先後進行四次肅反，幾乎把湘鄂西有威望的幹部殺光了。他最後只落得孤家寡人的下場，在中央不滿、全軍憤恨中黯然離開。從這

^①《任政治委員在紅二軍團黨的積極分子會議上的報告》（1935年1月27日），《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歷史文件彙集》（1934—1936），湖南、湖北、四川、貴州檔案館1984年，第256頁。

個角度來講，夏曦也是一個被放錯了位置、身不由己的悲劇人物。

夏曦從 1921 年入黨到 1935 年犧牲，總共有 14 年的革命歷史，在其中 12 年中他被認為是個不錯的幹部，而在 1932 到 1934 這兩年中，他卻成了湘鄂西幹部戰士眼中的恐怖象徵。但肅反的不僅僅是夏曦，甚至在肅反中被殺的朱勉之、周小康、蔚士鈞等，本身也參與過肅反。或許可以說，在某些特殊的環境下，平時的正常人可以變成魔鬼，比如南京大屠殺中的日本兵、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派。人性中的黑暗深不可測，在正常時代裡，古老的、現代的文明規則制約著這種黑暗。一旦在激烈、緊張、野蠻、混亂的特殊環境催生出不受制約的絕對權力，一旦絕對權力衝破了基本的文明規則，一旦生死存亡的巨大壓力扭曲了人性，世界將變成人與人互相迫害和仇殺的黑暗地獄。如何防患於未然，避免這種極端環境再次出現，是我們從歷史中得到的深刻教訓。

餘論：彈性集中體制的有效性和適應性

1934年的中國共產黨看起來前景黯淡，三大蘇區先後陷落，失去了絕大部分根據地和群眾，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事實上已不復存在。幾支主力紅軍在國民黨軍隊圍攻中處境險惡，最後經過長征 1936年在陝北會合時，剩餘部隊大約只有四萬人，此時白區力量損失殆盡，絕大多數中共黨員都在這裡了。然而，這些百戰淬煉的革命者積累了豐富軍事政治經驗，很多紅軍裡長大的小夥子已經成長為能獨當一面開闢根據地的將才，1949年的建國領導人和一千多位開國將軍大都在這四萬人裡，中共核心團隊雖然歷盡艱險，仍然比較完整地保存下來了。

更為重要的是，經過十年武裝斗争中血與火的鍛造，中國共產黨建立了高度集中統一的嚴密組織，“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黨指揮槍”成為神聖原則。依靠這些原則，中共在動盪的南方農村建立了新的政治秩序，進而把農民中蘊藏的巨大力量動員起來，創造了十幾萬主力紅軍和上千萬人口的蘇區政權，抵抗國民黨重兵圍攻數年之久。雖然南方蘇區在力量懸殊的國共戰爭中最終失敗，但中共已經顯示出驚人的政治建設和動員能力，遠非派系紛雜的國民黨所能比擬。當然，鍛造組織的過程中也始終伴隨著激烈的矛盾衝突，並且在殘酷肅反中付出了痛苦高昂的代價。

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長征到北方的紅軍改編成八路軍，開赴華北前線。在當時的敵後淪陷區，國民黨軍政機構大多崩潰，日軍也只能守住城市 and 交通線，廣大農村陷入兵匪橫行的混亂之中，八路軍憑藉紅軍時期鍛造出來的強大組織，迅速重建了政治秩序，吸收大批青年農民和知識份子

加入革命隊伍，中共軍政力量以驚人的速度增長。到1945年日本投降時，中共軍隊已經達到一百萬，控制了山東、河北、江蘇、山西、陝西等省的大片區域，領導下的廣大群眾多達一億人。

缺少成熟領導集體，始終是早期中共組織的大問題。中共建立初期是共產國際的支部，得到經費、組織和政策上的幫助，但共產國際領導人不熟悉中國實際情況，也不信任中國幹部。中共歷任領導人陳獨秀、瞿秋白、向忠發、李立三、王明、博古都難以勝任，一方面中共建立起高度集中統一的強大組織，另一方面在組織頂端卻缺少成熟的領導集體，不僅難以發揮組織的潛在力量，甚至會因權力過於集中造成災難，這在李立三、博古領導時期非常明顯，夏曦在湘鄂西的集權領導也造成了慘重損失。

在1935年初的遵義會議上，民主機制發揮了作用，博古、李德下臺，毛澤東進入領導核心。在先後戰勝了張國燾和王明的挑戰之後，經過共產國際的認可，毛澤東在1938年10月六屆六中全會上成為中共領袖，他與周恩來、劉少奇等組成了中共第一個成熟的領導集體。中共在抗日戰爭中發展順利，領導威望越來越高，在1945年中共七大上，毛澤東為核心的領導集體獲得全黨的由衷擁戴。

中國共產黨在紅軍時期已建立嚴密組織，又在抗戰時期獲得了廣大群眾和成熟領導集體，中共的組織優勢已經足以抵消兵力劣勢，成為抗戰勝利後中國最強大的軍事政治力量。不過由於表面上國民黨擁有四百萬軍隊和三億多人的國統區，甚至中共自己都沒有認清這一點，所以在國共談判中不斷讓步，只謀求建立地方自治政權。當談判破裂，國共兩黨1946年夏天爆發全面戰爭之後，中共的強大力量很快顯現出來，僅僅兩年半時間就橫掃幾百萬敵軍，推翻了國民黨政權。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革命戰爭中鍛造出來的強大組織體系，成為當代中國政治體制的基礎，對中國命運產生了深遠影響。

巴林頓·摩爾在《民主和專制的社會起源》中提出，世界各國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的現代化進程中，難以避免由於新舊勢力無法妥協發

生暴力革命，有些國家即使避免了革命，代價也同樣巨大。^①英國、法國、美國都曾發生大規模內戰，德國和日本通過自上而下的改革避免了國內革命，但由於舊勢力過於強大轉向對外侵略，引發了血腥的世界大戰，只有當舊勢力被外國力量摧毀之後，德國和日本才真正成為現代國家，而印度則由於沒有足夠內外力量掃除保守勢力，在現代化道路上步履艱難。

中國和俄國在現代化進程中出現了特殊情況，在新勢力還沒有強大到足以取代舊勢力的時候，舊勢力就在內外力量的衝擊之下倒臺了，於是在廣袤國土上出現了政治秩序的大崩潰。中國在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之後，無法建立新政治秩序，長期深陷在軍閥混戰之中。俄國在一次大戰中損失慘重，1917年沙皇被迫退位，也陷入政治混亂。正如亨廷頓所說的，“共產主義的政治功能不是推翻權威，而是填補權威的真空”，^②列寧憑藉布爾什維克革命黨的嚴密組織，迅速創建紅軍，在幾年之中擊敗其他軍政勢力，建立起黨領導的國家，開創了發展中國家現代化的新政治模式。

中國與俄國的情況相似，都是幅員遼闊的發展中大國，各種割據勢力有很大迴旋空間，重建政治秩序比大多數國家更為艱難。中國從俄國道路獲得了啟發，也獲得了實際幫助，新興的國民黨和共產黨都試圖學習列寧主義模式。初期國民黨佔有先機，依靠軍事力量取得優勢，但最終還是被組織力更強的共產黨擊敗。

1949年建國之初，中共憑藉強大組織力量迅速消滅敵對勢力，建立新政治秩序，並且在普及教育、控制傳染病、男女平權等社會建設上取得顯著成就。但是強大組織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如果出現偏差，也能造成巨大損失，接下來中國遭遇了大躍進、三年困難和文化大革命等嚴重挫折。

民主集中制是富於彈性的制度，民主和集中的平衡點可以適時移動，

① 巴林頓·摩爾：《民主和專制的社會起源》，華夏出版社1987年，第3頁。

② 薩繆爾·亨廷頓：《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第307頁。

順利的時候集中權力減少紛爭，困難的時候則通過民主來糾正錯誤。雖然中共在長期革命戰爭中形成了偏于集中的傳統，但民主機制也頑強地發揮著作用，在某些重大歷史關頭，甚至發揮扭轉乾坤的決定性作用。這特別體現在1935年遵義會議和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這兩次充滿民主精神的會議都撤換了不稱職的最高領導人，推出了更有能力的新領導集體，帶領中共走出困境，開闢出新的大發展期。這說明民主集中制有很強的適應性，民主的糾錯能力可以挽救危局。

1978年改革開放之後，鄧小平把國家從階級鬥爭轉到現代化方向。事實證明，中共強大的組織力在經濟建設中也同樣有效，中國在四十多年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發展成就。而印度作為與中國可比性最強的國家，由於保守勢力根深蒂固，雖然保存了豐富多彩的多元文化，也擁有形式上的現代民主制，但是由於政府效能不足，在經濟、教育、基礎設施等現代化指標上已明顯落後。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迅猛發展，中產階級日益壯大，人民教育水平顯著提高。高考招生人數從1977年的27萬增加到2022年的900多萬，九千多萬中共黨員中超過50%擁有大專以上學歷，中國以及中國共產黨生存和發展的內外環境都發生了不可逆轉的深刻變化。根據英格爾哈特的實證研究，社會進步“最可能的情況是通過代際人口更替”^①，隨著教育程度更高的年輕一代不斷成長，富於彈性的民主集中制也將不斷進步，推動中國現代化到達新的高度。

^① 羅奈爾得·英格爾哈特：《現代化與後現代化——43個國家的文化、社會與政治變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10頁。

參考文獻

一、史料：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18),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1992年。

《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26),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

《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1-6),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1998年;(7-12),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13-21),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2012年。

《湖南革命歷史文件彙集》,中央檔案館、湖南省檔案館1984年。

《江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中央檔案館、江西省檔案館1986年。

《福建革命歷史文件彙集》,中央檔案館、福建省檔案館1983年。

《江蘇革命歷史文件彙集》,中央檔案館、江蘇檔案館1984年。

《中共中央長江局文件彙集》,中央檔案館1985年。

《中共中央南方局文件彙集》,中央檔案館1985年。

《中共中央北方局文件彙集》,中央檔案館1992年。

《河北革命歷史文件彙集》,中央檔案館、河北省檔案館1992年。

《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中央檔案館、陝西省檔案館1992年。

《東北地區革命歷史文件彙集》,中央、遼寧、吉林、黑龍江檔案館1988年。

《廣東革命歷史文件彙集》,中央檔案館、廣東檔案館1982年。

《鄂豫皖蘇區革命歷史文件彙集》,中央、湖北、河南、安徽檔案館

1985年。

《湘鄂西蘇區革命歷史文件彙集》，中央、湖北、湖南檔案館1987年。

《閩粵贛革命歷史文件彙集》，中央檔案館1985年。

《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歷史文件彙集》(1934-1936)，湖南、湖北、四川、貴州省檔案館1984年。

《六大以來》，人民出版社1980年。

《紅色中華》，1931-1934年。

《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上、下)，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年。

《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

《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上、中、下冊，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

《中央革命根據地歷史資料文庫》(1-13)，中央文獻、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2015年。

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教研室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4、13、14冊。

總政治部辦公廳編：《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歷史資料選編》，解放軍出版社2002年。

王健英編：《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彙編》，紅旗出版社1983年。

姜華宣等編：《中國共產黨會議概要》，瀋陽出版社1991年。

《江西黨史資料》(1-18)，江西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1987-1991年。

《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鄂豫皖時期》，解放軍出版社1993年。

《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

《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農民運動資料》，人民出版社1983年。

《廣州起義資料》，人民出版社1985年。

《馬日事變資料》，人民出版社1983年。

《南昌起義資料》，人民出版社1979年。

《八七會議》，中共黨史出版社1986年。

《平江革命歷史文獻資料集》，中共湖南省平江縣委黨史資料徵集小組辦公室 1983 年。

《“圍剿”中央蘇區作戰秘檔》，中國文史出版社 2007 年。

《海陸豐革命史料》第二輯，廣東人民出版社 1986 年。

《中共中央北方局·土地革命時期》，中共黨史出版社 2000 年。

《湘鄂贛革命根據地文獻資料》(第一輯)，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羅章龍右傾分裂主義批判資料》1972 年 5 月鉛印本，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圖書館藏。

《反對羅章龍右傾分裂主義資料彙編》(文革時期鉛印本)，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圖書館藏。

《列寧選集》第一卷、第四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

《斯大林論中國革命問題》，聯合出版社 1949 年。

《毛澤東集》第二版(1-5)，蒼蒼社 1983 年。

《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毛澤東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

《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一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3 年。

《毛澤東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國人民解放軍出版社重印 1984 年。

《毛澤東年譜》，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3 年。

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 1893-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6 年。

張仲舉編著：《毛澤東詩詞全集譯注》，陝西人民出版社 1999 年。

《周恩來軍事文選》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97 年。

《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中共中央文獻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1989 年。

《朱德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6 年。

《朱德傳》，中央文獻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1993 年。

《任弼時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4 年。

《中國赫魯雪夫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言論集》(1923.8-1944.10),人民出版社資料室1967年。

《蔡和森文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

《方志敏全集》,人民出版社2012年。

《陳毅軍事文選》,解放軍出版社1996年。

郭德宏編:《王明年譜》,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

黃仲芳、羅慶宏主編:《井岡山鬥爭口述史》(上、下),江蘇人民出版社2015年。

《何孟雄文集》,人民出版社1986年。

《回憶中央蘇區》,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

《星火燎原》(1),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士出版社1979年。

《星火燎原未刊稿(1)》,解放軍出版社2007年。

《紅軍反“圍剿”·回憶史料》,解放軍出版社1994年。

《彭德懷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

《黃克誠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年。

賀龍:《回憶紅二方面軍》,《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1期。

蕭克:《紅二、六軍團會師前後》,《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1期。

徐海東:《生平自述》,三聯書店1982年。

張國燾:《我的回憶》,東方出版社1991年。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

羅章龍:《椿園載記》,東方出版社1989年。

《羅章龍回憶錄》,溪流出版社2005年。

《徐向前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2007年。

《聶榮臻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2007年。

《粟裕戰爭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

《何長工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87年。

蕭克:《朱毛紅軍側記》,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

江華:《追憶與思考》,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

伍修權：《回憶與懷念》，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

龔楚：《我與紅軍》，香港：南風出版社1954年。

滕代遠：《中國新軍隊》（1936年），解放軍出版社2008年再版。

《周士第回憶錄》，人民出版社1979年。

《蕭克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97年。

《龔楚將軍回憶錄》，香港：明報月刊社1978年。

《耿飆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91年。

《張宗遜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2008年。

《程子華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2015年。

《陳再道回憶錄》，解放軍回憶錄2009年。

《李志民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93年。

《葉飛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

《王平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

《楊得志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

《李聚奎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86年。

《鐘期光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

《吳法憲回憶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9年。

《邱會作回憶錄》，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11年。

《賀彪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2001年。

《張金保回憶錄》，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

《謝覺哉日記》，人民出版社1984年。

《關向應紀念文集》，大連出版社2002年。

《一個革命的倖存者——曾志回憶錄》，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年。

《劉英自述：張聞天夫人人口述歷史》，人民出版社2012年。

《陳伯鈞日記·文選》，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2年版。

《文強口述自傳》，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

《中共黨史人物傳》精選本（1），人民日報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

- 《李先念傳》，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
- 《紅軍的耳目和神經——土地革命時期通信兵回憶錄》，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年。
- 《北京革命史回憶錄》第二輯，北京出版社1991年。
- 《紅色往事》第一冊，濟南出版社2012年。
- 《中共重大歷史事件親歷記》第一編，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年。
- 袁林：《征途漫漫——我的紅軍生涯》，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
- 陳複生：《九死複生——一位百歲老紅軍的口述史》，中央文獻出版社2010年。
- 羅東進：《我的父親羅榮桓》，遼寧人民出版社2003年。
- 蔣伯英：《蕭克將軍訪談錄》，《黨史研究與教學》2009年第2期。
- 羅明：《關於“羅明路線”問題的回憶》，《中共黨史資料》1982年第2輯。
- 蕭揚整理：《胡喬木談毛澤東與張聞天》，《炎黃春秋》2011年第8期。
- 李銳：《廬山會議實錄》，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
- 何方：《何方談史憶人：紀念張聞天及其他師友》，世界知識出版社2010年。
- 袁溥之：《往事歷歷》，《廣東黨史資料》第三輯，廣東人民出版社1984年。
- 朱道南口述、於炳坤整理：《在大革命的洪流中》，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
- 鄒賢敏、秦紅主編：《博古和他的時代》，當代中國出版社2016年。
- 《湘鄂西風暴——監利革命歷史回憶》，長江文藝出版社1986年。
- 《重評古田會議》，中共龍岩地委黨史資料徵集研究委員會編印1984年。
- 《鄧演達先生遺集》，香港：楊逸棠發行1932年。
- 曾憲林、萬雲主編《鄧演達歷史資料》，華中理工大學出版社1988年。
- 楊資元、馮永寧：《鄧演達》，廣東人民出版社2008年。

夏蓮瑛訪談記錄、胡志偉翻譯校注：《張發奎口述自傳》，當代中國出版社2012年。

鮑勁夫：《許繼慎將軍傳》，解放軍出版社1986年。

胡允恭：《金陵叢談》，人民出版社1985年。

黃嘉謨編：《白崇禧將軍北伐史料》，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

蔣永敬編：《北伐時期的政治史料——一九二七年的中國》，臺北正中書局1981年。

《細說中統軍統》，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92年。

《反共鬥爭經驗談》，臺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72年。

《黨的文獻》1988年1期、4期，1991年2期、3期，1999年2期，2000年2期，2001年6期，2006年3期，2008年2期、3期

《黨史資料叢刊》1981年第3輯。

《黨史研究資料》(5)，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

《廣東文史資料第42輯——中國國民黨“一大”史料專輯》，廣東人民出版社1984年。

《羅易回憶錄》，商務印書館，1978年。

《羅易赴華使命》，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1年。

《鮑羅廷在中國的有關資料》，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

切列潘諾夫：《中國國民革命軍的北伐》，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

薩坡什尼柯夫：《1924-1927年中國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湖北人民出版社1958年。

巴庫林：《中國大革命武漢時期見聞錄》，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

奧托·布勞恩：《中國紀事1932-1939》，現代史料編刊社1980年。

《共產國際有關中國革命的文獻資料》第1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

《羅易對大革命失敗的回憶》(1938年),《國外中國近代史研究》第7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

《國外中國近代史研究》第13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

羅素:《中國到自由之路——羅素臨別講演》,《羅素談中國》,浙江文藝出版社2001年。

愛德格·斯諾:《西行漫記》,三聯書店1979年。

史沫特萊:《偉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時代》,三聯書店1979年。

二、著作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

楊奎松:《“中間地帶”的革命——國際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

王奇生:《國共合作與國民革命》(1924-1927),鳳凰出版傳媒集團、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年。

黃道炫:《張力與限界——中央蘇區的革命(1933-1934)》,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

余伯流、凌步機:《中央蘇區史》,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

何友良:《蘇區制度、社會和民眾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

凌步機:《中央蘇區軍事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

蔣伯英:《1929:朱毛紅軍和古田會議》,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

王健英:《紅軍史疑難考辨》,中共黨史出版社2009年。

黃少群:《周恩來在1927至1935年》,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年。

戴茂林、曹仲彬:《王明傳》,中共黨史出版社2008年。

黃焜:《革命與鄉村——從暴動到鄉村割據:1927-1929》,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

陳德軍:《鄉村社會的革命——以贛東北根據地為研究中心1924-1934》,上海大學出版社2004年。

- 任偉：《中共軍隊早期形態研究》，北京大學歷史系博士論文(2016)。
- 戴向青、羅惠蘭：《AB團與富田事變始末》，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
- 萬振凡等：《蘇區革命與農村社會變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
- 唐寶林：《中國託派史》，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4年。
- 韓榮璋、陳朝響、陳立旭：《毛澤東與古田會議》，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年。
- 袁德金：《毛澤東與陳毅》，中國青年出版社2008年。
- 賴宏：《毛澤東與紅軍》第一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年。
- 賀彪：《湘鄂西紅軍鬥爭史略》，華夏出版社1988年。
- 《湘鄂西革命根據地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 《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
- 蔡少卿：《民國時期的土匪》，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3年。
- 邵雍：《中國近代綠林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
- 張永：《民國初年的進步黨與議會政黨政治》，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
- 張永：《梁啟超與護國運動》，天津人民出版社2022年。
- 陳佑慎：《持駁殼槍的傳教者——鄧演達與國民革命軍政工制度》，臺北：時英出版社2009年。
- 薩繆爾·亨廷頓：《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三聯書店1989年。
- 羅奈爾得·英格爾哈特：《現代化與後現代化——43個國家的文化、社會與政治變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
- 巴林頓·摩爾：《民主和專制的社會起源》，華夏出版社1987年。
- 費正清：《偉大的中國革命》，世界知識出版社2000年。
- 史華慈：《中國的共產主義與毛澤東的崛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
- 裴宜理：《華北的叛亂者與革命者》，商務印書館2007年。
- Lucien Bianco : Peasants without Party ,New York: M.E.Sharpe,Inc.,2001.

畢仰高：《第六章 農民運動》，《劍橋中華民國史》下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

亞歷山大·潘佐夫：《毛澤東傳》，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年。

菲爾·比林斯利(美)：《民國時期的土匪》，中國青年出版社1991年。

三、論文

楊奎松：《王明上臺記》，《民國人物過眼錄》，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

金沖及：《中國共產黨在革命時期三次“左”傾錯誤的比較研究》，《黨的文獻》2000年第2期。

陳永發：《中共早期肅反的檢討：AB團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7期，1988年。

陳永發：《政治控制和群眾動員：鄂豫皖肅反》，《大陸雜誌》86卷1、2、3期，1993年。

陳耀煌：《中共湘鄂西蘇區的發展及其內部整肅(1927-1933)》，《國史館學術集刊》第15期。

應星、李夏：《中共早期地方領袖、組織形態與鄉村——曾天宇及其領導的江西萬安暴動為中心》，《社會》2014年5期。

應星：《蘇區地方幹部、紅色武裝與組織——東固根據地與延福根據地的對比研究》，《開放時代》2015年6期。

黃文治：《民眾動員視野下的中共與富農——以鄂豫皖蘇區為中心的考察(1927~1932年)》，《開放時代》2010年10期。

曹仲彬：《六屆四中全會召開的日期、地點、出席人數問題》，《黨史資料叢刊》1981年3期。

李海文：《東方旅社事件與李求實等人的被捕犧牲》，《中共黨史拐點中的人物與事件》，中國青年出版社2014年版。

戴茂林：《六屆四中全會前後有關王明研究的幾則史實辨析》，《中共黨史研究》2011年11期。

章學新：《任弼時提出“以毛代項”為中央局代理書記始末》，《中共黨史研究》1993年第1期。

王新生：《李德來華的身份及任務新探》，《近代史研究》2009年1期。

王建英：《中共六屆五中全會改組中央考析》，《中共黨史研究》2013年第10期。

姜義華：《論一九三一年鄂豫皖蘇區的“肅反”》，《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80年3期。

陳錫華：《淺談列寧時期的清黨經驗》，《理論戰線》第195(1983年)。

江林平：《淺析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人民解放軍高級將領的地域分佈》，《珞珈史苑》2015年。

謝廬明、陳東：《中央蘇區時期中國共產黨對土匪和會道門的爭取和鬥爭述論》，《贛南師範學院學報》2006年第5期。

楊會清：《土地革命時期黨對土匪的政策與策略演變——以革命動員的視角》，《贛南師範學院學報》2008年第2期。

徐保琪：《對有關黨的六屆四中全會幾個史實的補正》，《黨史研究資料》1984年第11期。

盧慶洪：《羅章龍策劃“第二中央”始末》，《文史精華》2008年8期。

楊祖培：《反立三路線、反調和路線之剖析》，《近代史研究》1982年2期。

郭煜中：《張國燾在鄂豫皖根據地的肅反經驗及其惡果》，《安徽史學》1987年3期。

敏志：《張國燾在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的錯誤“肅反”》，《江淮文史》1994年3期。

張建德：《略述湘鄂西蘇區反“改組派”的鬥爭》，《中共黨史研究》1992年第3期。

任光明：《“萬夏之爭”與湘鄂西蘇區肅反》，《紅岩春秋》2011年6月。

宋威：《改正錯誤中的夏曦》，《黨史研究與教學》1991年第2期。

王建強：《紅軍時期的士兵委員會制度探析》，《中共黨史研究》2015年

第5期。

村田忠喜：《1929年的毛澤東》，《黨史研究資料》1987年12期。

石川禎浩：《走向農村革命——中國共產黨的農民運動策略與共產國際》，《中國近代歷史的表與裡》，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



責任編輯：章明
封面設計：石慶華

ISBN 978-988-31266-0-1



9 789883 126601

定價：HK\$ 175元